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俄国档案文献有四个专题，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1941年8月至1948年11月）、“犹太人‘黑皮书’”（1944年8月至1948年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1943年5月至1953年4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专题：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在苏联，出现了一个由境内著名犹太人士组成的、以反抗法西斯为宗旨的组织，即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这个组织在战争期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专题刊出的49份文件，展示了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苏联“犹委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历史。

“犹太人‘黑皮书’”专题：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以后，计划出版一本记录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黑皮书”，向全世界揭露和声讨法西斯的罪行。“犹委会”及著名犹太人作家爱伦堡为编撰“黑皮书”、争取“黑皮书”的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最终，英文版的“黑皮书”在纽约出版，而俄文版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本专题刊出的文件向读者介绍了“犹委会”出版“黑皮书”的动机，及俄文版最后未能出版的原因。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专题：“犹委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大量工作，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特别是战争的临近结束，“犹委会”与国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包括向国外寄送大量材料，以及在国内为各地犹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并被加上了各种罪名。“犹委会”最终被政府取缔，一些重要的领导人被捕并被处决。本专题共14份文件，它们揭示了“犹委会”如何遭受安全部门强加的“莫须有”罪名及“犹委会”的最后结局。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专题：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于1948年被取缔后，一批著名的犹太族人士，包括作家、演员、科学家、诗人等，相继遭到逮捕。他们当中，有“犹委会”的领导人或积极参与其活动者；有的则与“犹委会”没有太多的联系。经过三年多的囚禁，他们备受折磨。本卷刊出的大部分档案材料，是这些曾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并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法庭接受审讯的记录。他们在法庭为自己作了最后的然而却是徒劳的申诉。一个多月以后，绝大部分受到审讯的人被处决。此外，在刊出的档案材料中，还有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作出的判决书和裁决书。本专题刊出的档案材料真实地再现了苏联历史这一大冤案的来龙去脉。

丁 明

2001年2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25 - 1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41年8月至1948年11月)

专题说明..... 25 - 1

No03727 米霍埃尔斯等人关于举行犹太人大会给洛佐夫斯基的建议 (1941年8月16日) 25 - 3

No03728 米霍埃尔斯等联名发表的告世界犹太人书 (1941年8月24日) 25 - 5

No03729 第一次犹太人大会发言记录 (选编) (1941年8月24日) 25 - 9

No03731 布劳恩就响应犹太人大会的号召致米霍埃尔斯的信 (1941年8月30日) 25 - 22

No03721 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 (1941年10月) 25 - 24

No03722 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 (摘录) (1941年10月) 25 - 25

- №03732** 卡尔马诺维奇就建立犹太人部队致米霍埃尔斯的信
(1941年12月14日) 25-27
- №03724** 埃利希就无端被拘捕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的申诉书(摘录)(1941年12月27日) 25-29
- №03742** 洛佐夫斯基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基本
方针草案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2月5日) 25-31
- №03743** 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就犹太会组成及职能问题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1942年3月4日) 25-34
- №03736**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出版犹太人报纸致
谢尔巴科夫的信(1942年3月4日) 25-36
- №03744** 爱泼斯坦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致
谢尔巴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2年4月13日) 25-38
- №0373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出版犹太人
反法西斯委员会报纸的决定
(1942年4月27日) 25-40
- №03739**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增加《团结报》的发行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1942年5月13日) 25-41
- №03725**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就埃利希自杀问题
的报告(1942年5月18日) 25-43
- №03745** 第二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犹太人书
(1942年5月24日) 25-44
- №03748**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
(摘要)(1942年5月28日) 25-49
- №03723** 茹科夫关于逮捕埃利希和阿爾特的报告
(1943年2月) 25-54

- №03726** 奥戈利佐夫关于处决阿尔特给梅尔库洛夫的报告
(1943年2月17日) 25-56
- №03749**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言
速记记录(摘录)(1943年2月18~20日) ... 25-57
- №03750** 弗里德里希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的报告(1943年4月7日) 25-63
- №03811** 洛佐夫斯基关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国外之行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3年7月15日) 25-68
- №03817**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关于派代表前往英国和
巴勒斯坦的建议(1943年8月18日) 25-70
- №03785** 犹委会关于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共和国致苏联
人民委员会的信(1944年2月15日) 25-72
- №03751** 第三次犹太人大会发言记录(摘编)
(1944年4月2日) 25-76
- №03753** 爱泼斯坦在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1944年4月8~11日) 25-78
- №03767** 犹委会就乌克兰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命运呈
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5月18日) 25-80
- №03770** 贝利亚关于救助在乌克兰幸存的犹太人的指示
(不早于1944年5月) 25-83
- №03771** 犹委会就组织安排对犹太人的物质援助问题给
苏联情报局的报告(1944年8月1日) 25-84
- №03826** 犹委会就申请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致
莫洛托夫的信(1944年8月18日) 25-86
- №03827** 犹委会就申请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致
谢尔巴科夫的信(1944年8月30日) 25-88

- №03828** 谢尔巴科夫就犹委会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9月2日) 25-90
- №03772** 犹委会就国外救援犹太人物资分配中的问题呈
莫洛托夫的信(1944年10月28日) 25-91
- №03773** 波波夫就乌克兰、白俄罗斯犹太人援助工作情况
呈莫洛托夫的报告(摘录)
(1944年11月) 25-94
- №03775** 米霍埃尔斯就犹太著名评论家古尔维奇的医疗
问题致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娃的信
(1945年4月18日) 25-98
- №03783** 美国乌克兰同乡会就援助乌克兰犹太人问题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信
(1945年4月25日) 25-99
- №03777** 犹委会就苏联犹太人物质支援工作的安排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5年8月28日) 25-103
- №03778**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国外犹太人组织救援物资分配
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5年10月17日) 25-106
- №03789** 犹委会就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问题致苏联部长
会议的信(1946年) 25-108
- №0382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犹委会派代表出席
世界犹太人大学生代表大会的意见
(1946年8月8日) 25-110
- №03782** 犹委会关于组织安排对苏联犹太人物质援助
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6年11月26日) 25-111

- No03842** 犹委会就参加反法西斯组织国际代表会议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7年1月17日）…………… 25-113
- No03784** 舒梅科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请示信呈
日丹诺夫秘书处的报告
（1947年2月19日）…………… 25-115
- No03843** 苏斯洛夫就犹委会参加反法西斯组织国际代表
会议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7年2月24日）…………… 25-116
- No03796**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用希伯来语出版
文学艺术丛刊的决定（1947年7月28日）… 25-118
- No0384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犹委会参加
人民民主国家犹太人代表会议的意见
（1948年1月5日）…………… 25-119
- No03884** 犹委会就志愿者申请支援巴勒斯坦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8年5月18日）…………… 25-121
- No03885** 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反应（来信综述）
（1948年6月5日）…………… 25-124
- No03886** 日茨就申请增加《团结报》印数致马林科夫的信
（1948年11月6日）…………… 25-128

犹太人“黑皮书”

（1944年8月至1948年2月）

- 专题说明**…………… 25-130
- No03848** 犹委会就出版俄文版“黑皮书”的准备工作致联共（布）
中央的信（1944年8月23日）…………… 25-132

- №03851** 爱伦堡就“黑皮书”的材料被寄往美国致犹太委员会的信
(1945年1月30日) 25-134
- №03857**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不宜出版“黑皮书”给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摘录)(1947年2月3日) 25-135
- №03861** 犹太委员会关于结束“黑皮书”出版发行工作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3日) 25-137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1943年5月至1953年4月)

- 专题说明**..... 25-138
- №03799** 克鲁日科夫就批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3年5月11日) 25-140
- №03807** 洛佐夫斯基就犹太委员会的成立及战后安排致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3年7月) 25-141
- №03801** 犹太委员会为阐明自己的宣传的立场致联共(布)
中央的信(1943年11月23日) 25-143
- №03808**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就犹太委员会今后的工
作问题呈马林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5年12月25日) 25-147
- №03892** 联共(布)中央专门小组关于犹太委员会及《团结报》
活动情况的报告(摘录)
(1946年9月) 25-149
- №03893** 联共(布)中央干部部就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
的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6年10月7日) 25-154

- №0389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犹委会的工作
情况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摘录）
（1946年11月19日） 25-160
- №03896** 苏斯洛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建议中止犹委会及
苏联学者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摘录）
（1947年1月7~8日） 25-171
- №03894** 亚历山德罗夫就犹太人文学作品状况致日丹
诺夫的报告（1947年4月） 25-173
- №03897** 巴拉诺夫和格里戈良关于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情绪
给日丹诺夫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 25-177
- №03900** 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犹委会的决定（草案）
（1947年7月） 25-180
- №03908** 苏联国家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
长会议的报告（1948年3月26日） 25-182
- №039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查封犹太人反法西
斯委员会的决定（1948年11月20日） 25-197
- №03907** 贝利亚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的报告（1953年4月2日） 25-198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

- 专题说明** 25-202
- №0341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组成和宣布起诉的记录
（1952年5月8日） 25-204
- №1168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费费尔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8日） 25-219

№1168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费费尔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9日)	25 - 238
№1168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泰乌明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9日)	25 - 265
№1168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泰乌明、马尔基什的审问 记录 (1952年5月10日)	25 - 272
№1169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马尔基什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2日)	25 - 284
№1169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马尔基什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3日)	25 - 304
№1169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贝格尔森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3日)	25 - 315
№1169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贝格尔森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5日)	25 - 333
№1169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5日)	25 - 339
№1169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2日)	25 - 356
№1169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3日)	25 - 369
№1169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霍夫斯坦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3日)	25 - 381
№1169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霍夫斯坦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4日)	25 - 386
№1169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尤泽福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5日)	25 - 401
№1170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尤泽福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7日)	25 - 409

目 录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

- №1170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7日) 25 - 433
- №1170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8日) 25 - 436
- №1170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9日) 25 - 457
- №1170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30日) 25 - 479
- №1170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31日) 25 - 509
- №1170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2日) 25 - 525
- №1170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2日) 25 - 538
- №1170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3日) 25 - 548

№1170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4日)	25-564
№1171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4日)	25-578
№1171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5日)	25-582
№1171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6日)	25-590
№11713	费费尔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上的供述记录 (1952年6月6日)	25-603
№1171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7日)	25-606
№1171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7日)	25-616
№1171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8日)	25-628
№1171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9日)	25-636
№1171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9日)	25-654
№1171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0日)	25-663
№1172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和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1日)	25-681
№1172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祖斯金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2日)	25-712

- №1172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什泰恩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2日) 25-739
- №0341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6日) 25-758
- №0341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和证人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7日) 25-765
- №0342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8日) 25-769
- №1172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什泰恩的审问记录
(1952年7月2日) 25-775
- №1172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裁决书
(1952年7月2日) 25-778
- №11725** 费费尔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2日) 25-780
- №11726** 洛佐夫斯基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3日) 25-794
- №1172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布雷格曼患病的裁决书
(1952年7月9日) 25-815
- №11728** 贝格尔森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9日) 25-817
- №11729** 塔尔米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10日) 25-831
- №03421** 费费尔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10日) 25-837
- №11730** 被告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上的最后陈述
(1952年7月11日) 25-840

- №1173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等人的判决书
(1952年7月18日) 25-855
- №1173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执行判决证明书
(不早于1952年8月12日) 25-870
- №11733** 关于布雷格曼的死亡证明书
(1953年1月23日) 25-871
- №1173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终结布雷格曼的
刑事案件的判决书(1953年6月3日) 25-872
- №1173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撤销对洛佐夫斯基等
人的判决并终结该案的判决书
(1955年11月22日) 25-874

【专题说明】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 成立及其活动

(1941年8月至1948年11月)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全体动员，迅速投入到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立的。虽然现在还难以确定“犹委会”成立的准确时间，但是，1942年2月初，“犹委会”已将其活动的“基本方针草案”通过情报局副局长所·阿·洛佐夫斯基上报苏共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由此可见，“犹委会”的成立当在此之前。正式对外宣布则是同年的4月。洛佐夫斯基在苏联战时首都古比雪夫，向外国记者通报了情报局下设一系列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消息，其中就有“犹委会”。由此亦可见，“犹委会”的成立是经官方批准的。“犹委会”成立的宗旨非常明确，即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成立之后，“犹委会”很快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它的第一个举动，是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犹太人大会，并向全世界作了广播转播。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士在大会上的慷慨激昂发言，令各地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战士，无不热血沸腾。战争期间，“犹委会”在情报局的领导下，采用各种形式，包括开

办希伯来语报纸、向国外寄送材料、组织犹太人大会等，用大量事实，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和反动实质；颂扬苏联红军英勇作战、抗击法西斯的英雄业绩；同时，它同北美和欧洲的进步组织保持国际联系，促进战争期间大量的食品、衣物、药品、钱款等项无偿援助，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提供给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事实证明，“犹委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反法西斯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苏联政府对“犹委会”在战争期间开展的活动及取得的成绩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赫鲁晓夫甚至作过这样的评价：“情报局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于我国的利益、我国的政策及共产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在1946年11月，由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米·安·苏斯洛夫组织的对“犹委会”的调查——这次调查已经把封杀的矛头对准了“犹委会”——当中，也不得不承认“犹委会”在动员犹太人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专题刊出的49份文件，充分展示了“犹委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大量活动，有助于人们对这一反法西斯组织作全面的了解。此外，从公布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发现，最早提出成立“犹委会”的人，并非后来担任这一组织领导职务的索·米霍埃尔斯和伊·费费尔等，而是两位来自波兰的革命者——亨·埃利希和维·阿尔特。早在1941年10月，他们便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紧接着，又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令人们不解的是，他们在提出了建议，并随着波兰使馆迁至古比雪夫之后，突然被捕。没有宣布任何拘捕他们的原因。此后，这两位革命者便一个自杀身亡，一个被处决。这一事件的发生，似乎预示了“犹委会”的不幸结局。几年以后，“犹委会”被取缔，它的主要领导人同两位波兰人一样，无一幸免，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材料的理解，编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丁明编辑和校注，
岳书幡、高增训翻译)

№03727

米霍埃尔斯等人关于举行 犹太人大会给洛佐夫斯基的建议

(1941年8月16日)

致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阿·洛佐夫斯基同志

作为犹太人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举办一次邀请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犹太人参加的犹太人大会是非常适宜的。

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犹太人的社会舆论投入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积极支援苏联进行伟大的卫国解放战争。

在我们看来，有身为院士、作家、演员和红军战士的犹太人参加的大会将会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

大会将通过告全世界犹太人书（呼吁书草稿已送交谢尔巴科夫同志^①）。

大会的初步安排如下：

1. 杰博林院士和什捷伦院士联合发言；
2. 斯穆什克维奇将军和克赖特尔将军联合发言；
3. 获奖犹太人红军战士发言；
4. 著名犹太人作家贝格尔森发言；
5. 著名犹太人诗人、勋章获得者克维特科和马尔基什联合发言；
6. 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米霍埃尔斯发言；

^① 亚·谢·谢尔巴科夫（1901～1945），曾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军总政治部部长，苏联情报局局长。

7. 奖金、勋章获得者达维德·奥伊斯特拉赫发言；
8.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眼科专家阿韦尔巴赫教授发言；
9. 美国犹太人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发言（将用英语发言）；
10. 语文学博士努西诺夫教授发言。

索·米霍埃尔斯
达·贝格尔森
克维特科
佩列茨·马尔基什
韦（尼阿明）·祖斯金
加尔金^①
沙·爱泼斯坦
努西诺夫

谢尔巴科夫同志：

我觉得这样的大会似应举办。如果原则上同意举办，对发言人名单可以做某些修正。

所·阿·洛佐夫斯基

^① 加尔金·萨·扎（1897~1960），苏联犹太人诗人、剧作家，1950年被镇压。

No 03728

米霍埃尔斯等联名发表的告世界犹太人书

(1941年8月24日)

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们！

许多欧洲国家和人民受到希特勒主义的粗暴践踏并在其强盗式的铁蹄下流血。法西斯主义奴役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民。每一个被法西斯匪徒野蛮占领的国家都遭受了无情的劫掠和暴力。被洗劫一空的波兰，生灵被涂炭的捷克斯洛伐克，饱受凌辱的法国均被戴上了沉重的枷锁，陷入了桎梏之中。同样悲惨的命运也降临在比利时、荷兰、挪威、希腊、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头上。斯拉夫民族正在受到无情地屠杀。仅仅在塞尔维亚一地，希特勒的军队就屠杀了十万塞尔维亚人。数百座城市和成千上万村庄变成了废墟和瓦砾场。就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暴力、掠夺和杀人放火的血腥场面，法西斯匪徒却将其称之为欧洲的“新秩序”，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徒们，则被冠以“崭新文明的使者”。如此的厚颜无耻实乃从古至今绝无仅有。

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们！

如果说在那些被奴役的国家里血腥的法西斯主义是借助刺刀和绞刑架、借助于疯狂的暴力来推行其所谓的“新秩序”的话，那么在对待犹太民族方面，杀人不眨眼的希特勒主义则已经制定了采用法西斯刽子手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完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强盗式计划。

仅仅在波兰一个国家，希特勒分子就以最野蛮和最肆无忌惮的方式折磨和屠杀了三百多万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甚至当着其双亲

的面强奸其女儿，在有母亲们在场的情况下砸碎孩子们的头颅。那些侥幸得以活命的人也难逃荼毒：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女孩子送往妓院，而男孩则必须被绝育。

犹太人同胞们！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已经把自己的文化同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紧密地连在一起而不可分。

在那些被法西斯主义占领和奴役的国家里，我们不幸的同胞首当其冲地成了最早的牺牲品。在波兰，法西斯暴徒把惨遭他们折磨的人们大批活埋，无名坟墓遍布城乡，数以千计；在鹿特丹的犹太人教堂被纵火焚烧，犹太人哭天号地，血流遍野。这些坟墓和鲜血在向全世界控诉，向全世界大声疾呼。

这些血的控诉，血的疾呼所希求于人们的，不是斋戒和祈祷，而是复仇！不是祷念的烛光，而是把人类的刽子手们通通烧死的烈火；不是眼泪，而是对这些吃人恶魔们的仇恨和奋起反抗！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要么立即行动，要么遗恨永远！

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悲剧般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一直到中世纪——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同当今的法西斯主义带给全人类、其中也包括犹太民族在内的灾难和惨况相比拟，而且犹太民族受到的迫害尤为凶残。

杀人杀红了眼、劫掠劫得发狂的吃人魔鬼们现在已经在进犯这样一个国家了。在这个国家里，各民族人民拥有自己亲爱的母亲——给予他们美好生活，自由，幸福和使其民族文化欣欣向荣的祖国。他们当中也有犹太人。犹太人在这里几千年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同其他民族相互间平等相处，亲密无间。在伟大苏联的肥田沃土上，种田的犹太人第一次开上了拖拉机。犹太人在工厂里操纵起了各式机床。高等学府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他们有的参加了军，有的下了矿井，有的进了实验室。在苏联各民族的大家庭里，犹太民族占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在真正的兄弟友情之中，苏联各族人民携

手并肩建设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民族自由，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现在，由多民族组成的苏联人民原本和平宁静的原野却被鲜血所染红。暂时陷入希特勒恶魔血腥魔爪的城市和乡村正在遭到毁灭。城乡道路两旁，惨遭野蛮折磨致死和被绞死的和平居民的坟墓比比皆是。

但是，伟大的、热爱自由的苏联人民及其传奇式的红军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在苏联的疆场上，英雄的红军在浴血奋战，他们不仅仅为苏联的各民族而战，而且也为全人类的荣誉和尊严而战。

在浸透鲜血的苏联土地上的这场给全世界带来泪水和痛苦、折磨和劫难的法西斯褐色瘟疫必须永远被埋葬！红军在同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希特勒主义的战斗中涌现出了大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在这些光荣人物的名单中，我们骄傲地看到了犹太人的名字。他们怀着苏联人最崇高的尊严，奋起保卫人类文明免受法西斯暴徒践踏。当我们提起那些同希特勒强盗们浴血奋战在空中、在海上和在陆地的人们当中的我们的同族人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许多人也参加了游击队，我们对他们也深表钦佩。同男人们并肩战斗的还有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女儿们。

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们！

他们进行战斗同时也是为了你们！他们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也是为了保你们的平安。因为这场法西斯褐色瘟疫正在向大洋彼岸蔓延。当然它越凶残肆虐，末日也就越近。只要法西斯主义仍在横行无忌，全人类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对你们的这一呼吁，同时也传达了无辜流血的千百万犹太人的声音。我们向你们的恳切陈词，是向你们发出的吁请你们奋起抵抗和进行复仇的号角。时不我待！愿你们抓紧每一天的时间，尽

快起来向敌人讨还血债！愿你们抓紧每一个小时，把心中的复仇之火愈燃愈烈！愿你们争分夺秒，做好付诸行动的一切准备！

请你们用一切手段从内部破坏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源！请你们潜入到希特勒刽子手们的杀人工业的最要害部门，并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破坏使其瘫痪！请你们随时随地地抵制和破坏它们的开工生产！请你们用各种语言和在一切地方向人们高声历数和控诉希特勒杀人匪帮在其全部血腥之途上犯下的前所未闻的残忍兽行！请你们以不屈的游击队员们的自我特殊精神为崇高榜样行动起来！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应当在尚未为无辜流淌的鲜血而向法西斯刽子们讨还血债的情况下死去！请你们随处展开鼓动宣传，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并积极支援正在对那些给世界带来死亡和毁灭的狂人进行英勇抗击的苏联。

人类定将摆脱这场法西斯褐色瘟疫！

你们的责任——提供帮助将其焚灭！

愿你们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联人民演员、教授索·米霍埃尔斯；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作家达维德·贝格尔森；教授努西诺夫；苏联人民演员萨莫苏德；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雅科夫·弗莱尔；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埃米尔·吉列尔斯；建筑学院士约凡；画家拉比诺维奇；画家特施勒；功勋艺术家、电影导演埃姆勒；功勋艺术家、电影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作家马尔沙克；诗人加尔金；苏联人民演员赖森；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医生博马什；国际提琴比赛获奖者、教授奥伊斯特拉赫；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扎克；作家卡普勒；记者扎斯拉夫斯基；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祖斯金；作家戈季纳；英国皇家协会会员、苏联科学院院士卡皮察；记者沙赫诺·爱泼斯坦；演员克拉拉·容克。

No03729

第一次犹太人大会发言记录（选编）

（1941年8月24日）

苏联人民演员、教授索·米霍埃尔斯的发言

我现在是从自由的苏联向你们，全世界的犹太人，发表讲话！在这里，犹太人都是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建设者。

犹太人同胞们！

希特勒恶魔正在对你们，对你们子女后代们秣马厉兵、磨刀霍霍。他视数以万计、十万计的犹太人的生命如草芥，用他们的命运来磨炼他的毒刺，发展他吃人的天赋和才能。除了其他种种暴行之外，他还在自己的旗帜上赤裸裸地载明：“完全彻底消灭犹太民族”。

这里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列举法西斯野兽们那些史无前例、耸人听闻、早已超出人的一切想象力的残忍暴行。

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爪牙们宣称他们纲领的基础是对你们，一个古老的、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子孙们的仇恨，希特勒及其首要匪徒们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反犹太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其实既是他们血光闪闪的主旋律，同时又是他们骗人的诡计。

希特勒的残忍天性及其在对待伟大的斯拉夫民族、对待尊崇和热爱自由和民主思想观念的整个人类方面的嗜杀成性很快就暴露无遗。

法西斯匪帮正在利用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得以受到最小抵抗的地方，在人民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的地方，在冒最小的风险就可以指望人们对其恶毒的意愿百依百顺的地方，这只野兽就充分地显露出了它那极其卑鄙下流、极其野蛮残忍的凶暴本性。

对我们的母亲们、姐妹们和年幼的孩子们进行折磨和施加的暴力，中世纪犹太人区的一切可怕情景的再现，视人不如牲畜的屠杀和凌辱，——所有这一切都被这些强盗们看做是英勇无畏的范例，刚毅坚强的样板。

由雅利安人进行“统治”的病态狂想，被那些仇视人类的最高权威们视作自己手中野蛮权力的来源。杀人凶手们已经杀红了眼，他们像发了疯的醉鬼似地猖獗、嚣张。

而今天，当伟大的苏联人民同英国和美国人民结成联盟为反对法西斯杀人犯的武装匪帮而战的时候，当全世界已决心挺身而出保护受猖狂的法西斯奴役和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时候，你，古老的和饱受迫害与屈辱之苦的犹太民族，不论你的子孙现在何处，颗颗犹太人的心脏不论跳动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请听我说！

再也不能仅仅成为暴力的对象，仅仅成为牺牲品了。

再也不能只是诉苦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创伤了。

在新的、自由的苏维埃国家已经成长起来了民族的新的一代，这是掌握了人类的伟大和进步思想的一代，

这是掌握了本民族和全人类伟大的历史文明财富的一代，

这是已经彻底明白了什么是祖国的一代。因为苏联确实是苏联所有各民族的至亲至爱的祖国。

这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一代。

这是不能容忍自己任人宰割的一代。

我们的子孙们正在同我们伟大国家的全体公民一起参加到全体

苏联人民进行的伟大卫国解放战争中去，流血牺牲，拼搏奋战。

我们的母亲们都主动地送子出征，让他们去为正义事业、为我们自由的苏维埃祖国的伟大事业而战。

我们的父亲们正在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们一起为反对向他们施暴和进行种族大屠杀的敌人而奋勇厮杀。

而你们，我们的同胞们，请记住：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的战场上也决定着你们的命运，你们国家的命运。

请你们不要轻率地幻想，以为凶残的希特勒匪徒会宽容你们。希特勒是十分狡猾和撒谎成性的人，他是在玩弄花招以使你们丧失警惕。

仇恨希特勒匪徒——这就是摆在我们民族面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责任。

这种仇恨应当不断积聚。

这种仇恨应当凝聚在威力强大的炮口上，应当体现在斗争的行动中。

这种仇恨应当最终成为永远埋葬世界所有民族、整个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

英国的犹太人同胞们！

你们伟大的民主的国家正在同苏联一起为消灭法西斯主义而并肩战斗。

我相信，你们将会站在这场战斗的最前线。

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整个美洲的犹太人同胞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一直在给予同人类最凶残的敌人——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的民主国家以巨大的援助。我确信，你们将是最早促成这种援助尽快实现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

犹太人母亲！即使你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也请你为他向上帝祈祷并把他送去参加反对法西斯褐色瘟疫的战斗。

犹太人同胞们！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由苏联进行的这场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的周围。

一切热爱自由但眼下正在受苦受难遭受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

犹太人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的发言

犹太人同胞们：

许多城市以及受到希特勒刽子手们的铁蹄践踏过的国与国之间的道路上都洒满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鲜血。

法西斯恶魔在德国杀人而流淌遍地的鲜血尚未变干，受到凌辱而躲避在边境地带和森林中的数以万计的逃难者的呻吟声尚未停息，被狂暴的刽子手套上了阴森森的卐字绞索的奥地利，又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紧接着又对波兰开始了血腥的镇压，那里已被野蛮的希特勒变成了千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坟墓。

犹太人生活了将近千年的城市和其他地方，遍地是废墟，尸体堆成山。伴着成千上万个被活埋者因窒息而发出的嘶哑喘气声，这场疯狂的褐色瘟疫转而扑向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巴尔干——扑向斯拉夫民族的古老国度。所到之处，它给人们带去的是斧头和绞刑架，死亡和毁灭，绝望和泪水。他们无情地屠杀妇女、儿童和老人，杀头就像割草一样；他们对这些人肆意凌辱，用皮靴践踏。这些不幸的犹太人倒在地上，被焚尸灭迹；像圣经里的约夫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看到了。人们还没来得及从遭受的一种兽行中清醒过来，另一种兽行就已接踵降临到他们头上。数十万生计无

着、无家可归的人汇成一股遏止不住的洪流涌向旷野和大道。他们被扒去衣服，扒掉鞋子，饥肠辘辘，在严寒中冻饿而死。他们遭到的是希特勒匪徒的劫掠，而恰恰是这些匪徒向欧洲展示了他们自己的“新秩序”和条顿文明。希特勒强盗们每天夜里都将大批的母亲、儿童和老人投入河中溺死，许多河流由于被这些人的尸体充塞而河水溢出两岸。

在苏维埃国家里，在经过上千年的漂泊流浪和艰辛折磨之后，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和祖国——母亲，是这位母亲治愈了他们身上过去遭受到的创伤。在这里，在苏联，犹太民族是平等的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的一员。在这里，耳边又重新响起了他们本族语言之声；在这里，犹太民族的文化又重新繁荣兴旺。在不到 25 年时间里，由于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巨大关怀，犹太人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建起了一些剧院，它们在国内的最优秀的剧院当中亦堪称一流。在日常的创造性劳动中，我们的民族同苏联所有兄弟民族一起携手并肩，鼓足干劲，忘我地工作在肥沃的田野，工作在各种工厂。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里，犹太民族培养出了热爱苏维埃国家的出色的一代名人，他们在全世界既为本民族也为整个苏联赢得了荣誉。如你们所知，在一些世界性音乐家比赛中技压群芳而获得头奖的是受到祖国——母亲和苏联各族人民精心培养教育的犹太人的优秀儿女。

苏联还培养出了大量的犹太人工程师、发明家、医生、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胸前都闪耀着苏联的各式勋章。请看，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对待居住生活在它辽阔无垠的国土的所有民族，其中也包括犹太民族的。

现在，来自慕尼黑强盗黑窝的血腥外来者带着自己的大批发了疯的匪徒扑向了这片已成为新的人类正义的摇篮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祖国的神圣土地。

犹太人同胞们！你们知道，声誉卓著、万世流芳的苏联红军正在对横行无忌的法西斯强盗进行空前的抗击，表现了英雄主义的奇迹。红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同希特勒匪帮浴血奋战。在红军的队伍中也有犹太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手执武器所捍卫的不仅仅是本民族的尊严，不仅仅是苏联的尊严，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尊严。他们手执武器，战斗在飞机上、坦克里和军舰上。他们的行动向人们宣告：犹太民族仍然活在世上，世界上任何狡猾的骗子、不论他如何地老谋深算、精于劫掠和屠杀，只要苏联还存在，犹太民族就不会被消灭，因为是苏联在所有民族的心中唤醒了民族自尊、自由和独立的情感。

犹太人同胞们！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在战场上同法西斯匪徒殊死搏斗，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法西斯分子在自己送葬的灵幡上除了毁灭和死亡之外，还写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那就是：用剑与火，用烧杀抢掠，直至用卑鄙无耻的阉割手段从肉体上彻底灭绝犹太民族。

犹太人同胞们！在刽子手面前束手就擒而不加反抗是可耻的，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悲惨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将不再允许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被消极等待死亡的行为所玷污。而死亡现在正像曾经站在已被摧毁和奴役的欧洲和巴尔干国家的门口一样，站在你们的门口。

犹太人同胞们！大海和大洋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了。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现在都已被动员起来投入反对惨无人道的恶魔的顽强、殊死的斗争，而不论他们何时在地球上出现。我们没有权利现在仍然仅限于读读报纸和对我们不幸的同胞表表心酸的同情！我们的孩子和子孙后裔都绝不会原谅我们这样做！在当前的同血腥的法西斯主义进行的战斗中人类正在经受着一场考验——是容许这股黑暗势力统治世界还是打垮他们。受到考

验的是所有民族，而特别受到悲剧式考验的是我们的民族。在这场殊死搏斗中犹太民族应当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无愧于自己的历史。你们被呼吁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做一名反法西斯神圣战争中的战士，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有的地方可以拿起步枪，而在有的地方则可以通过打击敌人的话语。请做一名大后方的战士！请你们竭尽全力，以便使人类及犹太民族的敌人丧失元气直至失败！请像我们在这里，在战火连天、弹雨纷飞的前线所作的那样去行动吧！我们——是一个共为一体的民族，而现在我们——又是一个共为一体的军队！横贯在我们之间的大洋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的同胞们流淌的鲜血和我们民族遭到侮辱的荣誉与尊严，向你们发出庄严的呼吁，并期待着你们的响应！

犹太人作家达维德·贝格尔森的发言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希特勒灭绝一些民族、首先是犹太人的计划，作为一项杀人魔王的图谋，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极其残酷的。

一个希特勒匪徒对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血迹斑斑并成了卫戍司令部所在地的罗兹城的犹太人氏族首领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远没有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当时曾活下来的犹太人更自尊自爱——那些人请求集体自杀”。

没有人晓得在经过希特勒的屠杀和迫害之后今天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荷兰、法国、丹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以及在暂时被占领的苏联一些州里还剩下多少犹太人。但是，人们知道，居住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大多数是生活在上述一些国家里，而且这些犹太人正在惨遭希特勒这只野兽和屠夫的毒手。

犹太民族切身的生死存亡问题，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全部过去的历史上，还未像今天这样尖锐地摆在面前。犹太民族还从未像今天这样血流成河。

但是有一个情况在给我们的心里注入希望。在以往的某些时候发生的对待犹太人的所有不公正事件中，犹太人都曾经是孤立无援，因而只好听天由命。在同迫害自己的那些人进行的斗争中犹太人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和保护，而就自身而言又不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抵抗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们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对于那些暴虐者们来说，从来都是最易于得手的猎物，都是最松散的，因而可以不受惩罚地加以劫掠、强暴和杀戮的民族。而现在，犹太民族所经历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时代。这一次，犹太人的最狂暴的敌人同时也是被法西斯主义侵占和奴役的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数十个其他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不仅如此，这些民族的血腥仇敌也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协助下正在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激烈生死搏斗的伟大苏联人民和大不列颠王国各民族的最野蛮的敌人。这场在美国的协助和支援下由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所进行的激烈战斗，大大地鼓舞着所有被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国家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抱有胜利的希望。这就等于是在法西斯的后方埋下了地雷并将其炸得天翻地覆，使占领者日益不得安宁。法西斯匪帮在同我们的朝气蓬勃、无比强大的祖国进行的战争中仅开头两个月就损失了200万人，而我们的国家目前却保存了主要的军事实力，因而有充分的决心用自己强有力的巨手把敌人远远地抛出苏维埃国土的疆界并永远地消灭他们。希特勒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他将被从地球上除掉而不再现。但是他目前尚未将自己罪恶的力量消耗殆尽，他仍在猖狂一时，他正在日益暴露其极其凶残的本性，直至被人们一览无遗，他正在毁灭落入他手中的一切。

那么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现在该做些什么呢？难道一个一千年来饱受自己敌人的闻所未闻的凌辱、一再遭到屠杀、在血泪中熬煎而从未停止过大声向世人反复申说“我不会灭亡，我希望并且一定将继续生存下去！”的民族，如今将俯首听命并进而走向灭亡吗？

难道一个在遭受到各种屈辱、磨难和痛苦的情况下仍然为世界造就了斯宾诺莎、海涅、门德尔松、伯恩、比康斯菲尔德、奥芬巴赫、布兰德斯、列维坦、赖因加特、爱因斯坦以及其他许多捍卫过真理与正义的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民族应当灭亡吗？

不，这是绝不容许发生的！

法西斯匪徒们建议罗兹城的犹太人走他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同胞们的路，请求集体自杀。法西斯强盗们以他们特有的厚颜无耻和蛮横无礼要求这些犹太人，让他们自己动手帮助法西斯加速消灭犹太民族，强盗头子希特勒在向犹太人推荐一条不区分工人与厂主、自由思想者与宗教信徒、被同化者与未被同化者而将他们一律斩尽杀绝的最佳捷径。

但是犹太人顽强不屈，他们将选择一条更为困难和漫长的道路，一条通往生存而不是通往死亡的道路。他们将仿效的榜样绝不是柏林和维也纳的犹太同胞中由于陷入绝望而请求自杀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在苏联的红军部队和敌后游击队的队伍中英勇战斗、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在给狂妄的纳粹主义分子——世界所有民族、其中包括犹太民族的共同仇敌以致命打击方面做出自己一份贡献的犹太同胞。对于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犹太人——不论是在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还在被法西斯主义占领的国家——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也是惟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俄国人、英国人、捷克人、波兰人、荷兰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挪威人所走的路。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犹太民族当前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是同时，你们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也不应当忘记，这一次我们拥有一条已经为从地球上消除法西斯痼疾和彻底埋葬希特勒爪牙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强大阵线。

所有的犹太人，不论他们身在何处，也不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和世界观，都应当毫不迟疑地投入同法西斯主义的神圣斗争，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呼声，而且要高举自己强有力的巨手，以便给希特勒主义以应得的致命打击。你们的位置应当是在各地的同盟国军队中。你们的位置应当是在各战线的前沿阵地。你们的位置应当是在波兰、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一切被占领国家的游击队伍中，在那里法西斯的后方正被人民群众的战斗行动搞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应当让整个世界尽快地感觉到你们在积极地斗争，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你们的高声呼唤：

——我不会灭亡，我希望并且定将继续生存下去！

不能允许有任何的犹豫和迟误——因为这关系到犹太民族今后的存亡！

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发言

在童年的时候，我曾经经历过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场屠杀是沙皇警察和一小撮流氓组织进行的。而俄罗斯人把犹太人藏起来加以保护。我还记得父亲曾经带回一封抄写在小纸片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信。托尔斯泰就住在与我们相邻的那座房子里，我经常见到他，我知道：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当时十岁。父亲出声地读出信中的话“我不能沉默”，托尔斯泰对屠杀犹太人感到愤慨。于是我母亲哭了起来。俄罗斯民族在大屠杀中是无罪的。犹太人知道这一点。我从未听到过犹太人对俄罗斯民族恶语中伤，并且永远也不会听到！俄罗斯民族在争得自由之后已经不再提起对犹太人的

那些迫害而将其视为一场噩梦。甚至连“大屠杀”一词都不知道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我是在一座俄罗斯城市长大的。我的母语是俄语。我是一名俄罗斯作家。现在，我像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在保卫我的祖国。但是纳粹向我提醒了另外一个方面：我的母亲名字叫哈纳；我是犹太人。我说到这一点感到自豪和骄傲。希特勒对我们的仇恨胜过一切。而这一点却给我们增添了光彩。

我不知道德国人民对自己的元首作何想法。但是我去年夏天曾经到过柏林，那里简直就是个强盗窝。我曾见到过在巴黎的德国军队，那简直就是一支暴虐者的军队。整个人类现在都在进行反对德国的斗争——不是为了领土，不是，是为了进行呼吸的权利。

还需要去说一说这些“雅利安”畜牲们对犹太人都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当着母亲们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他们强迫生命垂危的老人像小丑那样故做丑态。他们强暴女孩，用刀子割她们，拷打她们，用火烧她们。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别尔季切夫、文尼察等城市都将作为提起来就令人发指的名字永留于世。话说得越少越好——因为需要的不是话语，而是子弹。要知道，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是牲畜。他们自己就一直在说，对他们而言，芬兰的母牛比海涅的诗更高贵。他们在法国哲学家贝格森即将去世之前还百般凌辱他——对于这些野蛮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佬。他们下令把波兰诗人图维姆的著作丢到士兵茅厕当手纸：犹太佬。爱因斯坦？犹太佬。沙加尔？犹太佬。当他们竟然强奸年仅十来岁的幼女和把活人埋入坟墓的时候，难道能够同这种人谈论什么文化？每当我想到一个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想到这个国家已使十个国家沦为奴隶，我就感到羞于直视朋友的眼睛，害怕听到亲人们声音——说纳粹像人类，哪怕是从外表上像人类，都无法令人容忍。

我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也身居其中的民族

已先于所有的人率先投入了战斗。现在，我作为一名俄罗斯作家和一个犹太人向美洲的犹太人发出呼吁。没有哪个大洋可以让人们躲在它的彼岸。请听一听戈梅利周围的隆隆炮声吧！请听一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别尔季切夫的俄罗斯和犹太妇女们的哭喊声吧！你们将听之不尽，视之不完。你们那里的夜晚还是一片光明，但将呈现出纳粹兽行的惨景。你们的夜梦还是一片宁静，但乌克兰的利亚、明斯克的拉希利亚和比亚韦斯托克的萨拉的声音将搅扰你们的梦境——她们在为被撕碎的孩子哭泣。犹太人同胞们，野兽已经盯准了我们。为了不至于扑空，它们正向我们瞄准，愿这种瞄准成为我们的光荣！我们的位置在最前列。我们不能原谅对这场斗争态度冷漠的人。我们将诅咒那些袖手旁观、逃避责任的人。请帮助所有为反对凶恶的敌人而战斗的人。请支援英国！请支援苏维埃俄国！我们这里现在正是夜晚。纳粹的飞机正在乌克兰的城乡各地杀害老人和儿童。你们听到他们濒死的挣扎声吗？你们那里现在还是白昼。请不要错过时光！愿人人都各尽其所能。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会问他：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将在活着的人面前做出回答。他将在亡故者的面前做出回答。他将面对自己做出回答。

附 录

《真理报》关于第一次犹太人大会的报道

8月24日，犹太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苏联人民演员、教授索·米·米霍埃尔斯，犹太人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反德国法西斯战斗参加者、红军战士叶罗尼姆·库兹涅佐夫，犹太人作家达维德·贝格尔森，俄罗斯学者、苏联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协会会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教授卡皮察，功勋艺术活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家、著名电影导演艾森斯坦，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建筑学院士约凡，德国作家普利维耶，作家马尔沙克，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著名记者、美国犹太人刊物工作人员沙赫诺·爱泼斯坦。

发言者的演说充满激情，鼓动人心。他们一致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投身到反对血洗欧洲城乡的法西斯暴徒和刽子手的神圣斗争中来。

《真理报》，1941年8月25日

№03731

布劳恩就响应犹太人大会的号召

致米霍埃尔斯的信

(1941年8月30日)

尊敬的教授同志！

我现在正在军队中服役。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有关在莫斯科举行的犹太人大会的详细报道。我尤为欣赏关于不再流泪、不再号啕、不再按犹太教的礼俗为死者守灵和祈祷的号召。现在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说得对，要么立即行动，要么遗恨永远！我代表我的犹太人同伴向您保证，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各自的岗位上打击并消灭敌人，我们的表现绝不会稍逊于我们的斯拉夫民族战友。敌人定将灭亡！

此外，尊敬的教授，我还对您有一个请求。在1941年8月24日的大会上，美国犹太人刊物的通讯员、记者沙赫诺·爱泼斯坦也发了言。根据照片我认出了他就是在巴黎的左派组织的犹太人社会家。（我本人是里加人，但1938~1939年我曾在巴黎进修——我是一名钢琴手。）如果沙赫诺·爱泼斯坦只是他的化名，并且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就是列奥·格列泽尔（在巴黎时我曾在他那里住过），则请您帮助我同他建立联系。如果我搞错了，则也请将情况告我。

请原谅我给您添了麻烦。

当初在里加，我们曾期待着您光临我们的犹太剧院做客，我们等了又等，但是很遗憾，没有等到您的到来。不过我相信，在苏维

埃的新里加我们将有幸接待您作为我们敬爱的贵宾。

我的通信地址：野战邮局No557，邮政所No4，乐队 布劳恩
恭候回音。

您的 布劳恩

№03721

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

(1941年10月)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

最尊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遵照您同我们的谈话精神，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依据我们已经同您达成相互谅解的那些原则制定有关细节的讨论。

经过这些讨论和思考，形成了创立反希特勒犹太人委员会发起小组致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信中请求允许在苏联领土上建立一个委员会。现将该信副本呈上。

我们同时也请求您，最尊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给予帮助，以便使我们的请求尽快被审议并得到批准。

致社会主义的敬礼。

埃利希^①

维·阿尔特^②

于莫斯科

① 亨·埃利希（1882～1942）著名的犹太社会主义者，生于波兰，曾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并多次被捕，是战前波兰革命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

② 维·阿尔特（1890～1943），著名的犹太社会主义者，生于波兰，15岁在华沙参加革命运动，战前是波兰工会的领导人和华沙城市杜马的代表。

№03722

埃利希和阿尔特就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 致斯大林的信（摘录）

（1941年10月）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文明人类目前正面临从未经受过的巨大危险：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现已成为对人类文明的一切后果、一切国家的独立和世界各民族和平生活的致命威胁。

工人运动和全人类的命运均取决于当前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正在进行的伟大战争的结局。

为排除这一危险而进行的浴血奋战，需要把所有希望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民族和拯救整个人类免遭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暴徒蹂躏命运的人们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希特勒力图征服和奴役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包括一切国家和民族。

但是犹太人却是他凶残地加以迫害的对象。他诋毁犹太居民的作为人的以至整个民族的尊严。他迫害他们时置任何法律于不顾，甚至连自己的法西斯法律本身也不遵守。很显然，希特勒的目的是要消灭整个犹太民族。因此，为什么说广大犹太民众必须以特殊的精力和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参加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这一点涉及到希特勒的野蛮暴行已经由威胁变成可怕现实的那些国家的犹太公民，因此，本信件署名者，作为已经成为希

特勒侵略行为牺牲品的那些国家的犹太居民的具有典型性的代表认为，作为第一步，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反希特勒犹太人委员会，并且以该委员会发起小组的名义致信给您，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求您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允许在苏联的领土上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我们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将顺利批准该委员会的建立而无任何障碍。

致社会主义的敬礼。

亨·埃利希
维·阿尔特
于莫斯科

№03732

卡尔马诺维奇就建立犹太人部队

致米霍埃尔斯的信

(1941年12月14日)

尊敬的米霍埃尔斯同志！

我是一个犹太人，1919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远东游击队老游击队员。

国内战争时期我在远东曾经担任伊尔库茨克第一师军事委员。现在我是一名预备役首长，在普及军事训练部门工作。

我听了您和其他发言人在犹太人大会上的讲话，感到十分高兴。但遗憾的是我暂时还没有听到，这些政治性的发言怎样从组织方面保证其实现。

许多民族——捷克、波兰、希腊以及其他一些民族都在单独组建起一些部队。不言而喻，我们民族的情况完全与众不同，因而我们当然应当在我们英勇的红军队伍中去战斗。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也组建若干个犹太人师团将是适宜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应当特别显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英勇精神。

在苏联，我们最近二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绝对平等的公民权利，其中也包括在一切级别服军役的权利。因此，有必要让我们在这些单独组建的部队中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一权利，有必要让希特勒野兽们也受到红军中专门组建的犹太人部队的痛打和歼灭。

血腥的希特勒主义使我们的民族遭受了特殊的苦难。他们对我们的蔑视是史无前例的。只有用军事力量才能消灭希特勒主义。但

是在世界各国的许多人、其中包括犹太人本身，头脑中一直存在一种偏见，认为我们的民族在军事方面似乎是能力有限的，甚至是无能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有必要去证实，在苏维埃国家，我们民族在军事方面的英勇精神已重新得到恢复。历史上，曾征服了全世界的古罗马帝国当时为了击垮我们的民族曾经投入了自己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二。我们必须证明，在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兄弟式的帮助下已经掌握了军事艺术的犹太人能够在战场上击败纳粹分子。

我今致信给您，给苏联的犹太人社会代表人士中的一位。

如果您同意我的上述意见并且这一意见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我深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组成得到全世界犹太同胞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我希望，您将不会拒绝对我的这封信给予简短的回复。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伏龙芝市，加里宁大街152-A栋
卡尔马诺维奇，约瑟夫·帕夫洛维奇

№03724

埃利希就无端被拘捕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申诉书（摘录）

（1941年12月27日）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当还被监禁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就完全确信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都不约而同地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层领导机关提出过相类似的建议。我们提出了建立反希特勒犹太人委员会的想法，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任务）被设想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团体当中大力宣传最广泛地帮助苏联进行反对希特勒入侵的斗争的必要性。我们制定了该委员会活动的详细计划并草拟了其章程草案。此事在我们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负责工作人员直至人民委员本人所进行的商谈中曾多次予以讨论。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均得到完全的赞同。当时还拟定了委员会主席团组成人员名单：我担任主席，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任副主席，阿尔特出任书记。为了完成此项工作，我们曾被提议就该委员会的合法地位起草一份致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请示报告。我们拟就的呈文草稿得到完全赞同并被上呈。决定本应在几天之后做出。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曾被指派为委员会寻找办公用房。被推荐参加委员会的人员从苏联的四面八方汇聚莫斯科。大家正日复一日地期待着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原本曾预定还要吸收苏联政府的代表和波兰、英国以及美国大使馆的代表作为名誉成员参加该委员会。

1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电话通知我和阿尔特说，曾参加

过我们在莫斯科商谈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请我们去一趟。我们当即前往并确信，我们的无所事事的局面即将结束。我们到了那里，在等待了20个小时之后，上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竟向我们宣称，他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要逮捕我们，并说他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误会，但他暂时不得不拘留我们。

于是我们二人被分开并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内部监狱，至今我在这里被单独囚禁已有三个半星期。

关于逮捕我的决定迄今仍未向我出示，甚至连口头上亦未向我说明，我究竟被指控犯有何罪，由于我的一再请求而两次传唤我的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宣称，他对逮捕我的原因完全一无所知。

古比雪夫州内务人民委员部
所属内部监狱42号牢房在押人
埃利希，格尔什-沃尔夫·莫伊谢耶维奇

№03742

洛佐夫斯基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
基本方针草案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2月5日)

22.1. 苏联情报局附函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现将米霍埃尔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共同起草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任务草案送上请审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5点，因为通过规模并不很大的工作，我们即可以得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药品和防寒物资用来供给红军和被疏散的居民。

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所·洛佐夫斯基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请将我们的意见转告洛佐夫斯基同志。

亚·谢尔巴科夫

归档。给洛佐夫斯基的指示已转达。

亚历山德罗夫

1942年2月11日

附 件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下列目标：

1. 收集有关被希特勒匪帮占领的欧洲国家及暂时被其侵占的苏联一些地方的犹太人状况的具体材料。

2. 收集有关犹太人在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的确切资料。

为此而组成若干犹太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采访组分驻苏联各地并组建国外通讯员报道网。

这些材料将以必要方式进行整理并在英—美报刊上发表。

3. 以各种方式力促在国外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4. 出版关于希特勒强盗对犹太居民所施野蛮暴行和关于犹太人在卫国战争中所做贡献的简报丛书、小册子、及文集——既可以是政论性质的，也可以是文学—艺术性质的。

5. 就同样主题发行一些配有犹太诗人诗句的宣传画和漫画。

6. 特别注意出版卫国战争中的犹太人英雄们的传记特写和故事。

7. 筹备出版名为《卫国战争中的犹太人》的俄文、希伯来文和英文版、带插图的汇编文集。

8. 筹备出版名为《法西斯分子在灭绝犹太民族》的带插图汇编文集。

9. 在国外的犹太人居民中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宣传与活动。

10. 安排在外国的犹太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电台发表反法西斯的广播讲话。

11. 同苏联和国外的电影摄制组织就拍摄一系列有关法西斯分子对犹太居民所施暴行和犹太人群众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影片问题进行商谈。

12. 向犹太人作家预约有关犹太人群众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和犹太人参加卫国战争情况的电影脚本。

13. 同犹太人出版机构商定出版原文和翻译的反法西斯歌曲选集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优秀作品的希伯来文译著事宜。

14. 定期刊行关于本委员会活动情况的工作报告。

15. 募集现款——重点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用以供给红军和被德国人占领地区被疏散居民的药品及防寒物资。

№03743

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就犹太委员会 组成及职能问题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3月4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和组织在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人群众支援红军和苏联被疏散居民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请求去年8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反法西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参加者们以及下列在国外的犹太人当中享有声望的人士参加委员会是适宜的。他们是：犹太人诗人、勋章获得者克维特科，费费尔和加尔金，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祖斯金，评论家、剧作家、勋章获得者多布鲁申^①，来自拉脱维亚的沙茨·阿宁博士，杰出的犹太人散文作家、现居阿拉木图的尼斯捷尔、鲍马什医生和《德尔埃梅斯》出版社经理斯特龙金。

如能通过著名的犹太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电台发表讲话来祝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将定会在国外引起广泛的响应。为此目的，可在古比雪夫或莫斯科举行一次代表会议，其参加者除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之外，还可以有如下人士：贝格尔森，尼斯捷尔，祖斯金，多布鲁申（塔什干），克维特科，沙茨·阿宁，卡加诺夫斯基（阿拉木图），罗赫尔·科恩（撒马尔罕），费费尔和霍夫斯坦

^① 伊·莫·多布鲁申（1883～1953），苏联犹太人剧作家和批评家，曾任《团结报》编委员会委员。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乌法),佩列茨·马尔基什(莫斯科),加尔金(喀山),以及作为红军战士的犹太人作家中的一位,以及一位卫国战争中的犹太人英雄。

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出面通过疏散管理总局和移民委员会及其在各地的下属机构,组织在国外的犹太人出版物像在波兰的报纸上那样,刊登被疏散的犹太人姓名和所在地点,将大大有助于提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威望。这样做将可以把大批有影响的犹太人社会组织、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南非的同乡会团结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及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周围。这些组织和同乡会非常关心其成员在苏联的命运,因而肯定能够像过去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促进对红军及被疏散居民的支援方面发挥杰出的作用。

为了扩展自己的活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需要拥有一定的预算经费和由一名技术人员及一名希伯来文-英文打字员(女)组成的办事机关。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赫诺·爱泼斯坦
地址:古比雪夫,州首府,文采克大街37号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您的意见如何?

亚·谢尔巴科夫

№03736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出版犹太人报纸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3月4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收到了一些犹太人作家和其他人士发自主要是被疏散的犹太人集中居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什基尔、乌拉尔和萨拉托夫州的一系列信件。

所有这些信件都指出，在那些被疏散的、绝大多数除了希伯来语之外既不懂俄语也不懂其他语言的犹太人当中，从不进行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政治教育工作。而与此同时，这些犹太人却又都极其渴望能把大量活的苏联政治词汇转换成本民族的语言。不仅许多被疏散的犹太人，而且还有作为红军战士的犹太人都不断提出关于创造可能性以便能读到用希伯来语印刷的出版物、尤其是犹太人报纸的问题，数不胜数的此类问题证明了上述的渴望心情。

据统计，在苏联共有六百万犹太人，而现在却连一种供他们阅读的犹太人报纸和犹太人杂志都没有。这种情况一方面间接地帮助了那些隐蔽的敌对分子——教权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崩得分子的忙，使他们得以向各阶层的犹太居民广泛地扩展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被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来在犹太人群众当中传播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

出版犹太人报纸既是加强对在苏联的犹太人群众的政治影响的迫切需要，也是争取和加大在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居民对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迫切需要，因为在美国，犹太人在社会 - 政治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犹太人报纸同样还将大大有助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展活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秘书 沙赫诺·爱泼斯坦
古比雪夫，州首府，文采克大街 37 号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记得在当时曾经决定出版一份印刷份数不多（每十天一次？）的报纸。当时是否已落实？

亚·谢尔巴科夫

№03744

爱泼斯坦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 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2年4月13日）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从其偶然收到的数期纽约犹太人共产党报纸《护航艇》和从其他一些来源中，得知了一系列关于1941年8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在国外所引起的反响的有趣事例。

许多国家的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犹太居民都对苏联犹太人代表们向全世界犹太人发出的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起来、开展以武器和药品支援红军活动的呼吁做出了响应。

英国和巴勒斯坦的许多城市都由犹太人宗教社团出面组织了声援莫斯科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的庄严大会。一些苏维埃政权过去的反对者，诸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组织主席海姆·魏茨曼博士、犹太复国主义民族阵线领导人乌瑟什金、巴勒斯坦犹太人民族委员会主席伊茨哈克·本-茨维等人均对莫斯科的大会表示了祝贺，并表示对苏联红军反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十分钦佩和感动。他们都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不分政治和宗教见解千方百计地帮助苏联……

莫斯科的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美国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反响。

甚至像美国的犹太人代表大会这样的反动组织也做出专门决议，祝贺莫斯科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并许诺要帮助红军。该决议是由这个组织的主席魏斯本人签署的，而这位主席恰恰就是著名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臭名远扬的苏维埃政权反对者、犹

太教牧师斯蒂芬·魏斯博士。

作为对苏联犹太人代表所做呼吁的回应，在纽约成立了美国著名犹太人作家、演员和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分支机构遍及美国的所有大城市，其主席是犹太社团革命党人的前领袖、犹太语和犹太文学的前辈海姆·日特洛夫斯基博士。该委员会为声援苏联而于1941年10月26日举行的广播大会，在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上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

为了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犹太人声援苏联的蓬勃运动，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措施将是适宜的：

1. 在不久的将来在莫斯科或古比雪夫举行第二次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广播大会。

2. 每周一次（逢周五或周六）进行半小时的希伯来语对国外无线电广播。

3. 尽快出版发行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的希伯来文报纸，每月至少两次。

4. 对外公布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把该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和将在莫斯科或古比雪夫举行的第二次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广播大会，安排在同日举行以提高其在国外的声望和威信。

5. 通过在所在地建立可靠的积极分子队伍，来扩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事机关及所进行的活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赫诺·爱波斯坦

№0373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出版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报纸的决定

（1942年4月27日）

关于出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报纸的决定

1. 批准出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希伯来语中央级报纸《团结报》（《埃尼凯特报》），发行周期为每月三次，发行量为一万份，半标准开张，版面四版。

2. 批准《团结报》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贝格尔森同志，加尔金同志，多布鲁申同志，克维特科同志，库什尼罗夫同志，米霍埃尔斯同志，斯特龙金同志，费费尔同志，沙赫诺·爱泼斯坦同志（责任编辑）。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No 03739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就增加《团结报》的发行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2年5月13日)

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从苏联各地收到的消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出版犹太人报纸《团结报》的决定受到了犹太人社团各界的普遍欢迎，他们对此均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

根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在美国、英国、巴勒斯坦、南美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引起的反响可以看出，在犹太居民的所有各阶层中，对我们的工作，其中包括对苏联的犹太人报纸的兴趣是非常之大的。

起码有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证明那些居住在苏联以外的广大犹太人群众当中进行的反希特勒宣传的政治意义：英国新闻部已在出版希伯来文的书刊了。

为了使《团结报》对大多数除希伯来语之外不懂其他语言的苏联犹太人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为了让这份报纸在国外能引起的新希望的效果，有必要使《团结报》的出版发行至少增至每月四次并改为四页、与《真理报》的大小开张相同。

应当考虑到，一份面向六百万犹太居民的、在苏联境内惟一的犹太人报纸，按原定的相当于《真理报》的一半的半标准开张、每月三次出版发行，在苏联的犹太人群众中有可能引起某些困惑不解。同时，也还有一种顾虑，即：敌对分子将会试图蛊惑性地利用

这一事实，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把事情说成是在苏联似乎不尊重犹太人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及其一伙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请求您指示尽快解决关于《团结报》的出版期数和版面开张问题，以便使该报纸从第一期起就能够在苏联和在国外引起必要的效果，因为该期报纸正好安排在5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时出版。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赫诺·爱泼斯坦

请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阅处。

亚·谢尔巴科夫

№03725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就
埃利希自杀问题的报告

(1942年5月18日)

绝密

据布坚科同志 1942 年 5 月 16 日发自古比雪夫的 №9072 号报告：5 月 14 日 20 时 0 分发现，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局第四处在押犯埃利希·格尔什－沃尔夫·莫伊谢耶维奇在古比雪夫内部监狱的牢房里悬窗自杀。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第二处主任侦查员、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尉 曼萨波夫

№03745

第二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犹太人书

(1942年5月24日)

致全世界的犹太人！

9个月之前我们已经向你们发出呼吁，号召你们奋起投入反对人类的敌人、一切热爱自由的民族的敌人、犹太民族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自那时以来，希特勒刽子手们已经焚毁了数百座城市，杀害了数十万人。对于希特勒分子来说，除了德意志民族以外，一切民族全部都是“低劣种族”。他们正在屠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他们把不久以前还在蓬勃发展的诸多城市变成了一座座监狱，一间间刑讯室、一个个墓地。

犹太民族的苦难无比深重。希特勒分子在被他们侵占的城市里残酷杀害犹太人，杀害犹太妇女、犹太儿童、犹太老人，其状惨不忍睹。在杀死他们之前，希特勒分子对犹太人加以残酷折磨，他们强奸妇女，当着母亲们的面杀死孩子。他们把活人埋入坟墓并对这些坟墓肆意进行侮辱。有一些城市和乡村，一年前那里的犹太人还曾在机床旁劳动，还在耕耘土地，而现在那里已经连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也不剩了，不论是老人还是怀中哺乳的婴儿；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犹太人被全部杀光。

9个月之前，我们曾经呼吁你们奋起投入对卑鄙下流和野蛮残忍之敌的神圣斗争。当时，希特勒的军队还在向前推进。犹太人同苏联其他各民族的儿女一起团结得像一个民族一样，奋起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犹太人为保卫亲爱的乌克兰而同乌克兰人并肩战斗，

为保卫亲爱的白俄罗斯而同白俄罗斯人并肩战斗，为保卫亲爱的俄罗斯而同俄罗斯人并肩战斗。他们同全体苏联人一起并肩战斗——为了保卫整个伟大的苏维埃国家。

人类的敌人——嗜血成性的法西斯主义在苏联的土地上第一次遭到了应有反击。为了捍卫自由和祖国，苏联红军给了希特勒军队以无情的打击。我们，苏联的犹太人，骄傲地告诉全世界的犹太人：在这里，在我们的土地上，自由的人民已经显示出了自己对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刽子手们的优势。

尽管希特勒的军队已经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支军队依然还是强大的。它还占领着欧洲的十个国家。它还占领着苏联的大片土地。它仍然还试图向前冲闯并把新的地区付之一炬。决战的时候即将到来。因此我们，犹太民族的代表们，值此出席在自由的、不可战胜的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之际，再次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发出呼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在苏联，没有一个犹太人家庭没把自己的儿女送往前线。在人们为了祖国的自由而流洒的苏维埃人纯洁的鲜血中，也有犹太人的血。我们缅怀阵亡的烈士们。我们为活着的人所建立的战斗功勋而骄傲。我们呼吁红军中的犹太人——不论是战士还是指挥员，更加奋勇地同万恶的敌人进行战斗。请时刻都不要忘记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五月一日的命令：必须在今年之内将敌人粉碎。让我们国家和军队的伟大领导者的这番话语引导我们前进吧，因为这是英雄们通往胜利的指南。

犹太人战士们，请做一名神投手吧！希特勒的坦克在隆隆开动，试图轧碎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荣誉，你们的尊严。犹太人战士们，请瞄准它们投出你们的手榴弹；请做一名反坦克枪手吧，请直接瞄准轰击敌人！犹太人飞行员们，请消灭希特勒匪帮万恶的技术装备！愿你们的名字闪耀在誉满全世界的优秀苏联飞行员的行列

中！犹太人坦克手们，前进，夺回亲爱的苏维埃土地：那里长眠着你们的父辈，那里有着人们的子孙未来的幸福。

犹太人近卫军战士的队伍在与日俱增。对于犹太人来说，没有任何荣誉比当一名近卫军部队的战士的荣誉更崇高、没有什么比当众说：“我是苏联英勇的近卫军中的一员”更荣耀。

被德国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国家的犹太人，请推倒臭气熏天的犹太人区的高墙！请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去！让希特勒分子们寸步难行！请炸毁德国人的仓库和铁路！请把德国强盗军队的列车搞得脱轨瘫痪！

大不列颠和美国的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徘徊观望的余地。从约翰内斯堡到蒙特利尔，从亚历山大到旧金山，犹太人，请投入战斗！

我们，苏联的犹太人，已经率先垂范，为你们做出了榜样。一小时、一分钟都不能再迟延。如果一切热爱自由的民族都能像苏联人民这样去竭尽全力，则法西斯主义定将会更快地被彻底粉碎。

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犹太人，请同你们国家的其他民族一起给法西斯主义以坚决的打击！对法西斯野兽只要层层包围、人人痛打，他们就必定气断身亡。

苏联红军——这乃是全人类的希望。美国、英国、加拿大、巴勒斯坦、南非、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同胞们，为了打垮法西斯凶手，还需要更多的飞机！为了解放被希特勒占领的那些地区，还需要更多的坦克。请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参加到反希特勒同盟各路大军的行列中来！请记住——你们的位置现在应当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积极战士队伍中的最前列。

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犹太人，你们距离血雨腥风的战场迢迢万里！请你们每天清晨都诅咒那些正在折磨和屠杀你们同胞的希特勒分子吧！请你们每天晚上都为正在消灭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们祈祷和

祝福吧。愿你们对希特勒分子的诅咒变成坦克的洪流！愿你们对英雄的祝福和祈祷变成歼击和轰炸机的编队！

全世界的犹太人！让我们一起募集钱财购成一千辆坦克和五百架飞机并把它们送给红军！

整个地球均被战火所吞噬。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之间的搏斗。在反动势力一方有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在进步力量一方的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苏联、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热爱自由的各民族。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不可能有和解，也不可能休战——希特勒及其集团必须并且定将被粉碎和消灭。

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同胞们！1942年夏季即将到来。这个夏季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它将决定犹太民族的命运。这个夏季应当给业已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的希特勒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过去你们已经表现出确是自己国家忠诚的爱国志士，是热爱劳动的能工巧匠，是勤奋忘我的建设者。现在，请你们再成为一名无畏的战士吧！现在，没有什么比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更光荣！没有什么比胜利更让人期盼。当巴黎和罗马、阿姆斯特丹和萨洛尼卡、华沙和里加、利沃夫和基辅、明斯克和敖德萨的犹太人遭到万恶的希特勒分子迫害、折磨和屠杀的时刻，我们，伟大苏联的犹太人公民，在我们神圣祖国的首都庄严地向你们呼吁：英勇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胜利的时刻已经临近！

在自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苏联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教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作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沙赫诺·爱波斯坦；作家达·贝格尔森；犹太人诗人、剧作家、红军志愿军战士、“战功”勋章获得者库什尼罗夫；犹

太人语文学家、红军志愿军战士法利科维奇；诗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尔沙克；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弗鲁姆金；作曲家、功勋艺术活动家、勋章获得者克赖因；雕塑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萨布赛；二级军医齐弗里诺维奇；现役红军护士布克列尔；古比雪夫州“纳伊-列奔”犹太人集体农庄主席、勋章获得者休帕克；勋章获得者、上校法伊韦利·米赫林；勋章获得者、少校韦普林斯基；诗人、勋章获得者克维特科；诗人、勋章获得者费费尔，诗人、勋章获得者霍夫斯坦；诗人和剧作家、勋章获得者加尔金；诗人和剧作家、勋章获得者马尔基什；评论家、剧作家、勋章获得者多布鲁申；犹太人“德尔-埃梅斯”国家出版社经理斯特龙金；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科学院犹太人办公室主任斯皮瓦克；建筑学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约凡；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埃米尔·吉列利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奖金获得者、教授奥伊斯特拉赫；犹太人女诗人哈纳·列维娜；犹太女诗人罗赫尔·科恩；犹太自治州集体农庄女庄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列亚·利什尼扬斯卡娅；犹太人自治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尔伯施泰因；犹太人自治州党委书记库什尼尔；犹太人自治州州委书记萨维克；历史学家格林贝格；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祖斯金；画家、勋章获得者特施勒；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普利韦尔；医生、勋章获得者希梅利奥维奇；教授、勋章获得者沃夫西；画家纳坦·阿尔特曼；电影导演、勋章获得者埃姆勒；画家、勋章获得者伊萨克·拉比诺维奇；院士莉娜·什泰恩；作家尼斯捷尔；记者扎斯拉夫斯基；教授努西诺夫；国际钢琴比赛奖金获得者雅科夫·弗莱尔；美国支援苏联“伊科尔”犹太人移民协会前主席瓦坚贝格；女演员克拉拉·容克。

№03748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摘要）

（1942年5月28日）

会议主席米霍埃尔斯同志：

在第二次莫斯科犹太人代表大会之后，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现在举行首次全体会议。

我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战斗单位，应当服务于战争；同时，我们应当不仅仅用话语、刊物和讲话这样的武器进行战斗。第二次犹太人大会提出的口号——《为红军募集一千辆坦克和五百架轰炸机》——已经是我们当前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是极其重要的，它要求我们集中全力去完成它。但是也不能把我们的活动仅限于此。同希特勒斗争的战线贯穿着我们国家辽阔领土，但它同样也贯穿在人类广泛的思想战线上。我们需要同反犹太主义做斗争，而我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则应当特别着重于同反犹太主义的斗争，而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这是我们的第二项任务。

必须让人们看到，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人民是怎样在奋起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同时，也投入反对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理论的代表者——希特勒主义及一切公开和秘密给它以帮助之人的斗争的。

我们的会议议程如下：

1. 关于委员会前一阶段即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前的活动的总结报告。

2. 包括有两部分内容的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这是一项重大的具体工作，它将促成《为红军募集一千辆坦克和五百架轰炸机》这一口号的实现；第二部分——宣传介绍犹太民族的儿女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及他们所做贡献的措施；还有全力以赴、义无反顾的同反犹太主义的斗争、同希特勒的斗争、同一切作为希特勒在英国、美国和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工具而通过反犹太主义偷偷贩卖最露骨的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人的斗争。

对会议议程有反对意见吗？没有。

现在请委员会责任秘书沙赫诺·爱泼斯坦同志做总结报告。（报告未做速记记录。）

米霍埃尔斯：在我们的报纸上需要有一个报道声援犹太居民的运动的栏目。

努西诺夫：我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迄今为止还仅仅处于拟议之中的活动应当本着下列基本精神进行：

第一，没有任何一个在苏联的犹太人不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最积极地、最勇敢地参加这场战争。我们是苏联公民，我们的所有公共组织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本着这一精神，但是还应当补充地说一些由我们说出，并通过我们说给世界上所有犹太居民的话。

第二，关于在苏联境外最大限度地组建犹太武装力量的问题。扎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军事化问题所讲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据我们所得到的材料，其中有些就反映说，曾经在西班牙战斗过的犹太青年就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参加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在您的总结报告中我暂且还未听到。例如，最近有人曾向我们讲述了葡萄牙的犹太青年英勇地参加战争的情况，而收集关于这种参战行动的材料，应当成为委员会工作的中心。

再谈一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我应当说，我们对我们的年轻的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如何英勇无畏地参

加战斗的情况宣传和强调得很不够。我在莫斯科以外的一些地方曾经遇到过一些为了能够加入红军的队伍参加战斗而克服极大困难的犹太青年，他们由于一系列的事务性原因而遇到巨大的困难。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我们还应当关注那些被疏散到我们这里并且为了能够参加战斗而不得不克服巨大困难的波兰犹太人青年。这些情况都是需要加以反映的。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反犹太主义做斗争的问题，包括在我国国内和在国外。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地介绍犹太人群众在他们的疏散地区的活动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经常遇到一些非常令人难以承受的偏见，而所有的人都知道犹太人是被最早疏散离开城市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这同样是不言而喻和能够理解的。而且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些人是以怎样的充沛精力、怎样的无限忠诚在各种企业、各种机构里工作着，而且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关于我们的广大犹太人群众正在做些什么，这些人是怎样被安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忘记。

我在高尔基市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一名带着一群孩子从日托米尔逃难出来的犹太妇女长时间没能得到安置，她的丈夫已经被敌人打死了；一位在场的妇女问她：“您的儿子怎么不来帮您？”她听了感到非常气愤，回答说：“可是谁将去保卫日托米尔？”这个情况说明了许多事情。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在我们的委员会的活动中，对这些材料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和反映，并用于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被疏散的犹太人所处的各种境遇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在美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里已经提出了一个关于药品的问题。毫无疑问，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将有多少人得到救治和保全生命，这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像关于

外加的十辆坦克和外加的飞机的问题一样，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美国各界，人们已经知道东方有需要帮助的难民，现在还应当让他们知道，在苏联，犹太人难民问题是同其他被疏散的居民问题一并加以解决的——在这里有一部关于被疏散居民问题的共同的专门法律。

最后，是关于从广义上关心历史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应当把那些过若干时间将无法再记住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样做对于历史来说是需要的。对了，这也是一个关于我们当前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问题。不论是各种英雄主义的表现，还是数不胜数的英雄们——这些都不仅仅是我们未来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一个当前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

什泰恩：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一切援助，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需要的，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但是我们是作为犹太民族的代表在说话。

本来是可以向世界上的所有公民发出呼吁的。这种呼吁同我们曾经发出的呼吁并没有任何不同。

一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犹太人资本家们有钱。犹太人不应当仅仅像那些出钱购买药品和坦克的人那样行事；战争在进行，人们在流血，犹太人在流血。

于是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年轻的犹太人在军队里浴血奋战的人有很多吗？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反犹太主义做斗争——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把法西斯主义消灭掉，我们能够给法西斯主义以打击，那我们也能够消灭反犹太主义。

在苏联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应该回避这一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同样应当被提出，在告犹太人书中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一方面。

我认为，在呼吁书中应该呼吁组建将派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太人军团。应该指出，整个的战争问题将在苏联，在苏维埃的领土上解决。我们谈这个问题，许多人重复这个问题。正在给我们运来坦克。如果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志愿者师团该多好。在这些师团里可以有战士，也可以有医务工作者，也就是说，参加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用金钱，而且是用可以付出的一切，也就是说，犹太人学者们也可以亲身参加战斗。

№03723

茹科夫关于逮捕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报告

(1943年2月)

绝密

阿尔特·维克多·伊兹赖列维奇和埃利希·亨里希是于1941年10月随同（波兰）大使馆的一批工作人员由莫斯科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

在古比雪夫，阿尔特和埃利希在大使馆供职，住在“格兰德饭店”，负责搜寻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崩得分子^①的工作。与此同时，阿尔特和埃利希还同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就他们前往美国一事进行过商谈。

埃利希和阿尔特于1941年12月被逮捕，当时西科尔斯基正在苏联逗留，逮捕他们是遵照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逮捕埃利希和阿尔特的过程是这样的：阿尔特和埃利希被秘密召到古比雪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口是为了继续就组建反希特勒犹太人委员会问题进行当时根据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提议而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同他们进行过的商谈。埃利希和阿尔特告知波兰大使馆，说这次商谈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举行。

随后阿尔特和埃利希被告知，鉴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的有关他们同德国人的联系的材料，他们将暂时受到拘留。

^① 指反革命的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分子。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波兰人于次日发现阿尔特和埃利希的失踪，于是波兰大使馆诉诸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做出解释。

一连数日，外交人民委员部未对波兰人做出任何答复，但后来维辛斯基同志^①告诉波兰大使科特说，阿尔特和埃利希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因为他们是苏联公民，因而他们当初被赦免是不对的；维辛斯基还暗示说他们二人同德国人有关系。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局第四处处长 茹科夫

^① 安·亚·维辛斯基（1883~1954），时任苏联外交部长。

№03726

奥戈利佐夫关于处决阿尔特给梅尔库洛夫的报告

(1943年2月17日)

绝密

亲阅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一级警官
B.H. 梅尔库洛夫同志

兹报告：您的关于枪决№41号在押犯的命令已于1943年2月17日执行完毕，现将行刑文书连同人事卷宗一并送上。

所有涉及№41号牢房囚犯的文件和记录均已由我本人从内部监狱和第一专案科查收。物品已焚毁。

内务人民委员部古比雪夫州管理局局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级少校 奥戈利佐夫

№03749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发言速记记录（摘录）

（1943年2月18~20日）

霍夫斯坦：同志们，我们当前正处于我们的红军在不停地进攻的时刻……

……让我们想一想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区的情况吧；凡是没有从那里出逃的人全都死光了。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是希特勒。我们同来自各地的代表们进行了交谈，同休帕克同志、同萨布赛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同所有目睹过我们那些第二次、第三次出逃的逃难者洪流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知道我们需要去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事情该怎样去做呢？显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做了许多事，但它是做了它能够做的事。但是它能够做的是什么事？……

卢里耶：红军向前推进得非常快。它在接连不断地解放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地区。我们这些犹太人作家应当到被解放了的那些城市里去。我们应当沿着我们的骨肉同胞们未干的血迹去寻访，应当去见一见那些死里逃生的人。可能有一些留下来的当地犹太居民活下来了。

我们应当到历史苦难的人们那里去，去倾听他们的诉说，去搜集关于德寇杀人放火罪行的材料，并将其记录在案……我们应当到曾经饱受折磨现在已被红军解放的人们那里去，向他们提供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和温暖。我们应当同他们一起搬砖运瓦重

建屋舍。

休帕克：……我认为我们的犹太民族应当在我国集体农庄中拥有哪怕是并不很大的份额。犹太人委员会需对此予以关注并将其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还有，同志们，还需要对现在处于疏散状态中的犹太人提供帮助，因为像在被疏散了的其他民族的集体农庄中的情况一样，我们的犹太人庄员们同样失去了一切，因此需要帮助这些同志……

……我认为，委员会将要去干这件事，因为犹太人再没有其他的代表机构。因而委员会应当承担起这项任务。

努西诺夫：会议上对于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同意我们的同志们的评价和看法。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应该谈论的事情主要不是已经做过了什么，而是我们今后将应该做些什么。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定位于面向国外。我们的对外宣传将非常重要，但是委员会不应当把自己局限于仅仅进行宣传。它的活动还应当在其他一些领域体现（显露）出来，不仅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比如说，委员会应当研究和解决大量疏散的犹太人遇到的诸多难题。我们见到了来自许多城市和地方的被疏散者，我耳闻目睹了他们遭受的巨大人间苦难。

佩·马尔基什：这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关系到已经完成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委员会可以被认为是犹太人反法西斯主义的参谋部……

犹太民族早在苏联领土上爆发战争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遭法西斯主义的血腥屠杀了。犹太人文献当时指控希特勒德国杀害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是根据的。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确信犹太民族肯定是法西斯的主要受害者。我们不仅指出了犹太民族将遭受的苦难，也指出了这个将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抵抗和将进行的忘我斗争……

不久前有一位坦克兵团的上校走到我身旁对我说：“我是个犹太人，我很想以一个犹太人的身分去进行战斗。我很想去找有关当局，向他们建议组建一些独立的犹太人兵团……”当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但这也是一种情绪……

当时我问他：“您认为组建这类兵团会有怎样的效果？”而他回答说：“它们将令你感到骄傲。在犹太人士兵面前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把敌人消灭掉，要么自己战死……”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应当继续扩展自己的活动。它应当在对待受苦受难的犹太人群众方面、对待被疏散者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和热心。我亲眼看到了他们遭受的巨大痛苦。委员会在安置他们这些人方面负有直接的责任。

扎斯拉夫斯基：……不能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冠以“犹太人代表机构”等名称。赋予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很可观了。完成这些任务并非轻而易举。而且我们现在并不能说，我们的这些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了……

我了解佩列茨·马尔基什的激动心情，也理解贝格尔森的发言中所满怀的激情……

菲宁贝格：我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如果业已开始出版俄文版的杂志和简报的话，那么它就是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些杂志和简报可以使社会了解世界犹太人的处境。委员会应当向外界通报有关希特勒分子的野蛮兽行和犹太人在我们的战争中所做出的英雄业绩的情况……

伊·爱伦堡：……我想涉及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即出版俄文版的汇编文集，我认为此事非常重要。有一位年迈的犹太人来拜访了我，他是一位著名飞行员的父亲。他向我讲述说：“我曾经同一位负责的文职人员交谈。他对我说：‘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前线没有犹太人？为什么在战场上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对他甚至

干脆就没有回答。我当时心情沉痛得不想说话，因为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我从我儿子的指挥员那里收到关于他已阵亡的通知之后刚刚四天”。

你们所有的人大概都听说过关于那些“在前线上没有”的犹太人的事迹。而当他们身在前线的时候，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自己都未曾意识到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在收到自己的亲人发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来信的时候，因为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里经常听到有人议论，说在前线上没有犹太人，说他们没有参加战斗（？）”。于是，在自己的掩蔽部里或者在通往前线的路上读了这样的来信，这位犹太人前方战士心中开始不安起来。他心中不安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自己的亲人，那些无端受到羞辱的亲人。为了让那些犹太人红军将士能够安心地做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向人们讲述犹太人在前线是怎样殊死搏斗，——不是为了夸耀，而是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为此目的，我们应当出版一本将直观地展示犹太人投身战争情况的汇编文集。……

……这本文集应当有适当的发行量。如果只印几千份，那么出版它就很不值得。倘若那样，还不如……多打几次仗和多给工厂提供些装备呢，因为出版数量如此之少的文集将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读到这些文集的人，有些是清楚地知道犹太人在怎样地战斗，而有些人则是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而要使不知道犹太人在怎样战斗的人们都能读到这本书，就只有加大发行量。……

费费尔：……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还没有充分地研究我们在国外的的工作。这项工作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很明了委员会的职能都是什么。不可能要求它扮演与其他苏维埃机关同样的角色。虽然如此，但仍然有一些我们对之不能漠然处之的问题。委员会应当就那些问题采取相应的主动行动。

例如，有许多被疏散者的信件寄到委员会来。信中提出了一些委员会无力解决的难题。不管怎样，委员会能够而且应该把这些信件转交给有关的当局……

斯特龙金：……报纸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负责的同志们一连二、三个昼夜不离开印刷厂；他们自己搬运重物，自己做出校样并当场进行必要的校订而完全不顾寒冷和其他困难。报纸的发行量是不够的。不能指望增加发行量，因为没有纸张。大约有三分之一发行量是发往国外。由此而难以进行散发。但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使报纸能送达订户手中。总共只剩下大约两千份可供零售。

沙·爱泼斯坦：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基本宗旨曾经并且继续是动员全世界的犹太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们过去的活动都集中服务于这一宗旨，而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未来工作的核心。

座位上有人说：我想提个建议，建议把犹太人作家派往已经解放的城市。这一点极为重要。

米霍埃尔斯：这个建议已记录在案。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尽可能地把犹太人作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派往我们那些已被红军解放了的城市和乡村。这一点已经记录在案。这个建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已不需要交付表决了，因为这个建议被认为已经通过。

现在，请允许我就我们这次全体会议的工作做一小结。我们有一些同志大致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似乎在我们这里，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出现了某些意见分歧等等。我完全不赞成这些意见。我没有看到这些分歧。而且，在我看来，这使本次全体会议的意义受到削弱。再说，也没必要来谈论这件事。的确是进行了争论，但是争论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在这些

争论中弄清楚了我们工作的本质。

因此，如果说在这里，类似的用词被使用了的话，那看来也只是由于人们尚不善于使用别的词语而已……引起争论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赋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范畴是什么。因而提出了一些希望，想在这些职能之内再加进一系列的职能。而且，显然是忽略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乃是一个战斗单位，它的惟一宗旨是团结一切力量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这一事实。这才是委员会惟一的任务。是它的基本任务，规范其一切行为的任务。在这里，有许多同志的发言都非常正确、有益、有道理，他们说：“除了在反法西斯战线上的斗争没有别的任务，除了战胜法西斯没有别的目的”。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在活动中存在很多的困难，对此我是亲眼所见。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疑问。每一个人都能再提供一些关于困难、关于怀抱婴儿坐卧雪地的……成批成批被枪杀的母亲的说，但是要知道，这是战争。这些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在被纳入一定的轨道加以解决。

另外，在会上还有人谈到，对于我们的犹太人居民来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实际需要的核心。这一点，情况也许是这样，但是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受命去安置被疏散者。这不是我们的职能。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作为社会活动家、作为苏联公民，可以去找有关的组织并提出问题。我这里有一封素不相识的妇女的来信。她是在她非常痛苦的那一天写这封信的。她的父亲死了。她详细地叙述了她是何等痛苦、何等艰难、如何安葬了父亲。她谈到了自己的孤独。但是，具有特点的是在她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她无处可诉。有很多被战争弄得生计无着的人，而我们不能背过脸去不理睬他们，说他们的难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命运给予同情，就他们的困难提出问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附带性的任务。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希特勒主义……

№03750

弗里德里希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

(1943年4月7日)

秘密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材料概述表明，这次全体会议在对待国外的犹太人问题和这些问题同苏联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在全体会议结束之后，曾试图当即得到全会文件的副本，但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仅限于口头上许诺，而实际上只提供了全会的呼吁书、致斯大林同志的信及关于全会工作的简要通报的副本供我们审阅。

只是到了3月下半月，全会的文件材料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官方机关报《团结报》上发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全部这些材料。

1941年8月24日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曾经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支援苏联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英勇斗争。

在于1942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委员会曾做出决议使对苏联的支援具体化，向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把“1000辆坦克和500架轰炸机”作为“民族的礼物”赠给红军。

在报告中谈及的1943年2月举行的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总结了委员会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制定了今后工作的计划。我们这里将主要依据1943年3月15日《团结报》报上转述的内容，来分析一下犹太人委员会的“国际政策”，因这次全会宣称这一“国际政策”乃是该委员会纲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一“国际政策”将按照随此报告附上的材料中转述的那样加以实施，则它只会：1) 给苏联招致麻烦；2) 给在国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无尽无休的困难。

在全体会议上所做的主旨报告中，作为委员会责任秘书的沙赫诺·爱泼斯坦同志指出，委员会在同国外的一切犹太人社团的关系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和加强向红军提供物质支援的运动。委员会打算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一任务：

1) “不断地进行努力以发动犹太民族做些具体的实事（意指向红军提供物质支援）”；

2) “不是漠视而是揭露那些试图阻碍或者削弱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中支援红军运动发展的人士”。

这个纲领已被全会通过。

这样一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等于是向公众宣布，它自己有权为自己确定具体的任务（向红军提供物质援助）并有权（从苏联境内）同那些不同意该委员会给两个确定的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社团提出任务的政界（意指犹太人）人士进行斗争。

正如从所附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的那样，这一政策实际上在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已经付诸实施了。

按照上述政策，爱泼斯坦同志在向全会所做的报告中，仅仅按一个尺度就对国外的所有犹太人社团在军事方面的努力做出了评价：这个或者那个犹太人社团在何种程度上按照在苏联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提议，参加了或者根本没参加为给红军建造坦克轰炸机而募集资金的活动。

在美国，在经过各种犹太人团体之间的激烈争论之后，只好将募集资金建造坦克和轰炸机的运动转而纳入军事援苏全美委员会的轨道，爱泼斯坦同志把这一事例看成是来自以纽约《前锋报》和其他“主使者”为首的一伙不希望帮助红军的“坏”犹太人进行抵制的结果。

诚然，犹太人报纸《前锋报》的一些一贯反动的孟什维克式领导人（卡甘，杜宾斯基，李，阿布拉莫维奇）并没有改变其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的反革命立场。但是沙赫诺·爱泼斯坦同志不想知道或者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伙人现在仍然是美国整个反动势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在美国劳联各级机构，在一些政党（美国工人党和坦马尼大厦^①）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组织中施加自己的影响，来阻碍美国的民族团结；他们甚至对国内的亲罗斯福力量都不给予充分的支持。除了一般性的政治角色以外，他们还在履行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竭力把在美国的犹太人社团拴在反动势力的战车上，因为他们通过上述一些组织而在犹太人社团中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脱离开国内的一般政治形势，只对美国犹太人所从事活动的个别领域的结果进行分析，就不可能不得出荒谬的结论。爱泼斯坦同志在自己的主旨报告中，在为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勾画政治路线的时候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全会面前摆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就其数量而言比较弱小的拉丁美洲犹太人社团却比最富有、资金最雄厚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募集了更多的用来购买坦克和轰炸机的资金？结论是：第一，那里只有“好”犹太人。爱泼斯坦同志还忽略了或者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争取在全力支援反法西斯战争纲领基础上形成各民族大团结的人民运动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已

^① 美国民主党纽约的政治中心。

经达到了比在美国高得多的发展水平。在乌拉圭、古巴、阿根廷、巴西等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仅仅是各民族支援盟国、特别是苏联的广泛联合民主运动的反映。在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不顾来自亲法西斯政府方面的公开阻挠（不仅仅是外交性质的阻挠）而出色地开展了支援苏联的运动。

在主旨报告中，报告人把国外犹太人在当前这场历史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作用的大小，同他们按照在苏联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下的形式总共给予红军物质支援的多寡等同起来。换言之，作用的大小只看你为购买坦克和飞机募集了多少美元和美分，而不管在每一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如何。

从附上的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主旨报告之后所进行的讨论，就不能不以这样的不能容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讨论使在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在给红军以物质支援的运动中取得的一切成绩黯然失色。缺乏政治内容的讨论就像一群小本经营的商贩在进行廉价的交易，试图把红军中犹太人战士的英勇不屈和顽强战斗的精神与美国犹太人的美元和美分相比拟。有一些发言，例如希梅里奥维奇博士所做的发言，是同不久前与斯大林同志在谈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对苏物质援助问题时阐述的政治路线相抵触的。这些发言同样也与李维诺夫同志在回敬美国大使的挑衅性攻击时所做的声明相违背。

全会的材料等于往法西斯分子的磨盘里注水——帮法西斯分子的忙，而且毫无疑问，一旦在纽约的犹太人报纸《前锋报》收到登载有本次全会材料的今年3月15日《团结报》，将会立即利用这些材料将苏联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

全会在讨论苏联犹太人在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傲慢情绪。全会的参加者们显然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自己赋予了自己以代表全体苏联犹太人、同样也代表

苏联当局说话的权利，而这样的角色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口气贯穿在率先开始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之中，贯穿在努西诺夫教授的发言中。

犹太人委员会给自己提出的第二项任务及其完成的方法在爱泼斯坦同志的总结发言中做了阐述，那就是：公开地向在美国的某些反动的犹太人政界人士宣战。诚然，委员会的领导层在到底应当同谁作战的问题上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一点从爱泼斯坦同志发言时会议室内发出的惟一明智的即席插话中可以看出。但是委员会却打算“强令某些作者说话”，而强令其他作者闭嘴等等。这样一来，问题就不仅仅涉及支援红军，或者仅仅涉及为红军募捐坦克和轰炸机了。问题涉及的是“重要的政策”，而该委员会却在完全不考虑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又不考虑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又对我们党在美国的政治行动纲领及其对犹太人的政治方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充当起该政策在美国的执行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忘记了它是在莫斯科，是从属于苏联情报局的下属机构。

十分清楚，该委员会与苏联情报局下属的世界斯拉夫人和其他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同，由于执行这样一个纲领而只能给美国的工人运动和苏联帮倒忙。

在刊载于《团结报》上的关于此次全会的总结中我们认为同样犯有不能容许的、政治上有害的错误：公布了不应当公布的一些发言，例如爱伦堡同志关于必须进行反对反犹太主义斗争的发言，犹太人出版社经理斯特龙金同志关于报纸发行量，关于报纸的出版及其正确散发方面的困难的发言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刊出版
管理局局长 弗里德里希

№03811

洛佐夫斯基关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 国外之行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3年7月15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
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抄送亚历山德罗夫、萨克辛和孔达科夫^①

现将苏联情报局古比雪夫小组 1943 年 7 月 1~15 日收到的一些电报原件^② 送您一阅。我提醒您注意一下那些涉及到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的美国之行的大量电报。可以看出，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代表团的到达，在孤立反苏分子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按全部情况看来，《前锋报》以及为数不多的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和崩得分子已被排斥在外，这对于援助苏联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来自墨西哥、古巴和加拿大的一系列直接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以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出的邀请很引人注目。伦敦的援助苏维埃俄国犹太人基金会一再发来的邀请电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① 孔达科夫·尼·伊（1905~?）曾任苏联情报局责任书记。

② 收集的档案中无这些材料。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讲求实际的伦敦人甚至在成立一个接待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委员会，但是将不得不耐心稍候。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至今仅一个月，他们最早也要在8月底之后才能离开那里。

苏联情报局副局长 所·阿·洛佐夫斯基

№03817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关于派代表 前往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建议

(1943年8月18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局长格·费·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阿·洛佐夫斯基同志

副本供存档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亲爱的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
亲爱的·阿布拉莫维奇：

8月30日在伦敦将举行讨论实现犹太民族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大会口号——向红军捐赠1000辆坦克和500架轰炸机问题的英国犹太人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英国援苏犹太人联合委员会负责召集。参加该犹太人联合委员会的有犹太居民所有阶级和阶层的最知名的代表：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该委员会创建的宗旨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第2次莫斯科大会的口号。它请求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拍发贺电给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并向会议发出由我们委员会的知名成员签署的告英国犹太人书。该委员会同时还建议我们派代表团前往出席会议。

根据我们的建议，英国犹太人联合委员会已经答应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在英国出版由我们编辑的关于犹太人参加卫国战争情况的汇

编文集，篇幅为 10 印张。

将在伦敦举行的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在我们开展的以国外犹太人名义向红军捐赠 1000 辆坦克 500 架轰炸机的运动中将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鉴于英国的犹太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有影响的各界犹太人当中享有特殊的威望，可以预料，这次伦敦会议定会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

苏联犹太人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前往出席此伦敦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将会大大促进不仅是英国的、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援助红军运动的发展。

在巴勒斯坦有一个由著名德国作家阿诺尔德·茨韦格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其他知名代表倡议建立的争取苏维埃俄国胜利同盟。

该同盟一直在积极地开展支援红军的运动。它已经为红军建设了一座野战医院，并且积极参加了由巴勒斯坦劳动联盟为支援红军而发起的募集首批 10000 英镑的活动。

为了开展为红军募集 1000 辆坦克和 500 架轰炸机的运动，该同盟将于 8 月 24 日在耶路撒冷召开巴勒斯坦犹太人代表会议。这个同盟同样也建议我们委员会派代表出席他们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会议。苏联犹太人的代表在这座犹太人历史古城举行的会议上发出的声音，将会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广大阶层的犹太富翁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从而有助于支援红军运动的成功。

同一个代表团可以既访问巴勒斯坦，也访问英国。

随信附上致伦敦会议的贺电及告英国犹太人书草稿和致耶路撒冷会议的贺电草稿。^①

责任秘书 沙赫诺·爱波斯坦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材料。

№03785

犹太委员会关于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共和国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信

(1944年2月15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在卫国战争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与苏联犹太人群众的生活和安置相关联的问题。

在战争之前在苏联共有近500万犹太人，其中大约150万犹太人是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各州、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比萨拉比亚和布拉维纳以及波兰。据统计，在被法西斯分子暂时侵占的苏联各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不少于150万。

除了在红军队伍中忘我战斗的数十万犹太族战士之外，其余所有的苏联犹太居民都分散到了各中亚共和国、西伯利亚、伏尔加沿岸和俄罗斯联邦腹地各州。

很自然，对于被疏散的犹太族群众来说，就像对于所有被疏散的人一样。首先摆在面前的就有一个返回故乡的问题。但是从犹太民族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所经受的深重灾难角度看，这样做还不能全部解决苏联犹太居民的安置问题。

首先，由于法西斯分子在被他们暂时占领的苏联各地区特别是对犹太居民的空前暴行和群体屠杀，故乡对于许多被疏散的犹太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其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意义。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被毁掉了的家园——这涉及到所有返回家乡的人。对于其家庭成员没来

得及被疏散的大部分犹太居民而言，问题在于他们的故乡已经被法西斯分子变成了这些家庭及其亲友的集体墓地，而这些人是不可能起死回生的。对于已经成为苏联公民的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一般来说不存在返回故土的问题。他们留在那里的亲属已被消灭，犹太文化的一切痕迹也已经被清除殆尽。

其次，由于在各兄弟民族中建设各自文化的民族干部的迅速成长，曾在兄弟民族的民族文化各领域中工作过的相当一批犹太民族知识分子越来越无用武之地，并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业务荒疏。

犹太民族的知识分子能够将自己若干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文化能量运用到有着巨大成就的犹太民族苏维埃文化的建设中去，并带来极大效益。但是犹太居民散居各地，在所有共和国中均成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这将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现在，实际上在犹太人群众中，已经停止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现在的为数甚少的犹太人文化设施和机构（几家剧院，一家出版社，一家惟一的周报）不能满足 300 多万犹太居民的文化需求。

让如此众多的犹太居民散居各地并且不用其本民族语言对之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势必为外部的、敌对势力的影响的渗入造成可乘之机。

在战争过程中，某些资本主义的流毒在有些民族的个别阶层，其中也包括他们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上繁衍起来了。这种流毒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反犹太主义的重新迸发。一些法西斯的代理人 and 暗藏的敌对分子，为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的成果——各族人民的友谊而在千方百计地为这种迸发煽风助势。

通过自己优秀儿女在卫国战争的前线与后方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证明自己是祖国的真正爱国者的苏联一切阶层的犹太居民，对这些不健康现象感到极为难过和痛心。反犹太主义的出现之所以

无一例外地在每一个苏联犹太人的内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应还因为，整个犹太民族经受着自己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在欧洲由于法西斯的野蛮罪行就有近4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占整个民族的四分之一。苏联是保护了欧洲犹太居民几乎一半人生命的惟一一个国家。另一方面，反犹太主义的事实再加上法西斯的残暴兽行在促进犹太居民某些阶层中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增长。

为了犹太居民所有阶层经济状况的正常化和苏维埃犹太人文化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犹太居民的一切力量造福于苏维埃祖国，为了使犹太群众的状况同各兄弟民族达到完全相当的水平，我们认为在解决战后问题的框架内，提出建立犹太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问题是适时的和适宜的。

过去，曾经在比罗比詹建立了过渡到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为前景的犹太族自治州，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也为犹太民族解决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应当承认，比罗比詹的经验由于一系列原因，首先是由于没有充分动员一切力量，也由于该州距离大多数犹太人劳动群众的居住地过于遥远而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犹太族自治州还是成了远东边疆区最先进的州之一，这证明了犹太群众建设自己苏维埃国家组织的本领和能力。这种本领和能力更多地还在建立于克里木的一些犹太人民族区的发展中表现出来。

基于上述各点，我们认为在从政治观点看被认为可行的各州之一建立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是适宜的。我们觉得克里木的疆域是最为合适的州之一，因为它不论在安置移民的容量方面，还是在那里的各犹太人民族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方面，都最大限度地符合要求。

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将一劳永逸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按照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精神解决犹太民族国家—法律地位及其古老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课题。许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解决这一难题，它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得到解

决。

关于建立犹太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构想，在苏联最广大的犹太民众中以及在各兄弟民族的优秀代表人物中，受到极其普遍的欢迎。

在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中，世界所有国家的犹太民众，不论他们现在身居何处，都一定会给我们以极其重要的帮助。

基于上述内容，我们建议：

1. 在克里木疆域内建立犹太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 在克里木解放之前，先行委任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研究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您能对我们的建议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一建议的实现关系到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

索·米·米霍埃尔斯

沙赫诺·爱波斯坦

伊萨克·费费尔

№03751

第三次犹太人大会发言记录（摘编）

（1944年4月2日）

米霍埃尔斯：犹太民族的儿女们！兄弟姐妹们！

犹太民族代表第三次大会的举行正逢一个特殊的、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同你们是在我们的祖国——苏维埃国家感到光荣和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在英雄的红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日子里，在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捷报频传日子里，来这里聚会的……

但是在所有……对各兄弟民族施加的残暴罪行当中，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是最令人发指的……

在欧洲，包括暂时被德国人占领的一些苏联地区在内，在战争进行的几年之内已经有四百多万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杀害，占我们这个民族的约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布：因在卫国战争前线建树的战斗功勋而受奖的人员数量方面，犹太人在苏联各民族中位居第四……

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曾经引用了仅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战斗英雄的数字，其中的犹太人英雄数量仍然是位居前列者之一。在该方面军的英雄当中，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犹太人占据第五位……

费费尔：……在从基辅撤退之前，纳粹挖开掩埋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们尸体的巴比谷地，并进行焚尸扬灰，以为风可以吹散他们滔天罪行的秘密。但是巴比谷地扬起的骨灰灼痛了我们的心，怒火在我们的眼里燃烧，骨灰落在我们剧痛的心灵创伤之上，使我们寝

食不安。如果我们不用我们复仇的刺刀把这些吃人的魔王彻底消灭，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眼泪变成致命的炮弹，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烧死在我们仇恨的烈火中，我们就不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为苏维埃人感到骄傲，我们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以苏联各民族为榜样、以苏联犹太人为榜样、以华沙犹太人区那些作为我们的战友兄弟而令我们为之自豪的英雄们为榜样，奋起投身到反哈曼战争中来……

莫斯科犹太人社团犹太教牧师什洛伊梅·施利费尔：以色列的子孙们！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们！我们，犹太人，作为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忠实儿子，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穷凶极恶的两条腿野兽们对我们的祖国、其中也包括对我们犹太人的进犯的全部危险，因而我们所有的优秀儿女都在参加这场为消灭敌人而进行的神圣斗争。

希特勒就像一个恶毒吸血鬼在吮吸犹太人的血。从最久远的年代开始历数，他超过了犹太民族的一切敌人。因为古埃及法老处死的人仅仅是男性。阿马列克进攻的仅仅是疲惫者和弱小者，而哈曼也仅仅是打算要“折磨、杀害和消灭”犹太人并且仅仅预备了一棵树用来当绞架。可是希特勒却是残酷地动手消灭整个犹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不留；他的恶意真该遭人千古诅咒，遗臭万年……

爱伦堡：……希特勒分子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起了反犹太主义。他们使已被遗忘的偏见重现、使被讥讽的迷信再生。无法使法西斯分子回心转意，只能消灭他们。苏联人民将把法西斯主义烧成灰烬。苏联人民也不能容忍在地球上存在法西斯代用品。偏见扩散起来比知识要快。病毒对所有的民族都是危险的。必须找到疫苗，将它生产出来，寄发各地，而细菌到处游荡却无需签证也不必有什么许可证……

№03753

爱泼斯坦在犹委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1944年4月8~11日）

……在业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剥削人现象的苏联，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土壤。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和牢记。如果说这场战争由于过去的黑暗残余在某些最落后的居民阶层中的死灰复燃，引起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正常现象，那么现在则无论如何不能再把这些现象进行概括并加以夸大，也不应吹嘘其意义和影响。任何类似的概括和夸大都只会对敌人有利；那样做将会传播颓废心理，助长失败主义，培养绝望情绪。

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在犹太人中间有不少由于受法西斯耸人听闻的暴行的影响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这一点甚至也反映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就主观而言，这些人都是循规蹈矩的苏联公民，但是客观上，他们却是在不理解这些严重事件的实质而单单是感情用事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抱怨和牢骚在影响周围的人，起到腐蚀作用，从而带来巨大的危害。

我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同一切不健康的狭隘的民族情绪作无情的斗争；我们应当揭露这些情绪并根绝我们当中的一切抱怨、牢骚和诉苦……

自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尝试来扩大自己的选题范围，办法是向外寄发各种话题的材料而不再仅限于犹太人话题。但是结果还是发现，国外的犹太人报

刊，甚至左翼的、直至共产主义的报刊，都更希望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收到仅仅有关犹太人话题的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关于苏联的一般性题材的材料这些报刊通过一般的渠道即可得到。

国外的犹太人广大群众普遍对苏联极为关注，但他们尤为关注的是犹太人在我们国家的生活情况，因为在我们这里，与其他国家、甚至与最民主的国家不同的是：再也不存在“犹太人问题”了。而且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法西斯主义对犹太居民施加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这种关注更加增长了……

自上次全会以来至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其刊发的材料的内容方面加强警觉性和严格把关，以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作为苏联各民族共同友谊的众多有机环节之一的我国犹太人的生活……

№03767

犹太委员会就乌克兰幸免于难的 犹太人命运呈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5月18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不断地收到来自解放地区的，关于在法西斯屠杀中幸存犹太人极其艰难的精神和物质处境的材料。

在许多地方（别尔季切夫，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巴尔塔，日梅林卡，文尼察，赫梅利尼克，罗夫诺州的旧拉法洛夫卡等）犹太人幸存者中的许多人仍然待在从前的犹太人（特划）区里边。他们原有的住房不予返还，已被认出的被劫财产亦不退还本人。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在惨遭空前灾祸之后，当地政权不仅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关怀，有时反而还粗暴地违背苏联法制，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为他们创造苏维埃式的生活条件。

留在当地的希特勒帮凶们，由于参与过对苏联人的屠杀和劫掠，很害怕现今仍然活着的其所犯罪行的目击者，因此也千方百计地力促业已形成的上述局面继续下去。

本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还表明，当初曾经被苏维埃政权暂时疏散到大后方去的犹太人劳动者，在迁回原地方面障碍重重。尽管在被疏散者中有许多技能熟练的人员，他们本可以在重建被毁的城市和乡村工作中成为十分有用的人，但是也不让他们返回。

即使有某些人通过各种办法好不容易地回到了其祖祖辈辈世代

生活过的故乡，他们也都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在德国占领期间被别人住上了。于是，返回者便无处安身了。在安排工作和提供物质帮助方面他们的处境也同样很糟。

此外，令人关注的事实还有，由“红十字会”接收的各国向被疏散者和回迁者提供的物品和食品援助，很少被分发到贫困的犹太人手中。应当指出，国外的犹太人组织向遭受战争苦难的苏联居民提供援助是不分民族的，但它们毕竟还是侧重于有可观数量犹太人居住的那些地区。

根据所有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措施将是适宜的：

1. 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在对待已解放地区幸存犹太人方面的一切不正常现象，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问题，归还他们的住房和财产，安排其工作并提供急需的物质帮助。

2. 消除由某些地方政权机关设置的各种障碍，使被疏散的犹太人劳动者有可能重返故里。

3. 向“红十字会”下达专门的指示，让他们既向被疏散在外的、也向在被解放地区的犹太居民提供经常的援助。

4. 鉴于在已被解放的地区和被疏散地区的犹太居民的特殊艰难处境，最好能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或其他某个苏联机构之下，设立一个负责向蒙受战争苦难的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专门委员会。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苏联人民演员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波斯坦

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诸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否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某些材料？

维·莫洛托夫

5月20日

沙塔林同志：请了解一下情况并同我面谈一次。

马林科夫

5月26日

我已同马林科夫同志谈过。

沙塔林

5月31日

№03770

贝利亚关于救助在乌克兰幸存的犹太人的指示

(不早于 1944 年 5 月)

1. 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志，采取措施帮助安排好曾遭受德国占领军特别镇压（集中营、犹太人特划区等）的犹太人在已解放地区的劳动和生活，其中首先把孤儿和父母极端贫困的儿童送入幼儿园。

2. 向切尔诺夫策和莫吉廖夫 - 波多利斯克派遣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授权他调查大批犹太居民聚集该地的原因，并帮助他们前往各自的居住地。

与此同时，还应为其中尚未解放领土上的那部分犹太人居民指定分散安顿的地点，并向他们提供帮助，将其送往该地安置。

№03771

犹委会就组织安排对犹太人的 物质援助问题给苏联情报局的报告

(1944年8月1日)

致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阿·洛佐夫斯基同志
亲爱的·阿布拉莫维奇：

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各国的大量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复电费用已付的。它们发自一些犹太人社会团体、同乡会以及一些个人，其中均表示准备向已解放地区的某些地方和城市的犹太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我们认为这种援助极为重要，因此提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下设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国外的犹太人团体和同乡会进行联系，以便协调并具体将援助分配到位。

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之所以适宜，还因为已解放地区的犹太人由于业已形成的条件，而在物质方面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国外的犹太人组织通过“红十字会”提供来的援助物资分不到他们手中。

国外的上述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向我们表示提供援助的愿望而被置之不理、不予答复，正在招致救援运动的挫折和敌对宣传的加强，关于这一点我国驻纽约总领事基谢廖夫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告知过我们。

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都一直在直接经管在他们生活在苏联的同族人中分配国外救援物资的工作，而犹太人至今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仍然不拥有这种可能性。这一事实在美国的犹太人舆论中引起闲言碎语并在助长反苏分子的气焰。

我们确信，我们的上述建议一经采纳，必将会促进国外救援运动的发展，并使以纽约《前进报》为首的反苏集团失去反苏的借口，该报一直在利用形成的局面号召中止援助。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苏联人民演员 索·米霍埃尔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泼斯坦

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请您决定。

阿·洛佐夫斯基
8月14日

洛佐夫斯基同志：

弄清情况之后将此问题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议处。

亚·谢尔巴科夫
8月15日

№03826

犹委会就申请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8月18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以斯蒂芬·魏斯博士为首的美国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拟召开一次有关各国犹太人状况问题的世界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将有所有国家的代表而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从犹太教牧师到共产主义者都有。

这次会议本应在今年3月份举行，但是为了争取有苏联犹太人的代表参加会议而两度延期。

国外的犹太人社会团体对召开此次会议非常重视并且围绕苏联犹太人的与会问题表达了各种意见。

近日以来，我们再次收到纽约的来电，称会议已最后确定于1944年11月11日举行，第三次重申坚持邀请苏联犹太人代表前往出席。

鉴于有关许多国家犹太人状况的问题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派出由苏联犹太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将是适宜的。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由于我们必须在您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之后才能对邀请做出答复，故请您给我们以相应的指示。^①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泼斯坦
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① 莫洛托夫批示：请征求谢尔巴科夫同志的意见。

№03827

犹太委员会就申请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 致谢尔巴科夫的信

(1944年8月30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所有国家的犹太民族的各阶层代表，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从犹太教牧师到共产主义者，都将参加定于1944年11月11日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

在我们收到的邀请中称：

“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包括有所有关于支援和救助犹太人的问题，曾经被敌人占领或者遭到敌人破坏的国家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问题，以及恢复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犹太人生活问题。

另外还将讨论关于惩办罪犯和赔偿方面的要求，以及对犹太人战后的合法地位的保障问题”。

此次代表会议是由著名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教牧师斯蒂芬·魏斯博士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纳胡姆·戈德曼博士领导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召集的。

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系联合着世界各国的大多数犹太人的社会组织。该组织完全处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它并不以一个政党组织的身份出现，但却竭力想把一切政治倾向的社会组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对待苏联方面，该组织的领导人在卫国战争期间一直采取十

分友好的政策。

虽然很难预料到本次会议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程度，但是毫无疑问，从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来说，肯定将积极努力，试图把这一问题变成中心议题。但是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列入了一些全世界犹太人对其得到阐明和解决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使我们相信，我们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将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如果有关与会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我们认为代表团的人数应当多一些，不少于 10 人，以便使之占有相应的比重。

我们建议让下列同志参加代表团：

1. 苏联英雄、中将克赖泽尔（代表团团长）；
2. 犹太人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尔伯施泰因；
3. 埃玛·拉扎列夫娜·武尔夫，近卫军大尉，勋章获得者，联共（布）党员（代表团秘书）；
4. 亚历山大·弗鲁姆金，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勋章获得者；
5. 费萨诺维奇，苏联英雄，海军中校；
6. 爱泼斯坦（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7. 戈诺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8. 达·贝格尔森，作家；
9. 卡茨，少将；
10. 佐林，白俄罗斯优秀犹太人游击队队长。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泼斯坦

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03828

谢尔巴科夫就犹委会参加世界
犹太人代表会议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9月2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今年11月11日在纽约将召开世界犹太人代表会议。我以为，苏联犹太人代表参加此次代表会议是适宜的并且具有政治意义。

可以推荐下列同志为代表团成员：

索·米·米霍埃尔斯——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

西尔伯施泰因——党员，犹太人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费萨诺维奇——党员，苏联英雄

埃玛·武尔夫——党员，近卫军大尉，勋章获得者（代表团秘书）

亚·谢尔巴科夫

同意。需要在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

维·莫洛托夫

9月25日

关于派出代表团的问题已获解决。莫洛托夫同志业已同意。

亚·谢尔巴科夫

№03772

犹委会就国外救援犹太人物资 分配中的问题呈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10月28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在我们此前写给您的信件中，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系列在分配由“红十字会”接收的国外捐赠物品工作中存在的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犹太人居民，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在此类救助物资的分配中完全被地方政权机关所漠视。甚至连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犹太人游击队员都得不到任何捐赠物品。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已经众所周知，并在对我国持敌视态度的报刊中被广泛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在纽约的亲法西斯犹太人报纸《前锋报》就在号召犹太人团体停止援助苏联的运动。关于这一点苏联驻纽约总领事基谢廖夫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告知过我们。告知我们此事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在国外的友好组织。《前锋报》还特别向“联合会”这样的在美国颇有影响的组织发出呼吁，而该组织已经同我们签订了通过“红十字会”向苏联居民提供救助的协议，而且这一救助是不分民族的，只是要对住有较多犹太居民的地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为此事而向捐赠物资分配委员会主席克鲁季科夫同志提出的所有请求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的一些旨在使情况正常化的具体建议

也被置之不理。

克鲁季科夫同志下达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具体情况，因为它没有突出地强调指出上面列举的现象，也没有包括任何对各地执行指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措施。

从我们不断地从苏联各地收到的大量来信和请求中可以看出，在分配来自国外的救援物资工作中对犹太居民的漠视仍在继续，而这种漠视具有粗暴违反苏维埃准则和对遭受法西斯主义特殊磨难的人极不尊重的性质。

我们在此请求您本人亲自过问并解决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使上述不正常现象得以结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让中央和地方的犹太人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救援犹太居民物资的分配工作是适宜的。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泼斯坦

致波波夫（国家监察人民委员）

抄送：克鲁季科夫同志，米霍埃尔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

1. 请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认真、迅速地调查米霍埃尔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所提要求的依据，并追究有过失者的责任，望在11月15日前将处理结果报告人民委员会。

2. 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关于让中央和地方的犹太人社会团体代表参加救援犹太居民物资的分出和分配工作的要求，可在第1项所提的调查进行完毕之后予以研究，但是我认为有必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要事先指出的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建立的，而该委员会看来对自己的任务并没有充分地正确理解。

维·莫洛托夫

1944年10月29日

№03773

波波夫就乌克兰、白俄罗斯犹太人援助工作 情况呈莫洛托夫的报告（摘录）

（1944年11月）

秘密

呈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关于对索·米霍埃尔斯同志和沙·爱泼斯坦同志 所提申请的依据的调查结果

按照您的委托，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对索·米霍埃尔斯同志和沙·爱泼斯坦同志1944年10月28日所提申诉的依据进行了调查，该申诉中提到的一些事实称，某些地方政权机关在分配“红十字会”从国外收到的捐赠物品工作中，对犹太居民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态度。

……为了证明其关于在分配捐赠物品工作中犹太居民受到漠视的论点，米霍埃利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在同我进行谈话时向我提供了个别公民寄给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15份信件。

但是在这些信件中提出的申诉是个别公民希望给予他们物质帮助的“个人请求”，而不是对地方政权机关在分配捐赠物品工作中对他们的需要采取冷漠态度的“抱怨”，而且在上述那些信件中，甚至没有一处表明这些人曾经向任何人提出过类似的请求。

根据苏联监察人民委员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进行调查表明，分配给犹太居民的捐赠物品通常都比其他居民要多。

根据上述几个加盟共和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材料，犹太居民分得捐赠物品的情况可以用如下数据加以说明。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对该共和国的 13 个组织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这些组织中，工作人员总数为 2645 人，得到捐赠物品的为 1719 人，占 64.9%。

在 2645 名工作人员中有犹太人 324 人，其中 235 人得到了捐赠物品，占 72.5%。

在工作人员总数中非犹太民族者共 2321 人，得到捐赠物品的共 1484 人，占 63.9%。

由此可见，在被调查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上述组织，得到捐赠物品的犹太民族工作人员的比例，不论是在获得捐赠物品者的总的数量方面，还是同非犹太民族的工作人员相比，都是比较高的。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调查范围包括了明斯克、莫吉廖夫、莫济里和鲍里索夫等城市的共 18 个组织。

有 6 个被调查的组织中没有犹太人工作人员。在其余 12 个组织中工作人员总数为 607 人，得到捐赠物品的有 369 人，占 60.7%。

在 607 名工作人员中有犹太人 88 名，其中 64 人得到了捐赠物

品，占72.7%。

非犹太民族的工作人员总数是519人，得到捐赠物品者305人，占58.7%。白俄罗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沃洛申同志告诉我们，在被调查的那些组织中，捐赠物品通常是发放给卫国战争中的伤残军人、游击队员、疏散后返回原地者、军人军属以及德军占领时的蒙难者。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捐赠物品被转送给了儿童保育机构。例如，通过莫吉廖夫州卫生局就向各儿童保育院和婴儿院转送了1021件物品。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俄罗斯联邦，调查是在5个人民委员部及其一系列下属机构进行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机构中共有2098人得到了捐赠物品，其中有301名犹太人，占得到捐赠物品的工作人员总数的14.3%。

所分发的贵重物品中这14.3%的人得到的数量最多。例如，在莫斯科州卫生局所属第一市立结核病医院，得到捐赠物品者65人。其中有12名犹太人。而分配给这12名犹太人工作人员的鞋靴和大衣占所收到的此两种物品的比例分别为42%和43%。

在通心粉工业管理局，得到捐赠物品的有12人，其中有4名犹太人。分配给这4名犹太人工作人员的连衣裙和鞋靴各占所收到的上述物品的50%和66%。

在俄罗斯联邦粮食总局，捐赠物品发放给了28人，其中有10名犹太人。给这10名犹太人工作人员分发了鞋靴，为发放总数的54%。

上边列举的所有事实都证明米霍埃尔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所提的申诉是缺乏依据的。这份申诉是不严肃地综合个别一些并不能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用以评定分配捐赠物品工作情况的事实所得出的结果。

我同时在此还向您报告，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以前就已经向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发出指示，要求它们对从国外收到的捐赠物品的正确分配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波波夫

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米霍埃尔斯同志和爱泼斯坦同志

根据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现将波波夫同志（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报告的抄件寄给你们。

秘书处主任 拉普绍夫

№03775

米霍埃尔斯就犹太著名评论家古尔维奇的
医疗问题致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娃的信

(1945年4月18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波林娜·谢苗诺夫娜：

首先请您原谅我冒昧地打扰您。对公共事务承担的责任是给予我这一勇气的惟一因素。事情是关于我们的一位著名苏联评论家古尔维奇·阿布拉姆·所罗门诺维奇医疗住院问题的。此人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了身体局部麻痹症。据医生证明，他的病是可以治愈的。由于我深知您极富同情心，故请求您费心帮助安排他人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诊治。

我再重复一遍，我是犹豫再三才下决心冒昧打扰您的，并希望您能原谅我。

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米霍埃尔斯

No 03783

美国乌克兰同乡会就援助乌克兰犹太人问题 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信

(1945年4月25日)

致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亲爱的朋友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

通过这封信我们想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隶属于犹太人援助苏维埃俄国委员会的乌克兰同乡委员会的活动，和一些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在向乌克兰的苏联居民提供援助方面的工作造成困难的特殊问题。

如果说这些问题自本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期待得到解决，那么现在，当我们的委员会最近即将改组为美国有组织的乌克兰犹太人民族联合会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加迫切和尖锐。

但首先，还是先总的概述一下在美国的一些乌克兰同乡会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加入这些同乡会的人并不属于某个确定的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积极活跃的阶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情绪上多愁善感，怀念故土——乌克兰。这一点促使了并且现在仍然在促使他们专门为自己的故乡城市筹集捐助。

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些同乡会，特别是乌克兰同乡会，深受奥舍罗维奇反苏口号“救救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影响。这一阴险的口号与当时是由犹太人“工人委员会”中以《前锋报》为首的反苏分子从外部蓄意带进来的，很遗憾，该报至今对在美国的犹太人生活

依然具有某些影响。

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由于我们委员会不间断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一口号的恶劣影响，并把一些乌克兰犹太人同乡会动员起来广泛参加对苏联居民的援助活动。

我们曾经成功地说服了那些同乡会组织相信，由于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因而也就根本谈不上从它们寄去援助物资的城市和乡镇收到回音的问题。

而现在，当所有的人通过阅读报刊都已知道在乌克兰的一些城市和乡镇，犹太人群众的生活正在恢复的时候，当他们知道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文尼察和其他一些城市还有大量的犹太人幸存者的时候，这些同乡会向我们做出这样的表示：“我们承认‘同族相助，骨肉相亲’的口号是有害的。我们意识到苏联各族人民是一道战斗、一道受难并一道取得胜利的，因此他们都应当得到我们一视同仁的救助。出于这种意识，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进行我们救助工作的，并且打算今后仍本着这种精神继续进行下去。例如，我们已经着手为装备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旧康斯坦丁诺夫的医院募集价值15万美元的全部必需的医疗仪器及其他附属品。我们还准备在我们的故乡城市装备起儿童保育院、学校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供这些城市和乡镇的公众共同享用。但是现在我们希望能够确信无疑的是：我们的援助确实能直接运达我们所寄发的那些地方。我们同样还希望能够从我们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直接的回音，希望能够知道我们的亲属、朋友和熟人生活得怎样，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生活恢复得如何”。

由于我们的委员会没有可能对各同乡会提出的这一理所当然的要求做出明确的肯定答复，于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既然不可能同他们迄今为止发送过援助物资的城市和乡镇建立直接的联

系，那就应当开始给那些写信请求给予帮助的个人寄送专供其个人的物品。

无需赘言，克服这种倾向是何等地困难；它实际上在把人们引向那个有害的口号“同族相助，骨肉相亲”，而这个口号在动摇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才得以说服所有同乡会参与其中的建设性援助的广泛基础。

完全可以料到，向苏联政权机关提出与我们的救助苏联居民工作相关的条件，不论是什么样的条件，都是不明智的。但是 we 想，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能帮助我们做到：

1. 在旅居美国的乌克兰犹太人同乡会与在乌克兰的犹太居民，特别是敖德萨、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旧康斯坦丁诺夫、莫吉廖夫（在德涅斯特河畔）、白米尔科维、别尔沙季、明科维茨^①、利丁^②、奥斯特罗波尔、波隆诺耶和赫梅利尼克的犹太居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这些城市和乡镇的同乡会已着手要募集 25 万美元的设备来装备那里的医院和儿童保育院）。

同这些城市以及同乌克兰的其他城市的直接联系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广泛地开展我们动员诸多同乡会参加援建各种项目规划的工作。

2. 提请有关当局研究由我们乌克兰犹太人委员会派出代表团于最近的将来前往乌克兰的问题。

我们深信，这样的直接联系和我们代表团从乌克兰犹太居民那里带回来的出自亲属本人之口的问候，定将会使我们获得最广泛的可能性在所有的同乡会中大规模开展建设性的救援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联系和问候还能够使在美国的众多犹太居民阶层摆脱

① 此地名为音译。

② 此地名为音译。

有害的反苏影响，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们正日复一日地在犹太居民中扩散这种影响。

此外，这样做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生活在乌克兰的犹太居民同移居美国的乌克兰犹太人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和促使人们对苏联总地采取正确的、友好的态度。

致以友好的敬意。

隶属于犹太人援助苏维埃俄国委员会的
乌克兰同乡会委员会主席、
犹太教牧师 阿夫拉姆·比克

№03777

犹太会就苏联犹太人物质支援工作的 安排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5年8月28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亲爱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最近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许多犹太人社会团体向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关于向苏联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帮助重建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毁坏的苏联城市和乡村的建议。

基于国外犹太人生活和习惯上独有的特殊性，这些犹太人社会团体在自己关于不分民族地向遭受德国侵略者磨难的苏联居民提供援助的建议中，请求给它们固定一些确定的援助对象以便能够在具体的口号之下在犹太居民中间进行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例如，由著名的极地考察专家斯蒂芬森和知名律师乔治·戈登·巴特勒领导的“阿姆比詹”（对口支援比罗比詹协会）就表示希望参与重建斯大林格勒的工作。

以百万富翁波尔·别尔华特为首的最大犹太人资产阶级慈善组织“联合会”请求允许它支援克里米亚的犹太人集体农庄。

美国支援苏联抗战犹太人联合委员会决定要支援萨拉托夫州。

以孔茨教授为首的支援犹太人土地整治协会准备向比罗比詹提供物质支援。

各种各样的同乡会（拉脱维亚同乡会、比萨拉比亚同乡会、明斯克同乡会等）都力求参加家乡城市和乡村的重建工作。

像伦敦的互助协会和纽约的犹太人发展手工业协会这样一些犹太人社会组织都已向苏联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委员会给它们以协助，以便为它们指定可以向之寄送现金和物资的救援对象。

从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出，上述各组织遵循的是他们美国人的这样一种传统，即让他们需要为之付出努力的对象具体化。联系着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移居国外的数十万犹太人的那些兄弟会和同乡会尤其抱定这一传统。仅仅一个支援苏联抗战犹太人联合委员会下面就有 2364 个此类社会组织和同乡会等。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这些组织曾经募集了大量资金用于支援红军。这种社会性的运动当然并不仅仅是限于募集资金这一件事情上。它同时也是在国外的犹太人广大群众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同情的某种积累。

与此同时，直到如今依然存在着一切现金和物质援助，不论其来自何方和寄送给哪里，一律发送给一个组织——“红十字会”的体制，而该会并不把这些援助交给指定的受援者。

我们现举一个具体的实例，以说明现行的分配国外社会组织提供的现金和物资援助做法的弊端，供您参考。

在 1943 年“阿姆比詹”（对口支援比罗比詹协会）通知斯大林格勒市苏维埃，说它已通过美国贸易股份公司给斯大林格勒近郊的“银色池塘”保育院寄出了发电设备、各种作坊用设备、衣服、食品和药品。该保育院当时共收养着 500 名各民族的孤儿。“阿姆比詹”给该保育院的负责人员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注明了运货单的号码等等。该保育院等待上述宝贵的物资长达一年有余。最近该保育院的一个代表小组来到了莫斯科（该院副院长及两名保育员），试图追回“阿姆比詹”寄发给该保育院的物资。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采取如下措施是适宜的：

1. 废除现行的国外犹太人组织寄发苏联的现金和实物一律不指明收受人的做法。

2. 让这些组织有可能根据同苏联的相关机构达成的协议直接向区、乡、儿童保育院、医院、学院和博物馆等具体对象提供自己的援助。

一俟这个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我们深信这种援助定能达到相当的规模并促进国外犹太居民对苏联的同情的进一步加强。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致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请仔细研究此事并呈报您的建议。

格·马林科夫

8月30日

№03778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国外犹太人组织救援物资 分配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5年10月17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费费尔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采取新的办法，以使国外犹太人慈善组织寄发苏联的现金和实物不再是非指定人收受，而是直接发给收件人。

关于废除来自国外的捐赠物资不确定收受人做法的问题，早在今年3月份已经解决。1945年3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指示，要求来自国外的捐赠物资只要标明具体的收受对象，均应交给收受人。

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是知道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此项决定的，并且就此问题同克鲁季科夫同志（外贸人民委员）和弗拉索夫同志（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外捐赠物资分配委员会主席）交谈过。

鉴于他们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只好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是试图达到这样的目的，即让国外的犹太人慈善团体能够直接向我国的犹太居民提供物质支援。

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在他们1945年2月致莫洛托夫同志的请求中，已经在提出其他问题的同时提及过这个问题，并遭到了拒绝。

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建议是在使苏联的规矩去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味和习惯。如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将使国外的慈善组织有可能利用慈善事业来作为在我国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实施这样的建议之所以不适宜，还因为把犹太人单独从苏联各民族居民中划分出来，将会为反犹太主义创造条件。

在实践方面，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二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也不具有迫切性，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来自国外的捐赠运动几乎已经停止。

格·亚历山德罗夫

№03789

犹太会就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问题 致苏联部长会议的信

(1946年)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

亲爱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在今年3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期间，来自犹太人自治州的代表巴赫穆茨基^①同志（联共（布）州委书记）和科钦娜同志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表示欢迎犹太人劳动者前往该犹太人自治州去工作。这些文章以及该报随后刊载的材料在苏联以及国外的犹太人当中引起了广泛反响。该州的一些组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团结报》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希望移居犹太人自治州的犹太人写来的数千封个人和集体的信件。在文尼察已经组织起了一个由100个家庭组成的争取迁往比罗比詹的小组。来自克里木州占科伊的类似小组的一名代表已经来到莫斯科。同样，还收到了来自敖德萨州加里宁区的大批来信。

这些信件说明，现在有大量犹太人希望自愿移居比罗比詹并参加犹太人国家组织的建设。

该州目前非常需要新的移民。劳动力不足使他们无法完成在第4个五年计划中计划拨给该州的投资。

关于比罗比詹的问题正越来越多地拥有国际意义，因为比罗比

^① 亚·瑙·巴赫穆茨基（1911~?）曾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联共（布）州委会第一书记，1949年被捕，1952年被判处剥夺自由25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詹作为苏联犹太人的国家性组织已经成为国外犹太人进步力量进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反动势力斗争的旗帜。

但是由于苏联政府没有做出给予前往犹太人自治州的移民与移民远东相同优惠的决议，同样也由于许多地方组织不愿意放走那些希望移居犹太人自治州的犹太人，向该州移民的工作目前困难重重，难以进行。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们请求您过问并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数千个犹太人家庭能够在今年就移居到犹太人自治州去从事固定的工作。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索·米霍埃尔斯

作家 费费尔

《团结报》责任编辑 日茨

№0382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犹太委会 派代表出席世界犹太人大学生代表大会的意见

（1946年8月8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建议派一名苏联犹太人大学生的代表前往出席拟于今年8月份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犹太人大学生代表大会。

鉴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和性质均不清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认为向该代表大会派出苏联犹太人大学生的正式代表是不适宜的，但可授权出席在同一时间在布拉格城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苏联大学生代表团领导人，可根据需要从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中派一名观察员出席上述犹太人代表大会。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施皮格尔格里亚斯同志）同意我们的建议。

米·苏斯洛夫^①

同意。

日丹诺夫

^① 米·安·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主编。

№03782

犹太委员会关于组织安排对苏联犹太人 物质援助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6年11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部长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亲爱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现将下列材料^①寄给您：（1）波尔·诺维克收到的“拉申列利弗”犹太人援助苏联委员会主席路易·卢因寄自纽约的信件副本，此人不久前曾访问过苏联；（2）诺维克致本委员会信件的副本；（3）一些同乡会支援苏联某些城市的计划安排。

所提出的计划安排仅仅是犹太人援助苏联委员会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规模更大的计划安排的一部分。从提供给您材料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一些同乡会有意对它们以其名字命名的苏联城市提供援助。

鉴于必须在上述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对这个我们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组织做出答复，请您就此事给我们以相应的指示。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材料。

存档。已告知该委员会，援助问题应通过其他组织（“红十字会”及其他机构）而不是通过该委员会解决。

舒梅科

1946年12月19日

№03842

犹太会就参加反法西斯组织国际 代表会议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7年1月17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亲爱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作家肖洛姆·阿什和记者尔德格^①（肖洛姆—阿列伊赫姆的女婿）为首的美国犹太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通知我们称，根据该委员会的倡议预定召开一次旨在联合起来进一步开展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残余的斗争的各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及同苏联友好委员会世界代表会议。按照该委员会的计划，可能将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巴勒斯坦、英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组织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将听取各国进步的犹太人社会组织关于其对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贡献、关于它们参加消除战争后果及争取持久和平和民主世界运动情况的报告，并制定今后同反动派，其中包括同犹太人中的反动派斗争的计划，犹太人中的反动派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非常活跃。

为了召开此次代表会议正在组建一个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计划于今年春季在巴黎举行会议。然后过一段时间，预定仍在原地召

^① 戈尔德贝格·边齐翁（1895~1972），美国新闻工作者，40年代是自由主义犹太报刊《德尔托格》报的合编者之一。

开此次代表会议。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收到参加此次会议及参加组织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的邀请，该组织委员会负责最后审定大会议事日程和代表会议本身的参加人员。

我们认为，各界犹太人的代表既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参加代表会议，将会在团结国外犹太人劳动者当中的真正进步的民主力量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并可对会议的政治方向产生影响。

我们的代表可以利用这一重要的讲坛，进行反宣传和对到处散布有关我们祖国的诬蔑性谰言的苏联的敌人进行揭露。

另一方面，苏联各界犹太人代表不参加此次会议则可能会削弱进步—民主阵线的力量，并可能为敌对分子所利用。

我们请求您给予指示。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人民演员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03784

舒梅科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请示信

呈日丹诺夫秘书处的报告

(1947年2月19日)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请示回复在美国的乌克兰同乡会委员会的来信，该信中告知这些同乡会正在募集资金和设备用以在敖德萨、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以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一系列城市修建医院、学校及其他公益机构。

鉴于这些同乡会作为其提供援助的条件，试图获得向乌克兰的犹太居民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性质的工作，故建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美国同乡会委员会的来信不予回答。

舒梅科

№03843

苏斯洛夫就犹委会参加反法西斯 组织国际代表会议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7年2月24日)

致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请求批准该委员会参加负责筹备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及同苏联友好委员会世界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并参加拟于1947年底在巴黎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正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美国犹太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没有收到请其参加负责筹备本次代表会议的组委会的正式邀请，也没有得到关于这样一个组委会业已组成的通知。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有大量的国外犹太人组织赞成召开这次世界代表会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掌握有美国犹太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戈尔德贝格同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互信件来往的一些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关于召开此次代表会议的问题早在戈尔德贝格访问苏联期间就曾经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讨论过。在信中戈尔德贝尔把拟议中的代表会议称为亲苏组织的会议，而且在谈到这次会议时就像谈到一项他在莫斯科已经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充分达成协议的措施一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力求以这种办法成为此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

而这一点则有可能被国外的反动势力利用来反对苏联。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认为，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倡议举行亲苏组织世界代表会议有可能被国外的反动势力利用来反对苏联，因此反对该委员会关于让它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参加组委会的建议。至于是否参加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晚些时候，视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国外犹太人组织究竟多到何种程度再予审议更为适宜。

米·苏斯洛夫

同意苏斯洛夫同志意见。报莫洛托夫同志。

日丹诺夫

同意苏斯洛夫同志意见。

维·莫洛托夫

3月3日

№03796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用希伯来语
出版文学艺术丛刊的决定

（1947年7月28日）

关于用希伯来语出版文学艺术丛刊事宜

兹决定：

批准在莫斯科和基辅两城市出版希伯来语文学—艺术丛刊。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0384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犹太会 参加人民民主国家犹太人代表会议的意见

（1948年1月5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致函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求批准它接受由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派员扎克·纳坦提出的关于召开民主国家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会议的建议，举行该会议的目的是旨在研究制定同在57个国家、其中包括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均设有分支机构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反动领导层进行斗争的措施。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认为，召开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的专门会议是不适宜的，因为在9个共产党的代表在波兰举行的会议之后，团结犹太人—民主主义者的斗争措施已经十分明确。毫无疑问，加入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民主国家犹太人组织，应该在该组织内部更加活跃地开展自己的活动，从而争取换掉其反动的领导班子。而苏联的犹太人委员会首先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自己是否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组织的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建议苏联犹太人委员会把召开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专门会议不适宜的意见通知扎克·纳坦，并希望开展积极斗争以更换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反动领导班子。

请您给予指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副部长
巴拉诺夫^①

送中央委员会各书记

同意采纳巴拉诺夫同志的建议

日丹诺夫
阿·库兹涅佐夫
米·苏斯洛夫

已告苏联犹委会（海菲茨同志）：召开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的专门会议并不适宜。

（签名）^②

① 列·谢·巴拉诺夫（1909～1953），曾任联共（布）中央国际宣传部副部长，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联共（布）中央对外关系部副部长。

②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No 03884

犹太会就志愿者申请支援 巴勒斯坦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8年5月18日）

特急，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巴拉诺夫同志

由于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有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来犹太
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申请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参加同侵略
者及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提出申请者多数不是仅仅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代表着自己各自
的同事或同学。

大多数申请来自莫斯科各高等院校：法律学院，化工学院，外
国语专科学校，化工机械制造学院以及其他院校。

有一些申请来自苏联国家黑色冶金铸钢与轧钢设备设计院及兵
器部的职员、工程师，和苏联军队的军官。这些申请人都说明自己
提出申请的理理由，是帮助犹太民族进行反对英国侵略、争取建立犹
太人国家的斗争。

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的申请中也有关于募集资金用来
购买武器的。

5月17和18日两天，亲自前来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超过20人。

苏联国家黑色冶金铸钢与轧钢设备设计院工程师富尔曼，现年
52岁，带领两个儿子（三人都是卫国战争参加者）表示愿意“同

侵略者进行斗争”。大学生阿纳托利·杜阿，按他自己的话说，已经组织了一大批准备立即前往巴勒斯坦“参加同阿拉伯人的斗争”的莫斯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

一位参加过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坦克制造工程师（他没有自报姓名）同样准备首批应召出国前往战斗。他请求“趁为时未晚，赶快组织一个犹太人旅”。

大学生莱温声称，有80名莫斯科法律学院的大学生准备立即开赴巴勒斯坦。

大学生列伊泽尔诺克表示，他以及他的20名莫斯科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同学，准备前往巴勒斯坦去“参加同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随本报告附上1948年5月18日通过邮局收到的一封来信的副本。^①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理责任秘书 海菲茨

请舒梅科同志阅处。

巴拉诺夫

1948年5月18日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存档。已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海菲茨同志）：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机关提出此类申请。

舒梅科

1948年5月18日

存档。遵照巴拉诺夫同志的指示，已编写了供中央委员会领导参考的来信综述。

(签名)^①

①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3885

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反应（来信综述）

（1948年6月5日）

犹太人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和苏联政府对它的承认，已在苏联犹太人公民中引起了众所周知的反响。

来自犹太人、大学生、工人和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以个人和集体名义发出的信件、电报和询问不断涌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团结报》编辑部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其中有莫斯科某些高等院校（法律学院、化工学院、外国语专科学校、化工机械制造学院）部分大学生、敖德萨机床制造厂许多工人、苏联国家黑色冶金轧钢设备设计院、兵器部的工程师、苏联军队的军官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申请。

苏联犹太人公民的信件和申请主要涉及如下问题：

1. 犹太居民对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表示支持，对正式承认犹太人国家以色列表示感谢，对利用阿拉伯人服务于一己之私利的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巴勒斯坦奉行的政策表示谴责。

敖德萨基洛夫机床制造厂工人魏因施泰因、尼森包姆和赖梅杰尔在信中写道：“我们作为苏联犹太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由进步人类的天才斯大林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以自己的国际威望支持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建立自己自由独立国家的企望。我们对在巴勒斯坦挑起流血战争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们的行径感到义愤填膺”。

乌克兰人民演员戈利德布拉特也对苏联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

他在信中写道：“得知苏联政府关于承认犹太人国家的决定之后，我像所有苏联人一样，深深地为自己亲爱的国家、为我们的苏联政府、为敬爱的斯大林感到骄傲和自豪。毫无疑问，全体苏联人一致拥护我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2. 犹太居民表示对承认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感到满意。许多人指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斗争是进步的解放斗争；他们表示确信“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定将成为和平的支柱和民主的捍卫者”。

在有些来信中强调了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犹太人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强调了苏联犹太人公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忠诚。例如，公民罗森施泰因在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信中就表示：“一旦在巴勒斯坦取得胜利，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他们将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公民。当然，我们苏联犹太人对移居以色列连想也不会去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祖国。俄罗斯民族以及全苏联的各民族帮助我们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为我们国家的幸福而共同劳动”。

但是也有不少信件反映出明显流露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信件的写信人对苏联犹太人公民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不加区分，并且看来是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有把以色列置于苏联之上的倾向。

例如，公民佩雷尔穆特（生活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西乌克兰共产党前党员）表示说：“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犹太人已经大大地扬眉吐气，我们已经成了拥有平等权利的民族……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以色列国独立的斗争，而且也是一场为我们的未来、为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

卫国战争参加者、预备役中尉、联共（布）党员、现为莫斯科

国立师范学校研究生的扎姆斯基在来信中写道：“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领袖们，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如何，都是在从事一个正义的事业并因而受到全民族的尊敬和感谢。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不能仅仅做一个‘喝彩助威者’。现在需要的是干实事、发扬积极主动精神和做出牺牲。对这些事件袖手旁观就是对民族的背叛。做这些事件的活跃、积极的参加者，这不仅是每个犹太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权利……成为一名犹太人军队的士兵，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3. 苏联犹太人公民建议给巴勒斯坦犹太人以具体的帮助，以支援他们为以色列国所进行的斗争。

他们认为有必要由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出面，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对阿拉伯人军队入侵以色列国的抗议（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大学生的信）。其他一些人则建议组织募捐、提供武器和派志愿人员参加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军队。

例如，一些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犹太人大学生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出了如下要求：

- (1) 立即开始支援以色列政府的募捐活动；
- (2) 请求苏联政府批准组建志愿军开赴巴勒斯坦支援以色列军队；
- (3) 得到这一批准之后即开始组建部队；
- (4) 与以色列政府建立联系并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其提供帮助。

公民格尔曼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提出批评，认为该委员会在支援巴勒斯坦犹太人方面没有表现出积极性。格尔曼在给该委员会的信中说：“你们致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总统的致敬电很好，但这并不是广大犹太人群众所期望于你们的。在犹太民族现在所经历的艰难而又极关重要的时刻，不能仅仅满足于讲几句漂亮话（这

种事我们留给我们的美国‘朋友’去干)。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语，而是行动。动员苏联的犹太居民捐出现金用以购买武器。派遣志愿人员加入犹太人军队——这才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应当完成的基本的，总的说来也是惟一的任务”。

斯塔罗波尔的公民佩雷尔穆特坚持认为，应当“在‘为了犹太人地域上的民主国家以色列’的口号下，采取一切措施组建苏联犹太人公民的志愿军团”。

许多苏联犹太人公民表示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帮助以色列国而效力。

莫斯科铁路交通工程学院的大学生沙弗兰请求帮助他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以色列军队，认为这样做是一名犹太人和共青团员的义务。

提出类似申请的还有：住在基辅的苏军预备役大尉谢尔佩尔，苏联国家黑色冶金铸钢与轧钢设备设计院工程师富尔曼及其两个儿子（三人均为卫国战争参加者），代表莫斯科法律学院 80 名犹太人大学生的学生莱温以及其他一些人。医生格尔曼已经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预付给他些钱，以便充作前往巴勒斯坦支援犹太人的路费。

由于苏联政府决定承认以色列国而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致敬电函的有：作家爱伦堡、贝格尔森、阿杰米扬，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祖斯金，世界象棋冠军博特温尼克等。

№03886

日茨就申请增加《团结报》印数

致马林科夫的信

(1948年11月6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最近以来，随着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建立，在部分苏联犹太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表露出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情绪的主要表现是美化犹太人国家，赞扬它的民族模式和掩饰这个国家已明显显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政府政策的反民主倾向。以色列国公使拜谒莫斯科的犹太教堂被抱有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分子们利用来公开赞扬以色列国。在明斯克和日梅林卡发生了挑拨离间性的煽动犹太人集体前往巴勒斯坦的事件。

鉴于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团结报》加强了在犹太居民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报纸列举具体事实指出，苏联犹太人惟一的祖国是苏联、其中也包括犹太民族都有着无限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报纸引用苏联犹太人生活中和犹太人自治州建设中的许多实例指出，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报纸还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的文章。与此同时，报纸还系统地刊出了一些旨在反对国外的犹太人反动势力，其中包括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材料。

不论在犹太人居民中进行的反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中，还是

在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和各民族友谊方面，《团结报》都可以充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但是报纸目前的发行量使它无法更充分更广泛地进行此项工作。《团结报》的需求量增加了25~30%。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一些州，有大量对其他语言掌握很差因而只能阅读希伯来文报纸的犹太人。在这些地方，对新一代苏联公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尤为重要，而《团结报》由于自己有限的印数而散发量极为不足。

报纸印数过少，制约了宣传犹太人自治州的成就，和更有效地协助党和苏维埃机关组织犹太人大规模移居犹太人自治州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1月1日起增加《团结报》印数至30000份。

同时我们还请求中央委员会确定《团结报》的编辑和编辑委员会。已经有近3年的时间报纸都是由代理编辑负责的。至于编委会，它目前的人员组成已不能胜任其职，因为编委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是在编辑部机关里上班工作的。

《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 日茨

【专题说明】

犹太人“黑皮书”

(1944年8月至1948年2月)

犹太人“黑皮书”是指揭露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罪行的书，简称“黑皮书”。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展了大量活动。广泛搜集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的证词和材料并编撰成“黑皮书”，这是“犹委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最早提出出版“黑皮书”的是美国著名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1942年底，他曾就此事与“犹委会”进行了联系和讨论。但事情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犹委会”当时尚未考虑成熟，在揭露纳粹暴行时，是否仅限于犹太居民。事实上，这也是后来困惑“犹委会”，并最终导致出版计划搁浅的重要原因。

1943年4月，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联名写信给谢尔巴科夫，向他介绍“犹委会”制订的一个出版“黑皮书”的计划。1943年夏天，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出访美国期间，又具体讨论了这一计划，并就参加撰写者共同搜集材料、统一整理、用几种语言同时出版等取得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苏联著名犹太作家爱伦堡也开始了独立搜集法西斯暴行材料的工作。作为《红星报》的记者，爱伦堡常常去前线，亲眼目睹了许多事件。同时，他还有机会和犹太族的士兵和游击队员进行广泛的接触。此外，这位作家和读者之间还有一种诚挚的信任感。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他就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至

1943年更达到了上千封。信件当中有许多关于苏联犹太人情况的证词和材料。1944年1月，在“犹委会”组织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会议主席爱泼斯坦向众人介绍爱伦堡时，称他是出版“黑皮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一年的春天，“犹委会”委派爱伦堡担任“黑皮书”文学委员会的领导人。文学委员会由俄罗斯作家和犹太人作家组成。爱伦堡走马上任之后，在“黑皮书”问题上，与“犹委会”的矛盾日渐尖锐。双方都以领导者自居，在出书内容上也存在分歧。“犹委会”强调“黑皮书”涉及的范围应包括全欧洲；而爱伦堡则认为应以苏联境内为主。随着矛盾的发展，形成了两个编委会。一个从属于“犹委会”，以在国外出版此书为目的；另一个则是爱伦堡为首的文学委员会，准备出版俄文版“黑皮书”。双方的矛盾，无疑影响了该书的出版工作。洛佐夫斯基得知后，为解决矛盾，任命布雷格尔领导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两个编委会的工作和各自的书稿进行了研究。1945年2月底，专门委员会做出结论，明显地偏重于支持“犹委会”的书稿。于是，洛佐夫斯基亲自出马，试图说服爱伦堡改变观点。不料遭到了拒绝。爱伦堡甚至一怒之下辞去了文学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46年春天，英文版“黑皮书”在纽约出版。俄文版却由于双方的矛盾和其他种种原因而一拖再拖。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也开始发生变化。1946年11月底，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写信给日丹诺夫，请求批准出版此书。日丹诺夫委托亚历山德罗夫办理。1947年2月初，亚历山德罗夫在写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出版该书。据说后来斯大林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于是出版俄文版“黑皮书”一事就此搁浅。有趣的是，该书最后还是得到了出版，但地点不在俄罗斯，而在以色列，时间则推后了30年。

本专题选登的文件虽然不多，但有代表性，有助于读者了解“黑皮书”筹划和编写的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丁明编辑和校注，
岳书幡、高增训翻译）

№03848

犹委会就出版俄文版“黑皮书”的准备工作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4年8月23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在准备编辑关于发生在暂时沦陷的苏联各地区及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法西斯暴行的“黑皮书”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有关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血腥残害犹太居民的材料。

这些材料主要涉及暂时沦陷的苏联各地区。

不仅仅在外国，而且在苏联对“黑皮书”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用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在国外出版“黑皮书”的同时，也为苏联读者准备一种该书的俄文版本是十分适宜的。

伊利亚·爱伦堡、瓦西里·格罗斯曼^①等许多最知名的苏联作家都已经主动提出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下，参加出版俄文版“黑皮书”的准备工作。

鉴于这一举措对世界公众舆论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出版俄文版“黑皮书”而单独设立一个以拥有最丰富

^① 瓦·谢·格罗斯曼（1905～1964）苏联作家。战争期间担任《红星报》的军事记者。1952年曾发表著名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他因这部小说遭到政府的迫害，直到他死后小说才全文出版。

的关于法西斯对犹太居民所施暴行材料的爱伦堡同志为主席的文学委员会。

我们希望这一建议将不会遭到您的反对。

美国、英国、巴勒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犹太人社会组织的代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斯蒂芬·魏斯博士，莱昂·费特万格尔，英国犹太教大牧师格尔茨博士，英国犹太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布罗杰茨基教授，肖洛姆·阿什等）都在参加“黑皮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均为编辑委员会成员。

为了“黑皮书”出版准备工作的需要，我们请求您下达指示成立一个由四人组成的专门机构来负责最为妥善地安排此项工作。我们认为，该机构必需的人员有：（1）秘书；（2）顾问；（3）文学编辑；（4）女打字——速记员。

鉴于“黑皮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一些国家已经展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也需要使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活跃起来。

等待您的指示。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索·米霍埃尔斯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爱泼斯坦

№03851

爱伦堡就“黑皮书”的材料被 寄往美国致犹太委会的信

(1945年1月30日)

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我是被你们举荐来编辑“黑皮书”的。在我所主持的文学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规定，本书的基本文本是俄文的，由俄文文本可以译成希伯来文、英文及其他文种的版本。不言而喻，不可能有两种“黑皮书”来分别供给国内市场和用于出口；这样做将使书中的材料失去其意义。

尽管有上述所有情况，但是用于“黑皮书”的材料却在未经我和其他在文学委员会中工作过的同志同意的情况下被寄往美国。顺便说一句，本书第一卷的出版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在美国发来另一部在其有关苏联的部分中内容与我们的材料不相符合的“黑皮书”，将使我们的工作失去意义。因此，我坚决要求制止未经我和文学委员会同意而在美国发表“黑皮书”中苏联方面的材料。否则我将不得不放弃由我负责进行的编辑“黑皮书”的工作，而此事的全部责任将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承担。

伊利亚·爱伦堡

№03857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不宜出版“黑皮书” 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7年2月3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同志在写给您的信中，请求加速进行由以伊·爱伦堡和瓦·格罗斯曼为首的一批作者负责编辑的“黑皮书”在苏联的出版工作。

根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苏联情报局在未报告宣传局的情况下将该书的初稿分别寄往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巴勒斯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黑皮书”在美国已经出版。

宣传局详细地阅读和研究了这本“黑皮书”的内容，该书实为希特勒分子在曾经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残害犹太居民的野蛮兽行的目击者们的讲述、日记和信件的汇集。书中以数百页的篇幅描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被占领的俄罗斯联邦某些州的苏联犹太人公民所遭受的侮辱、折磨和群体屠杀。

但是阅读此书，特别是阅读此书涉及到乌克兰的第一部分，却给人造成关于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机构的真正性质的错误概念。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德国人劫掠和消灭的仅仅是犹太人。在读者的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同苏联交战仅仅是旨在消灭犹太人，而在对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以及苏联的其他民族方面态度似乎是宽容的。在书中的许多讲述中都强调说，为了逃脱厄运，只要得到“俄罗斯人身份证”、相貌长得不像犹太人等等就足够了……

在由瓦·格罗斯曼撰写的该书前言中指出，在消灭犹太人的行动中，当时采取的是某种挑拨离间的策略，德国人规定了屠杀苏联各个民族的某种次序。但是该书的内容却没有证明这一点。况且关于某种并不曾存在的所谓次序的想法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罪行国家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已令人信服地表明，希特勒分子在同一时间无情加以屠杀的是苏联的各个民族，俄罗斯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无一幸免。但是这些文件完全没有被该书作者们充分采用。

基于上述想法，宣传局认为在苏联出版该“黑皮书”是不适宜的。

请您给予指示。

格·亚历山德罗夫^①

^①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

№03861

**犹太委员会关于结束“黑皮书”出版
发行工作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8年2月13日）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

谢皮洛夫同志：

鉴于“黑皮书”原定发行量将被取消，我们请求您允许印完所缺少的2~3印张（该书的总印张量为36~38印张）以便装订出150~200本供各图书馆、德国法西斯罪行调查特别委员会内部收藏及供各反法西斯委员会留用。

分寄该书的机构名单，我们将在收到此批印出的份数之后送您审定。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费费尔

【专题说明】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1943年5月至1953年4月)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成立以后，“犹委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情报局及其领导人洛佐夫斯基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战争期间，政府对于“犹委会”的工作虽有一些不满之处——如情报局负责人之一克鲁日科夫就曾抱怨说：“犹委会”的领导人“在干预他们不该干预的事务”，但是，总的说来，政府还是对“犹委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犹委会”继续开展涉及犹太人的种种活动——例如希望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共和国；解决犹太人遇到的各种困难，包括返回故乡遇到的困难，以及与国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安全部门密切的注意和不安。出现了各种猜忌并不断升级，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到了“犹委会”的头上。1946年10月，安全部向联共（布）中央报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不久，由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米·安·苏斯洛夫组织的关于“犹委会”的调查，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和现状一锤定音，做出了结论。结论认为：卫国战争期间，“犹委会”在动员犹太人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该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业已告终。苏斯洛夫断言，“犹委会”的活动在政治上已变得有害了，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必须予以取缔。1946年11月，该报告转呈斯大林。但是，没有立即做出取缔“犹委会”的决定。两年后的1948年1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才通过决议，认为“犹委会”“是一个反苏宣传中心，并定期向外国侦察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决定“立即解散该委员会”、“查封该委员会的印刷出版机构”。几个星期后，逮捕行动开始。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士遭到逮捕。在这场飞来的横祸中，他们惨遭迫害，屈打成招，经历了数年的折磨后被处决。

本专题刊出的14份档案材料，揭示了“犹委会”与政府的关系及最后被取缔的过程。通过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人们可以了解这一历史冤案的真实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953年夏天，这一案件就已水落石出，被证明是一起冤案。但直到1955年才秘密平反。而公开为这一案件的受害人恢复名誉，则是1988年底的事情了，距联共（布）政治局当年的决议已过去了整整40年。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文件的阅读，编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丁明编辑和校注，
岳书幡、高增训翻译）

№03799

克鲁日科夫就批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3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现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1号公报的摘录呈您审阅。

我个人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干预他们不该干预的事务。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收到苏联犹太人公民带有各种物质—生活性质的请求的信件之后，就主动为满足这些请求而奔波操劳，并着手同党和苏维埃各机关进行书面交涉，我认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如果您认为我的意见正确，请您向古比雪夫的洛佐夫斯基同志发出指示。

苏联情报局责任秘书 克鲁日科夫

№03807

洛佐夫斯基就犹太委员会的成立及战后安排 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3年7月）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在德国进犯苏联之后不久，根据苏联情报局的提议并报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了下列直属反法西斯委员会：

1. 全斯拉夫反法西斯委员会；
2.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3.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
4. 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
5. 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5个反法西斯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与苏联情报局没有联系，但是事实上苏联情报局却不得不对所有这些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实施日常的领导。各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苏联情报局的这种从属关系，当时是根据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的指示确定的，并且在如下方面得到体现：

（1）不经苏联情报局批准，各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能向国外寄发文章；

（2）发往国外的信件和电报需经苏联情报局审查批准；

（3）会见外国人、拜访各国使馆、组织宴会和招待会，均须经苏联情报局同意；

(4) 在群众大会和各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发言，由苏联情报局先行审查并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管理局核准……

当时如果所有这些反法西斯委员会都独立存在，就像苏联的其他组织那样存在和工作，当然更好，但是我们当时容忍了这种组织上的不明确性，原因是：首先，当时战争正在进行，因而需要进行广泛的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宣传；其次，苏联情报局当时是归口领导一切国际宣传，因而也包括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宣传归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领导。

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各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否还需要继续自己的工作；如果需要，那么需要按照什么样的规章进行工作。从所有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所有的委员会都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诸多非常有益的联系，因此这些反法西斯委员会应当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必须为所有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下这样的规章，即让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面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苏联情报局副局长 所·阿·洛佐夫斯基

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阅。

格·马林科夫

7月25日

№03801

犹委会为阐明自己的宣传的立场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3年11月23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自成立以来至今已经在世界上用各种语言发行的犹太人出版物中赢得了牢固的地位。在国外没有任何一家犹太人报纸、没有任何一家犹太人杂志没有在显著位置刊登过委员会的材料。在用英文、西班牙文和其他语言出版的犹太人报刊以及在一般的非犹太人报刊上——后者也同样重要——刊出的本委员会的材料数量在与日俱增。

如果注意到，除了少数的左翼报刊之外，多数由希伯来语和古希伯来语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以前刊载的有关苏联的报道，都是被歪曲了的和敌视性的，而美国和英国许多用英文出版的十分有影响的犹太人报刊则是千方百计地漠视苏联，那么不能不指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广泛传播关于苏联真实情况的材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在传播有关我国真实情况的材料方面所做工作的困难在于：除了为数甚少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报刊都被狭隘民族主义和反革命孟什维主义情绪所充斥和处于犹太主义者及第二国际最阴险分子的直接影响之下。这些报刊的反苏

性质即起源于此。摆在我们委员会面前的任务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在世界犹太人报刊中突破对苏联的“封锁”，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去迎合其口味和心意。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利用犹太人报刊自身具有的特殊性，以便透过犹太人问题这个总题目的外壳，使在国外的犹太民众对苏联在所有领域的多方面创造性的生活、对苏联各族人民在战场上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英勇斗争、对他们在劳动战线和文化建设中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对法西斯主义的卑鄙行径及其对全人类的危险性有一个最明晰的概念。因此，犹太人问题这个总题目在我们的材料中并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而仅仅是为展现我们国家的伟大与强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据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许多同志从其他国家（罗斯托夫斯基同志从伦敦，英国共产党犹太人支部，来自南非、古巴、乌拉圭、阿根廷的信件）的书面报告称：我们的材料之所以能够以其目的性强、精确、具体而一举取得巨大成功，恰恰是借助于经过精心文学加工的特殊的题目外壳。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把一般性的材料寄给犹太人报刊，但均频频受挫，因为这样的材料犹太人出版机构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从塔斯社和苏联情报局的其他部门得到。

突出的现象是，不仅是犹太人的，甚至连共产主义的报刊，都要求我们仅仅提供有关苏联犹太人生活情况的材料，因为希特勒在国外的代理人一直在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散布卑鄙的谎言，他们一方面说犹太人没有参加战斗，另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似乎反犹太主义在肆虐。我们的材料不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而是从整体上展示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和犹太人积极参加卫国战争及经济和文化全面建设的情况，从而成为恶意的反苏宣传的最有效的消毒剂。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事实是：由于在卫国战争的数年里广大犹太人群众对苏联的深切同情与日俱增，甚至连最保守的资产阶级

报刊也不得不刊载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这些材料通过具体的事实说明苏联仍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既不存在“乌克兰人问题”或者“白俄罗斯问题”，也不存在“犹太人问题”的国家，因为在苏联，所有的民族，其中也包括犹太人，都在斯大林宪法的阳光下享有真正的平等权利，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自由的、兄弟般的大家庭。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还开展了对美国 and 英国的无线电广播。

迫使我以此信占用您宝贵时间的，是如下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听到一些来自某些负责同志的责难，说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路线是不正确的，说在我们的材料中过分突出犹太人的作用。例如扎达科夫同志，他虽然承认在我们的材料中没有什么粗制滥造和胡说八道，但是他竟然断言说我们在迎合犹太复国主义。波利卡尔波夫同志在同我的个人会见中猛烈地抨击了我，说我们在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某种独特的王国。我觉得这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提出这种指斥多半是由于：一方面，对犹太人报刊的性质和国外犹太人的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又对党给我们的委员会提出的任务理解不清。难怪孔达科夫同志的讲话给许多犹太人同志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他认为我们委员会的存在是多余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委员会工作的周围造成一种恰恰有某些犹太民族主义分子试图利用来搞些小阴谋的不良气氛，这些人企图把委员会变成犹太人事务委员部和犹太民族的全球性代表机构的想法，遭到了我本人和我们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最坚决的反对，在委员会举行过的两次全体会议上，以及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缺点和薄弱环节，对此我们都在我们的全会上和 1943 年 6 月 3 日在古比雪夫举行的苏联情报局工作人员参加的起草的会议决议中，不失时机地加以揭

露了。我们一直在遵照您和洛佐夫斯基同志的重要指示努力，并且仍在努力消除这些缺点和薄弱环节。看来，这些努力似乎并非没有成效。

如果您认为可以在最近接见我，以便得到您有关我们工作的今后方向的必要和明确的指示，我将不胜感激之至。

希望您将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秘书 沙赫诺·爱波斯坦

谢尔巴科夫已阅。

№03808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就犹太委会
今后的工作问题呈马林科夫的报告（摘录）**

（1945年12月25日）

致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所发表的某些言论表明，他们是在错误地筹划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认为该委员会的任务中还应该包括在苏联犹太居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报刊、出版社、俱乐部等等）。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工作人员试图把该组织变成某种负责犹太人事务的人民委员部的打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并且是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建立时为其确定的任务的曲解。

为说明类似的曲解行为，还需要指出如下事实：当在许多场合下一些犹太族苏联公民向该委员会就任务问题提出抱怨、声称自己受到某些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的不公正对待，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就同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谈话，给他们做出某些解释。

我们深信：不能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继续处于它目前所处的状态，并且有必要刻不容缓地研究它的今后工作问题。

如果认为该委员会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则需要规定它的工作范畴，加强其领导层，为其选配政治坚强的领导人；否则的话，不

如干脆解散这个组织，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在卫国战争年代赋予它的任命……

什基里亚托夫
安德烈耶夫

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阅。

格·马林科夫
[1946年] 1月18日

№03892

联共（布）中央专门小组关于犹太会及 《团结报》活动情况的报告（摘录）

（1946年9月）

秘密

致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不存在政府和党的机构关于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及其任务的正式决定。据该委员会前责任秘书爱泼斯坦的解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按照谢尔巴科夫同志个人的提示建立的，直属于苏联情报局，从1941年底开始活动。

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谢尔巴科夫同志和马努伊尔斯基同志^①的个人指示确定的，并归纳为以下几项：首先，是在全世界犹太人面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强盗本质及其野蛮兽行、特别是对被其暂时侵占的苏联一些地区和被占国家的犹太居民的野蛮兽行的残暴性；其次，是向国外的犹太民众以苏联各民族，其中也包括苏联犹太人为范例，展示应当怎样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第三，是推动在民主国家建立犹太人联合委员会，以动员社会公众对苏联各族人民史无前例的斗争给予同情和支持。

在卫国战争期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促使国外犹太人在组织上联合起来加入支援苏联委员会，和在抵制反苏宣传方面做了

^① 德·扎·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曾任联共（布）中央国际宣传部副部长，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

大量的工作……

对战后时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往国外的文章、信函和其他材料所做的分析表明：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没有就自己在战后的形势下所担负的任务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并且成了国外大多数犹太人所独有的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俘虏。

在苏联情报局1945年5月22日举行的会议上，沙赫诺·爱泼斯坦在谈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个别成员的情绪时，引用了伊·爱伦堡的如下一段话：“在国外犹太人中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方面，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直无事可做，因为犹太人需要的最少的是反法西斯宣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同我们国家里的反犹太主义进行斗争”。

爱泼斯坦接着说：“在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以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和文学家努西诺夫为首的一伙人，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刚刚建立的时候起，就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个仅仅从事在国外的反法西斯宣传工作的组织范围狭小的职能表示不满。由于苏联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共和国和自己的代表机构，这些人曾要求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事实上的犹太人事务委员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这些要求步步退让，并开始承担起既代表生活在苏联领土的犹太民族人士的利益，又代表国外犹太人组织利益的职能。

1946年6月21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专门致信苏联内务部，对匈牙利犹太人联合会关于从战俘营释放犹太族匈牙利人的请求表示支持。

在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压力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为在克拉科夫及波兰其他城市出现的反犹太人讲演一事，向波兰政府发去了由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签署的质问电报。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国外犹太人组织的联系并没有减

弱犹太复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势头，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犹太人知识分子中间的这种倾向，使他们更加脱离苏联的现实。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境外宣传工作的组织安排方面，也有一系列严重疏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宣传不论在选题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都缺乏进取性、政治上的尖锐性和现实性。不仅如此，在其许多文章中，还出现有重大的政治错误和过分突出犹太人在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积极性的倾向。大部分文章都具有文化至上主义的不问政治性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的组织安排同样是低水平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外国不进行研究。文章在不考虑该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形势特点的情况下发往国外，以相同的内容发往美国 and 波兰、英国和保加利亚。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编辑人员的职责分工本身就带有不问政治的性质。职责是按照形式主义的原则来划分的：一个编辑负责经电报局发送的材料，另一个编辑负责经邮局发送的材料。

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外国的政治形势中有什么值得指出的特殊之点”、“一个国家的形势与另一个国家的形势有何不同”之类的问题，编辑人员中无一人能做出回答，他们同样也没能明确地讲出摆在编辑部面前的有哪些任务。

参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的作者们都是随意地、凭熟人关系挑选来的……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变成了该委员会工作人员自身和莫斯科市的犹太人作家的某种可以捞到油水的地方……

请看一些具体的实例：委员会书记费费尔除工资外在 1945 年共得到稿酬 18685 卢布，而在 1946 年的 8 个月内则已得到稿酬 23000 卢布。委员会副书记施皮格尔格利亚斯在 1945 年共得稿酬

26757 卢布，在 1946 年的 8 个月中得到稿酬 15835 卢布。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编辑戈尔德贝格在 1946 年的 8 个月中共得稿酬 16735 卢布。委员会顾问马涅维奇在 1946 年的 8 个月内得稿酬 4575 卢布。

《团结报》编辑日茨在 1946 年 7~8 月得稿酬 6550 卢布，该报的一位职员拉比诺维奇在 7~8 月内共得稿酬 5500 卢布，而职员伊茨科维奇在同一时间里则得稿酬 7050 卢布……

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

该报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建立之后不久于 1942 年年中开始问世的。

报纸的任务和宗旨不论是在创刊时还是在以后，均没有明确确定并记录在案。这种情况以及对该报缺乏有系统的领导，导致编辑部的负责人无法确定报纸的方向，因而只是针对生活在苏联的犹太居民出版该报。这样一来，《团结报》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的任务，实际上就自然地消失了，于是该报变成了一份普通的希伯来文地方性报纸。这种情况使编辑部工作感到困惑，但也仅仅是从报纸的内容与其名称不符的角度。

名为《团结》，而且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这使人不得不去想：这家报纸在为犹太人的什么样的团结而斗争？……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的脱离现实和文出无力，以及报纸的低水平，总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意挑选作者和编辑部工作人员的素质不高。

在编辑委员会的 9 人中有 4 人是非党人士。

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大部分人的年龄接近或超过 60 岁。

3 名主要工作人员（编辑、副编辑、责任书记）都陷在日常琐

事之中，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前瞻感。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 委员会的存在及所进行的活动，在卫国战争期间，在动员犹太人参加同德国法西斯及亲法西斯分子的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战后时期，该委员会不仅显得不能从业已变化了的外部政治形势中做出正确的结论并相应地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之下，正逐渐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机构。

2.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对国外宣传工作进行得很不得力。其宣传不善于通过鲜明的事例展示我国战后经济的欣欣向荣、我国各民族的成长和发展，及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显得缺乏战斗性、现实性和进取性。

由于内容方面缺乏特色和贫乏无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宣传没能在国外报刊上赢得一席之地，而它的随波逐流的特性，则常常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组织加以利用的合适材料。

鉴于上述各点，专门小组认为可以建议：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其在国外进行宣传工作的职能转由苏联情报局承担。

《团结报》作为有负使命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报，建议予以查封。关于是否有必要存在一份供犹太居民阅读的希伯来文报纸问题，可交由宣传局报刊处加以研究。

诺罗夫科夫

秋林

叶尔莫拉耶夫

加里宁

№03893

联共（布）中央干部部就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6年10月7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关于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报刊处掌握着一些关于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材料。

苏维埃爱国主义，对红军胜利及其解放使命的信心，整个说来给了犹太人文学作品以乐观主义的基调。但是在表现犹太民族命运的时候流露的情绪，却是深深的悲痛、走投无路、悲剧或灭顶之灾和宗教神秘主义。这一点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犹太人诗人和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费费尔、达·贝格尔森、菲宁贝格、霍夫斯坦等人的创作中。

在1945年举行的在苏联的波兰犹太人代表会议上，马尔基什宣称：“不能把犹太民族分成波兰犹太人、苏联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心是不能分割的，它只能击碎”。

在马尔基什的诗作《战争》中，苏联姑娘—女游击队员诺伊米忧伤地感叹：“森林（指她前往投奔的游击队）不希望犹太人心中有故国的深情……为什么甚至森林每前行一步都看见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为什么河川的条条水流都知道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这有谁能对我说清……”

在同一作者的剧作《犹太人区里的起义》中（该剧本被犹太人

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往美国出版), 姑娘诺伊米断言: “一切都被截除, 只留下双眼, 为的是使你看见自己到处都被当作陌生人……每一个门槛都以闭门谢客使你尴尬痛心……”

诺伊米认为这种现象是犹太人的“无家可归”造成的。“哪怕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国土(显然是指民族的疆土——作者札记)也会使情况改变啊”, 她这样想并说: “你是这样的幸福, 大概只有在坟墓里, 只有在我们头上……”

“倘若不是用火, 也就是用憎恨来灼痛我们, 灼痛一个没有国家而只有装着一把泥土的讨饭袋的民族, 有谁会拒绝过舒适的日子呢”, ——马尔基什以各种变换的形式表达其基本主调。

鼓吹犹太人重新组合为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民族主义观点的还有费费尔(诗作《华沙犹太人区的阴影》, 《土耳其围巾》, 《我是犹太人》), 达·贝格尔森(话剧《列乌拜尼王子》), 霍夫斯坦(《圣经》), 塔拉拉耶夫斯基(《妒忌》)。

发表在《团结报》上的诗作《我是犹太人》中, 犹太人文学的思想家之一费费尔指出, 犹太民族之所以强大和有力量, 是由于拥有圣经中先人的智慧。作者颂扬了“一连串”人的思想, 从所罗门、马卡韦耶夫、伊赛亚、斯宾诺莎、海涅到马克思、斯维尔德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斯大林的朋友”。在诗作《土耳其围巾》中, 费费尔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围巾的故事。这条围巾吸收了犹太民族的所有眼泪和痛苦, 成了犹太民族若干世纪以来经受苦难的象征, 并且现在像一面“黑夜里的旗帜”在迎风飘扬。

犹太人最有影响的作家达·贝格尔森在话剧《列乌拜尼王子》中(该王子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 试图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途径。

列乌拜尼希望帮助自己饱受折磨的民族, 宣布自己为在阿拉伯建立的虚构的犹太人国家的代表。他代表这个国家悄悄来到罗马教

皇克利门特七世那里，然后又去向葡萄牙国王约安三世和卡尔五世提议建立同东方的犹太人的联盟来共同与土耳其人等进行斗争。在该剧中贯穿的思想是：要拯救犹太民族，就得依靠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的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个剧本于1945年刊登在美国的《犹太文学》杂志上，并已列入苏联犹太人出版社《杰尔·埃梅斯》1946年的出版计划。

许多犹太人文学作品钟情于宗教神秘主义。诗人—共产党人马尔基什把用武器捍卫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军人所做的事情，看成是……圣经主旨的继续发展。

为了表达少校马尔吉利斯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在空中同德国人进行战斗的，马尔基什感叹道：“当他的祖先赐给世界圣经的时候，当他们向世界宣布圣训的时候，其中包括在宣布所有圣训中最崇高的一条——‘勿开杀戒！’的时候，是未曾体验过这样的感情的……”

于是诗人号召这位苏联犹太军人不要离开自己的武器：“就像你的祖先未曾离开过圣经一样……”

作家戈尔东硬把一个关于一位犹太人医生功勋的故事，塞入为使这位老人灵魂得到安息而在犹太教堂进行的祈祷的框架之内。

作家尼斯捷尔在名为《祖父与孙子》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犹太教牧师及其孙子——“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地下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绞刑架旁，牧师拒绝了德国人要他污辱列宁勋章的要求，孙子拒绝污辱圣经。故事中被大量添加进了宗教性格言和牧师祈祷时的喊叫……

在莫斯科出版发行的犹太人报纸《团结报》，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协会犹太人分会，甚至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列宁格勒某些杂志问题的决定之后，也没有对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对犹太人诗人和作家的错误展开布尔什维主义

的原则性批评。而且《团结报》自身也曾反映出了类似的情绪。例如，该报曾利用犹太人文学的经典作家佩列茨逝世 30 周年纪念，来为此人的民族主义的动摇性辩护，把他说成几乎就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

在回忆起许多在前线牺牲的犹太人的时候，《团结报》经常强调说他们是“为犹太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在这种情况下却只字不提保卫苏维埃祖国。

在《团结报》上刊登的大量材料主要都是有关法西斯暴徒对犹太居民所施的野蛮兽行的。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遭受法西斯主义蹂躏的仅仅是犹太居民。对犹太人区里的人们奋起反抗的话题，该报在多数情况下不予提及或者仅限于强调古以色列人的坚忍不拔精神，也就是顺从、消极。报纸几乎没有讲述过俄罗斯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对犹太居民的兄弟援助，没有对已经离开苏联的苏茨克韦尔的书《维尔纽斯犹太人区》、费费尔的长诗《华沙犹太人区的阴影》等一些作品展开批评……

《团结报》编辑部不懂得，关于犹太人的总话题必须服务于巩固苏维埃基础，服务于宣传苏维埃制度，服务于对读者进行苏维埃教育。

美国的某些犹太人报纸（比如《前锋报》）公开地同反动报刊搞在一起。但是毫无原则性的《团结报》却不去揭露反动的反苏污蔑和国外犹太人报刊的民族主义宣传。可是要知道，《团结报》30%的发行量是发往国外的。

在《团结报》上没有党的生活专栏，不去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没有对犹太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布尔什维式的批评。在阅读该报时很难想象得出，在苏联是否还存在各族人民的友谊，还存在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学。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向国外发送苏联作者的作品时常常

不加选择。曾经把西托的一本描写流浪儿的短篇小说集发往美国。该书描写的事件涉及1919~1920年，对当今时代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施奈费尔未能通过新闻检查的特写《披巾》是对苏联人的污蔑。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为了“形象地”表现出德国人的野蛮兽行而杜撰了一段一个哈萨克人在市场出售一条神圣披肩的情节，而这条披肩是他在乌克兰从一位被法西斯分子杀害的犹太人身上取下来的。

在不久前收到的美国出版的《犹太文学》杂志第六期上刊登了莫格列尔的文章《面对新任务的苏联犹太人》。作者给苏联犹太人文学做出如下评价：“当前在犹太人散文和诗歌中有力而突出地推出的主题是各个时代犹太人文学的历史连续性，犹太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犹太民族对解放的历史性渴望”。文章接着指出，犹太人文学的这些主题“很好地同苏联各民族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及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而斗争的主题思想交织在一起。费费尔的杰出诗作《我是犹太人》是新时期苏联犹太人创作力量的历史性和犹太人自我意识方面最好的反映和具体结合。反法西斯战争不仅加强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历史性自我意识，而且加强了全世界犹太民族所有部分的不可分感”。

本报告因篇幅所限不可能详细地谈到《团结报》在有关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对苏维埃比罗比詹莫名其妙的偏见，利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名字为异端思想辩解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局报刊处认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加以审议是适宜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局报刊处处长 谢尔巴科夫

请安·亚·日丹诺夫，尼·谢·帕托利切夫，德·米·波波夫同志阅

阿·库兹涅佐夫

1946年10月23日

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阅……

日丹诺夫

№0389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犹太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致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摘录）

（1946年11月19日）

致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尼·谢·帕托利切夫同志

格·米·波波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EAK）是在1942年4月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没有做出过关于建立该委员会及其职能的正式决定。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称，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由谢尔巴科夫同志和马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口头指示确定的，其内容是动员国外的犹太居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在国外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成就。

在卫国战争期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动员国外犹太人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发挥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该委员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已经完结并且正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所做的调查显示的那样，在当前时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不仅已经不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政治上正日益变得有害无益。

当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活动正越来越多地具有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因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加强国外犹太人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

和加剧苏联某些犹太居民当中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情绪。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实际活动主要体现在向国外犹太人报刊提供文章和同国外各种犹太人组织保持联系。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论是该委员会向国外发出的材料和文章的内容，还是同国外犹太人组织联系的性质都局限于苏联和国外犹太人的生活问题……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没有进行针对由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掀起的反苏运动的宣传与反宣传，也没有向国外提供有关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优越性和成就的真实信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把发往国外的文章和材料的选题仅限于一些特定的问题上，错误地阐明犹太居民在苏联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脱离苏联其他民族的生活去孤立地反映犹太居民的生活，过分夸大犹太居民、特别是犹太人知识分子的作用，以至给人们造成犹太人在苏联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在发挥如果说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主导性作用的错误印象。而与此同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苏联众多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和活动却一律避而不提。

在于 1946 年发往加拿大的佩尔松的文章《通向布拉格的胜利之路》中强拉硬扯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意思，即在攻克柏林、德累斯顿和布拉格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是坦克旅旅长、上校达维德·德拉贡斯基……

在切尔尼亚科夫中将的题为《在胜利节的阅兵式上》的文章中，详尽地描述了切尔尼亚科夫本人的生活和功绩，以及达维德·德拉贡斯基上校、菲舍尔松少校和阿布拉姆·捷姆尼克的功绩。文章中对苏联军队中其他民族的军官和将军们只字不提。

在1946年向国外发出了大量关于犹太人苏联英雄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坚持不懈、连续不断地贯穿着关于犹太人在卫国战争前线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示意，而关于苏联其他各民族代表们的英雄主义则要么是附带地提一下，要么是干脆避而不提。

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尔德贝格的文章《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犹太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简单地提到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在卫国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后，紧接着用了5页的篇幅详细谈到的，仅仅是犹太人在前线 and 后方建立的功绩。

在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往国外报刊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文章和材料中，给人提供的是关于苏联现实情况的错误概念。如果依据某些文章的标题来做出判断，那么可能会认为该委员会发往国外的都是详细介绍苏联经济成就的。这里可以举出这样一些文章，诸如《苏联冶金工作者的胜利》、《苏联汽车制造者英雄事业》、《苏联橡胶工业的优秀人物》、《斯大林元帅祝贺弗拉基米尔拖拉机厂的建设者们》、《在白俄罗斯正在重建机床制造厂》、《站在顿巴斯重建者前列的专业知识分子》等。

但是这些文章的标题与它们的内容并不相符。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上述文章以及许多其他文章中，苏联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仅仅是被用来作为夸大地全面展示决定了事情成败的、有才干和主动精神的犹太领导者们的作用和功绩的陪衬……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作者们把读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就、多民族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事业、苏联各民族出众的合作上，而是集中在有才干的一些个别犹太人的作用和功绩上，从而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他们在苏联国民经济的成就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往国外的材料中，有关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文章占有很大比重。这些文章和材料的突出特点是：

1. 其绝大多数是仅仅谈犹太人作家、演员、音乐家和学者的创作的。对其他民族的苏联人在文化、科学和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通常是避而不提。

2. 以隐蔽的方式夹带和强塞关于犹太人文化的优势及其在苏联的特殊作用的暗示，以此来夸大犹太人文化在苏联总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3. 脱离苏联的现实介绍苏联犹太人文化并且避而不提苏联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化对它的影响。

4. 崇拜包括犹太教圣法经传和圣经在内的犹太人古文化，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逢迎资产阶级文化。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是千篇一律的。它们通常以关于苏联文化的几句笼统的话开篇，而后就全面展开地介绍一个或者数个犹太血统的文化工作者的活动……

所有犹太人的东西，包括犹太教圣法经传和圣经，都加以突出和宣传。所有非犹太人的东西一律避而不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总方针就是这样。很显然，这种“宣传”是在助长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的声势和给苏联带来政治损失。这种宣传给国外犹太人组织提供材料，帮助它们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关于特殊的和统一的犹太人国家的反动观点。另一方面，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通过其发往国外的文章和材料给人们造成关于苏联现实情况的错误概念，似乎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犹太人，从而助长了诽谤性地把整个苏联的东西同犹太人的东西等量齐观的反苏宣传。

如果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文章和材料中对苏联各族人民在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一贯避而不提的话，那么在对待资产阶级文化方面该委员会有时却表现出有损于苏联人尊严的崇拜和逢迎。

例如，在寄给美国犹太人报刊的题为《美国影片在乌克兰乡镇的巨大成功》的文章中，某个叫巴拉诺夫斯基的人添枝加叶地描述说，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的斯莫特里奇镇的居民非常高兴地观看美国影片。

作者声称：“斯莫特里奇镇的居民们认识金娜·德宾，是从影片《他的管家人的妹妹》和《春天圆舞曲》中认识她的。影片《他的管家人的妹妹》在镇里已经一连放映了四天，票已全部售光。许多人看这部片一看就2~3次”。

文章作者接着描述了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电影发行局局长对美国影片的热烈反映，据说他似乎宣称：“‘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金色谷地的情歌》曾经在全州的25家乡镇影院放映，观看过该片的观众有15194人。但这家公司的影片《查利的姑母》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部影片横扫了全州的所有银幕。它的观众共达45801人。”

这篇文章就这样散发着对美国的谄媚逢迎的气息。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材料刊登在除为数甚少的左翼报纸外，均属资产阶级和犹太复国主义性质的国外犹太人报刊上感到颇为满意。他们把这样一些情况都认作是自己的功劳，例如：“在美国最大的犹太人报纸之一《美好的时代》第95期上共刊登了委员会的77篇材料”；“甚至反苏的报纸《前锋报》也不得不时而刊登一些我们的材料”。

只有丧失起码的政治警惕性，才能把同反苏的肮脏小报的联系看做是自己的一大功劳。在此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把经常刊登反苏谰言的巴勒斯坦报纸《话报》列入“似乎是……友好的”报纸之列，就不足为奇了。

不加选择地同资产阶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反苏报刊搅在一起，证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所表现出的至少是政治上的目光短浅，它已经不再重视国外犹太居民中间的阶级界限，实质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犹太人报刊的义务通讯员并在自己文章和材料的选题和内容方面迎合这些报刊的口味和要求。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支持同几乎所有在国外的犹太人组织的书面联系，而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组织，并且被由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领袖斯季文·瓦伊兹领导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联合在一起。该委员会坚持不懈地企望尽一切办法扩大其同国外犹太人组织的联系而不管这些组织的政治面貌如何，它不仅不同这些组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作斗争，而且自己也在渐渐滑向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进而成为它们思想上的俘虏。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国外犹太人组织的联系就其内容而言都没有脱离犹太人特有问题的狭小范畴，并在客观上加强着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在进行这些联系的时候经常不看阶级状况和所在国实际情况而过分强调关系到全世界犹太居民的所谓共同问题：“共同文化的问题，领土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某些国家的犹太人状况问题等等”。

关于这些联系的性质可以依据下列实例做出判断。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为向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要求让步，于今年春天就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其他一些城市出现的反犹太人讲话一事向波兰政府发出了质问电报。在这一问题出现之前，犹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曾经讨论过波兰犹太人问题，会上主席团成员优素福维奇曾建议了解波兰犹太人安置情况的详细材料，以便通过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去影响波兰政府。优素福维奇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6年4月1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为自己的建议辩护说：“应当让波兰犹太人代表团到这里来，并告诉我们波兰犹太人的生活安顿情况。我的建议只不过是：一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收到有关波兰犹太人安置进程的官方资料，我们就可以给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发信了”。

1946年6月21日该委员会专门写信给苏联内务部，支持匈牙利犹太人联盟提出的关于从苏联战俘营释放犹太族被俘士兵的请求。

1946年4月25日收到了乌克兰同乡会犹太人委员会发自纽约的如下信件：“我们希望得到来自我们的兄弟姐妹——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的直接回音，希望了解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生活恢复得怎样。我们请求你们向相应的当局提出在乌克兰接待我们代表团的问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此信转给了乌克兰政府并电告在美国的犹太人同乡会，说他们的请求已遵嘱转达……

同样，国外的犹太人组织也开始不再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看成是反法西斯的委员会，而看成是“自己的”犹太人的委员会，这一点可由该委员会从国外收到的来信的性质加以证实……

应当指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它发送给国外犹太人报刊的一系列文章中（爱泼斯坦的《人民的复生》，努罗克的《复仇之日——在我心中》和《我获拯救之年正在临近》等），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同情，并对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抱有好感。看来这一点也正说明了为什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有关巴勒斯坦的工作倾注过多的关注，在1945年6月1日至1946年6月27日这一段时间内往那里竟发

出了 900 多篇文章和材料，是同期内发往英国的篇数的 1.5 倍多。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仅加入了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合大合唱，而且成了力图通过大规模移民的办法在巴勒斯坦安插大量美帝国主义间谍的美国巴鲁赫分子的追随者。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广泛宣传活动在阿拉伯居民中造成关于苏联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错误概念，从而无疑在给苏联的利益带来政治性损害。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算今后还要同国外的犹太人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在去年曾经一再提出关于在全世界犹太居民中开展募捐运动，以便为被法西斯杀害的犹太居民建立纪念碑……

在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规定让该委员会拥有在苏联犹太居民中进行工作的任何职能。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却擅自在国内开展活动，而且它的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亚于在国外的活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进行内容广泛的信函来往并收到犹太居民的大量来信。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收到的信件中，有不少对各级苏维埃组织对待犹太人所持错误态度的抱怨。写信人都请求委员会进行干预。许多来信是匿名的。其中的某些抱怨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经常给苏维埃机关发去公函，请求给一些个别的公民以这样的或那样的帮助。该委员会为了给个别的犹太公民争取物质帮助，不仅仅向苏维埃机关、而且还向莫斯科宗教团

体的代表乔布鲁茨基不断提出要求……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自1942年起出版《团结报》，发行量为10000份。其中只有约2000份寄发国外，而发行量的其余部分则在苏联国内、主要是在犹太人知识分子中间散发。

《团结报》归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管辖的负面影响表现在这家报纸的整个内容上。刊登在该报上的文章和材料与委员会发往国外的文章很少有什么不同之处。它们同样基本上都是阐述特定的犹太人题材的并且有助于用沙文主义精神培养犹太人知识分子。该报1946年的6个月中刊载的、不包括社论和官方材料在内的263篇文章中，有201篇是讲犹太人题材的。《团结报》对犹太人居民所作的关于苏联其他民族的生活，关于我们国家的成就的报道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该报从不宣传苏联的、尤其是俄罗斯的文化……

在阐述犹太人问题时，《团结报》同样是片面地强调犹太人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而且犹太居民通常都被人为地描写为是孤立于其他民族的苏联居民之外的……

分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国内的活动得出的结论是：该委员会擅自赋予自己以并非它该有的、犹太人居民事务首席全权代表和犹太居民与党政机关之间的中间人的职能，同时还擅自去扮演试图首先通过《团结报》加以实现的、犹太人群众的政治和文化领导者的角色。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算今后认真地在苏联国内扩展自己的活动和职权范围。该委员会甚至打算向苏联政府提出犹太居民的疆域问题（显然，是除比罗比詹以外的新的疆域），仅仅由此亦可看出它在这方面的打算已经走得何等之远。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1945年10月23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费费尔同志曾经说过以下一番话，而未受到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需要提出关于委员会在国内的某些任务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由于新的任务委员会将提出关于新名称的问题……至于说到任务，我们觉得我们当前面临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例如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业已出现在我们这里的形势。疆域问题、出版杂志问题、俱乐部大楼问题。”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算组织犹太人历史的研究工作，并于1946年2月认定有必要在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历史专门委员会。

最近一个时期，在一部分犹太居民中，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活跃。例如，在出席于今年7月17日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题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会的听众们的行为中，就部分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在报告结束时递给报告人卢茨科伊的条子共有200多张，其中大多数是事先准备好的，甚至是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大部分条子都反映出其书写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偶尔也有些是反苏的情绪。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苏联的活动及其存在本身无疑是在人为地促使犹太居民、特别是犹太人知识分子与众分离和促进异端的、敌视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些人中间的扩散……

结论

经调查认定：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论在国外的还是在苏联国内的活动，都越来越多地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性质，因此，它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是不能容许的。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的整个活动在当前都与列宁—斯大林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实质的观点相抵触……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其活动中不是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

立场而是从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和崩得主义的立场出发，执行着一条把全体犹太人居民分离和封闭起来、使犹太居民同苏联其他各民族分离开来的方针。客观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苏联的条件下继续实行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崩得分子的方针，实际上是在同他们一起为实现建立统一的犹太人国家的反动主张而斗争……

基于上述理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认为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今后继续存在是不适宜的，在政治上是有害无益的，故建议予以撤销。请你们审定。

米·苏斯洛夫

已分呈：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拉·帕·贝利亚同志，格·马·马林科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安·安·安德烈耶夫同志，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①，阿·尼·柯西金同志。

^① 尼·米·什维尔尼克（1888～1970），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03896

苏斯洛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建议中止犹太会及 苏联学者委员会活动的报告（摘录）

（1947年1月7~8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经谢尔巴科夫批准于1942年4月开始活动的。未曾有过党和苏维埃机关关于建立该委员会和关于其职能的正式决定。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曾经在促进动员国外犹太人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中发挥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该委员会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具有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性质，在客观上有助于加强国外犹太人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和加剧苏联一部分犹太人居民中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情绪。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实际活动在于向国外犹太人报刊提供文章和同国外各种犹太人组织保持联系。该委员会错误地解释犹太居民在苏联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它脱离苏联其他民族的生活去孤立地反映犹太居民的生活，给人们造成关于苏联一些个别民族在国家生活中所起作用的错误印象。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丧失了其反法西斯性质并且实质上变成了国外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自己的”犹太人机构。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擅自在苏联犹太人居民中进行工作。它

收到来自犹太居民的、内中包含各种抱怨的大量信件，并根据这些抱怨向苏维埃机关说情，请求给一些个别犹太人公民以物质帮助，请求组织犹太人迁居等等。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赋予自己以犹太人居民事务首席全权代表和犹太居民与党政机关之间的中间人的职能。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和对外政策部曾经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后时期工作中已形成的错误做法的问题，同该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责任书记费费尔同志进行了谈话。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米霍埃尔斯同志和费费尔同志都认为委员会的任务还不止这些。

我们建议中止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和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应当委托杰尔扎温同志和米霍埃尔斯同志召集各自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并在会上做出鉴于所负任务已经结束而中止委员会活动的决议。

随报告呈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宜由上述二委员会就中止其活动问题通过的决议示范文本。^①

格·亚历山德罗夫

米·苏斯洛夫

①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附件。

№03894

亚历山德罗夫就犹太人文学作品状况 致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7年4月)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局报刊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同志在写给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信中报告称，在许多苏联犹太人作家写于1941~1945年的作品中，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情绪。他建议在中央书记处对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的状况问题加以审议。

宣传局研究了这个问题，阅读了一些逐字翻译成俄文的苏联犹太人作家的作品，并得出如下结论。

苏联犹太人作家在卫国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写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充满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和带有乐观主义性质。菲宁贝格的诗集《在熊熊烈焰中》，马尔基什的诗集《为了人民和祖国》，法利克曼的短篇小说《苏联人》，施赖布曼的特写《三个夏天》等就是这样一些作品。

在战争年代的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各民族斯大林式的友谊。例如诗人菲宁贝格在其所做的一首诗《我的汇报》中这样写道：

沿着鲜血染红的路我在前行，
为了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
为了乌克兰人和犹太人，
为了庄严的和平。

在诗人马尔基什的诗作《致犹太人—军人》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的俄罗斯兄弟行进，还有哈萨克人和格鲁吉亚人，
乌兹别克人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战友一起并肩在行
进。

祖国只有一个，
同胞兄弟——只有一位母亲；
离世时你吻别忠实的佩剑，
也吻别俄罗斯大地，像儿子吻别母亲，
你已准备好为俄罗斯战死疆场，热血洒尽。

同时，犹太人在法西斯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在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也有广泛的反映。某些作家对希特勒入侵带来的恐怖惨状的描写与苏联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英勇斗争相脱节。结果在个别的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过分激烈的民族感情，表露出忧郁、悲伤的情绪。但是类似的情节并没有扩及多少作品。

在谢尔巴科夫同志的信中提到的少量有错误的作品（费费尔的诗《难道这就是朋友》，霍夫斯坦的诗《圣经》、《春天》、《白昼》，莫尔根陶的诗《我在公园里》，布罗德索恩的诗《没有这样的瞬间》，戈尔东的短篇小说《作安灵祷告的人》，贝格尔森的短篇小说《赔款》等）均被新闻检查机关及时扣住未发。对一系列其他作品的文字也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马克的书《华沙犹太人区》，戈尔布施泰因和塔拉拉耶夫斯基的诗等）。

大部分苏联犹太人作家都对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某些表现进行了充分的批评。诗人费费尔于1942年刊出的诗作《我是犹太人》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诗中包含有美化犹太人圣经中的古旧的成分，滥用了犹太人神话的内容和形式。作者从其于

1946年出版的诗集《光和反射》中除去了这首诗。叙事长诗《华沙犹太人区的阴影》在收入该诗集的时候也被费费尔作了大量的修改加工。

马尔基什的叙事长诗《战争》迄今以来仅仅发表了一些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流露的片断，因为在该长诗的初稿中曾经有对宗教的象征意义借用不当之处：例如，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借用希伯来神秘哲学的神秘主义象征物“迈特罗尼塞”，而这个象征物却是苏联犹太人所不理解 and 感到陌生的。目前，马尔基什正在对该长诗的全文进行加工，此项修改工作尚未完成。

在苏联犹太人作家全莫斯科地区会议上，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46年8月14日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缺陷，为了更好地更有成效地为人民、为党、为苏维埃祖国服务，这些缺陷必须加以克服”。作为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的主要缺陷，决议指出的是某些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过重和悲观主义情绪。在这次会议上对霍夫斯坦（诗作《青霉素》）、平切夫斯基（话剧《我在等待》）等人的某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原则性和颓废情绪进行了批评。在《团结报》上也刊载了对作家韦里捷的《当大地在颤抖的时候》和卡佐维奇的《在新的地方》等短篇小说集的批评性评论。

目前，苏联作家协会下属的犹太人作家分会已经改组，在该分会的多次会议上都对新的文学作品进行讨论。已经指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维什涅夫斯基同志）必须进一步开展对该分会的作家成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已提议他们特别注意同个别作品中的一切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情绪的表现作斗争。

已指示《德尔埃梅斯》出版社（斯特龙金同志）必须在编辑委员会上讨论所有收到的文学作品，对其进行认真的审阅并对作者进

行深入的经常性的工作。

已经建议《团结报》编辑部（日茨同志）经常刊载能够促进苏联犹太作家尽快完全克服民族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情绪的得到认定的批评性文章。

已经建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费费尔同志）对发往国外的苏联犹太人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质量更加严格要求，该委员会的编辑班子已于1946年通过一批精通业务的共产党员编辑（莱温同志、贡塔里同志、科夫纳托夫同志）的加入而得到加强。

谢尔巴科夫同志信中报告的某些事实经调查并不属实。例如，关于在费费尔的诗作《华沙犹太区的阴影》、《土耳其围巾》、《我是犹太人》中似乎宣传了民族主义观点和犹太人重新组合为一个国家的思想的断言就与实际情况不符。关于在《团结报》上刊载的某些通讯报道中强调犹太人作用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在1946年5月16日登出的随笔《胜利纪念花瓶的创造者们》中指出的仅仅是：在革命前，制造了这个花瓶的工厂不录用犹太人；可是现在，在这家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有50多名。这篇随笔的作者在一一说出该厂优秀工人的时候除了列举俄罗斯族工人之外，也提到了一些犹太人。在1946年7月18日刊载的随笔《重建城市》中写道：奥尔沙市没来得及疏散的居民，其中也有一些犹太人，在德国占领期间曾经帮助过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犹太人也同该城市的所有居民一起在参加城市的重建工作。在这家供犹太居民阅读的报纸上刊登这些材料是完全恰当的。

宣传局认为，目前将关于苏联犹太人文学作品状况的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审议是不适宜的。

格·亚历山德罗夫

№03897

巴拉诺夫和格里戈良关于犹太会的 民族主义情绪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7年7月19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对其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正在采取某些措施改善自己在国外的宣传工作。该委员会除了有关苏联犹太人居民生活的文章之外，也开始把反映苏联各民族友谊的材料发往国外。

但是该委员会没有消除在宣传工作中的民族主义错误，并且在描述苏联犹太人文化的时候继续避而不提苏联其他各民族对它的影响，委员会过高地评价犹太人居民在苏联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

委员会没有对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苏运动以应有的回击。

该委员会没有进行反对国外一些国家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在发往国外的文章中，还是在由委员会出版的《团结报》上，都没有对最近一个时期非常活跃的各种色彩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揭露，也没有对犹太民主主义组织及其某些活动家的民族主义错误进行批评。

委员会没有利用自己同国外的犹太人学者、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家的联系，并从这些人那里获取对苏维埃国家有益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信息。

在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规定让该委员会拥有在苏联犹太人居民中进行工作的任何职能。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却擅自在国内开展自己的活动而置国外犹太人运动问题于不顾。该委员会同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进行内容广泛的信函来往，并收到苏联犹太人居民的大量来信，这些来信中有不少对各级苏维埃组织对待犹太人所持错误态度的抱怨。其中有些抱怨受到委员会的支持。

出版主要是面向苏联犹太居民的《团结报》，加强了本来不属于该委员会的国内工作职能。委员会对这家报纸的领导是不令人满意的。该报只是转载塔斯社的一些官方材料和报道，经常以一些无关重要的文章、内容贫乏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来填充版面。

该报主要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的犹太人当中和在比罗比詹散发。《团结报》总印量为10000份，其中仅有1000份发往国外（主要是美国、阿根廷、巴勒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团结报》工作中的缺点，首先是由于在委员会及报纸编辑部的领导班子中，缺乏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党的干部和业务精湛的国际问题专家造成的。委员会和《团结报》编辑部的责任书记职位长时间空缺。委员会代理书记、诗人费费尔（前崩得分子）实际上总揽委员会和报纸的全部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自吹自擂，并把一些并不熟悉本行业务的新闻撰稿人网罗在自己周围。《团结报》编辑一职由政治素质不强的日茨同志出任。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多数成员是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的；主席团组成人员中没有业务精湛、研究国外犹太人运动的国际问题专家。在1947年一年中仅仅举行了一次主席团会议，18名主席团成员中出席此次会议的只有8人。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44年举行的。

为了从根本上改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局和宣传鼓动局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相应的决定是必要的。

随报告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草案^①，供参考。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局副局长 巴拉诺夫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副局长 格里戈良

^① 见本专题No03900文件。

№03900

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

犹委会的决定（草案）

（1947年7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中
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缺点。

在战争年代为动员国外犹太人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
的斗争和在国外报刊宣传苏联的成就而建立的该委员会，在战后时
期已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委员会擅自担负起在苏联犹太人居民中开
展工作这样一个并不属于它的职能而置国外犹太人运动问题于不
顾。委员会没有利用其同外国的犹太人民主报刊的联系来反击英国
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反动代理人（民族主义分子和犹太复国
主义分子）在外国犹太人居民中进行的反苏、反民主运动。在委员
会发往国外的材料中和在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上经常不正确地
反映苏联犹太人的生活；委员会还脱离苏联的实际情况去显示苏联
犹太人的文化成就，而对苏联其他民族对犹太居民的文化发展的影
响视而不见；经常对俄罗斯民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避而不提。

委员会没有利用自己同国外的犹太人学者、社会—政治和文化
活动家的联系，并从这些人那里获取对苏维埃国家有益的科学—技
术和政治信息。

为了从根本上改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决定：

1. 责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消除工作中的政治性错误和缺点，开展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国际反动势力及其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企图利用国外犹太人运动达到反苏反民主的目的。

向该委员会指示：在苏联犹太居民中进行工作不在其所负任务之列。

2. 确定该委员会近期的基本任务是：向国外宣传苏联的成就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阐明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苏联宪法；展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及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优越性；揭露英—美反动势力及其代理人在犹太人运动中的反苏活动；获取对苏联有益的信息。

3. 批准利夫希茨同志为委员会责任书记。

4. 授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和宣传局选定知名社会活动家、学者、艺术工作者、作家和新闻记者充任委员会全体会议成员以加强该委员会。

5. 为了增补主席团和委员会成员及活跃委员会的工作，批准于1947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

6. 停止出版《团结报》，批准委员会出版《团结》月刊，篇幅为4印张，发行量为15000份。

7. 批准莫宁同志为《团结》杂志主编。

8. 授权国家编制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在审定委员会及《团结》杂志编辑部的人员编制定额。

舒梅科

№03908

苏联国家全部就犹委会的 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48年3月26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约·维·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苏联国家全部通过新采取的契卡工作手段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中的亲美倾向在该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美国之行之后，开始特别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在那里同知名的犹太人活动家建立了接触，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受雇于美国情报机关。

委员会主席团前主席索·米·米霍埃尔斯战前好久就是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曾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人的一面旗帜

米霍埃尔斯把民族主义的犹太人权威中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拉进委员会。进入委员会成为其成员的有：

费费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责任书记。过去是崩得的积极参加者，并且是崩得在乌克兰的一些组织之一的领导人。

费费尔在没有中断同民族主义地下活动联系的情况下后来又投靠了托洛茨基派。1937~1938年期间被捕并被判刑的作家布龙施泰因、察尔特、皮亚塔科、基里连科、泰夫和扬克列维奇等人的供词，证明费费尔进行过托洛茨基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活动。

费费尔在国外的民族主义犹太人士中颇有名气。他在1943年同米霍埃尔斯一起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期间，以及在国外知名犹太人活动家访苏期间，同这些民族主义犹太人士建立了联系。

费费尔同已被查明系情报人员的美国驻莫斯科记者马吉多夫有过数次会晤。

马尔基什——作家。从1921年到1926年曾使用波兰护照在波兰、德国和英国生活。在波兰他曾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得派报刊合作，为其撰写反苏文章。

在于1926年来到苏联之后，马尔基什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建立了联系，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夹带进民族主义观点。

马尔基什曾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情报人员马吉多夫会过面。

贝格尔森——作家，曾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积极参加者。

在1909~1912年期间，贝格尔森曾经领导在十月革命之后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斗争的所谓“犹太人文学家基辅小组”。参加过该小组的还有作家马尔基什、克维特科和文学研究家努西诺夫。

在1921年贝格尔森逃往国外，曾住在立陶宛、罗马尼亚、法国、德国和美国，只是到了1935年才回到苏联。

1923年在柏林时，贝格尔森曾在《前锋报》上发表过有反苏内容的文章。

贝格尔森现在仍在发表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

中亦有所反映。

克维特科——作家。在1921年拒绝接受苏联国籍并去了外国。到1935年之前，他一直逗留在立陶宛和德国。

在国外期间，克维特科曾同著名作家——民族主义分子比亚利克有过交往，同他一起写了反苏的呼吁《从血染的乌克兰救出我们吧！》，并为反动的犹太人杂志《手榴弹》撰稿。

克维特科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国家的支持者，并在犹太人知识分子中间挑起这个问题。

多布鲁申——教授，文学评论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在1905~1917年期间曾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且直到1921年之前为崩得成员。十月革命以后多布鲁申在基辅成立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文学小组《施得隆》。

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教授努西诺夫、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和克维特科经常在多布鲁申的家中聚会，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苏联犹太人的状况。

什泰恩——院士，于1925年从瑞士来到苏联，曾多次去欧洲和美国出差。她抱有反苏情绪，表示有必要让美国和英国干预苏联的内部事务。她同英国、澳大利亚、丹麦和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些系情报人员。

什泰恩帮助其中的许多人同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系。

什泰恩同自己的兄弟、住在美国的巨商什泰恩保持着信函往来，此人同知名的民族主义犹太人活动家有联系。

优泽福维奇——苏联情报局国外工会工人报刊处处长。1905~1917年投靠崩得派，而后至1919年曾是“国际主义者”小组的成员。在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中间拥有影响和威望。

除了这些人之外，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怀有民族主义情绪

的知识界代表人物：作家加尔金、包特金医院主任医生希梅里奥维奇、犹太剧院演员祖斯金、院士弗鲁姆金等人。

对他们进行的谍报调查和根据一些犹太民族主义分子的案件所做的侦讯表明，米霍埃尔斯及其志同道合者们是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

曾经同米霍埃尔斯关系密切、现已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戈利德施泰因在审讯中就这个问题供称：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中存在着旨在犹太人居民中煽起‘犹太人的孤立感’和散布‘犹太民族特殊’思想的民族主义活动。整个这项活动由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领导，他同国外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同美国的犹太人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得到这些美国犹太人的充分支持”。

另一名曾经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会议成员、现已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格林贝格在审讯中供称：

“米霍埃尔斯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很久就已把犹太人知识分子网罗到自己周围，他为此而广泛利用了由他领导的莫斯科犹太人剧院及该剧院的艺术工作室。为了同样的目的他还利用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该委员会近年来已被他变成了苏联犹太民族主义地下活动的领导中心”。

根据谍报观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费费尔、克维特科、贝格尔森、马尔基什等人均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有联系，每当前往该地都要同他们接触，向他们通报委员会内的工作情况并指导他们的反苏活动。

乌克兰国家全部在基辅正在调查一个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会议成员、作家霍夫斯坦为首的犹太民族主义小集团。

这个集团把犹太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作家、记者和演员网罗在自己周围，并在他们当中进行争取“犹太人的民族统一和资产阶级

式的犹太人独立国家”的怀有敌意的活动。

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偷偷塞进民族主义观点，其中的某些人还曾试图将自己的作品转寄到国外以便在反苏的报刊上刊载。

该民族主义集团的参加者同基辅、切尔诺夫策和利沃夫的犹太人社团保持着联系。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还在基辅的科学工作者中间，发现了一个以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语文学博士斯皮瓦克为首的类似的民族主义小集团。

普拉特尼奥尔 1930 年以前住在美国，并在那里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犹太人社会—民主工人党”，他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该集团的参加者在犹太居民中、主要是在作家、艺术家、大学生和演员中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活动。

通过谍报观察查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犹太民族主义集团的参加者们，是透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从国外来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活动家建立联系的。

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力图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某种国家机构，他们宣传说，这个委员会是惟一的一个维护苏联犹太人利益的组织。

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作家多布鲁申曾经说过：“委员会应当变成一个特殊的犹太人事务委员部。为了扩大委员会的活动，需要在与犹太居民紧密相关的地方建立它的分支机构”。

由于这种活动的结果，大量来自犹太人的信件涌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些来信对似乎存在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对犹太人居民的歧视提出抱怨。这些信件经常包含有各种民族主义的谰言和对苏联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诬蔑。

委员会领导班子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不怀好意地在犹太人知

识分子中间扩散这些来信的内容，而在战争时期他们就曾经向有关权力机关递交过关于所谓党和苏维埃机关非正常对待犹太居民的报告。

同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赋予自己以本不属于它的职能，就犹太人的抱怨问题诉诸一些地方苏维埃机关，要求在工作安置、提供住房和物资等方面给他们以帮助。

在战争时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国外的各种犹太人组织建立了联系并至今保持着信函往来。

1943年底，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被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派往美国，其官方使命是宣传苏联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所做的努力。

但是，现已查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却把自己此次国外之行用于反对苏联的目的。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和英国逗留期间，曾经同世界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进行过一系列会晤，其中有：

斯蒂芬·魏斯——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共济会分会“锡安之子”会长，与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犹太人情报组织“反破坏名誉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魏斯对苏联抱有敌对情绪。过去曾同托洛茨基有私人来往，曾去墨西哥看过他。

海姆·魏茨曼——世界犹太人组织^①前主席，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传播者。

詹姆斯·罗森贝格——百万富翁，资产阶级“慈善”组织“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

过去，罗森贝格曾领导过美国犹太人农业合作团体“农业联合

^① 应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会”，这是一个被美国情报机关利用来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组织。

戈德曼·瑙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执行委员会并任该办事处政治部负责人和犹太人代表大会秘书。

西尔弗曼·阿奇博尔德——英国议会议员，过去曾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民族委员会成员。

布罗杰茨基·托利克——俄罗斯移民，著名的民族主义分子，对苏联持敌视态度。

据谍报及侦查材料查明，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从美国返回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中开始引人注目地显现出美国的影响。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热情洋溢地评论在美国所看到的一切，声称犹太民族主义者在美国的国家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具有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还搞了数次聚会，受到邀请的仅仅是他们在犹太民族主义分子中的知己，在聚会上他们向出席者通报了同美国犹太人各界建立联系的情况。

曾出席这种聚会之一、现已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格林贝格在审讯中供称：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向参加聚会的人详细地介绍说，他们在美国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他们已经同这样一些知名的犹太人活动者建立了联系，例如，斯蒂芬·魏斯——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詹姆斯·罗森贝格——犹太人委员会‘拉申列利弗’协商会议主席及海姆·魏茨曼——世界犹太人组织主席……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说：他们从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方面向这些人士介绍了苏联犹太人的情况；向他们讲述了似乎已在苏联出现的反犹太浪潮，对这一浪潮苏联政府不但不与之进行斗争，相反却给予鼓励；他们已请求这些人士向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提供援助和保护。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

尔称，瓦伊兹、罗森贝格和魏茨曼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意，并指责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并且说：只要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不开始真正地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美国的犹太人将不再给他们以援助。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魏斯、罗森贝格和魏茨曼就援助问题达成了协议，而对他们关于争取犹太人民族独立的提示，他们两人已经接受并答应付诸实施，允诺将这方面的情况通报美国的犹太人各界”。

在1944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借向政府呈交关于美国之行结果的报告之机，决定提出某些被他们称之为“根本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的问题。

就是在那时，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关于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共和国的问题。

为了详细推敲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吸收了一些犹太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最后决定从向政府建议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共和国入手。

据谍报材料查明，直接和积极参加讨论和推敲上述文件的是洛佐夫斯基。

例如，国家全部内线人员报告称：

“文件的准备工作是急急忙忙进行的，因为洛佐夫斯基说必须尽快把这个文件递送政府。他暗示：上边正等着这个文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指望政府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例行全会之前就建立单独的犹太人苏维埃共和国问题做出明确的决定。这使得文件的起草者们加紧了工作。但是由于草拟出的文件十分含混不清，所以洛佐夫斯基提出需要在文件中明确地加进两点：第一，关于未来的犹太人共和国的地点；第二，负责整个这一举措的准备工作的国家机构。洛佐夫斯基的这一提示被认为指的是笼统地转达上级愿望那一部分，于是立即做了必要的明确：将笼统的愿望为‘安

顿大批犹太民众而划出从政治方面考虑被认为可能的疆域’在文件中改成了建议把克里木的疆域划归犹太人共和国。作为预备措施，曾建议成立一个负责筹建犹太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府委员会”。

为同此份文件递交政府一事相配合而在犹太居民中间开展了宣传活动，以争取对这一计划的支持。

作家贝格尔森曾经宣称：

“应当坚决地行动，以后就来不及了。应当有勇气去主动承担责任和开辟道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米霍埃尔斯提出关于建立共和国的问题是对的。我确信，我们定会把克里木变成瑰宝。朋友们希望办成这件好事是为犹太人着想，而敌人希望这样做则是为了使犹太人在地域上集中到一起，而不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占据苏联其他部分的好地方。”

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在信件递交政府不久就把作家多布鲁申、格鲁比扬、霍夫斯坦及教授努西诺夫邀到自己家中，提议他们分析研究一下他自己的信件草稿，他为信件定下的基调是：“需要为保全犹太人文化而建立一个共和国，以便使这个共和国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精神上的中心”。

就此问题努西诺夫说：

“所有国家的犹太民族命运都是这样的。我们应当欢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而如果在我们这里将有一个自己的共和国，那么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将建立起最紧密的精神上的联系”。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向政府呈递上述信件一事广泛地告知犹太人居民。

米霍埃尔斯宣称：“我们不把此信当做秘密。许多人在读它并且关于这封信他们知道得更多”。

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散布流言说，似乎不是该委员会提出了关于

建立犹太人共和国的建议，而相反，是政府向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使得犹太人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向犹太人提供疆土，其中包括克里木，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问题。

于是关于犹太人共和国未来体制问题的各种方案、信件和建议开始涌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克维特科和努西诺夫为此问题曾专门去了克里木和乌克兰。

在委员会没有收到对自己计划的正面答复之后，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开始加强散布流言说，国内的反犹太主义不仅没有被制止，而且还在发展，并且已经具有国家反犹太主义的态势。还散布了许多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诬蔑性反苏谰言，指责他们实行反犹太主义。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利益的捍卫者，于是开始提出同所谓国内日益发展的反犹太主义做斗争的问题。

例如，在1944年就曾致信苏联人民委员会，列举了所谓出现在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现象的诸多实例。经调查，那些实例没有得到证实，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已将此情告知了该委员会。

对于这一答复，米霍埃尔斯声称：

“这不是答复，这是不准备改变任何事情的敷衍了事的复文。在这样的答复之后事情将会更糟。那些反犹太主义官僚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一切”。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还曾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呈递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提请政府注意“地方当局在分配收自美国的捐赠物资中漠视犹太居民”。

在该书面报告中说：

“从我们不断地从苏联各地收到的大量来信和请求中可以看出，在分配来自国外的救援物资工作中对犹太居民的漠视仍在继续，而这种漠视具有粗暴违反苏维埃准则和对遭受法西斯主义特殊磨难的人极不尊重的性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让中央和地方的犹太人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救援犹太居民物资的分配工作是适宜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委派经过调查否定了该报告中所列事实之后，据我们通过内线了解到，洛佐夫斯基一得知调查结果，立即对这一结果表示怀疑并建议当时的委员会责任秘书爱泼斯坦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委员会的领导人还试图利用提出关于来自美国的捐赠物资分配不合理这一问题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即向犹太人指明，美国的犹太人各界是在向苏联犹太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援助。

在这方面，日益增多的主要是从美国、英国和巴勒斯坦寄到苏联的邮包很引人注目。例如，在1940年寄到苏联的邮包总共只有大约13000个，而在1943年则超过30000个，在1946年近90000个，到了1947年则已超过180000个。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国外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成就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反苏立场。在发往国外的许多材料中都脱离苏联其他民族的生活，孤立地描述犹太居民的生活，并给人造成犹太人知识分子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印象。

同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也不进行针对反动的、由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苏运动的宣传和反宣传，不介绍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介绍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不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优越性和成就。

由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种活动的结果，美国犹太人集团

把该委员会看成是一个应当与之保持联系，并利用它进行反苏颠覆工作的组织。

在 1945~1947 年期间，许多知名的美国犹太人活动家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客人名义来到苏联，这些人当中曾经有被怀疑进行间谍活动的人。

例如，在 1945 年年末，犹太人作家和演员美国委员会主席戈尔德贝格·边齐翁曾来过苏联。

戈尔德贝格在苏联逗留期间同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犹太人报纸《团结报》编辑部责任书记加尔金、作家马尔基什等人进行过接触。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向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会见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维尔纽斯、明斯克和基辅等地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和教权主义者的机会。

据谍报材料得悉：戈尔德贝格曾拜访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并向费费尔通报了他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多次会见的性质。其中，戈尔德贝格同大使斯米特有过几次由谍报人员戴维斯和汤姆森安排的会晤，此二人是对他在苏联各地旅行期间得到的间谍情报感兴趣。

1946 年底，犹太人报纸《护航艇》的编辑、美国共产党党员诺维克·保利来到莫斯科，此人同样与美国大使馆，其中包括情报人员——武官梅孔及其助手舒曼保持过联系。

诺维克在苏联逗留期间，在来自美国的犹太人移民中间广为交往——这些人当中许多人因间谍嫌疑受到国家安全的调查，拜谒犹太教堂，拜访犹太人社团领导人，收集有亲属在美国的犹太人的信件并表示说有必要同美国犹太人紧密合作。

1946 年 7 月一个英国代表团拜访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该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个同犹太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有联系的人叫西

尔韦尔曼。

西尔韦尔曼在同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交谈中表示希望建立更加密切的接触。

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同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看成是一个应当参加解决犹太人问题，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组织。

为此目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执委会采取措施同该委员会建立了联系。

1947年12月，瑞典“波罗的海毛皮商贸公司”派来苏联进行商务谈判的霍兰德到莫斯科，此人是瑞典国籍，犹太族人。

已查明：霍兰德是世界犹太民族主义分子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在美国、英国、瑞典、芬兰和其他一些国家拥有广泛的联系。

霍兰德在莫斯科拜访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见了委员会书记海费茨，向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成员和该组织美国和瑞典分支机构的非正式代表，并请求安排会见米霍埃尔斯或者费费尔。当得知二人不在后，霍兰德试图向海费茨了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会议所持的立场，询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否将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在霍兰德离开苏联不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收到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戈尔德曼从伦敦发来的如下内容的电报：

“我们已经收到了霍兰德关于他同你们谈话情况的报告。现在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你们发出参加将于2月底在蒙特勒（瑞士）举行的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邀请。贵委员会的代表数量将在同你们相互协商后确定。你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主动向第二次会议提出决议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准备派出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布拉格、华沙或者索非亚同贵委员会的代表会晤和

进行事先的商谈。

我们最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参加会议。期待你们尽快给予答复”。

1948年1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收到了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欧洲秘书处发来的通函，来函中要求提供用于概述犹太民族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做出的军事努力的材料。

按照这一通函，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需要向代表大会提供下列资料：

“1. 武装力量（地面部队，海军，空军）。

多少犹太人被征召入伍。参加武装力量的犹太人占整个军队人数的百分比。

犹太人参加过的战役概要。

牺牲、受伤和下落不明者名单。

犹太人指挥人员——姓名、军衔、所居职位的特点。

犹太军人在帮助被占和被解放领土上的犹太居民方面所起的作用。

2. 游击运动的军事部队（这里所列各点与第1项中相同）。

3. 地下活动（政治活动，破坏，救援）。

4. 辅助工作（住宅护卫，消防，医生，护士等等）。

5. 国家公职（外交和其他国务活动）。

6. 在经济领域的军事努力（在工业，通信，交通及其他领域）。

7. 在科学领域的军事努力（发明，发现，医学领域，新的科学方法等等）”。

由于欧洲秘书处在今年2月的一封信中提醒说必须尽快寄出所要求的材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没能向代表大会提供上述资料。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国外各种犹太人组织，其中包括同世

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有联系这一情况，已开始为某些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苏联犹太人所知晓。在这方面有如下一个典型事例：

今年3月，一份匿名的“一群苏联犹太人的抗议”寄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人在信中指出，他们已得知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行将在瑞士举行会议，因而他们要求全面了解有关这一犹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抗议”中指责说：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其中包括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中都发生了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变化之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取得的结果，我们认为两百万苏联犹太人按照战前年代令人伤心的先例所置于其中的同犹太民族其余部分相分割和隔离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和极其有害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在报刊和信息报道方面对苏联犹太人社会的明显歧视。

我们以此最坚决地抗议这种歧视并宣布，我们一方面是具有苏维埃世界观和受过苏维埃培养教育的人，同时我们也认为自己是在自身文化和饱经苦难方面均堪称伟大的犹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愿意而且应该履行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民族义务”。

在最近一个时期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中，苏联国家安全部揭露出了不少美国和英国的间谍，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怀有敌对情绪，因而进行颠覆活动。

阿巴库莫夫^①

^① 维·谢·阿巴库莫夫（1908～1954），曾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7月被捕，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

№039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查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决定**

（1948年11月20日）

机密
特别卷宗

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如下决定：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不断地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

据此同时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暂不逮捕任何人。”

№03907

贝利亚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4月2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在审查被苏联前国家全部逮捕的所谓“医生—破坏分子”案的侦讯材料过程中曾经查明，对许多犹太族的苏联医学界知名人士的主要指控之一，是同著名社会活动家—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的联系。在这些材料中，米霍埃尔斯被说成是反苏的犹太民族主义中心的领导人，据说该中心似乎是按照来自美国的指示在进行反对苏联的颠覆活动。

关于被捕的医生沃夫西、科甘和格林施泰因从事恐怖和间谍工作的说法，当时“依据”的是他们同米霍埃尔斯有交往，而沃夫西还同米霍埃尔斯有亲属关系。

应当指出：同米霍埃尔斯交往这一事实，同样也曾经被原苏联国家全部的造假者们利用来挑拨离间性地捏造热姆丘任娜^①从事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的罪名，此人已被根据伪造的材料逮捕，并被苏联国家全部特别会议判处流放。

应当强调的是：国家安全机关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米霍埃尔斯

^① 波·谢·热姆丘任娜（1897～1970），曾任苏联渔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同维·米·莫洛托夫结婚。

从事实际的反苏活动，尤其是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恐怖和颠覆活动的材料。

还必须指出：米霍埃尔斯在 1943 年曾经作为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出访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此事乃众所周知；他在这些国家的讲话都具有爱国主义性质。

在审查有关米霍埃尔斯的材料过程中查明，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伙同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察纳瓦，按照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委派，于 1948 年 2 月在明斯克市进行了一次肉体上消灭米霍埃尔斯的非法行动。

苏联内务部曾就此事传讯了阿巴库莫夫，并得到了奥戈利佐夫和察纳瓦的说明。关于这次犯罪行动的进行情况阿巴库莫夫供称：

“据我所记得的，在 1948 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当时已得悉，米霍埃尔斯已经同他的一位其姓名我不记得了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当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掩护干掉米霍埃尔斯。也就是说，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在这次谈话中还逐个精选了可以委派去执行上述行动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领导工作人员。当时说定：委派奥戈利佐夫、察纳瓦和舒布尼亚科夫去执行此次行动。此后奥戈利佐夫和舒布尼亚科夫就带着他们为此次行动而准备的工作人员小组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们同察纳瓦协同行动干掉了米霍埃尔斯。当米霍埃尔斯已被干掉并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的时候，他高度评价了这一措施并吩咐奖以勋章，此事业已照办”。

奥戈利佐夫在谈及杀害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的情况时供称：

“由于当时我们对‘车祸’行动时取得圆满结局尚无把握，

况且这样做还可能导致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蒙难，我们选定了这样的方案——通过货运汽车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进行撞轧的办法来干掉米霍埃尔斯。但是这一方案虽然胜于第一方案，仍然不能保证行动有十分把握取得成功。因此决定通过谍报机关邀请米霍埃尔斯于晚间去某个熟人处做客，派车前往他下榻的饭店，把他拉到察纳瓦的城郊别墅地界并在那里将其干掉，然后将尸体运至市内一条行人稀少（僻静）的街道并抛置在通往饭店的道路上，接着再用货运汽车辗轧过去。这样就造成了一幅汽车撞轧散步归来者的不幸事故的逼真景象，况且类似事故在明斯克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干了”。

察纳瓦证实了奥戈利佐夫关于杀害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情况的说明，并供称：

“1948年冬天，在我担任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的时候，阿巴库莫夫通过‘高频’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们能否完成约·维·斯大林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回答他说保证完成任务。晚上他又打电话来转告说：为了执行政府的一项重要决定和约·维·斯大林的个人指示，奥戈利佐夫将率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小组前来明斯克，而我应当给他以协助……来到之后奥戈利佐夫告诉我们说：按照政府的决定和约·维·斯大林的个人指示，过一两天应当干掉因公出差前来明斯克的米霍埃尔斯……对米霍埃尔斯的谋害准确无误地按照这一计划实施了……大约在晚上10点钟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被送到别墅的院子里。他们立即被从车上拖下，并用货运汽车轧死了他们。夜里12点左右，当明斯克市内开始无人走动时，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走，并抛在市内一条僻静的大街上。清晨他们被一些工人发现，这些工人将此情况报告了民警局”。

就这样，由苏联内务部进行的调查判定：在1948年2月，奥

戈利佐夫和察纳瓦与国家安全部的行动人员 - 技术执行人员一起在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野蛮谋杀的犯罪行为。

鉴于对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的谋杀是对苏联公民受到苏联宪法保护的权利的不能容忍的侵犯，同时也为了提高内务部机关业务人员坚定不移地遵守苏维埃法律的责任感，苏联内务部认为有必要：

(1) 逮捕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前白俄罗斯安全部部长察纳瓦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撤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谋杀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行动参加者勋章和奖章的命令。

拉·贝利亚

【专题说明】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1952年5月至1955年11月)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冤案。1941年秋天，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应运而生。战争期间，“犹委会”在宣传鼓动、筹集钱财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战后，“犹委会”却被扣上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取缔。不仅如此，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一些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演员、诗人、科学家、医生等，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他们当中有“犹委会”的著名领导人，如阿·洛佐夫斯基、伊·费费尔、达·霍夫斯坦等；有积极参加“犹委会”活动者，如所·布雷格曼、佩·马尔基什、达·贝格尔森等；还有与“犹委会”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如韦·祖斯金、列·塔尔米、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等。虽然他们的身份并不相同，但在狱中的遭遇却是相同的：全部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一个受命直接领导这一案件侦查的安全部官员自称：“囚犯们在我面前确实嗦嗦发抖，他们像见着火一样地怕我”。鲍·希梅利奥维奇在狱中写的一封信中透露，被捕的第一天，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就根据部长阿巴库莫夫的指令对他大打出手，他们都争着去打希梅利奥维奇的面部，用橡皮棍打、

皮靴尖踢他的股骨。由于他拒绝在“招认”口供上签字，被打得越来越凶，以至于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作家佩·马尔基什在被捕后的二个多月时间里，竟被提审 96 次，通常是彻夜受到审讯。大部分人经不起这样的非人折磨而屈打成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犹委会案”越搞越复杂，雪球也越滚越大。但是，所谓的“犯罪事实”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经过三年多的囚禁后，有关当局终于决定了结此案。1952 年 5~7 月，最高法院组成了军事审判厅，对“犹委会”领导人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 15 人进行了秘密的法庭审判。这是这批在押数年的所谓“犯人”受到的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法庭审判。不久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即被处决。

本专题刊载的文件，是对上述 15 人进行的审判记录，被告的最后陈诉，以及法庭的判决。读者可以通过大量的材料，清楚而详尽地了解到“犹委会”冤案的始末。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文件的阅读，编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丁明编辑和校注，

吴吉康翻译)

№0341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组成和宣布起诉的记录

(1952年5月8日)

审判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军法中将切普佐夫^①

审判员——军法少将德米特里耶夫^②

——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③

书记员——上尉阿法纳西耶夫

无国家公诉及辩护机构代表参加

1952年5月8日12时00分开始

审判长：我宣布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法庭将审理诉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布雷格曼及其他人背叛祖国案。

书记员报告：被告人所·阿·洛佐夫斯基、伊·所·费费尔、所·列·布雷格曼、约·西·尤泽福维奇、鲍·阿·希梅利奥维奇、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达·拉·贝格尔森、达·瑙·霍夫斯坦、

① 亚·亚·切普佐夫（1902～1980），曾任陆军军事检察长，苏军武装力量副总检察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

② 雅·彼·德米特里耶夫（1892～？），曾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

③ 伊·米·扎里亚诺夫（1894～？）曾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委员，红军军法学院代理院长，苏联最高法院委员。1955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军法少将军衔。

韦·利·祖斯金、莉·所·什泰恩、列·雅·塔尔米、伊·谢·瓦坚贝格、埃·伊·泰乌明和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被押解到庭。

审判长查验出庭者是否确为被告本人，被告人将自己的身份陈述如下：

“我叫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丹尼洛夫卡村，家庭出身教师，犹太族，1901年入党，1914年和1917年曾两次被开除出党，1917年至1919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派）党员，没受过党内处分。最近这次被开除出党的时间是1949年1月20日。受到政府的奖励有：列宁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勋章各1枚；‘保卫莫斯科’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在沙皇时代吃过官司，1908年因受控参加社会民主党而被哈尔科夫审判院判罪。在苏维埃政权时代没有前科。已婚，有三个女儿，几个外孙和一个重孙。被捕前曾任苏联情报局局长直到1947年7月。最近的一年半时间写书，与别人共同主编过一部外交辞典，还担任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1949年1月26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1900年生于基辅州什波拉镇，家庭出身乡村教师，犹太族，高等学校肄业，1919年入党，未被党开除过，1947年曾受党纪处分。1917年至1919年曾是‘崩得’成员。

被捕前的全部人生都是写诗的。已婚。有一个已成年的女儿。受到的奖励有：‘荣誉’勋章1枚——1948年获得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2枚。1948年12月24日被捕，起诉书的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1895年生于布良斯

克州，父亲经商，犹太族，中等教育程度，1912年入党，从未被开除过，也没受过处分。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监督部副部长。家庭状况——已婚，有1个儿子。获得的奖章有：‘保卫莫斯科’奖章1枚，‘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1枚，‘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1949年1月28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1890年生于华沙市，职员出身，母亲是家庭妇女。联共（布）党员，党龄确定自1917年5月算起，职业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婚，收了1名1940年生的养女，小姑娘的父母都是被德国人枪杀的。受到的奖励有：‘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和‘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1949年1月13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1892年生于里加市，犹太族，1920年4月加入联共（布），此前曾参加过‘崩得’，共5个月的时间。受到的奖励有：劳动红旗勋章1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保卫莫斯科’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还持有授予俄罗斯联邦功勋医生荣誉称号证书。家庭状况——已婚，有1子1女，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担任的最后职务是担任包特金临床医院主任医师18年。1949年1月13日被捕。起诉书的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1890年生于敖德萨州戈洛斯科沃村，犹太族，1941年入党，此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职业是诗人，家庭状况——已婚，有一成年女儿，受的是家庭教育。所受的奖励有：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

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各1枚。1949年1月25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1895年生于原沃伦省现日托米尔州的波隆诺耶市，犹太族，家庭状况——已婚，有3个孩子，受的是家庭教育，职业是诗人，1939年加入联共（布），一直从事文学活动。受到的奖励有：列宁勋章1枚，‘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和‘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各1枚。1949年1月28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法伊洛维奇，1882年生于基辅省萨尔内地区，犹太族，家庭出身大商人。接受的是家庭教育，另外还上过犹太宗教学校。家庭状况——已婚，有1子。曾获‘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职业是作家。1949年1月24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1889年生于基辅州科罗斯特舍夫地区，犹太族，家庭出身小职员，后来父亲开了一家小店辅，家庭状况——已婚，有3个孩子，教育程度——自学，革命前取得了中学毕业证书，苏维埃政权时代作为校外考生通过了高等学校考试。1929年读完了研究生。1940年入党。职业是诗人。获得‘荣誉’勋章和‘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各1枚。1948年9月16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1899年生于立陶宛，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帕涅韦日斯市。父亲是裁缝。犹太族。曾在矿山学院读书，1915年上军事专科学校，后来转入军事学院。已婚，有1个未成年的女儿。获得红旗勋章1枚，‘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一枚，并获得斯大林奖金

二等奖。没有加入过党，具有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捕前担任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1948年12月24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夫娜，1878年生于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市（原库尔兰），犹太族。出身商人家庭，独身。1938年入党，此前未加入过任何党派。捕前从事科研工作。高等教育程度。在维也纳读完了大学——医学系和化学系，并从事科学教育工作。曾担任过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和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主，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的职称。获得红星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各1枚；‘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和‘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卫生保健优秀工作者’奖章数枚，获得过斯大林奖金。1949年1月28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审判员：有哪些学术著作？

什泰恩：我有400来种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学术著作。

（审判）长：你因为什么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什泰恩：因为《血脑屏障》这部著作。

“我叫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1893年生于巴拉诺维奇斯克州的利亚霍维奇地区，犹太族。出身于商人之家，无党派。在1914~1917年居留美国期间是社会党党员，后来成了共产党党员。我是受联共（布）党的调派来到这里的，经历了清党，但没有履行转联共（布）党的手续，因为我找不到革命前的人党介绍人。已婚，有1个儿子，受教育程度是高等学校肄业，就是说上过一年的大学。获得‘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我的职业是新闻兼翻译工作者。最近时期在苏联情报局工作。1949年7月3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1887年生于斯坦尼斯拉夫市，犹太族。父亲起先是职员，后来当工人，最后成了一名经纪人。他在纽约售卖不动产。我现在无党派，过去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已婚，受过高等法学教育。在纽约读完了法学院。捕前担任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审职务。1949年1月24日被捕。起诉书副本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我叫泰乌明，埃米莉娅·伊萨科夫娜，1905年生于瑞士伯尔尼市，犹太族。父亲系职员，母亲家庭妇女。在瑞士时父亲是‘崩得’中央委员会委员。我1927年加入联共（布），职业是编辑，最近任《外交辞典》副主编。获得‘荣誉’勋章一枚及‘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和‘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各一枚。1949年1月28日被捕，1952年5月3日收到起诉书副本。”

“我叫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夫娜，1901年生于基辅州兹韦尼哥罗多克村，我父亲是屠宰场的屠手。我的教育程度是高等学校肄业。在纽约读完中学，以后上过大专。已婚，被告人伊·谢·瓦坚贝格就是我的丈夫，没有孩子。获得‘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曾在反法西斯委员会担任翻译，最近时期在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任翻译；1949年1月24日被捕。起诉书于1952年5月3日收到。”

（审判）长：此案将由以下人员组成的军事审判庭审理：

审判长——军法中将切普佐夫，

审判员——军法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和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

书记员——上尉阿法纳西耶夫。

按照法律的规定，你们作为被告人，如果有理由的话，有权要求法庭的全体人员或是个别成员及书记员回避。

被告人一一回答说，不要求法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回

避。

审判长说明开庭审理时被告人的权利：

“在审理的过程中，你们有权相互提出问题，就任何问题向法庭做你们认为必要的解释，此外，你们有权向法庭提出请求。”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你清楚你的权利吗？

洛佐夫斯基：清楚了。

(审判)长：你有什么请求吗？

洛佐夫斯基：我请求把几份材料加进案卷里。这几份材料保存在侦查人员手里，但侦查人员不认为有必要把它们收入这42本卷宗里。我说的是由我交给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带往美国的那几份材料。我请求把它们加进案卷里是因为这些材料里没有任何机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材料才没有被收进案卷里。

由被告泰乌明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些材料的全文。这些材料侦查人员那里有，但没有归入案卷里，这显然是由于这些材料里没有任何机密。

我被指控同戈尔德贝格有联系。可是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查抄来的材料中，有一本戈尔德贝格从苏联回国后写的维护苏联的政策而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的书。这本书没有归在这42本卷宗里。可是这本书却可以证明，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些材料被采用后对苏联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

1942年4月，发表了我谈几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务，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务的答外国记者问，这份答记者问当时曾经莫洛托夫和谢尔巴科夫审订。我请求把这份材料也加附到案卷里。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对开庭审理时你的权利清楚了吗？

费费尔：清楚了。

(审判)长：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吗？

费费尔：向我送交起诉书时我就提出过我的请求。这请求就是希望法庭读一读我的诗歌选集。俄文的选集侦查员库兹明上校那里有。

(审判)长：被告泰乌明，你清楚你在法庭上的权利吗？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吗？

泰乌明：权利我清楚了，我有一个请求。起诉书中说，我审订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我不仅从未审订过，而且从来没有读到过这些材料。在侦查的过程中这已经得到证实，特别是1952年最后的几次记录中有一份特别强调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材料。我请求查验一下侦查材料，并同起诉书进行核对。再没有别的请求了。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你对你在法庭上的权利清楚了吗？对法庭你有什么要求吗？

马尔基什：对权利我清楚了。我有一个请求，如果可以，把苏联大使沃伊科夫在华沙出版的那本书收入卷宗里。这与对我的指控有直接关系。案卷里没有这本书。这本书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或者在我的家里都可以找到。另外，侦查人员手里有对我1920~1923年间在华沙发表的讲话的评论。我请求把评论材料收进案卷，那里也有对我的讲话的评价。

(审判)长：被告尤泽福维奇，你对你在法庭上的权利清楚吗？有什么请求吗？

尤泽福维奇：权利我清楚了。有一个请求。侦查员和检察长曾允诺把我按照洛佐夫斯基的指示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份第205研究所的材料“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复制件提交法庭供了解情况用。所以我请求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法庭，以便阅读，了解情况。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你对在法庭上的权利清楚了吗？

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

布雷格曼：权利我清楚了，我没有什么请求。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清楚你的权利吗？你有什么请求？

克维特科：权利我清楚了，有几点请求。

我请求把我送交安全部侦查员格里沙耶夫中校陈述与此案有关的事实的信件附在卷宗里。我提这个要求是因为我当众讲话有困难，而我的这份申述对事实阐述得更具体，更详细。这份申述我大约是在3周前写的。

在这几本案卷里有两份文件是费费尔用我的名字签的字。我请求把这两份文件从我的材料中抽掉，因为我没有签这些文件。

我请求法庭阅读一下我那本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题为《1919年》的书，或是把它放在我的卷宗里。这本书是写彼得留拉在乌克兰的暴行的。这本书被作为反苏书刊向我提出指控，然而它却是一部反对彼得留拉的书。书是用犹太文写的。这本书可以在列宁图书馆或是我家里的图书室找到。

我请求在我的案卷里附上1948~1949年（我被捕之前）苏联作家出版社把我的作品汇编起来出版的那册书。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对你在法庭上的权利清楚了吗？你有什么请求？

贝格尔森：权利我清楚了。我对法庭有几点请求。

我请求把我在被捕开初的那几天预审时亲笔书写的供词收进案卷里。

我请求把我的作品选集收进案卷里，因为起诉书说，我侨居国外时一直在写反苏的作品，而从这部短篇小说选集里面可以看出，我并不是一直在写反苏的作品，只是有一段时间写过。还请把后来刊登在《红旗》月刊和《新世界》月刊上以“暴风雨的日子”为题

的几部短篇小说收进案卷中。

(审判)长：被告霍夫斯坦，你对在法庭上的权利清楚了吗？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

霍夫斯坦：权利我清楚了，我没有什么请求。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你清楚你的权利吗？你有什么请求？

瓦坚贝格：权利清楚了。我请求撤回今年5月3日向我交起诉书时我提出的请求。没有什么新的请求。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清楚你的权利吗，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吗？

希梅利奥维奇：权利我清楚了。有几点要求。

1950年3月的侦查终结文书中记上了我的一项请求，即把我1949年5月15日向要案侦查员留明中校提出的申明附在案卷里。我请求把这项申明附在案卷中。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

我一直都坚持要求把这个申明附上，在1952年3月签第二份文书的时候，我曾请求把我对这一点的声明写进文书，并记上，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我自己有罪。

(审判)长：这是实质性的说明，而我们是问你在给案件附加文件方面有什么请求。

希梅利奥维奇：1952年3月，我曾请求把几份我先前签过字的申明附在案卷中，就是写给留明中校的第一份申明，1950年写给安全部检察长尼古拉耶夫的第二份申明和今年2月11日呈交给我的侦查员斯特鲁戈夫的那个说明他的做法是错误的最后一份申明，还曾请求在案卷中附上搜查时从我那儿查抄去的确证我父亲身份的证明书、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发给我母亲个人的个人退休金证书；我当时还要求附上1份（抄走6份）已是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查封之后从苏联情报局发出、由莫伊希科夫博士作附言的“致海外”

信件，再附上1948年8月刊登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上的安德烈耶夫的文章。上述文件已经逐一罗列在第二份侦查终结书中。几天之后我接到通知说，这些文件，包括2月11日关于错误的侦查做法的申明全部被拒绝接受。我现在请求把第二份终结书中开列的所有这些文件附在案卷中。再没有其他的请求。

(审判)长：被告祖斯金，你听清楚你的权利了吗？

祖斯金：权利我已经听清楚了。

(审判)长：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

祖斯金：有。起诉书说，我给美国的报刊寄过一些谈苏联艺术现状的文章。我已经说过了，我写的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工作。我最多就是写了三或四篇有关演员的文章。我请求把这些材料附在案卷内，好让法庭对我所写的这些文章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你听清楚你的权利了吗？

塔尔米：权利我听清楚了。

(审判)长：你对法庭有什么请求吗？

塔尔米：我有一个请求：把我亲手所写、后来成了阿尔乔莫夫中校1946年9月写的那份记录的基础的供词附在案卷里。

(审判)长：这有什么必要吗？反正要给你权利就指控你的全部实质问题做出说明的，那时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讲。这些都会记录在速记稿中的。

塔尔米：是这样的：记录中只是概括地转述了我的供词，而且改得面目全非，由于我在审讯时曾申明，我认为专家们对我的《在处女地上》一书的鉴定结论是错误的和不当的。我还提一个请求。为了把一切都弄明白，我请求传唤这些专家到庭，我完全可以证明他们的结论是不当的。我的书有译本。实际上，俄文本只有从这本书里别有用心地摘译出来的一些部分，要评判我的这本书，就必须有一个完整而正确的译本。我还要求在案卷中附上我刊登在《奈

耶—采特》报上的那些文章。

我在侦查终结结论书签字的时候，曾对检察长和侦查员说过，侦查材料表明，我的案子被错误地同其他被告人的案件合并到一起了。

再没有别的请求了。

(审判)长：这是对指控的实质问题的说明，而不是请求。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你听明白了你在法庭上的权利了吗？你有什么请求？

什泰恩：权利我都听明白了，我有几点请求。

这里边说我收集了一些谍报材料，所举的证据是我同三名来苏联的美国人建立了联系，并交给他们一册科学论文集（医学科学院的出版物）。怎样去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是苏联和外国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些科学上的问题，可我却被指控为了获得报酬而把学术论文集交给了他们。这些学术论文的题目是《医学中的生物学问题》。这本书是1944年为纪念我的一个周年日而出的。纪念性文集就是这么个编法——许多科学家给它寄送自己的论文。

我请求把这部书附在材料里边。这部书是1944年写的，里边没有任何机密。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把认识我的人请到这里来，或者不可以这样做？

(审判)长：他们能讲些什么呢？

什泰恩：证明说我没有民族主义情绪，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我犯了罪，这本书里收录的论文对外国科学家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

(审判)长：没有别的请求了吗？

什泰恩：没有了。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听清楚你在

法庭上的权利了吗？对法庭你有什么请求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权利我听清楚了。没有什么请求。

审判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听取了被告的请求，经过当庭商讨，决定，这些请求将在审理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书记员遵照审判长的指示宣读本案的起诉书。

审判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52年4月21日召开预备会议，批准了本案的起诉书，根据起诉书的结论，将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交付审判。本案决定不公开审理，各有关方面不参加，也不传唤证人出庭。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听明白了所提出的控告吗？

费费尔：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费费尔：我承认。

（审判）长：被告泰乌明，你听明白了控告吗？

泰乌明：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泰乌明：是的，我承认自己有罪。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你听明白控告了吗？

马尔基什：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马尔基什：我不承认自己有罪。

（审判）长：被告尤泽福维奇，你听明白了控告吗？

尤泽福维奇：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尤泽福维奇：我只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名。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你听明白了控告吗？

洛佐夫斯基：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洛佐夫斯基：不，我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所提出的控告你听明白了吗？

布雷格曼：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布雷格曼：我不承认。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听明白控告了吗？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克维特科：控告听明白了，我只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听明白控告了吗？

贝格尔森：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贝格尔森：部分地承认。

(审判)长：被告霍夫斯坦，你听明白控告了吗？

霍夫斯坦：是的。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霍夫斯坦：部分地承认。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你听明白控告了吗？

瓦坚贝格：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瓦坚贝格：部分地承认。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听明白所提出的控告了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从未承认过，现在也不承认。

(审判)长：被告祖斯金，所提出的控告你听明白了吗？

祖斯金：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祖斯金：部分地承认。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你听明白对你的控告了吗？

塔尔米：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塔尔米：部分地承认。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所提出的控告你听明白了吗？

什泰恩：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什泰恩：是的，我只承认在下面这一点上我是有罪的，即我担任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而作为一名党员，又根本没有去深入探究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我从未进行过间谍活动和反苏活动。作为一名按要求应该具有一定警觉性的党员，根本没有表现出这种警觉性，在这一点上我是有罪的。我的罪过在于：我加入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着主席团委员之职，却根本没有过问它的工作。我想，我的罪过只有这些。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所提出的控告你听明白了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的，听明白了。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部分地承认。

No 1168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费费尔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8日)

费费尔：我生于什波拉镇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没有钱供我上学，所以我是自学出来的。我在这个镇上一一直居住到1922年，然后在1922年搬迁到基辅，开始从事文学工作。在基辅我没有干过反苏活动，而且相反，我认为我是首先开始写红军，写党，写共青团的犹太诗人之一。

我证实，1917年我加入了“崩得”，在其中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一个传播犹太文学的不大的小组，大的事情我当然没有参加过。情况是这样的，我本人在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那儿就有一个犹太人小组。当时我对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很满意，所以我在19岁上入了党。

我从1918年年中开始写作，1920年我结识了犹太民族主义者贝格尔森、霍夫斯坦、克维特科。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表现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诗里边。我当时认为，应当更多地书写苏联的现实，1922年我出版了自己写俄罗斯的诗。

审判长宣读供词（卷2，案卷页46）。

费费尔：事情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反苏情绪，贝格尔森和霍夫斯坦在他们的作品里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在编入第一个集子的诗里边我并没有民族主义情绪。我写了组诗《俄罗斯》。我的民族主义基本上表现在情绪上和关于对同化不满的谈话中，而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同化的事实表现在大量关停犹太人的学校上，在1930年期间封闭了许多犹太人的报纸、机关和学校。这使我感到很气愤并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即我同卡扎诺夫、贝格尔森和霍夫斯坦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

举办乌兹别克艺术旬的时候，我看得羡慕极了。我出版了30来本书，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反映在书里边，我的情绪是民族主义的。我使出全部的力量去维护犹太人的机构。犹太文化研究所被封闭后，和霍夫斯坦提出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属下设立犹太文化研究室的问题。我千方百计地努力要使已被封闭的犹太人机构恢复起来。我还必须说，我不得不常常去反对其他一些仇视犹太文化的现象。我写过几篇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的文章。我特别是同费尔德曼进行了斗争。

我从未被开除过党籍。1929年我经历了清党，就是1933年也没有被开除出党。

关于我的经历我就想说这些。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反苏的文章。相反，我的文章都是符合苏维埃精神的，我写了一些歌曲，过去为人们传唱，至今也还在唱。

我妻子因为没有进取精神而被开除党籍。

审判长宣读供词（卷2，案卷页52）。

费费尔：因为我非常喜爱犹太传统，我去过几次犹太教堂。不能说我是定期去教堂，但我们同犹太人宗教团体有联系。

在委员会成立之前，我的情绪有过民族主义的波动。1942年我被召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是爱泼斯坦用洛佐夫斯基签署的电报把我叫去的。我于1942年4月到达莫斯科，被委任为《埃尼凯特》报（《团结报》）副编辑。可以说，此报从最初的几期开始，就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办这份报纸的工作上我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我们登载讲述犹太人的英勇精神的材料，刊登是应当

的，但是我们把它同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割裂开来，就是说，我们单另有一本账。我们曾说过，必须单另进行统计，掌握有多少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英雄气概，好在以后有条件找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指出犹太人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从最初的几天起就开始记数牺牲的人。后来，这就成了写“黑皮书”的依据。我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就曾按照苏联情报局的指示同外国的报刊建立了联系，向那边的外国犹太人报刊寄发讲述苏联的犹太人、犹太人的英勇精神、他们参加国防工业生产的情形和一般的犹太文化的文章材料，特写和消息。

我必须说，大约是从1942年起，我们犹委会里开始谈论说，所有的犹太人机构，就连犹太人区里30年代期间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被撤消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克里木问题。这说的不是克里木的那些疗养院，而是战前曾设有3个犹太民族区的克里木北部地区。

我们当时彼此之间曾说过，若是在克里木建立起犹太共和国就太好了，于是我们根据爱泼斯坦的提议，当时就在这几个人之间分配了未来的犹太共和国领导人员的“部长职位”。

我认为在《埃尼凯特》报刊载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一点上自己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该报从开办的最初几期起，就已经在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了。

1943年初，我和米霍埃尔斯收到了去美国的邀请。赴美之前，我们同爱泼斯坦、洛佐夫斯基、谢尔巴科夫交谈了几次。苏联情报局领导要求我们在外国的刊物上登载尽可能多的材料。这说的不仅是要寄送有关犹太人的材料，还有关于苏联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方面的材料。洛佐夫斯基要求我们在美国不仅要同进步刊物，而且也要和资产阶级报刊达成协议，并试着把这些材料登在资产阶级报刊

上。另外，还要求我们同犹太资产阶级组织建立联系，以争取物质上的援助。

审判长宣读费费尔在预审时所做的供述（卷2，案卷页59）。

（审判）长：有这样的事吗？

费费尔：是的，有。在我们临去美国之前的那次谈话中，洛佐夫斯基指示我们同资产阶级分子取得联系，目的是从他们那儿弄钱满足战争的需要。

（审判）长：他们为什么要给你们钱呢？

费费尔：因为希特勒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由于害怕，许多犹太族资本家向援助犹太人同法西斯斗争基金捐出了大笔钱款，虽然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审判长宣读费费尔的供词（卷2，案卷页60）。

费费尔：关于洛佐夫斯基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鼓舞者，对该委员会的全部活动一清二楚，实际上就是领袖这一点，我在同洛佐夫斯基对质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述过了。没有一份文件是不经洛佐夫斯基签署的。我们没有一项答复是未经洛佐夫斯基同意并签署而发往国外的。我曾对爱泼斯坦讲过，我们必须发寄有关苏联犹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材料，以引起美国的犹太人的同情，并在此后战争结束时一起向政府提出问题。爱泼斯坦估计，如果我们能唤起美国犹太人的同情，那么就有希望获得对我们有用的物质支援。

我们还谈到，战后应该复兴犹太文化。同爱泼斯坦这样谈过，和洛佐夫斯基我没有提过这种事情。

（审判）长：从美国返回后，你们从洛佐夫斯基那里接受过什么指示？

费费尔：同富有的犹太人建立联系，以动员财力，就是征集更多的钱。但主要的是指示打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刊，以便在上面

尽可能多地登载我们有关犹太人参战，犹太人参加后方工作的材料，以及关于苏联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材料。

(审判)长：难道你们这个委员会的任务范围包括的只是寄送讲述犹太人的，而不是讲苏联人民的材料吗？

费费尔：给委员会定下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成一个整体，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

到达美国之后，我们会见了魏茨曼，即现在的以色列国总统。我们曾被指示，只会见报刊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而不同政党的领袖接触，而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政党的领袖，因此我即报告了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把米霍埃尔斯召到华盛顿，对他说，有同魏茨曼进行接触的指示，然而莫斯科准许这样做的指令是会见魏茨曼之后过了两周才收到的。

在去美国之前，我和米霍埃尔斯收集了一批有关犹太人文化设施的材料，我还收集了关于农业，关于被疏散人员状况的材料。我们知道，到时候我们必须准备好作大型演讲。我们把这些材料带上了，出境时这些材料受到检查。因此，在边境我们被阻留了几个小时，材料被放行，但是从1945年的角度说，这是秘密，是国家的机密。

会见魏茨曼的时候，我们同他谈的时间不长，我们同他只见了一次面，他对苏联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持何态度很感兴趣。我们告诉他，苏联犹太人不会去巴勒斯坦，对犹太文化处境如何的问题，我们回答说，犹太文化的情况不好。然后我们给他讲了法西斯分子的残暴行径。魏茨曼对我们提出一个请求，若是我们能会见苏联政府的代表，就告诉他，如果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而不是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采取任何反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们没有给魏茨曼任何材料。

后来又会见了罗森贝格。我们同他只谈了一次，时间也很短，

因为他只能用英语谈话，而我们不懂这种语言。

罗森贝格是“卓因特”的领导人之一，一个家资百万的律师。“卓因特”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同罗森贝格的会见并不是我们提出的。“卓因特”给米霍埃尔斯寄来一封信，提出要给受战争之害的犹太人以资助，米霍埃尔斯获准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同“卓因特”商谈该组织代表不进入苏联，而经过红十字会向苏联民众不分民族地提供援助的问题。

罗森贝格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老是提出要求，而自己却什么都不干，如果你们能够提出犹太人迁居克里木问题，我们就向你们提供物质援助”。他说，“我们不仅是作为犹太人，也是作为美国人对克里木感兴趣，因为克里木这就是黑海，是巴尔干和土耳其”。没有直接谈到关于把克里木变成一个登陆场的话。

我当时没有弄清形势，醉心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追求，希望为犹太文化得以发展创造经济条件，认为在克里木北部建立犹太国是非常符合愿望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有罪的。

宣读费费尔的供词（卷2，案卷页67）。

（审判）长：他说过这样的话吗（指美国人对犹太人迁居克里木感兴趣）？

费费尔：是的，他讲过这个话。

在美国我们没有向任何侦察机关送任何材料，材料仅只送给犹太人报刊。我们同戈尔德贝格谈妥了寄送文章、特写、关于苏联经济的情报的事宜，没有谈到军事材料。

我们谈好要寄送美国人感兴趣的材料。我在预审时已经供出了这一情况，现在我对自己的口供加以证实。我们谈好要寄关于苏联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材料。我们没有谈寄送谍报性材料的话，可是后来却变成了连国家机密材料也寄。在侦查期间，我了解到有一份1945年的目录，从这个目录的规定考虑，我们是无权寄发这些

材料的。

(审判)长：哪些材料？

费费尔：载有关于工业、农业、文化的具体数据，特别是关于比罗比詹的新建筑工程和文化的材料的材料。

没有谈要寄送专门情报的话，但是战后洛佐夫斯基把委员会的领导人召集起来，指示要寄送更多的有关苏联工业和农业恢复情况的材料。根据这一情况，我也对自己的编辑们做了同样的指示。洛佐夫斯基让我们注意倾听美国人的约稿要求，并完成这些稿约。我一接手领导委员会的工作，便立即提出一切材料都要经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问题。

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向主席团委员和洛佐夫斯基通报了去美国的情况，委员会就开始向美国发送通讯稿件——文章和特写。我们经常收到美国资产阶级报刊领导人对稿件的预约，我就按预约寄稿。

我应当说，除开这一切之外，我们实际上把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并把它的职能加以扩展。

(审判)长：我们是谁？

费费尔：我，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扩展职能是希梅利奥维奇说的。马尔基什建议为被疏散的人提供帮助。希梅利奥维奇主张帮助那些从疏散地返回原地的犹太人。这都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出版“黑皮书”，我们也得到了洛佐夫斯基对出版“黑皮书”的同意。

所以我认为，委员会进行过民族主义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发寄过属国家机密的材料。

我帮助过戈尔德贝格收集他感兴趣的材料。

戈尔德贝格于1945年底来到莫斯科。委员会为他安排了一次招待会，有犹太族的代表出席。他会见了洛佐夫斯基。他还去见过

米霍埃尔斯。他还受到过洛佐夫斯基的接见。他要求为他安排去苏联各地，特别是去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旅行。格佐夫斯基答应给他安排这样一次旅行。后来，戈尔德贝格会见了希梅利奥维奇，马尔基什，泰乌明。

(审判)长：他在委员会和在苏联情报局收集过什么材料？

费费：他在苏联情报局获得了关于对外政策、新民主国家的状况及苏联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态度的材料。在委员会得到了工业恢复情况的材料。旅行时，他询问过各种企业的情况。

旅行时他还有过几次交谈。他同拉齐斯谈过话，同爱沙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谈过话，向他询问过爱沙尼亚工业和农业恢复的情况。在敖德萨同犹太人宗教社团主席交谈过。这样，他就收集了有关工业和农业，以及文化的材料，在乌克兰同犹太人宗教社团主席谈了话。

(审判)长：你知道女证人戈尔季延科供述的内容吗？她提到了戈尔德贝格，说他曾给她布置谍报任务：收集各种谍报材料。可她不过是个乌克兰人，还不是犹太人呢。

费费尔：我没有见过她。

(审判)长：但是你读了她的供词。从中可以看出，她曾接受过谍报任务。

费费尔：我感到惊奇，他认识那么多犹太人，有什么必要去同她商谈？

(审判)长：可你是知道的，她同戈尔德贝格有暧昧关系，所以他就利用了她。由此可见，戈尔德贝格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旅行是在苏联收集谍报材料。

费费尔：是的，从1945年发布的目录看，他是在收集有关工业和农业的谍报性资料，也收集有关犹太文化的资料。他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曾经供说，戈尔德贝格曾给犹委会提出加强收集我国经济方面的材料的任务？

费费尔：是的，他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我们也给他寄了这样的材料。在委员会存在的期间，我们总共向国外寄发了约2万篇文章和特写。

(审判)长：你在供词（卷2，案卷页89）中说，这个问题是以罗森贝格的名义向你们提出的。

费费尔：从在美国同罗森贝格的谈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指示，因为我们同他商定，我将和新民主国家的犹太人取得联系，以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且寄送有关苏联经济和农业的材料。

(审判)长：接到这些关于在苏联扩大收集情报的指示后，你们在委员会系统是怎样从组织上落实的？

费费尔：我们向地方组织派出了几名记者，他们写了些关于苏联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特写和文章，这些材料送到委员会的编辑室，经编辑室加工修改，再送审编部进行检查，然后就寄给美国的报刊。1946年之前，这些材料是经大使馆寄送的，后来是邮寄和用电报发。1945年以前，办理寄发手续除我们的签证之外，再不需要任何别的签证。爱泼斯坦在世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接手工作的时候，我宣布，不经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准许，一份材料也不能往外寄。此前爱泼斯坦加盖的是自己的签证，当时，苏联情报局还有军事检查员。不管怎样，在我主管的时期所有的材料都一定是经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检查之后才能通过。

(审判)长：现在说克里木问题。你们从美国回来之后，你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费费尔：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克里木问题是这样提出的：我对几位主席团委员说，在同罗森贝格谈话时，他曾许诺，若是在克

里木组建一个犹太共和国，“卓因特”就给以物质援助。我们已经知道，从克里木迁出了一部分人，将会提出向克里木移民的问题。我们决定，在同政治局的一或两位委员谈过之后再写信，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写信之前我们请求维·米·莫洛托夫接见。他接见了我们（我，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接见时，我们和其他问题一起提出了在克里木或是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共和国原来的所在地区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原来是德意志共和国的地方，现在应当是犹太共和国”，这种提法我们当时很喜欢，听起来也很漂亮。莫洛托夫说，这从人口学的角度说是很好听，但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和在这个地区建立犹太共和国，因为犹太人都是城里人，不能让犹太人去开拖拉机。莫洛托夫接着说：“至于说克里木，你们写封信吧；我们考虑一下”。在这之后，我们同洛佐夫斯基商议了一下，和尤泽福维奇、希梅利奥维奇也商量过，还把信的草稿给马尔基什看过。信的本文，你看，写得不好，我们在其中表露出来的心理多于思想。就其实质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图，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有罪。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讲一下莱温是个什么样的人。

费费尔：莱温是曾存在于美国的战时援助俄罗斯组织犹太人委员会的前主席。他本人是个房主，在纽约的黑人区拥有大约20栋房屋。我在美国同他见过两次面。不管怎样，这是重复我在侦查时已经说过的事。

审判长宣读被告的供词（卷2，案卷页68）。

费费尔：同莱温是谈过话，但记不得具体谈了些什么。他曾说，他对很少能听到苏联犹太人的消息很不满意。确实，在犹太会成立之前外国报刊上没有任何写苏联犹太人的东西。他接着说，苏联的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当然，这是指他们受到同化。莱温的谈话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我们告诉他说，现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

员会将定期向美国寄送关于苏联犹太人，关于他们的工作和活动的报道，文章和信息。

在美国我们还会见了戈尔德曼^①。戈尔德曼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加入该代表大会的有各种政党的代表，这个委员会在所有各个国家都设有分会。

寄送材料的问题我们是同报刊界的代表谈的。

(审判)长：讲一讲诺维克访问莫斯科的情况，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费费尔：诺维克是1946年9月底到达莫斯科的。

(审判)长：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费费尔：他是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自由晨报》的编辑。他到这里来的身份既是报纸的编辑又是报社的记者。

宣读费费尔的供词（卷2，案卷页92）。

(审判)长：这些就是你的供词吗？

费费尔：是的，这是我的供词。诺维克是间谍，这我并不不知道，不过，既然他收集有关工业、农业和文化的材料，同各种各样的人多次交谈，我根据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一些规定，把他的活动说成是间谍活动。我以前对间谍情报抱有一种最为庸俗的观念。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对这些东西的看法是错误的，对这些东西理解得不对头。况且我还知道，诺维克出了很大一部书，把他在苏联收集到的材料全用到这本书里了，他在书里把苏联描述得很好。

(审判)长：现在我们回到委员会本身的工作上来。从你的供词看来，你们从美国回来以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敌对

^① 瑙姆·戈尔德曼（1895～1982），犹太复国运动的首领，曾任犹太通讯社伦敦执委会委员。1944年在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上提出惩处有迫害犹太人罪行的纳粹分子的全面纲要。

活动加强了，一方面是往美国寄送各种各样的经济情报，在苏联各地收集这种情报，另一方面是由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对超出委员会本身职能范围的民族主义活动问题进行讨论。你讲一讲这个情况。

费费尔：我们从美国返回时，正好赶上委员会从古比雪夫迁至莫斯科。委员会在莫斯科扩展了自己的活动。第一，在这里讨论了有关克里木的问题——一种民族主义的措施。其次，举行了委员会的群众大会，全体会议。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在爱泼斯坦、米霍埃尔斯和我做的报告中，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高。对犹太人的英勇精神讲的很多。另外，委员会还收到许多来自地方的信件，对地方机关的压制的控诉。我们把这些材料全部收集起来，进行了归纳概括。

（审判）长：什么材料？

费费尔：说犹太人疏散归来得不到安排工作。

克维特科接受犹太委会的任务去了克里木，看一看那儿出现了什么情况，战前那儿曾设过3个犹太民族区。

此行之后，克维特科报告说，在地方上有当地政权机关阻挠犹太人返回的情况，有许多犹太族集体农庄庄员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得不到帮助。

犹太委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见农业人民委员别内迪克托夫^①。代表团由希梅利奥维奇、米霍埃尔斯、古别利曼^②、克维特科组成。别内迪克托夫接见了他们，答应对这事进行调查并给以帮助。

我们收到几封来信，说美国的赠品在地方上分配得不够恰当，很多犹太人从犹太人区回来，得不到帮助。就此事给国家监察人民

① 伊·亚·别内迪克托夫（1902~1983），曾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② 莫·伊·古别利曼（1882~1968），老党员，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曾任国家商业工作者中央委员会主席。

委员写了信，也接到了波波夫的答复，他说，信中所说的一切都检查过了，委员会掌握的资料与实际不符。

所有这些都不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之内，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委员会的职能。其实，做这些事情的与其说是委员会，还不如说是米霍埃尔斯本人。他办理了个别犹太人的户口登记问题，写信要求为他们安排工作，等等。这样一来，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事务性机关。

(审判) 长：在你们委员会里，是不是不只讨论苏联内部的形势问题，也讨论国外的局势问题？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不只讨论过与苏联的犹太人生活有关的问题，也讨论过同国外的犹太人生活相关的问题？有这种事情吗？

费费尔：英国法西斯分子的首领莫斯利获释后，在英国的犹太人区实施了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这事发生在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我们认为有必要表示抗议并让英国知道一下它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我们就给英国的工会写了一封信。

(审判) 长：什泰恩对此是怎么说的？她仿佛是拒绝了在这封信上签名。

费费尔：不，她签了名，只不过她说了一句，应当核对一下事实，看看是否符合实际。

(审判) 长：意思是不是说，应当再看一看，暴行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吗？

费费尔：不知道，我没有看出这样的意思。她建议核实一下是否真有暴行这回事，因为我们对莫斯利和英国保守党人竟然能干出这种事做出的反应是很强烈的。

审判员：犹委会给魏茨曼发过贺电吗？

费费尔：是的，1948年夏发的。

审判员：因为什么事情？

费费尔：我们发贺电是由于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而且我必须说，我们拟好贺电草稿拿给外交部副部长佐林看，他看了一遍，说：“我和领导商量一下”，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时，他说贺电可以发，他只改了其中的一句什么话。

审判员：卷宗里有供词说，米霍埃尔斯带了圣经去的美国。这是为什么？

费费尔：圣经不光是信教的人读。我们必须对一些落后的听众讲话，他们可能不理解我们的反法西斯宣传，有时候就不得不依靠圣经上的语言。所以他带上了圣经，而且必须说，在那里圣经真用上了。圣经是犹太文化最伟大的文献之一。

审判员：你在一次审讯时曾供述，据说什泰恩曾呼吁对党及苏联国家的民族政策积极进行斗争，她曾说过，苏联不是她的祖国。

费费尔：一次我请什泰恩为纪念十月革命的周年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回事。她问道，写什么题目，我回答说，写我们的祖国，苏联。她说，这不是她的祖国，她出生在波罗的海沿岸，而且不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

(审判)长：在同什泰恩对质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做过供述(卷31，案卷页438~451)。

费费尔：关于什泰恩就英国发生的蹂躏犹太人事件所说的话，我已经讲过了。除此而外，什泰恩常在主席团多数委员出席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说在苏联犹太人受歧视。

(审判)长：你接着供说，在犹委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报告犹太人参加游击运动的时候，什泰恩声言：“你怎么老是说德国人，你说一说白俄罗斯人是怎样协助德国人来消灭犹太人的”。她发言是这么说的吗？

费费尔：什泰恩说的这些话已记在犹委会会议的速记记录中了。

(审判)长：接下去你供说，在讨论《苏维埃政权给了犹太人什么》这本小册子的问题时，她提议写上犹太人给了苏维埃政权什么。

费费尔：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反对。

(审判)长：你接着供道，针对你提出的写一篇《我的祖国给了我什么》的文章的建议，什泰恩声明说：“……苏联不是我的祖国”（卷31，案卷页445）是这样的吗？

费费尔：她确实是回答说，“这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波罗的海沿岸”。

审判员：这是哪一年的事？

费费尔：1947年。

审判员：看来，说的是苏联了，立陶宛不是已经包括在苏联之内了吗？

费费尔：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审判员：米霍埃尔斯曾把一块金表交给了德拉贡斯基，有这回事吗？

费费尔：有这回事。那表是戈尔德贝格带来的。

下面法庭详细查问文稿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人员之手转交到外国通讯社的方法及文章披露的材料机密程度。

审判员：编写“黑皮书”的材料是怎样收集起来的？不准你们出这本书，可书还是在美国出版了。

费费尔：那时爱泼斯坦还在。

审判员：你说一切都是办了合法手续的，并且是通过官方机构转寄的。那些材料究竟是怎样寄出的呢？

费费尔：所有东西都在1944年，还在发出禁令之前就寄走了，

是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寄出的。葛罗米柯有一份电报，说“黑皮书”将不含我们的材料，在美国出版。电报是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的。爱泼斯坦根据这种情况，在1944年把全部材料寄到美国去了。最后我想说，我非常清楚全部的责任，因为爱泼斯坦死后，我应该对一切负责。我只有一点希望，就是法庭弄明白此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依据法律把这件事审理清楚。有的事是我做的，我不会推卸对这些事应负的责任。

审判员：洛佐夫斯基了解反法西斯委员会日常活动的一切细节吗？

费费尔：我想，这样说太过分了。因为他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可以这样说，洛佐夫斯基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没有一项要求是他不知道的，没有一条消息是不留复制件就发出去的，我们没有一封复信是不经洛佐夫斯基签署就往外发的。所以说，他对我们作答的材料是了解的。他没有亲自参与，但是他都了解。而且洛佐夫斯基指导我们进行犹委会的活动，指示要使事实具体化，所以在外国人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洛佐夫斯基对情形是清楚的，我们都和他商议。可以说，在总体上他领导并指引着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的事项都是了解的。他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变成了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委员会在进行民族主义活动。

审判员：你在自己的供词里说，他不仅是委员会一切行动的领导者，而且是一切行动的鼓舞者。

费费尔：大家都找洛佐夫斯基商量事情，是他指引着工作的方向。

肯定地说，洛佐夫斯基是倡议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人之一，积极参与了“黑皮书”的编写工作。

(审判)长：结论是洛佐夫斯基不仅领导着犹委会的工作，而且引导着民族主义活动。

费费尔：是的。

(审判)长：你知道，对向美国送交的间谍情报进行了鉴定，1月30日开出了鉴定书。随意取检了78份文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英国方面向反法西斯委员会要求的内容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机密……

你了解这份鉴定书的内容，同意它的结论吗？

费费尔：基本上同意。但是我必须说，体现美国报刊要求的文件并不典型……

(审判)长：你这就同自己的供词矛盾了。1946年你就已经理解到，这是要求提供间谍情报，可现在你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费费尔：我本来不明白间谍情报是什么性质的，我对这个观念很淡漠，当提到陆、海军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是1947年的事。

我没有想到，我发出的请求告知犹太人机构名册的电报会使美国的侦察机关感兴趣。如果把其他委员会发出的材料全部审查一遍，会发现这种性质、这样一类的材料数量也不在这之下。

(审判)长：你说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中心。除这个委员会之外，还有哪些犹太人机构曾经协助这样做过？

费费尔：除委员会之外，还有：

犹太剧院，它好像是一个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讲坛。犹太剧院上演的剧目中有好些包含民族主义的情节。

(审判)长：剧院上演的剧目包括哪些戏剧？

费费尔：古典犹太戏剧中有肖洛姆·阿莱赫姆的剧作，演出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及现代作家的一些戏剧：布罗德宗的《节日前夜》，我写游击队员的戏《太阳不落》也演过，我在那部戏里犯

过民族主义的错误，把犹太人同德国人对立起来。后来演了……^①的《潜水艇长》。《弗烈伊列赫斯》这部剧是各种民俗题材的混合物。这部有各种古老仪式的戏剧瞄准的是被看做“黄金的往昔时代”的古代。米霍埃尔斯是这个剧院的艺术指导。

《埃尼凯特》报，它发表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材料。我个人在这家报纸上发表过大约150篇抨击性的文章。这些抨击性文章主要是反对反动势力和战争贩子的。

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那里举办一些朗诵民族主义作品的晚会。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知道对委员会和它的参加者所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活动问题的鉴定书的内容吗？进行鉴定的人员是谢尔比纳，叶夫根诺夫，卢金和弗拉德金。你认为这几位鉴定专家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吗？

费费尔：我认为这几位专家的专业水平比1952年1月20日给材料的机密性做结论的那些专家要高。

(审判)长：你就是根据这份鉴定书受到审问的。你认为鉴定结论是正确的吗？

费费尔：总的说来当然是这样的。但问题是有个别的小的地方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总地说鉴定是正确的。

(审判)长：鉴定的结论指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委员会不仅宣传了民族主义观点，而且还对此工作进行了领导。这具体的表现是：在所分析的这些文件中有鼓吹犹太民族特殊性的论题，歌颂了圣经形象，宣传对犹太人采取以同一血统为特征的阶级态度。这些在外表上用苏维埃的口号掩饰起来，而实际上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偷换成了世界主义。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费费尔：没有讲世界主义。

(审判)长：我是引证鉴定书的说法。

费费尔：不能说全部的活动都被换成了民族主义的。委员会寄出过很多好文章，不过其中也有民族主义的。

(审判)长：你对委员会活动的这一个方面有什么供述？

费费尔：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做过供述了。我说了克里木的问题，说了不分阶级向全世界犹太人呼吁的问题。

№1168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费费尔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9日)

审判员：讲一讲你的活动，你写的文章，你是怎样颂扬民族主义的。

费费尔：我必须对法庭说，如果说在我的社会活动中有很严重的民族主义成分的话，那我的创作却极少牵涉这个问题。我的创作没有这方面的缺陷。我有个别的民族主义错误。例如，这里举出来的那首诗《我是一个犹太人》，此外还有那么两三首类似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诗。

(审判)长：你为什么认为这是错误呢？你以前曾经说过，你接受的是民族主义精神的教育，特别是在30年代之后，你的主旨是反对同化犹太人的斗争。这不是错误，这是路线。

费费尔：在谈我的社会活动时，我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供述，至于谈到我的创作，我是最早写苏维埃祖国、红军、顿巴斯、第聂伯河建设工程的犹太诗人之一。至于我的活动，我把它看做是委员会的工作。

(审判)长：可以作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又写苏维埃精神的作品吗？

费费尔：不行，在诗歌上这是办不到的。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诗是心灵的镜子。我写心灵揭示给我的东西。我出了近30本书。我的民族主义情绪归结起来是什么呢？我说过，我爱自己的人民。有谁不爱自己的人民呢？我希望看到自己的民族和所有其他的民族

一样。可当我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个个封掉，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个个撤销的时候，我非常痛苦，这就驱使我去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也让我对克里木和比罗比詹感到关切。我觉得，只有斯大林方能纠正罗马皇帝做下的历史上的那件不公正的事。我觉得，只有苏联政府才能纠正这件不公平的事，缔造一个犹太民族。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苏维埃制度，我是一个穷教师的儿子。是苏维埃政权把我培养成人，培养成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的。

(审判)长：你在你写的诗里使用的是某些远古的形象，比如：“参孙的头发”，“巴尔·考奇巴的号召”，“经师阿基维额头睿智之纹”，“圣经中的伊萨亚预言的智慧”，“我们神奇的智者所罗门的思想”，等等。这里边的苏维埃人的文明在哪里呢？

费费尔：我必须说，在任何一个民族的遗产中都有许多智慧。我不认为，我们必须把所罗门拒之于门外。和这一首民族主义的诗性质相近的还有2~3首，而且这是1941年的。然而，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沾了斯大林的光，并且断言，斯拉夫人是我们的朋友。我的诗追求的就是我们要在希特勒的坟墓上欢舞。

我说的是我在纽约群众大会上的那次演说。在讲话中我举出波克雷什金作为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可以看一看这个演说。它不是很成功的。可以讲得再好一些，因为归根到底保卫莫斯科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审判)长：你毕竟还是在宣传一种非常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最重？

费费尔：是的，我认为，落在犹太人头上的苦难是非同一般的。

(审判)长：难道说在卫国战争中只有犹太一个民族受苦受难？

费费尔：是的，你再也找不出像犹太民族那样饱受如此深重苦难的民族了。1800万犹太人中被毁灭了600万——三分之一。这

是很大的牺牲，我们有权挥洒泪水，我们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

(审判)长：这不是被用来挥洒泪水，而是被利用进行反苏宣传的。委员会变成了民族主义斗争的中心。

审判员：在进行侦查时你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工作做了更为具体的评价。

在第46卷第37案卷页上记载着，犹委会进行了民族主义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混到一起，变成了民族主义中心。这对吗？

费费尔：对的。

(审判)长：这是鉴定记录。

费费尔：我认为，这与我的供词并不矛盾。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说过，你们必须在委员会的掩护下把苏联所有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并更加紧密地联系国外的犹太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费费尔：他曾说，必须利用委员会来推动犹太人贴近犹太文化，把犹太人团结在委员会的周围，并同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为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

审判长依据费费尔在预审过程中所做的供述，请他评说一下马尔基什及克维特科，讲一讲克维特科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组长的活动。

(审判)长：你知道别济缅斯基就犹太组的活动所做供述的内容吗？

费费尔：这不是供述，是歇斯底里的狂叫，我不认为这是供述。他没有供出一个事实。他改供词和他的创作一样平庸。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被传唤到安全部害怕了。他的供词矛盾百出。他根本不懂。他虽然也是诗人，但不懂诗。

(审判)长：你不同意他的供述，但是这个苏联作家协会犹太

组一直到最近都在进行民族主义的活动。

费费尔：我对此已经做了供述并举出了很多事实。克维特科和犹太组支部委员对此负有责任。

此后，审判长请费费尔评说一下希梅利奥维奇，并提出，在预审时费费尔曾说过，“希梅利奥维奇是委员会里最富进攻精神的成员之一”。

费费尔：这都是对的。我主要是指克里木问题，因为呈送政府的信件的几份草稿中有一份是由希梅利奥维奇拟的。把这份草稿拿给洛佐夫斯基看时，他说这份草稿有民族主义倾向，就把它淘汰掉了……

我们致魏茨曼的电文——对以色列国成立的贺电——发表后，希梅利奥维奇对电文只刊登在犹太报纸上表示不满。他常常表现出这样的不满。

(审判) 长：卷 2，案卷页 53 上所记你的供词对不对？

费费尔：我这是转述米霍埃尔斯的话。米霍埃尔斯曾对我说，包特金医院是一块“世袭领地”，那里的工作人员，由于希梅利奥维奇的努力，多数是犹太人。

(审判) 长：接下来，在卷 2，案卷页 144 上你供称，在犹太人中间散布反苏情绪问题上，希梅利奥维奇出了很多的力，他经常的话题就是苏联的反犹太人主义，他对联共（布）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讲过污辱性的话。

你的这些供述都是对的吗？

费费尔：说散布反苏情绪，我指的是希梅利奥维奇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说过，在个别单位里边医生中间也有反犹太人的思想。什泰恩也说过这样的事。

(审判) 长：希梅利奥维奇是米霍埃尔斯的朋友。你说他是米霍埃尔斯在委员会里做民族主义工作的首席顾问，是这样的吗？

费费尔：我已经说过，我同希梅利奥维奇几乎没有见过面，不过我知道，米霍埃尔斯常这样说：“……应当同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商量一下”，在需要拟一份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信件草稿时，他就请了希梅利奥维奇来做这件事。

(审判)长：你直截了当地供认，希梅利奥维奇是米霍埃尔斯的首席顾问。

费费尔：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的，因为没有什么人同米霍埃尔斯的关系像希梅利奥维奇那样亲密。

费费尔评述的下一个同案被告人是尤泽福维奇。

(审判)长：你对尤泽福维奇的民族主义活动都了解一些什么，你同他相识很久了吗？我想要审查一下你的供词，因为法庭的任务就是这样的。

费费尔：我很难从一个话题突然调转过来去谈另一个话题。我以前的供述都是正确的。可现在我有可能漏掉一些事情，忘记一些事情。我以前所做的评述是正确的。

苏联最高法庭军事审判庭于12时25分继续开庭。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在预审时曾供述了贝格尔森的民族主义活动。现在在法庭上你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要说的？

于是费费尔再一次重述了预审中侦查员对费费尔“做工作”时他捏造出来的那些谰言。

评述过贝格尔森之后，接着又对霍夫斯坦、瓦坚贝格夫妇做了同样的评述。

在审问的过程中，出现了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由苏联的犹太人组建专门部队的建议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

(审判)长：怎么，当时就已经出现了组建军队的问题吗？

费费尔：在委员会内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罗加切夫

斯基的一份申请书，他建议组编一个师，派赴巴勒斯坦去反抗阿拉伯人的强霸势力。

(审判)长：可是别的人也曾向你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德拉贡斯基也说过这件事。

费费尔：是的，德拉贡斯基说过这件事。可是说这件事的不光是犹太人。伊万诺夫上校也来找过我们，说他也想到巴勒斯坦去。我答复他说，我们不管这些事。

霍夫斯坦是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持消极态度不满的人物之一……

霍夫斯坦有民族主义情绪。应当说，他因诗歌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受到的批评最多，乌克兰苏维埃作家协会也对他的这种倾向进行过批评。霍夫斯坦提出过学习古犹太语的问题。

(审判)长：学习古犹太语是反对犹太人受同化的斗争措施之一吗？

费费尔：古犹太语现在已几乎不用了，这是一种口语，这是一个大的复古行动，这是圣经语言。在巴勒斯坦人们谈话使用这种语言。霍夫斯坦曾表现出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

(审判)长：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吗？

费费尔：是的，他在几部作品集、一些诗里歌颂各种各样的“伟大的犹太人”。

(审判)长：霍夫斯坦是委员会的成员，但不是主席团委员吗？

费费尔：是的，他是给委员会积极撰写稿件的人员。他写过诗和几篇特写。

(审判)长：你没有同他谈过民族主义这个话题吗？

费费尔：我们没有谈过民族主义的话题。谈过关闭学校的事。1948年夏天，霍夫斯坦来到委员会，他非常激动，斥责我，说我胆小，没有勇气。使他不满的是委员会完全不参与建立以色列国、

与阿拉伯各国进行斗争的活动。

(审判)长：他提出了什么建议？

费费尔：什么建议也没提。当时国外正在反巴勒斯坦募捐。我们的意见是，既然巴勒斯坦有很多德国法西斯分子，而由于我们是支持以色列国并主张实施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不进行募捐。

(审判)长：这是谁的意见？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吗？

费费尔：不是，委员会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审判)长：那你认为这一切同霍夫斯坦有什么关系？

费费尔：在这个时候好多犹太大学生来找我们，表示对我们的消极态度不满。但是我们，说实在的，不经上级机关准许什么也不能做。霍夫斯坦在情绪上和这些人是相通的，他说我们态度消极，什么事儿也不做。当时他出版了一卷本的诗集，他就给这本诗集加上了表示对我们的消极态度和没有给正在进行斗争的犹太军队以援助不满的题词。

(审判)长：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谈犹太剧院。你在接受侦查时曾说，它还是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撑点（卷2，案卷页250）。

费费尔：我昨天说到了该剧院的民族主义剧目，上演过《节日前夜》，《佐里亚·别连科维奇》，《兰佩林济国王》，等等。在整个这件事情上米霍埃尔斯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是作为剧院的一名演员和艺术指导，而且是作为一位为发展犹太文化付出了大量劳动的人。犹太剧院是使犹太人接受犹太文化的重要杠杆。

(审判)长：看来，近年米霍埃尔斯上演了许多民族主义的剧目。

费费尔：他上演了一些戏。

(审判)长：他曾对你说过，剧院是一个天天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讲坛。他说过这话吗？

费费尔：说过。他曾说，剧院是让犹太人接触犹太文化的主要杠杆之一。

(审判)长：他做这些事的助手是祖斯金和菲什曼（剧院院长）吗？

费费尔：这两个人是他管理剧院的助手，既然剧院进行民族主义的活动，那么在这方面也是的。我知道祖斯金是这个剧院最活跃的演员，可以说，他主要是干演员的事情，但对上演的剧目他也分担有责任，因为他和米霍埃尔斯共同安排上演戏剧。

(审判)长：讲一讲委员会同莫斯科和美国的犹太教经师院的关系。

费费尔：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犹太教经师院的代表拜访了我们。经师恩施泰因和另外两个人请我们同莫斯科的协会联系。他们当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答应帮助他们同莫斯科宗教协会建立联系。在莫斯科我们同经师院的代表施利费尔和乔布鲁茨基进行了交谈，并向他们转交了自美国带来的信件。乔布鲁茨基声称，他将去莫斯科市苏维埃谈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问题。

(审判)长：你们有什么必要参与这件事呢？他们找委员会谈过这些问题吗？

费费尔：乔布鲁茨基和施利费尔同米霍埃尔斯的关系特别密切，施利费尔找了米霍埃尔斯，米霍埃尔斯帮助他校订了他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词，这份演说词后来发表在《真理报》上……

(审判)长：施利费尔找过你吗？

费费尔：是的，是关于我们从各个国家收到的大量图书的问题。我们自己也常去找施利费尔和别的经师们。

(审判)长：你本人去过经师院吗？

费费尔：我到犹太教堂去过2~4次。我第一次去是1945年3月14日，第二次是和诺维克一起去的。后来我和贝格尔森去听了

一次亚历山德罗维奇演唱宗教歌曲的音乐会。还有一次我去是因为我正在写一部关于1917年的剧。

(审判)长:施利费尔找过你谈别的问题,特别是他向委员会咨询过犹太教堂接待梅尔松传教士团的问题吗?

费费尔:他就此事来找过我,但是我让他去外交部找莫洛奇科夫了……

(审判)长:(卷27,案卷页22)证人加尔金的供词你是知道的。他评判说委员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他讲道,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是一些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如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布雷格曼,尤泽福维奇,贝格尔森,等等。他讲,什么问题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都要同洛佐夫斯基协商。他说的对吗?

费费尔:一切同委员会在国外和国内的活动有关的问题,以及重要的措施都和洛佐夫斯基商议过。

(审判)长:对贡塔尔的证词你能加以证实吗?(卷28,案卷页21~22)

费费尔:我和贡塔尔进行过对质。

(审判)长:你揭发他进行反苏活动,他也揭发你有这样的问题。

费费尔:说的都是一回事,对犹太民族的同化和歧视。在这一方面他的证词是对的。

对费费尔的审问时间拖得很长。费费尔完全承认了侦查员指控他的全部罪名。对他的审问从此案审理的第一天,即5月8日开始,5月9日上午开庭又进行了一上午。费费尔实际上成了被控告的主要人物,因此,按照这次所谓审理的组织者的意图,对他的审问应当成为此案审理的关键部分。对费费尔的审问必须为整个审理过程定下基调,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

现在对费费尔的审问结束了，其他的被告人可以向他提出问题了。

(审判) 长：被告谁有问题问费费尔？

洛佐夫斯基：我有。1946年8月1日，整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从苏联情报局系统中除名。在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查封前的29个月中委员会是由谁领导的？

费费尔：委员会被切断同苏联情报局的关系后，委员会受党中央对外关系部的领导。

洛佐夫斯基：没有这么一个部，只有对外政策部。

费费尔：可能的。直接领导委员会的是苏斯洛夫，后来是巴拉诺夫。

洛佐夫斯基：不是波诺马廖夫^①吗？

费费尔：不是，他是在这之前的。后来由帕纽什金^②领导。

洛佐夫斯基：是谁准许你花费4万卢布为诺维克举办宴会的？

费费尔：事情是这样的，所有这些事情我都不管，有一个主管各委员会事务的主任尼基京，他编制预算，拟写这种事情的呈文，并同联共（布）党中央对外政策部协商这种事。

洛佐夫斯基：侦查材料中说，是苏斯洛夫准许的，是这样的吗？

费费尔：我不知道他是否准许过这件事，然而诺维克去乌克兰旅行是苏斯洛夫准许的。

洛佐夫斯基：办《埃尼凯特》报是谁支付钱款，核准人员编

① 鲍·尼·波诺马廖夫（1905~?），曾任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局副局长，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局副局长。

② 帕纽什金·亚·谢（1905~1974），曾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局第一副局长，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秘书长，苏联驻美国、驻中国大使。中文名字是潘友新。

制，任命编辑，进行监督的，苏联情报局及我本人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费费尔：不，这份报纸的产业是独立的，它是委员会的机关报，但这是形式上的，而实际上该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新闻出版部。报纸每一期的计划都送中央这个部。核准人员编制和预算的也是这个部。这份报纸形式上是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而在监督方面，一切事务都由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和联共（布）党中央新闻出版部领导。

洛佐夫斯基：我和报社有没有什么关系？

费费尔：不，没有。

洛佐夫斯基：你和米霍埃尔斯什么时候对我说过，犹太人移居克里木问题令美国政府感兴趣，美国政府允诺在这件事上给犹太人以援助，以便在那儿建立一个登陆场的话吗？

费费尔：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供述。若是我对洛佐夫斯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在预审和法庭上我是会供述出来的……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在供词中说，去美国之前他和米霍埃尔斯曾在莫斯科拜会过谢尔巴科夫，谢尔巴科夫给了他们一些指示。我请求他再重述一遍，谢尔巴科夫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指示，谢尔巴科夫的指示和我的指示有什么矛盾。第二点，我对他们是否说过，在美国对广大群众演说时，必须强调苏联拯救了几十万人免遭希特勒强盗的祸害，他们必须坚持开辟现在还没有开辟的第二战线是必要的？

费费尔：我没有想去回忆这些……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在问，他和谢尔巴科夫两个人的指示有没有分歧，如果有，是什么分歧。

费费尔：我现在来回想一下。我记得谢尔巴科夫对我们说过，

必须把材料分别刊登在美国的犹太人报刊上，必须扩大订户。关于物质援助的问题谢尔巴科夫和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是一致的。谢尔巴科夫更多的是要求我们必须宣传苏联各族人民的英勇精神和苏联在反击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的作用。洛佐夫斯基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因为至今在美国还不相信法西斯分子的残暴行径。他说，这一点一定得讲，还应当告诉他们，苏联拯救了许多犹太人。关于第二条战线的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相反，谢尔巴科夫曾告诉我们，关于第二战线什么话都不要说，因为我们有可能被逐出美国。

接下来提了几个有关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美国之行，美国的活动家戈尔德贝格 1944 年访问苏联的问题。

从费费尔的回答中弄清了谢尔巴科夫对犹委会代表团所做的指示同洛佐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基本上是吻合的。费费尔举不出事实说明洛佐夫斯基对戈尔德贝格持有一种似乎是特殊的态度。

洛佐夫斯基：我听说，费费尔在其供词中曾说，自美国回来之后，他们曾晋见莫洛托夫，谈及把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国人的地域作为可以让犹太人迁居的地区或克里木问题，据说莫洛托夫似乎回答说，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德国人的地域的事办不成，克里木的事你们写个报告，我们讨论一下，是这样的吗？

费费尔：是的，是这样的。

洛佐夫斯基：这事你报告侦查人员了吗？

费费尔：没有。

审判员：在第 2 卷第 286 案卷页上，你供述说，“1948 年，由于成立了以色列犹太国，委员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委员会接到不断打来的大量电话，人们也纷纷来到这里。

洛佐夫斯基几次给我打电话，想了解详细情形”。

下面接着说——“……犹太国的建立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

你个人对这一事件的高兴心情同洛佐夫斯基的电话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费费尔：一切都是我供述的那样：1948年夏天，很多人来找我们打听这个问题，洛佐夫斯基给我家里打了电话。犹委会主席团委员中间情绪出现激动；其中有些人指责我们在同以色列国联系的问题上胆小怕事。洛佐夫斯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给他做了解释。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评价这个事件的立场同葛罗米柯是一样的。我们完全同意葛罗米柯的看法。我们那里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的是另一种立场，他们对建立任何组织机构都抱极其敌对的态度。海菲茨把所有来委员会的人都记下列成名单，这件事他是受命办理的。确实，人们来到这里提出各种建议，比如，有人提出组建犹太师等等，我们让这些人全去找外交部了。

审判员：你说过，犹太国的建立对你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事。对吗？

费费尔：对，是这样的。这件事令我高兴，被墨索里尼的祖先从巴勒斯坦赶出去的犹太人重新在那里建立起了犹太国家。

希梅利奥维奇：你供述说，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据点是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讲坛的《埃尼凯特》报。你说一下，此报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大约是7~8年的时间，你能不能说出来，报上有过我的哪怕一篇文章吗？

费费尔：不，报上没有希梅利奥维奇的文章。

希梅利奥维奇：这就是说《埃尼凯特》报没有登过我的文章？那么你说一说，在委员会存在的整个期间向国外寄送过哪怕是一篇我的文章吗？

费费尔：我在的时候没有，以前我就知道了。曾经寄过一份致犹太人书或是《致海外的信》——那不是我在的时候。

希梅利奥维奇：几天前我得知，1946年出版了“黑皮书”。在反法西斯委员会存在的几年里，我跟这本“黑皮书”有没有过什么关系，我为它写没写过什么简讯，文章？

费费尔：据我看，没有人指控你这一点。“黑皮书”里没有你的文章。

希梅利奥维奇：有没有过出一本讲犹太英雄人物的书的设想，我是不是这本书编委会的成员？

费费尔：没有。

希梅利奥维奇：你来讲一下，昨天你曾申明，委员会一开始活动，你就被召至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团结一切犹太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可后来你的供词有一个地方说，倡议同美国各界犹太人建立联系的是希梅利奥维奇。你如何让这两处供述统一一致起来呢？

费费尔：确实，委员会承担了团结全世界的犹太人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任务。我不记得我曾说过是希梅利奥维奇倡议同美国各界犹太人建立联系的。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说过，希梅利奥维奇是主席团的一名很具有挑衅性的委员，是积极维护同外国的联系的……

希梅利奥维奇：在你的供词中，关于克里木问题你说，你和米霍埃尔斯回国后起草了一份克里木问题的呈文，同洛佐夫斯基商议并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把这份呈文送给了莫洛托夫。对质时你是这样说的。是这样的吗？

费费尔：是的，这份呈文我们不光送给了莫洛托夫，还送给了斯大林。

希梅利奥维奇：那么你是证实，是你和米霍埃尔斯写的这份呈

文，并在取得洛佐夫斯基的赞同后送给莫洛托夫的了？

费费尔：是的，是这样的。

希梅利奥维奇：对质时你曾说，这份呈文的内容米霍埃尔斯是应该通报给我的。在你的供词的第二部分你说，关于克里木问题由你、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起草了一份呈文，在努西诺夫家对这份呈文进行了讨论，有希梅利奥维奇参加，在这之后把呈文送交政府了。有没有过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讨论向政府呈送的有关克里木问题的呈文这回事？

费费尔：我们根本没有在私人住宅里聚会过。我们委员会的大楼很好，所有问题我们都是在那儿讨论的。在我们拟呈文的同时，米霍埃尔斯还委托希梅利奥维奇起草一份向克里木迁居犹太人的呈文稿。他提交了这份呈文。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讨论这一问题，但主席团委员们是了解这件事的。

希梅利奥维奇：请你说说，供词里边附有一份文件，说1949年由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签名的关于克里木的呈文送呈给斯大林了。那就是说，有两份呈文，是这样吗？

费费尔：是的，有两封信，一封寄给了斯大林，另一封寄给了莫洛托夫。

希梅利奥维奇：请你说一下，你的供词中说，热姆丘任娜出席了米霍埃尔斯的葬礼，前后有6个小时。据说她似乎讲出了自己对他的死的一些看法，你把这事告诉了我。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起过这件事吗，在葬礼上你把她指给我看过吗？

费费尔：我不记得我曾做过这样的供述。忘记了。

希梅利奥维奇：昨天，审判长就你对我曾有幸领导了18年的包特金医院所做的供述提出问题时，你曾说，那里的三千多名职工中几乎没有非犹太人，并且说，这是米霍埃尔斯告诉你的。你供词的另一个地方说，包特金医院里有50%的犹太人。50%的犹太人

和几乎完全没有非犹太人职工，这两者相差太大了。你的根据是什么，你认为该是多少？

费费尔：我不知道那里有 99% 还是 48.5% 的犹太人。这我很难说。但是我昨天说过，米霍埃尔斯在和朋友一块坐的时候，曾说过，医院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还说，希梅利奥维奇在这方面做到了占多数，他选定人员是带有一定倾向的。

希梅利奥维奇（对费费尔）：昨天你在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回答说，我曾就反犹太人主义攻击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你说只能记起一件事。这就是 1947 年底选举时，米霍埃尔斯没有被推举为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候选人，据你讲我当时似乎说过，这是波波夫干的，是反犹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我想问你——你是听我这样说的吗？是我对你说了这样的话还是另外什么人？

费费尔：我记得，这是事后过了一段时间，希梅利奥维奇在委员会里说这个事的。他曾说，这是波波夫干的，看来他对米霍埃尔斯并不怎么友好。

接下来希梅利奥维奇提出了一连串与《埃尼凯特》报的内容及他对该报的评论有关的问题。

费费尔推说记忆力差，企图避开希梅利奥维奇的直接提问。

审判员：被告费费尔，在你做供述的时候，你把希梅利奥维奇形容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说他对我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极为不满，怀有民族主义情绪。

布雷格曼提出出版“黑皮书”的问题。

布雷格曼：起诉书第 29 页第 1 段说，布雷格曼和你参加了“黑皮书”的编委会。我参与了“黑皮书”的编辑工作吗？

费费尔：事情是这样的，布雷格曼没有去收集材料，这种事有

工作人员去做。在材料收集齐全，洛佐夫斯基要求调往苏联情报局之后，推选了一个编委会，布雷格曼为主任，格罗斯曼、爱伦堡、鲍罗廷^①及另外几个人任委员。

审阅完这些材料以后，布雷格曼提出的不同意见全是质量方面的，并没有反对出版“黑皮书”的意见。

塔尔米（对费费尔）：起诉书第41页说，我参加了犹太民族主义秘密组织。既然他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那么他是否知道，我参与了这个“秘密组织”的什么活动？

费费尔：事情是这样的，指控我是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不符合实际的。用不着怀疑，我的预审供词没有说这样的事，也没有一份记录提到过这事。但是我明白，这说的是在委员会房内进行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说的是民族主义活动，而不是秘密活动。我们既没有在私人住宅里，也没有在别墅里举行集会，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委员会里进行的。所以，我不能提供有关其他参加秘密组织的人的材料。至于塔尔米，我能说的就是诺维克对他的文章很感兴趣。

克维特科：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费费尔。他本人向我通报过他同罗森贝格和莱温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交谈吗？

费费尔：我本人没有向克维特科通报过我们同罗森贝格和莱温的谈话。但是对此委员会里谈论得很多。有的讲，“卓因特”曾许诺，如果犹太人迁居克里木，它将在物质上支持我们。然而我本人没有同克维特科谈过这个话题。

克维特科（对费费尔）：你曾供述说，你们利用了努西诺夫和克维特科旅行的材料来草拟给政府的信件。这说的是哪一次旅行，

^① 米·马·鲍罗廷（1884～1951），20年代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指导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回国。1949年被捕前一直担任《莫斯科新闻》报的主编。

又说的是哪一封信？

费费尔：这说的是克维特科到克里木去了解犹太族集体农庄庄员的境况和他们经过疏散遣回原地的情形的那次旅行。后来，在克维特科做了报道之后，在主席团的会议上给安德烈耶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如我已说过的，是根据克维特科关于克里木的报道写的。努西诺夫没有去克里木，他到了乌克兰，他也带回来了有关犹太人在乌克兰处境艰难的材料。提出了安置犹太人就业、为他们疏散后遣回原地办理户籍、从犹太人区返回的犹太人物质生活状况艰难的问题。这些材料写进了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写给政府的那封信中。

克维特科（对费费尔）：在主席团会议上我去克里木的问题是怎么说的，又是怎样写在记录中的？

（审判）长：你是想问，去克里木之前给你提出了什么任务吗？

克维特科：是的。

费费尔：克维特科供说，似乎是我和爱泼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做过指示。我不记得这事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到委员会工作，这是1944年的事情，我还在编辑部工作。据我所知，给克维特科定下的任务是在当地了解情况并写几篇特写。

（审判）长：（对费费尔）这次旅行同已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一次为提出迁居克里木问题而进行预先收集材料的行动？

费费尔：爱泼斯坦曾说过，因为已经向政府递交了信件，最好能了解当地发生的事情。

（审判）长：可是克维特科回来后，说过把犹太人安置在克里木各地定居是可能的吗？

费费尔：是的，他说过，有许多闲置的土地，也有许多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从前居住在克里木的犹太人希望从疏散地返回原

地。

克维特科：为什么费费尔要供说，我们是在没有可能拿出一个犹太共和国向美国人售卖的情况下，于是决定用关于克里木的情报来代替它。为此方派我到那里去的。在犹委会会议记录中却是这样写的：在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了克里木，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地方之后，决定派遣一个作家组，多布鲁日斯基、克维特科、努西诺夫及其他人去乌克兰，以了解经历了法西斯分子入侵之后的实际情形。

（审判）长：费费尔，你听懂这个问题了吗？

费费尔：话说得含含糊糊，很难弄懂。

（审判）长：克维特科是想问你，犹委会给克维特科克里木之行定下的任务，为什么你的供述和据说是犹委会会议记录中的记载不一致。

费费尔：我已经说过了，那段时间我在报社工作，克维特科的那次出行是爱泼斯坦在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的，克维特科出行的目的是到克里木走一走，然后写几篇特写，给美国读者讲一讲集体农庄犹太族庄员从疏散地返回克里木的事情，因为美国报刊想了解这件事，曾提出过要求。我不知道爱泼斯坦是否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克维特科，不管怎么说，这份材料是预定要寄往美国的，因为它使美国人感兴趣。

克维特科：为什么昨天审判长并没有问他这件事，他却声称，克维特科写了一份他克里木之行的报告。甚至在连我都对此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

（审判）长：他现在说的是你那次旅行的目的。关于报告他什么也没说。

克维特科：这件事他应当知道。

费费尔：我现在不能肯定克维特科写了报告。

(审判) 长：你还有问题吗？

克维特科：有。戈尔德贝格来苏联是谁帮的忙并坚决主张要他来的？除犹委会主席团委员，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之外，是谁协助这个坏蛋来苏联的，而且这一切都花的人民的钱？犹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谁对戈尔德贝格了解得最清楚，最深？究竟是谁不遗余力地把他吹捧夸赞成苏联最好的朋友的？

费费尔：戈尔德贝格来苏联不是应反法西斯委员会之邀，这个问题主席团会议并没有讨论决定过。他是受他那家报社的派遣而不是由反法西斯委员会派遣来苏联出差的。我们在美国期间，基谢廖夫——苏联领事——把他作为苏联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们，并帮助领取签证。他给了戈尔德贝格来苏联的入境权……

克维特科：(对费费尔)你为什么没有向主席团委员们通报委员会支持出版“黑皮书”的想法，为什么没有通知主席团委员们这本书已经在外国出版发行。你隐瞒此事的目的是什么？

费费尔：主席团委员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好几次。他们都知道，这本书是应该出的。编写这本书用的材料早在1944年就由爱泼斯坦寄出去了，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已经说了，是在收到葛罗米柯的电报后，这件事维辛斯基的秘书也知道，爱泼斯坦是不得已才只好把材料寄往美国。

(审判) 长：(对费费尔)那么委员会的成员和克维特科知道正在为出版“黑皮书”做准备吗？

费费尔：这个问题在主席团中讨论过。出版“黑皮书”并不是什么秘密，《埃尼凯特》报的万名读者都知道这件事。如果克维特科不知道这件事，那我就不知道原因何在了。

克维特科：关于出版这本书，不知怎的，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已经出版了这样一本书？

(审判) 长：给犹委会寄来了多少册？

费费尔：据我的记忆，犹委会的任务当中有一项就是为“黑皮书”收集材料——法西斯匪徒对民众犯下的残暴罪行。对凡到曾被侵占过的地区去的记者都交待过这种任务。出版发行“黑皮书”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我们收到了10册书，我记得有给洛佐夫斯基、什泰恩、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米霍埃尔斯和贝格尔森的书。

(审判)长：这些书是直接来自美国寄来的吗？

费费尔：是的。这些书是英文的，寄给委员会那些人的。也许当时没有给克维特科寄书，所以他才说，他不知道书已经出版。

克维特科：我再没有问题了。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你供述说我为委员会写的文章是民族主义性质的。除电台广播过的那一篇致同乡会的文章外，你读过我的多少文章？

费费尔：我没有读过瓦坚贝格的文章，但我知道他写过2~3篇关于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文章，再有的我现在记不得是写什么的了。

(审判)长：(对费费尔)你没有读过，那怎么知道他写过呢？

费费尔：我是听编辑们说的。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既然你没有读过我的文章，那你怎么可以谈论文章的内容呢？

费费尔：我说，我是听编辑们讲才知道这事的。他们告诉我，瓦坚贝格写了一篇关于法西斯匪徒的文章。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于是你就把这篇文章放行了？

费费尔：我是在文章已经发出之后，听编辑们说才知道这事的。

瓦坚贝格：你曾供说，诺维克从事间谍活动。

费费尔：我知道，诺维克从他同人们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获取他

感兴趣的一切情报。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为什么你把这些东西称为间谍情报呢？

费费尔：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词的，所以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直到现在，我才把一些事情重新估量了一遍；我记得，那些情报是机密性质的。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你并不知道他在收集什么情报，你怎么能够称那是间谍情报呢？

费费尔：我知道他收集有关工业、国民经济等等的情报。

（审判）长：间谍收集一切令侦察机关感兴趣的情报，这可不光是与工业和经济相关的情报。

费费尔：我并不知道他是间谍。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你为什么说他从事个人间谍活动？

费费尔：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你曾供述，诺维克对有关包特金医院的情报感兴趣。你是否知道，他对包特金医院的兴趣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他患上了肺炎，住进了这家医院。

费费尔：是的。

瓦坚贝格：（对费费尔）你是说过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赞美美国生活方式，诋毁苏联现实的话吗？

费费尔：她曾说，那边的衣服更好，生活设施更完善，等等。

瓦坚贝格：那她对苏联的生活方式是怎么说的呢？

费费尔：她说过，这边比较穷。

（审判）长：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否谴责过苏联现行的制度，国体，或者她只是说美国的衣服更好？

费费尔：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她没有讲过任何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话。她没有对我说起过自己的情绪。

瓦坚贝格：我的问题问完了。

(审判)长(宣读供词卷2,案卷页307):费费尔,你供述马尔基什在犹委会的全体会议上以及与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你的交谈中,公开讲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你的这些供述是对的吗,马尔基什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费费尔:供述是对的。马尔基什在自己的发言中说,犹太人的处境很艰难,必须给他们以援助,委员会应当同据说是现在正发生着的压制犹太人的现象进行斗争,等等。

他的这个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布雷格曼发言反驳,并说他(马尔基什)想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反苏的舞台是办不到的。

马尔基什:(对费费尔)面向西方是什么意思?

费费尔:面向西方,这就是说同外国的作家和诗人友好,就是离开苏联到马尔基什曾居留多年的西方国家去,就是努力向资产阶级作家和诗人学习。

马尔基什:费费尔是否读过我在20年代写的两首诗,我在那里边说,我们苏联作家没有什么可以向西欧文学学习的,因为这种文学已经陷在“双人床的绝境”中无法自拔了。

费费尔:记不得这个了。

马尔基什:费费尔是否还记得我于战争初期写的“东方之光”这首诗?

费费尔:是的,这首诗是在战争初期发表的。

马尔基什:那么这算是,是面向西方吗?

费费尔:这是不同的东西。

马尔基什:1943年委员会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讲希望《埃尼凯特》报关心一下来自波兰的不会讲俄语的难民,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可以把这解释为,看成是要求扩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职能吗?

费费尔：马尔基什谈扩展职能问题时，把他在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涉及的范围缩小了。当时谈的是建立犹太人军事部队，为贫困的犹太人提供物质帮助的问题。马尔基什的这次发言当时曾引起许多议论和反对。

马尔基什：我在全会上作为笑话讲了一条建立犹太师的建议，能把这认定是一个非苏维埃人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建议吗？

费费尔：我的供词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老实，很详细。我没有说马尔基什提出建立犹太师，但是在全会上我曾对马尔基什说过，这样讲述一位上校来找他提议建立犹太军事部队的故事，是给委员会摆出这个问题，让委员会成员深思这个问题的一种很合适的方式。

马尔基什：我再没有什么问题了。

（审判）长：什泰恩，你有问题吧？

什泰恩：（对费费尔）我想问问，根据什么把我认作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

费费尔：她没有被认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也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说过，在主席团会议上什泰恩有过民族主义性质的插话和发言。这些在我们进行对质时都已经详细说明了。关于她我能说的昨天已经全说了。我再没有任何新的材料，我被问了几个关于她的那些插话，关于题为《苏维埃政权给了犹太人什么》的小册子的问题，对那本小册子她曾说，应当把它叫作《犹太人给了苏维埃政权什么》。

什泰恩：（对费费尔）根据什么和出于什么原因 1942 年把我列进了犹委会主席团组成人员中？

费费尔：我不知道，这事是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办的，什泰恩是他们邀请的。

什泰恩：（对费费尔）起诉书说，我被作为民族主义者列入犹

委会的成员中，但在案卷中却没有与此相关的具体材料。

费费尔：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供述过，也没有我的这种供词。这种论断是侦查机关做出的，并不是我。

(审判)长：(对什泰恩)你是在费费尔就任犹委会秘书之前被列入主席团的。

什泰恩：这里说，集聚了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对什泰恩)费费尔说了，起诉书中的一个论断是由侦查人员从你在犹委会的活动中做出的，他并没有供说这一点。

什泰恩：这里开头说，所有这些人把委员会变成了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组织。

费费尔：看来，起诉书是侦查人员根据什泰恩和证人的供词，其中特别是根据我的供词写成的。这是侦查处所做的总结。

(审判)长：谁还有什么问题？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有问题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似乎觉得，费费尔说，我制造谣言诽谤苏联。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费费尔：不，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是说你把美国的生活和苏联的生活进行对比，说美国生活舒适，苏联生活贫困。

希梅利奥维奇：(对费费尔)你说，收到了给犹委会主席团几位委员的“黑皮书”，其中你也说到了我，可你为什么从未在主席团会议上提起过此事，又为什么只是到了今天才认为有必要讲出来，给我也寄来了这本书。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把书交给我？

费费尔：我没有专门打算把这书藏下来。我不管分寄书籍的事。有专门的部门做这件事。

(审判)长：(对费费尔)书转没转给希梅利奥维奇，你知道吗？

费费尔：我哪里能注意到这种事情。这事是图书馆干的事，它

可能把这件事办了，我不知道。

(审判)长：还有什么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再没有问题了。

马尔基什：我还有一个问题。

(审判)长：提吧。

马尔基什：(对费费尔)你是从1945年开始计算我在犹委会从事积极活动的，而没有把委员会在古比雪夫进行工作的那一段时期算在内。那就是说，我的主要活动是从1945年开始的了？费费尔是否知道，1944年我就曾向苏联情报局的党组织举报过《埃尼凯特》报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份举报审查了两个晚上，结果宣布我是诬告。这件事情费费尔知道吗？

费费尔：我没有说过，马尔基什是从1945年开始积极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

马尔基什：那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费费尔：就是犹委会开展工作的初期吧。

马尔基什：那就是1941年，古比雪夫时期与我有关系没有？

(审判)长：(对费费尔)马尔基什在古比雪夫待过吗？

费费尔：他在莫斯科广播委员会犹太语编辑部工作。

马尔基什：就在那同时我也在海军政治部工作。

(审判)长：马尔基什确实向苏联情报局的党组织进行过举报吗？举报什么事情？

费费尔：他的举报是在爱泼斯坦在作家会议上发言，对他写车里雅宾斯克的那首诗提出严厉批评之后的事。在那以后马尔基什举报说爱泼斯坦的批评没有任何根据，并向委员会及其领导人之一爱泼斯坦提出一系列指控。

(审判)长：他指控些什么？

费费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有过这么回事。

(审判)长：做出了什么决定？

费费尔：不记得了，这在案卷里边有。

马尔基什：我被宣布为诬告，从那时起，从我进行举报的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走进过委员会。费费尔是否知道，从那时起，除1948年费费尔叫我去参加会议那一次之外，我从未登过委员会的门？那次是借口要开一个重要会议把我骗去的。

费费尔是否知道，在反法西斯委员会存在的整个时期，我只出席过三次会议？一次去是苏联作家协会决定派遣几位作家到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去，我们要做一个同样的决定。还有一次是克维特科报告克里木之行，我去了。说得简短一点，我到委员会去不超过三次。

开庭审讯的第二天，5月9日20时45分，开始审问埃·伊·泰乌明。审问于次日继续进行到14时10分。

№1168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泰乌明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9日)

(审判长): 被告泰乌明, 法庭问你是否听懂了对你的指控, 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 你回答说, 承认自己有罪。现在你向法庭供述自己的罪行。

泰乌明: 1905年我出生在瑞士, 我的父母在那里侨居。我以前说了, 我父亲是崩得分子, 受过处罚。那以后他去了瑞士, 在那里上大学。我的母亲是裁缝, 是孤儿, 当年是一名“火星派分子”, 五一游行时被捕, 关进了监狱, 狱中她得了重病, 患上了结核病。亲属们给了些钱, 她就到瑞士去治疗, 在那里与我父亲相遇, 他们就结婚了。1905年我在瑞士出生了, 同年父母返回俄罗斯, 我随他们一同回来。自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国外。我父亲于1936年去世。1920年他加入了联共(布)。他学的是化学专业, 担任过“气体净化”托拉斯经理。作为联共(布)的一名党员, 他继续同崩得分子, 特别是同魏因施泰因、弗鲁姆金娜和莱温会面。我认为, 父亲在其有生之年一直背着参加过崩得这个包袱。有一次我和魏因施泰因谈话。我对他说, 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孟什维克, 社会民主党人。他就吵嚷起来, 还对我父亲说, 父亲没把我管教好, 他决不再到我们家里来。最后的6~7年父亲病得很厉害, 他的健康状况极差, 他下楼来得由母亲在楼下给他穿上皮大衣, 再上班去。完了母亲迎候着他, 扶着他上楼。我们跟他说, 别干工作了, 退休吧, 可他却说, 生命终结之前他不愿放弃工作退休。我父

亲酷爱象棋，凡能和他下上一盘的人他都不会放过。有一次米霍埃尔斯到我们家里来，和父亲下过棋。后来我在犹太剧院看到过他下棋，这之后，1941年他来到古比雪夫，我和他见过面。

(审判)长：预审时你曾供述米霍埃尔斯曾对你表露过自己的思想吗？

泰乌明：1941年我在苏联情报局工作，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组织一切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米霍埃尔斯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被洛佐夫斯基召到古比雪夫。在那里我同他谈过几次话，后来我去了莫斯科，从此一直到他们来到莫斯科组织他们的第二次大会，而我受命在这方面做一些组织事务工作之前，我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让我编辑大会的材料，那是米霍埃尔斯做的。我的任务是找到足够的打字员，注意大会按程序进行，安排好参加大会的人在饭店里的住宿，等等。

在为大会做准备的过程中，有一次米霍埃尔斯对我表露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他说，在苏联犹太人处境艰难，在工作上受到压制，塔什干有很多疏散到此地的犹太人境况十分困苦，政府同反犹太人主义斗争不力等等。我本应对他做出反应，但却没有表示意见。这是我的罪过。

(审判)长：可是他说这些也责难苏联政府了吗？

泰乌明：他说苏联政府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我未置可否，没有表示态度。这是我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罪过。

(审判)长：在建立犹太人地区方面，他说过必须让犹太人在一起的话吗？

泰乌明：是的，说过。我认为我的第二个民族主义罪过，就是在1942~1943年费费尔曾对我表露过与米霍埃尔斯大致相同的思想，而我又一次对这没有做出反应，没有表示意见。

(审判)长：预审时你，泰乌明，曾供说(卷24，案卷页52)：“……费费尔同我谈话时讲过，在苏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据他说的不公正的，他指责苏联政府据他说鼓励反犹太人主义，等等……他说必须把犹太人团结起来为独立而斗争。

我支持了费费尔，于是我俩之间就有了一种罪恶的联系……”

你的这些供述都是真实的吗？

泰乌明：我认为我支持了费费尔，因为本该表示反对他的看法，而我却避而未答。我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毒害，既然我对这说法保持沉默，那就是说我对他表示支持。有一回费费尔对我讲，委员会准备向政府提出在克里木建立共和国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克里木建立呢，他开玩笑地回答说，那里的气候好。后来有一次，在洛佐夫斯基的接待室里我把他和米霍埃尔斯两个人都碰上了，他俩很兴奋，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现在“上边”正在审查我们的“克里木方案”，看来这个方案得到了支持，一切都很顺利。这是他们自美国回来之后的事。他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在苏联情报局做过一场报告，在报告会上他们讲了他们在那里发表演说获得的成功，桌子上放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

我想指出，我完全没有想到，起诉材料中竟说我校订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对这一点我想说，我不仅没有校订，而且没有读过一篇文章。在侦查材料和鉴定书中都说，我从未见过这些材料，相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从创立之初开始就享有独自处理事务的权力。

1942年3月，马尔基什来到苏联情报局国际部，提出由国际部经办犹太报刊的事务。我那时管民族报刊已经管着亚美尼亚的、罗马尼亚的还有其他的报刊。我向部长列别杰夫汇报了此事，他答复我说同意，可是爱泼斯坦得知这事以后，却和我大吵大闹了一

场，说这是他们独家管理的事。几天后洛佐夫斯基来了，他把我们叫去，申斥了一通，断然禁止我们这样做，即干预犹委会的工作。所以我想再说一遍，我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寄往国外的那些材料毫不相干。我同委员会之间惟一的关系就是从组织事务方面协助准备了第二次大会。况且他们是待在古比雪夫，而我却在莫斯科。

(审判)长：其他委员会的邮件有人检查吗？

泰乌明：1946年的决定实施之前，我们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检查。各委员会开展活动的最初几年，材料是在莫斯科由苏联情报局的责任秘书验看并检查的，一开始是克鲁日科夫，后来是孔达科夫，再后是卡尔梅科夫……

(审判)长：克鲁日科夫一个人怎么检查得完所有的邮件？

泰乌明：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向国外寄发文章的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那时寄发的文章很少——一个月5~6篇。

(审判)长：你是想说明，你和犹委会文章的校订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吗？

泰乌明：我想，这一点从案卷材料中就看得出来，这儿有犹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说明白我和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起诉书的第4点列举了一大串姓名，其中也有我的名字，说我从事积极的民族主义宣传活动。我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活动，而我本身倒是这种宣传活动的对象。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表现在这一点上。为此我应当受到惩处。后来我摆脱掉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我没有对这些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给以反驳就意味着我通过这种行动正在变成民族主义者的共犯。我是有罪的。

我把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资料轻易地就交给了戈尔德贝格。费费尔保护我，说我总共转交了3~4篇文章。不是这样的。我转交了大约有2~3页的资料。但问题不在于是3还是30页，问题在于我转交了资料。这份资料逐一简述了三个共和国的概况，就

是说那里边列举了这三个共和国的主要城市，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失，经济和工业恢复的成就。这是 1945 年底的事情。资料里还列出了已经修复的企业的数字。开列出这些共和国里农民由于实行土地改革获得了多少土地，文化和科学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那份资料涉及的材料范围就是这些。

有一天费费尔非常高兴地来找我，他说，来了一位苏联的好朋友——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戈尔德贝格。跟我强调说，这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想帮助我们揭穿外国新闻机构所散布的诋毁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的谎言。我很关心这几个共和国，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无法对美国的反动分子给以切实的驳斥使我感到很不安。在美国正在组织波罗的海沿岸军团，这些共和国的黄金储备耗费在支持反动分子上面。波罗的海沿岸的反动分子开始被从德国遣送到美国。所有这些情况都强化了反动势力的活动。还有，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不承认这些共和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情况促使我去寻求机会把这些共和国的实情讲出来。而我们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所能利用的关系只是同共产党报刊的联系，因此我就抓住了这个同苏联的朋友、美国的大新闻工作者见面的机会。费费尔曾对我说过，他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没有加入共产党，他“无所不能”。我就抱定了一个想法：通过他的手能够真正揭穿反动分子。费费尔对我说，咱们去见洛佐夫斯基。到那里会把情况都告诉你。

法庭在审问泰乌明的过程中查问戈尔德贝格波罗的海沿岸之行的情形，令他感兴趣的问题，组织在立陶宛的活动的详细经过。

然后，法庭询问了泰乌明为戈尔德贝格准备的那份资料，特别是写这份资料所依据的那些材料。

“我使用了，”泰乌明说，“下面这几种材料：我们寄往国外的有关波罗的海沿岸问题的文章。第二种——波罗

的海沿岸报刊的材料。我经常收到《苏维埃立陶宛报》、《拉脱维亚报》和《爱沙尼亚报》，那里边有这一类材料。

第三个来源是各个调查法西斯暴行特别委员会的材料，最后，是书，书用得极少，因为1940年以后书里就没有什么资料了。”

审问的下一个内容是苏联情报局的情况，工作的组织，干部的选任，对待外国记者的方法。

泰乌明：各部的编辑人员当中有很多人无论是在业务能力上还是在政治素质上都不符合对外工作的编辑应具有的水平。

有许多所谓的不幸者栖身在苏联情报局，犹太族人数很大，这一点非常显眼。有一次我同谢韦尔斯基私人交谈，我们曾说到我们这里犹太人太多了。甚至写作者的队伍中也有。远非所有的人都适合自己的专业工作。

（审判）长：人员的选任由谁决定？

泰乌明：我们没有人事部。人们都去求见洛佐夫斯基，他写个“录用”的条子，就作为命令发下去。1944年或是1945年，来了那么一个人，被称为“人事部”。

（审判）长：预审时你曾供说，洛佐夫斯基的许多朋友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是这样的吗？（宣读泰乌明的供词，卷24，案卷页109）。

泰乌明：是的，是这样，有一些人虽然能力很弱，根本不适合在苏联情报局机关里工作，洛佐夫斯基还是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不过关于鲁比宁，我不能说他是洛佐夫斯基的朋友。

（审判）长：你曾供说（宣读），美国犹太人塔尔米和法因贝格被录用为英语翻译员……英语的核心编辑是从前居住在美国的莱温，英语打字员一职由美国犹太人皮拉克·贝蒂担任。自美国返回的原白俄侨民列克钦被洛佐夫斯基任用为美国部编辑。苏联情报局

的写作队伍也是洛佐夫斯基全部选用犹太人组织起来的。

泰乌明：就是这样的。必须说，我们的写作班子情况很糟。干这事的是一大批平庸的写作人员，我们那儿把他们称作“骗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有什么作品发表，他们可以写大剧院或是拖拉机、集体农庄、基辅、第聂伯水电站等等，结果都差不了多少。这些人什么题材都写。我们这些编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编辑会议上提出，必须要求写作班子由另外的，业务水平高一些的人员组成。

№1168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泰乌明、 马尔基什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0日)

(审判)长：你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过吗？

泰乌明：没有，只是参加了一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根据工作的性质，我应当在古比雪夫帮助各委员会——斯拉夫人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和犹太人委员会做组织工作，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自1941年11月至1942年4月我做的就是这件事。应当说，犹委会的事务在古比雪夫是洛佐夫斯基处理的，在莫斯科是克鲁日科夫处理。我要做的事是给参加大会的人员安排好伙食，饭店里的住房等等。大会上的发言交稿由米霍埃尔斯审校，所有这些事情他都同洛佐夫斯基商议。

(审判)长：按照工作性质，你同大会上的发言有关系吗？

泰乌明：没有任何关系。

审判员：可你是编辑呀？

泰乌明：这是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能，也没有协助做编辑工作的惟一一个委员会。应当说，米霍埃尔斯是一位很好的编辑。他说他自己就能做好这项工作，他不需要帮助。

(审判)长：哪些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泰乌明：我记不清楚了。我想有米霍埃尔斯。记得有那么一位集体农庄主席——来自古比雪夫州的犹太人发了言。这是一个高大的特别令人注目的人物，我把他记住了。费费尔发过言，发言的好

像还有弗鲁姆金院士。

(审判)长：预审时你把犹太人委员会的活动讲述成民族主义的，反苏的，你说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在委员会里造成了那么一种环境。

泰乌明：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个别事实来评说委员会的活动，因为我没有直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同委员会也没有任何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从预审材料中才详细了解到的。

我讲几个犹太会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个别事实。在一次编辑会议上，爱泼斯坦教我们应该怎样为美国写文章，比如他说过，美国商行寄来橡胶热水袋赠送给军医院这件事应当这样来写：要把使用美国热水袋的红军伤员的英勇精神和这热水袋是怎样减轻了他的痛苦写出来。而且一定要指明寄来这些热水袋的那家商行的名称。

结果是美国商人利用苏联人民的鲜血来做他们的生意，而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向他们鞠躬致敬。

还有一件事情。我出席了情报局党委的一次会议，当时爱泼斯坦和马尔基什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次党委会和这番讨论给我和所有出席的人留下了极其不愉快的印象。

(审判)长：当时争论的是什么？

泰乌明：我们听他们两个争吵了两个晚上，却什么也没弄懂。发生了非原则的争吵。马尔基什和爱泼斯坦互相指责对方去了波兰等等。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弄清楚他们互相提出的责难，而马尔基什又是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的委员，就决定把这个问题送到那里去审查。我已经说了，这场争吵是无原则的。此事最初的起因是马尔基什给苏联情报局的党组织写了一份全面而详尽的声明，请求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来自爱泼斯坦方面的人断言，提出这份声明的真正内情是爱泼斯坦批评了马尔基什的作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尔基什才写声明告他的状。可马尔基什却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这些

不要脸的自己……总之应该说，马尔基什是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立的，曾在会议上公开说过，他不喜欢那里的那帮人，所以他来找苏联情报局，建议由情报局管理犹太报刊的事务，因为他不愿意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

(审判)长：为什么？他是说过，那儿的民族主义者歪曲党的路线的话吗？

泰乌明：我个人从这场争论中没有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党委会上他是对犹委会的领导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指责，但马尔基什公开指示他们搞民族主义这话我不能说。我不记得有这种事情。在这次吵吵嚷嚷的会议上，有些东西我可能没听清楚。

(审判)长：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事和美国人怎样用我们战士的鲜血做生意的问题。

泰乌明：我原来的上司，也是《黑皮书》编辑委员会的委员谢韦林还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据他说好像是爱伦堡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在《黑皮书》的事情上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我不知道爱伦堡是不是犹委会的成员，但仿佛是起先让爱伦堡编这本书，后来尽管爱伦堡在做这件事，犹委会却自己干了起来。爱伦堡认为，出版《黑皮书》的事应当采取另一种办法去做。应当取得严肃而实际的材料，除犹太作家外，还要吸收一些俄罗斯作家来编这本书，做这件事不能“毛手毛脚”。当他得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仅在编他们自己的一本《黑皮书》，而且已经把一部分材料，包括他（爱伦堡）的材料在内寄往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场争论并判定谁的材料更好。记得谢韦林曾对我说，他不喜欢犹委会的材料，他曾就此事同洛佐夫斯基谈过，但是洛佐夫斯基告诉他，这本书是很需要的，材料已经寄走。谢韦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能，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来这里受审的时候（我想，连谢韦林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才知

道了这本《黑皮书》原来是在美国出版的总的《黑皮书》的一部分。我们苏联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自然听说过《黑皮书》的事，但我们原以为这本书只写苏联的犹太人。

(审判)长：(卷24，案卷页65)你说米霍埃尔斯在犹太人中间有很高的威望，这使他得以把民族主义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泰乌明：有一些供述我是依据在预审时才了解到的情况做出的。我原先知道是洛佐夫斯基领导着委员会的活动，但我当时并不了解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关于集聚在犹委会周围的那些人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不过有人对我说过，贝格尔森过去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很重的人，努西诺夫也有点这种气味，并且作为一个作家为此受过不止一次的严厉批评。

(审判)长：关于对你的指控。起诉书中指出，你是一名活跃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受洛佐夫斯基之命，对寄往国外的含有歪曲苏联现实状况内容的文章进行过校订，1945年向戈尔德贝格转交过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情报。现在你否认说你校订过文章的指控吗？

泰乌明：我同这件事毫无关系。

(审判)长：预审中没有就这件事对你进行审问吗？

泰乌明：1952年2月份的记录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没有校订过犹委会的文章。我不是活跃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米霍埃尔斯有一次、费费尔有两次同我进行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而我没有对他们进行相应的驳斥，避而未答。

(审判)长：这么说你承认参与了同米霍埃尔斯及费费尔进行的反苏的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了？

泰乌明：是的，那是在走廊里进行的一次10~15分钟的谈话。

(审判)长：从你的供词中可以看到，你曾把一份有关波罗的海沿岸的资料转交给了戈尔德贝格。那份资料都讲了些什么？

泰乌明：资料里边有各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主要城市，德国占领者给每个共和国造成的损失，还有关于重建工作的资料。比如载明立陶宛已经恢复了1118家企业。

有关损失的资料我是从特别委员会的调查记录中摘录的。我的办公桌里有3本记述委员会工作的书，我就利用了这几本书。

（审判）长：你又是从哪儿弄到有关工业恢复情况的资料的呢？

泰乌明：我利用的是我们发往国外的那些文稿。这些文稿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多数是一些做领导工作的人员寄给我们的。我在战争年代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也就给我提供一些可供外国报刊发表的文稿。

（审判）长：那里边有可能写明某某军工厂生产多少多少大炮等等东西吗？

泰乌明：不，这种材料是没有的。就说立陶宛吧。这是一个农业国，那里最大的一家工厂也就有300~400名工人。爱沙尼亚最大的克连戈尔姆纺织厂只部分地开工。

（审判）长：在同你谈话时，戈尔德贝格问起过在波罗的海沿岸发现的新型工业原料吗？

泰乌明：我们没有谈过这个。所有这些都是我受审时才了解到的。我被告知，戈尔德贝格曾打探过当时存在于立陶宛的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我对这种建筑材料一无所知。

（审判）长：（对费费尔）你对这件事了解些什么？

费费尔：当我带戈尔德贝格去拜访拉齐斯的时候，他向拉齐斯打听一种什么新的建筑材料。拉齐斯让他去找国家计委主席，计委主席给他讲了这种材料是种什么样的东西，说用这种材料可以制成砖，板等等，还把报道过此事的几种俄文报纸告诉了他。

（审判）长：对（泰乌明）你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些材料登记了吗？如果做了登记，那么有关波罗的海沿岸的情报的副本现在

哪里？

泰乌明：这件事真让我百思不解。我弄不明白，这个副本能跑到哪儿去。

(审判)长：你们谁负责登记材料？

泰乌明：文稿都是由秘书登记的，可这是一份资料呀。

(审判)长：就算是一份资料吧，可是出自苏联情报局并由你转交到间谍手里的文件应该是做了登记的。

泰乌明：我那时不知道戈尔德贝格是个间谍，我把他当成了苏联的朋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该把这份资料转交给他的。这是我的罪过，这是我在政治上目光短浅。

(审判)长：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是相信你的说法呢，还是相信侦查机关断定的这份资料包含有机密情报？

泰乌明：我已经说过了，在这份资料里，我根据发表在我国和外国的报刊上的正式文章列出了恢复工农业方面的数目字。

(审判)长：这份资料的复制件是不是应当存在你们部的档案里？

泰乌明：复制件是应当存在那里，但是也有可能偶然地混到秘书处的材料里去了。

(审判)长：这是什么时候，哪一年的事情？

泰乌明：是1945年底的事。我必须说明，我们的档案里缺少点什么东西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每到年终临要把文件送交档案室时，都要全体动员紧急办理，而且没有可以把档案妥善保管起来的房子。

(审判)长：你还要对法庭讲些什么？

泰乌明：我想请法庭注意在这儿还没有加以说明的一个情况。犹委会欢迎戈尔德贝格的宴会是在米·伊·加里宁逝世的那一天举行的。我考虑，在这样一个日子举办宴会真是不成体统。当我得知这

件事的时候，就去找洛佐夫斯基，对他说，这太不像话了，在治丧的日子里怎么可以摆酒设宴呢。洛佐夫斯基告诉我，委员会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现在取消不好办，况且戈尔德贝格明天就走，就是说，如果今天不办这个宴会，那就根本不能办了。宴会还是举行了，也喝了酒。

洛佐夫斯基：（对泰乌明）你是什么时候为大会做准备工作的？是1942年年初的事吧？

泰乌明：是的……

洛佐夫斯基：你在苏联情报局我的领导下工作了多少年？

泰乌明：情报局一组成我就在那儿工作了。

洛佐夫斯基：苏联情报局打印材料有没有过不要副本的情况？

泰乌明：没有，从未有过。

洛佐夫斯基：你在我的领导下和在维辛斯基的领导下在《外交辞典》编辑部工作了几年？

泰乌明：我在《外交辞典》编辑部从它组成的时候起一直工作到被捕的时候，也就是从1941年到1949年。

洛佐夫斯基：（对泰乌明）由于你在两个组织系统上受我的领导，所以你和我见面的机会就比别的工作人员多，我们之间是否就犹太民族主义的话题交谈过？

泰乌明：从来没有，根本没谈过。一般地说我同洛佐夫斯基常见面，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严格公务性质的。我来见他，接受工作上的指示和命令，有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再没谈过什么。

尤泽福维奇：戈尔德贝格是否说过，从尤泽福维奇那里拿到过什么关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材料？

泰乌明：没有，没说过。

尤泽福维奇：也许戈尔德贝格对你说过，他从尤泽福维奇那儿得到了什么有关工业、交通、科学和文化的材料吧？

泰乌明：不，他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洛佐夫斯基是否对你说过，尤泽福维奇曾把什么材料转交给了戈尔德贝格？

泰乌明：没有，没说过。这件事是我在侦查的过程中才知道的。

尤泽福维奇：你先前是否认识负责检查寄往国外的材料，也包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在内的那位苏联情报局人员萨克辛？

泰乌明：我认识他，因为我和他一块上过学。我知道他是检查国际部系统的材料的，但是他检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我却不知道。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泰乌明是否知道，检查文稿的是克鲁日科夫？

泰乌明：我已经说了，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在莫斯科由克鲁日科夫审查。在古比雪夫谁审查材料我不知道。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也许泰乌明知道，这事是由鲍罗廷做的？

泰乌明：鲍罗廷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担任审查编辑部的成员职务。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泰乌明也许知道吧，孔达科夫负责检查苏联情报局的文稿，特别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

泰乌明：我知道孔达科夫负责检查文稿及大概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文稿。

尤泽福维奇：泰乌明是否知道，对审查编辑部，也就是对书刊检查机关来说，其负担的职责是既不容许把不宜公开的内容写进寄给国外的文稿中，又要使文稿在质量上和政治上站得住脚？

泰乌明：我知道，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包括从质量和政治两方面

对文稿进行审查。至于说保守国家机密的问题，我并不知道这方面的事，因为关于文稿的质量和政治倾向问题审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曾开过多次会议，但却没开过一次会讨论这个题目。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难道在有各个委员会的编辑参加的苏联情报局编辑人员大会上，审查编辑部人员没有指出过，文章里边有不宜公开的情报，或者是政治上站不住或是写得不好？

泰乌明：那样的会倒是开过，但不是讲国家的机密问题。所有这些年来，只有一次在党的会议上由于发布了新的命令，提出过加强责任心严防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泰乌明是否知道，原责任编辑孔达科夫为何被撤职？

泰乌明：我知道，是因为经济上的舞弊行为，他盗用公款了。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泰乌明是否知道，米哈伊洛夫，英国部的前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还担任过党委会的书记，是因为什么被撤职的？你没听法伊金说起过，他是因为什么被撤职的吗？

泰乌明：法伊金对我说的不是米哈伊洛夫，而是沃尔科夫。他讲，这个人被撤是因为一些排斥犹太人方面的不体面的事情。确切说，是因为喝醉酒说了一些反犹太人的话。这我记得。

尤泽福维奇：（对泰乌明）泰乌明因为什么获得的她那枚“荣誉”勋章，是按苏联情报局开列的名单还是根据波罗的海沿岸方面的呈请授的？

泰乌明：是根据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呈请，因为战时我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他们，特别是因为我帮助了游击运动。

尤泽福维奇：泰乌明的父亲亡故时她多大岁数？

泰乌明：他是1936年死去的。

尤泽福维奇：我问的不是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而是她那时多大岁数。

泰乌明：我大概有 30 来岁。

(审判) 长：泰乌明生于 1905 年。

费费尔：(对泰乌明)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犹太文化衰落的话吗？我们谈过这个吗？

泰乌明：你没有说过，而且你也未必能和我谈这种事，因为你一向认为我这个人关心犹太文化。可是谈过反犹太人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压制；谈过这些。

费费尔：(对泰乌明) 说政府了吗？

泰乌明：是的，说了，你讲过反犹太主义的表现，讲过各个系统都在压制犹太人，“上边”也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不过没有直接对政府进行指责。

(审判) 长：(对泰乌明) 请对费费尔关于反苏谈话的问题做出说明(宣读卷 24，案卷页 52)。

泰乌明：我不记得费费尔曾说过必须把犹太人团结起来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话。

(审判) 长：供词的其余部分是对的吗？

泰乌明：是的，我确认证词的其余部分是正确的，不过我再说一次，没有直接说到政府。

洛佐夫斯基：(对泰乌明) 泰乌明参与了，如她所说，广播大会的筹备工作。她是否知道，每一篇广播发言都送联共(布)中央宣传局审查并交谢尔巴科夫批准。或者她只是一名什么都不了解的事务工作人员。

泰乌明：关于谢尔巴科夫我不知道。我了解，这种规定是有的，但我不了解实际情形，这些材料是否送了。我再提醒一次，我知道有这样一条规定，所有的发言都必须送去审批，但是具体的这些篇发言送了还是没送，我不知道。

审判员提示泰乌明，预审时她曾供述，由她通告给戈

尔德贝格的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工业的情报是国家的机密。

泰乌明：在我把这份资料交给他的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份东西是国家机密这种认识。那里面就是把我们将分别寄往国外的材料：关于新剧院开始营业的，关于恢复工业取得成就的等等综合到一起了。在我的观念里当时这些并不构成国家的机密。

审判员：可这是你自己说的，这些材料是国家机密的供词啊？

泰乌明：到了在这里受审的时候，才给我证明清楚，这些材料构成了国家的机密。

(审判)长：(对泰乌明)那么你现在是怎么认识的——这些材料是不是构成了国家机密？

泰乌明：我现在认为，这些缩聚起来的材料确实构成了国家的机密。

对埃·伊·泰乌明的审问就此结束。同日，星期六，5月10日14时35分，法庭开始审问佩·马尔基什。审问一直持续到星期六这一天終了，于21时50分暂停。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现在你向法院供述你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

马尔基什：我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我只承认有一些错误。

做了这样的声明之后，马尔基什向法庭讲述了他的童、少年时代，他的家庭，讲述了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诗人在他踏上创作道路之初所遇到的困难，他和贝格尔森、霍夫斯坦、克维特科之间在这段时期形成的非同一般的关系。

法庭则要详细了解马尔基什的经历，以求判定侦查人员说马尔基什自幼就信奉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并痛恨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结论是否可信。

从这种角度查询了马尔基什 20 年的几次去外国的目的，在国外的生活情形。法庭详细审查了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尔基什话说得太多造成的。审判长就这一情况曾对他说：“你讲了很多没有必要的话。”马尔基什竭力强调，和他一起坐在受审席上的那些文学家都是他的老对头，他们一贯地、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反对他。同时马尔基什还提到：“在同犹委会争吵的时候，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在党委会面前诋毁我，就像现在费费尔在法庭面前做的那样。”（卷 1，案卷页 146）

直到审问的第二天，星期一，5 月 12 日 12 时 25 分，话题才转到犹委会的事情上。

审判长宣读了马尔基什在预审时的供词，他也当众做了确认。

№1169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马尔基什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2日)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中指出，近几年你隶属犹委会，在那里，一些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因从事反苏活动而彼此关系十分密切的老朋友们常常聚会。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一问题你回答说，发生这种事是因为一切都受到洛佐夫斯基的鼓动。

马尔基什：接受侦讯时我被告知，费费尔是崩得分子，这我以前不知道。侦讯时说洛佐夫斯基是崩得分子。我认可了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因为这是案卷材料里写着的。

(审判)长：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进行敌对活动是否属实？

马尔基什：委员会的所有举措洛佐夫斯基都过问了。既然委员会是一个敌对的机构，既然这个委员会同洛佐夫斯基有联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他的双翅把这个委员会托起来的，因为他鼓舞激励着这个委员会。他们不让我参与。泰乌明说得对，他们不让我参与。但是，是洛佐夫斯基鼓舞激励着这个委员会，是洛佐夫斯基对它大加夸赞，这都是事实。他非常信赖费费尔。费费尔给他读过自己那首庸俗的诗《我是一个犹太人》之后，说“洛佐夫斯基很喜欢这首诗”。

(审判)长：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你对它有什么评论？

马尔基什：这首诗不仅充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十分俗气。诗中堆砌了很多历史上和圣经里的人物名字，一派趋附奉承的味道，

照我看，连特罗耶鲁奇妮察都可以写进去。

(审判)长：那么说你确认洛佐夫斯基是委员会的灵魂了？

马尔基什：我知道，洛佐夫斯基一直同他们有交往。他们也觉得他是自家人。

(审判)长：（宣读马尔基什的供词，卷15，案卷页149）“……1942年4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时，由于洛佐夫斯基的安排，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等几个热心的民族主义者被推上了领导职位……”你是这么供述的吗？

马尔基什：绝对是这样。我加入了委员会，但对委员会却持反对态度。

(审判)长：你接着说（宣读供词）……“列进委员会的有：斯皮瓦克，霍夫斯坦，贝格尔森，加尔金，努西诺夫，多布鲁申，希梅利奥维奇，莉娜·什泰恩……斯特龙金……克维特科和我。”是这样的吗？

马尔基什：这是概括起来说的。我当时根本不认识什泰恩，到现在也不认识。

(审判)长：你观察了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吗？

马尔基什：没有，他们待在古比雪夫，我连他们（在）古比雪夫开过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都不知道。1943年他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当时（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原来这已经是第二次全体会议了。他们把我当做外人。我处在他们活动的圈子之外。

(审判)长：他们是什么时候把你包括进委员会的？

马尔基什：在古比雪夫的时候，他们在自己人中间划分了职能，这以后，他们组织了《埃尼凯特》报编委会，这是1941年的事情。1942年爱泼斯坦来莫斯科，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到莫斯科来是要去联共（布）中央协调编委会的组成人员问题。中央把你划掉了。”我心里感到很恐慌：这就是说，我对中央，对党必

定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但却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了错误呢？原来，是他们欺骗了我，到后来，仿佛是想缓和一下这件事情，他们在1942年把我包括进了委员会。

（审判）长：既然委员会里全是民族主义者，那你为什么还要加进去呢？

马尔基什：我那时还不了解这个情况。我只不过是对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克维特科、贝格尔森他们几个人心怀敌意。

（审判）长：于是你就到这个敌对的群体中间去了？

马尔基什：有人对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工作，而我这个人做事又没有考虑我个人是否有好感的习惯。

（审判）长：谁对你这么讲的？

马尔基什：这话是爱泼斯坦对我说的。他当时是犹委会的任秘书。

（审判）长：你是想说，你被邀请参加委员会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第一，作为一种补偿，第二，免得你和委员会做对？

马尔基什：是的，他们吸收我进委员会就是想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是想，“我们把他拉进来，他一旦置身于委员会之内，他也就没有办法再反对了”。

（审判）长：接下去你对这次大会的情况供述说（卷15，案卷页150）“……参加此次大会的人喊了很多反对法西斯的口号，然而他们的发言却和第一次大会上的情形一样，都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并隐含着深远的蓄谋。”你指的是什么？

马尔基什：我本人没有出席第一次大会。我在这里的监狱里做这样的供述的时候，我的理解，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在第二次大会上发言的有信教的人，那么他们同美国、加拿大的大的反动团体是有联系的，他们已经，如常所说，“全面接通了关系”。在这个问题

上用不着捏造，民族主义活动已经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年半了，他们已经开始肆无忌惮了，我已经见到了几期《埃尼凯特》报，看到了一些信号，下面我就来讲一讲这些信号。

在审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马尔基什同米霍埃尔斯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尔基什从作为剧院的领导者、作为政治活动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几个方面，对米霍埃尔斯给予了尖刻的否定的评价。在审问的过程中查明，马尔基什对米霍埃尔斯抱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米霍埃尔斯拒绝上演马尔基什的剧本。

按照马尔基什的说法，米霍埃尔斯的全部活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思想。米霍埃尔斯的这种立场使他所领导的剧院的创作活动都带上了印痕。

马尔基什：……1937年剧院里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他被告知：我们要封掉你们这个剧院，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你让剧院演出的全是些半神秘主义的玩艺儿，剧院就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及瓦赫坦戈夫剧院并立于首都，却拿这种糟糕透顶的货色给人看，真让人为它感到羞耻。

（审判）长：这是说1937年剧院的活动带上了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

马尔基什：它简直由于“面”向往昔而朽烂了。1937年拉·莫·卡冈诺维奇来看戏。完了他把米霍埃尔斯叫去，问道：“……你为什么侮辱人民呢？”然后又对他说：你到我那儿去。我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卡冈诺维奇曾告诉米霍埃尔斯：“……你什么时候要到我这里来，把马尔基什带上。”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代做了一定的反映，忐忑不安地准备去进行这次拜会，可是米霍埃尔斯并没去见卡冈诺维奇，几天后就带领自己的剧团出去巡回演出了。

(审判)长：由此可以做出结论，米霍埃尔斯在诱导剧团去搞民族主义。

马尔基什：米霍埃尔斯是一个大演员，我并不认为他可以和大
的世界艺术相提并论，但在犹太戏剧界里他还是挺有名气的。他把
韦尼阿明三世游记和格拉诺夫斯基^①留下的全部破烂当成剧院的
主要资本，可格拉诺夫斯基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迥然不
同的人，他不愿意见到人民甩掉这堆破烂，迅疾前进。他对以文艺
形式宣传社会主义的演出活动不感兴趣。临近1937年，剧院已经
衰败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米霍埃尔斯认为，没有人会对他做什
么不利的事情，因为那会被认作是……反对犹太人、反对党的民族
政策的行动……或和米霍埃尔斯在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

(审判)长：他终归是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怎么会让你加入了
委员会并且当上了主席团委员呢？

马尔基什：他是“有两副面孔的伊阿诺斯”。在和人谈话的时
候，他可以做出很有魅力的样子。当他被实际上宣布为反法西斯委
员会的主席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一个坐在王位上的小丑。可是既
然政府认为有必要任命他在战时去领导这样一个重要部门，那就是
说必须这样做。

其次，我心理上有了一种感觉，米霍埃尔斯在假充大人物。确
实如此。情况是这样的：洛佐夫斯基对所有的人都把他介绍成一个
真正的大人物，要人，于是我就疑惑起来，也许我认为他是个坏人
的看法错了。

(审判)长：怎么会这样呢。你把米霍埃尔斯说成是民族主义
者，同时又写诗，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形容他（宣读这首诗），把他

^① 亚历山大·格拉诺夫斯基（1890~1937），苏联戏剧工作者，革命后的国家犹太
剧院的创建者。20年代去西欧。

描述成是为自己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救世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你过去这样赞颂他，现在怎么能对法庭说，你对他有反感呢？

马尔基什：这个大厅里有轻声发笑的声音，我猜得出来，是洛佐夫斯基在笑。我必须告诉你，审判长公民，这里边没有任何可笑之处。洛佐夫斯基对待米霍埃尔斯极好，洛佐夫斯基对米霍埃尔斯这种极好的态度使得我去思索，也许是我错了。在我的概念里是这样的：如果政府派某个人出国，那么这个人就是有这个资格的。是谁派米霍埃尔斯到美国去的？——是洛佐夫斯基——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我们国家，把派往国外的人都看成是值得尊敬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审判）长：是的，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马尔基什：对委员会的深层活动中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多大兴趣。我总共只出席过两次主席团会议。在米霍埃尔斯死后，我在我们的报刊——《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看到悼念米霍埃尔斯的溢美文章之后，我沉思起来。

（审判）长：这同你对他做的那种形容不符。你是把他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马尔基什：我开始思索，米霍埃尔斯在我的眼中会那么坏，是因为我同他的关系不好。

（审判）长：他人并不进步，是个民族主义者，把剧院和艺术拖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泥淖。你至少也应保持沉默，而不应该给他写那种诗。

马尔基什：我当时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啊。法捷耶夫亲口说，像米霍埃尔斯这样的人一百年才能出一个。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所有同他关系不和的剧团都来追悼他，颂扬他。我那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你瞧，俄罗斯人都来这里对他大加赞誉，只有我一个人说他不好，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我们之间不发生这些职业上的

争吵，也许我同他的关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审判)长：你是把自己这首诗解释成追随他的葬礼期间出现的那种形势之作吗？

马尔基什：国家为他举行的那种宏大的葬仪促使我去思索，我想到，也许我真地错了。我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品质。我也是一个 人，也许我没有正确地理解他。

(审判)长：为什么你认为米霍埃尔斯是被人害死的？

马尔基什：他死去的第一天，情况有点混乱不清，艺术委员会里有人说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发生灾祸也是可以把人害死的。连着两天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他是遇害身亡的。后来又说他是喝醉了酒，可是调查的结果是他并没有喝醉。他死后最初几天一直未能确切认定他死亡的原因。应该说明，他有一位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的朋友特罗菲缅科，他们两人的妻子很要好，就连这家人都不了解他死亡的详情。连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这样一种情况让我感到捉摸不定，我一直在想，也许是我错了，就是在所有这些感情一齐涌上心头的情况下我写了这样一首诗。可是我并没有将这首诗公开发表。我只写了一个草稿。形势的实质和有预谋性促使我这样做了。

(审判)长：流言蜚语本不该听信，可你却拿过来加以利用，把他的死描绘成一场暗杀，把他同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的牺牲者相提并论（宣读诗作）。

马尔基什：在关于他的死的流言传出的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有一些由米科瓦伊奇克的那帮人暗派进来的法西斯分子在白俄罗斯活动，有可能是某个法西斯分子把他杀害了。这是流传最广的说法之一。

(审判)长：现在回过来谈那次出国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去了美国的？

马尔基什：启程前一或两天费费尔给我打了个电话。请我给他一首诗，他接着又说，他终于交上了好运——可以到美国去走走了。一听这话，我的脸都抽搐起来。不过，由于这次出国之前犹委会的领导人曾对我进行过恶毒的攻击，尽管中央委员会方面对我的态度充满了善意……

（审判）长：你说“态度充满了善意”具体是指什么？

马尔基什：指的就是我的作品能顺利发表，担任由上级任命的《真理报》撰稿人之一。1942年当我的书按页拼排成版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机要信使来要过校样。最后还有，这我已经说过了，这本书被推荐参加斯大林奖金的评选。而且提出推荐的组织是党中央，并不是作家协会。我觉得，这一切都使我有权利说，中央对我的态度是很好的。然而我还是被解除了在无线电广播电台编辑部里担任的职务。

（审判）长：但是你并没有向费费尔提出问题，并没有告诉他，去美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好运？对此应当做何理解？

马尔基什：不，我没有对他说这些，因为我和他没有这样亲近地谈过话。我并不是说，若是我就不会去美国，尽管现在我有权利断言，若是我就不会去美国。同犹委会的这场冲突斗争是很严重的。我想：“这就是说中央对我又感到不满意了。”我也感觉到了这个情况，因为我已被从编委会人员的名单中划掉了。可这会儿握着听筒的是那位胜利者，他要去“享受好运”了。我只对自己亲近的人说：“多么鄙俗”。正在打仗，可他却要去“享受好运”。我把这话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说了。但我若是对他说这个话，就会让他更加嘲笑我。他在中央对我进行诽谤，是想痛快一下——用他获得的又一次胜利，就是去美国这件事情，使我感到痛苦。

接着马尔基什评价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美国之行的结果和代表团在作家协会做的汇报。

(审判)长：那时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的组长是谁？

马尔基什：是我。但汇报会是他们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一块安排的。

(审判)长：你参加汇报会了吗？

马尔基什：参加了。汇报是应当联系某些具体事情来做的，可他们却没有讲什么重要事情。

(审判)长：而同罗森贝格的会见呢？

马尔基什：只字未提。

(审判)长：会上都说了些什么？

马尔基什：当时其他作家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莫斯科。所有的作家都疏散出去了。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讲了他们对这次出国之行的印象。座谈宣布结束后，费费尔由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看一看这个。”这是对克里木问题的信件几种草稿中的一份。那封信中还没有给犹太人造谣说如果他们得不到克里木，就要到波兰去。我说：“这是诬告百姓。”以老百姓的名义给政府写信，就必须同百姓有联系交往，他们有什么？有同犹太教会的交往联系。他们根据什么有权利这样说？

(审判)长：哪些人参与起草了这封信？

马尔基什：费费尔，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并且必须说明，他们还散布流言，好像说是莫洛托夫鼓励他们写这件东西。你知道，这种悄悄话一经由费费尔告诉一位作家，它就迅速传播开来。

我还要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1948年我们这些作家被法捷耶夫叫了去。去的人有贝格尔森、费费尔、加尔金和我。我来以后坐在了一边。这是爱伦堡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一封信》那篇文章之后的事情。对这封信是如何拟写出来的，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费费尔对法捷耶夫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了解这封信是怎样产生的，我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告诉

我，没有人给爱伦堡寄这封信，这是一个政治性步骤。”法捷耶夫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也许他知道的比费费尔还多，不过这个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审判)长：你说过费费尔在美国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群体联系上了，并且获得了他们对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吗？

马尔基什：我是在接受侦讯的时候被告知有这种联系的，我已经讲了我对此事的看法。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同罗森贝格会见的？

马尔基什：接受侦讯时才知道的。我曾对侦查员说过，我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半，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时间就是阅读这42卷材料的时候。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费费尔曾对留明说(是留明转告我的)，我们让他，就是我，保持一个“火炮射程”的距离。他们虚情假意地把我包括进主席团里，想以此让我保持沉默，可是我没有沉默。不过，关于他们的犯罪活动我在接受侦讯前一无所知……

(审判)长：接下来你讲了委员会向国外寄送间谍材料的活动(卷15，案卷页156~157)。你的这些供述是对的吗？

马尔基什：客观上是对的，但这些我是直到接受侦讯时才知道的，我不在允许接触这些事情之列。

接下来庭审的一部分时间被用于证明几乎全部的文献——犹委会寄往国外的文章和特写，都具有谍报性质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休息过后开庭审理戈尔德贝格来苏联的问题

(审判)长：你说戈尔德贝格不仅仅是一名编辑，他还是顽固的美国侦察人员，可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提到他的时候却很佩服他。

马尔基什：他是侦察人员的事我并不知道，而且不管这事有多

么蹊跷，就连安全部在这个坏蛋败坏了我们国家的名声一年半之后也没有发现这一点。一年半之后，西蒙诺夫和加拉克季奥诺夫去美国，还和他在一起并接受了他的采访。

我和他的直接联系是从哪里开始的吗？我和委员会并不来往。一位姑娘打电话告诉我，肖洛姆——阿莱赫姆的女婿、美国反法西斯科学家委员会主席来了，要我也去。我去了。来了大人物，尊贵的人物嘛。没有开主席团会议。我只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在场有一位摄影师。给和他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审判）长：在这之前，你和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见过面吗？

马尔基什：没有，没见过面。

一周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出席为戈尔德贝格举行的宴会。我不认为法捷耶夫是出于某些个人的考虑这样做的，这就是说，下面的人受骗了，下一步的欺骗行动就轮到了高级人物的头上。苏联作家协会被蒙骗了。戈尔德贝格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本人是一个俄罗斯的移民，并且服过几年的苦役。他在宴会上发表的讲演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请允许我把我这第一杯酒献给写出了犹如苏联宪法一样不朽作品的苏联最优秀的作家。”所有的人都兴奋异常。

随后马尔基什向法庭讲述了在“民族”宾馆的房间里同戈尔德贝格会见的情形。

马尔基什：他（戈尔德贝格）问道：“为什么关于比罗比詹的设想没能实现？”我对他说：“有哪个愚蠢的犹太人肯拿莫斯科去换比罗比詹。”接下来我告诉他，如果肖洛姆——阿莱赫姆的书用俄文出版，它可以发行十万册，能让人有饭吃。如果用犹太文出版，它就不可能销得这么广，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已经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他们想要大文化，他们已经没有了民族激奋。他们已经不会讲

犹太语，他们在比罗比詹能干什么。他们的孩子就是再过十年也不可能说犹太语。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已向他讲明了你坚决反对比罗比詹设想的信念？

马尔基什：1934年我写成了一部关于边防军人的剧本之后到过比罗比詹。我记忆起来的比罗比詹并不是比罗比詹这个地方，而是一些居住在边境上的人们。

1934年我对比罗比詹是什么态度？我认为那是个适合于愿意耕田，打鱼的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是个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所以在剧本里我没有一句话提到比罗比詹。我不相信，一个聪明的犹太人在这儿应有尽有，都会到比罗比詹去生活。我曾对他说过，当一只苍蝇落到一个球上的时候，它会以为踩着的是地球。而怀着苍蝇这种心理的人，希望展示一下自己，以显现自己是更为重要的人，需要有一个小小的支托。

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苏维埃文化，它包含了一切健康、先进的东西。向前走的犹太人会走向大海，而停下来的人就留在水洼里。

(审判)长：后来你们就分开了。那是什么时候？

马尔基什：我对他说，你还是要进行写作的。我可不是能让他感兴趣的人物。如果说他终究还是和我相遇了，那只不过是因为回到美国而对一个人们都知道的作家一点什么都不讲对他来说是不相宜的。于是在一家亲苏的美国杂志上登了一篇他评论我的小文章。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不过有人告诉我，文中有一个小小的段落指出，马尔基什身上全部的可贵之处就是“俄罗斯的宽阔胸怀”。这后来被费费尔当作对我进行告密的目标而加以利用。

接下来戈尔德贝格问我：“你们的学校情况怎么样？”我说，现在由全国人民提出的千百份申请正纷纷送至各高等学校，而当某个

俄罗斯儿童因未能通过竞争而被拒绝录取上大学时，他并不说这是歧视俄罗斯大学生。

近年来我们的高等学校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也包括不少的犹太人。我对他说，“你亲自到这儿看一看吧，有时间请到我家里来，看一看犹太作家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你们进行宣传的需要啊，这些对你很有好处”。

(审判)长：戈尔德贝格曾对犹委会的成员们讲过，交谈的范围很广：“同马尔基什在一起待上一小时，就会了解到比从别人那里一周了解的东西还要多。”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马尔基什：这事费费尔在接受侦讯时说过。至于费费尔是否诚实，克维特科昨天已经评判过了，当时他说，费费尔曾伪造过他的签名。费费尔生性狡猾。我同戈尔德贝格交谈过，我想他会得出一个印象：和他谈话的人并不愚笨。假如戈尔德贝格曾向他稍稍有过暗示，说我讲的话不够深思熟虑，有欠周密，那么费费尔一定会大肆夸大，张扬的。

(审判)长：戈尔德贝格曾说（卷15，案卷页166），“再派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到国外来一次，我们一定会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这说的是什么？

马尔基什：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致上是这样说的：“把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给我派到美国来，我们就能把世界翻转过来。”这就是说，他们到美国去了一次，就弄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假若能再派遣他们去一次，他们会弄出更多的这种事情来……

(审判)长：那个时候恰巧在准备派代表团去波兰吧？

马尔基什：不，那是另一回事。

(审判)长：可是你曾经供述过，1948年你们收到了一份派代表团去波兰的建议？

马尔基什：1948年我又接到海菲茨的电话。“马尔基什”，他

说，“我知道你不参加主席团的会议，我也了解你对委员会的态度，不过我请你来参加党组的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你是知道不参加党的会议是一种什么行为的。受到邀请而不参加党的会议是不行的。

我去了。结果发现这并不是党内的会议。海菲茨骗了我，好像希梅利奥维奇也被骗了，因为希梅利奥维奇后来发了言，他质问，这儿举行的究竟是党的会议还是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

费费尔报告说，曾想派代表团去波兰参加在犹太人区同法西斯匪徒进行斗争而牺牲的犹太人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他，即费费尔，为此给联共（布）中央写了报告，但是中央没有批准派代表团去。这时，与会的主席团委员中有一人站起来说，必须把收到邀请的事通知给主席团委员，并就由谁去的问题进行磋商。原来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而费费尔想自作主张地处理这一问题。后来，在我接受侦讯做供述的时候，我讲了自己的想法：这大概是想通过波兰与美国建立起联系的一种尝试。这可能是一种隐蔽的尝试，我把自己的看法对侦查人员讲了。

5月12日14时45分继续开庭。不久审判庭审判长对马尔基什审问完毕，接受审讯的人获得了提出问题的权利。

（审判）长：被告有谁要对马尔基什提出问题？

洛佐夫斯基：我提。马尔基什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犹太人委员会向国外寄送了些什么样的材料。那他根据什么说这些材料经过洛佐夫斯基那充满敌意的手传往国外？“充满敌意的手”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况且在进行审问时还没有这42卷材料？

马尔基什：既然犹委会寄往国外的材料经查都不是对苏联有利，而是相反的，既然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家们利用这些材料一层接一层地扯下披覆在我们祖国躯体上的外衣，把我们国家的实力暴露给外人，而不通过洛佐夫斯基他们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而且一

切事情他们本来就和洛佐夫斯基协商过，那我的说法就是以这些为根据的。

洛佐夫斯基：马尔基什在他1949年的供词中说洛佐夫斯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他从1942年就了解，就像现在得出的这种结果那样，这只“充满敌意的手”，如果说他知道我有民族主义思想，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他为什么不报告这一情况？

马尔基什：洛佐夫斯基是委员会全部工作的鼓舞者这一点是我到了这里的监狱里才了解的，根据这一种情况我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说洛佐夫斯基认为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是他在6~7年间可以一直与之进行交往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同我建立和他们一样的密切联系呢？

洛佐夫斯基：（对马尔基什）马尔基什找过我几次，是和哪些人一起，我和他以及与他同来的人谈过什么问题？

马尔基什：我们见面很少。1938年，当时我和洛佐夫斯基还不认识，有人告诉我，他是国家文学出版社的新任社长。我去了出版社，跟他说我想再版我的一本写国内战争的俄文书。他敷衍地接待了我，没有做任何肯定的答复。这本书没有被接受再版。这是我第一次见洛佐夫斯基。第二次会见是1940年7月，当时是讨论帮助留在华沙的犹太作家家属问题。我当时说，如果有可能救援这些作家的家属，那我们就应当这样去做。后来，在1941年我还见过洛佐夫斯基，那时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一起被召到联共（布）中央，那些作家当中有一部分人今天就在场。洛佐夫斯基接见了我们，他说必须到外面去搜集有关敌人的暴行的材料，以便今后把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情形反映出来。

洛佐夫斯基：目的是什么？

马尔基什：目的是要把这些材料送到国外去，并不是要在国内

使用。当时克维特科和努西诺夫去了。我没有去。

洛佐夫斯基：（对马尔基什）你在供词中说，洛佐夫斯基是一个活跃的崩得分子。这是富有诗意的比喻还是散文样的谎言呢？

马尔基什：这个问题撤掉了。我是从侦查材料中知道洛佐夫斯基是崩得分子的。

洛佐夫斯基：（对马尔基什）材料你是1952年4月读到的，可供词却是1949年年初的，这意味着什么？

马尔基什：这意味着：洛佐夫斯基在1949年做了第一次供述，那之后侦查员告诉我说，案件涉及的所有人员都是崩得分子，并且给我读了他们对此事的供词……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你对法庭说，关于米霍埃尔斯的那首诗没有发表，可是它却刊登在《埃尼凯特》报上。

马尔基什：在这儿宣读的那首诗共有90行。而这首诗是由好几位诗人共同写成的，登载在葬礼当日的《埃尼凯特》报上。这首诗里也有我写的12行。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在这里马尔基什对米霍埃尔斯做了否定的评定，指责他有民族主义思想。我想问一问，马尔基什在报刊上是否发表过反对米霍埃尔斯的文章？

马尔基什：在报刊上我记不得了，不过我记得我是发表过反对米霍埃尔斯的意见的，因为我认为他在上演剧目的文学部分是干了缺德事的，我和他曾因此争吵过。

（审判）长：（对马尔基什）是在作家协会吗？

马尔基什：是在剧院的生产会议上。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马尔基什是否写过关于米霍埃尔斯的书，书中把他说成是一位大戏剧工作者，却闭口未谈任何民族主义思想？

马尔基什：我是写过一篇关于米霍埃尔斯的争论性文章，不过

我说他是一个大演员这并不是昧心话，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大演员。

费费尔：请你说一下，犹太剧院上演过你的哪些戏剧？

马尔基什：“土地”

费费：在哪一年？

马尔基什：1930年。

（审判）长：讲一下上演过的戏剧。

马尔基什：“土地”，“奥瓦季斯一家”，“筵席”，后来又演出了“以眼还眼”，这还都是疏散时期的事。

（审判）长：四部剧吗？

马尔基什：是的，四部剧。1947年我写了一部悲剧“犹太人的起义”，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费费尔：马尔基什说，党中央曾推荐他的一本书参加斯大林奖金的评审。这本书是否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马尔基什：没有。书是由中央委员会推荐的，这是法捷耶夫告诉我的。亚历山德罗夫^①把国家出版社总编辑米亚斯尼科夫召到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去说：“赶快把马尔基什的材料给我送来，因为我们推荐他参加斯大林奖金的评审。”当时法捷耶夫曾在会上说：“马尔基什得到了推荐，但是未能获得斯大林奖金，因为他来自民族共和国的竞争对手很多。”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你是否还记得法捷耶夫曾责备你的书含有民族主义的内容？

马尔基什：胡说。那是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你有一首讲镜子的诗，说镜子掉了下来，摔成了碎片，你努力要把这些碎片拼接成一个整块。你却依然没能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法捷耶夫说这

^① 亚历山德罗夫，曾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首诗是悲观主义的。如果费费尔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他是无权诬蔑法捷耶夫的。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你不记得法捷耶夫说的被打碎了的人民和碎片的话了吗？

马尔基什：不记得了。他对我说：“……能感觉得到，你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很悲哀的……”

费费尔：（对马尔基什）我什么时候去过你家吗？

马尔基什：没去过。

费费尔：1944年我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过言之后去了你家，在你的家里我们一起待了两个小时。在那儿我概括地给你讲了这次出国的情形。你的妻子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我甚至可以说出你房间的样子。我在那儿给你讲过，奥帕托舒抵制了我们在美国开的大会。

马尔基什：这简直是要无赖，这种保全自己的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你们想一想，他还能讲得出来我妻子对这件事会说一些什么话的。行前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当中，他往我头上泼这么一盆污水，想说明他到我家里来过。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他连我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审判）长：（对费费尔）马尔基什那时住在哪儿？

费费尔：我乘地铁到白俄罗斯站下的车，但我无法准确说出他家的地址。

（审判）长：费费尔，你能肯定去过马尔基什的家吗？

费费尔：我去过他家一次。是1944年去的。

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之后，我讲了这次出行的印象。马尔基什走到我的身旁，邀请我去他家。我不能说我们的那次谈话带有犯罪的性质，但确实有过谈话这样一个事实。

（审判）长：你揭示一下，马尔基什的房间里有什么家具？

费费尔：我们待的那个房间很小，窄窄的走廊，没有什么家具，都是些铺着毯子的木床。

马尔基什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家，我就给他讲了奥帕托拿抵制了我们的大会，还对他讲了很多事情。他感到非常惊讶。

马尔基什：我提议曾经到过我家的安全部人员说一说，费费尔所说的我家的情况和他们看到的符合不符合。他是1944年去的。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从未修整过住房。我住的是标准楼，我上面住着阿·尼·托尔斯泰，我家下面是人民代表列昂诺夫，列别杰夫—库马奇、尼科利斯基将军，这是一幢11层的楼房；这样的楼房里的住宅会摆设些（廉价的）家具吗。

费费尔：我想补充说，有一段时间，马尔基什曾到我基辅的家里去过那么两次，我还曾请他向他的妻子转交过一件小礼物。

马尔基什：对，在基辅上演我那部写乌克兰西部几个州解放的剧的时候，我去过他家。在弗兰科剧院演出了我的剧之后，我和费费尔在演员俱乐部里吃过饭。

费费尔：对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是确定马尔基什去过我的家里。这一点已经确定了。我说这事是因为有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还是正常的。马尔基什可以读他的诗，我可以发表讲话，赞扬他。

还有一个问题。马尔基什说过，《文学报》上有过一篇文章，说他的创作是民族激进主义的。所有的犹太作家都知道是谁写文章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和《文学报》的，这些文章是努西诺夫写的。这是马尔基什最知己的朋友，也是惟一个他不加以敌视的人。甚至连他（也说），马尔基什的创作是与无产阶级文学背道而驰的。

马尔基什：我知道他给《文学报》写了文章，但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写文章的事我不知道。我不否认，努西诺夫对我很好并尽其所能地著文论述我的创作，可是那篇文章里讲的不光是我，也讲了犹

太文学，所以我并不知道是谁写的那篇文章。

差不多5月12日晚间开庭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调查马尔基什同费费尔和克维特科的关系上。他们相互之间由来已久的不和被摆到了法庭上。他们相互指控对方有民族主义思想，不体面的行为。5月13日继续开庭。

№1169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马尔基什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3日)

向马尔基什提出问题的有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克维特科，希梅利奥维奇，塔尔米，贝格尔森，布雷格曼，尤泽福维奇。这些被告人把马尔基什的供词订正得更加确切，还引证马尔基什无法否认的具体事实从根本上推翻了一部分供词。特别是费费尔与马尔基什的供述相反，断言“米霍埃尔斯同马尔基什的相互关系是大家都清楚的……多年来他们一直很友好。”

大家都知道，米霍埃尔斯很高兴上演马尔基什的戏剧。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只间断过一段短暂的时间，马尔基什从来没有反对过米霍埃尔斯。”

(审判)长：马尔基什，我想简短地总结一下审问的情况。请你对问题回答得具体些，因为你所做的说明非常广泛，甚至详尽得没有必要。我问你，你是否承认犯有参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的罪行？

马尔基什：不承认。

(审判)长：那为什么在接受侦查时你承认了这一点？当时问你，你承认自己有罪吗。你说：“是的，我承认有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我和其他一些民族主义者：贝格尔森，费费尔，霍夫斯坦，等等。”接着你说，单是把这些人的名字罗列出来就已经能够说明，犹委会是民族主义者的巢穴。

马尔基什：我是处在这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圈子之外的。

(审判)长：也许你承认自己有罪是指你和参加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人员共同活动，且直到被捕时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马尔基什：不，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

(审判)长：可你在预审时曾供说(卷15，案卷页126~130)，自青年时起，你就是以民族主义精神教育起来的。你的父亲产生了影响，贝格尔森，霍夫斯坦，克维特科等等人发生了影响，是他们把你培养成了一个民族主义作家。

马尔基什：在审讯的过程中你已经有机会看到，我受这些人的影响有多么大。

(审判)长：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供述？

马尔基什：在侦查的过程中，经常说到民族特征和民族主义。民族局限性是一回事。我可能在狭小的民族思想的天地里写诗，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做这些供述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想，每一个在押的人，只要有某些过失，都会这样承认的。可现今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想到这个就感到害怕。在对我的剧本《奥瓦季斯一家》进行分析评判的时候，我说了，我在剧本中出了民族主义的偏差。我在自己身上搜寻某种可使我论为罪犯的污痕。

(审判)长：你说(卷15，案卷页129)，在国外你曾会见过奥帕托舒，格林贝格，说在波兰你迅速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这些供述都是真实的吗？

马尔基什：这些不符合事实。

为什么做这样的供述呢？你说你是一个心灵纯正的诗人，只讲真话，为什么要给整个诗坛抹黑呢？

(审判)长：你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你怎么能够在预审时承认

这一切，而现在却加以否认呢？你现在来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确如鉴定书所确认的那样，已变成了犹太人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

马尔基什：现在来评判犹委会的活动，我完全可以断定，委员会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庇护所，我读过这42卷材料之后，我为自己所过的生活感到羞耻。我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为间谍配制精美谍报“菜肴”的卖私酒的酒馆。

委员会没有站到政府把它安放上去的那条轨道上，于是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巢穴，也许是中心。

（审判）长：委员会派遣自己的奸细去收集材料，又有人来找它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说明它是一个中心。

马尔基什：我同意你的看法。费费尔从美国人的嘴里听到克里木、黑海—土耳其、巴尔干这些词儿的时候，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的。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些暗示的实质的话，那不是还有一个敌人用的毫无掩饰的词儿——登陆场嘛。

可是在法庭上他却坚决地说，他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协商的。在同法西斯分子及法西斯的同谋这样谈过之后，在同反动分子勾结起来，密谋为了美国政府把克里木这样国土从苏联分割出去之后，在干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怎么居然还有胆量踏进苏联大使馆的大门，他怎么竟然还有胆量面对苏联政府，面对苏联的司法机关！

（审判）长：（对马尔基什）那么你是说，委员会已经变成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活动中心，干起了并不是它该干的事情，此外，它还成了间谍的巢穴。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变成这种样子的。具体又是谁人把它变成了民族主义活动中心的呢？

马尔基什：在我读完了这42卷犹太人耻辱总汇的时候，我看出来，领头这样干的是爱泼斯坦，费费尔，米霍埃尔斯，我又想，他们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呢？于是我明白了洛佐夫斯基所起的作

用。他们不分年龄大小都说，去找洛佐夫斯基，什么事他都会办好的。他们同洛佐夫斯基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只要一个鼠疫杆菌，就可以毁掉整个机体。对此还必须补充一点，洛佐夫斯基对这个委员会关爱备至，把它树立为其他委员会的榜样，最终他也和他们混到了一起，而没有把他们当作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大祸害炸掉。

(审判)长：其他的人，霍夫斯坦，希梅利奥维奇，贝格尔森和其余的人在整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

马尔基什：在委员会里贝格尔森是最热衷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他们都很敬重他。第一，他在美国有名气，是个老作家，他写书讲述旧世界的传统，他是反法西斯委员会所需要的那种文化的综合体现。

(审判)长：是一个适于从事委员会后来领导进行的那种犯罪活动的人物？

马尔基什：只能这样说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我曾经考虑过，我能不能同意说他们都是间谍。对费费尔我可能这么想，但对贝格尔森我不能设想他会是个间谍。我很难指控这些人从事间谍活动。

我说一下霍夫斯坦。这个人有点儿不太健全。人们曾因1918年他在基辅写了一首劣诗而对他进行诽谤，而他竟然把这些诽谤承担了下来。他不是自行成长的，他受到人们尽心的保护。我记得人们曾经这样说：“霍夫斯坦吃晚饭去了，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审判)长：建立委员会的时候他是作为老民族主义者参加进来的吗？

马尔基什：是的。他也有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他曾写信提倡古犹太语，此事他已酝酿了好几十年。梅尔松来的时候，他给她发了一封电报，说应该恢复使用古犹太话。这些行为都不是出自健

全的头脑。

(审判)长：这也许是一种政治倾向？

马尔基什：不，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受压抑感。我从供词里看到，他曾经经营过祈祷书的生意。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作为诗人而求取学者名位的人，竟然会去经营祈祷书的生意，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审判)长：他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给犹太教堂供应祈祷书吗？

马尔基什：那是在基辅时期最后一段时间的事。他同犹太教的经师有联系，就是说他的行动完全脱离了正常人常规。我现在按时间顺序对他做一个纵向的剖析：最初几年的情况，他写了一些好似出自民族知识分子手笔的诗。他去巴勒斯坦旅行，后来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这是他登上诗坛的宣告。在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他没有去承担时代赋予第一代作家的沉重使命。他在反映现实上取得的成就越小，就越是回过头去发掘旧的东西。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创作成就，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不容争议的犹太抒情诗人。

就性情说，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

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的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往某项设施派人，打算写一篇特写，而这篇特写本身就可能产生一般潜在的力量……

我很难说，犹委会主席团委员中什么人自觉地进行了间谍活动，什么人是盲目进行的，因为费费尔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主席团的其他委员。

(审判)长：克维特科是委员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吗？

马尔基什：是的，克维特科是委员会的一名活跃的成员。初期他是一个头头的副手。这就是他的活跃程度的一个自我判定。克维特科这个人若是做起什么事情来，就会全身心投入地去做。他的活跃程度可以从两点来判定。有一段时间他坐在委员会里一张桌子后

面办事情，究竟是做什么事情我可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他是以副
任秘书的身份做事的。还有就是曾到克里木去过，那次去就产生
了那份荒唐的呼吁书。我不能说克维特科就进行过间谍活动，但他
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从你的回答中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克维特科，
贝格尔森，霍夫斯坦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核心，这几个人是很活跃
的，他们和费费尔及米霍埃尔斯一起，共同指导着委员会这方面的
全部工作。

马尔基什：这得稍稍插上一句。费费尔完全是独断独行地领导
委员会，他不让委员会的成员管他的事情……

(审判)长：你说过，希梅利奥维奇赞同米霍埃尔斯的民族主
义观点，你是否听到过希梅利奥维奇本人在委员会的讲话？

马尔基什：对这个问题我一无所知。我必须说明，所有这些肮
脏事我都是到了这里，被关进监狱之后才知道的。

(审判)长：布雷格曼在犹委会扮什么角色？

马尔基什：辱骂马尔基什的角色。

(审判)长：他在什么场合又是因为什么对你进行辱骂？

马尔基什：我在苏联情报局党委会的会议上是孤立的。会上所
有的人都反对我，其中就有布雷格曼。他曾说：“我们就没把马尔
基什瞧在眼里。”我就是凭一句话来评判人的。第二天我去找沃尔
科夫，对他讲起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沃尔科夫对我来见他表示感
谢，并且说他们已经采取措施去查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我明白了我
在这场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这使我感到鼓舞。

(审判)长：应当这样来理解，马尔基什，全体共产党员，整
个集体都反对你，而你反对整个集体。是应该这样理解吗？

马尔基什：在讨论我的声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明白了，事情会
变得对我不利。我明白了，已经和洛佐夫斯基进行过商讨。我感觉

得到，我同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及其副手之间将有一场决斗。党委会会议的整个进程都是和我做对的。我在这儿说这件事情完全是坦诚而真实的。在这件可耻的结论上洛佐夫斯基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不可往自己的招牌上抹黑”，——这就是对我进行辱骂的缘由。

在审问过程中出现了犹太剧院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战后的际遇问题。

(审判)长：……我还想做个补充，1946年米霍埃尔斯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在那里他被告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到该撤销的时候了。当时，据说好像费费尔也在场……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有过在联共(布)中央进行的这次谈话吗？

费费尔：是的，有过这么一次谈话。米霍埃尔斯和我被帕纽什金召到中央委员会。帕纽什金问我们对撤销犹委会问题的意见，因为，他说，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些反法西斯委员会该当撤销了。

米霍埃尔斯回答说，他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为时尚早，因为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消失，还必须与之进行斗争。

在这之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5人委员会来到犹委会，把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装上3辆或是4辆卡车拉走了。所有这些材料检查了2~3个月，之后帕纽什金又把我们召去，说撤销犹委会的问题暂缓进行。

在随后继续开庭时希梅利奥维奇又回过来问关闭犹委会的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费费尔，你今天说，1946年委员会里来过一个中央委员会的5人专门委员会。此后过了些时候就考虑撤销委员会的问题。那么你说一说，你把这件事情通报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了吗？

费费尔：事情是这样的，那时米霍埃尔斯还在世，这种事情由他办，对这点我没有可说的。

希梅利奥维奇：不过这事给犹委会主席团通报了没有？

费费尔：这是 1946 年的事。我和米霍埃尔斯两人去见帕纽什金。他要我们把就中止委员会活动一事致国外犹太人组织的信件草稿交给他。草稿是我写的，米霍埃尔斯协助我。这份草稿的想法是大家共同努力同法西斯进行斗争。我们指出：中止委员会活动的目的是把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共同努力联合起来，我们还号召各个国家的一切反法西斯组织加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舒梅科曾就此事召我去中央委员会，对我说他想再看一看犹委会的材料，于是全部档案又被收掉了。

（审判）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费费尔：是 1946 年底——12 月份。后来又召我去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建议在 1947 年 2 月 3 日召开犹委会主席团会议。前一天才把全部材料拉回来，3 日苏斯洛夫在电话上和我通话，他要我们以前怎样工作的还怎样工作，不会有什么变化。我问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什么指示。我还是想知道，犹委会在工作中出了什么错误，于是我要求巴拉诺夫接见，我是和米霍埃尔斯一起去的。

巴拉诺夫说并没有什么意见，但要我们更加努力地撰写反对战争贩子的文章。他说，这种文章应当具有更加激烈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我们加紧书写了一批批这样的文章，3 个月后在一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的代表舒梅科表扬了我们的工作，号召其他委员会学习我们的榜样。他（米霍埃尔斯）为什么没有把所有这些情况通告给主席团委员，我不知道。

希梅利奥维奇：那就是说，没有向主席团通告了。

费费尔：是的，没有通告。

（审判）长：最后一个问题。有关 1952 年 2 月 29 日审讯记录

的事。你是犹委会主席团的委员，在问到犹委会原领导人进行敌对活动的问题时（卷16，案卷页312），你讲了它的形成过程，然后接着说道：“要讲活动，因而也就是讲犯罪活动，就必须说，是一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和对苏维埃政权抱敌视态度的人当上了委员会的领导，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间谍中心，在它的周围聚集起一帮犹太民族主义者、间谍和其他的流氓无赖。”

这些供词属实吗？

马尔基什：属实。

费费尔：你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马尔基什：从侦查时我看到的材料中知道的。

（审判）长：你接着供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行的犹太文报纸《埃尼凯特》报变成了煽动犹太人口中落后的那部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机关报。这是真的吗？

马尔基什：是的，是真的。

（审判）长：接下来你还说，犹太人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一切有冤屈的犹太人的代表机构”。这是真的吗？

马尔基什：是真的。

（审判）长：再往下。你被问道：“你的罪行不只是通过犹委会寄出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内容的文章。你来详细供述你作为犹委会主席团委员进行的罪恶活动。”你说，作为主席团委员你对你所进行的活动负有一定的责任，接着又说：……我参加过许多次讨论委员会的活动计划和其他与活动相关问题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特别是犹委会有一次会议讨论了派几位犹太作家去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地方，收集有关把疏散的犹太居民遣回原地，及当地政府和居民对他们的关系的资料的问题。

哪儿说的是真话，马尔基什？

马尔基什：当我向侦查员提出问题，你们称为计划的是什么的

时候，他回答说：“派遣作家的事难道是没有计划进行的？”

（审判）长：侦查员审问你的时候，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在场的，而且你亲手修改、订正速记稿，并签上了名字。

马尔基什：我是后来才签的字，记录并不是当着我的面做的，是由侦查员写成的，可是当我问侦查员，“参加讨论计划”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他们派人去被解放的地区时，你是知道的，而这可不是没有计划地做的。

（审判）长：在供词里你接着说：“作为犹委会的主席团委员，我在呼吁书《致全世界的犹太人》上签了名。”这就是你对全世界的犹太人发表的一篇就内容说是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讲话？

马尔基什：不，这是塔尔米曾经问起过，为什么上边有他的签名的那份誓词。这份文件是在古比雪夫写的，可我是在莫斯科。

（审判）长：具体是哪个人写的？

马尔基什：我不知道。

（审判）长：它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吗？

马尔基什：据我看，那里边有一句对我们来说是带侮辱性的话。

（审判）长：签字是你的吧？

马尔基什：他们签上了 60 个名字。

（审判）长：你签过类似的民族主义内容的电报吗？

马尔基什：这倒是有的，这正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莫斯科的领导人疏忽大意的一种表现，他们让人的认识发生错误。

他们被禁止搞《黑皮书》。他们有什么权力编这种书。可这次大会正是庆祝《黑皮书》出版的，如果他们告知了我，这份电报同被禁的《黑皮书》有关，我还会在这封电报上签名吗？直到两年之后我才知道《黑皮书》被禁了。

（审判）长：就是说，你受骗了？

马尔基什：是的。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马尔基什：我想提供一点小小的说明。昨天开庭时，当说到我与克维特科的对质时，曾问我：“是否承认我在同克维特科对质时说的：我们进行了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活动”。我做了肯定的回答。我请你们理解，这仅仅是指我写《致一位犹太战士》这首诗所用的借喻而言。这是我发表的包含有反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号召用意的8万首诗中惟一一首借喻诗。

5月13日20时45分马尔基什讲了这些话之后，法庭侦讯过程中对他的审讯就结束了。对佩·马尔基什的审讯持续了将近三个整天——5月10、12和13日。

经过短暂休息之后，21时零5分开始审问贝格尔森。

No 1169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贝格尔森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3日)

21时零5分法庭继续开庭。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贝格尔森：具体说是哪些吗？我将对每一个问题做出具体的供述。

(审判)长：你先讲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然后我们再说具体问题。

贝格尔森：我的罪行是逃离苏联和民族主义。

(审判)长：好。现在你来供述，从履历开始，也就是从1918年开始。

然而贝格尔森却是从还要早得多的时期讲起的。他回忆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在世纪之初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情形。

贝格尔森：……我受的是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17岁之前我就没见过身边有其他的精神。我童年时不曾有过一本俄文书。

我11或12岁的时候才学会用俄语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犹太圣法经传题页上的词，因为每一本书那一页上的书名都依照法律的要求，要另外用俄文按音拼写出来。几乎是大多数犹太人，其中也包括手艺人，都学习犹太圣法经传。有的人掌握得多一些，有的人掌握得少一些。我记得有那么一位马具匠，每到礼拜六犹太人聚集到犹太教堂里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那些深奥费解的东西。那些不

懂、自己无法弄明白的就汇聚到犹太教堂去，在两次祈祷——日祷和晚祷之间，他给他们读犹太圣法经传并讲解意思。

8月里有一个所罗门教堂焚毁的纪念日。这一天所有的犹太人，甚至连儿童也在内都要吃斋一昼夜。要到墓地上去待一整天，在那儿“和亡故的人一起”祈祷，我被这座教堂焚毁的气氛深深感染，人们对这回事说得没完没了，所以在我6~7岁的时候，我好像觉着已经闻到了这场大火的那股焦糊的气味。我讲这些是想说明，这种民族主义的根子扎得有多么深。

我17岁时母亲去世了，我比哥哥们小好多岁。哥哥们宣布说父亲的财产剩的已经很少了，但他们还是给我分了一份。我被交给了大哥，他就成了我的监护人。过了一些时候，我已记不得是多久了，从基辅又来了一位哥哥，他把我和两千卢布一块带走了。他让我住在他家，供我吃，但是这笔钱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在这一时期我在基辅开始大量阅读犹太文书籍。同时学习牙科技术，好取得一门糊口之术。

不能说我要当一名作家。1907年我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它被刊登出来。到这个时候我真是博览群书了。犹太文学是很贫乏的。

我写出了第一部小说——短篇《聋子》，我觉得这部作品已经可以发表了。小说讲的是一个工人受有钱人的压迫，在他的磨房里干活耳朵变聋了。对这个耳聋的工人是这样描写的：对于他是整个世界变聋了。这个耳聋的工人想杀死他的主人。这部短篇小说在许多编辑部这家出那家进地转了好长时间，都说这是一篇好作品，但是不能刊载。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这篇小说后来收进了我的作品集，集子是1948年出版的。它被改编成了话剧《聋子》。这部剧在4~5年间一直在白俄罗斯的、莫斯科的还有其他的犹太剧院里不停地演出。

我的下一部短篇是《火车站》，这里边我描绘了一群在火车站

上的犹太人：犹太商人，犹太经纪人，犹太旧货商。他们这群好吃懒做的人游来荡去，火车站好像成了一头牲畜，它的肚皮上寄生虫爬来爬去。这些寄生虫彼此吞噬着。这部小说立即引起了我们国内和美国的所有犹太人对我的注意。

(审判)长：在哪一年？

贝格尔森：这是1909年的事。

再往后我写了长篇小说《一切都已过去》。这部书是1912年年底在维尔诺出版的。1939年此书又由国家出版社个人文学作品部用俄文出版。这部小说，用当时批评界的话说，使得我和最优秀的犹太作家并驾齐驱。某些人甚至把我和肖洛姆-阿莱赫姆相提并论。把我和肖洛姆-阿莱赫姆相提并论是因为我们俩住的地方相距不远，我和他都讲同一种地方方言。同时，在1912年又出了一位犹太出版商，姓克列茨基。

他在维尔诺有自家的房子，非常喜爱犹太文学，当然他可能更喜欢赚钱。不过他决定出一本杂志，就把我叫到了维尔诺，提出印行我的这本书并要我领导他想办的这本杂志的文艺部。我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就当上了只负责诗歌和散文的编辑，而政论文章由卡尔马诺维奇编辑。我在那儿工作了5或6个月，然后于1913年回到基辅，开始工作——写作。

书我是顺利地写成了，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年才出版。后来我又完成了一部叫做《乌埃根斯》的中篇小说，书中写了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1905年革命的年青人。按照性格说，我把他们写成了那种可能成为崩得分子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党人。我描写了他们是如何感觉生活空虚，开始是其中的一个来到了某个小镇，在那儿服毒自杀了，然后他的密友来到这个小镇了解导致这种悲惨下场的原因。原因调查清楚了，这位密友却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这部书我在1918年写成，收入了

《库利图尔-利加》这本集子中，关于这本集子，这里有人说里边刊印了马尔基什的作品，而我是想把他的诗刊印在那里边的。

这时我转向“文化联盟”。在那之前我是根本不问政治的，我需要的是犹太文化和文学。利特瓦科夫是一个疆土党党员，他本人在基辅的《梅谢利》工作。这是一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达维德·扎斯拉夫斯基和许多其他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都在其中工作。他虽然算不上最重要的，但也是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他和我结识后，就开始向我灌输“疆土党”的观点。这是一个犹太资产阶级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党。这个党的党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他们证明说，似乎根据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在异国他乡是不可能无产阶级化的。这是犹太圣法经传的理论。利特瓦科夫开始向我做宣传，但是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办法说服我。

（审判）长：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什么？

贝格尔森：为犹太人取得疆土，慢慢地他对我产生了一些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曼坚贝格医生和另外一些人获准在彼得堡成立犹太文学学会，并在大城市里设有分会。在这个学会举办的晚会上朗诵作品，做有关文学、有关犹太经典作家作品的讲座。这样，犹太民族主义不仅在文化上，不仅在文学上，也在其他所有方面兴盛起来。

（审判）长：这是1918年的事吗？

贝格尔森：不，这是1918年之前的情况。战时我被召到彼得堡这个犹太文学学会去，并举办了一个晚会，会上我朗读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后来革命到来了，先是二月革命，后是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初期，基辅政权频繁更迭。1921年之前有过好几种政权，出现过：邓尼金，德国人，彼得留拉的政府。这是一个令血液里渗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迷惘惶惑的时期——他身处何地，和他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在这段时间，1918年里，有过许多形形色色的

机构，文化社团。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社团呢？这些社团毫无疑问都是民族主义的，而且它们作为民族主义的社团存在已久。

……我那时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出了名。“文化联盟”的中央委员会由好几个政党的代表组成，里边有崩得分子，议会党分子，社会党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

我还得说一下达维德·扎斯拉夫斯基。他管文学界人士事务，同时在“文化联盟”理事会里任职……

(审判)长：你那时是哪一个党派的？

贝格尔森：哪个党都不是。

(审判)长：扎斯拉夫斯基是哪一个党派的？

贝格尔森：“法列尼格捷”党。这是由“议会党”和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合并而组成的一个党。

(审判)长：民族社会党吗？

贝格尔森：不是的，那是一个民族主义党，但却不是民族社会党。那并不是法西斯党。

这些犹太人党派联合起来了。就思想意识说，“议会党”很像社会革命党类型的政党。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文化联盟”变成了那个时期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它有着几家出版社、印刷所，几所学校，保育院，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戏剧学校。

(审判)长：“文化联盟”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吗？

贝格尔森：是的，它在外省有好些分部，并且广泛地扩展开来。“文化联盟”中央有4个无党派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无党派者。我的工作是担任戏剧学校的校长，此外我还是上边已经说过的所出版的作品集的经理之一。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任何工作了，每次苏维埃政府一来到，“文化联盟”就恢复活动，苏维埃政府资助它金钱。应当说，当时“民族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流行。

(审判)长：在其他政府，比如彼得留拉政府管辖的时候，你

也在“文化联盟”中央工作吗？

贝格尔森：是的，不过彼得留拉一点钱都不愿意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文化联盟”只能靠这个组织的成员，靠他们缴的会费维持活动。不过苏维埃政府一来，1919年提出要我担任戏剧学校校长的时候，我同意了，因为我保证可以领到一份可观的工资。

1914年我认识了克维特科。他几乎是个哑巴，他讲话很困难。

（审判）长：怎么，他生着病吗？

贝格尔森：不是的，以后我再说这个缘由。我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给所有的编辑部投稿，但谁都不登他的作品……

（审判）长：他那时多大岁数——24岁吗？

贝格尔森：是的，24岁。他的作品人家不登。我感觉得到，作品里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地——黑土地。那些诗，正像一切初试写作的文学家写的，都是非革命内容的，但是感觉得出来，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天赋。我们开始通信……后来，1917年（还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来到了基辅。他来找我时衣服破烂不堪，满脸风尘。我带他去见了几位朋友。把他介绍给多布鲁申。我们决定为他举办一次晚会。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他朗诵了自己的诗。这些诗，特别是儿歌，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后来他被征召入伍。

在后面的审问过程中审判长查问了贝格尔森对待布尔什维克、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

贝格尔森：……我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取胜。我身边的人也不相信。我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仇恨，他们甚至让我产生好感，因为可以说是他们救了我的命。

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朋友们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是要过去的。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奈耶-采特”报的编辑，我已经说过了，是卡茨，他后来去

了美国并且在那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然后又回来，当了某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或是社长，我记不准确了。在 30 年代初他又去了美国。

我曾受邀编辑文艺栏目——诗歌和散文。我和党的本身，和党纲及党的志向都没有什么关系，大概编了一个来月，但是我作为一名编辑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因此我开始发表我自己写的东西。

我不记得我当时曾写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東西。这儿在场的有两个人当时曾在那家报社工作过，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他们提示一下。我请求法庭对这个问题问一下塔尔米和当年就住在基辅、读过这份报纸甚至还发表过一些东西的克维特科。还可以问霍夫斯坦。

我面对法庭老老实实地说，我确实不记得那时曾仇视过布尔什维克并反对过他们。

因为在这儿侦查员曾对我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我的全部作品就都会是民族主义的。我想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的作品的性质不是民族主义的。

(审判)长：你被指控的罪行有对十月革命抱敌对态度，那时候你是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分子之一，同“崩得”，“法列尼格捷”党有联系，等等。因此，对你的每一部作品，顺便说一句，你的作品数量是很多的，都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以辨清其实质。不过现在没有必要详细说这事。你必须在指控你的各条罪状的范围内做供述。现在你说，你公然敌视苏维埃政权表现在什么事情上？

贝格尔森：我是这样理解的，每一种敌意都应当表现为某些行动。我的行动是什么呢？我对苏联的敌意表现为我逃离了苏联。

(审判)长：对这一时期就说到这里吧。你因为什么突然逃到国外去了呢。曾经救过你的命、救过 15000 名犹太人、而且你对之怀有好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一般的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令你感到关切的事，可是你却抱有

疑虑，你是因为什么要采取逃往国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疑虑呢？而且是用来报答对你的拯救、对犹太人的拯救的。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中止了，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必须得往国外跑吗？

贝格尔森：……在基辅政权更迭时期我们的生活很差，物资非常匮乏。于是在波兰侵占时期写出了那么一封信，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审判)长：写往哪里？

贝格尔森：写往美国，写给斯皮瓦克医生。这封信是由住在基辅的批评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巴拉绍维奇医生写的。因为我在挨饿，作家们在挨饿，我就和别人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封信发出去的时候波兰人正占据着基辅，一些人散布流言说，这种被占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目前在基辅，报纸杂志都已不出了，我们不再写作，我们无事可干，我们处于“吮吸死尸身上的奶头”的婴儿的境况，因此请求帮助。

……这封信被寄往美国，并在纽约发表。

(审判)长：登载在哪家机关刊物上，是谁发表的？

贝格尔森：我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1920年我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在犹太工人俱乐部有人对我说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候，在莫斯科犹太人作家俱乐部里，我开始为在寄往美国的信上签名而遭到责骂。后来跑到国外去的那些作家开始进行中伤，攻击。

应该写作，而我却没有办法写，不知怎么的就是写不出来，觉着好像没有才气了，过着饥饿的日子，非常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曾当过彼得留拉的部长的拉茨基·贝托尔季来找我，他说他是杜宾斯基办的那家向我预支稿费的出版社的合伙人。他告诉

我说，你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出版社将来不设在苏联了，要办在柏林，说我必须途经基辅到那里去。此外他还说，在柏林米勒出版社准备出版两部我的作品，这书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审判)长：你是从莫斯科出发走的吗？

贝格尔森：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供词里的这段记载是错误的：“彼得留拉政府的原犹太事务部长拉茨基把他的几家‘人民党’出版社转移到了柏林。他说服了我和克维特科随他一起逃往国外。我们从基辅出发去了明斯克。然后在1921年3月试图非法越境。在国境上我们被截获并逮捕。”

就是说，你们并不是从基辅出发走的？

贝格尔森：那里面把一切事情都说得太尖锐了。我为什么在说得如此尖锐的东西上签字。后来，住在柏林期间，当肃反委员会受到猛烈抨击的时候，我写了一部名叫《严厉的尺度》的书，我在书中证明说（那正是1924年年底和1925年年初），苏维埃政权在道义上有权实行最严厉的惩处，也有权通过放大镜去看待对它进行侵害的各种罪行。

于是，在我被捕后，第一天让我感到非常可怕，我得让自己把事情想个明白，我就对自己说：“当年你曾写下了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有权通过放大镜去看待对它进行侵害的各种罪行，那么现在你也应当通过放大镜去看待自己干的事情。”

我现在认为那次逃跑是一种敌对的行动，但当时却认为，我并未做什么敌对的事情。

(审判)长：就是说，你不是从基辅，而是从莫斯科出发走的，而且还带着家眷？

贝格尔森：是的，在明斯克我和克维特科相遇。

(审判)长：你事先和他商量定的吗？

贝格尔森：不是的，克维特科说，是我曾劝说他逃跑。但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审判)长：不管怎么说，克维特科是在等你。

贝格尔森：我没有这么说过。

审判长非常详细地查问了1921年春贝格尔森和克维特科非法穿越苏联和波兰间国境线的详情。

在这天的整个开庭期间还详细地查问了贝格尔森在立陶宛、丹麦、德国的活动，来莫斯科的事，他同各种文学和政治团体的联系。

审判长这样做是因为侦查材料里边有贝格尔森承认他在国外的全部活动都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供词。

(审判)长：但是你说你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有联系，这些民族主义者，就是说也包括克维特科在内，举行充满忿恨的反苏座谈，捏造反苏谎言。

贝格尔森：我说一下这份记录。有一份我签了字的记录是侦查员事先就写好的，我差不多有一星期的时间都拒绝在上面签字。那里面有我手写上去的一句补订的话：“结果是成了这样。”这好像是5月份的事。

(审判)长：这份记录里有你写下的核对意见，但不是你说的那样。写的是“已勾掉的‘爱泼斯坦’一词不要”。在卷17，案卷页190上，1949年5月12日记载着你对所提问题的回答。问：这么一来，你除了民族主义的活动外，还进行过反对苏联而有利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了？你亲笔写着：“结果是成了这样。”

贝格尔森：我在这份记录上签字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我才写上了这么一句保留的话。

(审判)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贝格尔森：签字时我认为，我可以到法庭上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如实讲出来，法庭会相信我的。

(审判)长：为什么不能当着检察长的面把实情讲出来呢？

贝格尔森：我认为，检察长不会相信我的话的。

(审判)长：苏联检察院的代表主持对你的审问，而你却隐瞒真情，因为你不信任他。

贝格尔森：可是当时还有一位侦查员在座，他把原先的记录中我对问题的回答口授给速记员做记录。我本该阻止他这样做，可是我没敢那样做。我没有别的办法。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认为这份记录中记载的内容是不实的？

贝格尔森：我认为，那上面有很多是符合实际的，至于说反苏座谈，无论是我还是克维特科都没干过。

1934年贝格尔森回到了苏联。在随后5月14日开庭时，法庭查问了“犹太劳动者土地整理会”——“犹土会”活动性质问题。预审时，贝格尔森曾在一份他把该会的活动说成“敌对的工作”的审问记录上签了字。法庭审讯时，贝格尔森大大地缓和了由侦查员记录下来的他的措词。对建立犹太自治州方面的工作的评价与此完全类似。

利特瓦科夫和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被说成是民族主义的、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工作的组织者。

(审判)长：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预审时你曾说，几个犹太民族主义者把你拉进该组党支部当了委员，在党支部里你遇上了在基辅认识的老朋友、苏维埃政权的活跃的敌手克维特科、多布鲁申和马尔基什（卷17，案卷页176）。

这些供述属实吗？

贝格尔森：夸大了。

(审判)长：不夸大是怎样的呢？

贝格尔森：我们为关闭犹太学校深感焦虑不安。这就是公开承认我们将成为多余的人。其次，我们认为，这一决定并非出自联共(布)中央。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犹太学校的学生数量正在减少，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整体犹太文化问题。我看到，是父母自己不送孩子上犹太学校。我关心的是犹太文化今后的命运。加里宁认为，犹太文化可以在比罗比詹得到发展，这种提法我在他的小册子里读到过，也听到他亲口说过。我弄明白了，必须把这种文学拖延到它在比罗比詹发展起来为止。

贝格尔森：我对同化倒不是不相信，而是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垂死状态会拖得很长，这种状态有可能比死亡更可怕。

(审判)长：你现在还是把犹太民族在苏联人民中间受到同化称作是垂死状态吗？

贝格尔森：我说的不是人民，而是文化。

(审判)长：既然是文化，那也就是人民。

贝格尔森：苏联的思想原则在我的头脑中是生了根的，最终会想到犹太民族已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而处之泰然的。

(审判)长：就是说，你们讨论过学校的问题。你接着供认，你们这些反苏聚会都是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的，在努西诺夫或是犹太组党部其他的某个成员家里。你们是分批聚会还是怎么做的？

贝格尔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举行过一次专门的集会。

(审判)长：你们没有专门举行集会，可是一聚到一起，就会马上谈起这些事情的吧？

贝格尔森：是的，是这样的。

(审判)长：你们当时在学校这个问题上接受了利特瓦科夫的

方针，他是怎样教你们的？

贝格尔森：这是组里的方针。

(审判)长：后边你又说，因此你们批评党，批评政府，然后，你们这些激烈反对同化的人抗议关闭犹太学校，把一批犹太作家派往苏联的各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做报告，发表讲演，朗诵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以此来为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化和崩得的犹太民族特殊的理论的传播推波助澜……

“不过，进行这种活动的，”你这样说，“不光是我们这些进入了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党部的民族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人，其中你特别提到了米霍埃尔斯，他是在1937~1938年间加入到你们的行列中去进行这种活动的。

贝格尔森：这是那份记录里边的东西，我先前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记载得很夸大。

(审判)长：那么检察长在场时的审问情况呢？

贝格尔森：检察长在场也是那个样子。有一个地方，侦查员告诉我：“戈尔德贝格是美国间谍。”我对此很感吃惊，就说了一句：“是这样？”这句“是这样”记录里倒是有，但已经不带问号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侦查员时，他却说，在记录里这没有关系。

(审判)长：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你正是因为这些口供才被送上法庭的。

贝格尔森：他说，一个词的后面不能同时（书写）问号和感叹号两种符号。

(审判)长：你具体讲，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派没派它的同谋者到各个城市去举办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讲演，晚会，报告。

贝格尔森：是的，组里派它的成员去过。举办过晚会，其主题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其意图是希望犹太文化繁荣，扩展，普及到更多的群众。

(审判)长：讲演、报告用的是犹太语吗？

贝格尔森：是的，用的犹太语。

(审判)长：那么你还否认什么呢？是煽动民族主义情感？

贝格尔森：做这一切事情并没有勾结串通。

(审判)长：关于米霍埃尔斯你曾供说：“在1937~1938年间米霍埃尔斯开始特别积极地表现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开始经常在公共场所做报告，发表演说，同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党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达到了没有一次犹太文学晚会米霍埃尔斯不发表讲话的程度。米霍埃尔斯的这些讲话总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而且，尽管他把讲话都装潢上了亲苏的词句，却总能把他所面对的听众的特点巧妙地加以利用。在犹太剧院米霍埃尔斯挑选的演出剧目是他用来劝说观众相信，只有犹太民族才遭受到的那种苦难必定要周期性地循环往复，以及犹太民族是处在独立隔绝地位的。所有这些逐渐地造成了一种后果，就是各个阶层的犹太人开始到米霍埃尔斯的剧院来，仅仅是为了对他发泄一下自己的情感。”（卷17，案卷页179）

是这样的吗？

贝格尔森：1937年之前，米霍埃尔斯也发表演说。我说他自1937年起开始积极发表意见，是因为在利特瓦科夫之后，米霍埃尔斯“大权”独揽于自己的手中。

(审判)长：你是想说，在利特瓦科夫之后最有权势和最有名气的人物是米霍埃尔斯？那洛佐夫斯基呢？

贝格尔森：在整个期间，洛佐夫斯基只在一个晚会上露过一面。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就走掉了。

(审判)长：现在我对此没有兴趣。我问的是米霍埃尔斯？

贝格尔森：利特瓦科夫靠“大棒”保持对作家的影响。而米霍埃尔斯的影响是由于人们对他非常尊敬而形成的。他是一位非常有

才华的演员。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能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很好地伪装起来吧？

贝格尔森：首先他是一位大演员。他随时随地都在演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这个角色他扮演得很出色。此外，他还是剧院的领导人。

他扮演爱国主义者同样很成功。我在供词中写上了这样的话，任何一位大演员都能把正、反两方面的角色演得同样惟妙惟肖……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扮演着一个苏联爱国者的角色，然而内心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贝格尔森：是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扮演着苏联犹太爱国者的角色，不过他演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更真实一些。演这种角色流露出的腔调更为真实。他一开始扮演民族主义者，就显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干起罪恶的勾当，他也会显现出本来的面目。他的全部罪行被揭露出来之后，我才完全看清了他这个人……

贝格尔森：……他在方方面面都有民族主义思想。他为延续犹太文化而竭力斗争。

(审判)长：对他在剧院的活动你的供述是真实的吗？

贝格尔森：是真实的，因为像《卖牛奶的台维》这样的戏，若是把它和其他的剧结合起来，那么民族主义就是明摆着的。

(审判)长：你下边接着说（卷17，案卷179）

“除米霍埃尔斯外，1937~1938年间在聚集犹太民族主义者这件事上，洛佐夫斯基和他最亲密的帮手尤泽福维奇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段供词属实吗？

贝格尔森：属实。

接下来就洛佐夫斯基在如下一些事情上表现出的民族

主义思想进行查询：1938年他参加欢迎肖洛姆·阿莱赫姆的晚会，倡议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他在该委员会中起了主导作用，吸收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克维特科、爱泼斯坦、尤泽福维奇、马尔基什等等人参加委员会的活动……

（审判）长：你在供词中（卷18，案卷页269）说：“委员会领导人的讲话和发表在《埃尼凯特》报上的特写、短篇小说、文章，向外寄出，主要是寄往美国，其内容是抛开其他民族讲述犹太人在我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

过分地颂扬了犹太人在击溃德国法西斯的事业和战后的建设工作中的功绩，避而不谈其他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的主导作用。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其他民族的作用的轻视和民族主义的增强。”

这都符合实际吗？

贝格尔森：是的，符合实际。不过我想讲一下，仅只赞扬犹太人这一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其原因是什么，又来自于何处。

还在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之前，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让我写一份致犹太人的呼吁书，号召他们抗击法西斯。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亚历山德罗夫召见我们。按照他交待的任务，我写了一篇预定要由无线电台广播（广播大会）的呼吁书。这篇呼吁书是专门给犹太人的。可仅向犹太人发出呼吁那可不好。不过，既然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并不在意这一点，那就是说需要这样做。开了第一次大会。产生了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犹太人的，那就是说，它应当向犹太人呼吁。在委员会工作的爱泼斯坦了解美国，我也知道一些情况。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如果写的不是犹太人，就不会刊登。

我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我承认这一点，可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会感到惭愧的，有那么一次我就感到了惭愧。这事发生在一个由洛佐夫斯基主持的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我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在美国喜欢强烈的印象，并且追求这种效应。报道事实都要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这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说，也许可以利用一下这种方法。费费尔笑了一下，而洛佐夫斯基却没有任何反应。过后我还是决定——试它一下。我对费费尔说，我们来试一试吧。他说，他没有时间，他很忙，他不是编辑，等等。

我写了，然后把草稿读给费费尔听，他觉得很不错，我们重新抄了一遍，签上了两个笔名。费费尔选了一个“法利沙”，我给自己选定了另外一个什么化名，就把这篇文章寄到美国去了。当时还把它刊在了《埃尼凯特》报上，但是已经把耸人听闻的标题拿掉了。我至今不知结果如何，不过我确信这篇文章在美国已经发表了。

……有什么坏处？所有寄往国外的文章讲的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功绩等等。

（审判）长：是犹太民族特殊性问题吗？

贝格尔森：某些人有强调犹太民族特殊性的意图……必须说，曾有谣传说犹太人没有上过前线。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有人这样告诉我，囚室里有三个人——一个白俄罗斯人，一个亚美尼亚人，还有我；我这是听他们说的。

（审判）长：可是这些谣传你是后来才听到的，在你写文章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谣言？

贝格尔森：我在古比雪夫也听到过这种说法。这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记得在古比雪夫有过这么一件事，在电车里，当人们说起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这个地方，前线上没有犹太人的时候，站起来一个犹太人，给大家看他那条被截掉的腿……

(审判)长：这些谣言是反苏分子散布的，他们竭力煽动民族间的不和。这并不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始做这种事的理由。

贝格尔森：我是说，这种事情当然也起着某种小小的作用。

(审判)长：我们已经调查清楚犹委会活动的的一个方面，即向国外寄送民族主义作品和在苏联国内从事民族主义活动问题。

现在你来讲讲收集被写成通讯报道寄往美国的那些关于苏联(经济，文化等等)的情报的问题。这方面的罪行是什么？

贝格尔森：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怎么会不知道？

贝格尔森：我把这事和另外一点结合起来说，我们会讲到的。

我参与这种收集情报活动的身份是《埃尼凯特》报文艺部主任。

对委员会的整个工作，对我写信给某些作家，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作品——特写等等寄给《埃尼凯特》报，我不推脱自己的责任。既然对所有这些材料都进行过收集，我想以后，等讲到犹委会领导人的犯罪活动的最紧要时刻，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下边一段审讯调查了同准备并向政府呈送关于在克里木建立犹太自治共和国的信件相关的所有情况。调查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访问苏联、贝格尔森和犹委会的其他成员与之历次会见的所有详情用的时间更多。

接下来法庭讯问了贝格尔森在预审过程中关于反法西斯委员会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的供述。从1952年5月15日开庭审问贝格尔森的这一部分记录中摘录几段，就可以对侦查员费尽力气才获得的那些供词、对控告所有被告人的那些罪名，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1169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贝格尔森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5日)

(审判)长：现在我们来看你关于反法西斯委员会宣传民族主义思想这方面活动的供述。在你的预审供词中，特别是在1952年3月4日的审问记录中，就鉴定书一事问你：“你同意专家们的这一结论吗？”

你回答说：“是的，我同意”，接着你供述说：

“活动在犹委会中的民族主义者是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克维特科、马尔基什及其他一些人，还有我贝格尔森，以思想上的领袖和鼓舞者洛佐夫斯基为首，进行了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工作，形成一种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

现在你向法庭供述一下这个问题。

贝格尔森：宣传在国外和国内都是通过《埃尼凯特》报进行的。

我承认，在寄往国外和刊载在《埃尼凯特》报上的文章中，突出了在前线和后方立了功的犹太人的作用。我承认，这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

(审判)长：(宣读对民族主义宣传活动问题的总的鉴定结论)
你同意不同意鉴定结论？

贝格尔森：我同意鉴定结论。

(审判)长：就是说，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印刷品里进行的宣传中，犹委会都歌颂了圣经中的形象，鼓吹全世界的犹太人不

论阶级差别而仅按同一血统这一特征团结统一？

贝格尔森：对圣经形象的歌颂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所流露：在工作中，在谈话时，在诗歌里都有。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任何犯罪行为。有些形象对之进行歌颂是很适当的。有这种情况：歌颂某些形象能让我们产生一些非常有益处的想法。

（审判）长：（宣读致世界犹太人的呼吁书）

呼吁书号召每一个犹太人都宣誓：“我是犹太民族的儿女”还有其他等等。这就是号召按同一血统的特征团结统一嘛？

贝格尔森：呼吁书里说的是团结起来同法西斯斗争。

（审判）长：你认为同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光是一个犹太民族吗？

贝格尔森：要知道，这是在法西斯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战争时期，苏联的反法西斯的犹太人向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发出的呼吁。做这件事的那个时期，连具有民族主义感情的人也陆续地投入了斗争。书籍里边有很多词句在那个时候可以讲，而且恰如其分，可是在今天就会发现里边含有许多民族主义成分。有过这样一种说法：“犹太兄弟”。我看不出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好。

（审判）长：举例说，费费尔在他的“我是一个犹太人”这首诗里，不断地竭力强调他是犹太民族的一员，诗里从头到尾都在叫喊“我是一个犹太人”……

贝格尔森：“我是一个犹太人”这个说法本身是没有任何罪过的。如果我走到一个人的身旁说：“我是一个犹太人”，这有什么不好的？……

（审判）长：鉴定专家们研读了一系列文件，并据此断定，委员会实质上不仅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宣传的中心，而且还变成了职能范围很广的一般的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开始承担本不属于它的职能——在国内安顿犹太人，把犹太民族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等等。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这一鉴定结论是否正确？

贝格尔森：起诉书从我的供词中摘引了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我请求把这段话宣读一下。

(审判)长：(宣读起诉书。卷42，案卷页178)被告人贝格尔森对此供称：“由于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活动，犹太人民族主义^①委员会变成了苏联民族主义的中心”，等等。

贝格尔森：我确认自己的这些供词，如果需要，我可以加以解释……

贝格尔森：我必须说，委员会煽动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我的以及其他人的供词中都说到了这一点。这是对的。事情是这样的：委员会确实是在利用犹太人当时正经受着巨大的苦痛，他们有许多亲属被打死了这一情况鼓动民族主义。

委员会的领导人——费费尔、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在洛佐夫斯基的纵容下迅猛地推展开这一过程。主席团的一些委员，甚至那些原本并没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布雷格曼等人，都专心投入了这一过程。

审判长就证人阿布拉姆松供词的要点提出几个问题，从而结束了对贝格尔森的审问。

(审判)长：对这个问题他讲道：“在后来的交谈过程中，贝格尔森就据他讲似乎是在苏联存在的对犹太人进行压制和歧视的现象进行了造谣诽谤。而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按贝格尔森的说法，正在采取措施制止或消除歧视的事实，并竭尽全力谋求保证犹太人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享有应有的地位。”(卷27，案卷页4)。

贝格尔森：这是捏造。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人当时说，有犹太人被拒绝安排工作的事情；我感觉出阿布拉姆松就是来谈这件事的。所以我告诉他，我感觉犹太人会在非犹太人当中引

^① 原文如此。疑为“反法西斯”之误。

起愤怒，因为他们都力求到大城市，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等地方去居住。在这之后他再没有说话，告辞走了。

(审判)长：巴赫穆茨基在他的供词（卷27，案卷页136）中说：“贝格尔森从与我的谈话中了解到，最热切期盼去犹太自治州的是居住在乌克兰的犹太人时，就对我造谣说，据现在出现的苗头看，乌克兰的反犹太人运动正在加强，那边的形势对犹太人来说相当紧张……”贝格尔森接着这个话头往下说他自己，他想到犹太自治州去，在那个地方，如他所说，“死也瞑目”了。

贝格尔森：最后这句话是对的。我说过我想搬到比罗比詹去定居。但其余的全部是说谎。我知道有过一些反犹太人的行动，但是他没有对我说过乌克兰的犹太人想要迁往比罗比詹，我也没有对他说过那里有反犹太人运动，并且在加强。

(审判)长：证人加尔金在其供词中关于《埃尼凯特》报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属下创办一份自己的机关刊物——这就是以爱泼斯坦、费费尔、贝格尔森和我为首的《埃尼凯特》报，把犹太人团结在委员会的周围，鼓动他们的民族主义意向，以及同国外的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对这一点尤其特别关注）等项任务主要是靠这份刊物来承担的。

……讨论《埃尼凯特》报第1期拼版问题时，爱泼斯坦提出这样一个宗旨：“这份报应当是纯犹太人的，报上必须更多地引用圣经里的名言，提供能够满足不仅是居住在苏联的，也包括在国外的犹太人的有趣味的材料”。（卷27，案卷页230）

贝格尔森：加尔金的供词基本上符合实际。我记不得这是这一次的事还是另外一次的事，但爱泼斯坦确实讲过，《埃尼凯特》报是苏联的犹太人报纸，他的特点是阐释犹太人的生活和文化。此外我再什么也记不得了。让它作为苏联的报纸，不仅仅只反映犹太人

的特性，这不仅是爱泼斯坦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

(审判)长：被告贡塔尔在供述你的情况（卷 28，案卷页 10）时，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就是党和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反对者。他接着说道：“……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上层领导人物：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泼斯坦及其最亲密的同谋——贝格尔森和克维特科的努力，该委员会被变成了一个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组织，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我，都被卷入到他们的反苏活动里的”。

贝格尔森：这是他对我的看法，况且我具有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审判)长：也许，你们谈过这个话题吧？

在预审过程中，戈尔东、多布鲁申、尼斯托尔（卡冈诺维奇·平霍斯·缅杰列维奇）、库什尼罗维奇、斯托洛夫、罗加切夫斯基、斯皮瓦克评说贝格尔森是民族主义者，并举引了相应的例证。这些供词中相当大一部分贝格尔森都拒不承认。

6 月期间法庭日间开庭时间为 14 时 40 分至 20 时 20 分，其中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对被告贝格尔森的质询上。问题很多。所有问题都是驳斥贝格尔森在预审过程中提出的那些说法的。许多编造出来的谎言被揭穿。

提出问题的有：洛佐夫斯基、塔尔米、克维特科、尤泽福维奇、霍夫斯坦、马尔基什、费费尔。迫于事实的压力，贝格尔森不得不否认了某些供述。比如，贝格尔森曾供说，他在 1921 年见过的那个共产党员文学家诺姆贝格敌视苏联。

(审判)长：诺姆贝格是敌人吗？

贝格尔森：是敌人，不过这是到后来才查清楚的，而有关塔尔

米的谈话是1921年的事，那时他没有写过反对苏联的东西。

(审判)长：不过，他对苏联已经怀有敌对情绪了吗？

贝格尔森：没有。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讲这个对苏联怀着敌对情绪的诺姆贝格赞扬了塔尔米……这段供词(卷17，案卷页233)是不对的。

贝格尔森：他曾经试图要给《自由晨报》写一篇反对苏联的文章，但他那时并不是敌对分子。

(审判)长：就是说，1921年时诺姆贝格对苏联的看法不是敌对的，而是得当的？

贝格尔森：是的，他对苏联的看法是得当的。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供述呢？

贝格尔森：我未能坚决反对侦查员的看法。侦查员说：他是怀有敌意吗？我说：是的。

1952年5月15日继续开庭审讯。

20时2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20时45分法庭继续开庭。

№1169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15日)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认为你犯了什么罪？

克维特科：我承认我对党、对苏联人民犯了罪，我参与了这个给祖国带来很多祸患的委员会的工作。我还承认自己有罪的，是战后一段时期我曾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的责任秘书或是领导人，但没有提出把这个组撤掉，没有提出促进加快犹太人同化过程的问题。

(审判)长：你否认你过去曾进行过民族主义活动这条罪状吗？

克维特科：是的，我否认这一条。我没感觉到我犯了这种罪。尽管有这些关于我的案卷材料和供词，我觉得，我是全心全意地期盼我生于其上并把它认作是自己的祖国的这片大地幸福的。

(审判)长：你从你是怎样一踏上文学道路，早在基辅时就同民族主义分子多布鲁申、迈泽尔、霍夫斯坦、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建立了联系，是怎样和他们一起工作，并且受他们的影响从苏联出逃的这些事情开始，向法庭供述。你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供述。

克维特科：我曾请求法庭阅读我写的那封信及我被关在狱中写下的那些诗汇集起来的集子，我认为，这能比激动慌乱的口头供述给法庭提供更多的有关我的罪过的性质的资料。如果你们已经读过了，那我就讲得简短些。

革命前我过的是被人拳打脚踢的丧家犬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毫无价值。从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始，我过了30年美妙的精神振奋

的劳动生活，充分地享受着生活于可爱的祖国大地上的幸福，在这里每一棵草都在向我微笑。我的生活的终局现在就摆在你们的面前。如果需要说穿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以这样做，而如果说这些对法庭来说已经足够了，那我就从你们要我讲的地方讲起。

(审判)长：讲吧。

克维特科：我在基辅除贝格尔森之外没有一个朋友。我和他是在乌曼偶然相识的。我客居在亲戚家里，听说贝格尔森正在这个城市里，这是1916年的事，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出了名的作家，被认为是文学界最流行最新的一位作家。他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的特点——“聋子”，还有那部《火车站》，前一部作品饶有趣味地描写了磨房工人的生活，在后一部作品里他嘲讽了那种过“悬空”生活的人。在写作方面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许许多多其他的作家写过很多书，但这些书却未能流传到今天，现在都已不再印行，过2~3年就从文学舞台上消失，而贝格尔森的最早的几部作品今天依然拥有大批的读者，是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人格上他是有缺点的，但却是一位很好的艺术家。大约是在1915年或1916年，有人告诉我贝格尔森到这个城市来了。那时我对文学一无所知，我读的书很少，我从没上过学。10岁的时候我就到油坊去干活。所以我同他（的会见）虽然我曾在作品里写到过，但却只有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伙伴们知道此事，此外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全家共8口人——6个是孩子，他们成年后都死于结核病。只剩下我一个人。很早，我还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我跟着奶奶过，我在油坊和制革匠那儿干活养活她。我那时还不可能只单纯地去搞文学，我还是一个半文盲。文化我是自学出来的。所以当我必须去找这位名作家——贝格尔森，让他看一看我的这些小小的诗作的时候，我感到很害怕。我在大街上他的住宅旁边站了很长时间，没有勇气走进去，因为我的穿着很寒酸，而他当时却是一个很富有

的人。他的哥哥是制糖厂厂主，贝格尔森那时就是来他家做客的。我在他家门前站着想了很久，没有勇气走进去，最后还是进去了。我把自己写的诗给他读了一遍。他很喜欢我的诗，对我夸赞了一番。我就是这样结识贝格尔森的。

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天，他对我讲的那番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可是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我恍然大悟他本人对这些问题懂得很少。他有学识，但却是非常片面的。不过必须说，他当时待我很不错。这是我会见过的并且受到其热情接待的第一位作家。

贝格尔森回他自己的家里去了，我也回到乡下的家里。爆发革命后，我口袋里揣着一枚小小的硬币，几乎是衣衫褴褛地坐上火车，来到了现在叫做“彼尔沃迈斯克”的火车站。这个地方离我们村 30 俄里。我好不容易地在车厢的顶棚上弄到一个位置，来到举目无亲的基辅。在基辅候车室就是我的旅店。我开始寻找贝格尔森，找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贝格尔森还是热情地会见并很好地接待了我。然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一种神奇人物的多布鲁申和尼斯托尔（卡冈诺维奇）。当时这是基辅最进步的作家。

我那时只能用犹太语写作，而且文理极不通顺。我不能用俄语写作。我懂乌克兰语，因为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邻居们，就是儿时的朋友们都是乌克兰人，因此我通晓乌克兰语。

（审判）长：……你曾被吸收参加“文化联盟”的工作吗？

克维特科：被吸收参加“文化联盟”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这可是一个设有许多研究所的组织啊——所有这一切你都是清楚的。

我被什么吸收了昵？我在两册文艺作品选集中发表过两次作品。就是这一些。那时还没有苏维埃的杂志和出版社，而且总的说来私人出版社和国家出版社同等地存在了几乎相当长的时间。

（审判）长：现在说你逃往国外的问题。预审时（卷 11，案卷

页38)，对“你为什么要逃跑？”这一问题你回答说：“我认为，对犹太人的民族问题苏联政府解决得不对。犹太人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这据我看就是导致与其他民族相比一切独立自主都被剥夺，合法的权利受到限制。”

你把这一点说成是支配你的行动的动机。此外，在供述你在“文化联盟”中的工作时你说：“……我在‘文化联盟’中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有人鼓动我到国外去”，还讲出了一些人的姓名：努西诺夫、贝格尔森、拉茨基-贝托尔季和马尔基什，这几个人都是忠实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为了追求某种目的自己也都逃出了苏联。

你讲一讲出逃的动机。

克维特科：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你相信我。如果是一个信仰宗教的罪犯面对法庭，并且认为自己被错误地宣告有罪或是被错误地定罪，他会想：好吧，不相信我，给我定了罪，不过至少上帝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当然没有上帝，我也从来没有信仰过上帝。我只有惟一的一个上帝——布尔什维克政权，这就是我的上帝。我面对这一信仰说，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干过最沉重的活儿。干过什么活儿？我不想说我12岁的时候干过些什么。但是最沉重的活儿就是面对法庭。我下面给你们讲出逃的事，讲原因，但是请给我把话讲完的机会。

我一个人在囚室里蹲了两年，这是我本人自愿的，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没有一颗生气勃勃的心灵去同什么人进行商讨，没有对于诉讼事务比较有经验的人物。我是独自一人，自己和自己进行思索，形影相吊。1950年侦查员把我叫去，说：现在你的案子办结了。他催促我看一遍。我坐下来，匆匆忙忙地读完了第一卷——我的审讯记录，第二卷——其他被告人有关我的供词。我读毕，问道：如果你催促我，我就不看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交给我看这

些东西，我有些什么样的权利，也不跟我说。我问道，我是否有权提出异议，这里边有明显的谎言，捏造。只要什么地方有龌龊事——那儿就有克维特科，只要什么地方出了祸患——就准会有我的名字，只要什么地方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行——我定会适时赶上，到处都有我。我说，假若我看的是两卷关于一个我并不相识的人的材料，那我就会说，来了这个坏蛋，别让他玷污了苏联的国土，把他赶走。可我并不是侦查机关把我描绘成的那种匪徒，我并不是这里所写下的那种样子。这不是我。所以我提出请求：请给我指定一名辩护人，因为对敌人我能够斗争，我感到自己有力量进行斗争，如果党、政府、人民派遣我去把敌人掐死，我可以，我也会去掐这个敌人而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并不那么宝贵，对我来说另外一种东西更为可贵。可是我老实地说，面对自己人我是很软弱的，每一个我认为自己的亲近的人——苏联人都能够把我毁灭掉。你会对我说：可你干了这么一件事和那么一件事，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背叛。如果我总的说来相信你是一位真正的苏维埃人，我就会说：“当然，如果你这么说，那就是这么回事，而若是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都这么说，——那就意味着这更是确切无疑的了，那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叛徒，等等”。

我请求侦查员准许我请一位辩护人。他回答我说：“在我们把你的案子移送法院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把我们对你的结论和看法及全部有关你的生平的材料转过去的”。当和斯特龙金进行对质的时候，对质的主持人问斯特龙金，你为什么把民族主义者克维特科的文集用俄文印刷了7万份。他说：“克维特科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他的书印刷数量还要大，因为很快就会被买光”。侦查员打断他的话说：“住嘴，不要替克维特科辩护，……^①”。我心里想，这是怎

^① 档案复印件原文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么回事？可我现在看得出来，所讲的一切有关我的话在法庭上都是起作用的。我请求原谅我说了这样一些细枝末节，可是站在你们面前的总还是一个人啊。

现在说我的那次出国之行。差不多1919年全年我都住在乌曼，这是发生最为恐怖的残害破坏行为的地区。我经历了18次乌曼政权的更替。因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很危险的，我就待在房子里翻译舍甫琴柯和弗兰科的作品。1919年底我从这种噩境中冲脱出来，去了基辅。我来到出版社，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贝托尔季的作品，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我在这家出版社同金进行谈判，把我的那本书《1919年》和自舍甫琴柯到狄青纳的乌克兰诗选推荐给他们。他们同意了，和我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规定按月支付稿酬。这不过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一名独立的作家，我自己不要别的，更大的巨匠的帮助，便同出版社签订合同。在这之前，我曾在共产党的报社里干过校对员，在货站当过装卸工，还在孤儿院当过仓库管理员。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手稿（乌克兰诗选）交了出去，这是一部篇幅很多的手稿。我去领钱，负责人金对我说：“有这么一件事，我们要到国外去出版书籍，你和我们一块去吧”，我想了一想就同意了。我没有想到这会是背叛祖国。这次出行预计只有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应该出版我的书。我在这段时间可以稍稍学习一下，接受教育，见识一下世界，好把这些写出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见识世界就意味着丰富自己创作诗歌的蕴蓄。于是我表示同意，两年期满后还回自己的祖国。

（审判）长：在供词中你对于逃跑的民族主义动机是怎么供述的？

克维特科：那是假话。

（审判）长：因为什么？谁说的假话？

克维特科：我说的假话。

(审判)长：你为什么要说谎话？

克维特科：我很难同侦查员进行争辩。真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他们是怎样糟蹋人的。我被捕之前不久，此前一个月的时候，苏联作家主席团召开了一次庆贺我从事文学活动30年的会。并不是犹太组向我表示祝贺，而是苏联作家协会向我祝贺。优秀的作家们讲了话，讲话的有瓦连京、卡塔耶夫、马尔夏克、丘科夫斯基。别济缅斯基来了，并在主席团就坐。很多作家出席了，对我做了多少美好的发言呀。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发言说，我善于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给儿童提出迫切的问题。就在开过这样一次晚会之后，在举行了这样一个喜庆活动之后，却把我抓了起来，而且在第一次审问时就称我为民族主义者。我茫然不知所措了。那时我也没把所有其他的人当做民族主义分子。用不着说，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我每天晚上都在争辩，我跟你讲（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你把我的头砍掉吧，我不怕这个，我不担心自己的性命，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想干任何坏事，相反，我愿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工作都献给人民。

(审判)长：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供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现在你却又说，你到国外去只不过是出版自己的作品呢？

克维特科：因为他们不相信我的话，记下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在记录上签字？

克维特科：因为很难不在记录上签字。

(审判)长：就是说，你否认自己的供词？

克维特科：绝对否认。

(审判)长：你也否认是贝格尔森、马尔基什等等这些民族主义者唆使你逃跑的吗？

克维特科：是的，不管是贝格尔森还是马尔基什都没有这样做，而马尔基什我根本就不认识。

(审判)长：贝格尔森承认他曾从莫斯科外逃，你也听到了，他供说他认定这是对祖国的背叛，是逃亡。你是怎么同他会合的？

克维特科：难道不能一块乘车吗，不是常有这种情况吗：一位修士大司祭和一位工人乘坐同一节车厢？

(审判)长：可是你如何解释你曾和他一起试图越过国境呢？你同贝格尔森是什么时候在明斯克见面的？

克维特科：是我先去明斯克的。金曾告诉我，叫我不要担心，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我来到明斯克就等待着，也许金会来，但是他没有来，却来了这个贝格尔森。

(审判)长：贝格尔森是怎么找到你的？

克维特科：我是最早期的青年革命诗人之一，在明斯克都认识我。

(审判)长：你问过贝格尔森，他为什么到国外去吗？

克维特科：我没问过他这个，不过我知道，这同犹太出版社，同负责人金有关。

(审判)长：你否认说，你同贝格尔森之间并没有什么勾结，可是在预审时你曾讲过：“我认为，对犹太人的民族问题苏联政府解决得不对”（卷11，案卷页38）。出于这样的想法，你就离开了苏维埃俄罗斯，这段记录不对吗？

克维特科：是的，这段记录不对。

(审判)长：你为什么这样供述呢，而且你同时说，贝格尔森和马尔基什唆使你逃跑。

克维特科：我想我的论据会被听取的，但是他们不想听我说。请你现在听一听我的论据。

(审判)长：我也正想了解一下你的论据。这是你的签名，这可是法庭必须加以考虑的文件。应该相信什么，是你在侦讯时所做的供述，还是你现在所说的话。对法庭来说重要的是查清真切的事

实。

克维特科：我的论据应该得到听取，因为我将用事实去证实它。

(审判)长：我们在这里已经听到过了，说你的文学活动是完全全献给党的。

克维特科：我多么希望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平心静气地把我的生活中发生过并且能够说明我无罪的所有那些事实表述出来呀。我确信，若是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非常善于透视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人，他一定能讲出我的真实情形。我终生都认为我是一个苏维埃人，尤其是，虽然这听起来不够谦逊，但这是事实——我一贯都是热爱党的。

(审判)长：所有这一切都同你在侦讯时的供词是不一致的。你认为自己是热爱党的，那么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说假话呢。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作家，可你的思想倾向远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克维特科：我说党不需要我说假话，我供述的全是可以事实加以证实的东西。侦讯时我的全部供词都被歪曲了，一切看上去都颠倒了。我到国外去据说是怀有危害的目的也是这样，我是钻进党内的问题也同样是如此。就说1920~1921年间我的那些诗吧。这些诗都收在侦查员的一个文件夹里。它们说明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1919、1920、1921年间印行的作品是发表在共产党的报纸上的。当我对侦查员说这些的时候，他回答我说：“我们不需要这些”。

(审判)长：简短地说，你否认这些供词。

克维特科：我否认。我不能否认我曾在委员会中工作过，但其余把我说成是敌对分子的一切东西我都否认。请不要带任何幻想地听我讲述，我讲得简短一些。因为指控我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我必须证明我无罪。我只想向法庭列举那些可以查证的事实。说我是钻

进党内的，这不是事实，这可以通过事实来验证。十月革命中我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没有任何动产和不动产，我所有的亲人都死于肺结核病，在革命中我才成了一个人，目前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多亏有了十月革命才取得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是我生活中最欢乐、最幸福的节日。就是说，革命不可能是我出走的原因。这可以用我那时发表在基辅共产党的报刊上的那些诗来验证。

另外一个事实：推进犹太文化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不能被称为犹太文化（的拥护者）。就是因为这个，我被从当校对员的印刷所里赶了出来，我根本不了解犹太语言和犹太文化的独特之处。

我牵挂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另外的趣味和事件。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实际情况驳斥了出走的上述民族主义动机。当时苏联建立了很多犹太学校、保育院，合唱团、机关、报社、出版社，以及“文化联盟”的整个建制体系，都得到苏维埃政权充足的物质供应。陆续创立新的文化中心。我有什么必要走呢。而且我去的并不是极端的犹太文化当时繁荣的波兰，不是犹太人很多的美国，我去的是既没有犹太学校，也没有犹太报纸，又没有任何其他犹太东西的德国。所以说，这种动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那时我被认为是出于罪恶的动机出走的，白俄罗斯国家文艺出版社是不会同我签订出版我的文集的合同的，我的文集也就出不来了，而且我后来是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出国准许的。假如我被认为具有反苏倾向，那么科夫诺的秘密组织是不会出版我的诗集，也不会帮助我去柏林的。我若是犯有反苏的罪过，那么柏林的苏联驻外国商务代表处能给我提供物质帮助，能出版我的《乌克兰民间童话》，《白俄罗斯民间童话》，能为我在汉堡提供工作吗？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在苏联既有我写的书，也有人证。假如我是逃离了亲爱的苏维埃国土的，那我当时还写得出来《在异邦》吗？那是一部诅咒动荡而又停滞的生活的诗篇，充满对祖国、对祖国的星空、对祖国的

事业深切忧思的诗篇。如若我不是一个苏维埃人，我能有足够的力量在“德国工头”的侮辱和漫骂下，同在汉堡港工作时遇到的危害行为做斗争吗？那些人为强盗打掩护，却又装出一副宽厚和很有道德的虚假面貌。假如我不是忠诚于党的事业，我会自愿地承担起充满危险且要遭受迫害的秘密工作任务吗？干了一天沉重而收入微薄的劳动之后，我又无偿地去完成为苏联人民所必需的任务。这仅仅是从革命的初年到1925年，即我返回苏联的时候，我所从事的活动中的部分事实，部分物证。德国警察搜查了我的寓所并由阿尔通市府把我强行遣送出普鲁士境之后，在领导我进行工作的那些人的帮助下，我回到了祖国。我此行的真实动机是履行出版社的合同（我承担的责任是在两年之内独立完成并出版两部书）。就在这个时候我想雇请几位教师，把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一下。所有上述事实，以及出国之前我把自己的物品、家具什物交由基辅犹太图书馆馆长保存这件事都说明，我是把此行看做是暂时的，是打算回来的。我不知道我在汉堡从事的秘密工作重要还是不那么重要，但那是苏联所需要的，我也是不惜花费力量去完成的。这一工作的性质，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举例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是作为一个苏维埃人去那儿的，而且是打定主意要回来的。

我以为，不可能再举出更多的证据了。

（审判）长：领导你进行工作的人都是哪些呢？

克维特科：我说一个人的名字——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米涅耶夫，他现在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姓。

（审判）长：你那时没有出版任何民族主义的作品吗？

克维特科：没有。有一部长诗《1919年》。诗的序言说，在乌克兰有大批的人因红军而得救……书中有写红军的诗，我不敢说这首诗饱含苏维埃思想，总的说来，书中讲得最多的是彼得留拉骇人听

闻的暴行。

(审判)长：你不认为这是一部民族主义的书籍吗？

克维特科：不。我怎么可能认为是那样的呢，这部书中的大部分材料在1946年之前一直不断被刊载。

(审判)长：可是审讯时你却肯定地说这本书是民族主义的。

克维特科：那是因为对一切好的东西他们都不愿意相信。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返回苏联的？

克维特科：我原住在阿尔通市，我在那儿的寓所遭到搜查，但是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找的是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在这之后我搬到了汉堡，在那儿我开始受到监视。1925年我就离开了。

(审判)长：为什么对你进行监视？

克维特科：因为是在汉堡港进行的这项工作。

(审判)长：什么工作？

克维特科：从汉堡港往中国秘密运送武器给蒋介石的部队。武器被装进写有“小心——器皿”字样的箱子里。必须了解清楚这些箱子里都是些什么，又被装到哪里去了，好通报给人民军队。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回到苏联的。

克维特科：我是1925年回来的。先走海路到列宁格勒，再从那儿来到莫斯科，在我过去的一位上级的家里住了下来。我得在这个环境中谋求一份作家的工作职位，这个环境中谋求一份作家的工作职位，这个环境是怎样接待我的呢？利特瓦科夫在这儿专横跋扈，他是最主要的人物。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我也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找他。但是看到，所有接待我的人都要问：“你已经见过利特瓦科夫了吗？”，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过了10来天我去找利特瓦科夫。我来到他那里，他立刻对我大发脾气，说：“谁让你来的？为什么不经我们同意你就来了？你在这儿没什么事好干，在国外时你都和什么人有什么联系，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你在这

儿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就走了。幸好他们相互之间在进行斗争。在同乌克兰的叶夫谢科派不声不响地暗斗。这一情况帮助我在乌克兰找到了事干。之前我曾在基辅。我在那儿待了3~4个月，可是他们在那儿也没给我分配什么工作。

(审判)长：谁没给你分配工作？

克维特科：科特瓦科夫等人。我需要有一份工作，好把留在汉堡的家属叫来，我需要有一套住宅或者一间房子。

(审判)长：是谁写的？

克维特科：是非宁贝格给我写的，他那时是《红色世界》杂志编辑部的副编辑或是书记。我早就认识他。可是报刊上对我的中伤一时还停息不下来。1927年我写成了《斗争》这本书，那时我是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我发表了几篇夸张而幽默地写利特瓦科夫、费费尔、以及其他几个当时的“当家人”的文章。我想，我这样做会使他们安静下来的，可结果却是只让反对我的斗争更加激烈。对我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乌克兰作家协会撤销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中伤。对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加以歪曲，任何东西都得不到承认。

(审判)长：是谁进行的歪曲？

克维特科：是利特瓦科夫率领他那个20人组成的编辑部，在哈尔科夫是当时正在那个地方的一些人：费费尔，吉利金，亚特丘克。马尔基什在哈尔科夫待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半年吧，他对我还不错。我们彼此没有争吵。

在开庭的过程中，详细地调查了马尔基什和20年代其他的犹太作家在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的立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克维特科承认，他也有错误。

克维特科：是的，我有错误，可是这些错误受了批评得到改正，不必要最高法院对此操心费力了。

克维特科接着说，在他遭到中伤的时候，他当时“会

见了在汉堡曾一起工作过的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米纳耶夫^①。当时作家组织的书记是斯塔夫斯基，米纳耶夫对他说，克维特科做了一件比叶夫谢科派所有的事情都还要重要一些的工作。到这时才不再对我找茬儿。不久谢尔巴科夫就飞抵基辅，并撤销了全乌克兰作家协会，我才有机会在撤销全乌克兰作家协会时出来发言”。

讲述作家协会犹太组的活动时，克维特科说：“被捕前我曾接到一次法捷耶夫的电话，他要求组织人把近年来出版的全部犹太文学书籍审看一遍”。因此，组织起一个由10位青年作家组成的小组。

(审判)长：由哪些人组成？

克维特科：戈尔东，季列先，博姆沃利（女诗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是我被捕之前一个半月的事情，这个小组在别济缅斯基的领导下开始审看犹太文学作品。在俱乐部开周年纪念晚会的时候，别济缅斯基来参加晚会，并以苏联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主席团的位置就座。晚会由瓦连京·卡塔耶夫主持。假如别济缅斯基确实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不会来参加我的纪念晚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问过小组的一位成员，他们在所审看的作品中是否发现了什么毛病，可是他对此什么也没跟我说。

(审判)长：那他们写出报告了吗？

克维特科：那简直就是责骂。

(审判)长：审讯时别济缅斯基说到（卷31，案卷页131），在文集中不准许对诸如费费尔、马尔基什、贝格尔森、霍夫斯坦、加尔金、克维特科等等激烈的民族主义分子的作品进行批评。接着他说（卷31，案卷页133），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对

^① 原文如此，似与上文中的“米涅耶夫”为同一个人。

的态度。是这样的吗？

克维特科：我跟你讲实际发生过的事。为我这样一个人开会庆祝，别济缅斯基为什么要在主席团就座。

（审判）长：他可以来听一听小组需要的其他材料。

克维特科：在这次晚会上阐述的是与该小组的工作毫不相干的我在俄罗斯文学方面的活动。

（审判）长：你认为别济缅斯基的说明不对吗？

克维特科：是的。如若他举出哪怕是几件事实……

当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把某人或是另一个人抓起来了，我就回答说——那就是说他犯了罪，就是说有根据抓他。别济缅斯基也是同样的情况——克维特科被抓起来了，那就是说他是一个卑鄙小人。这是一种平常现象。

（审判）长：请你谈一谈有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的供词。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人把你吸收进去的？

预审时你曾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民族主义分子把持着的，委员会里有努西诺夫、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尤泽福维奇、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等等一些“激烈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因进行反苏活动而相互联系在一起，领导你们罪恶活动的是洛佐夫斯基（卷11，案卷页45~46）。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克维特科：我把我所知道的和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都告诉你。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良心清白地从这儿出去。我不想对你隐瞒什么。在公布了动员令之后，我和所有的党员一样，自愿编入了人民武装组织，后来过了一周，党委会宣布某些作家：许多俄罗斯作家，其中还有马尔基什、加尔金和我，被留在这儿干自己的工作。我留在这儿了。我的情绪很糟，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家属已经疏散。我什么人也不见，莫斯科城下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我觉得难以理解：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我竟然无所

事事。儿童出版社已经迁走……

(审判)长：你是在儿童出版社工作吗？

克维特科：是的。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被吸收为预备党员的？

克维特科：1940年，1941年1月转正。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开始从莫斯科向外疏散作家时，我也被疏散了。我不想随全体犹太人疏散到塔什干去，他们是奔剧院去的，因为他们都是写剧本的。我，感谢上帝，从不写剧本，这是上帝保佑我未和剧院及米霍埃尔斯发生联系。

(审判)长：你信仰上帝吗？

克维特科：不信。

(审判)长：那你说他干什么？

克维特科：我和库克雷尼克塞结伴走了。我们去了阿拉木图，是想要在那儿创作一本符合于那个时期的新书。在那个地方什么也没弄成，因为那时就不出新书。过了好几个月，却什么事也做不成。于是我给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请求给我分配点什么工作，以免无事闲等着。后来我又去了动员工作站，对我进行了查验，让我等着。我询问过两次，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中央也没有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突然间我收到一份由洛佐夫斯基签署的电报，说召我去古比雪夫工作。后来又收到了爱泼斯坦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他被召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等等。我收到这份电报之后，我于是认为，这是对我给中央写去的两封信的答复，是那边转告，要求把我召去的。因为谢尔巴科夫本人是认识我的，于是我就想到，也许他记起了我，也许我写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中。他当时任苏联情报局的局长……

……于是我来到古比雪夫，爱泼斯坦告诉我，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主要负责人仍然是他，爱

泼斯坦。

(审判)长：你先前认识爱泼斯坦吗？

克维特科：是的，早在哈尔科夫时就认识了。

接着爱泼斯坦告诉我，他任命我做他的助手。

(审判)长：那米霍埃尔斯呢？

克维特科：在形式上米霍埃尔斯是首脑，可实际管事的人是爱泼斯坦，我则是他的助手……

对克维特科的审问5月15日晚上开始，22时10分中断。

再一次开庭已是一周之后——5月22日，星期四。文件资料目前还不能提供对最高法院法庭庭审出于何种原因突然中断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列·克维特科全部而坚决地推翻了预审时的供词，他为自己做辩护时所举出的事实是有说服力的，这使军事审判庭陷入窘境。

我们目前还不确切了解，这一周之内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到5月22日12时15分法庭继续对克维特科进行审问。

№ 1169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2日)

(审判)长：我们上次说到邀请你去委员会工作这个情节。爱泼斯坦请你做他的副手。

克维特科：他说，让我在那边开始工作。

(审判)长：除了你和尤泽福维奇之外，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还有哪些人？

克维特科：我在古比雪夫的时候，当时委员会里有这样几个人：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贝格尔森和我。

(审判)长：努西诺夫呢？

克维特科：没有他。

(审判)长：马尔基什呢？

克维特科：没有他。

(审判)长：也许他们是后来加入的？

克维特科：直到我被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委员会。确切说，我当时知道有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但是不知道它有哪些成员。我不知道还有会籍。

(审判)长：委员会不可能由你和爱泼斯坦组成。入会的都有谁，是谁创立的这个委员会？

克维特科：是洛佐夫斯基创立的。

(审判)长：预审时你曾说过：“挑选人员吸收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领导我们进行罪恶活动的是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

佐夫斯基，他当时是苏联情报局的局长”（卷 11，案卷页 46）。你对这话的实质有什么要说的？

克维特科：我一个人待在囚室里的时候，在我的头脑中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我一上了法庭，就一切都乱了套，我无法集中起来具体而明晰的思想。我以前所有的论据都没有得到侦查人员的尊重。

（审判）长：没有得到什么人的尊重，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克维特科：我做了很不好的供述。

（审判）长：怎么个不好，是不完整吗？

克维特科：我的供词是不对的。侦讯先入为主，把我所举出的一切论证都没当一回事。我所说的一切，而我是用自己的话说的，在这里边都被改成了记录中的言词。我用自己的话不是这样说的。我既没为自己，也没为洛佐夫斯基，没为其他人开脱，但是所有这些都组织的与记录中现在记下来的这种样子不同。记录全部是按法律的条款组织起来的，可是在生活中这些事实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样子。我来到之后，看出来掌权的首先是洛佐夫斯基。我知道，爱泼斯坦、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审判）长：是在对委员会工作的看法上？

克维特科：是的。使他们站到一起的还有未来的这次出行，不过我想，也有很多来自洛佐夫斯基方面的因素。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对任何人都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我很清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可怕时期——那是 1942 年，谁也不需要这样一项工作。我感觉出来，任命我作秘书是一种假托。召我来不是谢尔巴科夫推荐的，就是爱泼斯坦为了让马尔基什只剩下孤单一人而推荐的。爱泼斯坦很怕如果不召用我，那我就去莫斯科。而他是非常希望把马尔基什弄成孤身一人的。

（审判）长：因为什么呢？

克维特科：他们使劲损害马尔基什。害得他彻底毁了。

(审判)长：他们是谁？是洛佐夫斯基？

克维特科：不，是爱泼斯坦、费费尔和贝格尔森。爱泼斯坦和米霍埃尔斯对他特别仇视。

(审判)长：他们为什么要损害他呢？

克维特科：这里边有文学方面的恩怨。这就是戏剧。他们全都是剧作家，而由于马尔基什在文学方面居于第一位，他们就认为这名不副实，而马尔基什善于孤立人。他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都孤立起来了。

(审判)长：是怎么孤立的？

克维特科：他形容说，贝格尔森在文学上是一个小人物，而贝格尔森觉得，对他做这样的介绍是因为马尔基什和法捷耶夫的关系很好，没有正确地向法捷耶夫报告贝格尔森在文学上的地位。

(审判)长：那个时候马尔基什是什么身份？

克维特科：马尔基什那时同法捷耶夫的关系很好，主管苏联作家协会的犹太组。我想，如果是爱泼斯坦选定的我并做了推荐，那么这只能是为了不让我和马尔基什搞到一起去。

(审判)长：你和马尔基什的关系是很好的。

克维特科：不是友好，而是正常的关系。对这件事我这么看是因为后来爱泼斯坦曾经写信给希梅利奥维奇，秘密地告诉他，我不能胜任重要的工作，要求他对我加以指导。那他为什么把我要来呢？

(审判)长：这一情况通报给洛佐夫斯基了吗？

克维特科：是的，爱泼斯坦大概把说我的同样的话也给洛佐夫斯基讲了，因为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例。我的名分是爱泼斯坦主管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手，而费费尔的名分是爱泼斯坦负责《埃尼凯特》报事务的助手。

(审判)长：爱泼斯坦同时兼任报社的编辑和秘书两个职务吗？

克维特科：是的。有一次爱泼斯坦没有来上班。我依照常例去

找洛佐夫斯基，向他报告工作并请他指示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做。洛佐夫斯基竟拒绝接见我。我那时对担任中央委员的洛佐夫斯基是非常尊重的……

(审判)长：你早就认识洛佐夫斯基吗，你同他本人是什么时候结识的？

克维特科：我来到古比雪夫才认识的他。洛佐夫斯基不愿接见我，他说——你把费费尔找到。让费费尔到我这里来汇报。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我明白了，我被看做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人，也许党性也不强，因为费费尔与我相比是一个老党员，不过这重重地伤害了我。我很痛心。

那儿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经洛佐夫斯基同意和准许进行的，因为每天早晨爱泼斯坦都要到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去向他汇报，如果有了什么重大的问题，也都要找洛佐夫斯基。

米霍埃尔斯经常狂饮无度。实际工作是由爱泼斯坦主持。费费尔虽然像他在这里所说的，参加了秘书处或是委员会，好像是秘书处吧，但他不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在谢尔巴科夫那里大家都在座的时候，他曾发过牢骚，说没有让他参加委员会。我想，没有让他参加进去是因为一切都是由爱泼斯坦组织安排的，爱泼斯坦对所有的人都心存戒备，他也防着费费尔。而且他防范费费尔也是有理由的，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因为费费尔是这样一个人：就算你让他当一个勤务员，他也能实际上成为主子。而爱泼斯坦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追求荣誉，也就是虚荣心重。他提防费费尔是因为费费尔会把他赶下去。就是因为这个他任用了我。他认为我办不了大事，就委任了我。我就这样留下来工作了。

我前面已经说了，贝格尔森没有参与进来。贝格尔森的处境也很难。我讲所有这些是想说明，在那儿待了3个月之后我怎么抛开一切走了。

(审判)长：……你说由于洛佐夫斯基的缘故，贝格尔森、努西诺夫、马尔基什、希梅利奥维奇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都进入了委员会，洛佐夫斯基相当熟悉这些人。

克维特科：我无法说我知道洛佐夫斯基都认识谁，这是从其他被捕人员的口供中拿出来加进我的供词当中去的。

(审判)长：你不承认这些供词？

克维特科：爱泼斯坦同美国人，还有其他的人有联系，这一点我不否认。洛佐夫斯基是委员会的领导人，没有他参与，爱泼斯坦什么事也不干——这一点我也不否认。

(审判)长：现在你来供述一下委员会本身的工作情形。咱们已经弄明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进行宣传，对这个问题你曾讲过(卷11，案卷页48)：

“……理应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国外宣传工作被我们搞得带上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展示犹太人在我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其他民族，其中包括俄罗斯族，在这一点上所起的主导作用则避而不提。结果，就造成了主宰苏联各个方面前途的是犹太人这样一种观念。在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中间，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开展起罪恶的活动。”

是这样的吧？

克维特科：基本上是这样，也许并没有说得这么糟糕，但基本上是这样的。为什么？第一，这从米霍埃尔斯葬礼上的情况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在“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士”——梅尔松到达时我所见到的情形也使我充分地认识到，委员会的工作对苏联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是有害的。

(审判)长：具体说是哪些事情？

克维特科：具体说是哪些事情？在米霍埃尔斯的葬礼和梅尔松的欢迎仪式上那种显眼的民族主义表现说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

会做这种独特的犹太人工作，就是说只管犹太人的事务，也就促成了苏联犹太人群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

(审判)长：可是这些事都是1948年期间发生的，而咱们说的是1942~1943年。这是委员会从最初开始活动以来全部工作的总括吗？

克维特科：是的，这就像似一种总括。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莫斯科的？

克维特科：到达古比雪夫3个月之后。

(审判)长：就是说，在莫斯科你是委员会的代表？

克维特科：我同意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回到苏联之前不退出委员会。那个时候在莫斯科出版《埃尼凯特》报，我得帮助他们。当时没有工作人员，加尔金和斯特龙金在那儿。我把寄给我们的材料都邮给爱泼斯坦，他和他的助手们进行审阅并加工，然后这些材料再送回莫斯科排印。

(审判)长：那时马尔基什在莫斯科吗？

克维特科：是的，马尔基什在莫斯科。

(审判)长：爱泼斯坦不愿意，可是你和他联合起来了？

克维特科：他希望我和马尔基什之间没有任何事务往来。

(审判)长：在莫斯科你开始做苏联作家协会方面的工作？

克维特科：领导少儿作家工会小组委员会，这是我的工作。此外我还在《埃尼凯特》报社帮助工作。

(审判)长：你在《埃尼凯特》报社做些什么？

克维特科：材料都是在古比雪夫加工准备的，在莫斯科是进行校改。加尔金进行编辑，检查是斯特龙金的事，我帮助拼版，因为没有工作人员。

(审判)长：侦讯时你对《埃尼凯特》报问题说，这份报纸做了反苏工作（卷11，案卷页49）。你供说《埃尼凯特》报从事民族

主义活动，这确实吗？

克维特科：这也就是委员会干的同样的活动。如果我们把委员会的活动认定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埃尼凯特》就是一份民族主义的报纸。这首先是描述犹太人的生活等等。但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来到那一刻起，我没有看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何材料。向我提出了如此可怕的指控，但我还必须说，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宣读过任何材料，而且他们寄出些什么东西，这是没有人知道的。

（审判）长：可是你在报社工作过，是应该知道报上登载过些什么的？

克维特科：……我想你已经了解了费费尔是好多事都干得出来的。据我看，他只把对他有利的问题，便于取得主席团同意的问题提交主席团讨论。然而有关去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方案问题却没有进行讨论，连主席团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信件都是在主席团委员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出去的。照我看，不可相信经他们改动过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是真实的。大多数问题我都是在这儿，监狱里，了解到的。比如，出“黑皮书”的事我就是在这里知道的。在这儿我了解到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曾进行过非止一次的检查。每一次都未经主席团对其入选资格进行讨论就在机关里冒出来一些新人。一些重大的举措都不通知巴赫林参加，也不叫我。也没叫我参加讨论英国发生暴行的会议和向德拉贡斯基转交手表的晚会，没有叫我参加扎巴拉的情况通报会。其次我必须对你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选题计划中开列着许许多多的人。我被列入了几乎所有的计划，但我却连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他们也没有向我约稿。这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秘书处也是装点门面，形同虚设。工作的组织安排是要使它具有社会性，但实际上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审判）长：就是说搞民族主义的活动吗？

克维特科：是的，搞民族主义的活动。

(审判)长：是谁搞这种活动——是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泼斯坦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搞的吗？

克维特科：我对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有一种很明确的认识。

(审判)长：什么样的认识？

克维特科：这样一种认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干了有害的活动。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呢？

克维特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具有多重性的人物。我认为他的罪行比单单进行领导还要深重。

(审判)长：具体说呢？

克维特科：这个人亲自见过列宁，他知道列宁对同化现象所持的态度（我是在监狱中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这一点的），他知道列宁对犹太人同化问题的提法，列宁提及这一问题时说，就连实行资产阶级制度的国家都在发生同化，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在享受自由的状况下，同化过程难道还会停滞吗，还说了可以把同化的过程想象为一种什么样子。这些洛佐夫斯基都清楚，可是他却干了些什么呢？我理解犹太作家，我理解贝格尔森，我理解马尔基什，也理解我自己。

(审判)长：在哪一方面？

克维特科：我们是作家，我们的工具是语言。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无法带领受同化的这部分犹太人逃避开，但是你可以让这些人对同化做好准备。我认为，犹太文学已经使群众对同化做好了准备，我确信这一点，我确信是因为这种文学的内容有利于这件事。贝格尔森，马尔基什写书总是有明确目的的，我们不去说那些错误，错误当然也是有的，他们写的书拥护苏维埃政权，宣传鼓动

拥护一切新生活措施。他们通过这种办法让还在阅读犹太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做好接受同化的准备。大群的人走了，人们能轻易走掉是因为在大工厂里劳动比在手工作坊里容易，更舒服，更轻松，也更有趣。犹太作家是离不开语言的，他无法像变换读者群那样轻而易举地改换自己的工具；与人群一起走掉是不可能的。还应当把目标定到那些落后的人身上，引导他们朝一定的方向前进。但是没有讲这些，而这些是应该讲的。应当由洛佐夫斯基提出这个问题。我不是想说这就免除了我们的责任。可洛佐夫斯基没有去促进这一过程，他干的是什么事呢？他把一些差不多已经同化了的人指派到从事犹太人事务的委员会里去。

（审判）长：你指的是哪些人？

克维特科：我说的是那些已差不多同化了的人，例如布雷格曼。他同这些事务有什么关系。他把一生都已奉献给党了。我不认识他这个人。确切说是不熟。但是就我所知，在基辅时他就已经在党组织里干工作了。他差不多已经同化了，他同犹太人委员会和对利益狭隘、远离广阔的苏联社会生活的犹太人大肆夸赞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审判）长：那么你，克维特科，认为委员会是做了反对同化的工作？

克维特科：当然是反对同化。我看得出来，这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分支机构。米霍埃尔斯办公处的前厅里有10~12个犹太人坐着等待接见。

（审判）长：有什么问题？是演员，是反剧院的事？

克维特科：不是，看样子是为了各种与剧院的活动无关的事情。我在那个地方坐了足足一个小时，这位“老爷”才接见了。我。

（审判）长：那么说，你认为剧院是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分支机构？

克维特科：在米霍埃尔斯任剧院院长的时候，祖斯金同领导剧院的工作毫无关系，因为米霍埃尔斯在剧院里是院长，而祖斯金是其属下的一名普通演员，剧院在这个时期是委员会的分支机构。

(审判) 长：委员会同犹太教会会有什么联系呢？

克维特科：说起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对犹太宗教协会领导的态度真让人感到羞耻。这对于一个现代人，就不用说苏维埃人了，简直是一种耻辱。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到他们那里去参加节日活动。

(审判) 长：到教会去祈祷吗？

克维特科：不，到协会的主席乔布鲁茨基的住宅去，此人老奸巨猾，很不正派，可是他俩却同他很要好。我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以前我曾多次同加尔金说起过，这件事后果一定很糟。

施利费尔是个好人。我想，在这些事情上他比那几个人要更为正直。

(审判) 长：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克维特科：他大概被选进了宗教协会。

(审判) 长：乔布鲁茨基是干什么的？

克维特科：据说，他是个投机商，而且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投机商。

接下来克维特科对法庭讲，米霍埃尔斯审阅犹太人提交的个人申请。其中也包括希望到以色列去的人的申请。

(审判) 长：接下来你说：“确实，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向相应的机关正式提出过，但就所有其他问题都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名义往来过多次公函。我们曾向各级机关及各种社会组织申请满足甚至是最蛮横无礼的和最没有根据的要求。”是这样吗？

克维特科：不，这不对。这是我从案卷中了解到的。我对你们说，我的大部分供词都是以侦讯时给我讲的事为依据的。我不能说我以前就知道这事。

在调查有关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美国之行的问题时，克维特科又一次推翻了预审时他所做的那些供述。

法庭试图调查明白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接触的那些人的身分。

(审判)长：你否认你曾参与向国外寄送材料吗？

克维特科：我绝对否认我犯有蓄意去做过什么事情的罪行。我宁愿砍掉自己的头和手，也不想蓄意去干什么于我的国家不好的事情。当然，我也是有错误的。

你一次次地向我宣读侦讯时我签了字的那些东西。我必须说，我说那些话是因为对我不相信。我同检察长之间发生了误会。

(审判)长：同哪位检察长？

克维特科：开庭前两个来星期或是一个月前参加审讯的那一位。

(审判)长：是1952年3月5日的事情吗？

克维特科：正是。

(审判)长：是和科茹拉检察长吗？

克维特科：是的。是这样的。侦查员被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就剩了我和检察长科茹拉两个人。科茹拉问我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回答他的问话。可是我要是有什么事说得和先前不一样，就会争论起来。侦查员斯梅洛夫回来了，检察长科茹拉就对我说：“你怎么能否认，你甚至对戈尔德贝格吹牛说，你的存款折子上有12万卢布呢”。我回答他说，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就对我说：“好呀，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你肯定你什么也没说过！”——我说：“没说过”。我当时存折上就没有这笔钱，我又怎么能说这种话呢。直到1947~1948年出了我的那本纪念文集，我才有了这样一笔钱，而戈尔德贝格到这里来是1946年。科茹拉说我对他撒谎，把我好一顿羞辱和痛骂，到了这儿的法庭上我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马尔基什的事。马尔基什曾对戈尔德贝格讲过，他有一笔钱，可科茹拉弄混了。我对斯梅洛夫说：“为什么弄成了这个样子？”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间屋子里”。

(审判)长：同你交谈并且弄明白你在什么地方说的是实话可真难啊——在法庭上你是一种说法，侦讯时又是另一种说法。

克维特科：这都是由于悲观失望的缘故。3年来一直不相信我。我一来就对我说，我是间谍，是民族主义分子，我感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审判)长：讲一讲戈尔德贝格来的事情。戈尔德贝格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他来时的哪些情况？你同他见过面吗，都读了些什么，你认识他吗，是怎么认识的？

克维特科：戈尔德贝格我认识。他来之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要来是知道的，还给他大肆宣传了一番。

(审判)长：谁呀？

克维特科：委员会。

(审判)长：也包括你在内吧？你是主席团委员，显然，委员会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的？……

侦讯时侦查员曾对你提出一个同戈尔德贝格保持间谍联系的问题，对此你回答说：“我不否认，我同戈尔德贝格的联系带有犯罪的性质”……

接下来审判长详细询问了这种关系的准确性质。克维特科解释说，谈了交换有关科学、文化和艺术成就的材料、文章、发表的作品的问题，计划出版一本合编的杂志《莫斯科——纽约》。

(审判)长：你们之间的联系的犯罪性质表现在什么上？

克维特科：没有犯罪的性质。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要那样供述呢？有人强迫你这样做吗？

克维特科：是情势。

费费尔：那就是说，你读到的那些文章基本上是反对苏联的敌人的？

克维特科：我不能说我读过含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

费费尔：你还记得我写出抨击达维德·乌伊特利的文章后你来找我那件事吗，当时你说“你写这种样的文章，真是太好了”。

克维特科：也许就是那么回事。

费费尔：你因为什么认定同化是联共（布）的政策？

克维特科：弗·伊·列宁有一个提法（同崩得分子的争论），说经过革命，俄罗斯获得自由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有利于同化的时期，他认为同化是一个既有利于人民群众也有利于国家的非常进步的过程。而如果委员会把犹太人组织起来后，却没能让他们做好同化的准备，如果我们把几乎已经同化了的人又重新变成了犹太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与列宁的方针，与党的路线背道而驰。

费费尔：你是否知道，在犹太人向列宁和斯大林提出发展民族语言的文化问题时，他们总是得到支持的，而且大部分犹太人机构都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在向约·维·斯大林申述莫斯科的犹太作家没有艺术作品选集的时候，他问道，“……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犹太作家有艺术作品选集吗？”为什么只有莫斯科的犹太作家需要有艺术作品选集呢？如果说这是同化政策，是党的政策，那么就不会有比罗比詹了。

克维特科：我们的全部危害正就在于你提出这一问题的方法上。其原因是：犹太文化之所以需要，如同需要有一切少数民族的文学一样，是为了用人民群众的母语教育他们到一定的时期准备好迎接同化。

费费尔：你只是现在才持这种观点，还是被捕前你就有这种看法？

№1169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克维特科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3日)

1952年5月23日12时20分继续开庭。

庭讯从调查克维特科的出生日期开始。文件上记载的出生年份是1890，而实际上他生于1893年，在这之后，费费尔又开始提出问题。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继续对克维特科提问题。

费费尔：据我所知，你曾经写了一篇报道法西斯匪徒对克里木的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的特写。有这么一篇东西吧？

克维特科：是的，有。

费费尔：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

克维特科：不记得了，请提示我一下。

费费尔：你说你以前根本不知道“黑皮书”这本书，只是到了接受审讯的时候才听说的。我想提醒你，这篇特写是你为“黑皮书”写的。

克维特科：但不是给美国，而是给苏联写的。当时并没有在美国出版“黑皮书”这个问题。这篇特写1943年发表在当时在莫斯科出版的乌克兰杂志《乌克兰》上。这是你即将去美国时的事。所以说，编辑“黑皮书”的问题在1942年怕是不会存在的。也许是在我写成了这篇特写一年之后，提出在苏联出版“黑皮书”的问题的时候，我把它推荐给了“黑皮书”。

(审判)长：你是肯定这篇特写是在同美国合编“黑皮书”这

种想法产生之前很久你写成的。

克维特科：是的。

费费尔：在古比雪夫你是和爱泼斯坦坐在一个房间里的吧？

克维特科：是的。

费费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美国来说，“黑皮书”问题早就提出来了。

克维特科：在你赴美之前？

费费尔：是的，早在1942年年底，就曾收到过美国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来的电报，他向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提议合作出版“黑皮书”。对此有过很多议论，你和爱泼斯坦坐在一个房间里，你应该知道此事的。我们收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电报毕竟不多，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认为这篇特写你是推荐给这本“黑皮书”了。关于克里木的材料不是就编进那本书了吗。而关于俄文“黑皮书”的问题是爱伦堡后来才提出来的。

克维特科：你忽略了一点，我不是整个时期全和你们一起待在古比雪夫的。我从那儿离开了，可能不知道这种想法。也许当时知道，而现在记不得了。

法庭非常详尽地调查了列·克维特科克里木之行的目的、他在此行期间的活动、他都会见了哪些人，等等，克维特科是受委派率领作家协会的一个班子去那里的。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克维特科在其供词中把自己说成是委员会的一个事务工作人员，另外，他说他在古比雪夫只工作了3个月，后来在莫斯科干到1944年5月，再往后就脱离了委员会的活动。

我想总括一下：克维特科说，他只是在被捕之后接受侦讯时才了解到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的，而你的供词中却说在委员会成立之前他就是一个在乌克兰，而后又在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从事活动

的活跃的民族主义者，克维特科进入委员会并不是偶然的，提名他加入对委员会开展工作是合适的。

费费尔：我敢说民族主义这个词在此次侦讯之前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至于说克维特科，我同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又不稳定的。他同“战斗”的关系比同全乌克兰作家协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我却是全乌克兰作家协会的。“战斗”小组是费尔德曼受托洛茨基中央的委托建立起来的。这个情况我原来不知道，直到发表了宣言才知道的。我表示反对费尔德曼和这份民族主义的宣言。克维特科和费尔德曼一起在《红色世界》杂志编辑部工作。这本杂志因犯民族主义的错误而受到批评。说克维特科有民族主义情绪，这我是根据他同这个集团关系密切这个情况推断出来的。爱泼斯坦曾告诉过我，克维特科和费尔德曼非常友好。

克维特科投入委员会的工作态度是很积极的。克维特科说，他在古比雪夫的时间只有3个月，这不对，他在那儿呆的时间还要长。

克维特科：这可以根据党证加以查对。

费费尔：克维特科紧张地投入了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克维特科没有任何组织才干，但这没妨碍他积极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埃尼凯特》报上发表文章，写诗。当他在古比雪夫的时候，还审查应当从委员会送往莫斯科的材料。克维特科对这些材料进行修订。当然决定权还是在爱泼斯坦手中。

(审判)长：什么样的材料？

费费尔：应该发往国外报刊的那些材料。他的健忘使我感到奇怪。他对我的履历、我的履历资料记得清清楚楚，同时对他自己的履历又记得极差。克维特科忘记了，在委员会工作期间，对来找他求助的妇女他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当时有很多人曾说过，克维特科把委员会变成了卫生所。那时我对这一点甚至感到满意，因为我认

为这很有人道精神。克维特科给妇女们搞来了这里说到的葡萄糖、各种各样的药品、热水袋，总之，积极地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他还积极地参加了第二和第三次群众大会的筹备工作，参加了克里木之行的组织工作，《埃尼凯特》报的工作。他在这儿谈到了同化，这仿佛是他的理想似的。我必须说，从克维特科方面讲这是不诚实的，因为我无法想象，一个犹太作家使用犹太语从事了30~40年的文学活动，而后一下子就能掌握新的技能。这种美妙动听的言词更像是出自马尔基什之口，而不像是克维特科说的。我同样认为，克维特科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最积极的委员之一。克维特科把这些工作定性为民族主义的，但这却并未妨碍他本人积极地参与。

克维特科：法庭对费费尔的供词感到满意吗？

（审判）长：法庭接受被告的一切供词。如果你愿意对费费尔提供的材料做一些说明，那你可以这样做。

克维特科：我此刻很难做出解释，因为方才费费尔说的事太多了。我要在很晚的时候，一天或是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审判）长：你还有时间这样做。

克维特科：我想讲一件事：费费尔被捕后，我过了几天偶然在街上碰到了加尔金，我就对他说，费费尔被抓起来了，可费费尔是这样一种人，他会把委员会原先的成员全都牵扯上，跟着进监狱的。

加尔金对这件事回答我说，费费尔被捕并不是因为委员会的事，而是因为他同被驱逐出苏联的英国记者马吉多夫关系很好，马吉多夫曾多次到费费尔的家里去过。这是加尔金告诉我的。我现在看出来了，费费尔是在努力摆脱同“战斗”组织的关系，而又尽力把我拉到那里边去。从费费尔讲的话里边可以看出来，那时他仿佛

因为我在这个组里边而同我进行过一场战斗。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费费尔力图强调我们在思想上的分歧，显而易见是十分重要的，而同时他本人却是一个崩得分子。在全乌克兰作家协会中有一个吉利金，是崩得分子，科夫丘克则因为有民族主义思想而被捕。他常同这些人见面，对他们也很熟悉，他针对“战斗”的事吵过吗？我并不是想说，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是革命者，但是这个组织中有好几个人参加过国内战争。组织里共有7个人，其中的3个人参加过战争。

好，费尔德曼是担任过3或4个月的编辑，或许是连3个月都不到。他被揭露出来，于是我们断绝了关系。我同他没谈过话，也没有往来过。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换下去4位编辑。费费尔最好是能记起波柳克，休帕克。这是他的两位亲密朋友。

第二点——这是在古比雪夫初期的事，当时有一些妇女来找过我。这有什么罪过吗。我同这些妇女谈过话，也可能我还帮忙给病人弄了些药品，这有什么不好吗？

关于审阅材料。这是说假话。我不做编辑材料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审看材料呢，我是收集无线电广播用的材料，这是我惟一的工作任务，其次，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替换了我吗——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替代我担任了这家无线电广播台的节目的编辑或是写作人。

我得说，我离开古比雪夫就是因为你。能够为此作证的又是加尔金。我对他讲过此事。当我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他问我，我为什么留在这儿。而爱泼斯坦却一封接一封地不断写信来。我回答他说，我看到——费费尔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有舞弊行为，什么地方就会有徇一己之私来办理国家大事的现象，什么地方就会滋生对工资收入的追求和贪得无厌的心理，什么地方就会出现结交一切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事儿，我无法睁着眼睛去看这些在当时的时局下利用委员会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事情。

我还要对你做出回答的，不过这以后再来做。

费费尔：你说自己的事吧。

克维特科：我是要说自己的事。不管是在古比雪夫还是在莫斯科都没有让我做编辑材料的工作。爱泼斯坦把全部的事都干了，他喜欢这件工作，从早到晚地坐在那里干这个工作。我要说，全部供述你做得都很聪明，有分寸，你心里一直“装着好多道道儿”，说起这些事来态度狡诈虚伪。就比如说，召我们去开党委会会议那一次的情形吧。

委员会委员全体在座，这些人我不认识，只认识一个什基里亚托夫。他问我，看没看见以委员会的名义给马林科夫发去的那封信，我是否在信件上签了名。

（审判）长：信里讲了什么？

克维特科：写了一封信说，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而且十分重要，派遣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作为代表去波兰。两位代表应在那里同波兰的几个委员会（哪些委员会——我不知道）进行工作，从波兰再去一些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现在我已不记得这事的详细情况了。不过信是费费尔用我的名字签的字。

洛佐夫斯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克维特科：这好像是1947年的事。那时什基里亚托夫问我，看过这封信没有。我说没看过。我是否签了这封信？我回答说没有。他非常气氛，对费费尔说，你是从哪儿学会搞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的。

（审判）长：你昨天已经讲过这件事了。今天还讲它干什么。

克维特科：是费费尔讲的。

（审判）长：费费尔问，是否给了他处分，他是否被解除了工作。你回答说——这些昨天都已经弄清楚了。现在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呢。

克维特科：他所讲的一切，我想，他没有正确地进行通报。

(审判)长：他对你提出问题，你进行回答。你做出解释，说费费尔为此受到斥责，给了处分并要他以后再不要做这种事情。

克维特科：处分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在这儿听布雷格曼说才知道的。请让我现在讲一讲。

(审判)长：可要简短些。

克维特科：当时什基里亚托夫对我说：“当心，他们还说不上要怎么哄弄你呢”。

(审判)长：你昨天说过了。

克维特科：不，我没有说过。他对费费尔说，你凭什么断定你和米霍埃尔斯该到波兰去，就应该派你们俩去，为什么不该派别的什么人，比如说祖斯金吧，你又是用一个假名作掩护给什么人寄信要求派你们去出差。当时什基里亚托夫狠狠地骂了洛佐夫斯基。

费费尔：你撒谎。

克维特科：我为什么要撒洛佐夫斯基的谎。

洛佐夫斯基：为什么骂我？

克维特科：为了委员会。

洛佐夫斯基：我那时跟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

克维特科：也许你那时没有任何关系，可他是联系到委员会骂你的，尽管你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法庭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当然很难把事情搞清楚，不过我请你们相信，什基里亚托夫是骂了洛佐夫斯基。看来费费尔是同洛佐夫斯基协商过这个问题。后来，已经走到大街上，在中央委员会大楼旁，费费尔在会上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情绪很激动，他对我说：我现在得赶快去把这件事告诉给“老头子”。如果这不是实话，那光因这一件事我就请求你们把我处死。大概在去中央委员会之前他给洛佐夫斯基打了电话。

(审判)长：在那个时候洛佐夫斯基同委员会有关系吗？

克维特科：我不知道。

(审判)长：他有没有关系这无关紧要，费费尔是可以向他征求意见的吧？……

克维特科：我写的许多东西是用俄文出版的，儿童作品当中没有用犹太文出版的，因为没有读者。在1935年《埃梅斯》报还有儿童版面，因为那时还有很多犹太学校。由于我的作品都是用现实材料写成的，这些版面就作为这些学校的材料使用。《埃尼凯特》报上这样的版面每月也刊出一次。维尔纽斯、考纳斯、契尔诺维茨，还有比罗比詹这几个地方的犹太学校一直存在到委员会被封的时候。为这些学校出版课本是没有意义的，而老的教科书已经陈旧了，因此必须提供一些现实的材料。所以就用犹太语出版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还能向法庭就对你提出的指控的实质供述些什么？

克维特科：昨天法庭问到了对委员会内的危害行为的责任问题，我想就我昨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说几句话。我昨天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对委员会内进行的敌对活动应负的责任问题说的很笼统，今天我想更正一下。委员会的成员有的积极参与了它的活动，有的就几乎没有参加过它的活动。

(审判)长：讲具体些。

克维特科：在委员会内开主席团会议时，我就一次也没见到过或者是只见到过一或两次祖斯金。

(审判)长：对他在进行民族主义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你有什么话要说。

克维特科：说到委员会内的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据我看，几乎是等于零。

那么在剧院方面呢？——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据我看来，在米

霍埃尔斯活着的时候祖斯金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他在米霍埃尔斯死后的活动，我对此没有什么话好说。

什泰恩进入到委员会里来可是有点莫名其妙。我觉得，她到委员会里来完全出于偶然，是什么人的精心安排。她对民族主义方面的事多少有点易动感情，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心里同情，主要的，是在大的、重要的事情上有不问政治的倾向。

……^① 我看，什泰恩对委员会的事情不会有什么了解，她怎么可能知道呢。

（审判）长：这就是说，你只看到有两个人很少或是完全没有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这就是祖斯金和什泰恩吗？

克维特科：我可以这样说，霍夫斯坦也完全没有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他也不住在莫斯科，住在基辅，但是我敢说，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同情的，在他写的诗里边他也表露出民族主义的缺陷。他没有在委员会工作，也不可能了解委员会的全部底细。当然啦，霍夫斯坦也短时间地来过莫斯科几次，去见过费费尔。也许他会从费费尔那里了解到点什么事，不过这我就知道了。至于说泰乌明，她和委员会的工作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对柴卡·瓦坚贝格我也敢说这个话。伊利亚·瓦坚贝格的联系较多。柴卡·瓦坚贝格并不是委员会的事务工作人员，而伊利亚·瓦坚贝格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不是直接在机关里工作的，因为他有病，于是爱泼斯坦准许他在家里干工作。伊利亚·瓦坚贝格同爱泼斯坦很熟。

现在来说向我提出的各项指控的实质问题。请允许我对指控的每一点单独作答。

第一点——“作为一名活跃的犹太族主义者，多年来进行了与联共（布）和苏联政府为敌的活动。”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我不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言论上，或是在行动上，在我的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联共（布）和苏联政府，也没有进行过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工作。提出这种指控是没有事实和文件依据的。我认为，从十月革命爆发直到我被逮捕我全部活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苏联人民、苏维埃祖国做奉献，可以为此作证的有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现存的著作和活着的人，我可以提供一份这些人物的名单。

第二点——“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任秘书，同积极活动着的苏联人民的敌对分子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泼斯坦进行罪恶的勾结，与这些人一道利用委员会来达到罪恶的目的，把委员会变成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组织”。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担任秘书职务——完全是徒有其名，完全是一种假象，这从爱泼斯坦说我承担不了重大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及他不愿意让我来编辑寄往国外的材料这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根本谈不上与他们有什么勾结。我工作到第三个月就从古比雪夫跑掉了，这一事实也否定了我同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勾结。

第三点说，我给自己的同谋交派任务，收集材料往美国寄送。

仅签署过一份发给作家卡甘，要求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寄材料的通函。这种函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给所有的作家都发过。从哪里看得出来，又是因为什么指控我说，我要的材料一定是谍报？戏道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曾向国外寄发过成千上万份包含有实事求是且有利于苏联的宣传内容的材料，有过许多类似的材料，我签署的那一封信要的正是一种符合苏联需要的材料。

第四点说，1944年我到克里木去是为了收集有关该州的经济状况及那儿现有的犹太人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被委员会转送到美国去了。

我昨天供述过，我不是到克里木去收集关于该州的经济状况的

情报的。谁若是对我的工作及我这个人稍许了解一些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我距离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熟悉全州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还差得远着呢。我这个新冒出来的“经济学家”克维特科只不过是了解了一下几个犹太居民区的情况，我没有收集任何情报，既没往美国，也没往别的国家寄过任何有关我克里木之行的材料。我认为，我的克里木之行没有什么罪过，也许它在哪一点上有毛病，也许到当地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不完全是我分内的事情，但它是没有罪过的。我的意图是正确的，是符合苏维埃精神的，不然这主席团里一是会有人阻止我，也不会推举四人代表团去向农业人民委员部递交信件。最后，如果信里边有什么犯罪的或是有损于一个苏维埃人的东西的话，那么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或是副人民委员贝内迪克托夫会毫不迟疑地收拾我和其余代表的。可是根本没有这类事。

第五点说，1946年我同美国的侦察员戈尔德贝格建立了个人间的谍报联系，向他提供了苏联作家协会内部情况的情报，并同意合作出版年刊，美国人有意通过这份年刊获得关于苏联的间谍情报。

我昨天已经详尽地供述了我同戈尔德贝格几次会面的情形。我同他之间没有任何谍报联系，没有就禁止涉及的问题进行任何交谈和座谈。我和他没有密切的交往。我没有向他回答涉及到政治的问题，他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兴趣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和他谈这种事。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重要意义——谈诗，谈新近出版的书，谈肖洛姆·阿莱赫姆的书在儿童中间普及的情况等等，谈话持续了几分钟。

我认为自己有什么罪行吗？我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吗？第一是我没有看出来，也没有理解委员会的活动给苏联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委员会里还参加了工作。

我认为自己有罪的第二点，这该是由我来承担的，我感到这是

我的罪过。我们这些犹太作家，其中也有我一个（也许我比他们的罪过更大），认为苏联的犹太文学在思想上是健康的，是符合苏维埃精神的，与此同时却没有提出促进同化进程的问题。我说的是犹太民众的同化。我们继续用犹太语写作，不自觉地变成了同化进程的阻力。就内容说，苏联作家的创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始终一贯的，这种内容——符合苏维埃精神的内容——曾对犹太人的主要群体的同化起过不小的促进作用。然而最近几年语言不再为群众服务，因为他们——群众——丢弃了犹太语，于是它成了一种障碍。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的领导人，我没有提出撤销这个组的问题，这是我的过错。使用群众已经丢弃的语言，已经变得过时的语言，把我们不光是同苏联的广阔生活，也同犹太人已经同化了的的基本群体隔离开的语言，使用这样的语言，据我看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罪过。

（审判）长：说完了吗？

克维特科：说完了。

№1169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霍夫斯坦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3日)

(审判)长：被告霍夫斯坦，你要对法庭承认你犯有哪些罪行呢？

霍夫斯坦：这得从在这儿已经提及的事情说起。我的罪过是：1944年，我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写出了一首同犹太语告别的诗，并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大厅里当着所有作家（马尔基什、努西诺夫和其他一些人在座）的面朗诵了这首诗，还说了我们需要这种语言，然而我却没能够让自己和其他人停止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政治活动。

第二，1942年我从乌法来到古比雪夫，爱泼斯坦接见了，我说有一项工作，就是给美国报纸写文章，他开始向我做指示，这家报纸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很生气，就说，我们都是水平很高的作家（他是很了解我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写的这些作品寄给他们，那对他们就是莫大的荣幸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家报纸的文化水平。他同我争论起来，于是我就去找最高领导人——洛佐夫斯基诉怨。尤泽福维奇在那个地方，他不让我进办公室。我非常恼怒。最后得到了洛佐夫斯基的接见，他对我进行了安抚，我于是说，我写。真的，我写了一篇短小的见闻录（文章的复制件保存下来了）。我觉得很委屈，竟让一个老作家当采访员，给一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份黄色报纸的报刊写报道。

然而，我最大的过错是，在红军到达基辅的时候，我没有效仿

上了前线的堂兄奥舍尔·施瓦茨曼的榜样，而留在基辅沉溺于文学的梦幻之中，没有手握武器去同彼得留拉匪帮战斗，而是忙忙碌碌地张罗经历了彼得留拉的暴行存留下来的幼儿园、学校和孤儿们的事务。我原是数学和物理教师，后来开始出版教科书和儿童杂志，同时担任“法列尼格捷”党的机关报——《奈耶—采特》报的校对员工作……

接下来霍夫斯坦详细地供述了自己的履历。

审判长依据预审的材料，要求霍夫斯坦讲一讲犹太报刊上登载过的那些反苏作品。霍夫斯坦对此回答说：“那里边不可能有任何反革命的内容……”

由于这样一种说法，法庭开始调查霍夫斯坦对预审过程中所给予某些作品的评定的态度。

(审判)长：你说：“……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奈耶—采特》报上发表了自己的一首诗《雪》，在这首诗中，我渲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怖情景和布尔什维克对和平居民施加的‘暴行’，力图使犹太人感到害怕”。你写了这样一首诗吗？

霍夫斯坦：有这么一首诗。这是一首叙述天下着雪，在白白的雪地上滴滴鲜血显得分外地红的诗。

我来自农村，这首诗是在暴行期间所感受到的印象的影响下写成的。苏维埃政权来到之后，《奈耶—采特》报（它已经改名为《科姆半》）登出了我那些压了6个月编辑部都没有发的诗。这是一批最早的革命诗篇。

(审判)长：《雪》呢？

霍夫斯坦：《雪》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要早得多。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供说，你在此诗中诬蔑布尔什维克侮辱和平的平民，这些供词的下面有你的签名。

霍夫斯坦：我当时头脑没有办法进行思考。

(审判)长：接下去你又说：“……1918年我发表了一篇讲红军的诬蔑性文章”。

霍夫斯坦：我的第一篇写红军的文章发表在第一份犹太刊物上，那刊物名叫《季罗伊捷阿尔梅》，这是一篇追悼我的堂兄奥舍尔·施瓦茨曼的文章。

(审判)长：可是这些供词下面是有你的签名的。你在哪个地方讲的是实话呢，是在那儿还是在这儿？

霍夫斯坦：我想，我现在正处于记忆力最强的状态，回忆起了我的整个一生，也记起了我发表过的东西。而在我接受侦讯的那个时候，我简直就弄不清楚，我是在什么东西上签名，我在干些什么……

(审判)长：你信教吗？

霍夫斯坦：不，我从来不信教。我在农村住过好几年，我所有的亲属都务农。我是那一带第一批在礼拜六还刨树根、耕田地、割牧草的犹太人之一。

(审判)长：两件事互不妨碍嘛。可以既信教又从事体力劳动。

霍夫斯坦：但是我却从未有过信仰宗教的意向。犹太人有一条规矩：在礼拜六不能干任何劳动，没有哪一个信仰宗教的犹太人肯让礼拜六变得不洁净的，可我却像上边说过的那样，礼拜六干体力劳动。

预审过程中霍夫斯坦曾经供认，他和爱泼斯坦及费费尔一起进行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在审判长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问题之后，霍夫斯坦声明，“……现在我推翻这些供词”。

此后法庭转到犹委会的活动问题上。

(审判)长：再往下，在你关于同米霍埃尔斯这次会面的供词中你说：“米霍埃尔斯接着对我阐述道，他做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

员会的主席之后，将努力去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犹太民族的统一……”

霍夫斯坦：有过类似的话，可是我没有把它当真，我认为这是他“玫瑰色的”信口开河之辞。

（审判）长：他说，战争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霍夫斯坦：所有这些都是“玫瑰色的”信口开河之辞，后来却被那么一本正经地记录下来。

（审判）长：你在记录上签字的时候我不在场，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转弯，一部分承认，一部分又不承认。

霍夫斯坦：你现在来对我进行审判，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根据预审时我做的那些供述来审判我。

（审判）长：我分析你的这些供词，看得出来，你的供词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霍夫斯坦：是的，供词有一部分是真实的。米霍埃尔斯曾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发愁，会很完满顺利的”。我明白，侦查员有自己的想法，想给我做工作。

（审判）长：侦查员关心的不是讲自己的想法，而是讲事实，对这些事实你也签字加以确认了。

霍夫斯坦：有过这么一次会见——这是事实，可是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他怎么敢对我说那种话呢。我知道，战时全部的盟友只有两个——这就是我们的英勇精神和荣誉感。

（审判）长：你同贝格尔森见过面吗？

霍夫斯坦：是的。

（审判）长：在第13卷第144案卷页上你这样说：“在古比雪夫我见到了贝格尔森，他转述了米霍埃尔斯的想法，口气坚决地论证说，犹太国不是应该建在巴勒斯坦，而是应该建立在我们苏联，因为按照他的见解，这是最现实的。贝格尔森说他非常了解美国犹

太人对美国政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可以断言，如果我们能预先取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就会通过美国政府对苏联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苏联政府向我们做出让步”。

霍夫斯坦：这是真的，这里没有什么我要加以否认的东西。贝格尔森我是认识的。我知道他去过美国，我对他了解得很彻底，他当然可以跟我谈他自己的想法。

(审判) 长：同贝格尔森进行过这样的交谈吗？

霍夫斯坦：我认为这种念头是异想天开。

在对霍夫斯坦的审讯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预审控告他从事间谍活动。

(审判) 长：你否认你曾给委员会送过关于 26 家军工厂的情报吗？

霍夫斯坦：我没送过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没写过任何有关伊希姆拜的东西，连诗都没写过……

(审判) 长：就是说，你否认你曾收集过关于军工厂、伊希姆拜油田等等的材料，把它们转交给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再转送给美国人。

被告费费尔，霍夫斯坦向你转交过这样的材料吗？

费费尔：没有，他跟我讲曾去参观过国防工厂，说那儿的犹太人干得很好，表现出高度的英勇精神，没有谈过其他的事情。

霍夫斯坦：我到这些企业去参观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委员会。

(审判) 长：在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你也是可以到那些地方去的。

霍夫斯坦：在那之后我从未到外地去过。

№1169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霍夫斯坦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4日)

(审判)长：法庭继续开庭。

被告霍夫斯坦，咱们昨天谈到了克里木问题。你肯定说，你以前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克里木问题。

霍夫斯坦：是的，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是侦查员慢慢启发我才有了这种思想的。

(审判)长：被捕前你对克里木是有所了解，还是一点都不知道？

霍夫斯坦：在古比雪夫同米霍埃尔斯有过惟一的一次谈话。在他有了醉意的时候，他跟我说起过这个事，但我并没有怎么重视。

(审判)长：那么关于克里木你同他讲过什么吗？

霍夫斯坦：没有。他对我说，我跟你讲的比罗比詹的事儿，你别在意……

(审判)长：你为什么把这次谈话同你和米霍埃尔斯之间关于克里木的交谈联系起来呢？

霍夫斯坦：因为米霍埃尔斯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来到基辅，是在特韦尔林荫路上的时候，碰到了米霍埃尔斯。他把我叫住，问我：你知道现在是谁在克里木工作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他告诉我——雅科夫·克赖泽尔。从说这话的口气上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委员会的委员们委托他去研究克里木。米霍埃尔斯说，雅科夫·克赖泽尔在那边会把一切都做好的。他在那边干什么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对这件事是怎么回答他的呢？由此你得出了一个结论，克里木问题一直放在米霍埃尔斯的心上？

霍夫斯坦：苏奇科夫对我说过，帕斯特纳克和阿斯莫斯两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米霍埃尔斯曾对他们说过，在克里木将会出现一个单独体。

(审判)长：在同米霍埃尔斯谈话之后你和费费尔及其他人见过面。你没有同他们交换意见，也不知道他们正在谋划一种事情。你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吗？

霍夫斯坦：不是。

(审判)长：你是委员会的成员。

霍夫斯坦：我算是委员的成员，然而大家都知道，我对那儿在干些什么漠不关心，绝对无兴趣……

接下来审判长又回到了霍夫斯坦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上。特别是预审时他供述的。1944年他接受了犹委会领导人要他收集谍报的任务的问题。

(审判)长：你说，米霍埃尔斯并未满足于给他寄来的那些材料，而是要求提供更加广泛的情报并在基辅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活动。

霍夫斯坦：所有这些他都亲自做……

(审判)长：而你看到他是怎样做这些事情的，就决定在基辅当一名委员会的代表吗？

霍夫斯坦：是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在为法西斯侵略行动的牺牲者祈祷安息的那一天，我去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那一天去那儿的甚至还有一些老党员。

(审判)长：谁呢？

霍夫斯坦：费费尔和另一个什么人去了。

(审判)长：所有的人都在那儿祈祷吗？

霍夫斯坦：那天是祈祷安息日。我注意到突然间来了一位妇女。我对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一无所知。会议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妇女竟走到不是给她规定的位置上去了（妇女的席位在上面的敞廊里）。我问了一下旁边靠我站着的加尔金和克维持科，他们俩告诉我，这是热姆丘任娜。

（审判）长：还有什么人呢？

霍夫斯坦：还有费费尔、加尔金、魏斯曼^①、卡佐韦尔。

（审判）长：在那儿做祈祷吗？

霍夫斯坦：在那里诵读了通常那种追悼祈祷文。在那个地方他们还把塔尔列院士指给我看。

（审判）长：侦讯时你供说，从在名册里所看到的以及在那个地方同贝格尔森和克维特科的交谈中，你领悟到在乌克兰必须扩展民族主义的活动，努力加强对民众的影响？

是这样的吗？

霍夫斯坦：我弄明白了，这并不是秘密组织，我必须对年长的一代人做些工作。当时那个时期可以打个比方说，家家户户都有不幸。

（审判）长：是米霍埃尔斯指示你在基辅开展民族主义活动的，还是你自己决定做这件事的？

霍夫斯坦：烦恼得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审判）长：是谁烦恼你？

霍夫斯坦：我现在讲给你听。当时教育部长是狄青纳。来找我的有各种年龄的人，俄罗斯和犹太学校的教师也来找。

（审判）长：就是说，在基辅有很多犹太人找你提出各种各样

^① 海姆·魏斯曼（1874～1952），曾任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主席，世界犹太复国党首领，1946年5月当选以色列国临时总统，1949年2月当选第一任总统。

的日常生活问题？这种事很多吗？

霍夫斯坦：我当时明白，我必须对他们说明白，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许多请求和要求是不合法的，他们是有偏见的。我给他们讲，在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权利在基辅居住，现在条条道路都对他们敞开着，可他们对此却感到不满意……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一个年青党员，我必须做点事情，可由于当时没有文学工作，于是我就搞这些日常生活问题。

(审判) 长：你在自己的供词中是这么说的：你的住宅成了犹太民族主义者集聚的场所。这就是说，你的住宅变成了反苏的人集聚的场所，你同他们讨论你们的事情。你的这些供词是确实的吗？

霍夫斯坦：很明显，所有这些人有兴趣的是犹太语，很多人来找我，是让我给他们读他们收到的亲属来信的。因为我精通这种语言，而且几乎是惟一通晓这种语言的人，人们自然就来找我给他们读信。这些信来自巴勒斯坦和其他一些地方。先是一位医生古吉来找我，请我给他念一念收到的远亲的来信。我把信读给他听了，这件事情过后，别的人也开始来找我做同样的事。我的这位大夫让一位妇女拿着信来找我。这位妇女是先找到他，请他给念她的这封信的，后来又对他不相信，方来找我的。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审判) 长：是反苏的人在你在基辅的住宅里集会，商讨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任务吧？

你的供词的涵义就是这个。你的住宅是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的聚会场所？

霍夫斯坦：我没有这样的住宅。

(审判) 长：那你在供词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霍夫斯坦：在把这东西拿给我签字的时候，我确信是必须这么办，然而是为了什么——我却不知道。

审判长又回到间谍任务这个话题。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给你布置过反苏活动的任务没有？这是我要问你的事，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霍夫斯坦：对我个人没有布置过任何任务。

(审判)长：以前你说布置过，可现在又说没布置过任何任务。

霍夫斯坦：他们没有和我直接进行过任何谈话。没布置过任何任务。可是当侦查员问我，说你讲一讲，有过哪些事，你的生活过得怎样，一切事都是怎么安排的，我把什么都讲了。这次倒是一件大事，费费尔来了——为他组织了一场晚会，那时机关的全体人员都拿出了全部的力量，努力召集更多的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

(审判)长：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在问你，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给你交待了什么样的在基辅进行反苏工作的任务？

霍夫斯坦：没交待任何任务。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说，他们来到基辅，指责你做事迟缓，慢慢吞吞，指出有必要同在美国的“同乡会”建立接触，好寄送关于乌克兰的形势的情报？他们做过这样的指示没有？

霍夫斯坦：他们和我本人没有这么谈过。

(审判)长：你可是说过，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把这样的指示交待给了你、斯皮瓦克、洛伊茨克尔、波良克尔、卡甘等等一些人的，显然，你们是在不同的时间聚会的，在一个时间是米霍埃尔斯，在另一个时间是费费尔指示要把这项工作搞得积极活跃？

霍夫斯坦：他们说过应该进行工作，但是不会有人敢于直接就说：“要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

(审判)长：你的表现是不愿意回答我直截了当的提问。

接下来更加确切地询问了戈尔德贝格在苏联的活动。

(审判)长：怎么会弄成这样呢，费费尔是专门给你发了电报，让你为来访者组织适当的欢迎的——“欢迎戈尔德贝格，同‘国际旅行服务社’取得联系”。你那时知道戈尔德贝格是什么人吗？

霍夫斯坦：我当时可能已经知道戈尔德贝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之前我见过几份文件，从其中可以看明白他是纽约犹太作家和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且同援助俄罗斯运动有某种关系。但我对他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有关他的亲属关系我也一点都不知道。

(审判)长：戈尔德贝格到乌克兰后都干了些什么？

霍夫斯坦：对这件事情我已经供述过了。

(审判)长：对法庭来说，重要的是对所有这些进行查证。

霍夫斯坦：我说了他们进行的两次会见：在马努伊尔斯基那里和在巴然那里。这两次交谈的性质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去过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是马克西姆·雷利斯基……在全苏对外文化协会，戈尔德贝格当着雷利斯基的面说，他希望组织翻译一些乌克兰的文学作品，编一部文选，他得到了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允诺。至于雷利斯基，他是了解这种承诺的分量的。在那几年还来过一位什么美国女作家，对她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当然什么事情也没做。我同戈尔德贝格的会见当时仅限于谈论一些抽象的话题，我们喝了一杯茶，我就走掉了。

(审判)长：你说过，同戈尔德贝格在“国际旅行社”旅馆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会见过，在场的有你、卡甘、洛伊茨克尔及另外几个人，在那个地方提出了必须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中间加强民族主义工作的问题，戈尔德贝格要求为美国提供更为全面的情报？

霍夫斯坦：他，看来，认为自己是一个气派很大的人，所以直接就找了马努伊尔斯基，他们举行了会见。

(审判)长：你们之间谈了哪些方面的事情？

霍夫斯坦：我已经讲过了，不过我可以再说一遍。无论是在巴然那儿，还是在马努伊尔斯基那里，他说的都是一件事：他有帮助犹太人的愿望，在提高犹太文化方面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工作。总

的说来，他讲的都是些泛泛的、让人听不出什么意思的话，例如，不要灰心丧气，一切都会有的。听他说话真让人感到讨厌。

(审判)长：你供说，他在加强民族主义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指示，这是真的吗？

霍夫斯坦：我认为这就是在加强民族主义工作。“如果须要寄什么书来，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寄给你们的。”戈尔德贝格的举动行为就是这么一种样子。他扮演了一个对我们的态度似乎很友好的富有的大叔角色。

(审判)长：现在说收集谍报的问题。你曾协助戈尔德贝格在基辅收集谍报，并准备搞一份关于乌克兰的犹太人状况的详细情报吗？

霍夫斯坦：我跟你说是怎么一回事。

(审判)长：这一项指控是正确的吗，你承认这项指控吗？

霍夫斯坦：不，我不承认。

(审判)长：那么你来讲是怎么回事。

霍夫斯坦：戈尔德贝格到达之后一个星期，科特利亚尔把我叫去说：“你陪戈尔德贝格去犹太教堂，我故意让他在这儿耽误了一会儿”。这是去参加逾越节。科特利亚尔对我说，我们对这位美国客人应该使点外交手腕。他希望让戈尔德贝格看到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我们来到了犹太教堂。整个院子确实站满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我们勉强挤了过去。看得出来，在这之前牧师去过科特利亚尔那里。戈尔德贝格到处都参观了，看了房舍，见了人群，牧师问他——他要不要讲几句话……？戈尔德贝格同意了。他讲的是犹太话。他是这么说的：他不是一个人可以要求在场的人笃信宗教的人，但是他带来了你们的亲戚和朋友，一句话美国犹太人的问候，他希望今后也这样继续下去。他说，他不能要大家去做什么重大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不过大家都要相信，美国犹太人

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一定会做到。然后他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时祷告开始了，他也就无法再待下去。我们走到外面乘车走了。后来我告诉科特利亚尔，一切都办得很好，院子里人满满的，教堂里摆放着新家具，等等。

所有的被告都被问到关于犹委会成员的民族主义活动的问题，调查了是谁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通常都是由洛佐夫斯基问起。对霍夫斯坦的审问也不例外。

(审判)长：你关于洛佐夫斯基的供述（卷13，案卷页197）让我感兴趣。你供述了洛佐夫斯基在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中的作用。你记得这些供词吗？

霍夫斯坦：不记得了。

(审判)长：在那之前你陈述了吸收你进委员会的情形，同费费尔、尤泽福维奇的谈话。当被问及有关洛佐夫斯基的问题时，你回答说：“洛佐夫斯基完全了解我们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掩护下进行的那些民族主义的工作。他（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对我这样讲过）是倡议建立委员会的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实际上的领导人”。

霍夫斯坦：我知道洛佐夫斯基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最主要的领导人。在我第一次会见爱泼斯坦对他感到不满的时候，我就去找洛佐夫斯基……

(审判)长：你接着供说：“爱泼斯坦要求我提供的情报带有保密性质，我老实说非常害怕，就试图回避，不去执行这项任务。可是爱泼斯坦说是洛佐夫斯基准许收集这种情报的，坚决要求提供情报。”

我对爱泼斯坦说的是否是真话感到怀疑，我当即去找了洛佐夫斯基。洛佐夫斯基和我在苏联情报局他的办公室内单独谈了话，他

说，我们必须收集这种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将被作为同美国的犹太富豪们建立密切联系的基础（卷13，案卷页198~199）”。

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

霍夫斯坦：弄得太复杂了。我没有谈过这么复杂的话，不过侦查员已经了解了发生的事情，用我讲的事写成了这么一段话。我是写了一张便条，这张递交给洛佐夫斯基的便条说，我请求除情报和文章外，也要往美国寄文学作品，我们将努力寄送文学作品。后来我才弄明白，洛佐夫斯基不仅仅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他还是谢尔巴科夫的副手，管着所有的事务……

（审判）员：所以说，你是不同意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

霍夫斯坦：我从来也没敢想过，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可以不同意苏维埃政权的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么重大的问题。

（审判）长：你具体回答，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霍夫斯坦：我从来都是同意当局的民族政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给了我们……

（审判）员：（打断说）回答实质问题。你为什么供述这些呢？这是你的供词，你在上面签了字的。你是当着卡甘的面供出这些的。你那时说你不同意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可你现在却又说从来都同意。在哪一个场合可以相信你，你什么时候说的是实话，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

霍夫斯坦：是现在。

（审判）员：为什么你那个时候说的相反？

霍夫斯坦：我当时处于那样一种形势，那样一种环境下，对侦查员跟我讲的一切我都表示同意。

出了这么一场大祸，我觉得我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被卷进到一件案子里，既然被卷进案子里来了，我就做了那些供述，我有一

种感觉，我们都是一种靠人扶养的人，我的全部工作并不是完完全全有益的，所以在侦查员开始给我讲述评说的时候，我同意了他的评述。

当洛佐夫斯基在这儿说出了最重要的刑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这儿所认定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以前从未想到这一点。现在我才看清了情况的全部严重性。

(审判)员：法庭正在对你的供词进行查证。

霍夫斯坦：部长告诉我，我必须把全部东西都抖搂出来，讲出全部实情。

(审判)员：为什么你现在还不把全部东西都抖搂出来，还不讲实情呢？

霍夫斯坦：我直到现在才把一切弄清楚。我现在明白了全部的指控的实质是什么。出了某种事情，一位苏联公民，昨天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今天就已经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审判员：我们评判一个人依据的是他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依据他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

霍夫斯坦：我干过些什么事情呢。我干的事情这就是我写的作品，在我的作品里没有什么不同意……

审判员：可你在这些供词上签了字，你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字呢？

霍夫斯坦：我那时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审判)长：我对你进行了审问，你今天确认你的全部活动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可你现在对法庭的提问却回答说，你从来没有反对过党的政策。

霍夫斯坦：这难道是一回事吗？

(审判)长：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都同样意味着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为敌。

在审问霍夫斯坦的过程中，其他的被告，特别是贝格尔森也做了供述。

贝格尔森：我记得你曾对我进行过劝说，我感到非常地惊奇。你这样一个离开了苏联、家属也住在柏林的人怎么会劝我加入全乌克兰作家协会呢。此外他还对我说过，他有时感到头脑昏眩，他讲，每当他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他都想加以掩饰，为此就开始讲一些他想到的无意识的话。

你曾经说过，你来到柏林是因为在俄罗斯你没有任何工作。然而那时你却给我带来了由你作序的库什尼罗维奇、罗辛、哈谢瓦茨基、菲宁贝格等人的书籍。那就是说，你是有工作干的？

霍夫斯坦：无论是罗辛还是菲宁贝格的书我都没写过序言。库什尼罗维奇和哈谢瓦茨基是我的两位朋友，我给他们的书撰写了序言。

贝格尔森：不过，这就是说，那时已经在出版一些书了？为什么你要说，没有出任何东西呢？

霍夫斯坦：可以问一问这些书是怎样出版的，一个人如果在两年的时间里只写了两篇序言，那对他来说这算得上是什么工作？

贝格尔森：你曾说，尤泽福维奇和费费尔住同一栋楼——这在你的供词里有记载。然而尤泽福维奇却是和我住一栋楼，在我上边的一层，而费费尔却住在另一条街上。

霍夫斯坦：那就是说，我记得不准确。

审判员：（对霍夫斯坦）你对我们说你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贝格尔森却把你形容成一个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霍夫斯坦：他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审判员：贝格尔森在他的供词（卷17，案卷页170）中是这么说的：“早些时候，我在基辅认识的老朋友，一个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达维德·霍夫斯坦，以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现在

以色列国的总统魏茨曼的兄弟萨穆伊尔·魏茨曼来到柏林”。看，这儿有签名——贝格尔森。

贝格尔森：我在做这样的供述的时候认为：夸大要比缩小好，以后法庭会弄清楚的。

审判员：不是警告过你，必须供述真实情况吗？你供述过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并不对你隐瞒他进行的敌对活动，是吧？

贝格尔森：我是从什么事情上看出他的敌视态度的呢？他到巴勒斯坦去，这我认为已经是敌视态度了——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不可能是友好的。

审判员：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贝格尔森：毫无疑问。他一直在为古犹太语而奔走呼号。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现代犹太语只是一种代用品，它无法让犹太人得以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而他们需要这种民族的情感，以便把这种情感转化成民族主义思想。他们看到，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多数已经被同化，就是说不懂古犹太语。毫无疑问，在巴勒斯坦给霍夫斯坦布置了任务，他回来是负有任务的，于是他就鼓动我去反对现代犹太语。

他极力提倡古犹太语，很显然，他是从那边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他就巴勒斯坦的事和我争论过。我对他说，那儿汇集的都是陈腐的老古董。那儿的一切都和我少儿时代的一样——礼拜六到处都关着门，不准吸烟，不准乘马车在街上走，等等。他极力要我相信，比罗比詹搞不出什么名堂。我非常爱比罗比詹。我说，苏联政府还没有一件事是有始无终的。这件事早晚是要办成的。我给他列举了我的论据。我们对苏联政府给予以色列国的支持做何理解呢？我们的理解是对任何一个殖民地人民，苏联政府都会像帮助以色列摆脱大不列颠一样，去帮助他摆脱依附地位的，仅此而已。而他却

试图让我相信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说：“你瞧”，他这样说，“还是我说的对，你看看咱们的政府是怎样做的吧”。结果我们的政府仿佛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我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只不过得去回忆一下。比如说，他对我讲过，他是如何奔走提倡古犹太语的，他曾带领一个代表团去见加米涅夫，据他说加米涅夫好像也说了喜欢古犹太语，“可是你”，他对我说，“却反对这事……”

16时3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9时零分法庭继续开庭。

霍夫斯坦：我想回答贝格尔森提的问题……

霍夫斯坦：他的供词的全部意义我一点也不懂。他谈了我的感情，但是我却不相信他那么易动感情。他说的是哪一种语言？是比罗比詹应该使用的那一种？在比罗比詹给贝格尔森建造了房子，但他却没有去住。那么这里又谈得上哪一种语言呢？

（审判）长：什么人在比罗比詹给他建造了房子？

霍夫斯坦：政府建造的。他去了那里，说他想在比罗比詹定居，于是政府就在那里给他建造了住房，但是他却没有搬到那里去住。其次一点。我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去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就此写了文章的呢？有人对我说过，他去了，但是谁说的我记不得了。他自己在这儿说了这件事。

在这以后克维特科向霍夫斯坦提出问题。

克维特科：有一份你的供词记录，法庭宣读过而且相信，你在那里边说我们谈好了进行民族主义的工作。

霍夫斯坦：我读过你的供词，看到了你是怎样表述这种工作的……

克维特科：那就是说，你是以我的供词为依据做这样的供述的了。

在 1918 年出版的我的第一部诗集里，我有一首诗献给你。一个诗人把自己的诗献给另外一位诗人，这大概是表现了心灵上的贴近或者是十分尊敬。可是到了 1927 年，在哈尔科夫出版的一本书也收入了这同一首诗，但献词却去掉了。你这个博学多识且对道德问题有透彻了解的人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吧？

霍夫斯坦：小事一件。

克维特科：难道从一首诗上把献词抽掉是小事吗？

（审判）长：克维特科，你这样做和什么事情有关联呢？为什么再版这首诗的时候你把这个献词撤了下来呢？

克维特科：因为到 1927 年我已经把霍夫斯坦认作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人。

（审判）长：（对克维特科）你撤下献词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克维特科：是出于思想意识方面的考虑。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审判）长：在你把诗献给他的时候，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吗？

克维特科：不是。那是 1918 年初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的事。他也许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党的党员。那时他已经到了莫斯科，而我是在基辅。但在基辅那边已经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有一本书，虽然马尔基什在这里把它嘲笑了一顿，是很出色的，那是一些抒情细腻的美妙诗篇。那时把他抬得很高。这是第一位真正的抒情诗人。可是后来在基辅就有消息说，在莫斯科他有了一些不是苏联人应该有的往来和朋友关系。恩格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绍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可是你却同他们关系很好。这样的人有几十人之多。

审判长公民，请允许我给费费尔提一个问题。

(审判)长：说吧。

克维特科：费费尔为什么对他这位关系十分亲密的人——霍夫斯坦这样使劲地刨根问底儿呢，他同霍夫斯坦的关系从1922年，也许还要早一些就开始了，并且把一切他所需要和对他有利的事都问到了。我理解，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不过费费尔同时还应该记得，霍夫斯坦是他最亲密的人。20~25年来，费费尔同霍夫斯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霍夫斯坦引导费费尔入了文学之门，而费费尔又把霍夫斯坦引进了党内。

为什么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就没有一个涉及到霍夫斯坦是否有民族主义的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呢，还有费费尔了解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费费尔：第一，我和霍夫斯坦个人之间从来都不是朋友，我们彼此都称呼“您”，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常常是不太好的。我为什么没有向他提有关他的活动的问题呢？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从他关于自己的供述和对别人提问的回答中已经看清楚了。自然，我可以补充一句，我同他的关系是正常的。对于霍夫斯坦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也有发火的时候。为备忘录的事我和他发生了冲突，他被从党委会中开除。是我本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委会这个问题的。

等霍夫斯坦终于开始接近苏联的现实，等他出了一系列写苏联题材的书籍，那可是真正的诗篇。他有各种不同的著作。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来供述一下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霍夫斯坦的政治活动，他是不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基辅的传播者？

费费尔：问题是霍夫斯坦没有出席过一次主席团的会议，没有在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不过民族主义的倾向他是有的。我已经说过了他的那些民族主义的诗作，也供述了我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事。

№1169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尤泽福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5日)

(审判)长：被告尤泽福维奇，你面对法庭承认自己有哪些罪行？

尤泽福维奇：指控我背叛并进行民族主义的间谍活动以及诽谤联共（布）中央和工会我不接受。如果说我有罪，那就是我执行了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把一份概述英国殖民政策的材料通过科特利亚尔转给了戈尔德贝格，这份材料将作为文献资料供戈尔德贝格撰写揭露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书籍使用。我没有事先取得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或是其他机关同意这样做的书面批准。

我现在当庭依然证实洛佐夫斯基的确曾当着我的面同普赫洛夫谈好了这件事，洛佐夫斯基清楚地向他解释说，有一位美国的新闻工作者、美国的著名活动家准备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一部可以表明英国的政策不是用来巩固和平，而是用以反对和平的书籍，这份概述材料将会给他的写作带来方便。我现在像预审时和当着检察长科茹拉的面进行对质时做的一样，证实洛佐夫斯基曾托付我提醒普赫洛夫有这么一件事，我已当着洛佐夫斯基的面这样做了。

(审判)长：对于这件事你以后还要讲的，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概括性的问题——你承认自己犯了哪些罪，否认哪些罪？

尤泽福维奇：我认为，我没有事先取得这种书面文件，是很大一个疏忽，是大大的失策。格罗斯曼（一位著名的苏联作家）曾申明，他在爱伦堡的参与下为将在美国出版的“黑皮书”所编撰的材

料是得到了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同意和通过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认为这是我的失误。我得到洛佐夫斯基的指示，又相信了格罗斯曼的申明，就签署了该书所需材料已寄出的电报。在这之前我曾给洛佐夫斯基挂电话问我该怎么办（因为我没有采取任何自作主张的步骤）。洛佐夫斯基对我说，“那份材料难道还没有寄出去吗？”我在此之后就签了这份电报，认为一切都没有问题。

后来法庭听取了尤泽福维奇关于他的生活道路的供述。他讲道，他于1890年6月6日生在华沙的一个手工业者之家。在一家鞋厂做过工，曾经加入秘密的社会民主青年组织。1917年5月尤泽福维奇加入共产党。1931~1935年在美国工作。

（审判）长：你受什么人的派遣去美国的？

尤泽福维奇：经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核准，由红色工会国际决议派遣去的。

从美国回来之后，尤泽福维奇曾任水上运输工作者联合会中央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制革工业管理总局局长，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后来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情报局工作。

尤泽福维奇：我必须指出，在整个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同犹太人组织——无论是犹太劳动者土地整理会，还是犹太劳动者土地分配委员会，或是俄罗斯共产党（布）犹太组和《埃梅斯》报等等，都没有任何一点，哪怕是最不密切的联系。我对这些问题一点不感兴趣。1941年我开始在苏联情报局工作，1942年疏散到古比雪夫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情报局工人与工会报刊处处长，一直工作到1946年夏天，经过我长期多次申请和一再坚持，我终于又得以回到历史研究所，认真地撰写我那篇题为《毕苏茨基的五月法西斯政变》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写了35个印张，我本应于

1949 年对这篇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进行答辩。因被逮捕而未能进行。

……我必须说，我在离开苏联情报局之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过洛佐夫斯基，直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着手出版学术论文专辑《反对右翼社会党人》，洛佐夫斯基被委任为这本集子的编辑，而我则以《威廉·格林及其美国劳动联盟中的反动集团》为题写了一篇科研论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受到洛佐夫斯基的两次邀请。

(审判) 长：履历材料你已经讲完了。现在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预审时你对自己的罪行全部承认，并且供说你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进行敌对活动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之一。特别是在卷 17 的第 35 案卷页上你供道：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起犹太人当中的反苏分子。”对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的这个问题，你回答说：“第一，是因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权为一些极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所窃取……其中就有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其他一些人。另一方面，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一个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组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指导委员会活动的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者和随波逐流而把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的洛佐夫斯基……”

你现在就这些供词能对法庭讲些什么呢？

尤泽福维奇：第一点，我当时内心的状态，我当时所受到的震动，而且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摆脱掉这一震动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不起来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格列科夫的姓氏。我 4 个月都没能记起我的妹妹随她丈夫姓的是什么。我记不起苏联情报局我的副手雷季科夫的姓。

第二点，我必须说，侦查人员非常明白，供词讲得就像哈哈镜照出来的一样，他们并非出于偶然地对我这样说过，“你狡猾得超

过了你自己”。不过我那可不是狡猾。我在签字的时候相信，如果侦查人员自己弄不清楚我有什么罪，没有什么罪，那么还有党，还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至少他们会把一切都搞清楚的。我完全相信，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后，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判决，我一定能向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提起上诉，并且获准对我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我不愿意和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和国家安全部争吵。当然，我现在明白，而且从被逮捕的最初那几天起就对一切都明白，现在我也不装傻充愣……

我懂得，由于听了显然是出自霍夫斯坦等人之口的那些供述，侦查人员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看法，说服侦查人员改变看法，让他们相信我根本没有犯指控我的那些罪，这当然非我力所能及。

此外我还必须说，我在这些记录上签过字之后，侦查人员对我采取了一种关切备至的态度，而在我争辩的时候，我可是很不好受的。我必须指出，监狱的管理部门和卫生所对我可是表现出了非常人道的态度。我很感激他们，不过我还必须说，监狱的管理部门和卫生所非常了解，在把那些我根本不同意的记录拿给我签字的时候，我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我不想说得太多，不过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这事详细地供说一下，但不能是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而是直接对军事审判庭说。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我想这是速记记录可以容纳下的，我当时甚至想承认我是罗马教皇的亲侄子，是根据他直接交待下来的任务以他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此外我再不想说什么了。我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如此强烈，我不得（不如此），也许这从我这方面讲是机会主义，也许为此应该首先把我痛打一顿。

（审判）长：你现在究竟要否认什么呢？

尤泽福维奇：我否认自己有罪，并要加以证明。

（审判）长：可是在你之前已经审问过好几个被告人，他们都

说你犯有民族主义的罪行。

尤泽福维奇：我将努力向审判我的法庭证明并讲述我是在说谎还是讲的是实情。就说我去找这位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这件事……

(审判)长：我将按照法庭所必需的程序对你进行审问。我已经宣读了你的供词，你否认供词是对的吗？

尤泽福维奇：是的，我否认。

(审判)长：以怎样的形式否定？你的供词说在委员会里聚集一批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引导这个委员会去做对我们国家的敌对工作。这些供词哪些方面说得对，哪些方面说得不对？

尤泽福维奇：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先请求允许我讲一讲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一点，在宣读起诉书的时候，第24页上事情被说成是这个样子：我接到洛佐夫斯基的指示后，就自己悄悄地经过屋后面的门进入美国新闻专员的房里，把机密材料转交给美国的女侦察员伊甘。这是对实际情况的粗暴歪曲。事实是这样的：苏联情报局的负责工作人员巴拉绍夫^①给我挂电话，让我把衣服穿得好一点，说已经派车来接我，我必须去苏联情报局。我一到达，那儿就已经站了一群人，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一起走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是到新闻专员的私人住宅去。当时这一批人里边有著名作家、《真理报》的编辑马尔夏克，古罗夫上校，鲍罗廷，卡尔梅科夫，巴拉绍夫，鲁比宁以及别的什么人。进行侦查时我从第一天起就主动报告了这件事，并且一直加以肯定。第一批记录中有一份记载说，我是和一群苏联情报局

^① 彼·斯·巴拉绍夫(1905~?)，曾任苏联情报局副局长助理，情报局美国书刊部副部长，苏联部长会议书刊保守军事及国家机密特派员，中央机关道德法庭庭长。

的人员在一起的，后来在同洛佐夫斯基对质的时候，我又把此事向检察长科茹拉重新供述了一遍，讲了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的名字，还述说了那儿发生的事，那时记下来的是，在场的有鲍罗廷，卡尔梅科夫，鲁比宁和所有的人。当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伊甘向卡尔梅科夫——苏联情报局的责任秘书——提出了一个什么关于工会刊物的问题。卡尔梅科夫让我回答。伊甘是说，苏联情报局关于工人工会运动的文章只有产业工会联合会办的刊物，它的新闻通讯社“阿利那”才刊登，然而还有着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系列的组织，它们都有同苏联的工会接近的明显意向，因为它们都同情苏联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的这场斗争，等等，它们是会刊登我们的文章的。我回答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文章寄到《美国联合主义者》去。她说：“给我几篇文章，我把它们寄给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我认识几个人，他们自然会把文章登出来的”。几天之后她给苏联情报局打电话，要求接见她。我告诉她，我现在很忙，请她过几天再打电话来。我把这件事报告给苏联情报局局长洛佐夫斯基，他说：“好吧，你就拿几篇已经登载过或是得到了审查编辑部同意的文章的副本给她”。这几篇文章是由我那位主管工人和工会刊物事务的副手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雷季科夫选定的。那是几篇关于苏联工会组织建设的原则、关于苏联工会的社会保险、关心劳动保护和文化教育活动的文章副本。

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的杂志《工会》、《工厂工人委员会辅导》、《劳动报》等等刊物都刊登过许多这种题材的文章。我交给伊甘的不是什么“材料”，而是文章的副本，我当着科绍拉上校的面重又说明过这个情况。当侦查员把对质的记录交给我签字的时候，我指出了这一点，可是随后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就在这些供词上签了字。我再重说一次，这里讲的不是谍报性质的材料，因为那种材料本身就不存在，我也没有交付过那种材料。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卷7,案卷页7)中承认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伊甘,并把关于苏联工会情况的材料交给了她。

尤泽福维奇：我交给她的是一些文章的副本,这些文章此前曾登载在共产党和工会的许许多多机关刊物上,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机关刊物上也曾经刊登过。

(审判)长：这些文章的副本是存放在苏联情报局的,你把它们翻印了吗?

尤泽福维奇：我们是有副本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工会组织的代表来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们的就是这些文章,这里边不可能有任何机密的东西。另外,我向伊甘交付这些文章的副本时,我那个处的工作人员在场,就是说完全是正式的。

(审判)长：谁在场?

尤泽福维奇：我记得雷季科夫和库兹涅佐夫在。我曾央求侦查人员传唤这些人来为我的供词做证。我讲的绝对是真实情况。我说的若不是真话,就是把我绞死也嫌轻了。

接下来法庭调查尤泽福维奇另外是否还会见过美国人,对此他回答说,在他供职苏联情报局的整个期间,曾多次会见外国新闻界的代表人士,也会见过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不过在进行所有这些会见时,都有苏联情报局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场。

说到同戈尔德贝格的会面,尤泽福维奇讲,他听到过一些对此人极好的评语。

(审判)长：听谁说的?

尤泽福维奇：听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说的。

(审判)长：听洛佐夫斯基说过吗?

尤泽福维奇：我当时没有机会同洛佐夫斯基谈这个话题。关于戈尔德贝格我还听说过,他曾为募集款项帮助红军出过不少的力。

为去美国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组织了许多次群众大会一事也应归功于他。我还记得当时有人说，在给约·维·斯大林缝制皮大衣的时候，为了有机会缝上一条缝子，缝纫工人为这一荣誉还交了一定数量的钱，而这笔钱就转入了援助俄罗斯基金。再有我还听说，他是苏联的绝对朋友，我应该说，在苏联作家协会为他在联盟宫组织的大型集会上，他作为苏联的朋友，而且是热忱的朋友发表了讲话。每次讲话时，甚至在个人之间的交谈中，戈尔德贝格总是支持他是苏联的朋友这种说法的。在“民族”宾馆举行的午宴上，他当着我的面也说过这种话。

法庭详细调查从第205研究所为戈尔德贝格获取关于英国殖民政策的材料的情况。

然后法庭转而调查下一件事——委员会的领导同戈尔德贝格关于在克里木组建犹太自治政权的前景进行的座谈。

No 1170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尤泽福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7日)

(审判)长：你否认戈尔德贝格在谈到克里木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在那儿建立犹太共和国，美国人将给予支持的话吗？

尤泽福维奇：我没有听到过这种事。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供认过：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草拟了一份请求把克里木交给犹太人的致政府信件的草稿。这份草稿在小范围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中间进行了讨论，里边除了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之外，还有布雷格曼、贝格尔森、希梅利奥维奇、努西诺夫及另外几个人参加，但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得了（卷7，案卷页46）。

……关于我们已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克里木问题一事，我们对戈尔德贝格进行了通报，并告诉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洛佐夫斯基的支持”（卷7，案卷页47）。

关于你的这些供词你现在有什么话要对法庭讲吗？

尤泽福维奇：我只有一点可说——我不承认这些。

(审判)长：可是预审时你是在这些供词上亲笔签了字的？

尤泽福维奇：确实有我的签字，但是我不承认这些。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人曾向戈尔德贝格就克里木问题做过报告，我不知道这回事。所以侦讯时向我询问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这两个人时，我对他们做了很好的评价。后来我开始仔细思索，感觉到我必须写点什么，因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于是我就说：莫斯科市党委书

记波波夫召见费费尔，告诉他说，他准备向他为作家们提供用房——俱乐部。然后我又讲，曾经收到过参加美国进步组织的文化代表会议的邀请。我对此事考虑了很久，想到也许这些可以被认定是民族主义倾向。在其余方面我对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的评价是很好的。这使侦查员十分不满，可是对实际有过的事我既不能添加又不能减掉任何东西，我重说一遍——我只讲真话。

我不知道和戈尔德贝格有过任何谈判。

(审判)长：那么你的供词和你的签名，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尤泽福维奇：我可以确认一点：这是我签的字。如果为此必须对我进行审判的话，那么就审判吧，但是面对军事审判庭我没有权利讲事实上没有以及我并不知道的事情。

(审判)长：你还曾供说，戈尔德贝格说过，在他离开苏联之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必须加紧向美国寄送有关苏联的情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向戈尔德贝格保证说，他们会做到的（卷7，案卷页61）。说过这些话吗？

尤泽福维奇：我不知道曾经说过这种话。

(审判)长：戈尔德贝格说过，犹太人必须在国际规模上团结起来。

尤泽福维奇：我无法确证这一点。我不能说假话。我已经62岁了，在政治上我已被勾销了苏联公民资格。我现在实际上纯粹是一团神经而已。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可我只希望给一切都还以本来的面目，如果我有什么罪过的话，那就该对我进行惩办，而不必对我讲什么客气。

(审判)长：暂时你只承认你在这些记录上签了字是你的罪过。

尤泽福维奇：不只这一件。我犯了一个很大的过失——转交概述英国殖民政策的材料这件事情我有如下的罪过：我没有审看用于

“黑皮书”的材料，相信了格罗斯曼说的这份材料已经得到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同意和通过的话，就签署了通知材料已寄往美国的电报。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中接下来说到了几个参加组织委员会的人，特别是说到了费费尔（卷7，案卷页62），你评述费费尔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你说他同意戈尔德贝格的观点，提出必须加强你们在苏联国土上的活动，你还讲到，他据说似乎已经在相应级别的机关提出了在莫斯科建立犹太人俱乐部的问题，这个俱乐部将会成为在犹太人中间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心。

你又说，费费尔同其他城市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尤泽福维奇：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要看一看我亲笔写的供词就全清楚了。我没有写这些。这也和我亲笔写的关于马尔基什的供词一样，与记录中所写的并不一致。

在这之后，法庭向尤泽福维奇提出关于霍夫斯坦、什泰恩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之后还有关于同洛佐夫斯基的相互关系问题。

尤泽福维奇：我是在1917年8月或是9月认识洛佐夫斯基的。那个时候我担任莫斯科及其毗邻地区10万制革工人为期3个月大罢工的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副主席。我必须说，后来洛佐夫斯基一来到莫斯科，立即就当上了（在弗里切死后）俄罗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我已经说过了，关于这个党，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1920年1月1日的决议中有一段评语。确实，这个党有一段时间是反对过广泛使用红色恐怖手段的，但它总还是赞成苏维埃政权、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赞成建立第三国际等等的。洛佐夫斯基和克雷扎诺夫斯基住在一起，娶的妻子是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小姨子——涅夫佐罗娃，一个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我知道，

在1920年的工会大辩论时期洛佐夫斯基是捍卫列宁在工会运动问题上的立场的人们中的一个。

(审判)长：接下去你指出：“在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洛佐夫斯基握有关于皮亚特尼茨基和托姆斯基进行反党活动的有力材料，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默默地注视着这场斗争的结局……”

尤泽福维奇：对的，洛佐夫斯基有一回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机会主义的有毛病的提法——“改良主义的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他亲口承认了他的这一错误，那次会议我是作为来宾出席的。

第二点，他同托姆斯基在国际工会运动的问题上一直进行着极为激烈的斗争。当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部可以说是在俄罗斯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公开斗争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说话的诚然不是洛佐夫斯基，但是洛佐夫斯基积极地投身于领导并且开展了这场斗争的人们当中。

1923年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团组的一次大型会议上，鲁特、菲舍尔和马斯洛夫发了言，发言反对他们的有安德烈耶夫，洛佐夫斯基，还有其他人，这中间也有我。我为此受到托姆斯基的好一顿骂。洛佐夫斯基也挨了申斥。

当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部开始斗争的时候，洛佐夫斯基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委员。当时他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斗争。托姆斯基当时正努力要同国外的一些所谓统一的小组建立关系，把目标定在出了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兰德列尔身上。

至于说皮亚特尼茨基，他和洛佐夫斯基是相互敌对的。我必须忠诚而直率地向法庭申明，洛佐夫斯基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我曾经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委员，该执委会办的期刊的编辑委员，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杂志的编辑。我们反对过雷科夫、布哈林等

人。洛佐夫斯基知道我曾同右倾分子进行过斗争。他本人也憎恨这些人。他们老是搅得他心烦意乱，特别是托姆斯基和皮亚尼茨基。在红色工会国际的会议上托姆斯基总是让贝尔·库恩、科斯塔尼扬、斯库利斯基等等一些人出来说话。洛佐夫斯基不得不首先打击皮亚特尼茨基、贝尔·库恩等人。在团组执行部会议上他们不断地进行极其激烈的斗争。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原则上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

(审判)长：那么你在自己的供词里为什么要写一些别的事情呢？

尤泽福维奇：这我已经说过了。

(审判)长：关于他的个人品质你供的都是真实的吗？“在对洛佐夫斯基的评价中还得加上：他一贯既狡猾又谨慎。他的口号是：把一切可能损害他的前途的人排除掉，不管这是什么人——朋友，同事……”

尤泽福维奇：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回答。国家安全部部长曾两次传唤我去，问我：“你直截了当地说，对于洛佐夫斯基和其他人的危害国家的罪行你知道些什么”。

(审判)长：哪位部长？

尤泽福维奇：阿巴库莫夫。我两次都回答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洛佐夫斯基有什么危害国家的罪行，我自己也没有危害国家的罪行。在所有的记录上都已签过字之后，部长又把我第三次叫去，有礼貌地、话也说得很客气地问我：“请你直率地说一说洛佐夫斯基，洛佐夫斯基对党、对苏联政府是一种什么态度，关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党中央他都讲过一些什么”。我现在所讲的事情，我请你们去和部长核对一下，是不是我信口开河说的。我告诉部长我说的是实话，谈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总是十分崇敬的。我还补充说，有一次我问洛佐夫斯基，“莫洛托夫怎么会认识你

呢？”（洛佐夫斯基那时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对我说：“他大概是因为喀山那一段经历认识我的，我以前曾经在那个地方做地下工作，而莫洛托夫当时是大学生组织的领袖。”

洛佐夫斯基：当时莫洛托夫是一个大学生。

尤泽福维奇：是的，是大学生。我给部长讲了他家里的情形，我特别说到洛佐夫斯基正为他女儿的未婚夫——就是帕尔申部长的儿子——出了不幸而非常难过，他女儿的未婚夫被火车轧成了两截。谈话时在座的一位上校问我，据说记录中有这样的说法：洛佐夫斯基对他被撤销副部长职务又没有获得新的任命一事这么看那么看。我说并非如此。

（审判）长：对洛佐夫斯基被撤职一事，你在你的供词（卷7，案卷页39）中说，直到最近他对党都怀有敌意，在和你亲密地交谈时他的情绪有时就会爆发出来。“例如，”你说，“1948年，洛佐夫斯基已经不在职，他打电话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开始对他的艰难处境发牢骚。我问他是否期望再担任某种领导职位，洛佐夫斯基回答说，在党的目前的方针下，他不可能期望得到好的职位……”

接下来你供说，洛佐夫斯基对党的民族政策表示不同意，他说，苏联的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艰难了……

尤泽福维奇：对他期望获得任职的事我曾问过他：“你是否很快就会被任命新职呀？”他对我说：“给我选定一份工作可没那么容易，我都72岁了，当我在外交部工作，同时在苏联情报局兼职，再加上编著外交辞典的事务，因而我不得不工作到清晨5点钟的时候，我那时真体会到了年龄是个什么东西，另外，洛佐夫斯基说，党中央提拔一些年青人，对他们进行培养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这种做法是对的”。他确实是这么说的。至于说反犹太人主义，我在泰乌明向军事审判庭报告的时候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我只不过是把沃尔科夫和米哈伊洛夫两个人的姓氏弄混了。我曾经对

侦查员说过，当我被问到洛佐夫斯基是否谈起过反犹太人主义，犹太人等等问题的時候，我说了，在苏联情报局有一位英国科的负责人员，他还是党委会的书记，就是这个人是在出版科女职员法伊金娜的新年家庭娱乐晚会上做出了空前未有的举动，喝醉了酒，他就开始大喊大叫：所有的“臭犹太人”都是卑鄙下流的家伙，洛佐夫斯基卑鄙无耻，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孟什维克，是“臭犹太人”，所有的“臭犹太人”都是小商贩，等等。

(审判)长：这个人姓什么？

尤泽福维奇：沃尔科夫。过了一些时候，我看这位沃尔科夫不见了。有一天我问洛佐夫斯基：“党委会书记沃尔科夫不知为什么不见了，是怎么回事？”洛佐夫斯基对我说，这件事法伊金娜会告诉我的，同时又补充说，沃尔科夫以前在日本也干过令人不愉快的事，为此被撤了职。他是在那儿的苏联大使馆或者商务代表处工作，我记不准了。第二件，还是这个沃尔科夫干出了一些反苏的、反犹太人主义的乖张行为，使法伊金娜的丈夫很生气，他是一个俄罗斯族人，他对妻子说，如果你不去找洛佐夫斯基，我就亲自到其他地方去报告这件事。所以我就问了泰乌明这一回事。洛佐夫斯基还对我说：“真希望了解一下，他，沃尔科夫，是和什么人在一起狂喝痛饮的，他又是从什么人的身上感染了这样一些情绪的”。然而若说洛佐夫斯基对我讲过什么关于反犹太人主义的话——那是胡说八道。我必须说，洛佐夫斯基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什么民族主义内容的话，我也没和洛佐夫斯基谈过这种话。

(审判)长：你在供词中接着对洛佐夫斯基做了个人的评述。

尤泽福维奇：我说了下面这些话：洛佐夫斯基是一个自私的人，就是现在我也确认这一点。对自己的老同事他不总是很直率的。

(审判)长：我们把话题贴近委员会。洛佐夫斯基终究是这个

委员会的领导人，而委员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人们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且确认委员会做的并不是它该干的事，这种情形在这里已经说过了。那么洛佐夫斯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怎么竟然没有发觉委员会在进行敌对的活动呢？

尤泽福维奇：洛佐夫斯基有可能和我，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显得目光短浅，但是我不能想象洛佐夫斯基会去干犯罪的事，会去充当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鼓舞者。我无法设想会有这种事，就像我不能设想布雷格曼和其他的人干这种事一样。

(审判)长：那就是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是瞒着洛佐夫斯基干民族主义活动的了？

尤泽福维奇：也许费费尔也能证实洛佐夫斯基曾把他进行过的某些谈判向政府做了汇报。洛佐夫斯基可能犯错误，但是采取直接损害国家的行动——有意识地去犯罪，他是不会的。

我无法想象洛佐夫斯基听到了有关进行某种勾结的话，却不向安全部报告。我能够回忆起一个具体的事实吗？我的身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祖国的叛徒之一，间谍，诽谤党和政府的政策的人。我想提醒洛佐夫斯基回忆一下，让他说我讲的对还是不对。当我在“民族”宾馆听到戈尔德贝格说（不过我现在记不得是对谁说的了），美国大使史密斯和他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对苏联十分愤恨和仇视的时候，我这个诽谤者、间谍和叛徒却立即给洛佐夫斯基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史密斯恨苏联，他显然也是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我看，一个民族主义者，间谍，苏联的敌人未必会竭力设法当即报告此事吧。我的那张便条最后是这样说的：“这也许会引起你这位外交部副部长的注意，也许安全部对此也会感兴趣的”。我来问你，难道说可以设想，尤泽福维奇是一个坏蛋，恶棍，诽谤者，叛徒，所以他不对此事发出警报，因为这样做会使安全部去注意这帮“民族主义者和间谍”。

(审判)长：关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出行你知道一些什么？你知道有关他们同罗森贝格和莱温会见的详情吗？

尤泽福维奇：我恳求军事审判庭相信我，此前我没有听说过罗森贝格这个姓名。我现在就来讲一讲，有一次，我是怎么听说这次出行的。他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那个时期正住在“梅特罗波尔”，因为我的住房被洗劫一空并且捣毁了。费费尔回来以后，2~3周的时间他一次都没有到我这儿来。他一直很忙……

(审判)长：可是侦讯时你说过，你知道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罗森贝格、莱温关于克里木的谈话！

尤泽福维奇：关于这些人我什么也没听到过。我听说在那边有那么一位进步的犹太教经师魏斯^①曾寻求会见他们，侦讯时我供出了魏斯、查尔斯·卓别麟、德莱塞。我说的是实话。从本案的材料中可以看出，1944年10月24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我不在。

法庭试图查明，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去美国之前是否有过关于克里木的议论，以及这些议论是什么性质的。

(审判)长：你们谈论过这方面的事吗，为什么恰恰是克里木对你们有吸引力呢？

你们谈论过这件事吗？

尤泽福维奇：那是在古比雪夫，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去美国的问题出现之前很久的事。米霍埃尔斯喜欢喝两杯，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上了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他们两人正谈得很开心，很热烈。我走到他们身边，问是什么事？米霍埃尔斯对我说：“你会到比罗比詹去吗？”我回答说：“永远不会去的”。于是他说：“你也许不懂，苏联政府要把我们派到比罗比詹去，需要人手，很多去管理

^① 斯蒂芬·魏斯，40年代担任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

教育事务、保健事务的人，难道说像希梅利奥维奇这样一个人不能去搞保健工作吗，他在包特金医院当了多少年的领导了……”他还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连连摆手，可米霍埃尔斯说：“难道你这位老工会工作者就不能派上用场吗？……”

那时我认为这是胡说，甚至还问爱泼斯坦：“怎么，米霍埃尔斯喝多了？”爱泼斯坦回答说，他喝下了双份的酒。有这么一则俄罗斯谚语：“酒醉吐真言”。他当时说这一切就像是开玩笑，关于这件事在案卷里有我亲笔写的供词……

侦查人员控告尤泽福维奇进行间谍活动，向国外寄送包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同外国侦察机关的代表违法往来。

尤泽福维奇：……下面一点。在另外一份记录中，我被控告说我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撰文计划做了修改，并把它交给了海菲茨。据说这些改动具有谍报性质。鉴定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结论，但是我想说一说这个论断。自1933年我不再做秘密工作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起，我就认识海菲茨。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三位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要来找我。真的来了三个人，出示了他们的委任状，他们中间就有海菲茨，请求帮助他们。我同意了，他们请我告诉他们，什么人能够帮助他们在旧金山找到工作……我告诉他们，我认识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找工作的人，我给了他们这个人的地址。

就是说我知道海菲茨是什么人，即使我确实打算做一些谍报性的改动的话，我又怎么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我明明知道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多年的负责干部的人手中呢。这种说法哪有一点最基本的逻辑呀……

（审判）长：1952年2月22日你接受审讯时说过：“当然，洛佐夫斯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是利用我来达到他们进行敌对活动

的目的的，我和我的其他同谋一样，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是有罪的，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利用提供给它的各种机会，堕落成了外国各界反动势力和美国侦察人员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我们所有这些犹太民族主义者为了满足这些反动势力和美国侦察人员的要求，源源不断地往国外寄送大量有关苏联的经济和文化的材料，给苏联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卷7，案卷页300）。

在后面供述戈尔德贝格时，你说他确实在苏联从事了侦察活动，收集过属于苏联机密的材料。你现在确认这些供词吗？

尤泽福维奇：我不能确认这些供词。关于戈尔德贝格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假如我知道他是侦察人员、间谍等等的话，我当然是会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安全部的，可是我看到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而且我还知道这样的来访没有最高机关的批准是不可能的。我没能识别出来他是一个侦察人员，他的举止表现非常聪明机敏，就拿在犹太人委员会的宴会上他的那次演讲来说吧。我在宴会上也讲了话，为斯大林干过杯，而戈尔德贝格那次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极其尖酸刻薄地评述了杜鲁门（这儿在座的人大概都记得这件事）。他讲了杜鲁门是怎样爬上总统宝座的，等等。我的罪过就是做了30年的党员，却没能摸透这个人。侦讯时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审判）长：我想，尤泽福维奇，把这么一点弄准确，你被控告说，你把关于苏联工会工作的情报交给了美国的女侦察员伊甘，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

尤泽福维奇：我交给她的是已经在共产党和工会的报刊上发表过并通过了审查编辑等等手续的文章的副本。我不是“傻瓜”，会不经检查就把文章交给她。

（审判）长：你在对质（卷31，案卷页396）时说到同洛佐夫斯基谈话的内容，并且指出这份材料是苏联的国家机密。这是同洛佐夫斯基对质时的事。

尤泽福维奇：我是在检察长离开之后在这份记录上签的字。我问洛佐夫斯基：“请你说一说，我向你汇报这份文件的报告情况没有？”洛佐夫斯基说，没有，记录中没有记明这件事情。

（审判）长：可是洛佐夫斯基当时也证实（第397页）这份材料具有机密性质。这是检察长在场时的事吧？

尤泽福维奇：他把一些比较严重的事都签在了自己的名下。我现在给你讲这一切是怎么办理的。有一天检察长科茹拉审问我有关民族主义问题和分配“部长职位”的事。我供说那是在交谈时说的玩笑话，这之后他还审了我15分钟。我告诉他，我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愿对所有的一切负责。这时我请求让我出去几分钟，等我回来检察长科茹拉已经不在，就剩下侦查员和我一个人。对我的审讯一直继续到深夜12点至02点钟，等到我该在记录上签字的时候，我看到科茹拉已经在上面签好了名字。我感到很惊讶，他怎么可以在这个东西上签字呢。

（审判）长：讲一讲哈恩·乔治·赫伯特的情况。

尤泽福维奇：哈恩·乔治·赫伯特是苏联情报局的英语译员，他在苏联情报局工作是有合法手续的。

（审判）长：你还记得他的供词吗，他在讲述你在苏联情报局中的情况时说：“……1946年3月，戴维斯从加拿大用电话告知我，尤泽福维奇给他寄去了大量有关苏联，特别是有关苏联的工农业发展情况，以及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的材料”（卷30，案卷页210）。

尤泽福维奇：他是一名译员，他对我的工作能够了解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从未和他交谈过。有一次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迎面碰上了他，打了一个招呼，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译员。我记不得是谁跟我说过，他是一名英国的共产党员。

戴维斯去了加拿大，临行前他给我个人看了有加拿大共产党中

央书记签字的证书，证书中载明戴维斯是共产党中央的委员。

那个时候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步的出版印刷机构的编辑因同苏联情报局有联系而开始遭到迫害，所以戴维斯走的时候曾说，他愿意为苏联效力，他准备建立一个假的新闻处，以绕开美国反动势力的一切“犄角”。他甚至曾想过领一笔专门的货币基金来办这件事，但是洛佐夫斯基拒绝了他领取货币基金的要求。戴维斯开始收到我们寄去的材料，90%的材料是工会、工人题材的，后来我在这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苏联情报局。我走后，这个处由苏联情报局又管了半年或是1年，再往后就被划归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开始使用我们掌握的地址，向同样那些国家发寄文章。

(审判)长：证人列·亚·舍伊宁的供词你还记得吗，你确认这供词吗？(卷30，案卷页272)

尤泽福维奇：不。关于舍伊宁我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虽然他对我进行了诽谤，我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说，我对他的印象是良好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据我所知，他的军衔是上校。我不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可是他却认定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尤泽福维奇：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认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相信什么就说什么。

(审判)长：他在自己的供词中说你在委员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尤泽福维奇：我不知道是谁那么认定的，无论如何，我对他的供词感到惊奇。

(审判)长：对被告费费尔、贝格尔森、克维特科、霍夫斯坦、马尔基什针对你所做的供述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认定你起着这

样一种作用：被吸收进了这个委员会，干了民族主义的工作。你听见这些供述了吗？

尤泽福维奇：我没有去听。我要讲这样一点：多年来我和洛佐夫斯基保持着同志关系，这我不否认。我过去未曾为此感到羞耻，现在我也不感到可耻。我认为洛佐夫斯基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就不相信，甚至死后到了阴曹地府依然不会相信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可能犯错误，他可能放松了警惕，目光短浅，但若说是他干了犯罪的勾当——这就和好像是我去干了犯罪的勾当一样——我可真得去自杀，还得亲手把我的那个小女孩杀死了。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曾经就尤泽福维奇、他在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做过供述。你现在对自己的供词予以确认吗？

费费尔：我现在记不准自己的供词了。

(审判)长：你说过，尤泽福维奇实质上是洛佐夫斯基在委员会的代表。你后来（卷2，案卷页77）还说，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你，也就是3个人一起，起草了关于克里木的呈文，接着你又补充道：除我们3个人之外，尤泽福维奇也积极地参与了此事，他被认为是洛佐夫斯基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代表。过了两三天方案准备好了……洛佐夫斯基审查了方案，他说：“祝你们成功，犹太人”。这些供述属实吗？

费费尔：尤泽福维奇是洛佐夫斯基的助手——这是谁都知道的，尤泽福维奇协助担任委员会责任秘书的爱泼斯坦工作——这也是人们都知道的。至于那份呈文，我清楚地记得，在把呈文拿给洛佐夫斯基看之前，爱泼斯坦先让尤泽福维奇看了呈文。尤泽福维奇看来是把这件事情忘了。

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爱泼斯坦都同尤泽福维奇商量，供词的这一部分我确认。

尤泽福维奇：……爱泼斯坦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件事说什么话了。我惟一确实感到遗憾的是爱泼斯坦现在已经不在人世。

(审判)长：但是他本人曾亲口说过，你和希梅利奥维奇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是积极的。

尤泽福维奇：我不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我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这是在工会工作形成的老习惯了，开会时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就发言。所以说这一切都很荒唐。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这件事，有一点我倒可以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说这事，因为在这儿一切都要速记记录下来的），爱泼斯坦并没有对我直接说，但做过暗示，我也知道，曾经有一些极为重要的工作委派给他，到派他去的那些地方做。

第二点，我知道，弗·伊·列宁曾亲自召见过爱泼斯坦，把那封著名的致美国工人的信交给了他，他把这封信带到了美国。后来他在那边担任共产党报纸的编辑，再往后又干过几种其他的、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工作，因此我很信任他，关于这些我可以单独向军事审判庭报告。

在法庭的调查过程中犹委会的活动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自然，在审讯尤泽福维奇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审判员：给委员会规定的任务是什么？你具体说一说这个问题。

尤泽福维奇：我决不做可怜相来祈求怜悯，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有过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它做了重要的工作，它承担了重要的任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的，一切指示都是谢尔巴科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做出的。群众大会上的全部讲话都不是秘密的，这所有的人都知道。爱伦堡在台上讲：“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的母亲是哈纳”——这是通过了亚历山德罗夫和谢尔巴科夫的。我知道，有一个斯拉夫人委员会，

那儿办理的全是斯拉夫人的问题。斯拉夫人委员会只办理斯拉夫人的事务，只写有关斯拉夫人的文章材料，那么为什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不能办理犹太人的问题呢？

审判员：就是说当时你认为委员会办的是一切需要它办的事情，做的是它应分内做的工作了。

尤泽福维奇：概括起来我可以只讲一句话：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了上面批准的。关于这一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海菲茨总是讲，这个东西，他说，已经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的同意，不能再做补充了。这是他在我表示希望做一些修改时对我说的话。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整个路线和实际活动据我看当时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的心是非常坦然的。我是不会宁愿自杀并且杀死自己的孩子，而去干犯罪的勾当的。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许多这儿在座的人都可以证实。

审判员：你对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这个想法抱什么态度？

尤泽福维奇：米霍埃尔斯曾经告诉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维·米·莫洛托夫有指示，既然他对我这么说，我就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考虑，既然有一个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那为什么在克里木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共和国呢？犹太人都从比罗比詹跑掉了，因为那里的情形很糟，另外，那儿离日本的边境线也不远，而在克里木他们是可以定居下来的。我没有看出这件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至于我个人，无论是对比罗比詹还是对克里木都没有兴趣。对这一点这里在座的人都可以加以证实。

审判员：那么对于一般性的建立犹太国的想法你是什么态度呢？对联合全世界犹太人的想法又是什么态度？

尤泽福维奇：联合全世界的犹太人——委员会里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费费尔在这儿说得很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怎么可能

实现，比如说，思想上的联合呢。在苏联公民和阿根廷或是美国公民之间实现联合吗？第二点——至于说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事，在我代表基辅区党委会做报告的时候，向我提出有关此事问题的不仅有犹太人，还有俄罗斯人。我对他们说，那是个资产阶级国家，并指出在这个国家的政府成员中有那么一个格林贝格，在这之前他曾当过波兰议会的议员，曾对毕苏斯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我说了那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关于这一点不仅是本案的材料，就连鉴定的结论都提到了。我这指的是我反对往巴勒斯坦寄送那么大数量的文章的事。我认为，寄送那么多的文章及一般地说对巴勒斯坦犹太国如此看重这一事实本身，有可能招致一些不好的讹传和非议。

审判员：尤泽福维奇，你能记起你责难希梅利奥维奇对巴勒斯坦偏心的那一次发言吗……

尤泽福维奇：我说的就是那件事。我那次话说得极其尖锐，我是反对那么重视巴勒斯坦的。

审判员：你发言反对希梅利奥维奇，他也对你做了回答。

尤泽福维奇：我不记得这事了。我只念了自己的发言稿。

审判员：你经常收到并且阅读《埃尼凯特》报吗？

尤泽福维奇：请相信我，我家里经常收到这份报纸，但都是干家务用了。我自己没有办法读，因为我不大懂犹太语。

审判员：那就是说，你虽然经常收到报纸，但是却不看？

尤泽福维奇：是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事。我给这份报纸写过几篇文章，但都是关于工会问题或是对美国反动势力做反宣传的。

审判员：你参加了对报纸选题计划的讨论，也看到了文章专谈犹太人。你怎样看待这种情况：一个劲地写——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可是关于苏联人却一点什么东西也没有？……

尤泽福维奇：关于苏联的总体消息，犹太报刊是从一般性报刊

中选取的。这是一点。第二——在选题计划中有大量同犹太人不相干的文章，那些文章讲十月革命30周年，讲苏联的和平政策，讲斯大林宪法。我曾经指出，讲犹太人的时候，也必须指明苏联的其他民族。我在讲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强调的。每一个听到过我的讲话的人都会知道，我就是这样讲的，我没有这样讲过：“十月革命光是给犹太人带来了什么”，我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

我希望不光是军事审判庭，还有党和苏联政府都能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

在对30年代尤泽福维奇同外国人会见时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审讯记录中没有提到，其中有一些会见是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的请求进行的。尤泽福维奇向法庭申明，是按照工作人员的请求这样做的。

(审判)长：那么说侦查员没有把这个记下来？

尤泽福维奇：没有记下来。

(审判)长：是因为你的缘故。

尤泽福维奇：我坚决地要求这样做。

(审判)长：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感到奇怪，怎么会成了这么一种样子，可以起到为你做辩护作用的事实仿佛是侦查员没有记下来。这就意味着那时你感到此事对你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记下来，我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它记下来呢？

尤泽福维奇：有某些情况我要亲自向军事审判庭报告。

和审讯每一个被告的情形一样，在对尤泽福维奇进行审讯的过程中，在洛佐夫斯基这个人物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预审曾试图把这个人物弄成反苏的民族主义中心的领导人。几乎所有受侦讯的人都在提供了不利于洛佐夫斯基的相应供词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

由侦查员们记载在审讯尤泽福维奇的记录中的对洛佐夫斯基的全部不好的介绍，在开庭审讯的过程中都没有得到尤泽福维奇的确认，他全部予以否认。

对1940年洛佐夫斯基参加纪念肖洛姆-阿莱赫姆的晚会一事重又——已非第一次——进行了争辩。在诉讼的开初几天，这一事实被认定为只能是洛佐夫斯基民族主义立场的表露。

在开庭的过程中，举引了贝格尔森的供词，供词说尤泽福维奇就这次出席晚会的事讲过：“洛佐夫斯基对我们的民族主义活动早就抱同情态度”。

贝格尔森：我得修正一下，我说的是：洛佐夫斯基对犹太文学感兴趣，他对犹太文学持同情的态度，不是说的民族主义活动。

(审判)长：在你亲手校正记录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这改正过来呢？

贝格尔森：若是给了我机会把一切该修正的地方都改过来的话，那记录就已不是这个样子了。有的时候，我在那些本想把手中的笔放下来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交叉审讯的过程中就尤泽福维奇、贝格尔森对洛佐夫斯基的活动的活动的评价进行了调查。然后审判长要费费尔向法庭供述，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尤泽福维奇的民族主义活动表现在哪些事情上。费费尔把法庭已经了解的那些事实又重述了一遍：尤泽福维奇参与了关于克里木的呈文的草拟工作，组织了犹太人参加卫国战争的展览会，参加了“黑皮书”的准备工作，等等。

结束对这一问题的供述时费费尔说道：

“……他对犹太人问题注重的程度要比对其他问题深一些，对其他的委员会，比如对斯拉夫人委员会等等，表

现出来的兴趣就小一些。他是洛佐夫斯基的助手，积极地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对此我已不止一次地加以证实。如何评价尤泽福维奇的民族主义活动吗？我不能说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事实——展览会和‘黑皮书’——让人把他评价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尤泽福维奇被指控不仅是同洛佐夫斯基，而且还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尤泽福维奇为自己辩护说，这两个人是谢尔巴科夫选拔上来的，因此在政治方面没有引起什么怀疑。尤泽福维奇本人没有听到爱泼斯坦说过什么含有民族主义内容的话。

费费尔：（对尤泽福维奇）你同爱泼斯坦的关系这样密切，真的会对许多事情都不知情吗。这种情况我无法想象……

在调查了与展览会和“黑皮书”的筹备活动相关的细节之后，法庭要求克维特科“确切说明尤泽福维奇在委员会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克维特科：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使我感到可耻的总括起来说就是在这样一些记录上签了字，关于这个情况我请求听取我的陈述。我无法当着众人的面讲这种可耻的事。

（审判）长：我们不能在暗地里审理案件。

克维特科：据我所知，尤泽福维奇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们把这些同志看成是被派来加强委员会党组织的警惕性的。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的供词是不真实的了？

克维特科：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的。

审讯临近结束的时候，受审的人向尤泽福维奇提出问题。

布雷格曼：（对尤泽福维奇）你在自己的一份供词中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钻进了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你对法庭讲实话，我的民族主义活动表现在哪些事情上？

尤泽福维奇：我一点也不了解你有哪些民族主义的活动。我只知道，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你和我及古别利曼一起支持党的路线。这一点我了解，而这一点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里也看得很清楚。

布雷格曼：你的供词和一些讲话都说我参加过一次什么讨论建立克里木共和国问题的会议，这是真的吗？

尤泽福维奇：我不承认这个。我已经对法庭说过了，我认为布雷格曼是一名忠诚的党员。在那样一些供词上签字这是我的过错，现在我予以否认。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要在讲别人的事的供词上签字呢，你应该只在关于你自己的事的供词上签字。你为什么要这样积极呢？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指控一个人犯有重罪，然后又轻易地把它推翻呢。

尤泽福维奇：坐在这儿的人们已经讲了，他们也都在自己的不真实的供词上签了字。我现在对法庭讲的是实情……

（审判）长：不管在哪儿你都应当老老实实的，不管在哪儿人都应当讲实话。

尤泽福维奇：这个情况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我说了，我缺乏坚强的毅力。

希梅利奥维奇：昨天给你宣读了经你签过字的供词，那上面说，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及其他几个人，末了还提到了我——希梅利奥维奇，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了民族主义和谍报活动的中心。你把这些供词否认了。我是否可以认为，其根据就是你昨天在法庭上曾经申明，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希梅利奥维奇是一个罪犯等等，那么，经过你签字的、说希梅利奥维奇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了民族主义中心等等的那些供词是不是符合实际的呢？

尤泽福维奇：我已申明我不相信存在着什么中心。我也申明我不知道有任何中心，任何秘密活动，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秘密活动，由此我也就确认你，还有布雷格曼也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

(审判)长：(对费费尔)你在自己的供词中说，尤泽福维奇补充并且发展了关于犹太人无阶级属性、关于犹太人在苏联受歧视等等的思想。你确认这种说法吗？

费费尔：我现在记不得了，因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是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

(审判)长：(宣读)“尤泽福维奇和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那部分共产党员一起……”就是说，在你们主席团内部存在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和没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两个部分吗？

费费尔：比如说，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米霍埃尔斯我认为也是，可是比如说布雷格曼我就不认为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

(审判)长：那霍夫斯坦、克维特科和马尔基什你又怎么看呢？

费费尔：霍夫斯坦不参与主席团的活动。贝格尔森我认为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

(审判)长：克维特科呢？

费费尔：这几个人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审判)长：那么关于尤泽福维奇的供词根据是什么？

费费尔：我关于尤泽福维奇的供词有两个事实作根据：“黑皮书”和“巡回展览会”。还根据他支持建立纪念碑问题的演讲。曾有人提议在马伊达内克为受害的犹太人建立纪念碑。

(审判)长：你曾供说，尤泽福维奇表述过犹太人必须联合起来，犹太人没有阶级属性，据说在苏联仿佛存在歧视犹太人的现象这样一些观点，你要就这个方面做具体的回答。

费费尔：不记得了。

(审判)长：接下来你供说，“尤泽福维奇同美国的新闻记者戈尔德贝格有罪恶的联系，他接受戈尔德贝格送的一些小礼品，又通过苏联情报局的原工作人员科特利亚尔把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交给他”。

你的这些供词是确实的吗？

费费尔：是的。

尤泽福维奇：这说的是205研究所的材料。我想起来了，为了对戈尔德贝格所赠礼品表示回报，我也向他回赠了一份礼品——我写的书《乔治·华盛顿》和《为争取美国的殖民地独立而斗争》。

费费尔：我想向尤泽福维奇询问给魏茨曼发贺电的事情。他昨天说，贺电没有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我想对法庭讲讲下面这样一个情况。我已经对这件事提供过情况了，但是不完全。昨天审判员表示有疑惑，或许我们没有通知主席团，而自行发出了。祝贺魏茨曼的电文草稿是我拟的，送到了两个地方去（我准确地回想起来了，这是可以查证的）外交部和苏斯洛夫处。在我和副外长佐林谈话的时候（这是差15分4点的事），他说，16时他得到维·米·莫洛托夫处去，那时他再用电话把决定通知我。16时10分他打来了电话，他说莫洛托夫签署了这份贺电文稿。

(审判)长：就是给魏茨曼的贺电吗？

费费尔：是的。这可以查对，中央档案库里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我们是发到那儿给苏斯洛夫的。佐林来过电话之后，我给舒梅科打电话，问他是否有什么改动。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任何改动，我们有一条建议。

(审判)长：外交部做了哪些改动呢？

费费尔：只有一处什么修辞性的改动。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负责干部舒梅科告诉我，电文不会有什么改动，但是，首长建议——他是这样说的——把签名拿掉，把电报不加签名发出去。我告诉他，

这样在外国的报刊上显得不豁亮，舒梅科回答我说：由诗人们签名那是一回事，可若是由，举例说，包特金医院主任医生希梅利奥维奇签名，那就是另一回事，不方便了。所以我们把签名拿掉吧，这封贺电就用这样一种形式发了出去。

(审判)长：这就是说，贺电电文在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是第一个问题，而最后一个问题讨论的是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的贺电。

尤泽福维奇：费费尔，你说说，我也许和您谈过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话吧？

费费尔：尤泽福维奇和我个人没有谈过任何反苏和民族主义内容的话。

尤泽福维奇：我只想谈一点。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造谣诽谤过，我已经62岁了。在侦查的过程中，指控我的东西我都签了字。让布雷格曼看一看，我是不是给他造谣了。我感到惊奇，他怎么全都弄不明白，他怎么不明白已经形成的这种局面？我承认，在侦讯的过程中，我不幸缺乏铁一般的坚强毅力，畏缩了，在那样一些记录上签了字。我说“我不幸”是因为我有一个时期担任过洛佐夫斯基的助手，同他相识30年，所以我在侦讯的过程中处境尤其困难。说起这些我难过得不得了。

(审判)长：你还有什么要对法庭说的？

尤泽福维奇：我不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声明，一直到死我都认为我是一个忠诚的苏维埃人和共产党员。

(5月27日)20时3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 1170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7日)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你对法庭陈述一下，你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

洛佐夫斯基：我没犯任何罪。请允许我对此做详细的说明。

(审判)长：你在预审时是承认自己犯罪了的。

洛佐夫斯基：我什么也不会隐瞒的……

(审判)长：从你的履历开始讲。

洛佐夫斯基：今年3月底我已满74周岁。这一情况不会减轻，而只能加重我的刑罚。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会加重刑罚的情况是，在政治上不能像贝格尔森所想的那样，因年龄而从轻处罚。

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候补委员，1936年底我成了中央委员，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并接连担任中央委员13个年头。

第三个要加重刑罚的情况是，从十月革命时起我一直是历届士兵和农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一直到斯大林宪法通过。

根据斯大林宪法，我两次被吉尔吉斯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第四个要加重刑罚的情况是，我17岁就担任红色工会国际的秘书长，并领导工会运动，另外，20岁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团委员。

第五个要加重刑罚的情况是我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 20 年。

第六个要加重刑罚的情况是我担任过 7 年零 2 个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5 年苏联情报局副局长，1 年苏联情报局局长。

我简短地说一说我所走过的道路。我之所以能担任如此高的职位，要感谢联共（布），是党把我提高到高位的。

如果我在自己的供词中无法向法庭证明，收集在所有这 42 册卷宗和起诉书的一切，在这儿口头上加在我头上的一切，都与实际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话，那么我应该受到的不是一个最重的刑罚，而是整整六个。

我的姓氏，如你们所知，是德里佐。这是一个无法译成任何一种其他语言的姓氏。当我们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时，他告诉我说，根据父一辈子流传下来的一则传说的说法，1492 年宗教主裁判托马斯·托尔克韦马达颁布命令，规定犹太人必须改信天主教，否则他们就得在两个月之内离开西班牙，那时我们的远祖中有一个人随着 80 万犹太人逃出了西班牙。1905 年在塔墨尔福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上我改姓洛佐夫斯基，就是在那一次的代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弗·伊·列宁，还有约·维·斯大林。

我父亲是古犹太语教师。他熟悉犹太塔木德，精通古犹太语，用古犹太语写一些诗；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父亲教我学会了犹太文字、祈祷文和俄语。一个古犹太语教师却教自己的儿子俄语。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是宗教狂。大约在 13 岁之前我是信教的。我被硬性要求到犹太教堂去，读祈祷文等等。总之，我们在两个世纪之交进入社会的这一代人，童年时期都是信仰宗教的。就连米·伊·加里宁有一次在索契都曾对我讲起过，童年时期他也曾往教堂跑过。

在晚间开庭的整个时间里，洛佐夫斯基讲述了自己革命的一生，他直接参加了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社会

民主党人同列宁一起做过的工作。

22时2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次日，1952年5月28日，12时25分审判庭继续开庭。

№1170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8日)

(审判)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继续开庭。

被告洛佐夫斯基，由你继续做供述。我要求你讲一讲起诉书中指出的那些问题。你被控告在1918~1919年也进行过反党工作，还有通过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结合着为自己做辩护对已经讲过的事情再进行什么补充的话，我是不反对的……

洛佐夫斯基：好。有一个问题让我感到苦恼：可能不可能把政权保持住。我同伊里奇的关系很好，那时常同他在一起交谈。在克拉斯诺夫投降以后，伊里奇有一次说道：“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坚持住两年了”，——他预见得很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伊里奇在报刊上的一顿痛斥之后，不再公开出来讲话，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我搞的是工会运动。

有一次伊里奇对我说，他写了一份关于工人实行监督的文章草稿。他把他的那份“八条”交给了我。在伊里奇去世之后，我把这份手稿转给了《真理报》编辑部。

在伊里奇把他的草稿交给我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家里讨论一下，考虑考虑”。我和当时做工会运动方面工作的齐佩罗维奇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给这份提纲补充了几条，特别是补上了一条关于全俄罗斯工人监督委员会的内容。过了一天我把伊里奇的草稿和我们补充的那几条给他送去。伊里奇说，他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不

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要把工人的监督权集中起来，而在于工人要在各个工厂把监督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集中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做到的。

1917年11月14日公布了包括我们的补充意见在内的关于实行工人监督的决定。我作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书记，着手筹备第一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上同党的路线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弗·伊·列宁把工会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共产主义的学校，而认为它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当时怕工会会变成劳动厅或劳动部，从而将失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及自下而上地建设自己的组织的可能，因此我表示反对工会国家化。后来我明白过来我错了。由于犯错误我被开除出党。

(审判)长：哪一年？

洛佐夫斯基：1917年12月。

(审判)长：侦讯时你供说(卷1，案卷页37)1971年^①12月，我因十月革命期间反对党的政策及有关工会的问题被第二次开除出俄罗斯共产党(布)。

关于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是由季诺维也夫宣布的，他宣读完决议后说：“你照我的做法干，立下一项承诺，说你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你自己则继续执行原先的那条路线，这样就会把你留在党内”。

是这样的吗？

洛佐夫斯基：一点不差。季诺维也夫确实是那么对我说的，然而对我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也无法理解，怎么可以留在党内而暗中干反对党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不干这种事情。

我认为起诉书中所写的我因耍两面手法而被两次开除出党——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17年。

这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对的。耍两面手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当党员又干反对党的秘密破坏活动。可是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公开的，那么还能说他是因耍两面手法而被开除的吗？在因耍两面手法被开除和因有错误行为、因公开反对党的路线被开除，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说这种提法与我毫不相干。我从来不是耍两面手法的人。

1918年1月召集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我作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书记宣布这次代表大会开幕。第一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托姆斯基。我在关于工会的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工会独立自主的说法，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简直不值一批，可是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我是自己主动刊发了我对这一点所讲的那些话，而且党也了解这个情况，这难道还是耍两面手法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团选出来了，主席团主席是托姆斯基。记不得书记是谁了，不过我仿佛只是一个主席团委员。

我的党派面貌不清不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处局外，把我从党内开除出来，我变成了孤身一人。那个时候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有一些自称为国际主义者的团体，它们联合脱离了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和右翼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些中间团体。政府迁到莫斯科之后我也过来了。在这个地方我对相应的组织做了一番了解，召集了一个代表会议，就当上了“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审判)长：这次代表会议是根据什么人的倡议召开的？

洛佐夫斯基：是由一些“国际主义者”倡议，在我的参与下召开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要讲自己在工会的活动呢，并没有控告你这个问题。

洛佐夫斯基：你马上就会看明白的。这同对我的失实控告相

关。

社会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分配粮食时只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监督下供应给铁路职工。这是一个挑拨性的举动。在某一个火车站，一股穿着红军服装的白卫军杀死了站长、这列火车的机车司机，由此使得铁路职工人人惶惑不安。这时我就去见弗·伊·列宁。

(审判)长：这是哪一年的事？

洛佐夫斯基：是1919年初，那个时候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被高尔察克踢开。弗·伊·列宁立即接见了。我。“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我说，杀害铁路员工这明显的是白卫军的挑衅行为，红军战士是决不会干这种事的。干这种事的目的是要挑动铁路职工罢工。我说，必须以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名义写一份致铁路员工的呼吁书，指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弗·伊·列宁叫来秘书，告诉他：“领洛佐夫斯基到房间里去，让他写该写的东西”。

我并非如这里所说，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我起草了一份呼吁书稿。弗·伊·列宁改动了2~3个地方，第二天呼吁书就以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对俄罗斯共产党（布）的“敌对态度”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说明我领导的这个党，一个非常小的国际主义者政党的性质，我要举出一个事实。

俄罗斯共产党（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19年3月份召开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俄罗斯国际主义者社会工人党向俄罗斯共产党（布）致了贺词。

你们说，假如我对党抱着敌视的态度，难道列宁会接待我，还允许我在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吗。难道说可以设想弗·伊·列宁的行动是不合逻辑的。这不是凭空的杜撰，不是文艺小说——这是俄罗斯共产党（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与此同时，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同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进行了谈判，谈我们党加入俄罗斯共

产党（布），而不是如尤泽福维奇所说合并的问题。在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表的号召书里……

（审判）长：尤泽福维奇在他的供词里说，这是在基层党员的压力下这样做的，群众不支持你，你是不得已才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

洛佐夫斯基：关于尤泽福维奇的话我后边再说。我说的这些都有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作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审判）长：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又是讲话，又是保证，又是发誓……

洛佐夫斯基：我不认为对所有的人都可以采用同一个尺度。

（审判）长：对，那是当然。

洛佐夫斯基：在1919年4月举行的国际主义者党的代表大会上意见有分歧：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还是不加入。但最终经过谈判，我们加入了俄罗斯共产党（布）。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在致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书中说：“国际主义者党最近一个时期（或是最近几年，我记不准了）一直和我们党手携手地进行工作。在有大的国际主义者地方组织的地方，要吸收1~2名该组织的人参加省党委会”。这些都发表在报刊上……

为了给我的党籍问题做个了结，我要说明，在1929年或是1930年我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我的党龄问题的申请书。根据中央的决定，在1919年12月给所有国际主义者党员都从1919年5月计算了党龄。所以说，如果这是一个敌对的组织，那怎么可以把进行敌对活动的时期计入党龄呢。而且老布尔什维克诺金确认说，他因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一起工作，从1901年就认识我。从1903年认识我的……^①做了证实；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做了证。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当时做出了一项专门的决定——我的党龄从 1901 年算起，1911～1917 年曾中断。我的党证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接下来法庭调查洛佐夫斯基同贝格尔森、努西诺夫、马尔基什及其他人的关系。洛佐夫斯基供述他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情况。

在预审过程中，1940 年洛佐夫斯基出席纪念肖洛姆·阿莱赫姆的盛大晚会一事曾受到特别的重视。

贝格尔森：是的，我说过，洛佐夫斯基参加纪念肖洛姆·阿莱赫姆的晚会曾给一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泽福维奇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也是犹太族，他对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有兴趣，再也许他是想看一看，都来了一些什么人”。

（审判）长：“对我们的民族主义活动早就抱着同情的态度，能给犹太民族主义者帮上忙的地方都帮忙”这句话尤泽福维奇说了没说？

贝格尔森：没有，没说过。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这样供述呢，速记稿的这个地方你是亲自改过的？

贝格尔森：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写的比这还要糟。

有好几次洛佐夫斯基自己回过来又谈他的履历，审判长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洛佐夫斯基回答说，起诉书中写的是他自十月革命时起就与苏维埃政权为敌。

洛佐夫斯基：我不是从 1919 年起就是敌人了嘛。

（审判）长：可是所有这些都与案件无关呀。

洛佐夫斯基：这可与我的人头有关。

（审判）长：对你提出的控告很具体。起诉书说的是：“从事间谍活动并担任苏联国内犹太民族主义秘密活动的领导人，是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民族主义工作中心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1943年曾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布置任务，同美国的反动帮伙建立联系……”

你所讲的那些工人革命工会运动的历史同这种活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洛佐夫斯基：可是起诉书中说，从1919年起我就是敌人了。

（审判）长：如果你想历数一遍你都执行过党委派的哪些任务，那么你就简短地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

洛佐夫斯基：……可见，在整个工作期间，一直到在国家文学出版社担任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在做受到信任的党务工作，而且我也了解党的领导的看法。所以说，我一看到说我从1919年开始就是党的敌人这样的语句，我根本无法忍受。

（审判）长：这是从对你所提的控告里面得出来的。

洛佐夫斯基：就这样，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事讲完了，一切都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所有的杜撰虚构都扫除干净了。

1939年5月12日，莫洛托夫把我召去，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任命我为副外交人民委员，并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一切都要看由谁出任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告诉我人民委员由他亲自担任，还说，必须在晚上之前答复。我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给了我3天的时间来清理我的一切事务，从1939年5月15日开始我就当上了副外交人民委员。分派我管远东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事务。初期在远东我们的刺儿头是日本。我是熟知各个国家情况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了解所有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党的经济状况和政策；我从事国际事务达30年。我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了解远东，然而这仍旧是非常难做的那一部分工作，这种工作我一直干了好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我也知道党的领导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审判）长：这同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办理这个案件大概并不

需要了解外交部工作的细情。你说一说，在这一段时期内你挨没挨过批评，受没受过什么处分——你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洛佐夫斯基：在外交部系统，我在那儿工作了7年零2个月，我没受过任何批评。在我从事工会活动期间我曾发生过三次冲突。也许该把这个情况讲一讲？

(审判)长：这些冲突没有列入本案，我们为什么要扩大控告的范围呢。由于什么原因你被免去了外交部的职务？

洛佐夫斯基：1946年7月我被任命为苏联情报局局长，接替已故的谢尔巴科夫。由于这个原因解除了我在外交部的职务。

战争爆发的时间你们是知道的。1941年6月24日我收到一份决定的摘录，内容大致如下：成立苏联情报局，组成人员为：局长——谢尔巴科夫，洛佐夫斯基任副局长，其余人员有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主席波利卡尔波夫，塔斯社负责人哈文松^①，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克梅诺夫，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德罗夫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副秘书长萨克辛。

在中央委员会内给我们拨了房子，派了2~3个人来（是谢尔巴科夫从那个机关派来的），又叫来了阿菲诺格诺夫和法捷耶夫，让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协助我们工作。阿菲诺格诺夫是搞文学问题的。

分配给我两项职责：主持新闻记者招待会和为所有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报刊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需要选一些人。谢尔巴科夫说：“我不能从前线上给你调人来，你自己去找能干工作的人吧：没有上前线的老人，妇女等等”。我开始挑选还有工作能力的人，把连什坦都挑来了，他已经76岁。他懂好几门外语，开

^① 雅·谢·哈文松（1901~1992），曾任苏联塔斯社的主要领导人，《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兼国外部主任。

始在我们这儿工作。

困难的是我们从报纸上选来的材料必须翻译成很好的英语。国外的报刊编辑部若是收到文字很差的英文或是法文文章，他们就会把它塞进废纸篓里。

任务是——让关于苏联的情报打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报，同法西斯做斗争，进行反宣传，等等。指控我的一条罪状是我把一些曾经寄居国外的人招进了苏联情报局机关里。但是我们需要精通外语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任用了一些符合这项要求的人，尽管他们的历史也许不太干净。

你可知道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吗？中央的书记指示我——紧急召开用犹太语对美宣传广播大会。必须发动千百万人起来反对希特勒匪徒的兽行。于是这儿就有人说了：召开过一次民族主义的群众大会，那都是洛佐夫斯基干的。简直像是神话一样：既没有中央，也没有政府，却有一个洛佐夫斯基和几个犹太人，是他们干的这一切事。这可真是不可思议。我是根据党交待的任务组织大会的。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在中央接受过指示。每一份发言稿都经我、亚历山德罗夫和谢尔巴科夫读过。难道真可以做这样的想象：并不归我管辖的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不经中央批准就会把一些呼吁、讲话播发出去吗？

就是说，召开过这么个大会。你说说看，卡皮察院士归我管吗？作家爱伦堡归我管吗？难道他们是按照我的布置发言的，还是怎么的？请你们回忆一下当时发言的人的名单。爱伦堡直面法西斯，他母亲的名字哈纳脱口而出。可是突然间却说，这是重新提倡犹太特色。我母亲的名字也叫哈纳——怎么办，我得为此感到羞耻还是怎么着？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心理。为什么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是生气勃勃的，我

们进行斗争是有信心的，1941年9月有一个新闻记者讲，德国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德国人用望远镜已经看到莫斯科了，我就笑着回敬说，德国人无疑是会看到莫斯科的，不过是在当了俘虏之后，于是在1941年9月我回敬他的这句话就在全世界传开了。我讥讽了戈培尔，这就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拉斯印成了好几亿份，满世界传播。戈培尔在他的机关报上写文章说，等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要活活地剥了我的皮。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斗胆认为我干得还不错。我从未讲过这种事情，也从未把这当做是自己的功劳，不过我想，我干的是党的事业，是苏维埃的事业。

1941年10月15日下午2点，我接到通知，说我们夜里要到古比雪夫去。在古比雪夫全部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得收罗一些人，得找房子，好有个地方安身。在古比雪夫新闻记者招待会仍然接着举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但是提问和回答的文稿我都通过高频通讯传送给给他，然后再接收经过修改并附有建议的文稿，就是说通过令尤泽福维奇感到非常可疑的那种方式进行磋商。1941年底，在同谢尔巴科夫一次通过高频通讯谈话时，我们产生了成立几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想法。我们一下子就成立了好几个反法西斯委员会：斯拉夫人的、犹太人的、妇女的、青年的还有科学家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在一些只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的阶级性组织，这是一些要面向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同法西斯进行的斗争做些事情的人的组织……

这个建立委员会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说这一切都是我想出来的吗？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在我们苏联冒出来5个组织，中央为此供给费用，提供人员，给他们房子，都不过问他们在干什么吗？为什么控告我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而不是建立了所有这5个委员会？为什么会见一个什么叫罗森贝格的人就

比会见米科瓦伊奇克要好？为什么斯拉夫人委员会就可以经我准许接待安德斯？这是什么人，是苏联的朋友么？为什么可以接待贝奈斯？为什么青年委员会可以致信由埃莉奥诺拉·罗斯福直接领导的一些美国组织呢……

就这样，我开始网罗人才，翻译人员。党的委员会认为招聘法因贝格及其他一些人参加工作是我的过错。那么法因贝格是怎样一个人呢？法因贝格是一位在英国居住多年的共产党员、老工人的儿子。法因贝格是列宁著作英文本的翻译员。我为什么不能把他请来工作？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那么请你说说，这是健全合理的思想么？一个人干着翻译列宁著作的工作，但他却不能翻译法捷耶夫或是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而在那儿所有的东西都是归在一个栏目下的。

1941年底成立起来5个委员会。这都不是专门性的组织。它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愿意促进反法西斯的斗争并援助苏联的民主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等等的组织。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用的措词就是这样的，后来登在报纸上也是这个样子。我曾请求把这个材料附在案卷里，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5个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关于领导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总是要有人来领导的，需要有秘书，需要有主席。就这个问题同谢尔巴科夫谈过好多次。他推荐米霍埃尔斯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谢尔巴科夫问我，对爱泼斯坦我是否了解一些什么情况？苏联作家协会里有好多人是认识他的。我告诉他，爱泼斯坦原先是崩得分子。

（审判）长：关于米霍埃尔斯的问题是怎么提的？

洛佐夫斯基：谢尔巴科夫希望主席由一个党外人士担任，米霍埃尔斯符合这一条。这是由谢尔巴科夫提名的。

（审判）长：你以前见过米霍埃尔斯吗？

洛佐夫斯基：我和米霍埃尔斯是8月份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见面

的。这之前我从未遇上过他，和他也不认识……

(审判)长：那么认识费费尔吗？

洛佐夫斯基：在他来古比雪夫之前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印过他写的东西，也没听人说起过这么一个姓名。我听人说起过马尔基什的姓名。

(审判)长：听说过克维特科吗？

洛佐夫斯基：我听说过克维特科这个姓名，因为他在儿童文学方面是有名气的。

(审判)长：那么认不认识霍夫斯坦？

洛佐夫斯基：不认识。

马尔基什：请允许我做一点很重要的说明。

1938年在莫斯科的音乐学校校舍内举行过一次苏联知识界反法西斯大会，这次大会曾向全世界转播。米霍埃尔斯是在会上讲话的四个人中的一个。当时讲话的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位科学院院士，还有一个什么人。米霍埃尔斯在会上发言之后的第三天或是第四天，苏联作家协会党委书记扎伊采夫打来电话，说明了米霍埃尔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已经对米霍埃尔斯有所注意了。米霍埃尔斯的讲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中央委员会都知道他的名字，这对哪一个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审判)长：认识爱泼斯坦吗？

洛佐夫斯基：关于爱泼斯坦我只有一点可说，即我是从文学活动上知道他这个人的。关于爱泼斯坦我说过了，我知道他原先是崩得分子。在美国国内疯狂鼓动反对苏联的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参加了《自由晨报》编辑部的工作。做了几年编辑工作。应当说，美国的报纸编辑那可不是什么薪高而清闲的职位。

第三，我知道爱泼斯坦曾连续数年承担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事处的工作。所以贝格尔森在这儿暗示说爱泼斯坦是某个大国的间谍

的时候，我曾说，他是那个名称叫苏联的大国的间谍，就是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审判)长：在提名候选人的时候别人征求了你的意见，你就连一名候选人都没有提出过吗？

洛佐夫斯基：我也提出过候选人。我是想说，没有一个是光由我一个人任命的。那是不可能的。

(审判)长：那么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员是经过批准的吗？

洛佐夫斯基：那是一定的。在我阅读这部汇总了50名囚犯和20位侦查员的作品而成的总卷的时候，我简直都要精神错乱了。在我们的党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战时突然之间而且是在中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出那么一个担任着一个组织的领导的新的入物。各委员会成员的每一位入选都经宣传鼓动局通过亚历山德罗夫进行了审查，我从自己这方面也做了审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把这些人选送谢尔巴科夫批准。

物色入选的事就是这么个情形……

……在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后，我一天到苏联情报局来工作上一、两个小时。在古比雪夫——在莫斯科也是一样——我担负着大量的外交部的工作。有时一连几个月部里边只有我一个人，别人都出去办各种事务去了，但不管怎么样各委员会的工作总算干起来了。

所有这几个委员会，特别是博得了这42卷长篇巨幅认真调查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都是什么呢？

如果以供词材料和起诉书的说法为准，结论就会是这样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的，是要同各界的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这简直是一部小说。

一开初我们就被告知，我们不能往共产党的报刊投稿，因为那

样我们有可能被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再版。这就是说，必须打进大型报刊中去。我们着手从各个国家收集有关报刊和组织的情报。这件事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做了。所有的委员会也都做了这件事情。每一个委员会都收集开列了所有可以寄送材料并且也许有可能刊登一些有关苏联的正面东西的报刊清单，而不管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场主办的甚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刊。为什么还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刊呢？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在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上不可能不反对法西斯主义，关于德国人所干的兽行的材料他们是登载的。

费费尔在向法庭做供述的时候说过，戈尔德贝格在《德尔托格》报说一不二，然而据他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这份报纸上总共只发表过2~3篇文章。这是违心之言，胡说八道，发表的要多得多。审判员公民们，你们说，由百万富翁肖尔茨伯格当老板的《纽约时报》是劳动人民的报纸吗？这家报社的资本是2千万美元。那儿的老板不是编辑，而是出版人，编辑是雇佣人员。肖尔茨伯格往这家企业投入了1500多万卢布。这位资本家是罗马教皇、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其他一些人的狂热维护者。然而我们却想方设法要打进这家报纸去。

任务就是要打进一切外国的新闻刊物。

正在打仗，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必须刊登一些介绍苏联的东西。我们分别通过各自的线路打进了报刊。斯拉夫人委员会走的是他们自己的线路，犹太人、妇女、青年各委员会走的又是他们自己的线路。

如果“情报”这个词意思指的是“间谍情报”，那么苏联情报局的全部活动都是间谍性质的活动……

……除了通过苏联情报局各处发送的一般性情报之外，各个反法西斯委员会还寄送自己的特殊情报，《埃尼凯特》报从一开始就

是单独办的，因为在我国报纸有一种特别的监督类别和形式。

《埃尼凯特》报和苏联出刊的所有报纸一样，归联共（布）中央新闻出版部管辖。我没有给《埃尼凯特》报社委派过任何部门主任或编辑人员，也没有给它拨经费。这些事由联共（布）中央宣传处新闻出版部管。

（审判）长：可这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刊物呀？

洛佐夫斯基：是又怎么样呢？我没给他们经费，因为钱不是按我们这条线拨发的。我没往那儿派编辑，没有批过编制人员，没读过这份报，因为已经有60年不读犹太文的东西了。

这张在中央宣传鼓动局的直接监督下出版的报纸刊载了民族主义的文章，这责任能追究到我的头上来吗？

所以我声明，在《埃尼凯特》报上写的一切东西与我没有任何直接的和间接的关系。有时候跟我说，需要请一位犹太作家，我给他们帮过忙，仅此而已。

为了往犹太报纸投稿，就必须用犹太文写作。可是贝格尔森却突然间说，既是用犹太文写作，那么这就是民族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儿审判的是犹太语言。这真是莫名其妙。哪怕你是用黑人的语言写作都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事情。问题并不在于使用哪种语言写作，而在于如何去写。有的时候民族感情是会转化成民族主义的感情的，一个共产党人应当了解这一点……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各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另一方面是苏联情报局的各个处一齐源源不断地往外寄发大量的关于苏联、关于我们国家的人、关于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等等方面的情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只是这股洪流中的一道涓涓细水，这个委员会只向一定范围的报纸供稿。我在苏联情报局供职的6年时间内，如果一篇文章按4页计算（也有多的也有少的，但平均按4页算）的话，我们发到国外去的文章就大约有40万篇之多。在这40万篇

文章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占了 1.5 万~1.6 万篇，这是我领导这个委员会的 4 年零 2 个月（1946 年 8 月 1 日该委员会被从苏联情报局中划出）时间中的数量。

以上就是整个这项工作的实质内容。

在各个委员会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爱泼斯坦向谢尔巴科夫提出了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去了莫斯科好幾次。

（审判）长：第一次群众大会是 1941 年召开的吗？

洛佐夫斯基：是的，是 1941 年 8 月召开的。

（审判）长：费费尔，第二次群众大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费费尔：1942 年 5 月初开的，第三次群众大会是 1944 年 4 月召开的。

洛佐夫斯基：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与支持 and 反对苏联的斗争开始激化这一局势相关的。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苏联的军队虽然在节节后退，但却并没有被击溃，且对敌军的强攻进行着英勇的抗击。这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不能说是我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挑选的成员。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大型的委员会？你们以为是要让它聚集到一起，行动起来，讨论些事情。没有的事，就是选定了 70~80 位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人员的姓名，目的是让这件事传到美国、英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去，让那儿的人看到，呼吁他们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的不仅仅是一个米霍埃尔斯和一个爱泼斯坦，还有许多科学院院士，作家，诗人，国务活动家，等等，让他们看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所有这些人都在呼吁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有 9~10 位委员会的成员与犹委会的直接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是谁把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列进来的。但是我知道，把这样的人包括进来是为了名声。人的姓名

被拿来“出口”——莉娜·什泰恩院士是一位妇女。弗鲁姆金院士就根本从未来过委员会，可他的名字却被使用着，党也有权力这样做。在经过我签字的（以后我还要说我为什么在那上面签了字）供词里提到，我知道莉娜·什泰恩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对她进行了诽谤，我在这里向她道歉。

因为迫不得已进行了诽谤，我现在对她都无法仰首直视。

我过去根本不认识她。只知道有一位莉娜·什泰恩，是科学院院士，但没和她见过面。

……侦讯时我讲的那些话，说我知道她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这都是我的诽谤。我以后再详细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审判）长：配备委员会人员的事你供述完了吗？

洛佐夫斯基：还没讲完。

（审判）长：我们把这个问题结束吧。

洛佐夫斯基：我记不得了，是哪一年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审判）长：1944年4月份。

洛佐夫斯基：在这之前还开过一次广播群众大会……

（审判）长：第三次广播群众大会也是1944年开的。

洛佐夫斯基：在这一次大会期间，和其余所有的广播群众大会上的情形一样，用的还是原来那种程序：每个人自己写讲话稿，然后对他们的稿子进行检查，翻译，由亚历山德罗夫和我进行审阅，再送给我们的局长谢尔巴科夫去批准。大会产生的全部作品都由中央委员会机关、苏联情报局和谢尔巴科夫进行审查。我当时讲了一个想法，这是我的首倡，我说委员会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组织，就是说那里有主席，和秘书，有那么一些工作人员，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可以对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实行控制的集体。我和谢尔巴科夫两人商谈了一下这件事，就认定有必要成立主席团。这个主席团拟定要包括多少个委员——10个，15个，20个，是比这还

多还是少，我记不得了。作家，诗人等等类的人——这是最缺乏组织的人。每一个人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诗、书，多发表些作品，等等。当时领导人员中有谁在呢？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在。要说明一下，爱泼斯坦就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了。

他们草拟了一份主席团委员的初步名单，包括了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等等一些人，总共好像是 15 个人吧。关于布雷格曼我单说，因为关于这事有过一次特别的谈话，还单独有一个决定。所有这些人我都认识吗？不，并不都认识。我知道，包特金医院有一位希梅利奥维奇。希梅利奥维奇这个姓氏我听说过，但却从来没和他谈过话，没见过面，就连在电话里也未交谈过。

我把这个名单看了一遍，就给我的上司——谢尔巴科夫送去了。

我希望法庭能切实地理解我当时所处的严峻境况。我有两位上司：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是维·米·莫洛托夫，苏联情报局系统是亚·谢·谢尔巴科夫，至于这里所写、所描述的那些内容，由于一切都好像是我擅自发出的，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灵感的表现，那至少也属于凭空想象出来的诽谤。

就这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获得了批准。甚至于批下来的组成人员好像都和提交上去的一样。比如说我就不记得有什么改动。我想你们自己也知道，这都是按照党的规程做的：在批准前对人员要审查。主席团委员不得直接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内工作。由 3~4 名编辑进行工作，其余的人只在有事的时候才来……

(审判) 长：现在说一说各委员会干部的配置问题。

被告费费尔，你在预审时曾肯定地说，在委员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就收罗进来一些在政治本质上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人物，这并非出于偶然，这是根据洛佐夫斯基的意愿和提议办的。这

是我从你的供词里得出的结论。

费费尔：我已经提出请求宣读我的供词。

(审判)长：你不承认这些吗？我是直截了当地说。从你的供词里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

费费尔：这个结论太厉害了。

(审判)长：(卷2，案卷页60)你说，犹太人委员会里的一切措施都是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实施的。

费费尔：我可以证实这一点。

(审判)长：(卷2，案卷页48)你还供述说：“我们和爱泼斯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向我和米霍埃尔斯通报了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事，并且说，在这件事情上洛佐夫斯基的功劳很大，他把洛佐夫斯基称做我们的父亲^①”。

(审判)长：(对费费尔)……在就鉴定的结论提出问题时，你回答说：“从委员会存在的最初时日开始，如同我已经供述过的那样，它的工作中就执行着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这是因为它的领导权落在了几个积极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手中：洛佐夫斯基，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还有我，费费尔”。你的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费费尔：这是进一步推想得出来的结果。

(审判)长：怎么说是进一步推想得出来的结果呢？

费费尔：我现在来解释我说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洛佐夫斯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在委员会成立之前我也没找过他。

我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出过好些书，在纳科里亚科夫在任时期以及更早的时候都有，可是我没有找过洛佐夫斯基。在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并没有把洛佐夫斯基看成是民族主义者，我和他也没有谈论过民族主义方面的话题。可是当我在审讯期间，开始总结委员会的

^① 原文中此词不清，是据猜度并参照后文译出的。——译者

工作、这工作所有的各个重要方面、所有的项目，比如说像给中央的呈文，像“黑皮书”，关于对犹太人持反对态度及向国外寄送基本上是讲述前线和后方的犹太英雄人物的材料的两份简报，当我把这一切都综合起来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整个这些活动正是控告委员会犯了民族主义罪行的根据，那么既然洛佐夫斯基对委员会的事务一清二楚，我于是就说洛佐夫斯基是民族主义者。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进一步推想得出来的结果”这句话的含义。

费费尔：我说关于克里木的呈文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报送这个呈文洛佐夫斯基是知道的，我还可以证实，主席团的某些委员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物……

不过，洛佐夫斯基是否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部分委员是民族主义者，我可无法证实。

(审判)长：你讲，一切重要问题你都要向洛佐夫斯基提出来，要取得他的准许方办理这些问题的，那么他对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费费尔：我本人没有向洛佐夫斯基通报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事，是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通报给他的。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你在同费费尔对质的时候是承认了供述的这些事情的……

洛佐夫斯基：说到自1949年2月3日起到最后的全部记录中记载的我的供词，那全是不真实的，而且我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我以后再说。

费费尔一直是以诉方的证人身份出现的。以后我会说个明白，费费尔写下他这三卷勾画他的面目的作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的。现在请允许我说说实质性的问题。

从费费尔的供词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洛佐夫斯基只干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一件事，他不分昼夜地待在委员会里，脑袋里

想着的就是这个委员会。难道法庭真的不考虑当时并不是1个委员会，而是有5个……

经中央批准成立了5个委员会。作为谢尔巴科夫原来的副手和联共（布）中央委员，我负什么责任呢？如果你们要为犹太人委员会审判我，那么我请求为所有这些委员会审判我。难道说斯拉夫人委员会没有往国外寄呼吁书，文章等等？

频繁地讯问费费尔显然是由于对洛佐夫斯基的控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以费费尔的招供为依据的。在诉讼的过程中，审判长把预审时的口供和对具体事实及总体的指控进行说明时的这些口供做着比较……

No 1170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29日)

洛佐夫斯基：诉方的证人老是引证死去的爱泼斯坦的话：他说我是父亲，说我深感同情等等。也可能他们把我称为父亲，可是在吉尔吉斯我被称作“阿克萨卡尔”，在中国把我叫成中国老头，因为我对中国进行了很多研究，在拉丁美洲又叫我“哥伦布”第二。有那么一位女摄影记者给我寄来了一本书和她的照片，还写上了“赠哲人所罗门”。把我这么叫那么称呼的人多了。这和政治活动有什么关系呢？

(审判)长：可是他们并非把你看做是一般的“父亲”，而是看成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的领袖，他们是赋予了“父亲”这个词一定涵义的。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现在赋予它的涵义和死去的爱泼斯坦过去赋给的涵义不是一回事。我来揭一揭费费尔背着我都干了一些什么活动。叫他不要以为写了这3卷东西，他就可以充当告发所有人的诉方证人。审判员公民们，以你们的经验一定知道，人们是怎样企图以控告别人来逃脱自己的责任的。

(审判)长：他不是证人，是接受审判的人，他在进行他认为必须做的供述。

洛佐夫斯基：起诉书中说，我极力设法派代表团到美国去，代表团的人员是我专门挑选的等等。我们假定说这是真的。可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在旁边，查询一下是谁写的关于这个代表团的报告，

又是谁同意让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到美国去的，这又费得了什么事呢？这不是极其简单的事吗。我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竟没有做。事情是这样的：我国的驻美领事和大使（当时李维诺夫已经不在那儿了）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线路用密电报告，后来又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来一份明码电报，通知说美国现在有了一个以恩施泰因为首的艺术家、作家等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他们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联系过了。任务是要在美国把能够反对法西斯的人士发动起来。我个人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在美国成立一个可以吸引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参加活动，并由恩施泰因这样的世界级学者领导的组织是一件好事，而且对苏联有利。关于派遣代表团的建议也是通过两条线索送上来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条线，和后来又公开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条线。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仿佛是在电报里都已经刊出了他们请求作为代表团成员派出的人员的姓名：一位什么将军，再有就是爱伦堡，马尔基什，米霍埃尔斯及另外几个人。

费费尔：1943年收到过美国科学家和作家反法西斯委员会发给米霍埃尔斯的邀请。

（审判）长：1942年你和米霍埃尔斯谈过同这些组织联系的事吗？费费尔供说（卷2，案卷页59）：“同各种组织，特别是同反法西斯的组织建立联系的工作早在1942年就已经开始了……1942年在纽约，响应我们的呼吁成立了两个组织……第二个组织是恩施泰因领导的作家、科学家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成立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一情况给洛佐夫斯基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在启程去美国之前，洛佐夫斯基指示我们要同美国的富有群体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费费尔：我已经说过了，我确认这些供词，不过谈话的前后情形不是那个样子。

(审判)长：你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供词变得分量轻一点，把这一件说成配菜，把那一件说成前后情形。

费费尔：因为我确认了自己的一些供词，现在已经送给我一个诉方的证人的称号了。

(审判)长：你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样的被告。在这儿没有必要说玩笑话。你在这儿是做供述。

费费尔：我在侦讯时说了，那是1942年在古比雪夫时的事。我和米霍埃尔斯及爱泼斯坦确实到洛佐夫斯基那儿去过。我们谈过，第一次犹太人无线电广播大会导致美国产生了两个组织：科学家及作家委员会和“拉申列利弗”属下的犹太人会议，由恩施泰因这样的一些著名人物担任两个组织的领导。

洛佐夫斯基说这很好，并建议我们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同美国的富裕的犹太人建立联系，为苏联的国防基金争取更多的经费。

(审判)长：你确认洛佐夫斯基曾指示要同美国的富裕的犹太人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提出这种任务的目的是什么？

费费尔：谢尔巴科夫提出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要为苏联的国防基金获得更多的钱。

(审判)长：接下来(卷2，案卷页60)你被问道：“洛佐夫斯基做这样的指示其指导思想是什么？”，你回答说：“还是我和米霍埃尔斯都有的那个‘民族主义思想’。洛佐夫斯基打算用往美国寄送广泛的情报的办法赢得美国富裕的犹太群体更多的好感，预先取得他们对解决苏联的犹太人问题的支持”。

费费尔：我否认这一点。

(审判)长：你是从哪里这样认定的呢？

费费尔：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对洛佐夫斯基进行了诽谤。

(审判)长：那么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费费尔：洛佐夫斯基指示我们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同富裕的犹太

人建立联系时是说，为了给苏联的国防基金获取尽可能多的美元这么做是必要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现在否认洛佐夫斯基做这些指示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呢？

费费尔：我并不否认他的一般的民族主义的动机。

(审判)长：怎么会呢，在10个问题上你说他是民族主义者，而在2个问题上说他不是民族主义者。这不合乎逻辑。如果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他的全部活动都是民族主义的。问你：“洛佐夫斯基做这样的指示其指导思想是什么”。你回答说是民族主义的动机，接下去你又指出，他是指引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工作的力量。

费费尔：在这份记录里关于同富有的人建立联系的事记得不对。

(审判)长：但这是一个连贯的回答吧？

费费尔：在同一项上记录的东西可能既有对的，也有错的。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弄得一页上你的供词录得对，而另一页上录得就不对呢。

费费尔：关于洛佐夫斯基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结论，我是在这儿受审讯的时候得出来的。

(审判)长：1941~1942年你和爱泼斯坦及米霍埃尔斯一同开始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你在这个组织里不仅看到了国家规定的做反法西斯宣传的任务，也看到了宣传犹太民族具有特殊性的思想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你先前就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

费费尔：我已经说过了，民族主义情绪我是有的……

(审判)长：加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之后，你是打算不仅要实现国家给你们提出的那些正式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一些超越委员会范围的任务，即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吗？

费费尔：我指的是关于保存和发展犹太文化的问题……

(审判)长：可是反对同化的斗争正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试图加以解决的那个并不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是这样的吧？

费费尔：对，是的。

(审判)长：(对费费尔)我和你俩现在取得一致了，你开始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时，已经是先前就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

费费尔：在那个时期有一部分事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工作。比如说，我并没认为抵制同化是民族主义活动。

(审判)长：你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1941年你开始做《埃尼凯特》报的工作时，你曾经坚持自己的反对同化的斗争任务。

费费尔：是的，因为那时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同化过程。

(审判)长：既然党没有给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那你为什么要为反对这个去斗争呢，而我们查明了一个事实：1941年你开始在《埃尼凯特》报工作时，目的不仅仅是完成党提出的任务，而且要为反对同化、争取犹太人文化自主而斗争。

费费尔：不对，是争取犹太文化的提高。

(审判)长：好吧，不过这也是民族主义的任务。

费费尔：我那时并没有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任务。

(审判)长：费费尔，你在5分钟之前承认了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现在说法又不一样了……

(审判)长：费费尔，怎么理解你的话才对呢？

费费尔：说的是哪一个问题？是说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工作和洛佐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活动吗？

(审判)长：是的，你也是受和洛佐夫斯基同样的民族主义的动机支配的。你说过：“他是指引我们全部民族主义活动的力量”。

费费尔：我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在自己的供词里都说，我认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的。

实质上我对法庭说明了我进行过民族主义的活动，洛佐夫斯基也进行了这种活动。洛佐夫斯基的罪过达到了什么程度，这要由法庭调查认定。可是，洛佐夫斯基指导我们的全部民族主义工作这种话，我没有这样讲过。我说了，我是在审讯的过程中做出这个结论的，但是我本人和洛佐夫斯基没有谈过这方面的内容。

(审判)长：(对费费尔)你曾经供说，自从有了委员会，洛佐夫斯基就是指导委员会工作的力量，而委员会的工作被认定为反苏工作……

费费尔：是的，这工作被认作是民族主义的工作……

(审判)长：这一点是什么时候得到你的承认的？

费费尔：主要是在侦讯的时候……

(审判)长：(对费费尔)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你，费费尔，在进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之前就是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你现在说，只是到了现在，在侦讯的过程中你才开始明白，委员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的。

费费尔：我说过了，我在监狱里做了一个总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民族主义的。

(审判)长：既然你领导着委员会，为自己定下了利用委员会这块招牌与同化进行斗争，为犹太人的文化自主进行斗争的任务，也就是做犹太民族根本没有授权、也不想授权给你去做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你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反苏活动……

费费尔：民族主义活动。

(审判)长：你还改正干什么。任何民族主义活动都是反苏活动。

你着手去完成这项任务是因为你有反苏情绪，而洛佐夫斯基是了解你的民族主义情绪的……

费费尔：我同他没见过面，也没有谈过这方面的话题。

(审判)长：可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全部活动他都是知道的。

费费尔：委员会的全部实际活动，委员会通过的所有文件……都要由洛佐夫斯基检查并签署。我不是根据我同他的谈话，而是根据洛佐夫斯基对委员会所进行活动给予的这种支持，得出洛佐夫斯基支持我们的民族主义活动的结论的。

洛佐夫斯基：(对费费尔)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古比雪夫的？

费费尔：我到古比雪夫是1942年初，大约是4月份。

洛佐夫斯基：在什么地方工作？

费费尔：在《埃尼凯特》报社。

洛佐夫斯基：工作了多长时间？

费费尔：直到爱泼斯坦去世，即到1945年7月。

洛佐夫斯基：你说1942年曾来找我谈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但是你那时在《埃尼凯特》报社工作，你怎么可以来找我谈委员会的活动问题呢？

费费尔：我有时候是随爱泼斯坦，有时候是跟米霍埃尔斯来找洛佐夫斯基的。

洛佐夫斯基：正好是来谈关于同富有的犹太人建立联系的事？

费费尔：这项任务不光是洛佐夫斯基给委员会提出来的，谢尔巴科夫和加里宁也提出过。你说过，我们必须通过美国的这两个反法西斯组织同富有的犹太人建立联系，再通过他们为苏联国防基金募集经费。

洛佐夫斯基：除开从委员会里用无线电或是电报发出的文章之外，你还知道有什么从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往外国的文件（呼吁书，号召信等等）是未经谢尔巴科夫批准的吗？是否有过哪怕是一份这样未经过苏联情报局局长批准的文件吗？

费费尔：如果指的是群众大会的号召信，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发

表的演说，我们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发言，那么所有这些极其重要的文件都是经过了谢尔巴科夫之手的，至于说日常往来的书信，其中包括经鉴定被认为属不宜公开资料的物质援助问题和阿姆比詹订购比罗比詹的材料的订单，我可以肯定，这批来往信函是经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批准的。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在侦讯时的供词里（卷17，案

我了解到，按照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把一些在苏联没有公布过，也就是机密性的文件交给了戈尔德贝格之后，我开始认为，民族主义这只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在所有其余的关于洛佐夫斯基的供词上签字。

(审判)长：你接下来(卷17,案卷页59)在供述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时说：“而如果考虑到成为这种人物的竟是一批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泼斯坦，尤泽福维奇，多布鲁申，努西诺夫，马尔基什，克维特科，我，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么洛佐夫斯基不能期望委员会的工作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向这一点就是清楚明白的了”。

贝格尔森：对这一点我完全确认……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侦讯时你曾肯定说，由许多民族主义者参加的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它随后开展的全部活动，都不仅是在洛佐夫斯基的参与下，而且是在他的鼓励下进行的。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贝格尔森：是的，因为洛佐夫斯基假如想从名单中划掉某个人的话，那么委员会里边也是绝对不会有这个人的。

(审判)长：你还供说，早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之前，洛佐夫斯基就曾经召集一些犹太作家去苏联情报局，在那里给他们布置了获取有关犹太人由于苏德战争而遭受苦难和灾祸的材料的任务。洛佐夫斯基的这一指示就转化成了犹太作家们的民族主义活动，因为关于犹太人的材料是与战争带给整个苏联人民的苦难与灾祸分割开而单独报送苏联情报局的(卷17,案卷页57)。

贝格尔森：说洛佐夫斯基召集犹太作家是不对的，他本人并没有召集他们，而是犹太作家们自己到那里去的……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对费费尔和贝格尔森的供词你有什么话要讲吗？费费尔和贝格尔森两个人都说，你抱着民族主义

的目的组织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且成了该委员会后来进行的全部反苏活动的思想上的领袖。

洛佐夫斯基：说到贝格尔森，依我看，那他是把法庭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搅混了，而且很难弄明白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个人用犹太文写书，说十月革命给犹太人带来了权利平等，这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呢？

至于说抱着民族主义的目的成立了这个委员会，那我就得说，那时斯拉夫人委员会是抱着斯拉夫人的目的组织的，青年委员会是抱着青年的目的组织的，妇女委员会是抱着妇女的目的组织的。如果是这样对待这一问题，那么不管做什么，一切全都是民族主义。费费尔说，1944年我害怕了，告诉他们要小心谨慎。后来弄清楚了，这并不是我说的，而是1945年6月死去的爱泼斯坦说的。这事怎么能剖析得清楚？

我绝对肯定，讲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抱着民族主义的目的成立的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因为这个委员会不是我组织的，而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的，组织的不是这1个委员会，而是5个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应该对其他几个委员会负有责任。为什么把对其他所有委员会的责任都扣除掉了？可能爱泼斯坦参加了群众大会。可能的，不过关于爱泼斯坦我是从共产国际的文献资料中了解的，是听他在美国编辑共产党的报纸那个时期到苏联来的美国人说的。后来我了解到他在做什么秘密工作，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过，但由于他没有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同国家文学出版社没有联系，我就没有可能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也许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可是见过一个人这算得上什么罪过呢？最终你简直就觉得茫茫然，一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再一次肯定，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进行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当时有这么一个口号：“全世界犹太人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青年团结

起来反对法西斯，等等”。这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口号。你们会问：为什么，根据是什么？根据是这样的，让英国的、美国的犹太人、妇女、青年、科学家说，他们反对反法西斯的口号。让他们站出来，说他们反对这个口号。他们当中没有谁能够站出来反对这样的口号。这是一条揭露亲法西斯分子的极为出色的口号。我可以肯定地说，贝格尔森弄混了。我想法庭是看得出来的，他弄混了。

而费费尔供说我惶恐起来……

(审判)长：一开始他供述说，1942年他曾和你谈过关于美国出现了反法西斯的组织和关于同富有的犹太人建立联系的事……

洛佐夫斯基：我肯定地说，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的。出了那么一个为苏联募集钱款的组织。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假如我们反对募集钱款，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募集。“拉申列利弗”为苏联募集了9千3百万美元。就连费费尔都说，我提出的任务是：为援助苏联基金募集钱款。不是给犹太人，不是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而是为援助红军基金。建议募集钱款这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

我感到非常兴奋了吗？我不知道。我一般地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兴奋的人，而且一般说来，做外交工作过分兴奋是不适宜的。我虽然是一个热情的善于辞令的人，但却很审慎。而在这里每一句话都会变成民族主义的犯罪行为。我请问，为援助苏联基金募集钱款这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呢？这是什么民族主义？苏维埃的，是吗？在对费费尔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盘问之后，在你对他一再地追问之后，他兜来兜去，一个劲地说，他听爱泼斯坦说过，等等。我不知道，据我看，这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东西……

(审判)长：他讲，你曾对他和米霍埃尔斯说过，必须和美国富有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

洛佐夫斯基：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凭空创作出来的神话。

我以后给你讲几件事情，你就会看明白，神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这里又有多少创作神话的事情。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向法庭证实是洛佐夫斯基领导了委员会的罪恶活动，给委员会选配了人员并领导了委员会。你在自己的供词（卷11，案卷页46）中指出：“我讲起这些心里很沉重，但是我必须承认，委员会被我们这些民族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苏的组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一只罪恶之手拉进那里边去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

克维特科：不是这样的。

(审判)长：接下来对“是谁的手？”这个问题你回答说：“给委员会挑选人员并领导我们全部犯罪活动的就是洛佐夫斯基”。

克维特科：只有一点是对的。在我随委员会一起在古比雪夫的3个月的时间里，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不征得洛佐夫斯基的同意，什么事也不能做，不过对敌对活动我那时一点都不知道。

(审判)长：对你提出了问题，你回答说，你承认委员会进行了犯罪的活动，因为那里边都是些民族主义者，而你们这些民族主义者又是被一只“罪恶之手”网罗去的。谁的手？又这样问你，你回答说——洛佐夫斯基的手，也是他领导了我们的全部犯罪活动。

我问你这是不是真实的？

克维特科：不是。

(审判)长：可你是在这些供词上面签了字的？

克维特科：是的。我在那上面签了字。我供述得很糟糕，对它们的领会和在记录里写下的同我说的不一样。我想再说一次，在我在古比雪夫的那3个月的时间里，我知道也看到了，不经过洛佐夫斯基什么事也不能干，一切问题爱泼斯坦都要征得洛佐夫斯基的同意，这我知道，也看到了。

(审判)长：究竟是哪些同民族主义的犯罪活动有关的问题征求过洛佐夫斯基的同意？

克维特科：我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到过犯罪活动。

(审判)长：为什么在预审时你肯定地说，委员会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进行了敌对的民族主义活动，而现在又不承认了呢。

克维特科：这些口供是从别的被告人的供词中抄进我的记录里边的。

(审判)长：那又怎么样？

克维特科：这些供词转抄过来，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问题弄错了。我是从两件事实中做出结论的，这两件作为委员会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审判)长：哪两件事实？

克维特科：就是米霍埃尔斯的葬礼和“巴勒斯坦女士”的欢迎会。这两件事都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我看出这是煽动民族主义。

(审判)长：我问你：你认为是洛佐夫斯基组织的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并领导这个委员会吗？

克维特科：不，我不能说这种话。

(审判)长：可是你曾经说过，后来你确信他到底还是搞了这种活动？

克维特科：我从哪儿能知道这种事？我是直到1942年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就是在古比雪夫的那3个月，那个时候米霍埃尔斯狂喝滥饮，干工作的只有爱泼斯坦。我只是看到爱泼斯坦每天都来找洛佐夫斯基商量事情。

(审判)长：布雷格曼，预审时你也曾经证实洛佐夫斯基是委员会民族主义活动的领导者。你还记得自己的那些供词吗？

布雷格曼：不，不记得了。

(审判)长：我来提示一下。这是卷5，案卷页53：“给委员会选派人员以及对它进行领导这些事由苏联情报局局长洛佐夫斯基管，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这个委员会就是他的孩子，他，洛佐夫斯基，认为它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供词是符合实际的吗？

布雷格曼：是的，符合实际。

(审判)长：他是什么时候说这个委员会就是他的孩子，他认为它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话的？

布雷格曼：我是经常去的。我曾多次找过洛佐夫斯基，把委员会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报告给他，还说过应该多花些力气把委员会的事管一管。洛佐夫斯基对此回答我说，他对委员会的事管得很用心，因为这是他的“孩子”。我从这件事里边没有看出来有民族主义和反革命的东西。

(审判)长：那么就是说，洛佐夫斯基为委员会选派人员，他对委员会进行领导，称它为自己的“孩子”，认为它的存在是必要的，这些都是你的供词了？

布雷格曼：是的。

(审判)长：接下来你说：“……在委员会内部形成了犹太民族主义者居控制地位的局面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是洛佐夫斯基亲自选定人员，派到委员会来工作的。我从自身的体验中对此深信不疑”（卷5，案卷页54）。

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布雷格曼：不，不是真的。我不记得我这样说过。

侦讯的时候我被告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封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为美国提供民族主义的和谍报性质的材料，于是因为我知道委员会是洛佐夫斯基领导的，我当时就说：“既然委员会受洛佐夫斯基直接领导，是他挑选的干部，那么一切也就都

由他负责”，但是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因为我事先知道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你在侦讯时可是供认过，你自己就是被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吸收进委员会的。

布雷格曼：这对我来说是一条新闻，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直截了当地说(卷5, 案卷页54), 你是被洛佐夫斯基派到委员会去的。

布雷格曼：这是被侦查员歪曲了。

(审判)长：你的供词是这样的：“……早在洛佐夫斯基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于是受到邀请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问你：“是作为一名犹太民族主义者吗？”你回答说：“洛佐夫斯基有理由信赖我，因为在和他交谈的时候，我有时很坦率地把自己的观点讲给他。”

“1943年夏天，在一次和洛佐夫斯基谈话的时候，我告知他我被解除了工会的领导职务，我说，我估计这是出于民族方面的考虑而采取的行动。洛佐夫斯基对我表示同情”。

布雷格曼：这里边有故意篡改和歪曲的地方。我讲的是我在委员会里曾听到有人谈起，说犹太人，甚至连中学毕业时获得过金质奖章的人，都不能被招录进高等学校，也就是说根据民族特征选拔大学生。这是在会场外的休息室里谈到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洛佐夫斯基并且问他，也许这是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路线或者是一种政策。当时洛佐夫斯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什么路线也没有。说这都是希特勒散播下的东西，至今还是有所表现的。

在会场外的休息室里曾经有人谈过，说有一条由党和政府拟定的路线，要根据民族特征选拔人上学。这些话不是我讲的，在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曾经谈过犹太人在录取他们进学校的事情上受到

限制。

布雷格曼：我跟洛佐夫斯基说我是在委员会里听到有人谈起，说高等学校不收录犹太人，甚至连得过奖章的也不行……

(审判)长：什么人这样讲的？

布雷格曼：努西诺夫讲的。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位犹太姑娘来找我诉说，他没有被学院录取，因为她是犹太人。我回答她说，这不仅仅牵涉到犹太人，这样做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我没做任何事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这一类找我提出这种请求的人就业或是入学。

我告诉侦查员，在乌克兰是这样安排的：招收人要考虑民族结构。侦查员当时就问我：“那就是说，撤你的职是出于民族方面的考虑，于是你现在就指责联共（布）中央排斥犹太人吗？”对此我跟他说，也许所有这一切就和乌克兰过去的情形一样，是从调整民族结构的角度做的。此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组织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就决定了解除我的工作这样一个问题，我对这种办事程序不满意。我把自己不满意的情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说了。总之，我为换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感到高兴。

(审判)长：你在预审时曾经说，你和洛佐夫斯基谈过反苏内容的话。你现在证实这一点吗？

布雷格曼：没有谈过这种话。

(审判)长：你还曾供说，由于同你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洛佐夫斯基根据你从本性上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才邀请你到委员会去工作的。你们两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布雷格曼：我老老实实在对法庭说，我从来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洛佐夫斯基也是一样。这是虚构出来的。

(审判)长：可是这些供词都是你签了字的。

布雷格曼：这可以根据时间来检查一下。日期不相符。我是当

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监督部副部长之后，才受邀请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我有社会政治工作经验，所以才被邀请去委员会。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供说，在关于你被撤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工作的那次谈话之后，洛佐夫斯基派你到委员会去做社会工作。这个时候你是国家监督部的副部长（审判长进行宣读）。

有过这么一次谈话吗？

布雷格曼：曾经设法让我相信，我转入委员会工作是在民族主义观点相同的基础上，与洛佐夫斯基达成了协议的。侦查人员也曾设法说服我，我和洛佐夫斯基是勾结起来要在委员会里进行民族主义工作的。我肯定地说没有这回事。洛佐夫斯基亲自同我谈过话，他说谢尔巴科夫已经同意把我调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那时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内部不团结，那里有争吵，按照我的说法是发生了内讧。我看到委员会里是这样一种状况，总是说必须挑选一批像古别利曼那样从不参加任何其他党派的人到那儿去工作。洛佐夫斯基不会否认我曾向他报告过委员会里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和不顺利的事情。我很怀疑，洛佐夫斯基如果确实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会发出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不和的信号吗？我就这件事情亲自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过两次。

(审判)长：你的供词接下去还说：“投入委员会的工作之后，我确实实地相信了，享有对一个联共（布）中央委员的信任的洛佐夫斯基是党的一个暗藏的敌人，他组织并指导着犹太民族主义者全部的敌对活动”（卷5，案卷页57）。

布雷格曼：我声明，在进行侦讯时告诉我委员会被封，说它是民族主义—间谍活动中心之后，把我气疯了，我于是就开始拿过由其他人的供词里做出的结论这样一些东西来供述。我是在委员会组织起来3年之后到委员会来的。在爱泼斯坦做工作报告的时候，我

本人就曾发言反对委员会里的各种民族主义的表现。

我已经向法庭讲了，我曾把我在委员会里发现的所有不和现象向洛佐夫斯基做了通报，洛佐夫斯基也向联共（布）中央发出了相应的信号。我从来没有理由不信任洛佐夫斯基，我也从来没认为他是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可就是你做了这样的供述，说你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之后，你确实相信了，洛佐夫斯基享有党对他的信任，但却是党的一个暗藏的敌人。你供述过这些吗？

布雷格曼：我记不准了。我当然并不怀疑你是在读写下来的东西……

（审判）长：我在问你，你做过这样的供述吗？（把布雷格曼的供词——第5卷第63案卷——拿给他看。）拿去，自己辨认清楚——这是你的签名。你读一读最后一段。（布雷格曼阅读自己的供词）

这是你签的名字吗？那就是说你提供了这些供词了？这些供词是对的？

布雷格曼：从总的结论看供词是对的，然而可不是从我个人所做结论的角度说。

假如对那些来自国外的咨询问题的答复，经过开会讨论的话，我大概就不会落到我现在所处的这种荒唐处境了。事情就出在这种问题是用行政的办法解决的这上面了。而“克里木问题”根本就是背着人决定的。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预审时你曾供说洛佐夫斯基在领导委员会这方面的活动是民族主义的，你现在对自己的供词加以确认吗？

马尔基什：直接就委员会所进行的民族主义的活动讲，我不能断定这一工作是由洛佐夫斯基进行的……

(审判)长：这是你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辩护所持的立场，但是在预审时你曾谈过洛佐夫斯基的作用。

马什基什：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洛佐夫斯基领导着委员会。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中说，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的民族主义意图总是受到洛佐夫斯基的支持，我们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庇护人。

马尔基什：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是这样看的？这违反逻辑……

(审判)长：如果讲你的逻辑，那就什么事都弄不清楚了。侦讯时你承认自己有罪。

马尔基什：侦讯时我没有承认自己有罪。我所知道的那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民族主义活动的情况，完全是从《埃尼凯特》报上知道的，也就是说，是从处在能见范围之内东西上知道的，而其余的东西都封闭着我看不到。

(审判)长：你怎么会全不知道，你不是和洛佐夫斯基见过面吗？你在自己的供词里（卷5，案卷页148）说，洛佐夫斯基曾教导你，在演说中要强调犹太人的民族苦难。你接受过洛佐夫斯基的这种指示吧？

马尔基什：洛佐夫斯基就出访和收集有关法西斯匪徒兽行的材料问题，曾对作家们说过，必须收集关于对犹太人实施的兽行的材料……

(审判)长：对其他民族的苦难佯装不见？你曾供说，洛佐夫斯基对你讲，要只写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苦难要视而不见。

马尔基什：他没这么说……

收集此类材料这一事实本身被认定为民族主义的行动，但是洛佐夫斯基没有做过任何“对其他民族的苦难要佯装不见”的指示。

(审判)长：克维特科，这次谈话的时候你在吗？

克维特科：不，不在。我是1942年在古比雪夫第一次见到洛佐夫斯基的。

(审判)长：问题清楚了。

尤泽福维奇，1941年7月马尔基什在洛佐夫斯基那里谈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吗？

尤泽福维奇：我记得，在无线电广播大会之前马尔基什是把他的讲话稿装在一个信封里带着的，我还记得，在我去吃午饭的路上洛佐夫斯基交给我一个封好的纸袋，告诉我交给亚历山德罗夫。袋里边装的，我已经供述过了，就是预定要在大会上讲的讲话稿。

(审判)长：这是在古比雪夫还是在莫斯科？

马尔基什：在莫斯科。

(审判)长：实质上，马尔基什在侦讯时的供词里是把你——尤泽福维奇——指为洛佐夫斯基曾经说应该写对犹太人犯下的兽行，而“对其他民族的苦难要视而不见”这句话的证人的。

尤泽福维奇：我无法证实马尔基什的这些供词，但是我可以肯定，我了解洛佐夫斯基并不是民族主义者。

马尔基什：我想说，洛佐夫斯基无疑是要让当时在他那儿的作家们明白，应该只选写对犹太人犯下的兽行的那种材料；至于做这种指示的民族主义方面的理由，那已经是进行侦讯时做出的结论了。

(审判)长：这是你得出的结论吗？

马尔基什：归根到底洛佐夫斯基并没有号召作家们，也没有告诉作家们：去吧，去干损害苏联人民的罪恶勾当吧。他说的惟一的一句话就是：去吧，去收集关于对犹太人犯下的兽行的材料。我否认有直接的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

(审判)长：在第15卷的第149案卷页上，你对委员会的活动做了一个总的评价，你是这样说的：“1942年4月委员会成立时，

由于洛佐夫斯基的努力，像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被指定为领导人。希梅利奥维奇、斯特龙金、克维特科和我被列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仅从罗列出的这些人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具有民族主义的信念。”

你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

马尔基什：如果你看一看所有被告的供词，那你就会看到，这是全部记录中都有的一句刻板式的话。我本人同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 1944 年才和它弄到了一起。

(审判) 长：你处事也太没有条理了，你从这些供词中把“和我”两个字给去掉了，那么关于其余的内容你供述的却是真的？

马尔基什：从我被关在监狱里这个角度来说是真的。关于我不与之交往的人我有什么可说的呢？1944 年 11 月我和委员会斗过，直接同洛佐夫斯基我没有任何接触，和费费尔我也斗过……

(审判) 长：……洛佐夫斯基，对于布雷格曼、马尔基什、费费尔、克维特科和贝格尔森昨天所做的供述你有什么要对法庭供说的。

洛佐夫斯基：从费费尔、克维特科、布雷格曼、马尔基什和贝格尔森的供述中首先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到了这里，进了“反省”所之后，才醒悟过来，招致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洛佐夫斯基。我简短地提请法庭注意几个情况。醒悟过来之后他们就在他们并没有供认的东西上签了字。

克维特科坚称他从来没有，一点也没有考虑过洛佐夫斯基的罪恶之手。那就是说，存在着的不是洛佐夫斯基的罪恶之手，而是某个人的把事情写成这个样子的罪恶之笔，而克维特科挥笔就把字签上了。

(审判) 长：（对布雷格曼）可是你在侦讯时你所做的供述里

(卷5, 案卷页54) 是这样指出过的: “1943年夏天在一次和洛佐夫斯基谈话的时候, 我告知他我被解除了工会的领导职务, 我说, 我估计这是出于民族方面的考虑而采取的行动。洛佐夫斯基对我表示同情”。

是这样的吧?

布雷格曼: 不, 不是这样的……

(审判) 长: 你曾经对洛佐夫斯基说, 在联共(布)中央据你说仿佛只剩下很少的犹太人了?

布雷格曼: 不, 我没说过。

(审判) 长: 你曾经说过, 录取犹太人上高等院校是有限制的?

布雷格曼: 不, 我没说过。

(审判) 长: 你曾经说过, 犹太人正在被从国家工作岗位上撤下来?

布雷格曼: 不,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布雷格曼: 我和洛佐夫斯基没有谈过任何反苏内容的话……

№ 1170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30日)

洛佐夫斯基：……1941年7月，即苏联情报局建立起来后过了2~3周，我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指示召来几位犹太作家，跟他们说需要收集一些关于法西斯匪徒对犹太人犯下的兽行的材料，目的是抛出去给那些否认这种事实的人看。那个时候美国的报刊断言没有发生任何残暴行为。马尔基什的供词添枝加叶，说我要求收集这些材料时不要去管对其他民族所犯的兽行。马尔基什的解释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后来，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他才得出一个结论：我在1941年可能正是那么想的。

请你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机构存在才只有2~3周的时间。尤泽福维奇和阿菲诺格诺夫已经在进行工作，阿菲诺格诺夫管的是文学方面的事务。谢尔巴科夫给了我们一位管理行政的负责人斯捷潘诺夫。我们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楼里开始办公的，钱是中央委员会拨的，人员是从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给我们派的，可是突然之间，一个搞了40年工人运动的人，外交部的副部长会召集一批人来，告诉他们：“你们去收集只与犹太人的苦难相关的材料，对其他民族遭受的苦难不要管”。

就算我是一个暗藏的敌人，“恶人”，就像某些人在这儿讲的那样，但是还没有哪一个人认为我是白痴，会把一些我并不太了解的人召集来告诉他们说，一个能讲出“把希特勒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掩盖起来”这种话的人，他的道德—政治形象该是一个什么样

子。就算我对他们说了“去收集关于对犹太人所犯兽行的材料”，打算以后把这些材料送到国外去。就算这是民族主义，那么我请求法庭仔细考虑下述情况：纽伦堡审判是我领导的吗？不是，在纽伦堡审判时有6位检察长发了言，其中主要的一位是鲁坚科。为了给纽伦堡审判准备材料，司法部也找苏联情报局要过关于希特勒匪徒所犯兽行的材料。在鲁坚科及另4位检察长之后发言的是检察长舍伊宁，他讲的就是希特勒匪徒对犹太人犯下的兽行。这是什么——是民族主义的发言吗？

还用飞机把作家苏茨科韦尔送到那里，他在那儿发言讲的也是对犹太人所犯下的兽行。苏联政府为什么要组织这些发言呢？难道这真是民族主义吗？

这里所记的一切都落到了我的头上，这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是捏造的。

（审判）长：进行侦讯时你供认过：“我承认，我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受到这种情绪的控制”（卷1，案卷页47）。

洛佐夫斯基：是的，就是由于它们都是不真实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原故，我断然否定。

（审判）长：可是你下面接着说道：“1947年初，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工作组对苏联情报局的工作进行检查，揭露了我的民族主义的诡秘活动”（卷1，案卷页48）。

洛佐夫斯基：我这也是有意识签的字，好在以后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来说扩充主席团的问题。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团（以后再来说这个代表团）从美国回来之后，好像是在1944年初吧，提出了召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

为这次全体会议起草了讲话，呼吁书，也经过了中央的审查。

全体会议开会期间我对谢尔巴科夫说，委员会里的情况不大对头。关于这种情况他也收到了通过其他途径传来的消息。当时他说，聚集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的全是作家，诗人，新闻记者，科学家，应当派一些既不是作家又没有在专门的犹太人组织中工作过的人到那里去，最好能找上那么4~5个合适的人。爱泼斯坦和米霍埃尔斯大致拟定了一份主席团委员名单，名单上都有谁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不过我知道这名单送给了谢尔巴科夫。在这些人得到批准之后，谢尔巴科夫对我说，终归还是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派一批工会工作者好，他还问我能推荐谁到那里去。我说我知道布雷格曼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但问题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他被撤消了职务。对此谢尔巴科夫回答说：“那又有什么关系，撤消了一个职务；可他现在在另一个地方干得很好，你召他到你那里去，和他谈谈，问一问他认为派谁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有利于把党的精神带过去，消除那里的争吵”。我召来了布雷格曼，这是1944年5月或是6月的事，我和他做了一次长谈。

(审判)长：在这之前你同他见过面或者是单独会见过吗？

洛佐夫斯基：战争期间，一直到1944年没有见过面。

布雷格曼：我声明，我没有进行过反苏的谈话。

洛佐夫斯基：你们把这42卷研究得比我深，我想，你们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已经注意到了，所有的被告人供认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所有的说法都是一样的。然而其供词被收集在案卷里的那些人文化程度不一样，地位也不一样。结论只能是有人把说法词句都商量好了。是谁呢，是这些被逮捕的人？我想不是。那就是说，是侦查员们商量好的，不然，各不相同的人不会有一样说法。

我断然声明，我没有说过民族主义的话，没有说过要隐瞒我们的阴谋活动。这都是胡说。

……大约是在1944年末或是1945年初，谢尔巴科夫病得很

重，他得的是血管栓塞。而我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必须撤销所有委员会的明确构想。这事必须和谢尔巴科夫谈。

1944年底我一直未能在电话上和谢尔巴科夫联系好，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很差。1945年3月，就在我们临近胜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谢尔巴科夫觉得身体不错了，可以到别墅去找他。我就去了。我到了地方，医生和他的妻子出来告诉我，只能同谢尔巴科夫谈完全不至于使他激动的事情。这项使命当然是复杂的，他在期待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要让这个人不要激动，该谈些什么呢？我自然是答应了这样做，可我还是对他说了：“你看，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我有了这么一种印象，战争结束后我们必须把5个反法西斯委员会都撤销掉。它们是适应战时需要成立的。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说，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应该移交给共青团中央，科学家委员会应交到科学院去。

至于这些委员会同外国各种反法西斯组织的交往联系可以通过苏联情报局的各处去做。谢尔巴科夫告诉我，现在没有必要谈这种事，等战争一结束，这个问题也就会解决了。然后他问我，以前我们加进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的那几个我们的人干得怎么样。我把布雷格曼告诉我的情况讲给他听。我们决定战后我们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撤销所有的委员会。可是5月9日伟大的胜利日这一天谢尔巴科夫死了，于是这个问题也就悬起来了。本应该去找日丹诺夫请示这个问题，但是他有很长时间都在芬兰，我们只能通过高频通讯和他谈话，可是在电话上是不能多谈的。我同亚历山德罗夫的关系不大好，我不想找他。以后我再跟你们说我们的关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只是想说，主席团的组成是谢尔巴科夫在我的参与下批准的，因此我对此负有完全的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他的副手。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你在自己的供词里说，在克里木问题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之后，洛佐夫斯基感到非常不安（卷2，案卷页204）。你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

费费尔：我这是听爱泼斯坦说的。

(审判)长：你本人和洛佐夫斯基谈过这个问题吗？

费费尔：没有。

(审判)长：你讲一讲你们是怎样开始采取保密措施的，你们的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布雷格曼是怎样帮助你们保守秘密的？

费费尔：保守秘密这个词不恰当。

(审判)长：你的供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费费尔：保守秘密这个词不合适。布雷格曼等几个人来到之后，委员会的工作开始有了好转，再没有了在这之前有过的那种公开的民族主义的言论。

(审判)长：那就是说，布雷格曼来到后告诉你们：“要小心了，现在可不要再公开讲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

费费尔：布雷格曼、古别利曼和其他几个人是很会做政治工作的，他们对全部工作进行了整顿。当有人讲民族主义的话时，布雷格曼就表示反对。我不认为布雷格曼是民族主义者……

……我们自己相互谈论同化问题……

(审判)长：和谁谈？

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及爱泼斯坦。

(审判)长：谈些什么？

费费尔：说犹太文学和文化正经历着艰难的时日，没有文选，没有学校等等。我们和贝格尔森，和主席团的其他委员谈这些事。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爱泼斯坦和米霍埃尔斯说必须反对同化，贝格尔森和加尔金也反对同化吗？

费费尔：是的。贝格尔森和加尔金是反对同化的。我没有和马

尔基什谈过这方面的事，和贝格尔森谈过。布雷格曼和古别利曼在场的时候就不谈这种话。我们讨论与犹太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时非常谨慎。

(审判)长：(对费费尔)我问你，爱泼斯坦说过洛佐夫斯基是民族主义者之类的话吗？

费费尔：爱泼斯坦说过——洛佐夫斯基是我们的父亲，他同情我们的工作。

(审判)长：你供认爱泼斯坦没有对你说起过洛佐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思想，你同时又说洛佐夫斯基同情你们的民族主义活动。该怎样理解你的意思呢？

费费尔：爱泼斯坦没有公开使用民族主义或是民族主义的工作这种词……

(审判)长：你是不愿意对法庭说实话。我弄不明白，究竟哪些话是真实的。一会儿你说你没有同洛佐夫斯基谈过民族主义方面的话题，而同时你又肯定，显然这才是真的，布雷格曼等等这一伙人是洛佐夫斯基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敌对活动的秘密而派遣来的。

费费尔：洛佐夫斯基没有对我说过这些。是爱泼斯坦说了，这些人是被派来帮助工作的。

洛佐夫斯基：从费费尔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一部分所做的全部供述都是捏造出来的。他在这儿老是推脱是爱泼斯坦说的，又说他不懂什么是保守秘密，什么是民族主义。这正是对法庭态度不老实。归根到底从他所讲的全部话里可以看出来，这5名布尔什维克被派到委员会里来是为了加强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作的。而且他还说，当着这些人的面其他人不敢讲民族主义方面的话。即使是从费费尔这些闪烁其辞的供述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委员会里添了这几个人之后，其他人就害怕在他们面前表示民族主义的

情绪，就是有人表示出来了，也会立即使他放规矩些的。费费尔装出一副连什么是保守秘密都不懂的天真孩子的样子。从他讲的话中可以看出，我对委员会里开始公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话是很气愤的，因此我才提出要保守秘密。这一切真正是欲盖弥彰，这一切全是一派谰言。当然可以往已经死去的爱泼斯坦身上推，说他仿佛讲过，洛佐夫斯基是同情我们的工作的。在这儿，在“省悟”所里，费费尔是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所以他就想，是爱泼斯坦对他说了，我要求民族主义活动要保守秘密。这是对我的诽谤，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后边再讲。

现在请允许我来讲一讲访美代表团的事。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对于洛佐夫斯基是领袖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贝格尔森：关于洛佐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思想问题，我想举一个实例……

接下来他讲道：“在贝格尔森、爱泼斯坦和克维特科去会见洛佐夫斯基的时候，洛佐夫斯基提出了办一份犹太文报纸的想法，并要他们给中央委员会写一份申请报告。”

克维特科问到这次会见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得到贝格尔森的回答是——“1941年在莫斯科”。

克维特科：可是1942年之前我并不认识洛佐夫斯基。

贝格尔森：我肯定当时去见洛佐夫斯基的有你、爱泼斯坦和我。

克维特科：我没去过。

洛佐夫斯基说，他记不得都是谁到他那里去的了。

洛佐夫斯基：就算他们来找过我，而且我也对他们讲了，得给中央委员会写一个申请报告。可是难道说出版一份犹太文报纸这就是民族主义吗？……

难道国内机关向中央委员会呈送申请报告就是民族主义吗？

(审判)长：关于美国之行你有什么要供述的？

洛佐夫斯基：我前面说过了，由于我们开展了宣传工作，在美国成立了艺术家的、作家的、科学家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属于全美国国内组织“拉申列利弗”的犹太人会议，我对这件事情持肯定的态度。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世界级科学家恩施泰因。按照他的信念说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和许多的科学院院士一样，更多的是研究数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拉申列利弗”里管事的是一个大房主，姓什么我记不得了。他开始给援助苏联基金募集钱款。我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肯定的。

1942年一年之内我国驻美大使馆好几次用密码通报说，这两个组织不断到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去询问能否派遣我国代表团到美国来。由于这些密码电报是发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所以我都看到了，然后又和谢尔巴科夫商谈这事。他说，总之现在得等一等。那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攻时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前派出代表团对我们是不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国际形势更加明确了，掀起了一个向苏联表示同情的高潮。

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曾收到由美国发来的派遣代表团的邀请书，还列出了几个人名。等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形势已经变了），谢尔巴科夫给我打电话谈了开列出的这几个人的事。我那时在古比雪夫，他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那是1943年初。谢尔巴科夫说：“我这儿有一份名单，”他读道，“梅利斯——没有必要，他是个将军，让他去打仗好了；爱伦堡——没有必要，他文章写得好，而且每天都在写，不能把他派走；马尔基什——不行，他头脑不清而且还有些歇斯底里，他自己都不知道过两分钟他会讲出什么话来；爱泼斯坦”。我说我反对。谢尔巴科夫问：“你为什么不同意爱泼斯坦呢？”我回答说，他在美国担

任过好几年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我们如果派他去，那么不等到他到达那里，全美国就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我们的宣传浪潮——他们会叫嚣说我们派了一个共产党员去搞宣传鼓动了。谢尔巴科夫同意了这个看法，然后他又问我：“对米霍埃尔斯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对他不太了解，自1941年8月开过第一次群众大会之后我很少同他见面。谢尔巴科夫说：“米霍埃尔斯是一个明智的人，懂政治，顺带说一下，还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和一流的演员”。我说，我对他过去的历史不了解。谢尔巴科夫表示：“那好，我去查一查。反正我们得让代表团的成员中一定要有一个党外人士。”

后来，我们又用同样的方式审查了费费尔的提名。过了几天，谢尔巴科夫给我打电话说，中央确定了两个人选——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他要求交一份呈给他和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推荐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作代表团团员。我就写了，我建议派某某人和某某人去。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往纽约和华盛顿发电报，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给那两个组织发明码电报，通知派遣代表团之事。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代表团到底是访问什么人去的。起诉书中说，他们是抱着罪恶的目的去的，在美国同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联系上了。怎么着，他们是去访问共产党的吗？显然不是。若真是去访问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派去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非党人士。也许是去会见犹太工人？……

……美国有4个大的犹太工人组织。这就是：女装裁缝协会，其领导人是一些与苏联势不两立的敌对分子；第二个是男装裁缝协会，其领导人是自称为左派的西德涅伊·希利曼，还在列宁在世时他曾来过苏联，给苏联的服装厂带来了犹太工人的礼品。

第三个工人组织就是“工人团”，一个互助组织，联合有大约10万名犹太工人，其中既有孟什维克，也有崩得分子，还有左派。

第四个工人组织是一个不太大但却组织得很紧密的毛皮工人协

会，联合着大约 1.5 万~2 万名工人。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代表团在那里也许是去找这些工人组织的？可是那样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就会派出另外的人参加代表团。他们是去访问谁呢？邀请他们的是两个组织——作家、诗人、艺术家等等的委员会和“拉申列利弗”，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援助俄罗斯”或是“军事援助俄罗斯”。在这个协会的内部成立了一个犹太人会议，我不清楚它的组成人员情况，但它是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它的领导人是一个房主，不知是叫莱温呢还是叫什么别的名字。应该说明，在美国有数百万名犹太人——来自俄罗斯的移民。这些人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苏联有好感并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的，而是因为苏联军队从希特勒的铁蹄下拯救了数百万名犹太人，这给所有的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印象。所以他们才募集钱款来援助俄罗斯，而且是向一切可能募集的人去募捐。

资产阶级利用这件事做他们自己的生意，但是也有几十万普普通通的人是真心诚意地同情苏联并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了援助。

这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代表团是去访问那些愿意为支援反法西斯的斗争做些事情的人们的。

（审判）长：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去美国之前你给他们做指示了吗？

洛佐夫斯基：绝不能把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人派出国的，在战时尤其如此。众所周知，不经党中央准许，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论是出不去的。没有相应的批准手续给任何人都不会发放苏联出境签证，说我曾努力争取让这两个人成行——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做一分钟这样的设想：我是努力争取过这件事。两个人选——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现在被认定是民族主义者。请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知道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是民族主义者吗？不知道，否则它是不会做出允许这两个人出国的结论的。党中央知道他们是民族主义

者吗？不知道。

由此可见，起诉书把让他们两个人出国访问的责任加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是有意犯下的错误。断言我知道他们是民族主义者是经不住一驳的。

还是在这份起诉书里说道，早在去美国之前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就按照洛佐夫斯基的指示，同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群体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着手准备关于苏联国内形势的情报。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罪行！为的什么？为的是获得美国犹太资产阶级界人士的好感，预先得到这些人对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破坏活动的支持。

因此，这断言从委员会诞生的日子起，它所有的呼吁，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来为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给进行破坏活动做准备服务的。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是在实际上事情要比我们感觉到的严重得多。这是关乎到最重刑罚的事情。

很自然，在出发去美国之前必须找这些人谈谈话。因为他们是在古比雪夫，所以去了莫斯科，在那儿和谢尔巴科夫谈了话。费费尔在这儿说，我给他们的指示和谢尔巴科夫给他们的指示在第二战线的问题上有分歧。这是无稽之谈。我们都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说一个副外交人民委员和一位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在第二战线的问题上竟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是可能的吗？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我了解我国政府的政策，我知道该做什么和因为什么该这么做。不得到维·米·莫洛托夫或是谢尔巴科夫的同意，我是不会采取任何一项措施的。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启程之前，我和他俩谈了话，甚至还可能谈过不止一次。可是在这儿费费尔竟记不清楚，讲不出我们几次谈话的内容。我来提示一下，也许他现在会记起来的。我告诉他们：“你们首先是苏联人，然后才是犹太人。在你们到达美国之后，不仅会被看做是犹太人，而且要被看作是苏联人。不光是犹太人的與

论界、报刊等等，而且整个美国的新闻界都将关注着你们，因为不管你们属于哪个民族，都是苏联人。因此，你们的行动关系着苏联是否会在哪里丢面子，或者是你们经受了一定的苏维埃文化的熏陶，举止行为符合苏联人的身份”。接下来我还对他们讲：“……你们要注意，美国的新闻界和美国人，在他们需要从某个方面和你套近乎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时，是很会奉承的。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活动中有专门拉人下水加以控制的办法。在美国和英国进行收买，不是简简单单地‘给你2万卢布，你去干个什么什么事’，而是一种巧妙的诱人腐化堕落的手段”。

费费尔的供词里边说，在为美国之行做准备的时候，爱泼斯坦、米霍埃尔斯和我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此次出访的任务，说我们决定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的与苏联为敌的分子和犹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建立牢固的联系，以预先取得他们对我们今后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的支持。

从费费尔的这些供词和起诉书中可以得出这种结论，我曾指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说：“要和资产阶级分子取得联系，好让他们在今后帮助我们为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是对一个苏联人卑鄙的诽谤。

在起诉书里，接下来还写着一项更为可笑的指控，这就是：“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认为，给美国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一些关于苏联的间谍情报，可能是使令这些人援助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斗争最为可靠的手段，他们两个就在洛佐夫斯基的协助下，于起程之前收集了一系列关于苏联工业的机密材料，并随身带往美国去了”。

而在起诉书的第33页上说得更为果断：洛佐夫斯基“给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提供了关于苏联的工业、经济的状况及文化生活的间谍材料，要他们交给美国人”。

给什么人提供间谍材料——这是要判死刑的。侦查人员是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些材料具有谍报的性质？侦查员看过这些材料没有？我无法设想，侦查人员不阅读他们的材料就要求判人以最重的刑罚。这就是说，这些材料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在案卷材料里边没有这些东西。

我问费费尔这份材料在什么地方，他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档案室里留有一份副本，在搜查时被没收了。这就意味着侦查人员手中是有这些材料的。我是否有权看一下这是些什么样的材料？我，不是中央委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苏联百姓，是否有权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处死？怎么可以在起诉书中写上这些材料是间谍性质的而又不把这些材料收进这 42 册卷宗里面呢？这些材料怎么可以隐藏？这样的东西一般地说怎么可以藏着不拿出来呢？要知道这意味着要掉几颗人头呀。这不光是我的头，这还有我的家属的头，以及这儿在场的整整一帮人的头。这是怎么回事，苏联的侦查方法是控告一个人犯了从事间谍活动罪，而后又对他和法庭隐藏起足可以将他处死的材料吗？我认为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就这样，一名中央委员、外交部的副部长被控告在战时向两个人提供间谍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是我想干这种事情，我为什么非得通过这两个人转交东西，在莫斯科不是有美国大使馆吗，这儿有的是特工人员。

就算是我想搞间谍活动，我会去和一个诗人及一个演员联系吗？就连财政人民委员部看大门的人也不会这样干的，不要说外交部的副部长，一个老地下革命工作者了。所有这一切真是太荒谬了。

我还忘了说，在给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做指示的时候，我还曾告诉过他们，“没有领事或大使在场对别人任何话都不要讲，一切重要问题都要请示莫斯科”。起诉书中说，他们会见过魏茨曼。费

费尔在他的供词中已经讲了，他们是获准同魏茨曼会见的，对这个问题有一封由维·米·莫洛托夫签署的电报。尤其是曾由维·米·莫洛托夫签字给他们发去电报，指示他们会见罗森贝格，商谈苏联能够接受“卓因特”提供的援助的条件。而所有的供词和起诉书都把会见罗森贝格认定为犯罪。

总的说来，这件事哪一点是犯罪？他们不仅有权，而且作为苏联公民有义务去见“卓因特”的领导人之一，并同他交谈一番，因为这事关援助苏联对法西斯作战的问题。

(审判)长：那么说，给他们发电报通知了准许同魏茨曼会晤，而其他的会见活动他们就可以自行决定了？

洛佐夫斯基：关于同“卓因特”领导人的会见，他们也是收到了莫斯科发去的电报的。

(审判)长：同什么样的人他们有权独立自主地去会见呢？

洛佐夫斯基：同他们指明的一切人，但必须得到大使和领事的同意。

他们一定得征得大使或领事基谢廖夫的同意，并请求他给派译员。有这样的指示——不经领事准许不得采取任何步骤，没有官方的译员不得采取任何步骤。领事的做法是：如果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那他就自己做决定并派出译员，如果问题复杂一些，他就征询莫斯科，也就是莫洛托夫的意见。

(审判)长：在群众大会上他们该发表讲话吗？

洛佐夫斯基：该讲，要讲反法西斯的斗争。我知道他们讲了好多次话，好像是在300来次的群众大会上讲过话。他们也不仅仅是在犹太人中间讲话。

他们这次出去有死的规定：没有苏联官方派出的代表在场，不得进行任何交谈和谈判，一切都只能在官方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审判)长：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有译员在场吗？

洛佐夫斯基：不光是译员在场。举例说，他们收到去见纽约市市长拉加迪亚的邀请，此人是民主党人，罗斯福的朋友。他们是和领事基谢廖夫一起去见的。我们曾收到几份大使和我国驻纽约的领事发回的通报，这些都送给党的领导了。从这些通报中可以看出，大使和领事都认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所做的工作是积极的。钱款源源而至，反对苏联敌人的斗争激化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表达美帝国主义利益的罗斯福认为同苏联结盟比同希特勒的德国结盟更为有利。群众集会和我国的代表团人员同艺术家、诗人以及其他的知识界人士的会见给苏联带来了好处。

他们访问了好些城市，而且有趣的是来听他们关于苏联、关于红军的斗争的演说的人越来越多。这不光是犹太工人，来听的还有波兰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在他们的访问时间开始拖长的时候，我对维·米·莫洛托夫说，这两个客人在美国的长时间逗留该结束了。

在和维·米·莫洛托夫谈过之后，我以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签字发去了一份电报，通知必须赶快回来。他们于1943年12月初回到国内。当然，他们对这次出国访问感到极其兴奋。

他们是第一次到国外去，在那里印制了他们的画像，他们同一些人物谈了话，等等。回来之后他们给我挂了电话，我告诉他们，白天我没有空，但是我想和他们详细谈一谈，所以请他们晚上到我家去。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来到我的寓所，一连3个小时讲述他们的印象。谈话中间他们顺便说了一件在政治上饶有趣味的事情，使我感到激动。我记不得那是在哪一个城市里了，在我国领事的协助下召开了一个白俄侨民的大型集会，这些人流露出来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希望了解俄罗斯发生的事情。记得在这些白俄侨民当中，他们举出了一些非同一般的人物，如梅谢尔斯基公爵，普佳京

公爵，还有其他一些人。在这些昨天是我们的敌手而今天是摇摆不定的老排犹分子的集会上，犹太人米霍埃尔斯——一个演员——用俄语做关于苏联人民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的报告。我还问过他们，是否会见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那些全神关注着苏联这场斗争的人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告知了我，罗森贝格保证，如果把犹太人迁移到克里木来，“卓因特”就给予物质援助。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些。后来，如费费尔已经在这儿说过的（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点在他的书面供词中又没有），他们两个人受到了维·米·莫洛托夫的接见。维·米·莫洛托夫，如费费尔所说，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在这儿“亲切地接见”这几个字的意思不知为什么是民族主义。维·米·莫洛托夫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他们和他谈了两个计划（在费费尔的供述记录中这一点又没有），他们说了可以把犹太人移居到伏尔加河沿岸德国人的地域去，或是移到克里木的北部去。对第一个方案维·米·莫洛托夫讲，伏尔加河沿岸的德国人地域纯粹是一个农业地区，往那里迁移犹太人的问题未必能行。关于克里木，他说：“这样吧，你们写一个送我和送斯大林的呈文，我们研究一下”。

莫洛托夫说“研究一下”，当一位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务活动家说“研究一下”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表示赞同么？当然不是。他，这位国务活动家，知道，有一个集体专门处理这一类问题。米霍埃尔斯从这里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你听贝格尔森在这儿说了，根据米霍埃尔斯的说法，他知道维·米·莫洛托夫对向克里木迁居犹太人的计划表示赞同。我问过尤泽福维奇，对有关克里木问题的议论他了解些什么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委员会里听人讲过，维·米·莫洛托夫赞同向克里木迁居犹太人。如果你再问一问其余的人（我可是要问他们的），你就能看得出来，委员会里在别有用心地蛊惑说维·米·莫洛托夫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散布这些消

息的人一个是费费尔，另一个是米霍埃尔斯。正是他们两个人努力让其余的人相信，既然是莫洛托夫“答应了”，那就是说问题已差不多定下来了，即使说还没有解决，那至少也是“进展顺利”。我认为这是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对待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心术不正。他们应该懂得，一个处在这种地位的人说“研究一下”，这就意味着确实确实要进行一番“研究，思考，权衡”，而无论如何这也不是将予以准许的许诺。

（审判）长：在罗森贝格提出保证，如果犹太人移居克里木，“卓因特”将给以物质援助之前，你有没有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观点？

洛佐夫斯基：在他们第一次对我讲，罗森贝格保证，如果让犹太人迁居克里木，就提供物质援助时，我对他们说，如果他能给予物质援助那很好。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拒绝过美国人提供的物质援助。当然，美国人，大资本家们提供援助，他们是期望一本万利的。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莫非说我们什么时候害怕援助而加以拒绝过吗？我记得有过“美国救济总署”——“美国救济俄罗斯公署”这么一个组织，它的领导人是我们的死对头之一的赫伯特·胡佛。当这个组织提出要给予援助时，弗·伊·列宁当时（这是1921年发生饥荒时的事）曾说过：“一头癞皮羊总还能剪下一撮好毛的”。我们也曾拿了“卓因特”的钱在克里木组织移民区，后来又把“卓因特”的代表遣送出了苏联。

我们接受过钱款用于比罗比詹吗？是的。是通过私人关系吗？不是的。苏联政府是准许接受的，只是在1951~1952年间才禁止了比罗比詹接受阿姆比詹的款项。我们接受钱款，却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我说不出来是哪些人参与起草了关于克里木的信件。我只知道

有3个人来找我：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我当时告诉他们，我看这件事实际上很困难，因为犹太人都住在城市里边，而向克里木移民必须在2~3年内完成，必须让整个集体农庄地往那里搬迁。要想让犹太人移居到克里木，那得要花费50~60年的时间，这对苏联来说是不合算的，但是由于我对犹太人移居克里木或是另一个地区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意见，我看了看他们的草稿，光是说：“你们为什么把犹太人所受的苦难也写进去了，这个情况本来都是知道的，为什么在信里写那么多，把那些表现感情的词句都去掉，把你们提出移民的理由留下”。总的说来，我对能否在实际上做到是感到疑惑的，但在政治方面我却没有任何疑问。我看不出这事有什么民族主义问题和任何反对苏联的计划。另外我还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权力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名义写信，因为所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委员会的职能和任务的范围。但是作为苏联公民，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他们的建议或是请求。

起诉书中还相当幼稚地说，“他们还要求苏联政府把克里木地区疆土交给犹太人”。这甚至让人读起来都觉得别扭。事实上，他们是按照维·米·莫洛托夫的意见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的，这项建议被拒绝了，是根据什么样的想法拒绝的我不得而知。我再说一次，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老谋深算的敌对性的计划等等。

（审判）长：但是你对这封信做了校勘。是吗。

洛佐夫斯基：我想请求宣读一下费费尔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供词。他的供词里边直接说到，当他们同罗森贝格谈犹太人移居克里木的事时，据说罗森贝格仿佛曾经对他们讲，克里木这不仅仅是黑海，还是土耳其，巴尔干等等。

我想听一听费费尔供词的准确文句，因为在我问费费尔，他是否在什么时候对我说过，犹太人移居克里木对美国政府有利害关系，是否谈过什么登陆场这种事时，费费尔说，他从未和我谈过这件事对美国政府有利害关系，也未谈过登陆场这种事。

(审判)长：费费尔供说：“罗森贝格对我们声称，只有我们……把克里木从苏联政府手里争过来，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犹太共和国，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才能给予我们援助。你们自己也明白，——罗森贝格说，——我们一方面是作为犹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美国人而对克里木感兴趣。

罗森贝格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克里木这就是黑海，这就是土耳其，这就是巴尔干”（卷2，案卷页66）。

洛佐夫斯基：从这里曾经做出过一个结论：我委派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把克里木出卖给美国人。费费尔的供词中有很多想入非非的东西，包括同罗森贝格的这次谈话。在1943年7月罗森贝格怎么可能从几年之后美帝国主义者才开始讲的那种意义上去谈土耳其和巴尔干呢？简直是胡诌。

(审判)长：在你、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之间谈没谈过克里木这就是黑海，这就是巴尔干，这就是土耳其的话？

洛佐夫斯基：没谈过。这太荒谬了。假如他们告诉我，罗森贝格说到了土耳其和巴尔干，我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一定会把他们嘲笑一番的。美国的1万2千份报纸和杂志当时没有一家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美国的国务活动家考虑过这方面的事，可突然之间罗森贝格却想要来解决这一问题。

(审判)长：他们写成了一封信，有人用铅笔做了校勘。经过校勘，它依然是一份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件……

洛佐夫斯基：我告诉过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能向政府提出这种样的请求。由于这个缘故，信的下面才签了3个苏联公民的名字：爱泼斯坦，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而没有写反法西斯委员会。

3位苏联公民是有权写信给自己的政府的。

既然他们有这个权利，他们就写了，对也好错也好，但是说不上什么间谍活动，说不上出卖克里木……

(审判)长：但是这封信里边有诽谤党、诽谤国家、诽谤我国其他民族的内容。

洛佐夫斯基：我没有对这封信的每一行都进行校勘。

(审判)长：可是你说过你这样做了。

洛佐夫斯基：我告诉过他们把一些提法删掉。我承认，信中有好些民族主义的说法，而且那里边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在于他们想要用犹太语言写作和出书，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都是可以的。

(审判)长：这是对的。

洛佐夫斯基：此信的民族主义性质在于，问题的本身和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非被颠倒了。十月革命已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因为它使所有的民族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对每一个说法我当然都负有政治责任……

……我认为，民族主义并不在于让犹太人移居到苏联的某一块疆域去。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在于，就如信中所表述的那样，从这封信中得出的结论，是在苏联，犹太人仿佛没有任何权利。这是露骨的民族主义。我把这一点漏过去了，对此我负有政治责任……

……对这封信我承认，我粗心大意地马虎过去了。那里边有一

些非常露骨的民族主义的说法……

是的，我没有劝阻他们发出这封信，对此我要负全部的政治责任，不过，既然是维·米·莫洛托夫提议让他们写的，我却是无法禁止他们这样做的。

他们收到的答复大概是维·米·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发来的，这一点让费费尔来说吧，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收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我就说不上。信发出的时间大约是 1944 年 2 月份，不过，当时政府未必能立即处理这件事情……

（审判）长：你是从什么人那里了解到遭到了拒绝的？

洛佐夫斯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收到了否定的答复，我记不得了。我把话筒放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对这封信寄托了那么大的期望，可是却遭到了拒绝，在那以后他们嘀嘀咕咕，觉得很难过。

（审判）长：他们是谁？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米霍埃尔斯，还有那个时候爱泼斯坦还活着。我不知道爱泼斯坦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 3 个人先前曾跟他们的几个密友说过他们的方案进展顺利，这样做了之后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会在内心感到惋惜，不痛快等等。他们没有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告诉我，谁也没有来找过我，没有说过这件事。

关于克里木问题的情况全说完了。

仔细分析本案的全部材料和被告的口供，就会形成一幅非常奇怪的情景。我请求法庭注意这一情况。所有的被告，所有的被捕人员（不仅是那些身在此地的人，也包括那些身在此间审判大厅以外的人）都肯定并且发挥着同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来自何处？它的源头在哪儿，为什么想法和说法竟如出一辙？霍夫斯坦怎么会这样来表述克里木问题？我认为，最初的材料是费费尔在他的口供中提供

出来的，尽管他并没有提及美国政府，也没有说到过登陆场等等，接下来这个想法就开始由侦查员们加以发挥，结果到了这个地方，就从1952年的观点得出了出卖克里木的登陆场，等等。如果法庭准许，我现在或者是以后讲一讲有关本案材料中某些文件的情况。

(审判)长：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再返回来谈的。

16时2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18时50分法庭继续开庭。

洛佐夫斯基：休庭之前你曾问过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给我看的是不是一份信的草稿。我很有把握地回答说，是一份，就是给维·米·莫洛托夫发去的那一封信件，信的副件在案卷里有。可是现在我不能肯定这一点。

(审判)长：也许拿给你看的是一份草稿，后来也采纳了你的意见，而寄出的却是另一份。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洛佐夫斯基：是的。我现在已记不准信里的话了。你在这儿把这封倒霉的信读完之后，我大吃一惊，一般地说我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轻率呢。这一切连我自己都弄不懂，但我并不是想说，这样就可以卸掉我的责任……

……你已经宣读有关带往美国去的材料那部分。

关于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已经讲过了，因为侦查人员那里有这些材料，可以判断明白这是不是间谍情报。

现在来说报刊的事。我指示说要同一切能够同意刊登有关苏联的材料的报刊机构建立联系。我知道，谢尔巴科夫也做过这样的指示。我现在要说明，我指示的是要同美国的一切报刊建立联系——愿意并且将会刊登关于苏联、关于抗击法西斯等等的文章的资产阶级报纸，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报刊。在这些文章里应该阐述经济问题。我来问您，莫非说《真理报》不刊登关于经济的文章？就说咱们国家的那些报纸吧：《共青团真理报》，《真理报》，《消息报》

.....

什泰恩：我的名字一直被当作一个著名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而讲来讲去，并且还说，洛佐夫斯基老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有反苏情绪的人，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同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好像是1944年认识的。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他。现在我想问问他，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在我们认识之前很久就已经了解到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审判）长：他已经声明过了，他并不知道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不过是对这一情况做了不真实的供述。

什泰恩：还有一个问题，洛佐夫斯基是否听说过我给斯大林写过信的事情。

洛佐夫斯基：第一，我对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断然声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起过莉·所·什泰恩有反苏的观点。如果我的供词里有这样的话，那全是谎言，至于我为什么在这样的供词上签了字以后单独去讲。我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民族主义的和反苏的观点。她是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提议，作为一名科学院女院士被吸收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中的，我们的科学院女院士可是不多的。

第二点。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月份了，但肯定是1944年，莉·所·什泰恩曾经来找我，问她该怎样回复她收到的那些各国科学家的来信。我当时告诉她，她本人不要往外寄任何信件，一切复信只能通过科学院寄出，因为她是党外人士，所以我没有对她讲在科学院之外这种信件是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进行检查的。

在这次谈话当中，她告诉我，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谈了我们的领导干部迅速衰老的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保持精力健旺的措施。

什泰恩：是的，确有其事。

费费尔：这儿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怎样知道向克里木移民的方案没有得到同意的。我记得，1944年年中，爱泼斯坦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必须紧急去见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被召见的有我们3个人：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我。谈话的时间很长，两个来小时，或者还要多一点。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纯粹是从实施的角度考虑，对我们的关于克里木的报告进行了驳斥。他说，这是脱离实际的，犹太人不会到克里木去，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回到他们的老地方去，只有演员和诗人才会想出这种方案来。

费费尔：坦白地说，我和洛佐夫斯基没有谈过什么民族主义的话。

（审判）长：那谈过什么话呢？你可是供认过洛佐夫斯基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思想上的领导者的，你说过是他鼓励你们去干民族主义的活动的。

费费尔：我和他谈的是同委员会相关的具体问题。我同他总的说来很少谈话……

……同罗森贝格谈克里木问题时基谢廖夫领事在座。

（审判）长：罗森贝格对你讲过必须把克里木争过来的话吗？

费费尔：那是一种很随便的说法。是我和侦查员在一块采用的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说的是犹太人移居克里木的问题，如果我们开始把犹太人迁往克里木，“卓因特”就给我们援助。

（审判）长：可是你讲过：“罗森贝格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克里木这不仅仅是黑海，这是土耳其，这是巴尔干”。

费费尔：他说过，他在克里木的时候看到了黑海，克里木所处的位置很好，在黑海的岸边，那儿有土耳其，有巴尔干半岛，是一个出色的建立犹太共和国的好地方。

（审判）长：说的不是“克里木是一个登陆场”这种意思吗？

费费尔：不是，那个时候我的脑袋没有考虑那方面的事。

(审判)长：接下来你说：“他就是不说，我们也明白克里木的作用……。”

费费尔：这也是我使用的一种说法。

(审判)长：你还曾供认，在你向罗森贝格保证将为争取克里木而奋斗之后，他说，你们可以期望……不只是得到美国的物质援助。还可期望得到什么援助呢？说过这样的话吗？

费费尔：没有说过不光是物质援助的话。我否认这一点。说过克里木地处黑海的话。

审判长问费费尔，写这封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信在苏联和什么人商量过。

费费尔：我，比如说，就知道他同泽姆利亚奇卡和热姆丘任娜商量过。

(审判)长：你是说米霍埃尔斯？

费费尔：是的，我连热姆丘任娜回答他时说的话都还记得，还有什么人也知道这事。

贝格尔森：我知道，米霍埃尔斯曾经对我讲过。

费费尔：她说：“随便在哪住都行，但是得有一个栖身之所”。

洛佐夫斯基：……今天费费尔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供词。如果每天都提出一套新的供词，那就要混乱得一塌糊涂了。

第一，他供说和罗森贝格谈话时有领事和译员在场。那么假如他们谈过什么犯罪的话，这位译员该向谁报告早就报告了。这完全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费费尔那套引出来了整个这件事情的供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费费尔：这事是霍夫斯坦的供词引出来的。

洛佐夫斯基：我不知道。我是在费费尔供出这个登陆场的事之后过了两周就被捕的。而现在根据还是那个费费尔的说法，什么同

罗森贝格交谈过美国人想利用犹太人移居克里木来达到他们的帝国主义目的，什么支持我们占据克里木等等都是（没有的事）……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根据费费尔先前的供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曾经保证要为争得克里木而奋斗。什么人呢？是这两位火枪手——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将要为争取克里木、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这又是一部进行造谣中伤的小说。这小说是谁编写的呢？就是费费尔本人，这成了整个这件诉讼案的基础，也是控告各种罪行，其中包括背叛罪的基点。可是今天从费费尔的口供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另一种样子。不过我，举例说，可不能对费费尔胡编乱造出来而现在又改来变去的那一切东西负责。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那封信的事。我把经过情形已经说了。信确实送给我看过。对此我再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相信，给政府写信，即便是很恶劣的信，也不是犯罪行为。

（审判）长：被告霍夫斯坦，关于克里木问题你有话要说吗？

霍夫斯坦：我是在基辅被捕的。在审问我的时候对克里木只字未提。有那么一次问起我米霍埃尔斯的事，对委员会的工作当时没有讯问过我。关于克里木的问题是侦查员列别杰夫在莫斯科第一次跟我提起的。

（审判）长：那是1949年1月5日。而费费尔是1949年1月11日供述此事的，所以他断言，一切有关克里木的供述似乎都源自你那里。

霍夫斯坦：我连向政府呈送报告的事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曾派克维特科到克里木去过。

（审判）长：你是根据什么对克里木问题进行供述的？……

霍夫斯坦：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在问我主持机关工作的那些领导人是否曾经关注过克里木时，我说在20年代我去过克里木，

我了解到并且亲眼看到了那里在卓因特农业组织的直接支持下组织犹太人移民区。我就把这些对侦查员讲了。

(审判)长：下边你是这样供述的：“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费费尔和多布鲁申对他们的这一方案简直是时刻铭记在心，他们向我证明说，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克里木的问题最近就将做出决定。为了在犹太人中间推广他们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思想，米霍埃尔斯和贝格尔林在犹太剧院为上演话剧《鲁别因亲王》做着准备，该剧中夹杂着建立犹太国家的思想和这个国家同其他国家活跃交往的情节。这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戏剧遭到禁演，但是它还是被设法弄到了美国，并在那里用犹太文出版了”（卷13，案卷页172~173）。

霍夫斯坦：我认为，既然是侦查员跟我说这件事，那他这样做想必是有充足的根据的……

(审判)长：你没有自己的头脑吗？

霍夫斯坦：我那时一切都是取自同侦查员的谈话，此外我再没有可以了解的地方了。

我惟一可以说的是多布鲁申身体有病，每年夏天都要到克里木去，那里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犹太人集体农庄。

(审判)长：难道费费尔就没有同你谈过向克里木移民的方案？

霍夫斯坦：没有，是米霍埃尔斯同我谈的。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是公开同你谈的吗？

霍夫斯坦：是的，他说将在克里木建立一个共和国或是自治州。

(审判)长：就是说你是从米霍埃尔斯讲的话里才知道克里木的事的吗？那么你1月5日供述了这回事，而费费尔是1月11日供出的，这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

费费尔：我说过，在侦讯的过程中首先供出克里木方案以及

据说是美国政府仿佛要在这件事情上给予我们援助的是霍夫斯坦。可以让霍夫斯坦说一说，他是什么时候同米霍埃尔斯谈克里木的事的，又是在什么地方谈的。

霍夫斯坦：是在古比雪夫。

费费尔：是在我们去美国之前吗？

霍夫斯坦：是的，是在你们去之前。那是一天晚上，米霍埃尔斯和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共进晚餐之后的事情。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当时他的心情很好。

(审判)长：这是在1942年吗？

霍夫斯坦：是的。

洛佐夫斯基：我请求把霍夫斯坦关于登陆场以及美国政府的援助的供词宣读一遍。这非常重要。他这是从哪儿想出来的呢？

(审判)长：侦讯时霍夫斯坦供道：“在苏联政府没有允许把克里木交给犹太人之后，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费费尔及我的其他同谋们并没有放弃他们那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想法，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努力通过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期望着战后时期国际形势会朝着美国将有可能对苏联解决犹太人问题发挥影响的方向变化”（卷13，案卷页173）。

霍夫斯坦：这不是我惯用的词句，可是这上面倒是我签的字。

(审判)长：那么你这样供述又做何解释呢？

霍夫斯坦：太轻率了（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甚至不知道这该叫做什么。

洛佐夫斯基：我想，从方才宣读过的这段霍夫斯坦的供词能看得出来，他对国际关系是十分“精通”的，并且“清晰地”预见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

(审判)长：现在我们来调查控告委员会往美国寄送间谍情报这一项。

洛佐夫斯基：或许一开始能允许我讲一讲苏联情报局里工作是怎样组织的，因为就这一问题也对我提出了控告，有孔达科夫的供词，另外，孔达科夫写给谢尔巴科夫的一些信件（我）是到这儿以后才看到的。

（审判）长：你难道以前没看到过这些信件？

洛佐夫斯基：没有。孔达科夫是亚历山德罗夫安插的人，以后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亚历山德罗夫是宣传鼓动处的处长，孔达科夫是他的副手。

我想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和亚历山德罗夫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和他就有冲突。从一开始他对孔达科夫的态度就很奇怪。孔达科夫写了一些报告给谢尔巴科夫，而且不对我说这件事。

亚历山德罗夫把孔达科夫派给我作责任秘书，但是没有预先告诉我，他知道这个人不正派，被撤了职。

当初孔达科夫曾显露出其贪婪的本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去谋私利。他开创自己的事业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一本有 25 个印张的谚语。由此他获得了几万卢布。为了这件事，他被作为手脚不干净的人撤了职。可是你瞧，这么一个人作为责任秘书竟然支配起苏联情报局的预算拨款来，而我们的预算是很庞大的。

（审判）长：我们知道孔达科夫有过盗用钱款的行为，可是他写信的目的并不是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是反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他的盗窃行为还不能作为不相信他对委员会的工作所做详述的理由。

然而后面卷宗里有一些事实说明孔达科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对待洛佐夫斯基态度不公正。根据洛佐夫斯基的请求，在苏联情报局组织了一次财务检查，结果查出孔达科夫用苏联情报局的钱款购买了一架 18000 卢布的照相机送给亚历山德罗夫做礼物。

洛佐夫斯基：这份送给亚·谢·谢尔巴科夫的报告结果如何呢。孔达科夫是亚历山德罗夫安插的人，干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商量好了的。那么谢尔巴科夫为什么没有反应呢？他是中央书记。只要他手指动那么一动，整个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命令委员会停止活动对于中央书记来说那是小事一桩。孔达科夫的报告已经从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馆，谢尔巴科夫的档案中提取出来了。为什么谢尔巴科夫没有在孔达科夫的报告上写下一条批语呢？我，比如说，就知道，谢尔巴科夫很不赞成孔达科夫这个人，因为他了解早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工作的时候，孔达科夫就暴露了他贪财的本性。

另一方面，谢尔巴科夫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也是一样，就是做鼓动工作总是难免有过头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样，在孔达科夫写的报告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指示。

我想，在我到他那儿去，我们一起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在他说该派几名工会工作者到那里去这种话的时候……

（审判）长：派布雷格曼等几个人去那里这个问题是在孔达科夫把他的报告交上去之后才讨论的吗？

洛佐夫斯基：是的。应当注意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这是能够说明孔达科夫的为人和他的整个路线的。他总是做亚历山德罗夫暗示给他的事情。

他可以把问题在党的组织里提出来，可以来找我，说我发现了什么什么情况。假如我对他说他做得不对，他可以到中央委员会去控诉我。

№ 1170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5月31日)

(审判)长：……你说明了苏联情报局和各个委员会总的工作制度。讲了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应该阐述一些什么样的课题，以及材料是怎样寄送到国外去的。

现在我们该说鉴定的问题了。在第32卷里有一张鉴定书，这份证书说明，从美国发来的咨询具有侦察的性质，说得确切些，对这些咨询的答复必定要包含着国家的机密。

这份鉴定书的第二个结论是委员会发给自己的新闻记者和比罗比詹领导人的那些咨询，包含了要求寄送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的内容。最后，第三部分指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通过寄送文章——其中包括翻译已构成苏联国家机密的关于农业、工业等等方面情报的文章——这种途径，同美国的反动阶层保持着经常性的间谍联系。

对你提出的控告是你协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了所有这些活动。

洛佐夫斯基对法庭详细讲述了苏联情报局内实行的向外国的通讯社和新闻机构分寄情报材料的程序。

接下来审查了同边·戈尔德贝格在苏联逗留相关的各种情况：是什么人组织的这次旅行，是否向戈尔德贝格转交过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

洛佐夫斯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从美国回来，先给我后

又向维·米·莫洛托夫做了报告，另外还去见了谢尔巴科夫，他俩告诉我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戈尔德贝格一直在美国积极地做着有利于苏联的工作。你们自己也明白，在战争时期我们一直同那些支持苏联的人保持着联系，不过当然不是间谍联系。在这里一说到联系，就一定要想是间谍联系。我以后再给你们讲他俩和戈尔德贝格会面、我和他们两个会面的情形。

洛佐夫斯基对法庭讲，戈尔德贝格把关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这份材料转给了他。这份材料是应洛佐夫斯基的请求在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里准备的。

洛佐夫斯基：科马罗夫连苏斯洛夫的签名都给我看了。我从普赫洛夫手里拿到这份材料之后，把它翻看了一下。研究所关于英帝国主义能写出什么新玩艺来呢？莫非说我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还是秘密吗？在我们的报刊上关于这一点已经写了30年了。

（审判）长：你交到外国人手上一份让帝国主义国家了解我们对英国殖民地政策的情报工作的深度的材料。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尽力不予以公开的。

洛佐夫斯基：我现在就来讲这个问题。就算我现在犯了这样一种罪行：向这家研究所预定了这样一份材料，他们把材料给我送来了，而我又把材料转交给了一个外国人。可是这份材料是在侦查人员手里的。如果说这材料具有谍报的性质，那么为什么没把这样一个物证归入卷宗里呢？科马罗夫上校曾答应把这份材料给我读一遍，可是只拿出来让我看了一下。

（审判）长：他给你宣读过单独摘引的一些段落吧？

洛佐夫斯基：是的。我对这种做法感到好笑。他对我许诺说所有这些材料我还有机会看到。我在3年期间有10次请求侦查人员给我看一看这是些什么机密材料。我为这个东西是要掉脑袋的。科马罗夫上校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已经升为将军了，因为已经有3个年

头过去了，可是这份材料依旧得跟他要，我确信，假如那里边哪怕只有那么一行带有谍报的性质，那这份材料也会放进这里边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定成死罪，而材料却不必给法庭看。我要问一问，这难道是对待一个把一生中的 50 个年头都献给了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作的人的苏维埃式的态度？！

我被控告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我希望法庭能了解一下这些材料的内容。

(审判)长：在你通过尤泽福维奇把这份材料交给戈尔德贝格的时候，你看到过这份材料吗？

对洛佐夫斯基提出控告，说他通过泰乌明传递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情报。

洛佐夫斯基：……对质时她供述过，她收集的是一些什么材料，那里边是报纸上先前已发表过的一些数字。我了解泰乌明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有政治嗅觉，她不会放过会使苏联丧失威信的地方。

起诉书中说，她曾按照我的指示把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情报转交给了戈尔德贝格。就算是这么回事，可是这份间谍材料在哪儿呢，为什么没有把它附在卷宗里？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间谍在传递材料的时候，并不总是给自己留下一份副本的。谍报材料最常见的是秘密传递。

洛佐夫斯基：一点不错，问题就在这里。弄到最后我们的整个这件事却搞得很特别。我们就像起诉书中指出的那样，传递间谍情报，还在档案中留下情报的副件。后来安全部的人员来了，把全部东西都拿走了。怎么可以控告我办这种荒唐事呢？假如我想传递谍报，那么我做过多年的秘密工作，难道还会给安全部留下一份谍报的副件不成？这明摆着是太荒诞离奇了。

我在同泰乌明对质时曾问过她，副件在什么地方，她回答说不知道。可我知道这些副件在哪儿。安全部的侦查处有泰乌明转交的全部材料的副件。这是库兹明中校告诉我的。能够允许把一个人告上法庭，在政治上和肉体上判处死刑，而却把提出控告主要依据的文件秘而不露吗？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我现在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假如这些文件里真有那么一点点机密的话，难道还能不把它们附到卷宗里面吗？把一些书从犹太文、英文翻译过来，惊动了一大群专家，写出了他们的鉴定结论，而这些用俄文写就、不需要任何专家来进行鉴定的文件却没有收进卷宗里面来。

据此我认为，控告我转交了什么间谍情报，控告我作为一名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联共（布）中央委员，背着党和政府同美国的一名什么新闻工作者建立了什么间谍联系——所有这一切罪名都是造谣诽谤，这样做的意义和目的等我供述完毕你们就清楚了。

在对这条所谓的间谍联系的罪状陈述完毕的时候，我还想再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规矩，每当从外国有哪一个能为苏联做些有利的事情的人来到，相应的组织要为他举行招待会。根据来到的人的级别、形势等等，招待会的规模可以安排得小一些或是大一些。如果看一下斯拉夫人委员会的预算，那么就会知道，它举办的这种招待会比其他的委员会要多出好几倍。

（审判）长：是谁制定的接待戈尔德贝格的计划？

洛佐夫斯基：我只知道我批准了招待会要花的钱。

（审判）长：多少钱？

洛佐夫斯基：大概是5万~6万吧。我拨了招待会的费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就该自己去决定干些什么，怎么干。我后面再给你们说，是谁在搞民族主义的秘密活动。这种招待会其他的委员会也办。这在政治上是需要，我们就这么办了。

现在说诺维克的事。起诉书里说，我还曾努力争取让间谍诺维克获准入境。他是1946年秋天来的，那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7年间同办理苏联的入境签证工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共产党主席（他是我的朋友）、工人、老五金工福斯特在会议上见到我的时候说过，诺维克是他们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在美国为苏联而战，干得很棒。

（审判）长：诺维克是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吗？

洛佐夫斯基：美国共产党有好几份机关刊物。《工人日报》以及共产党的犹太文报纸《自由晨报》。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都是由各个国家，特别是从俄罗斯迁来的。福斯特说诺维克是一个很好的年青人。除此之外我对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作为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来到莫斯科，请求我接见他（我是苏联情报局的局长），我当然接见他。我接见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坏家伙，现在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来了，我怎么能不接见他呢？因为什么呀？书写起诉书的那些人断言，我接见过间谍分子诺维克和戈尔德贝格。调查清楚安全部机关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两个人是间谍的倒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他们在这两个人来之前就知道，那为什么放他们进入苏联呢？这事是取决于他们的。既然他们放这两个人到我国来了，那就是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对这个问题他们是应该知道得比我多的。假如说他们是知道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那么他们即使不想预先通知洛佐夫斯基，至少也应该预先向联共（布）中央报告。这就是说，安全部机关完全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接见了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并据他们说还和这两个人仿佛建立了“间谍联系”作为一种罪名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在苏联情报局任职期间，接见过不知有几百名新闻记者。来

找我的有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等等，可是这个美国的犹太人一来，我立刻就栽了下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再说，诺维克来的时候，委员会已经和我毫无关系，接待他的那笔4万卢布的费用是谁给的？是苏斯洛夫。这样看，他也是犹太民族主义者吗？这真让人难以想像。

这就是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安全部，或者是我都没有理由怀疑他。如果是费费尔说诺维克在苏联“东寻西找”地收集间谍情报，那这纯系诽谤。如果说我本人并不了解诺维克，那么有人几十年来对他一直是了解的，也了解他的工作。可见，安全部的机关是在他们离开以后才得知他们进行了有害的活动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要给我加上我事先对这不了解的罪名？难道是我的机构比安全部的还好吗？是我的机构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派有自己的代表吗？

(审判)长：费费尔，侦讯时你曾供认（卷2，案卷页84）“戈尔德贝格同我和米霍埃尔斯第一次见面，就恶狠狠地指责我们态度消极，并且说：‘对你们很不满意’”。你的这些供词属实吗？

费费尔：没有谈过这样的话。他只是说了：“罗森贝格对你们不满意”。

(审判)长：不满意什么？

费费尔：我们同他们进行了谈判，签了合同，过后却断绝了一切联系，他对这个不满。

洛佐夫斯基：三天前审讯时，费费尔说过，戈尔德贝格告诉他们“对你们很不满意”。

费费尔：没有说。

洛佐夫斯基：事实是谈过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政治手腕，而不是什么风言风语。

(审判)长：费费尔，我宣读过的你那些供词是真实的吗？

费费尔：不，那都是捏造出来的。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的供词里边捏造的东西还会有很多的。

洛佐夫斯基：……鉴定调查确认《埃尼凯特》报上的许多文章有民族主义的内容，但奇怪的是对这家报纸的调查是在 1947 年年中进行的，既不是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进行调查之前，也不是与之同时。

这其中的原因是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处处长职务一直到 1947 年年中，他自然是不愿意让一个什么小组来检查他所负责的那些事情。

（审判）长：这是你的推测。

洛佐夫斯基：这不是推测，而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亚历山德罗夫是一个不正派的人。我在监狱里已经被关了 40 个月，已经不了解世上的事了。我不知道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亚历山德罗夫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确信他早晚得被从党内开除出去。这种人不能待在党内，党不能容忍这种人，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想请法庭注意（如下）一点，即鉴定人员在对《埃尼凯特》报做出他们的结论的时候，他们都列明了报纸的日期和期数，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然而在鉴定人员做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寄到国外去的那些文章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一结论的时候，却没有文章的写作日期。为什么没有日期呢？为什么没有指明，某某篇构成了国家机密的文件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什么时候寄往美国的呢？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有意回避呀？我感到不写这些日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而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注册单据的，上面列着：作者，国别，刊印机构，寄往地，寄发日期和三个人的签名。恰恰是这些最重要的文件不仅没有注册单据，而且连日期都没有……这不奇怪吗？可每一篇文章的副件在档案库中都是连同注册

单据一起保存着的。这还算是是什么间谍活动的组织人啊，竟然让附件留存了下来？

(审判)长：你对认定这些材料有机密性质的鉴定结论有什么话要说吗？

洛佐夫斯基：我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除了3或4篇之外，鉴定人员在所有这些性质对国家有害的材料上都没有加上日期。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这事我想知道，我想法庭也想知道。我敢说，这些材料有十分之九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组检查完毕之后寄出去的，是在海菲茨这位安全部的老资格工作人员被派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工作之后，是在报刊划归他直接管辖之后寄出去的。否则就无法理解海菲茨为什么遭到逮捕……

……自1942年4月至1948年11月末委员会进行工作的7年中，平均起来说准备了40~50篇文章。7年发现了50篇文章，就是说年均7篇。难道说间谍中心是这么个活动法吗？

所有这些文章可以分成几个类别。这50篇文章中有一些是带有明显的谍报性质，还有一些文章挂着“不宜发表”的名称。

(审判)长：你这是说的鉴定的分类办法，还是你的看法？

洛佐夫斯基：这是我的看法。举例说，我认为关于有色冶金的一篇文章是有危害的，尽管它曾发表在《红海军》日报上。那就是说，有什么人钻进了《红海军》日报，给这篇文章放了行，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机关里有人抓到了这篇显然是有害的东西寄出去了，但是首先要对这篇文章负责的是《红海军》日报的编辑。

《听维·米·莫洛托夫做报告》这篇文章我认为也是有害的。而且鉴定断言数目字引用错了，在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没有这些资料。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寄出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危害行为，是间谍活动，你想说它是什么都可以。

此外，还有一组文章被鉴定为“不宜发表”。这些文章本来是

不该发表的，但是它们却被发表出来了。而且鉴定也加上了一条，说如果这些文章先前曾在某家苏联报刊上刊登过，那它们还是可以发表的。那么说，这已经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文章了。

最后是第三种类型——我个人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谍报性质的文章，尽管根据目录看也许不该把它们寄出去。这些文章是什么时候寄出去的，我就说不上去了。

在《听维·米·莫洛托夫做报告》这篇文章中写着，这报告是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 28 周年的。

(审判) 长：这显然是 1945 年 11 月了？

洛佐夫斯基：那个时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苏联情报局系统内。那儿写出了作者是谁，我记不得姓什么了。

(审判) 长：谢格洛夫。

费费尔：谢格洛夫是法捷耶夫的助手。

洛佐夫斯基：如果文章里边有对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进行歪曲的地方，而这是政府的正式报告，我们都知道对这类报告是怎样看待的，如果文中哪怕有一个不正确的数字，我是要对此负责的，但是我无法想象其中加进了间谍情报。一个在苏联作家协会给法捷耶夫作助手的人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来呢。莫非说他是一个破坏分子？我从未见过谢格洛夫，但是我认为，如果这里边列出了什么莫洛托夫报告里边没有的数字——那就是危害行动。

(审判) 长：你承认有一部分文章确实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吗？

洛佐夫斯基：是的。可是我无法说出是哪一部分，我无法说出所有的文章来，也说不出这些文章什么时候写的。

虽然工作小组认定所有前面举出的这些文章都暴露了国家的机密这一点是正确的，我还是要声明，它们有一半以上都是委员会已经不再归我管的那个时期的。有几篇文章带有明显的危害性，具有间谍性质的特点……

(审判)长：所有这些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洛佐夫斯基：由寄发这些文章的人负。

(审判)长：具体说是谁呢？

洛佐夫斯基：我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有编辑对文章进行加工，有高级编辑进行审查，有责任编辑和责任秘书负责一切。我作为这一机构的领导人不能说我在这方面没有罪过。在审讯中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对所有其余的委员会和全部的作品进行检查，那么这种文章就不是40篇，而是5倍于此数了。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间谍中心——那就不对了。这不是间谍中心，而是一般地漏过了材料，尽管漏过的材料是有害的，但数量并不大。

我不能说这是恶毒地蓄意损害苏联。比如说，这儿出来个法捷耶夫的助手谢格洛夫，我并不认识他。他为什么突然间对莫洛托夫的报告进行歪曲呢……

(审判)长：现在我们来看鉴定对民族主义宣传问题所做的结论。鉴定证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仅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变成了民族主义的中心，干起了并非它分内的事情。费费尔和其他的人在预审时对此做了供述。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领受了哪些任务他已经说过了，以后也还是要说的。

(审判)长：鉴定在结论中指出：“根据对提供给我们的文件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这些文件证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原领导人员广泛地宣传过民族主义思想。

这表现在：

1)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原领导人员在当众演讲、文章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宣传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和民族主义的独特性……等等”（卷33，案卷页48）。

洛佐夫斯基：我想起来了，根据对 122 份文件的分析，鉴定做出了三点结论……

显然，这 122 份文件中有一些是取自《埃尼凯特》报的，那份报纸是受别人监督的，这些文章和我毫无关系。至少有 40 或 50 篇文章是经过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机关的手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不属苏联情报局系统那个时期寄到国外去的。这些文章是否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呢——是的，无疑是这样的。我读过一些摘录。其荒诞不经令每一个苏联人注目。那里摘引马尔基什的民族主义的诗和费费尔的作品，那里引用一些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而内容上却是民族主义的文章。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隶属于苏联情报局系统期间把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送了出去，我在政治上或刑事上负有责任。但我完全负责地声明，这些文章我没有审阅过。

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允许用苏联的钱往外寄送伊马姆·霍贾的文章，他鼓动同法西斯进行斗争是以可兰经为依据的。但这是需要，我们就这么办了。

在全部的文章当中，有自吹自擂性质的，有流露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等等，因此对所有这些文章都必须分别加以分析。有民族主义色彩浓的，有民族主义色彩淡的，《埃尼凯特》报上曾发表过一个这些文章的百分比数字。假如我对这一切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的话，那我本是可以把这些文章说个明白，提出一个评价的。但是我要再一次声明，我与此毫不相干，我也不对费费尔背着我的事情负责。党信任我，我也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一切事务。请问，民族主义的体现者和思想上的鼓舞者究竟是谁呢？我不能说这就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整个主席团。我也不能把这一条罪状加给布雷格曼。他做的是社会—苏维埃的工作，与此毫无关系。

把这归罪于古别利曼——我也不能。

把这归罪于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我还是不能，因为她每月只到委员会来一次，和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那儿是有一伙人，他们对我隐瞒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意向。根据所能做出的判断说，这些人就是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从费费尔的供词看来，爱泼斯坦也是这样的人。

而整个主席团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这种话我不能说。费费尔说得对，那5个据说仿佛是我派去使民族主义活动保持秘密状态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来到，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及其一伙就担心发生争吵而开始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

即使承认鉴定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并且假定这120篇文章全都是在我和他们还有关系的那一段时间发到国外去的，我也认为这只是流向国外去的东西中为数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他们所有那些民族主义的越轨思想、倾向、超越所规定的任务范围的企图是要可怕得多的。这不仅仅是破坏了苏联的指令，而且是企图建立一个会成为所有犹太人在苏联的代表机构的那样一个中心。有人说，他们鼓吹非阶级性，然而就是在米霍埃尔斯的身上我也没有看出非阶级性来。有人说他是不事劳作的老爷，可我看他是个放荡不羁的浪漫派，而不是那种喝酒花个精光连袜子都没得穿的老爷。也许他们表现自己的企图是背着自家的主席团的。这正是这里所说的那种秘密活动，即力图通过非法的反苏的方式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一个据说是仿佛代表着苏联所有犹太人的组织，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苏联为数不少的市镇犹太居民中也没有哪一个群体接受他们这样做的权力。

我坚决而断然地谴责这里所说的那种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而不论在委员会归我管辖的那一段时间里有过多少篇这种文章。

第二，我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对这一时期所出的那些文章负有责任。

第三点，我认为苏联的司法部门一定会查清每一个人的罪行轻重的，它之所以是苏维埃的司法机关，正是在于它对每一个人的罪责都能做出公正而具体的审理。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犯罪人员，他们参与犯罪的情形也不尽相同。

(审判)长：在委员会里讨论过参加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问题吗？

洛佐夫斯基：那是在我脱离开之后的事。我想做这样一个结论：阅看这些材料和控告的全部罪状，得出这样一种情景，就是控告所依据的事实几乎全部都在1946年底，1947和1948年内；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和委员会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委员会已归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管的那一段时间里。

(审判)长：现在调查“黑皮书”问题。

洛佐夫斯基：你已听到了费费尔的供述，他在这中间指出他们对我隐瞒了他们将去美国的事。他们谈妥要出版“黑皮书”。我现在讲一讲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出了这一切事情。行前他们产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写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呢。要知道等他们到达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我可以用电报答复他们。可他们却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到达美国，同戈尔德贝格进行了会谈，然后收到了他们从那边发来的电报，说美国人提议出版“黑皮书”。你看得出来这是多么用心的安排呀。

他们给这边发电报，说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他们一点也不惹人注意，而实际上这是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早在动身之前就相互商量好了的。这从费费尔的供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

(审判)长：预审时交给你看了对“黑皮书”的鉴定结论：该书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你对此也表示同意了……

洛佐夫斯基：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对什么表示同意。

在我们收到建议出版“黑皮书”的电报时，只知道一点，书中应当收入希特勒匪徒在欧洲犯下的残暴兽行的材料，这样一来，这材料就会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我把这一提议报告给了谢尔巴科夫。谢尔巴科夫考虑的结果是：如果能够共同收集这种材料并用来反对希特勒，那就应当做。我也是这种看法，我对此负责。我发出复电——准许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这个“美国犹太艺术家、作家协会”共同出版这本书。我们确信这是美国人提议的，而事实上，如这里揭露出来的，是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自己把这种想法暗示给美国人的。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机关里开始收集材料，而且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一场斗争。不是为材料的质量而斗争，是两种路线的斗争。爱伦堡主张“黑皮书”“在苏联出一本俄文版的，在美国再出一本英文和犹太文版的”。我反对这种主张，我说我不希望在苏联出这本书，因为苏联有自己的组织，“黑皮书”应该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事情乱成了一团，我不得不组织一个以布雷格曼为主席的委员会，成员有尤泽福维奇，谢韦林，舍伊宁，鲍罗廷，特罗扬诺夫斯基，等等。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因为材料有犹太文的，有俄文的，还有英文的。这个委员会把全部材料通读一遍之后，报告我说那里边有好多不能公开发表的东西。可这时爱泼斯坦已经把一部分材料寄走了。我指示这些材料在委员会审查完毕之前禁止印行。

1945年底全部这些材料完成拼版，英文版样也寄来给我们审查。结果怎么样？委员会审阅过这份材料（英文文本）之后，把校样寄到美国去了。爱泼斯坦给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我们的委员会发现其中有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和一些从耶路撒冷被击破谈起的犹太民族的历史问题。这份材料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没有一点关系。我只好发电报要求不要把这篇文字排进去。

收到答复说爱泼斯坦同意撤下他写的这篇序言。话大致是这么

说的，如果莫斯科的人不希望有这样一篇序言，那么这篇序言将被撤掉。

委员会对文本做了几处修改。泰乌明在这里做供述时说，谢韦林感到疑惑，他认为这些材料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当时谢韦林什么也没说。这是后来想象出来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一位很好的同志。假如他当时告诉过我，我们有些疑惑，我是会暂时停止寄发材料的，但他根本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鲍罗廷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做出结论之后，发出了准予付印的电报。书是1946年初印好的。到这个时候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正在为纽伦堡审判做准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给纽伦堡审判送去成千上万册这类叙述法西斯匪徒的残暴兽行的书。我认为，这样一本凝缩着一切记述希特勒匪徒犯下的残暴兽行文章的书应当送到纽伦堡审判上去，因为那儿有成千上万的记者，这就意味着让全世界都注意到法西斯匪徒所犯的残暴兽行。那里有数千人，数千册书也被分发一空。

现在来看这本书的实质。这本书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鉴定虽然做出了总体的结论，但是着重强调的却并不是应当强调的东西。那里边从书中摘引了一大段话，这段话是说犹太人为发展德国的科学、工业等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希特勒匪徒还是把他们全都消灭了。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去关心那些被消灭了的德国犹太人。必须说，窒息性毒气是犹太教授加布尔发明的。这对他也是个小小的荣誉，可是就连他后来也被希特勒匪徒勒死了。“黑皮书”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难道说这是民族主义？不，这是直接打在坐在受审席上的那个人脸上的一记耳光。我们对这本书做了清理，不过那里边也许还漏下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段落和地方，可这本书终究还是承担了类似于第6名控诉人的发言的那种特殊的任务。另外，民族主义并非总是反动的。在殖民地国家里民族主义甚至可能是革命的，列宁曾经讲过，我们对它表示

支持。在沙皇俄国民族主义曾具有革命性，而在我国民族主义无疑是反革命的。对于“黑皮书”中的民族主义应当从纽伦堡审判这个历史观点来看待。应当讲，从这种观点来说“黑皮书”对苏联是有益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禁止此书在苏联出版那也是正确的，因为苏联人并不需要这本书。在我们国家希特勒匪徒入侵的苦难是各个民族都经历了的……

（审判）长：可是这本书不能单独地，而应同委员会的全部民族主义活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你是想把它看做是一个单独的事实。

洛佐夫斯基：不是，我是谈所有的问题。

（审判）长：关于“黑皮书”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洛佐夫斯基：有一件事这儿不知道怎么漏掉了，我想把它说清楚。事情是这样的：除了这本在美国出版、专门空运到纽伦堡分发出去的“黑皮书”之外，还曾试图另外再出版一本俄文的“黑皮书”，这本书的编辑是爱伦堡。爱伦堡希望出版的这本书（参与该书编撰工作的既有俄罗斯作家也有用俄文写作的犹太作家）除了记述残暴的兽行之外，还要反映出苏联人是如何对待这些兽行的。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对它不感兴趣，这是爱伦堡对我讲的。这个方案是爱伦堡想出来的，为此作家们还相互大吵大闹了一通。应该说这不光是一本书的事，还是关系到收入的问题。作家每写一篇文章可以拿到几千卢布。

5月31日20时2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6月2日11时10分继续开庭。

№1170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2日)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审判庭再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审判庭说吗？

洛佐夫斯基：我有几点补充。

(审判)长：说吧。

洛佐夫斯基：首先我想说，普赫洛夫把第205研究所编制的材料问题弄错了，他说转寄了约800页的工人运动方面的材料，可起诉书中却说洛佐夫斯基把有关英国殖民政策的材料交给了戈尔德贝格。戈尔德贝格返美后出了一本书，在书中他对苏联的对外政策给予肯定，却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我没有亲自读这本书，而只是读了《埃尼凯特》报上“底栏专论”对此事的介绍。从文中所引的摘自此书的段落可以看出，这本书对苏联来说还是好的。我觉得，既然把同戈尔德贝格的会见认定为间谍活动，那么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戈尔德贝格就是个中心人物，可是所发生的一切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人家来了，我同他进行了间谍性质的会见，向他转交了间谍材料，可是他返回美国之后，却突然写了一本书，对苏联的政策给予肯定，对美国的政策却进行了批评。那就是说，用在这个人身上的钱并没有白花啦？

(审判)长：你说的是戈尔德贝格写的小册子“苏联——是敌人还是朋友”吗？

洛佐夫斯基：我看侦查人员该委托鉴定专家们给这本书下个结

论，明确表示这书是充满敌意的或者不是。

我草草地把这42卷浏览了一遍。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有的人，不光是法庭这儿在场的人，还有那些作为证人提供证词和在这一批人的范围之外受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大谈特谈我的事。我可以举出希梅利奥维奇作例子，我跟他没有见过面，甚至连在电话上都没谈过话，可是他的供词里竟有10页是讲我的。对我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评价怎么竟如此地一致呢？我想做些解释。事情是这样的：对于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来说，让其他人切实想到他们3个人是受到显赫人物庇护的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就出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传闻，出自米霍埃尔斯之口的消息，说他和热姆丘任娜等人关系很好。

一方面说他们有莫洛托夫夫人的庇护，另一方面又说还有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提高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威望，是明白显示他们并不是自作主张去干的，而是处在得到联共（布）中央和政府信任的一些人物的庇护之下的需要。这是一种政客手腕，米霍埃尔斯把它表演得很出色。所以说证人们关于我的证词外表上的一致，产生于米霍埃尔斯散布的那些流言，结果就成了我是灵魂，是领袖，是推动力量，等等，等等。

现在说下一个问题。对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了。写《听维·米·莫洛托夫做报告》一文的那个谢格洛夫，从鉴定的结论看，事实上是向国外递送了间谍情报。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仅递送了间谍情报，而且还歪曲了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我看，如果谢格洛夫干了这些事情，那就应该把他归到我们这一批人里来。如果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没遭到逮捕，也没被起诉，那么我为什么要代他负这个责任？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没有被捕，那就是文章里边没有间谍情报，如果这是间谍情报——就该把他抓起来。这里有点不对劲，所以我有一个请求，请法庭把谢格洛夫的文

章同莫洛托夫的报告核对一下，看一看那里边是否真的有歪曲的地方，他是否真的把这篇报告改变成了间谍情报。如果在这个地方出了错，那么在一系列的材料里都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下面就给你们讲这种不对头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告诉你们，在我的苏联情报局的职务被解除之后，我在离开那里的时候带走了两份文件。我要说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文件。这是一张写着亚历山大·加宁名字的 100 美元的支票和一封写给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反映我的副手波诺马廖夫情况的信件的复制件。关于那张支票我必须说一下，因为这件东西放在了案卷里的什么地方。我收到《外交》季刊杂志编辑的一封长信，这是美国的一家季刊，一本很有名气的国际性杂志，通常都是外交部长们和大的国务活动家们在上面撰文阐述本国的对外政策。这家杂志的编辑请我本人或是我委托某个人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说杂志社将为这篇文章付 100 美元的稿酬。我回复说我不可能亲自写这篇文章，不过有一位专职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加宁博士（我的化名），这篇文章可以由他来写。我写了一篇反对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计划的文。结果就收到了以加宁博士的名字开出的这篇文章的稿酬支票。我就把支票放在我那儿了。我干吗去办这件麻烦事呢，得写委托书，经外交人民委员部证明，再寄到纽约去，这么一弄他们就知道了，加宁就是洛佐夫斯基。

第二件事，我已经说过了，我把给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带走了。这是我本人的信，我没有把它留下的原因是这样的。对苏联情报局的工作进行考察之后，1946 年年中波诺马廖夫（季米特罗夫先前的助手，后来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被任命为我的副手。我感到很高兴，以为有了副手，可以扩展我们的事务了，然而这是一位很独特的干部，他在中午 12 点来上班，3 点钟之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关起门来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情，3 点到 5 点接见人，然后就

走掉再不来了，可我却得一直坐到深夜12点钟。这种情况我一直忍了11个月，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无所事事，在这儿是住别墅休养，而不是干工作，我请求解决这个问题。我带走的就是这封信的复制件。

我为什么讲这件事呢，原因是这样的。在解除我的职务时，我不是被撤销职务的（在中央委员会的措词——罢免和解除之间是有一些细微区别的），政治局决定的第三点指出我的过错（除一系列的失误之外）是没能打入外国的大型刊物，例如国际政治的主角《纽约时报》中去。好吧，要想打进刊物里面去，那是得和记者们有某种接触，同编辑们互相通信的，不然怎么能够打入刊物里边去呢。可是现在又认为我的罪行是指示同大型的资产阶级报刊建立密切的联系，就是说控告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我还想强调一下，戈尔德贝格在这里的时候，除了经过批准为他安排的正式接待之外，戈尔德贝格、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之间不断地交谈着什么，这些谈话的内容没有人告诉我。阅读费费尔的3卷“著作”，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费费尔的供词中提到了100来个我不知道其姓名的人，他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诬陷，可是关于他自己他却只字不提。我在自己的供词中也对自己和另外两位妇女进行了诽谤。关于这两位妇女我说了假话。这就是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和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莫洛托娃。在这儿如果引用一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比喻，那么就可以这样说，被告人是分子，受他诬陷的人是分母。受诬陷的人数量增加得越多，分数的值就越小。

他在那里诬陷了很多人，这是明白无误的，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例如萨·马尔夏克曾经请求帮忙翻译他的诗，而在他的讲述中就成了马尔夏克也被拖下了水。

关于爱伦堡，费费尔做了供述，爱伦堡从来没有办理过专门的

犹太人事务，结果爱伦堡也就陷了进去。

这一切的政治意义何在呢？这一点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其政治意义是这样的：这里边有一个老谋深算的罪恶意图，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起诉，如果说完蛋，那也要如俗话说说的“有声有势”；牵进尽可能多的人来，其目的是让这件事通过以色列的大使馆或公使馆传到国外去。

(审判)长：请你对审判庭解释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侦讯时你承认了自己犯有从事反苏活动的罪行，可是现在尽管你的供词得到了其他被告，特别是费费尔的证实，你却要推翻这一切，这是为什么呢？

洛佐夫斯基：那你就相信费费尔好了……我肯定这一切都是费费尔干的，他是想通过以色列公使馆的特务们在国外掀起一场反对苏联政府查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埃尼凯特》报的运动。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审判)长：谁认为具有这种政治意义，是费费尔吗？

洛佐夫斯基：是的，是费费尔。

现在请允许我来做最后一点解释。1949年2月3日，在那份包含着一些政治上的以及其他各种样的荒谬之处的记录上我是签了字的。我现在只把这些地方讲一下，并说明我为什么在这份记录上签字。第一点。科马罗夫上校告诉我，尤泽福维奇在侦讯的时候肯定地说我随波逐流而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观点，等等。我会认为尤泽福维奇能够讲出我随波逐流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观点这种话，我(会)认可这种说法吗？而尤泽福维奇的供词我是直到我在那份记录上签字之后，过了14个月才看到的。我在记录上签字是1949年2月3日，而把审问尤泽福维奇的记录拿给我看是1950年3月25日。所以说我并没有见到尤泽福维奇的口供，而是听信了侦查员的话在记录上签字的。那上面关于克里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并断言

(我)已经猜想到了美国政府的意图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同犹太人移居克里木相关的计划。我看完这一部分就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但还是在记录上签了字。

第三个谬论是那上面说我从1939年就同情民族主义的观点,或者说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出于什么原因?那上面说,是由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对机关进行了清洗,把不适宜的人,其中包括犹太人从那里边开除出去,因此我就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1939年之前我领导过几个机构,而对国家机关的清洗从1917年10月开始就在进行……认为我由于一些不适宜的工作人员被赶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变成了民族主义者,那真是白痴,不过对这一条我也签了字……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要签字呢?

洛佐夫斯基:我签了字的最后一条——是我“为侦查机关于事”。我现在就解释我为什么要签字。其原因就是在连续8次的夜间审讯中,科马罗夫上校一个劲儿地反反复复冲我说:犹太人是下贱肮脏的民族,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卑劣的坏蛋,党内的一切反对派都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所有的犹太人在整个苏联到处“叽叽喳喳”地说苏维埃政权的坏话,犹太人想把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赶尽杀绝。科马罗夫上校对我讲的尽是这样一些话。我请问,这是什么语言?这是一个苏联人、一个苏联官员使用的语言吗?

(审判)长:所以你也开始诽谤所有的人。这不合逻辑。

洛佐夫斯基:我在这蠢话连篇、荒诞无稽的记录上签字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定要送到领导机关去的,人们在那儿读了全部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一定会明白,要么是洛佐夫斯基疯了,要么是这里边出了什么荒谬怪诞的事……

(审判)长:对你提出了控告,你就该或者是认罪,或者是予以否认而证明自己无罪。你方才所做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洛佐夫斯基：我对科马罗夫说出犹太人想把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赶尽杀绝这种话感到极为震惊。接下来他又说，我必须承认控告的全部罪状，不然的话，他就把我交给他的那些侦查员们……接着就是一个没有被记入速记稿中的“数学公式”，然后他说，那些人会把我关进单人囚室里活受罪，用橡皮棍子把我打得以后再也无法坐着。我当时对他们说，我宁肯死也不去受这种刑讯，他们却告诉我，不会让我一下子就死掉的，我得慢慢地死……

(审判)长：你就害怕了？

洛佐夫斯基：不，我没有害怕。接着科马罗夫开始讯问莫斯科的负责干部中哪些人的妻子是犹太女人。我回答说我没收集过这种情报。他告诉我，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任何权威人物，有了必要，把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莫洛托娃也抓起来了……再下来他让我供认我同卡冈诺维克和米霍埃尔斯据他说仿佛存在的联系，尽管我已经向他证明过几十次我和这两个人没见过面，我和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于是我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把自己诽谤一通，在他们写进记录里边去的所有那些东西上签个字，等以后到了法庭上我再讲清要案侦查处副处长科马罗夫上校是怎样进行侦讯的，他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不符合苏联精神的行动。这就是我在这种记录上签字的原因。你会说——这是前后不一致。这是很一致的，我没有别的办法。1950年3月25日把前两卷拿给我看，在那里边被列为被告人的还有热姆丘任娜、索尔金、科特利亚尔、加尔金及另外的11个人，这些人后来被从本案中去掉了，现在只剩下了坐在这厅里边的15个人。后来我读完了这些材料之后，我被带进一间房子里，屋子里坐着军法少将尼古拉耶夫，有人让我签字证明我没有任何声明意见。当时尼古拉耶夫什么也没问我，我就走了，心想既然通常是审批延长拘捕期限的尼古拉耶夫在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就可以请求他接见我。

我经过侦查员递交了这个申请。

(审判)长：为什么你在尼古拉耶夫那儿的时候不亲自对他讲呢？

洛佐夫斯基：当时科马罗夫在场。

(审判)长：那又怎么样，这并不会让你感到发窘的。

洛佐夫斯基：我希望到开庭的时候，把一切都向法庭陈述明白。假如我当时有机会单独见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员的话，我会把一切都对他讲的。可是科马罗夫把我叫了去，对我说我没有必要找尼古拉耶夫谈。

就这样我没有机会同侦查员以外的任何人交谈或是在侦查员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话。现在我把什么都对你讲了，请你看一下，从我签了字的这份记录开始，供词的篇幅越来越大，就看关于克里木等等问题的这一些就知道了。当然，你会说这是前后不一致，可是在当时我所处的那种环境之中我又能怎么办呢……

(审判)长：1952年2月28日副总军事检察长、军法少将基塔耶夫对你进行审讯，你也是完全确认了自己的全部供词。

洛佐夫斯基：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如果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意识地做的。

(审判)长：什么叫有意识地做，你有什么权利对苏联总检察长的代表有意识地说谎？

洛佐夫斯基：我现在告诉你。我除了在1950年3月25日见过尼古拉耶夫少将之外，我还见到过3位出席过侦查员对我进行审讯的检查长，这就是科茹拉大尉，普里霍季科少校和基塔耶夫少将。可是这些次审讯总是有侦查员在场，所以现在我对法庭讲的这些事我那时一点也没说。假如当时基塔耶夫是在没有侦查处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叫我去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要怕库兹明呢？

洛佐夫斯基：那倒不是，可是所有的侦查员都是执行科马罗夫的指令的……

(审判)长：还是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你以前对检察机关的代表甚至一点都不讲，而现在却要对法庭讲？

洛佐夫斯基：因为坐在法庭上的不是侦查员，我所有的话都是我怎样说就怎么记，而不是侦查员们需要怎样就怎样记。

假如我先前有可能给约·维·斯大林或是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写信的话，我是会把这一切都讲出来的，但是我没有这种可能。

我告诉你我还干过一件什么事。

我曾和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对质过。侦查员问我认不认识她。我回答说认识她 20 来年了，她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另外，我们在维·米·莫洛托夫偕夫人一同出席的各种招待会上也常见面。“对波林娜·谢苗诺夫娜你了解一些什么？”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什么有关她的特别情况，不过米霍埃尔斯曾经对我讲过，她爱看犹太戏剧，关心从波兰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我想，在对质时应当讲点什么对侦查员来说是合情合理而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又不合乎情理的事情。我就说，有一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我曾请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对维·米·莫洛托夫提醒一下。我记不准这封信说的是什么问题了，我想可能是关于地方上来的一些申诉吧。这封信是有的。我说的这种话对侦查员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假如维·米·莫洛托夫要是能读到我的这些供词，他一定会哈哈大笑的。我是维·米·莫洛托夫的副手，我哪里用得着对波林娜·谢苗诺夫娜提出这种请求啊。

(审判)长：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些细节。

洛佐夫斯基：怎么会不需要呢？

(审判)长：你讲自己事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并不审理的问题。你讲自己的事情。

洛佐夫斯基：我这正是说我自己，因为在荒谬的供词上同侦查员达成一致的这种办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审判)长：你自己想出来的各种各样事情太多了，可现在你又把一切都轻轻巧巧地推卸掉了。

洛佐夫斯基：这可不轻松，这是很痛苦的。我除了在这些供词上签字，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熬到开庭的日子。我诬陷的是我自己，而没有诬陷旁的什么人，我认识的人要比例如说费费尔认识的多10倍。关于所有的人都向我问到了：关于布雷格曼、尤泽福维奇的党籍问题你了解些什么情况，我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如果知道，我早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诬陷我自己我有这个权利，可是对别人进行诬陷我认为那在道德上是不能容许的。

我把一切都向你们说明白了，审判员公民们，你们当然自会审理清楚提出控告的这些罪状中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根据我职务的类型，根据我工作的性质，根据中央委员会委派给我的任务，我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人士和资产阶级的报刊：犹太族的，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等等都有联系。你们为什么单把犹太人的提出来呢？

(审判)长：因为你被控告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并且同犹太的，而不是美国的或英国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保持联系。

在苏联情报局里你对干部的选任是不合乎党的原则的……你说说，苏联情报局里犹太人对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比是多少？

洛佐夫斯基：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我从来没有偏向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我是一个犹太人。一个人若是否认他的民族归属，那他就是一个败类。

(审判)长：没有人控告你，以及坐在这儿的其他人是犹太人，你也不是因为这个坐到这儿来的，是因为你进行了反苏的活动。

洛佐夫斯基：我要说我没有进行任何反苏的活动，我这话是对

苏维埃法庭说的，我这话是对共产党员们说的。我没有问过人家——他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如果我需要一个好的译员，那我就用塔尔米，因为他能翻译4种语言。我为什么要请一个女学生来呢，她会给我弄得一塌糊涂，而我需要的是译员直接口述打字或是给速记员记录。就说译员法因贝格吧，他翻译过列宁的著作。这比翻译一篇什么文章更为重要。确实，翻译人员当中因此有3/4是犹太人。

(审判)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洛佐夫斯基：我现在不想逐条地去说对我提出的控告。我想说下面一点：我不需要因年龄等等而做任何从轻的惩处，不需要找任何可以减轻刑罚的情况。只要法庭能够认定起诉书哪怕有一行得到了确证，只要你们哪怕有百分之五的把握认定我在百分之零点五的程度上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和政府，那么把我枪毙就是罪有应得。

12时3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3时45分继续开庭。

洛佐夫斯基：我有一个问题。我不愿对审判庭有任何隐瞒。在我30年的党内生涯中我同党有过三次冲突。

然后费费尔请求审判庭给他机会对洛佐夫斯基作答。他在冗长的申述中再次试图证明洛佐夫斯基直接参与准备了关于克里木的信件，对向戈尔德贝格转交材料负有责任。

费费尔：……下面说“黑皮书”。从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苏联情报局对“黑皮书”的事做得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整个主席团还要多一点。那儿乱得不行，工作小组甚至都有好几个。出版“黑皮书”原本像是控告我们的罪状中的一件不大的事，可是在这儿突然编造出来一种说法，是我和

米霍埃尔斯先把这个问题考虑好了，然后同戈尔德贝格说定，再由戈尔德贝格发来电报。我们作为落实一系列问题的具体措施谈过“黑皮书”，至于说编写“黑皮书”这件实在的事情，那可不是我们策划起来的。在档案中保存着由爱泼斯坦、肖洛姆·阿沙和戈尔德贝格签署的电报，还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电报上还签着“A.H.^①”，也就是洛佐夫斯基的签名，这表明他是看过这封电报的。电报和会议记录的日期都表示出早在我们赴美之前就已经有了编写“黑皮书”的想法，我想古比雪夫的委员会工作人员是会清楚地记得这些谈话的……

……洛佐夫斯基向法庭供述，说我突然决定要求国家银行发给我的朋友戈尔德贝格6万美元。事情并非如洛佐夫斯基所供的那样。有一天戈尔德贝格在科特利亚尔的陪同下来找我。我必须指出，科特利亚尔并不是苏联情报局的技术人员，而是苏联职员中央协会的主席，这是一位负责干部。洛佐夫斯基认为诗人都举止轻浮，就把他派去陪同戈尔德贝格。戈尔德贝格给我看了一份由肖洛姆·阿莱赫姆的3个女儿签名的委托书，上面援引说在肖洛姆·阿莱赫姆的妻子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她曾写信给政府……

(审判)长：那是什么时候？

费费尔：1936年。当时苏联政府发给她1万美元作为在苏联出版肖洛姆·阿莱赫姆作品的报酬。

戈尔德贝格拿给我看的那份委托书说，肖洛姆·阿莱赫姆的3个女儿委托戈尔德贝格领取肖洛姆·阿莱赫姆作品的稿酬。

我当着戈尔德贝格和科特利亚尔的面给斯特龙金打了电话，请他同戈尔德贝格商谈这个问题。戈尔德贝格和科特利亚尔就去找斯特龙金，斯特龙金也是一个负责干部，他又和格拉乔夫及其他人联

^① 原文如此。洛佐夫斯基名字的缩写应为C.A.。

系，最后部长会议做出决定，给这几个继承人发了9千美元。

我不知道苏联政府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不过决定是约·维·斯大林签署的。

(审判) 长：谁有问题要问被告洛佐夫斯基？

(被告们都没有问题)

6月2日14时2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对洛佐夫斯基的审讯终了。对他的审讯持续了将近6天。

№1170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2日)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现在由你向法庭做供述。

希梅利奥维奇：审判长公民，我是否可以对今天上午洛佐夫斯基所说的事情提供一些情况？

(审判)长：或许你可以在自己进行供述的过程中把情况提供出来吧？

希梅利奥维奇：据我看，这个情况对法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洛佐夫斯基说了，我在侦讯时做了有10页长的关于他的供述。与此同时洛佐夫斯基做出结论，说这是米霍埃尔斯的政客手腕。我向法庭声明，在3年又4个月的预审过程中，除了1页纸之外我没有在关于洛佐夫斯基的供词上签过字，而我签了字的那些东西总共都写在1页纸上。除此之外，在整个期间，也就是3年又4个月的时间里，再没有问过我有关洛佐夫斯基的事。在我那大约记了有1页纸的供词上，侦查员留明附上了几个字，就是：洛佐夫斯基是主要罪犯。我在这上面签了字的事我是过了6周之后才知道的。我现在声明，我是在神志不清、心里十分难受的状态下在那份记录上签了字的。所以说有我签字的10页关于洛佐夫斯基的供词在天底下就不存在。

希梅利奥维奇：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也好，在行动上也好犯了什么罪，也不承认有任何反对党和政府罪行。我还得补充一下，我在最后一份侦查终结书上签字的时候

(这好像是在 1952 年 3 月 26 日那一天)，曾请求侦查员斯特鲁戈夫和检察长科茹拉大尉在记录里加上我过去没有承认，现在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检察长科茹拉相当长的时间都拒绝接受我的这一请求，他推说从我在预审时的口供就足以看出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而起诉书中却说，希梅利奥维奇除本人承认之外，还有一些证人做了揭发，等等。

(审判)长：可是预审时你总还是供出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呀？

希梅利奥维奇：我本不想在一开始审问我的时候说这件事，可是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我就讲吧。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1949 年 3 月审问我的第一份记录中所写并经我签过字的那些话。这些供词是我不在的时候由侦查员留明和什么人一起编出来的。洛佐夫斯基受到威吓，说又会打他又会怎么样的，于是他决定，如他所说，讲一些诬陷什泰恩的话，然后再向她道歉，他对自己，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人进行了诽谤，打算以后到了法庭上再把这一切推翻。我没有走这一条路。我争辩了 3 年 4 个月，如果还有机会，我还要和侦查员，如果有必要也要和检察长争辩下去。如果说洛佐夫斯基还只是受到了威吓的话，那么我，很遗憾，在审讯一开头我就不得不说，我在 1 个月（1949 年 1~2 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 80~100 下，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据我计算总共挨打 2 千下左右。我多次遭受肉刑，但却未必有哪一位侦查员说得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改变过自己的口供。没有的，我知道的事我说了，但我不管是站着，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都从来没有讲过写在记录里边的那些话。那我为什么在这些记录上签了字呢？1949 年 3 月的这份记录是我处在心里十分痛苦难受、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签的字。直到这事过去了 6 周之后我才知道我在这样一份记录上签了字。那是在侦查员留明进行审讯时给我读了从这份记录中摘出来的几个段

落的时候。

(审判)长：那你怎么着，对侦查员留明有什么要求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给他写了一份声明，是这么说的：“侦查员公民留明，1949年3月做的那份记录是我在心里十分痛苦、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签的字。我的这种状态是连续1个月不分昼夜每天对我进行精心安排的毒打造成的后果。挖苦嘲弄和讥笑侮辱我就不说了。我请求将我于1949年5月15日提出的本声明收入卷宗里”。留明本人没有碰过我，可是他说过先前见到过我。除了在实施肉刑的现场，他先前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实施肉刑的时候，在场的除了他之外还有7个人直接动手毒打我。在场的还有一位部长的秘书——着便装的上校。

(审判)长：你说留明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强迫你，可是卷宗里却有留明做的记录。记录上你也签了字，记录说你承认自己有罪。

希梅利奥维奇：在这份记录上签字的那一天，我正处于意识模糊状态（我是指遭受毒打期间）。在那之前的几天他们不断地问我：“你听得见我们说话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听得见，听得见”。部长把我叫到他那里去了五次，有几次留明也在场。

(审判)长：哪位部长？

希梅利奥维奇：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他对我的答话很不满意，而我的回答同侦查员们对我进行的最初几次审问时说的一样，他说：“往死里打”。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从他的嘴里听到了“打”这个词儿，当时留明也在场。

在那之后，有1个月的时间留明对我很客气，耐心地听我供说我以前对希什科夫供过的同样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留明都仔细地听并做着记录。

有一次在非规定的时间留明把我叫去，说：“在记录上签个

字”。而且他们是一页一页地交给我阅读的。我把整个记录读过一遍之后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供述，对此他们回答说：“党中央对你的案子有专门的决定。道义上的责任你是逃不掉的”。

除此之外留明还对我说，我若是在这份记录上签上名字，我就会好过一些，他还拿出保险柜的钥匙给我看，说一辈子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能看到这份记录的内容。

留明曾多次对我说，是他救了我，是他把我拉出来的，我应当为此感激他。那个时候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的。

(审判)长：就是说自从留明接手进行侦讯之后，他对你没有采用任何强制的手段？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不过我对他做出的回答和以前我对侦查员希什科夫的回答是一样的。可是他却突然把我叫去，让我在记录上签字。我们坐了大约有6个小时，我终于签了字，但是我再说一遍，我由于所遭受到的事情当时是处在神志模糊的状态。我认为这一程序显然还没有完结，因为侦查员希什科夫曾经对我说过：“你瞧着，我对你许下的事，我全都会办到的。如果以后你不能走着来受审，我们就用担架把你抬来，还要打你，打你”。

等我苏醒过来，那是过去6周以后的事，我只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把它在这儿重说一次，就是：洛佐夫斯基领导着所有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对犹太人委员会也是一样，他对犹太人委员会的活动负有完全的责任。

(审判)长：现在你来供述一下控告你的各项罪状的要点问题。你在预审时谈自己的履历时曾供说，以前你参加过崩得。

希梅利奥维奇：我在崩得里有5个月的时间。

(审判)长：是什么时候？

希梅利奥维奇：我现在跟你说。这与当时那种环境和我所受的那种教养有关。我从自己的履历谈起吧。

我生在1892年12月3日。我父亲开始在里加市的一个犹太教堂作守卫。我父亲的职责都包括一些什么呢：第一个来教堂开门，保持教堂清洁，分发祈祷书，照应教民，再最后一个离开教堂。

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虽然她生活并且死在了资产阶级的拉脱维亚，但却享受个人特定的养老金，并且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登记在册。她享受养老金是因为大儿子犹利乌斯是一个秘密革命工作者，1919年1月2日被白匪杀害。

证明我父亲是犹太教堂职员的文件和关于我母亲是个人特定养老金的领取者的市政管理委员会的证明都保存在我的写字台里，在逮捕时被没收了，那里还有个人证件，我就在这儿领钱，再往我母亲居住的拉脱维亚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我受审的第二阶段我曾按照留明的要求连着好几个晚上供述我的亲属，已故的和还在世的情况。我对他讲，我哥哥雅科夫和妻子一起在被占领地上遇害。尤利乌斯做秘密工作时牺牲。弟弟伊萨克跟着一位钟表匠学徒，40岁时去了新大陆。我同他没有联系。我说我父亲是犹太教堂的职员，母亲是个人特定养老金的领取者。但是侦查员说没有“犹太教堂职员”这个词，他记录的是我记不得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审判)长：这里写的是你父亲在犹太教堂里做事。

希梅利奥维奇：可是那里边还记着我不知道，不记得他是干什么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愿意让父母提起来感到羞耻，因为从我签过字的那份东西中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原来是一个“不知其父”的儿子。我不想在父母面前做一个不知其父的儿子，所以我声明，我的父亲是犹太教堂的职员……

我还得说一说我的成长受过什么样的影响。我和哥哥尤利乌斯生活和睡在一张床上。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组织的人。瓦夏·乌尔里希常来找他。有一次遭到搜查，一直搜了6个小时，那之后尤利

乌斯就被捕了。我那时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但我总是去干哥哥指派给我的事情，我可以毫不费事地就上到犹太教堂里妇女待的回廊上面，把传单撒下去。

(审判)长：你那个时候是住在里加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那是1908~1909年的事。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里是说：“我在崩得里待到1920年”。

希梅利奥维奇：我在崩得里的时间大致是从1919年11月到1920年4月1日。1920年4月1日我就拿到党证了。

(审判)长：就是说你是1920年4月入的党了？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在崩得里的时间是5个来月。

(审判)长：在党内期间你受到过党纪处分吗？

希梅利奥维奇：1920年4月，海菲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原责任秘书的父亲）授予我党证，履历栏填着参加崩得5个月，我被派去犹太人赈济饥民公益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把从“卓因特”那里获得的物品和药品分配给需要的人。给我派定的职责是给科学家们分发邮包。不久又派我同时在“卓因特”、“佩列利弗”等等组织各分支机构担任特别代表。后来我担任所有这些组织的组织处长和医疗处长，这些组织共有30个以上。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来到博根（“卓因特”的代表）处。他说“卓因特”想往苏联运送过逾越节用的硬面薄饼。我回答他说我反对。而“卓因特”提供的所有东西都必须征得我们的同意。接着博根又说，运来了24双童皮鞋，他们想把这一批鞋全分给犹太儿童。我告诉他我坚决反对。博根表示，如不按他提出的办法处理，他们可能提出废除赈济合同的问题。合同是和政府签订的，这是价值数百万的事。对此我向兰达做了汇报，他赞同我的做法，真真切切是过了1周或是10天，就召我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我和莫斯科监

察委员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到了那里，那里的人告诉我，从中央委员会转过来一份控告我对待犹太人问题态度错误的严厉的信件，给我看了由切梅里斯基签署的公文，切梅里斯基这个人我曾见过一面。我的党证被收走。我心情沉重地来找兰达，把事情的经过全对他讲了，他说了一些鼓舞我的话，并许诺要亲自去把一切都调节好。确实，他把党证给我带回来了。有传闻说，切梅里斯基讲过希梅利奥维奇一切都完了。

1923年像“美国救济总署”，“南采利”等等这样一些赈济饥民的组织被撤销了。

为表彰我在组织赈济饥民工作上付出的劳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给我颁发了一枚专门的徽章和证书。然后派我去了莫斯科州保健处，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看病的老布尔什维克奥尔赫在那里工作，他让我接受保健处处长的职务，我说不要派我去干那个工作，还是派我去区里吧。就把我派到鲍曼区去了，这是1923年年底的事。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米霍埃尔斯的？

希梅利奥维奇：在留明编造的那份审讯记录里记载着我是和米霍埃尔斯一起长大的，等等。

（审判）长：可是这份记录中没有关于你同米霍埃尔斯结识的供词。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想我和他比较熟识起来，是在犹太剧院上演第一部革命话剧的那个时候，《真理报》的底栏专论对这部剧做了评介。这部剧是讲尤利乌斯，讲他生命的最后4天的。那时米霍埃尔斯扮演的尤利乌斯。

（审判）长：那是什么时候？

希梅利奥维奇：大概是1934年。

祖斯金：是1931年。

希梅利奥维奇：米霍埃尔斯扮演了尤利乌斯。我和他就已相识了。

(审判)长：就是说，你同他是1931年在莫斯科认识的？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常去犹太剧院，知道有一位米霍埃尔斯，也许还和他握手寒暄过等等，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卫国战争快要开始的时候才密切起来的。

(审判)长：他去过你家吗？你也去过他家里吗？

希梅利奥维奇：他到我家去过大概有3次吧，而且这都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的事情。

(审判)长：维克托罗夫是什么人？

希梅利奥维奇：维克托罗夫就是戈尔德贝格——这是《真理报》上的叫法。

我听说米霍埃尔斯贪杯，可是我认识他的整个这段时间从未见过醉态。我也去过他家。我到城里去的时候顺便去过他那里，待上15~20分钟，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去过。我还到他剧院里的接待室里去过。在那儿我看见过有犹太人等待他接见。我对他很好，我认为他对待我也同样会很好的。

(审判)长：你同他谈过政治方面的事吗？你们谈起过犹太人的境况吗？

希梅利奥维奇：没有，他从未当着我的面提起过关于犹太文化，关于犹太人的安置等问题。

(审判)长：关于米霍埃尔斯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供词是贯穿于本案始终的，你和他是长时期的朋友。难道他真的从来没有和你谈起过什么犹太人的事情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说，当着我的面他没说过这方面的事。米霍埃尔斯知道我的孩子不懂犹太语。我儿子是党员，我女儿读大学1年级，在我被捕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去看

米霍埃尔斯，他告诉我在白俄罗斯的犹太学校被关掉了。

(审判)长：那是哪一年？

希梅利奥维奇：是1936~1937年间，他说这话时是感到很惋惜的。记得我当时对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不懂犹太语，我和犹太文学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能对你说什么。问题倒不在于把学校关了，而在于在那里是否当场把关闭的原因解释清楚了”。这次谈话我还记得，也把此事对留明讲了。留明后来把这些话做了改动，仿佛是米霍埃尔斯说，犹太学校被关闭了，因此必须向苏联政府，向党做斗争，——这是留明造出来的假话。

(审判)长：其他方面的事你们谈过没有，比如戏剧？

希梅利奥维奇：我们谈论过一些正在排演中的戏剧。他回忆过马尔基什。我对马尔基什提出，我曾见过他佩带短剑，那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在这儿。米霍埃尔斯有一次跟我讲起了马尔基什：“你知道吗，鲍里斯，犹太作家马尔基什为了一种什么不体面的行为被从海军开除，我对此不知怎么地感到不太痛快”。这事我还记得。有几回谈到了费费尔的诗。我并没有读过费费尔的作品，不过我得说米霍埃尔斯对费费尔的诗的评价一点也不高。

(审判)长：在哪一方面呢？

希梅利奥维奇：他并不是讲民族主义等等方面的内容，他是说他的诗质量不高。米霍埃尔斯和我说起过爱泼斯坦和马尔基什之间的无原则纠纷。他说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原则的人，听着他们两个人互相诋毁真让人感到羞耻。他曾多次问过我，医院里的困难我是怎么样克服的。

(审判)长：有过民族主义性质的交谈吗？

希梅利奥维奇：没有，米霍埃尔斯没有和我谈过民族主义方面的话。

(审判)长：可是在这儿进行审讯时一些被告人讲，在委员会

的工作方面，费费尔是米霍埃尔斯的首席参谋，而在民族主义性质的问题上的另一名参谋就是希梅利奥维奇。怎么会这样呢，人们注视着你的行动，你同米霍埃尔斯的友好关系，知道你和他都是民族主义者，可是你说的都是另一个样子。

希梅利奥维奇：这儿在场的人没有哪一个对我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回答说，曾听见我说过什么反苏的、民族主义的话。你曾两次对费费尔提出他认为哪些人是民族主义者的问题，费费尔说了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马尔基什和贝格尔森，但他并没有说我。

在我被捕并改换成相应的样子之后过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长的召见，当时有他的上校秘书在场。

当我进去见到部长的时候，他说：“看哪，好一副嘴脸”。当时那位上校秘书就对我说过：“你是米霍埃尔斯最重要的顾问”。后来我在费费尔的供词中看到了我是米霍埃尔斯最重要的顾问这个说法。但是费费尔供述这些的时间好像是 1949 年 1 月 11 日，而我见部长的时间是 1 月 3 日。

№1170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3日)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接着供述。

希梅利奥维奇：在起诉书的第3页上，在其他一些人中间，也提到了我的名字。在那个地方说，我出身于社会异己阶层，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仇恨，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之前很久就曾非止一次地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进行过敌对性的攻击。那就从我们国家的两亿人口中找出哪怕是一个能够证实这一条罪名的人来吧。我不说那个曾和我一起被关在布特尔监狱的医院中并像母亲照看自己钟爱的病儿一样照看过我，可是后来在今年的3月10日却突然出面和我对质并开始告发我的罪状的人。关于这样的人我不去说。

我，被告希梅利奥维奇，把自己的履历在这儿都讲出来了，如果我的履历中有什么污点的话，我请求坐在这里的被告们把这些讲给法庭，如果所讲的事是真的，我将愿意对他们的口供加以认证。

在起诉书的第12页上，在其他的人当中也提到了希梅利奥维奇，在那个地方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加紧对党和苏联政府进行破坏。加紧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希梅利奥维奇在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破坏，而现在准备把这种活动加强。这份起诉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谎话，都是对军事审判庭、党和政府的欺骗，因为党对此是应该了解的。

(审判)长：预审时你曾供述(卷8，案卷页37)“犹太人反法

西斯委员会是 1942 年 4 月在古比雪夫成立的。我当时在莫斯科，因此是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被吸收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这是真的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已经供说过了，我或者是在 1941 年底或者是在 1942 年上半年被吸收进委员会的。委员会在古比雪夫，但是我从那边接受过一些任务。

（审判）长：你是经谁的介绍被吸收进委员会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想是经过米霍埃尔斯介绍的。

（审判）长：那么说，在你的供词里当侦查员问你：是谁介绍你加入委员会的？你回答说是米霍埃尔斯，这段供词是正确的了？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这是对的。

昨天我们说到了我和米霍埃尔斯的谈话。没有谈过什么犯法的内容，但是有的谈话可能会使最高法院感兴趣。他跟我讲过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过接见，他还告诉我他曾两次进见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我说这事是因为费费尔提到了这个问题，说他们两个人去见过他，同他谈了话。米霍埃尔斯告诉我，他们去过不是像费费尔在这儿说的只有一次。

（审判）长：这件事我们以后还会谈到的。

希梅利奥维奇：米霍埃尔斯还和我说过反犹太人的事件。

（审判）长：是什么时候谈的？

希梅利奥维奇：谈这些话不是一次。

（审判）长：你们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说到过这些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曾经对他讲过，我在保健人民委员部碰上过反犹太人现象等等事情。我对他说过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对这些问题应该如何看待。

（审判）长：是什么时候谈的这些话？

希梅利奥维奇：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大约是在 1946 ~

1947年。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是党外人士，因此，由于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显然是经常找你来谈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你为他解释他产生的各种疑问。被告们在这里都说你是米霍埃尔斯的顾问。

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的使用当然是有条件的，不过被告都说，从你们的关系上看，米霍埃尔斯找你讨主意比找别人都多，他对你比对其余所有的人都亲近。

希梅利奥维奇：他和我亲近，友好，这我自己也对法庭讲了……

(审判)长：不过他找你想必是因为他认为你在政治问题上比作家更有经验。你说过，你们两个人谈过反犹太人的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讲了他在委员会里开始工作的情形，特别是关于准备告犹太医生书的事情。

希梅利奥维奇：……爱泼斯坦写信给我说，我写的致犹太医生书——他指的是第一份还是第二份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等地已经传播开了，而且不仅发表在犹太报纸上，非犹太报刊也登载了。这是第一点。

在同一封信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告诉我已经决定出版“黑皮书”。他还说了此书出版委员会的人员——美国方面是爱泼斯坦教授、肖洛姆-阿沙，苏联方面是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伦堡和我，在信的末尾爱泼斯坦还告诉我克维特科是一个不称职的组织者，得帮助他进行工作。爱泼斯坦在这封信里还提到，如果要开群众大会，由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而我在莫斯科，也许只好由我担任此次群众大会的主席了。

克维特科在这儿已经说了，我没有找他谈这封信的事，也没有给他任何帮助……

(审判)长：那为什么呢？爱泼斯坦不是请你帮助克维特科工作吗，你怎么连个电话也不给克维特科打呢，这对爱泼斯坦可是不礼貌的。你接到这封信后给爱泼斯坦回信了吗？

希梅利奥维奇：没有，我和爱泼斯坦没有互相通过任何信件。

(审判)长：在这个时候除你之外，委员会成员之中还有谁在莫斯科：马尔基什、克维特科、塔尔米？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克维特科：在莫斯科当时还有加尔金和斯特龙金。

(审判)长：那就是说在1943年有好几个委员会的成员在莫斯科，但是把信写给了你，甚至是有用意的：因为米霍埃尔斯不在，得由你担任群众大会的主席。为什么得由你，而不是由别人担任？

随后提出了一些关于希梅利奥维奇同马尔基什，特别是同爱泼斯坦的关系的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后来我在主席团的几次会议上见过爱泼斯坦，在上班的时候见过他，他从早到晚地干工作，但是以前，在委员会成立之前，也就是在1942年年中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爱泼斯坦这个人。

(审判)长：你怎么认为，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有民族主义者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在委员会期间和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的时候，我本人没有听到过那儿讨论什么民族主义的问题或是发表民族主义的言论。不过我要说我和布雷格曼有时候说过，马尔基什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

(审判)长：马尔基什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是马尔基什。

(审判)长：你是从什么地方判断出这种“味道”的呢？

希梅利奥维奇：有那么点感觉……

(审判)长：你大概是感觉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亲切的地方吧？

希梅利奥维奇：决不是什么亲切之处……

(审判)长：可你总还是能够断定他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

希梅利奥维奇：我在犹太剧院好像是两次听过马尔基什发表议论。

(审判)长：就是听过他演讲？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而且我还要说，他发表演说时异常地慷慨激昂，他演说的内容我有时也弄不懂。他讲话时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让人在同一时刻既有所感觉又弄不明白。当他在讲话中说到犹太民族时，他总要讲历史上的人物形象。根据这些我和布雷格曼说马尔基什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

(审判)长：这就是说你认为马尔基什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希梅利奥维奇：不是。假若我有根据说明马尔基什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我国条件下民族主义者不光是对苏联不和睦友好，而且是与苏联为敌，——那我是一定会把他揭露出来的。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马尔基什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情况。也许这是马尔基什的幸运，我没有读过他发表的诗。

(审判)长：可是侦讯时你肯定说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是由几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掌握的，如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

希梅利奥维奇：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

(审判)长：1951年3月11日审讯的时候说的。

希梅利奥维奇：那是我遭受了一连串的肉刑之后的事了。我声明，在3年多的侦讯过程中从我的嘴里从来没有说出过承认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的话。

(审判)长：可是在我上面提到的你的那份供词中你说过，表现得最为积极活跃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是爱泼斯坦，费费尔，马尔

基什……你看，你确实是说了马尔基什。费费尔在这儿，在法庭上也说过，马尔基什是个民族主义者，——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两个人的供词是吻合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以后再说费费尔。我不能说在我签这份记录的时候，整个6个小时我自始至终都处在神志模糊、抑郁的状态下，也偶而清醒一会儿。这份记录是留明中校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写成的，那里边写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讲过。

（审判）长：希梅利奥维奇，请你简明扼要地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

希梅利奥维奇：我的回答就是这份记录，是留明炮制出来的东西。

（审判）长：但是你的供词在客观上和马尔基什的供词是一致的，都说费费尔是一个活跃的民族主义者，他和爱泼斯坦一块指导着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工作。

希梅利奥维奇：我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工作并不了解。我要说，只是到了侦讯期间我才开始把费费尔看做是一个罪人的。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卷8，案卷页34）里说，米霍埃尔斯曾不止一次地讲出了他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在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方面感到不满。你接着供称在这一点上你同意他的看法。你这说的大概是米霍埃尔斯讲在苏联有反犹太人现象的那些谈话吧？

希梅利奥维奇：我再一次声明，这些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讲的。我再重说一次，不仅是米霍埃尔斯，就连其他的人都不敢当着我的面谈任何犯法的话。

这些供词是留明编造的。

（审判）长：你是说过的，米霍埃尔斯和你两个人谈过反犹太人的事件。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关于反犹太人的事件他和我谈过。

(审判)长：关于委员会本身成立的这回事你同米霍埃尔斯谈起过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昨天就说过了，在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曾就某些功勋科学工作者给我打电话反映呼吁书下面没有医生签名这事跟他谈过。

(审判)长：你被列入委员会成员当中这件事本身是谁跟你说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已经说过了，那是米霍埃尔斯告诉我的。

(审判)长：那就是说关于组织委员会这件事情本身你们之间是谈过的。米霍埃尔斯对你讲过他感到满意，讲过对委员会工作的展望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他感到满意，不过那时已经成立起来的不光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他的委员会也都有了。米霍埃尔斯说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犹太人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米霍埃尔斯没有跟我谈起过还有什么别的任务，比如说解决犹太人的前途、犹太人的文化，过去的或是未来的等等问题。

(审判)长：当时你们并没有友好的基础。被告费费尔和其他的人都肯定米霍埃尔斯就其信念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你是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你们之间能有什么友谊呢？

希梅利奥维奇：一切都很清楚，米霍埃尔斯是个什么样的人——苏联的人民演员。他曾经受派去美国，这就是很大的信任呀。

(审判)长：预审时你供述过洛佐夫斯基在组织和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你声称他在委员会开展敌对活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进行全部的敌对活动期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是从洛佐夫斯基那里领受最重要的指示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前说过的话，我今天再重说一遍，这就是洛佐夫斯基与我很少见面。侦查员曾问过我，关于洛佐夫斯基能讲些什么情况。我回答他说，他领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也同样领导其他几个委员会的活动……

（审判）长：你确认你关于洛佐夫斯基的那些供词吗？

希梅利奥维奇：那不是我的供词。

（审判）长：可那是你签了字的吧？

希梅利奥维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做过解释并写了声明。

（审判）长：从美国回来以后你和他们见过面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看见过米霍埃尔斯。

（审判）长：见过费费尔吗？

希梅利奥维奇：费费尔也见过，他去找米霍埃尔斯。

（审判）长：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希梅利奥维奇：说的全是朋友之间闲谈性质的话，米霍埃尔斯愉快地回忆了这次旅行。

（审判）长：他对你讲过美国的犹太人反动分子表示同意帮助委员会进行的那些民族主义工作的事吗？

希梅利奥维奇：没有。

（审判）长：那么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呢？

希梅利奥维奇：他讲在美国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接待他们。这个委员会包括了各界人士，其中也有反动分子的代表。他和费费尔的任务就是要引起各界广泛的犹太人士对苏联最大程度的同情，也要尽可能地引起在政府各层人士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同情。他告诉我，《前进》是一份黄色刊物，它的领导人，很遗憾，竟是利伯、塔姆和阿布拉莫维奇，这几个人先前在俄罗斯都是孟什维克的首领，曾经进行过而且现在依然在进行疯狂的反对苏联的运动。他跟我说了同“卓因特”的谈判，我不敢肯定他当时讲过罗森贝格这

个名字。我得补充一句，即使他当时说了这个名字，那它对我也说明不了什么。魏茨曼这个名字对我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从1922年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一直没有关心过任何犹太人问题，与犹太民众，与犹太作家等等都很疏远，虽然我还不能说我已经完全同化了。

关于“卓因特”他也对我提过，他说与“卓因特”进行了长时间的关于从物质上援助苏联问题的谈判。

问过一些与希梅利奥维奇和米霍埃尔斯之间关于他美国之行的谈话相关的问题之后，审判长转而调查希梅利奥维奇拟写关于克里木问题致政府的呈文的时间。希梅利奥维奇坚持说是1945年至1946年初这一时期，而不是像预审材料中肯定的那样在1944年2月12日。

(审判)长：希梅利奥维奇，你说说这份文件（出示文件）的作者是你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读了这个东西。

(审判)长：我是在问你，作者是不是你？就不能简简单单地回答问题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不管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可作者是我。

(审判)长：怎么个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这份文件是从你那儿搜来的吗？

希梅利奥维奇：想必是在我的保险柜里找到的。

(审判)长：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这份呈文，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不可能是1946年写的（宣读呈文）。

你有什么权利以所有犹太人的名义讲话？

从你的这份呈文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反犹太人主义要比德国人消灭了400多万犹太人还让人更加难受。根据一切材料

看，这份文件恰恰是 1943～1944 年拟写的，因为，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各个民族都在盼望着从希特勒的侵略下边获得解放，你提到的那次会议也是在 1943 年底或 1944 年初召开的。希梅利奥维奇为什么还要做徒劳无益的争执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只讲在今天这个时刻我知道的事情。

（审判）长：甚至连同反犹太人主义作斗争这样的问题你都是从全国的规模上来讲的，看，这是你的第一项要求：“必须控制住我们的领导人”。

希梅利奥维奇：我是说必须把我们的个别领导人控制住，当然并不是在全国的规模上。

（审判）长：你们那位米霍埃尔斯怎么没有说，他、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在呈文上签了字，并把它送交政府了。

希梅利奥维奇：我把呈文的草稿交给了米霍埃尔斯，过了大约 5～7 天他告诉我，我写的那份呈文被洛佐夫斯基否定了，因为它含有感情成分，我们再也没说这件事。我也没有再问米霍埃尔斯安置犹太人的事，关于克里木的事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也没告诉我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拒绝了那种解决克里木问题的办法。我同样不知道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也送去了同样的呈文。

（审判）长：你怎的，是说米霍埃尔斯也是在 1946 年，而不是 1944 年交上他自己的呈文的吗？

希梅利奥维奇：这个我根本不能肯定。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跟你说了你写的那份呈文感情成分太重，因此被否定，他们要自己起草一份新的文稿，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一下，然后送给政府这种话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但是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讨论过呈文的文稿。

（审判）长：你说一说米霍埃尔斯的那个用语“感情成分重的

呈文”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不能对你只说“感情成分重”这样一个词的。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用语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问过米霍埃尔斯，他这是想说什么，不过我对他的话是这样理解的：在呈文里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建立自治共和国的论据。

（审判）长：就是说没有有分量的论据，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却表现得很鲜明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民族主义情绪。

（审判）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文件，它通篇充斥着民族主义思想。你在这里边写道：“犹太民族意识到，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势力（希特勒德国）已选定他们这个民族加以彻底灭绝，这说明纳粹主义看出犹太民众和他们的高度智慧是对纳粹主义的巨大威胁且他们无法并存，犹太民族为此感到骄傲”（卷40，案卷页325）。

结果就成了希特勒去征服别国，全是因为有犹太人。这是一点。

你接下来说，“从西部各州疏散出来的犹太人既不懂俄语和当地的语言，又脱离了他们原有的犹太文化，从而也就脱离了国家的总体政治生活”。之后你强调说，“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由于爆发了战争，在很多极其重要的机关里反犹太主义获得了适宜的土壤，个别领导人政治目光短浅，缺乏文化素养，有时还愚笨糊涂则是其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反犹太人主义也就表露得公开地粗暴而肆无忌惮，解除犹太人的职务等等就是其表现的方式。所有这些有时就给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和在广大的犹太民众中间造成一种特别沉重的心境。发生在自己的祖国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常常使个别阶层的犹太人感到比德国人消灭了400多万犹太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遇害更为难过”。

(审判)长：你有什么权利代表 150 万犹太人讲话？

希梅利奥维奇：希特勒德国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消灭一切犹太人，因此在我写的那份呈文中列为第一项的任务，就是建立全人类的和平和消灭法西斯。我今天还可以确证，希特勒法西斯是把消灭一切犹太人定为自己的第一项任务的。

现在来说犹太民族为意识到……而感到骄傲这个问题。这种说法我是 1944 年在圆柱大厅里举行的第三次群众大会上爱伦堡发言时听到的，他说：“我感到骄傲的是我属于希特勒选定要彻底消灭的犹太民族”。

(审判)长：可是你写的是犹太民族意识到希特勒选定它来加以彻底消灭，并为此感到骄傲，就是说你是以犹太民族的名义讲话，并且强调它是与众不同的。这已经就是民族主义了。

现在接下去说。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说在许多重要的机关里盛行反犹太人主义的？在重要的机关里指的是什么？

希梅利奥维奇：我现在跟你说。我本人从来没有感觉到别人对我自己有反犹太人的态度。1942 年以前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人提到过一次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大约是在 1942 年，我个别的犹太医生朋友开始对我讲，在卫生保健部门的领导人中间出了几件表现出反犹太主义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前保健人民委员米捷列夫干了一件政治上的大蠢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把医学杂志的编辑人员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辞掉了。另外在医学科学院也发生了几起反犹太人主义的事情。我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写信报告给了格·马·马林科夫，并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去过。我就是根据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的那份呈文中这么写的。

(审判)长：希梅利奥维奇，你说说，你有什么权利只掌握了米捷列夫办的一件错事，就写在很多极其重要的机关里都有反犹太人主义的现象呢？

希梅利奥维奇：保健人民委员部是一个重要的机关。医学科学院也是。我现在想不起什么别的机关了，不过我会想起来的……

(审判)长：你可能会再想起一两件事情，但是这构不成系统啊？

希梅利奥维奇：我不敢说这份呈文就是原件的副本，也许这是我最初所拟的几种草稿中的一个，不过我认为把反犹太人现象报告给中央委员会是必要的。

(审判)长：你写了：“发生在自己的祖国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常常使个别阶层的犹太人感到比德国人消灭了400万……更为难过”。这可是你的思想啊，希梅利奥维奇……

希梅利奥维奇：至于说反犹太主义对个别人的影响，那我要说，在我自己的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假如我感觉出来哪个人有所表现的话，那我是会加以注意的。可如果说是国家机关，那么我认为对这种情况提出报告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义务。

(审判)长：可是你诽谤说反犹太主义在很多国家机关里都有。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进行诽谤。

(审判)长：那么做何理解呢，彼得罗夫事件发生在你写这份文件之后，科学院那件事的时间是1946年10月份，而你写你那份呈文的时间是在这之前。

希梅利奥维奇：我对写这份呈文并不感到后悔。

(审判)长：那么说你肯定在你这份关于克里木的文件里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东西？

希梅利奥维奇：我当时认为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东西。

(审判)长：我说的是现在，我们现在正在对一切材料进行审查。

希梅利奥维奇：在我写这份文件的时候，我没认为文件里面有

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个别的领导人不会做领导工作，而可能做出的反犹太主义的个别的事情。反犹太主义的表现会在个别的犹太人和苏联人民的一些阶层中间造成很沉痛的情感……

（审判）长：可是派遣克维特科去克里木这难道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职权吗？

希梅利奥维奇：克维特科去克里木的问题没有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过。这是不是委员会的职权？我认为，如果需要在《埃尼凯特》报上发表关于什么事情的稿件，那么每一个作为该报记者的犹太作家，都可以被派往现场收集所需的材料。

（审判）长：可是克维特科被派到克里木去的目的是考察那里犹太人的状况，然后给农业人民委员部打报告，——这难道是委员会的职权吗？

希梅利奥维奇：克维特科在这儿供说，他在主席团的会议上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们通报了他此行的情况。他在自己的通报中说，在一部分犹太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克里木的犹太移民区（我要说我原来还不知道克里木有犹太移民区）将和德国移民区同等对待，也就是犹太移民区和德国移民区一样，将不再恢复。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此外克维特科还说，在一些学校里气氛很坏，孩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好，他还说了俄罗斯儿童用来称呼犹太儿童的那个词儿，说甚至有俄罗斯人殴打犹太人的事。这些都是我从这份通报中摘出来的。

我记得米霍埃尔斯提议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政府，特别是要报告给安德烈耶夫。当时就推选了一个小组——米霍埃尔斯，古别利曼，克维特科和希梅利奥维奇。我要说克维特科的呈文并没有拿到主席团的会议上来。我也记不得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份呈文送给安德烈耶夫的，也许是在我们去见别内迪克托夫的那个时候交的。在安德烈耶夫的接待室里我们就被告知，将由别内迪克托夫接见我们。

克维特科迟到了一会儿，他一来到，我立即在附函上签了字。接见我们的是别内迪克托夫。米霍埃尔斯发了言，古别利曼、克维特科和我也发了言。我没有谈迁徙犹太人问题，只说我想提请注意有关学校的孩子中间有反犹太人现象的报告，还说这表明在家长中间有着同样的情绪。

我们当时请别内迪克托夫对我们指出的这些事情进行核查，如果证实确有其事，就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别内迪克托夫说，他将进行核查，如有必要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接着审判长提出诉希梅利奥维奇向国外送交间谍情报的罪名。结果查明，除《致海外的信》这一篇文章外，希梅利奥维奇没有写过一篇文章，而且就是那惟一的一篇文章也是苏联情报局的总编辑写的。

搜查时从希梅利奥维奇处查收了6份这篇文章，这些文章全被侦查员留明销毁了。该文是讲保健问题的，曾经莫斯科市苏维埃和莫斯科市党委会审查并得到同意。

希梅利奥维奇请求将此文附入案卷中，但没有得到这样办理。

至于说控告希梅利奥维奇同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保持犯罪的联系，并向他们转交间谍情报等罪名，他断然否认在预审过程中他曾签过字的那些供认口供。

“这不是我的口供”，希梅利奥维奇声明说，“这是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侦查员留明编造的口供”（卷5，案卷页52）。

（审判）长：那么你是否否认你关于同诺维克有联系的口供了？

希梅利奥维奇：我不仅予以否认，而且还要声明，这份记录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我签字的时候神志不清，等我神志清醒过来之后，我在侦讯的过程中就已经拒绝承认它了。

(审判)长：可是1944年^①3月11日侦讯时你说过，你同戈尔德贝格进行过民族主义性质和间谍性质的谈话，是吧？

希梅利奥维奇：审判长公民，我从来没有讲过写在记录里边的这些话。这些供词下边有我的签名吗？

(审判)长：有的。

希梅利奥维奇：那上面没有任何改正吗？

(审判)长：没有，什么也没改。希梅利奥维奇，你说你是从哪儿知道戈尔德贝格在苏联到处走，收集间谍情报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审判)长：你为什么对这份记录里所写的一切事情都予以否认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以前也否认这些事情，包括提出书面声明予以否认。

^① 原文如此。显然是1949年之笔误。

№1170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4日)

(审判)长：现在你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你和什么人谈过米霍埃尔斯之死，都谈了些什么。你在侦讯的时候说过：曾经有议论说他是被有预谋地杀害的，你还联系到这一点说到了侦查员舍伊宁。

法庭希望了解这种议论是从哪里开始的？

希梅利奥维奇：我被捕的第一天晚上，侦查员希什科夫和我谈话，他对我说：“喂，你来讲讲，是什么人杀害了米霍埃尔斯？”而且他立即对我说出了……

(审判)长：我是问你，关于米霍埃尔斯的死因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议论？和什么人谈的？是谁跟你说的他并非死于不幸事故，而是遭到有预谋的暗杀。至于希什科夫跟你都说了些什么法庭不想去问。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米霍埃尔斯是被有预谋地暗杀的话。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他仿佛是被宾杰里分子杀害的，说检察机关的侦查员舍伊宁已经到那边去了。我看到那间大厅里的人群当中有舍伊宁的妻子，我从1943年就认识她。我走到她身旁，和她招呼了一下就问道——人们所说关于舍伊宁的话确实是真的吗？她告诉我舍伊宁出差了，她好像还对我说了哈萨克斯坦。

(审判)长：你本人认识舍伊宁吗？

希梅利奥维奇：舍伊宁我认识，我是在莫斯科近郊的疗养院时认识他的，当时他的妻子在那儿，他是去看妻子的，他妻子就介绍我和他认识了。在那以后我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几次。当他觉着好像是得了直肠癌的时候，他到医院来找过我。我也到他的家里去过1或2次。

在一份审讯记录里写着，说舍伊宁对我讲过，他想到以色列国去，在那儿平静地度过此生。舍伊宁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种事情，我在侦讯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审判）长：对于他的民族主义信念你了解些什么？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米霍埃尔斯跟我说过他们俩认识，但是我没有听说过他们见过面。

（审判）长：侦讯时你把他形容为一个狡猾的人，有狐狸一般的习性。

希梅利奥维奇：那是留明写下的那么一种评语。

（审判）长：你曾经讲过，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视情绪。

希梅利奥维奇：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要想这样讲就必须准确地了解这些事情。这都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写进那份记录的。费费尔的供词说，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在剧院里米霍埃尔斯的遗体旁边有一位妇女（我就不说她的姓名了，因为这个姓名法庭是相当熟悉的）一直待了6个小时，这位妇女告诉费费尔，米霍埃尔斯之死并不是汽车撞的，而完全是另有原因，而他，费费尔，据说又仿佛把这事告诉了其他的人，其中也提到了我。

我必须把下边这个情况讲明：我在开追悼会的那个剧院里站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上边说的这位妇女。我在1948年就认识她了。我想，如果她去了那个地方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被介绍给她的。无论是在那些日子还是在后来的几年里，费费尔从来都

没有提到过她曾在那个地方待了6个小时。我只是从他的这些供词里才知道了这件事，并且了解到她对米霍埃尔斯很好，他也对她十分尊重。费费尔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曾告诉过他，米霍埃尔斯之死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审判)长：你本人和费费尔谈过米霍埃尔斯死亡的事吗？

希梅利奥维奇：没有。

(审判)长：你怎么，只是从费费尔的供词里才知道这个情况的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完全是在1952年从费费尔的供词里才知道这些的。

(审判)长：费费尔，是怎么回事？

费费尔：那个时候我甚至连剧院都没去过。是祖斯金供认曾见到过她。希梅利奥维奇全都弄乱了，这是他的幻想。

审判长提出供述一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民族主义活动，得到的回答是：

希梅利奥维奇：对所提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对委员会成员的民族主义活动我一无所知。

费费尔在揭发希梅利奥维奇的供词中指控他进行民族主义活动，说希梅利奥维奇是米霍埃尔斯最亲密的参谋，因而对委员会的全部民族主义行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就加尔金作证的事审判长问希梅利奥维奇，他是否认识加尔金。

希梅利奥维奇：总的说来，我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位作家的，在会上我也见到了他本人。我说不上来那是哪一年的事了，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是在1944年之后。关于他这个人我能说的也就是他常出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但是我没听到他发过什么言。他写的诗

我根本没有看过。关于他的为人我也讲不出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说一说，大约（我有可能记错）是在 1945 年或者是在 1946 年，我在医院巡查病房的时候看见过他。他住在 7 号楼，我是不往那里安排病人的。他害了一次严重的血管梗塞，过了一段时间又得了一次严重的血管梗塞。我还敢说他对我也是什么都不了解。也许是他害过两次严重的血管梗塞之后，他在接受侦讯时看来是不想再第三次患梗塞，所以把记录给他读过之后他就表示同意了。关于他我再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审判）长：格林贝格的供词你看过吗？在第 27 卷的第 273 案卷页上有 1948 年 3 月 1 日审讯被逮捕的格林贝格的记录。你是认识扎哈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格林贝格的，被捕前他是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30 年入党。他早在 1948 年 3 月 1 日，也就是在你被捕之前一年就已经供出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还说到在民族主义者当中希梅利奥维奇也起着显著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米霍埃尔斯把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拉进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中就有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费费尔，佩列茨·达维多维奇·马尔基什，犹太诗人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克维特科，科学院院士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包特金医院的主任医师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希梅利奥维奇……”（卷 27，案卷页 284）。

你瞧，他说你是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希梅利奥维奇：我要完全负责地说，在给我看的那些卷材料里边我见过格林贝格的供词，但我不记得他曾经提到过我。

（审判）长：显然是你看漏了。诚然，在供述的时候格林贝格把事情推给了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说你的情况他是听他们说才知道的。格林贝格本人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

希梅利奥维奇：格林贝格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这我也不知道。

(审判)长：他说：“……1942年我被选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很快我就确信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组织”(卷27，案卷页281)。

希梅利奥维奇：1952年，我在一卷材料中第一次看到了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特别令我惊讶不止的，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沃夫西教授竟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我想，假如他是委员会的成员，他是会把这事告诉我的。沃夫西教授是怎么列进了我1952年见到的那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这得问费费尔了。

关于格林贝格我什么也不了解。费费尔在这儿的法庭上对你提出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回答说，直到被关进监狱他才明白了委员会的工作是民族主义的，只是到了这个地方他才弄清楚了这一点。可是如果说他费费尔一直到来到这个地方才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他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告诉格林贝格委员会做的工作是民族主义的呢。与此相关联，费费尔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认定我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的活动是民族主义的呢。

对格林贝格的供词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审判)长：你对案情已经了解过了，在开庭的过程中委员会进行的许许多多民族主义活动的事实也一件件地在你面前摆了出来，你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

现在你来说，希梅利奥维奇，你是否认为自己对委员会进行的全部这些民族主义活动负有责任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并不认为自己作为主席团的委员对委员会的这些活动负有任何责任。

(审判)长：为什么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名委员并未得出委员会及其

主席团是民族主义工作的中心这一结论。在委员会里是否进行过民族主义的犯罪活动呢？我在审判之前对此并不了解。现在听过许多人，其中也包括费费尔的发言之后，我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在委员会内有几个主席团委员进行了秘密的工作。

(审判)长：是哪几个？

希梅利奥维奇：从发言和对给费费尔提出的那些问题做的答复中，我十分明确地形成了一种认识，即在入狱之前他也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说他终生都反对同化。在我国的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反对同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同苏联政府进行斗争，我对此不能做另外的理解。他在这个地方先是回答说，是根据罗森贝格的提议才同罗森贝格谈克里木问题的，可是后来如我们在此已经调查清楚的那样，关于克里木的问题费费尔早在去美国之前就同米霍埃尔斯及其他人谈过了。他声称，对罗森贝格跟他讲的：克里木就是黑海、土耳其和巴尔干，他根本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如果这句话真的讲过，不认为它有什么意义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审判)长：是谁在委员会里进行秘密活动？

希梅利奥维奇：从费费尔在这儿的法庭上的口供和我们两次对质（后来被概括进一份记录中）时我听到的事情里，我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这就是费费尔。

(审判)长：只有费费尔一个吗？

希梅利奥维奇：往下我就什么人也说不上来了。

(审判)长：你常到主席团去，又是委员会的一位积极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就没能把这项秘密工作揭露出来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没有看见过这种民族主义的罪恶活动。

(审判)长：难道先前你在被捕前就不知道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你昨天说他写的《我是一个犹太人》是一篇民族主义的诗，难道说他只有这么一篇民族主义性质的诗吗？

希梅利奥维奇：正如我已经对你说过的，我是在阅读鉴定书的时候，就是1952年，才第一次知道了这首诗的内容的，我完全清楚这首诗是民族主义的。

(审判)长：法庭再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了。

希梅利奥维奇：我可以对费费尔的供词做些说明吗？

(审判)长：可以。

希梅利奥维奇：对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费费尔说，尽管速记员可能有记得不准确的地方，但发言都基本上正确地记到了记录上。我觉得记录是由主席，而不是速记员进行校对的，不能把全部过错都推到速记员的身上去。

这3个年头，依我看，费费尔在监狱里过得并不差，所以他的记忆力是不应该有问题的。所以说费费尔应该清楚地记得，在他和米霍埃尔斯去美国之前他来到我家并非应我之请。

费费尔说，当时在我家的有沃夫西和扎斯拉夫斯基。我对此予以否认，并且声明，在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临行之前无论是沃夫西还是扎斯拉夫斯基都没有到我那儿去过。在我家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茶。整个谈话的时间不超过10~15分钟。费费尔已经把好多人，甚至一些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毫无任何关系的人都拉扯进这件事情里来了。说扎斯拉夫斯基和沃夫西正在我家里那是谎话。

费费尔，我现在已经不是1949年1月，2月和3月那个时候了，我现今没有任何幻觉，我现在声明，1952年3月我在案卷里读到了你曾供说，这位妇女（她的姓名法庭是知道的）在米霍埃尔斯的灵柩旁站了6个小时，她给费费尔说了些什么，因而费费尔也把这个转告给了某些人。这不是幻想出来的，这是真实的。

马尔基什在这儿发言的时候曾说，诗人常常被诗所控制。诗人

受到诗的控制那可是够糟的，我不知道你，费费尔，是受什么人控制的，不过你在这儿讲的事情，很多都是谎话。

关于我据说是在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仿佛发言谈了犹太难民的遭遇，这件事我没有可说的。我就一直没能想起来我和马尔基什一起在什么地方发言这回事，我根本就不记得我曾经和马尔基什在一起研究解决过什么问题。

当在这儿的法庭上不止一次地向费费尔提出，他认定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中哪些人是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过我。可是今天他却说我的一些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费费尔说他很少和我见面，原因是我不需要和他见面，因为所有的消息我都是去向米霍埃尔斯了解的。当然了，现在往已故的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的身上推倒是可以的。

费费尔说，希梅利奥维奇和米霍埃尔斯最亲近，尽管他预先声明说，他们之间也许并没有思想上的联系，但我和米霍埃尔斯很亲近他是完全肯定的。我不否认我和米霍埃尔斯很友好，但米霍埃尔斯并没对我讲过什么犯罪的话。

他们把关于克里木问题的呈文的副本送给约·维·斯大林的事我并不知道。

费费尔昨天说，我的那份呈文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色调或意味。

当1949年进行侦讯时我被告知，罗森贝格在谈话中曾对费费尔说，克里木——这就是土耳其、黑海和巴尔干时，费费尔在我的眼中就已经变成了罪人。虽然他在这里力图把此事解释为是罗森贝格据说仅就克里木的美景所发的喋喋冗论，所以费费尔并没认为此说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从我读了这些供词的那一天起费费尔在我的眼中就变成了一名罪人。

(审判)长：你还要对法庭讲些什么？你的回答法庭认为已很

清楚明白了。

希梅利奥维奇：在那份记录着我据说是发言要求扩大职权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记有费费尔的一次发言，他在这次发言中说没有像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希梅利奥维奇那么脱离委员会的人。

其次，爱泼斯坦也有过一次发言，说希梅利奥维奇从来没有读到过也没有见到过一篇发给国外的文章。这就意味着秘密活动还是存在的。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政府没有同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关于克里木问题的信件所提请求的事，既没有通报给主席团，也没有告知我。

关于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组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进行考察的结果，也没有向我和主席团做通报。戈尔德贝格是一家反动报纸的编辑这件事，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名委员就没有听见费费尔提起过。我听到的是戈尔德贝格是科学工作者委员会的主席，苏联的朋友。

戈尔德贝格和米霍埃尔斯（我不知道那时费费尔是否在场）晋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事费费尔没有向我通报。戈尔德贝格于当日就向美国发回电报，报道苏联领导人说比罗比詹将来可以成为犹太共和国，对此费费尔也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从案卷里了解到，费费尔曾经和在美国的戈尔德贝格进行过电话谈话——就是说打的直通电话。他什么时候说起过他和戈尔德贝格通过电话进行过交谈，这些电话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吗？从来没有说过。

现在说提名希梅利奥维奇候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也许费费尔确实同海菲茨说过此事，不过我了解的是下面一些情况。

舒梅科曾问过我，该推荐谁作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我没有合适

的人选。后来他又问布雷格曼这件事，布雷格曼也是说不知道。舒伊宁提名鲍里斯·沃林^①，政治经济学的作者，早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这次谈话时我在座。

在这儿的法庭上，费费尔一开始并没有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可是当你问到他这一问题，并向他宣读了他自己曾说包特金医院几乎没有俄罗斯族工作人员的供词时，他立即声明这是听米霍埃尔斯说的。让费费尔也知道一下，费费尔说了这话之后过了几天我就向审判长呈交了一份包特金医院领导人员的名单。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科室主任总共是 45 或是 47 人，其中大约有 36 名俄罗斯族人。医院里有 40 多名护士长，而在医院里护士长就是科主任的主要助手，这些护士长当中只有 2 名犹太族护士，等等。8 位共和国功勋医生中有 6 位是俄罗斯族人，2 位是犹太族人。

我还想说一说你，审判长公民，在这儿宣读过的尤泽福维奇在侦讯时说到我的那些供词。我在阅读尤泽福维奇的供词时，没看到案卷材料里有对我不利的内容。

尤泽福维奇在这儿的法庭上说，他没听到我说过什么民族主义内容的话。

关于马尔基什的供词。在他最初的供词里并没有提到过我，可是现在他却认为我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马尔基什声称我有 5 年的时间没有和他打过招呼，这就是经过了那次据说是我挑起的争吵之后的事。这是不对的。我没挑起过任何争吵，也从来没有不和人打招呼的习惯，即便是这些人在我面前有过什么过错也是一样。马尔基什所说的那次争吵，如果这件事可以叫做争吵的话，发生在 1941 年，在那之后是马尔基什自己再不和我打招呼了。照马尔基

^① 鲍·米·沃林（1886～1957），曾任历史科学杂志主编，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什的看法，我是米霍埃尔斯的朋友嘛，而米霍埃尔斯和马尔基什两个人是对头。

说几句“黑皮书”的事。我是从爱泼斯坦发自古比雪夫的一封信（就是存放在案卷里边的那封信）里知道了“黑皮书”的事的。爱泼斯坦在信中写道，已决定合作出版“黑皮书”。没有要我参加“黑皮书”的编写工作。关于这本书我没有什好讲的，因为我没看过这书，可是鉴定毕竟还是指出，“黑皮书”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审判）长：你怎么着，是不同意鉴定书对“黑皮书”的结论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同意。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在1943年，一本编辑出版得很成功的（不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讲述希特勒匪徒在各个国家对犹太人犯下的残暴兽行的书是会有好处的。

（审判）长：你同意“黑皮书”鉴定书的结论吗，那里边指出这书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它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我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对这本书负有一般责任。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对自己的口供有什么补充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的，我请求准许我提供一点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情况。费费尔终于说出来了，给魏茨曼发贺电的问题没有在会上讨论过。既然这个问题没有经过主席团会议的讨论，那次会议的记录上为什么第一次就记的是关于致魏茨曼的贺电问题？

（审判）长：费费尔，这个问题讨论过没有？

费费尔：在主席团会议上宣读了贺电的电文，可是由于电文已经得到中央的同意，所以就没有进行讨论。

希梅利奥维奇：1949年3月11日的审讯记录里，侦查员写上了我曾讲过什么什么有关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的话，我想就此事说几句话。我反反复复地说了三年半的时间，我出席了那次讨论致电英国工联主义者代表大会抗议英国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问题的主席团会议。很清楚这样的电报是事先已经协商好了的。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并没有说像这份记录中所写的那些话，这我是确切地知道的，她问了两次：“确实进行过核查，证实那儿出现了蹂躏暴行吗”。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就看得出来对事情缺乏政治上的认识，然而说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曾经讲：“应该看一看在什么人那里有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也就是说这种暴行不是出现在那边，而是发生在我们苏联这里，关于这一点我三年半以来一直对所有的侦查员，包括留明在内，说不是那么回事。

（审判）长：就是说你否认你讲什泰恩的这些口供？

希梅利奥维奇：是留明这样记的，我跟他说过这方面的事，他说，她的发言不是政治性的。我对此回答他说，本该让她知道这份电报是得到中央同意的。

（审判）长：什么电报？

希梅利奥维奇：抗议电报。我对留明说：请你记上，我供认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在那次会上两次发言问道：“那儿真地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消息确实吗”。这样我就签字。因为这是写在记录里边的，这是留明在当夜记上去的。我不能像洛佐夫斯基那样办，他是对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进行诬陷，然后再在这儿道歉，我没有诬陷任何一个人。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我只说事实上真正有的事，在整个3年又4个月的侦讯过程中我反复这样说，现在在法庭上我还是这么说。

我还要说一说1949年3月11日有关那位我们都知道的妇女的供词。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情况讲出来吗。进行审问的第一个晚上，

部长就问过我这件事，这是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请你说说你的那些首长”。我说我没有什好讲的。我是在被捕前2~3周在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上认识这位妇女的。是伊万诺夫厂长介绍我和她认识的。米霍埃尔斯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米霍埃尔斯还说过，在为犹太剧院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她曾大力参与，在很多方面都帮过忙，然而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她领导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或者是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在1952年受审时说过，我积极地参与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其表现是我写过几份呼吁书。我还要出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份正式的信函，信中指出我不按期地参加主席团的会议，从而使主席团的会议无法举行。这封信是由米霍埃尔斯签的名。好像是布雷格曼也接到了同样的信函。

(审判)长：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希梅利奥维奇：我要说我没有参加这些会议并不是因为同委员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分歧，而只不过是我的时间不够。我还想讲一件事情。

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指责我没有接受费费尔的女儿到包特金医院来工作。的确，我就是这么办的，没有接受她到包特金医院来作医生。有那么一项指令：包特金医院接受的医生至少要有2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费费尔的女儿是一个刚刚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医生，所以她被拒绝接受到医院来工作。

(审判)长：从那时候你就和费费尔吵翻了吗？

希梅利奥维奇：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

(审判)长：这是哪一年的事？

希梅利奥维奇：是1946年的事。

(审判)长：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希梅利奥维奇：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有一个时期我没有参加主席团的会议，但我不否认出席会议的时候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

(审判)长：你还想说什么呢？

希梅利奥维奇：我想说，在我漫长的整个一生中，无论是从内心里还是在思想上，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党。我想都没这样想过。所以1949年3月11日留明对我说，我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全部活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时，我回答他说，如果说道义上的责任就是把我抓起来，让我受肉刑，那么这让我无法理解。他对这个回答没有表示什么。

侦查员斯特鲁戈夫跟我说，如果我表现得好，如果我招供，法庭会考虑我的功绩的，等等。

(审判)长：侦查员是不可能对你讲这些话的。

希梅利奥维奇：党把能给的都给我了，我什么都有了，我是共和国的功勋医生，医院被授予列宁勋章，我从什维尔尼克手中接过了卫国战争勋章，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手中接过了劳动红旗勋章。我在苏联的保健部门工作的这30年间，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说过什么不好的话。

我要说——如果说我在党给了我一切之后，在我作了29年的党员，担任了25年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之后，做出了反对党的事情，那么我请求法庭对我30年间在保健方面做出的任何功绩都不要予以考虑。

如果法庭认定我对党犯下了罪行，那就让法庭给我以最严厉的惩治。

至此对希梅利奥维奇的审讯结束。

1952年6月4日19时48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6月4日20时20分继续开庭。

№1171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4日)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现在由你向法庭供述你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

布雷格曼：我以前曾经声明并且现在还要声明，我不承认自己犯有指控我的俄罗斯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和第58-2条各项罪行，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有必要向法庭声明，我认为在联共（布）中央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同意了加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这是有罪的，不过，我当时以为洛佐夫斯基向我提出这项建议的行动是得到了中央同意的。

我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但是我相信了洛佐夫斯基会采取改进这种工作所必需的措施，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有罪的。

我的第三个罪过是我本该早一些到联共（布）中央去报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的那些违反规章的事情，而我却去得晚了一些。

(审判)长：你本该早一些到中央去，可是却去晚了，具体说是要报告什么问题呢？

布雷格曼：你看是这么回事。我不止一次对洛佐夫斯基谈过（我找过他不是像他在这儿所说的两次，而是上20次）委员会的工作不对头的问题。我看到处理主要的工作都把那些非驻会的主席团委员排除在外。我作为一名这样的主席团委员，看得出来米霍埃尔

斯、费费尔和其他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排挤我和其他的一些同志，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那些编辑们，并不是我们。

(审判)长：这其他一些人都是谁呢？

布雷格曼：海菲茨，戈尔德贝格，海金，还有什么人来着，记不得了。

(审判)长：是莱温吗？

布雷格曼：不记得了。不过根据费费尔的说法来判断，这些人对向国外寄发通讯稿件的问题有权做出最后的决定。

(审判)长：我想弄准确些，你认为到中央去晚了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布雷格曼：反映我发觉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倾向，首先是《埃尼凯特》报的问题。

(审判)长：你应该把这些问题提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你承认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是有罪的吗？

布雷格曼：我给洛佐夫斯基提过，可是应该向中央提出，洛佐夫斯基对我跟他讲的那些事哪一件也不加辩驳。

在布雷格曼向法庭讲完他履历中的几个主要阶段之后，法庭开始调查布雷格曼和他在30年代被镇压的几个同事——马尔古利斯，塔根巴乌姆，埃斯金的关系。在起诉书中这些关系被认定为罪行。布雷格曼举引事实证明他同这几个人的相互关系在30年代就经过了详细地考察，控告布雷格曼的各项罪名都被撤销了。

布雷格曼：我再一次声明，我同马尔古利斯、塔根巴乌姆和埃斯金之间没有任何反党的、反苏的、有危害的关系。

(审判)长：在侦讯时你说过（卷5，案卷页37~40），你曾协助马尔古利斯和埃斯金用不正当的办法做出了旨在破坏收购皮革原料工作的决定，又协助塔根巴乌姆破坏皮革代用品投产的工作，也

就是说你曾协助他们进行敌对活动。

在1952年3月11日的审讯记录中（卷6，案卷页152）你也说过：“我没有加入过任何反党的组织和集团，但我承认同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右倾分子马尔古利斯、埃斯金和塔根巴乌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布雷格曼：我否认这些供词。我是受了情势的影响才这么供认的，不错，我是没有挨过毒打，而只不过是问题提得十分尖锐，说我是间谍，我就惊慌失措了。

（审判）长：可是卷宗里边有塔根巴乌姆的供词（卷30，案卷页203），他供说你是右倾分子反苏组织的成员，并且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你了解这些供词的内容吗？

布雷格曼：不了解。我没有去阅读这些东西，我给约·维·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指出这是诬陷。

（审判）长：这是埃斯金的供词（卷30，案卷页336）“……关于雷夫金和布雷格曼参加右倾分子反苏组织的事我既听马尔古利斯说起过，也从他们和这些人直接谈论我们所进行的反苏活动的话里边了解出来了。

塔根巴乌姆参加这个组织的事我是听布雷格曼说起才知道的。”

布雷格曼：我多次对侦查员说过，这是对我的诬陷，我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的三人集团，对这件事我曾给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写过声明。我过去和现在都敢肯定，这是那些被抓进来的人捏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话。

然后法庭对解除布雷格曼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工作的情况进行调查。

（审判）长：可是你说过，“我的所有这些行为致使我未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于1943年5月我被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解除所任职务……”。

布雷格曼：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认为他是完全胜任交付给他的工作的，我看过由约·维·斯大林签署的关于解除我的工作的决定的摘录，那里边说——同意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组的建议，解除我的职务并派我去做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因此，侦查员说我不是被解除职务，而是被撤销职务是不对的。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召见我的时候，我对他表示了我的愤慨，我说：“我不合适吗，你干嘛召开党组会议不通知我参加，不敢当面对我说我胜任不了工作呢？”他对我无话可答，我明白了，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得服从。在同一时间主席团也做出了决定，同时宣读了两份摘录：一份是政治局解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的决定的摘录，另一份则是任命我为俄罗斯联邦国家监督部副部长，因为我曾对格·马·马林科夫表示过，我没有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如果可以，我请求给我安排一份监督工作，这种工作和我比较接近。

在这个职位上我全心全意、老老实实地干了6年左右。在这份工作上我没有受过任何批评，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时也一样……

洛佐夫斯基对这件事补充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审判长公民，我在这儿做供述时已经说过了，在我和亚·谢·谢尔巴科夫进行预备性谈话的时候，他建议我让布雷格曼进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我当时曾告诉亚·谢·谢尔巴科夫，布雷格曼被撤销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会，他回答说：“那又怎么样，他被解除了一项工作，可在国家监督部又干得不错，你把他叫来，先跟他谈一谈”。

No 1171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5日)

布雷格曼：……在第一次以及随后的几次审讯中，侦查员都曾设法要我证实他的一种看法，就是我把解除工作看做是对犹太人采取排斥态度的一种迹象。可是我却对侦查员说，我不能把排斥犹太人的思想加给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确实，我就开始从我做党务工作的时期及根据是哪个民族的人对领导干部的成分进行调整的那个时期，给他举出一些实例来……

(审判)长：可是1952年3月份你曾这样供认过，还在供词上签了字。

布雷格曼：那是又干了一次蠢事。

(审判)长：那可是侦讯已经接近结束了啊？

布雷格曼：我当时正在生病。

(审判)长：你生的什么病？

布雷格曼：心脏有病。

(审判)长：可是检察长在场时你也说过这个问题呀？

布雷格曼：那是对我自己和对洛佐夫斯基的诽谤。

(审判)长：从你的口供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洛佐夫斯基知道你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他才把你派到委员会来。

布雷格曼：我和洛佐夫斯基除了党务和工会的事务外，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事务上的接触点，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可能说得出来我们什么时候谈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话题。我跟民族主义者斗争了一

辈子，这会儿自己倒成了民族主义者。我加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没有任何好处。我把这看做是一项值得重视的重要的政治工作。我习惯于做大量的社会工作。当洛佐夫斯基把我叫到苏联情报局，并问起我，进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担任一名主席团委员我觉得怎么样，那时他没有做任何的宣传鼓动，没有对我进行说服，只是平平淡淡地说，这件事值得重视，说有那么几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犹太人委员会，它的成员——作家、诗人等等之间不是那么同心协力的，由于我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工作经验，我到那儿去是会有好处的。我也没有过多地向洛佐夫斯基详细询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情形，那次谈话总共用了不超过 20 或 30 分钟的时间。

他又问道，我是否还知道有哪些老的联共（布）党员可以像我这样派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

（审判）长：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之间在工作上不能同心协力是怎么回事呢？

布雷格曼：诗人和作家们相互“吵架”。

（审判）长：你干什么非得要介入这种“争吵”当中去？根据被告人们的口供可以看出，把你派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是专门为了让把那儿做的民族主义工作重视起来的。

布雷格曼：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什么我和洛佐夫斯基之间有勾结，派我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是因为我在情绪上是民族主义的，我在这个委员会里为戈尔德贝格、莱温、诺维克的朋友们做了掩护等等，这些都是侦查员说的。

我声明，我到这个委员会去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审判）长：你在侦讯时曾供认，洛佐夫斯基派你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为了让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更难以察觉，更隐蔽。

布雷格曼：洛佐夫斯基没有讲过一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有民族主义表现的话。他是说那儿的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之间有“争吵”，而且这事许多人都知道。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和你商谈之后，就委托你给委员会物色合适的人吗？

布雷格曼：是的，我观察了一些人，认为舍伊宁、古别利曼、布里克尔适宜做这种工作。说这几个人是民族主义者那真是笑话。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民族主义的政党，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右翼分子进行过斗争。古别利曼是出了名的老布尔什维克。舍伊宁我从1919年就认识。

（审判）长：他叫什么名字？

布雷格曼：姓舍伊宁，名字是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914年入党。他是拉·莫·卡冈诺维奇铁路高级讲习所的所长。我是在乌克兰工作时和他认识的。他担任过工业大学的首长，准确说是校长。我劝说他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虽然我并不知道，这项给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增补新成员的决定是不是由联共（布）中央做出的。

布雷格曼：……洛佐夫斯基曾指示我，要我挑选那些从未参加过任何其他党派的人。经过一番认真地考虑，我就想到了这几个人。所以我再一次肯定我和洛佐夫斯基之间没有任何勾结。他那一方面也丝毫没有向我暗示过，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什么民族主义的表现，我必须对此采取保密措施。是我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去找洛佐夫斯基，说我发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中有一些不正常的民族主义的现象。所以说，侦查人员讲我和洛佐夫斯基之间有勾结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审判）长：可是你赞誉有加的舍伊宁供出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他既讲了洛佐夫斯基的，也讲了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他承

认自己和他们一起搞民族主义活动是有罪的。

布雷格曼：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我向法庭供认的都是真实情况。

(审判)长：从你的口供中可以看出，洛佐夫斯基是整个委员会进行敌对活动的思想上的鼓舞者。

布雷格曼：我被逮捕后，听侦查员说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说它是一个民族主义和谍报的中心，而且苏联情报局的领导是知道这些的，我当时就说只有暗藏的敌人才可能这些做。如果我早先，在侦讯之前知道这些事的话，我当然会到中央委员会去报告这一切的。

等我进入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我发现那儿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略微懂一点犹太语，但不能用这种语言流畅地阅读。我开始艰难地阅读《埃尼凯特》报，观察委员会的会议是怎样开的，于是我就看出来从组织政治观点说来，那儿是一团糟。会议记录记得很不像样，议事日程也不编制，工作没有个计划，记录不给主席团委员分发。这使我想起了1919年村苏维埃的工作情况，当时我曾多次接触过那种工作。

(审判)长：那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秘书是谁？

布雷格曼：爱泼斯坦，后来是费费尔。主席团开会也是乱糟糟的，这位主席团委员在，那位不在，这位来了，那位没来，希梅利奥维奇在这儿讲过，有一位主席团委员——弗鲁姆金科学院院士——根本就没参加过会议。

后来我开始发觉对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持容忍的态度，我特别记得有一次主席团会议，在那次会上记不得是由卢里耶还是由克维特科做关于克里木之行的通报，当通报到犹太人区域的名称已改掉，换用俄语名称（例如，斯大林多尔夫改称斯大林区）时，马尔基什站了起来，以他那特有的火性开始发泄怒气：“……斯大林宪

法完了，斯大林基本准则完了！为什么要改换斯大林多尔夫的名称？必须把这个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来，”等等。

我当时立即发言说马尔基什的做法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但是无论是费费尔，还是爱泼斯坦，或者是米霍埃尔斯都没有对他讲一句话，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对马尔基什既关爱又有耐心。过了1~2天我把此事告诉了洛佐夫斯基，并说这件事情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很不痛快的。后来，我看《埃尼凯特》报的时候，注意到该报的第一版上有很多关于比罗比詹的文章。我跟他们说，比罗比詹有自己的报纸，干什么要把《埃尼凯特》报变成一张州报呢，这件事我对日茨和洛佐夫斯基都说过。然而，不是应该告诉他，而是应该去报告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我也给《埃尼凯特》报写过3篇文章，我愿意为这3篇文章的政治内容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文章谈的是：乡村里的群众政治工作，工会的任务等等。我认为，不在报纸上阐述这些问题是不对的。

另外一件事，那是1945年爱泼斯坦报告工作的时候。我在这次主席团的会议上和别人不同，做了一次激烈的发言，我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变成了赡养某些犹太作家的地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和犹太作家组的工作合并到一起了。有人给国外写东西，写些什么，给什么人写，我们这些主席团委员都不知道。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在这次会上摆出一副外交家的姿态，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呢？应该把问题提到另外的地方去。

布雷格曼：1946年里和1947年的4月7日，我两次去联共（布）中央的一个部，在那儿我把我认为该讲的都讲了，讲了我所知道的那些事情。舒梅科不会否认这件事的。我首先请求他把我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充斥着的那种陈腐发霉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在那种氛围中我无法工作。

我同意你的看法，审判长公民，在这方面我老是和洛佐夫斯基商谈，是干了一件大大的政治蠢事。我曾对他说，我要去找安·亚·日丹诺夫提出加强委员会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无论是米霍埃尔斯还是费费尔都不能再让他们当领导了。

(审判)长：那是因为什么呢？

布雷格曼：第一，我看到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和《埃尼凯特》报上有民族主义的表现。

(审判)长：那么说这是一张民族主义的报纸了？

布雷格曼：我无法说《埃尼凯特》报是民族主义的，因为我并没有系统地读过这份报纸，也没有做过分析，但在报上还是见到过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和报道，而且看到根本没有一点批评。

(审判)长：侦讯时你还说（卷5，案卷页94）“……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边，我按照洛佐夫斯基派定的任务，把钻进委员会的那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干的罪行对党隐而不报。不仅如此，受充斥于委员会内的那种民族主义氛围的影响，我也和其他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一样，参加到敌对活动中去了”。

布雷格曼：我不能同意供词这样的表述方法。

(审判)长：你昨天还说过，侦查员没有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所有的口供你都是自愿招认的。

布雷格曼：是侦查员坚持要用这种说法的，我也就同意了。

(审判)长：要是你认为这样一种说法不对，你为什么要同意呢？

布雷格曼：不管怎么样，你若是把1952年的供词和1949年的供词加以对照的话，那这两份供词之差别是很大的。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同意了侦查员的这样一种说法是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蠢事。假如我一到委员会就知道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并且还提供间谍情报，那我是必须要把这种情况

报告给相应的机关的。我到委员会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声明，我当时不知道委员会的活动还有这样一个方面。我极力向侦查员说明我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想理解这种情况。

(审判)长：侦讯时你说到(卷5,案卷页95),你的第一个敌对行动是参加了关于克里木问题致政府的信件的讨论。

布雷格曼：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法庭是完全清楚的，这些议论发生在我来委员会之前很久的时候。侦查员却硬要说我参加了议论这个问题，在这件事上他欺骗了我，他本来是应该给我看记录的，但是却没让我看。我完全没有参与解决克里木的问题，而且在主席团的会议上也参与不了这种事情。

(审判)长：我问你，你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进行的犯罪活动的供述是否属实，对这种犯罪活动你不仅是观察而且是参与进去了？

布雷格曼：我没有参与进去。

(审判)长：怎么可能那样呢？你参加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观察了《埃尼凯特》报的民族主义活动，既然你保持了沉默，那就意味着你对所有这些都是同意的，就意味着你也参与了，即使是你对全部这些敌对活动采取观望的态度，那也是一种默许和包庇，你反正还是有罪的。

布雷格曼：犯罪也有不同的情况。我对这些现象并没有听之任之，我向洛佐夫斯基报告过，去找过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纵容这种事。另一方面，其他被捕的人也没有在口供中说我，布雷格曼是民族主义者，我支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干这些事情。

(审判)长：可是你刚才说过，你去找过洛佐夫斯基谈这些问题，去中央委员会反映过这些问题，可是在委员会里边和会议上反苏的议论不绝于耳，反苏性的攻击时有发生，民族主义的言论更成

了家常话，很明显你没有把这些问题足够尖锐地摆出来。

(审判)长：你怎么会在被捕之前对民族主义的活动一点都不知情呢？

布雷格曼：是的，并不知道。

(审判)长：那你去找洛佐夫斯基是谈什么问题呢？

布雷格曼：我没有对洛佐夫斯基说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事，而是跟他讲了我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们努力扩展委员会的职能感到不满。

№ 1171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6日)

法庭转入对控告的下一条罪状进行调查。

(审判)长：你参与“黑皮书”的出版表现在哪些事情上？你知道“黑皮书”的鉴定书的内容吗？鉴定书认为此书是一部民族主义的文件，而你是参加了此书的编写工作的。

布雷格曼：“黑皮书”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已经是我来到委员会之后好几年的事了。我们这些非常驻的委员们并不承担委员会主席团的什么固定的职责，与它的日常工作是脱离的。到苏联情报局去和洛佐夫斯基谈话的时候，委员会里边我常常听到人们谈起“黑皮书”，说因此作家之间还有斗争。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黑皮书”与纽伦堡审判有关，委员会积极地参与了这件事。在我给洛佐夫斯基讲我听到的那些事情，讲爱伦堡和格罗斯曼在令人难以理解地争吵时，他们究竟在争执什么我并不了解。直到后来我才得知，爱伦堡和格罗斯曼因给“黑皮书”写的那些材料获得了数万卢布。洛佐夫斯基问我，成立一个小组来审查苏联情报局和委员会为“黑皮书”准备的现有材料，我有什么意见。我同意了审看材料。

(审判)长：你不是一直在说你的工作非常多吗？

布雷格曼：我是指社会工作。说我没有承担什么任务，而在公职方面我的工作是不够多的。我把这项提议看做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任务，因为是一位中央委员同时又是苏联情报局的局长推荐我领导这

个小组，他没有权力硬性要求我做这件事，因为我并不归他管。我表示同意，因为我一直确信我是在做有益的事情。组成了一个小组，包括我，尤泽福维奇，舍伊宁，鲍罗廷，格罗斯曼（他很少参与工作），还有苏联森林工业部的米尔施泰因。这个人是舍伊宁推荐的，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只吸收作家参加此项工作。一连3周都没有发下任何命令确认我们这个小组的成立，但是我们却干了很多工作，日以继夜地干。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分担了此书的一个具体的篇章进行审查。材料非常之多，我们读完了材料就碰头，交换意见，等我们把这项工作全部做完之后，并没有提出书面的结论。

我们得出结论（特别是在格罗斯曼写出关于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的文章之后），认为爱伦堡和格罗斯曼的材料要好多了，写得文化水平更高一些，政治内容更丰富一些，等等。另外，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里边发现一些地方有歪曲现实的政治问题。那些地方甚至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当地人曾和德国人一起参与消灭犹太人，而在格罗斯曼的材料中则强调了相互的情形，举出了不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公民援救和隐藏犹太人的实例。

我把这种情形报告给洛佐夫斯基，并且说现在对全部这些材料必须仔细校勘，到相应机关去核实，只有这样做了之后，才可以该送到哪儿就往那儿送。

至此我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审判）长：这些材料要送到哪儿去呢？

布雷格曼：那要看苏联情报局认为该往哪儿送了。

（审判）长：你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材料是为美国准备的？

布雷格曼：洛佐夫斯基和小组的其他成员跟我说，这份材料和纽伦堡审判有关系的。

（审判）长：既然你审看了这本书，了解了它的内容，那么由

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你也是共同犯罪。

布雷格曼：我承担的任务范围极其狭小——就是了解一下这些材料。

（审判）长：假如你是反对这本书的内容的，你就该申明此书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布雷格曼：假如给我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我当然就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材料。现在这个问题是随便怎么提出都可以。所以就弄成了是洛佐夫斯基让我上了当，我倒要为此承担政治责任。洛佐夫斯基召我去的那个时候，那儿一方面是在格罗斯曼和爱伦堡之间，另一方面是在委员会和作家之间正在争钱争利，闹无谓的纠纷，我还以为我们是在做好事。在我们小组审查完材料之后，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但是我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有一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被列入了这个编辑委员会。不过我要说，我对此并不感到惋惜。

假如当初这个问题是像你现在这样一种提法的话，审判长公民，事情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我当时认为交给这个小组的任务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不过是选定一些材料，再加上些评语。事后我曾对洛佐夫斯基说，对这些材料还需要从政治和文学的角度进行校订，因为爱伦堡和格罗斯曼只是作家，他们有可能写得不准确。但是我没有提出过把材料寄到美国去。

洛佐夫斯基在这儿说，有一份舍伊宁的讲话，舍伊宁曾出席纽伦堡审判为希特勒匪徒的受害者辩护。

我的罪过是什么呢？就是这份材料是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侦查员把这一点看得特别重。侦查员对我是这么说的：“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就是犹太人遭受的牺牲最大，而其他民族受到的牺牲要小一些，因此对犹太人应当给予更多的关心。‘黑皮书’就是这一切的后果，因此你就提出建议，把编此书用的材料寄到美国

去”。我在这儿，同时也是向侦查员声明，我没有提过这种建议。至少，说是由这个小组决定该把材料寄到哪儿去是可笑的。

接下来审判庭转而调查布雷格曼和戈尔德贝格的关系。

(审判)长：可是他也利用了你，你也给他转交过材料吧？

布雷格曼：我没有转交任何东西。这件事是从那份倒霉的资料开始的。

(审判)长：你什么事情都是倒霉的。

布雷格曼：如果你把侦讯材料看一看，你就会确信，在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我从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时会见外宾的活动中知道，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有关我国建设，特别是文化方面的成就的材料。事情是怎么个情形呢？我得知，现在已记不清是听施皮格格拉兹说的，还是听费费尔说的，委员会要对有关苏联文化和经济发展成就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然后把它交给戈尔德贝格拿到美国去发表。

当问到我在这方面有什么东西时，我回答说，我作为文化部的报告员个人有一份关于苏联文化和经济发展成就的资料（我时不时地对它进行一些补充、诠释、改动）。我现在已记不清我是从哪些文献里选取材料编写这份资料的了，不过我是没有机密材料的。总的说来，我们有这样一个制度，机密材料在任何人手中的时间都不得超过1天。

(审判)长：那又怎么样，1天的时间是可以把某些东西记到纸上了。

布雷格曼：我记得这份资料里数据常常变化。中央报纸和一些专业报纸，像《教师报》或《医务工作者》都使用过这份资料。里边讲到国家计委的材料时只能使用百分比，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审判)长：侦讯时你在这些口供的末尾说：“我承认在这种情

况下我还犯有一项罪行。我明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人，特别是同戈尔德贝格有联系，我却协助他们搜集了关于苏联的情报。”

布雷格曼：我表现出了不理智的热心。

(审判)长：这种热心表现在什么事情上面？

布雷格曼：表现在我帮助他们向戈尔德贝格传递了一些材料，但是我声明，我没有传递过任何机密材料。

(审判)长：可是这份记录下面有你的签字。

布雷格曼：关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人的联系是我被捕之后才知道的，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审判)长：如费费尔所供——他们的联系在戈尔德贝格来访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946年，就已经带上了这种明显的间谍性质。你认为这是费费尔虚构出来的吗？

布雷格曼：我没有根据去那么想。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说你只是到了接受侦讯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个情况。

布雷格曼：我不知道在戈尔德贝格来访期间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曾给过他一些谍报材料。假如我知道这件事，我当然会该向谁报告就报告给谁的。

(审判)长：你说一下，戈尔德贝格确实公开讲过反苏的观点吗？

布雷格曼：我没有听说过这些。

(审判)长：但是你的口供里说到了这件事。

布雷格曼：侦查员曾一连好几天要求我说明这个间谍在他逗留莫斯科期间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于是我就杜撰出了仿佛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米霍埃尔斯的办公室里，戈尔德贝格和米霍埃尔斯当着我和斯皮格格拉兹的面，进行的这么一段谈话。

(审判)长：那么总括起来说，你对这个戈尔德贝格的活动了

解些什么呢？

他在苏联到处跑，搜集间谍材料，这你知道吗？

布雷格曼：我在被捕之前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审判）长：可是在预审时你说过，他进行过间谍活动。

布雷格曼：在侦讯时我被告知戈尔德贝格在乌克兰得到了两箱材料，我是根据这个才供说他搜集间谍情报的。

（审判）长：在这之前你就不知道他搜集间谍情报吗？

布雷格曼：我从侦查员给我讲的有关戈尔德贝格的活动的一切事情中做了一个逻辑推断，并以此为根据供说他进行间谍活动的。

（审判）长：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侦查员给你讲的，而你加以确认了？

布雷格曼：是的。我对法庭讲的都是实话。

（审判）长：这就怪了。你在法庭上只确认你讲别人的活动而与你自己无关的供词，可是一牵涉到你的活动，你就推说到侦查员的身上去。

布雷格曼：如果侦讯时的口供记得不对，我为什么不能把这种事情告诉法庭呢？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在侦讯的时候不提出来呢？

布雷格曼：我当时精神沮丧，身体有病。

（审判）长：可是1952年你同样供述过这件事。

布雷格曼：没有。1952年我身体好一些了，我把很多事情逐一思考、分析了一遍，最后我声明我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

（审判）长：可是1952年3月11日你当着检察长的面供述了这种活动，并承认自己参与了这种活动。

布雷格曼：他们对我讲我有罪，但我当时声明，我不承认自己犯有参与间谍活动这种罪，因为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洛佐夫斯基：请允许我对布雷格曼的口供讲几句话。

他在这里说，爱泼斯坦曾跟他讲过，“黑皮书”是为纽伦堡审判准备的。1945年7月正在开波茨坦会议，无论是爱泼斯坦，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还根本不知道会举行一次纽伦堡审判，因此爱泼斯坦不可能说这本书是为纽伦堡审判准备的。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法庭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卷宗里（卷37，案卷页200）有一份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就分配邮包问题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呈文的复制件。

洛佐夫斯基：是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名义吗？

(审判)长：是的。日期是1944年10月28日。从这份呈文中可以看出，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对问题是这样提的：这些礼品只能给犹太人，并且其分配时在中央和地方都必须有犹太人社团参加。呈文上有一条批示：“克鲁季科夫，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请国家监督人民委员部细致而迅速地进行检查，等等’”，而批文的末尾说：“……我认为有必要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不是为这些事建立的，看来委员会对自己的任务领会得并不完全正确”。

洛佐夫斯基：这是莫洛托夫的批示。

(审判)长：你知道这件事吗？

洛佐夫斯基：知道。美国的犹太人组织募集钱款，买了物品，通过“红十字”会把这些东西寄到了苏联。

(审判)长：这件事我们已经听说了。这份呈文上的批示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管了它不该管的事。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号，应该看一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袖们都在干些什么。

洛佐夫斯基：在他们来找我提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这些事我们不办，因为委员会是和法西斯做斗争的，可是他们还是插手这一类的事情。

(审判)长：他们写好这种公文难道不和你商量吗？

洛佐夫斯基：不商量。这类事情他们都是去找米·伊·加里宁和

维·米·莫洛托夫。

(审判)长：超过你吗？

洛佐夫斯基：他们有权去直接找自己的政府，他们是苏联公民嘛，不过我曾多次给他们指出，要他们不要插手这些事情，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断地超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去办事，我们曾进行过尖锐的解释争辩。

(审判)长：很显然，你并没有把问题提到足以让他们明白这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吧？

洛佐夫斯基：1944年底（正如我已经讲过的）战争行将结束的前景已经明朗，在这种形势下我很清楚，所有的反法西斯委员会都得撤销，因此我也就没有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对这件事我是有一个计划的……

(审判)长：这计划是装在你的脑袋里面的吧？

洛佐夫斯基：是的。没有写出来，不过我是打算就这个关于所有委员会的问题征得谢尔巴科夫的同意的。由于我料想近期我们就会撤销所有的委员会，所以也就没有采取很多其他的措施，虽然最果断的办法是撤消米霍埃尔斯和另外几个人的职务……

随后又提出了布雷格曼和尤泽福维奇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互谈话的性质的问题。布雷格曼否认了有关尤泽福维奇的那些口供，正是根据这些口供尤泽福维奇被指控犯有民族主义、同外国人保持可疑的联系的罪行的。

布雷格曼同样否认了在预审过程中他说他同洛佐夫斯基谈过民族主义性质内容的口供。

(审判)长：当时在1950年2月13日进行侦讯时，曾就洛佐夫斯基关于你的口供审问过你。给你宣读了洛佐夫斯基的口供，他在口供中指出，你曾同他谈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话，倾诉了对据说仿佛是在苏联发生的一些压制犹太人的事情的不满。接着又向你出示

了费费尔的供词，其中说到你主张扩展委员会同外国的犹太人组织的联系，等等。

你为什么现在否认这一切呢？洛佐夫斯基和费费尔两个人都揭发你有民族主义活动，侦讯时你也是确认了他们的这些供词的。

布雷格曼：我不知道他们这样供述有什么依据。至于扩展联系的事，我确实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听到有人议论说有必要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联系，而我认为通过反法西斯委员会这条线这件事比较容易办到。至于说洛佐夫斯基供述：我和他有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我再一次声明，我和他之间没有过任何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我告诉他，我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听到有人讲起从各种机关辞退犹太人的话，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没有得到确定的回答。

布雷格曼在法庭上声称他，希梅利奥维奇和舍伊宁曾向党中央报告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审判)长：这次去中央委员会是谁首先提出来的？你们怎么着，是没有约定，在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碰上了？

希梅利奥维奇：不是，就我所能记得的来说，在此之前我和布雷格曼曾通过电话，谈了几次委员会里那些不妥当的事，我们还说这事得报告给党中央。

(审判)长：于是你们就约好大家一块去中央委员会？

希梅利奥维奇：因为我在那之前不久认识了舒梅科，也把这事告诉了他们两个人，他俩就要我给舒梅科打个电话，问他能否接见我们。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和舍伊宁想去见他，他给我们指定了一个时间。就是在这次谈话的时候，他问我们的意见，谁可以作委员会的主席（这就是说那是在1948年米霍埃尔斯死后）。当时布雷格曼说他提不出合适的人选，我也是

这么说的，而舍伊宁推荐了鲍里斯·沃林。第二次见舒梅科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再声明一次，古别利曼没有和我们一起到那儿去。

布雷格曼：在舒梅科那儿谈了大约两个小时，谈的也不光是委员会工作中一般的不妥当的事情，也谈了具体的严重的缺点。我拿了一张单页的纸——列着这些问题（8 或 10 个问题）的单子，向舒梅科报告委员会工作中不妥当的地方和严重的政治缺点。

（审判）长：是谁最先提出这么做的？

布雷格曼：这当然也许是自吹自擂，不过是我坚持要去中央委员会的……

（审判）长：希梅利奥维奇，这事是怎么个情形，你来讲讲。

希梅利奥维奇：布雷格曼讲的情形和我所知道的情况没有大的出入。他说他去过两次中央委员会，其中一次我是记得的，另一次我们没有和他一起去，我对这也就一无所知。在那次我们 3 个人，就是我，布雷格曼和舍伊宁一起去会见舒梅科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洛佐夫斯基，也许是在布雷格曼第二次，我没有和他一起去的那一次见舒梅科时他说这些事了。

（审判）长：这是 1947 年的事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说不准日期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舒梅科问过我们，可以任命谁来作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

（审判）长：布雷格曼，你来供述一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活动。你了解对这个问题的鉴定结论吗？

布雷格曼：我现在无法全部记起来了。

（审判）长：那你看过这个结论没有？

布雷格曼：看过。

（审判）长：你同意其中所列举的事实吗？

布雷格曼：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

(审判)长：你来说，委员会是不是的确进行过这样的民族主义活动？

布雷格曼：当侦查员要我在记录上签字的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我在上面签字，那就是说我承认我参与了民族主义的工作，可是我根本就没做过这种工作。侦查员对我回答说，这不起什么作用，他只需要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审判)长：每当你在侦讯时的口供说明你在共同犯罪时，你就不同意这些口供，一旦口供涉及别人的时候，你就表示同意这些口供。

布雷格曼：如果说我必须为我进行的民族主义工作负责，这是一个问题，可如果说我得要为我并没有参与的工作负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这儿全都混在了一块，“人马不分”，结果成了我从1926年起就进行民族主义和间谍活动。

(审判)长：鉴定结论中提到了你的名字。你记得这件事吗？

布雷格曼：我不记得这事了。

(审判)长：鉴定是在讲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时提到你的名字的，那次会议讨论了关于以色列国和关于因以色列国大使（宣读）戈尔迪·梅耶松来苏联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的问题，因为你参加了这个可以表明委员会是实行民族主义路线的问题的讨论。这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8年10月21日会议的速记记录中也有记载。

布雷格曼：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记起来那次会议上都做了些什么事了，不过个别阶层的民众中间对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存在很多困惑不解的问题，这一点都不奇怪，也有人向我提出过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讲的可能是为以色列大使梅耶松安排的那次会见。在首都的中心——犹太教堂——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活动，我、舍伊宁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

都感到十分愤慨。

(审判)长：这次示威游行是由委员会以其全部的活动为它准备好了条件的。《埃尼凯特》报宣扬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为给这样的示威游行打好基础发挥了它的作用。

案卷材料里（卷 34，案卷页 57）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1948 年 10 月 21 日会议的记录，那次会议上讨论了有关巴勒斯坦局势的问题——斯列帕克的报告。这里还有你的发言（宣读）卷 34，案卷页 63）。

布雷格曼：就这篇报告展开了辩论。我没有收到记录，因此无法说发言记得对或是不对……从记录中对我的发言的记载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我是在小心翼翼地试图冲淡所形成的局势，我知道并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性质的活动，支持《埃尼凯特》报对这次示威行动的立场。我声明，我对这种活动一点也不知道。至于克维特科的发言，我不能说这篇发言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性质的。我如何评价鉴定小组的文书或是结论吗？既然这些表现了民族主义的事实已经由小组指出来了，我也就没有理由反驳或是怀疑其结论的正确性了。可是我进行过这种活动么？谁能够证明我进行过……

布雷格曼：我认为起诉书有重大的缺陷。说我炫耀委员会的活动，又说我进行民族主义的工作。第一，这没有任何实证，第二，把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放在了一起：我，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伊利亚·瓦坚贝格，还有别的我过去和现在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评定的时候说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从事间谍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概括？我觉得，从政治上和法律的角度说这是不对的。我最后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我对洛佐夫斯基讲的那些保证的话听信得太久，太耐心了，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这使我陷入一种十分复杂的境地。

(审判)长：哪些保证的话？

布雷格曼：他保证说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委员会工作中的民族主义表现，改进组织工作，等等。我认为洛佐夫斯基在这里说的报纸是归中央的一个部管理的话是不对的。《埃尼凯特》报是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委员会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在这里要把它推卸掉是不对的。中央宣传部当然也可以对它的工作进行检查，但是这并不能卸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情报局的领导人，特别是洛佐夫斯基对此所应承担的责任。我还认为，我虽然身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却没有干过任何间谍工作，没有参加过任何秘密集会（某些人在供词中说有过这个别几次集会）。你从坐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口供中听到了，甚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当着我们——补充进主席团的人员——的面说的。所以我希望法庭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做出相应的结论。当然，如果法庭认为光是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一条，光是我仅仅具有主席团委员名分这一点，就足以控告犯有全部各项罪状，那当然是法庭的事。不过我觉得，在侦讯期间我在精神上有很多感受，我仍旧没感到自己犯了参与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活动和沦为民族主义者的罪行。我从来不是这种人，也不打算成为这种人。

16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6月6日同一天举行了秘密开庭审讯。开庭的时间很晚。20时50分审判长切普佐夫军法中将宣布，被告费费尔提出请求秘密开庭，即其他的被告不参加。这次开庭审讯时费费尔推翻了自己的口供，并且供认他是安全部的密探，化名“佐林”。

№ 11713

费费尔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上的供述记录

(1952年6月6日)

费费尔供认，早在1943年他一到美国，就被安全部派驻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扎鲁宾将军召见。扎鲁宾向他提出，一切行动都要征得他和他的助手克拉林的同意，并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接着费费尔讲他向安全部机关提交了关于他的活动的详尽报告。费费尔供出了如下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揭示了谋划此一诉讼案及为他指定在诉讼过程中要扮演的角色的秘密炒作过程：“在法庭上我的口供混乱不清，因为甚至在‘签了’第206条之后，安全部的人员还把我叫去，警告我说，我对法庭的供述必须和我预审时的口供一模一样。早在我被逮捕的那天夜里，阿巴库莫夫就告诉我，如果我不招认，我就要挨打。所以我害怕了，这就是我在预审时做了不实的供述，后来在法庭上又部分地加以证实的原因。

在法庭上我没有承认自己犯了间谍活动罪。我供说戈尔德贝格是苏联的敌人和间谍那全是捏造。

我曾试图对这些加以否认，可是又害怕阿巴库莫夫和利哈乔夫实施他们威胁的事情，就开始在侦查员在背后编写的那些记录上签字。我在侦讯过程中一直在说，我不相信戈尔德贝格是间谍，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

对同罗森贝格之间据说是间谍性质的联系上，费费尔也是同样的讲法。费费尔接下来说：“这件事我在侦讯时就说过，可是他们对我讲，我的论点没有充分的根据，并且坚持要求我讲出据说是帮

助过我们谋求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领导同志的名字。我迫不得已讲了洛佐夫斯基的名字，他曾阅读过我们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的呈文。后来阿巴库莫夫要我给他讲一讲拉·莫·卡冈诺维奇和他对克里木问题的态度。关于梅利斯他曾问过，美国人要他去美国的事是不是真的？

利哈乔夫详细询问了我们同维·米·莫洛托夫谈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问题的情形，及莫洛托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他还说，关于这件事将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对我进行详细审问。

在后来进行的审问中，有一次阿巴库莫夫告诉我，我必须在有联共（布）中央代表参加的审讯中，确认我在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中看见过热姆丘任娜。

我被弄得糊里糊涂，就在中央委员会和热姆丘任娜进行对质时确认说，我在犹太教堂看见过她，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

阿巴库莫夫是当着利哈乔夫的面这样指示我的。

侦查员们还捏造出这样一件事，按照这种说法，仿佛是热姆丘任娜在和我谈话时指责约·维·斯大林对待犹太人很不好。我没有听见过热姆丘任娜说这种话，也没有听见过别的什么人说这种话，顺便说，我根本就从来没有跟热姆丘任娜说过话”。

费费尔再一次确证，对他采用了实施肉刑的威吓手段。他供认：“预审时侦查员利哈乔夫曾对我说：‘……我们既然把你抓来了，那就一定能找出罪行来。我们要什么全能从你的嘴里‘打出来’。事实上确是如此。我并不是个罪人，但是被吓破了胆，于是就给自己和别的人捏造了一些口供”。

费费尔又证实说，“控告我们这些犹委会的成员们进行间谍活动，也就是据说仿佛按照我们同一些反动群体达成的协议往美国寄送间谍材料这一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而且必定是这个样子，因为事实上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我对于自己的口供再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21时10分审判长宣布闭庭。

20分钟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由原班人员进行下一次的秘密开庭审讯。

这一次由尤泽福维奇进行供述，因为他向法庭提出了申请。他供认：还是在1938年，他就给国家安全机关立下了约据，承担了与之进行合作的义务。他的任务是调查苏联犹太作家中间的情绪。尤泽福维奇说，由于这些人猜疑到了什么，当着他的面他们绝口不说有损于他们自己的话，因此他没能给安全机关提供任何会损害他们名声的情报。接着尤泽福维奇供说，“1938年底我请求解除我的约据，因为我为能够提供得出情报而做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于是就被免除了这项工作”。最后尤泽福维奇供道：“侦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做了真实的招供，并对侦查员说，我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

我还声明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洛佐夫斯基有什么罪行。在这之后，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把我叫到他那里去，告诉我，如果没有招认的口供，那么他就把我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殴打。而在这之前就已经把我‘折磨了’好几天了。我拒绝了阿巴库莫夫，于是我被转入列福尔托沃监狱，在那儿用橡皮棍对我进行毒打，我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我。

出于这个缘故，我决定在任何的供词上签字，一心只等开庭的日子到来。

我想，在苏联法庭是能够还一切事物以本来面目的。

此外我对自己的口供再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21时55分秘密开庭审讯结束。

下一次开庭的时间是6月7日12时45分。

№1171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布雷格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7日)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你对自己的口供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布雷格曼：没有。

(审判)长：被告中有谁有问题要问被告布雷格曼吗？

洛佐夫斯基：我有问题要问，不过我想首先提供点情况。

布雷格曼在这儿说，我欺骗了他，耍弄手腕，我忘记了我是中央委员，等等，而你，审判长公民，又从舍伊宁的供词中引证了几行，舍伊宁说他曾和布雷格曼一起去见我，我要他们进入主席团去掩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路线。

就此我做如下的声明：我是在1944年6月底或7月初，准确时间我已记不得，在事先已同亚·谢·谢尔巴科夫商量好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把布雷格曼叫到我那儿去的，我告诉布雷格曼，我是受亚·谢·谢尔巴科夫的委托和他谈话的。我跟他讲了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对他说由于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时，老是超越自己的职责和职能，于是有必要物色一批布尔什维克。他给了我几个人名，其中我只知道古别利曼是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兄弟，但就是他我也并不熟识，而其余两个，布里克尔和舍伊宁，我就从未见过。我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报告给亚·谢·谢尔巴科夫，他告诉我可以和他们谈一谈。在这之后我就把4个人一起召来，而不光是叫布雷格曼，对他们讲了以前曾对布雷格曼说过的那些话。能够想象我会

对这4个人讲，你们到委员会去为民族主义工作做掩护，在实行民族主义政策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这样的话吗？我知道侦查员为什么要写上这些。为什么舍伊宁会在这上面签字，让他自己去解释，不过这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真情实话，这对每一个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在“黑皮书”问题上我有什么事骗了布雷格曼，他怎么会不知道“黑皮书”是干什么用的。作为工作组的组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工作组提出的应该删除几个章节的一系列建议我立即采纳了。有两份发给艺术家等等协会的、列着需要删除的东西的很长的电报。这件事就是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办理的。工作组里包括了两名俄罗斯族人——特罗扬诺夫斯基和斯维林，就是为了让他们也看一看这些材料。在此书经美国人修改、用英文印出的样本寄到之后，我又把它交给特罗扬诺夫斯基和鲍罗廷（他们两个人懂英语）去审阅，让他们两个人下一个定论，那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容许的东西了。由于这个缘故，又发出了一份电报，通知还要从书中删掉一些东西。所以我声明：如果布雷格曼没有看出此书有任何问题，那么只能说是他马虎大意放过去了。

第三，布雷格曼从未和我谈过《埃尼凯特》报的事。他在这儿亲口说了他阅读犹太文非常吃力。布雷格曼和我谈的是别的问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组织得不民主，那儿一片混乱，等等，可是派他们到那里去的目的是不正是要把那儿整顿好么。

布雷格曼说我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表现出特殊的亲近，这个委员会是苏联情报局的16个部门之一，而除开苏联情报局之外，我还有与20个拉丁美洲国家及整个远东的交往事务要管。我对犹太人委员会这么特殊地亲近，我就永远也别想出席宴会了，可是斯拉夫人委员会的宴会我可是常去的。这件事贡多罗夫将军和莫恰洛夫上校可以作证。我去那里是因为他们接待官方人士，而我作为外

交部副部长出席了这些宴会。

布雷格曼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委员4年零4个月，从1944年7月至1948年底。这4年零4个月中，委员会有2年仍在苏联情报局的系统内，而其余的2年零4个月不在苏联情报局系统，而直接隶属于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布雷格曼在这儿说，他向我反映过好几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内存在的毛病，但是我对他诉说的不满意的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他是知道老广场的地址的，中央委员会的人、所有的书记们，包括党的领袖约·维·斯大林在内也都认识他。他可以写信到那里去反映，他看到了什么问题，找了洛佐夫斯基，可是洛佐夫斯基却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布雷格曼说过，1948年他去找了舒梅科。难道说两年才该报告一次么？我觉得，如果舒梅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就该给中央的书记写信，控告我和所有的人。与此相关，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布雷格曼知道了我是党的暗藏的敌人的（在侦讯记录中这样记着，还经他签过字），在他从我这里接受以主席团委员的身份进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并在其中工作的任务时，是否就已经知道我是党的敌人，或者这是侦查员给他做了提示而由他签字的？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问题你听明白了吗？

布雷格曼：是的。说到是不是我本人知道洛佐夫斯基是党内暗藏的敌人，还是这是由侦查员提示给我的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人向我做这样的提示，我是在侦讯时了解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已经变成了间谍和民族主义的中心，而由于这个组织的活动直接受洛佐夫斯基的领导，那么他就得对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负责，在这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根据这一点我对侦查员说，这样的行动和对该组织的这样的态度只有党内暗藏的敌人才做得出。但是我却从未做出过洛佐夫斯基一贯是党内暗藏的敌人这

种论断，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你还有什么问题？

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在这儿的供词里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人们称他为布尔什维克政委。既然他被赋予了以“布尔什维克政委”这样的荣誉称号来称呼的荣耀，那就意味着他在委员会里是享有一定的地位和位置的。因此我想问一问布雷格曼，把他派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去，从我这一方面讲是有什么用意呢，还是并非如此。

布雷格曼：我说在委员会里把我叫做“布尔什维克政委”的时候，我指的是说这话是带有引号的，我把这当作一种讥笑。这事我没有告诉洛佐夫斯基，因为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置身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之列，我认为我执行的并不是洛佐夫斯基的，而是党的指示。

洛佐夫斯基：还有一个问题。布雷格曼说他曾两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问题。第一次是在1946年，那时委员会已不归我管了。布雷格曼你说说，你那时报告了些什么？

布雷格曼：1946年我同舒梅科谈过一次，我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的事，特别是在报刊上。在1946~1947年间洛佐夫斯基是否在领导委员会，这没有任何意义。我既可以在洛佐夫斯基领导委员会之前，也可以在洛佐夫斯基领导委员会之后去中央报告，所以时间问题在这儿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审判)长：谁还有问题要问布雷格曼？

希梅利奥维奇(对布雷格曼)：你在主席团会议上什么时候听到过我的发言里含有对党和政府的某种攻击甚或是这种攻击的迹象吗？

布雷格曼：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自己就被控告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你还来问我这个。关于你的发言我有一点可以

说，就是它们从来不具有攻击党和政府的性质，发言中没有任何民族主义和反苏的东西。

希梅利奥维奇：昨天听审判长公民宣读你的供词（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些供词），我才知道在侦讯时你曾供说贝格尔森和希梅利奥维奇向党和政府进攻。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呢？

布雷格曼：在1949年初我对侦查人员供说，在个别的国家机关里曾发生过表现了反犹太人情绪的事情，希梅利奥维奇、贝格尔森等几个人曾打算把这些事情报告给政府机关。我在委员会里听人这样谈论过。

希梅利奥维奇：可是你的供词里却是说我们因此对党和政府进行了攻击。

布雷格曼：不是的，没有那种事。

希梅利奥维奇：在1947~1948年间我曾到你家里去过了3~4次，我们决不是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同国家监督部副部长的身份谈起过米捷列夫在保健部和苏联医学科学院里干下的那些蠢事，是这样不是？

布雷格曼：我记不准了。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国家监督部里，希梅利奥维奇跟我讲，保健部有一些具有反犹太主义性质的不合规矩的事情，至于说医学科学院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希梅利奥维奇：那就是说，我到国家监督部去看你的时候谈过这种话？

布雷格曼：一点不错。

希梅利奥维奇：你在被捕之前，布雷格曼，知不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事，或者是在押期间你才了解到所有这一切的？

布雷格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个别的民族主义表现我在被捕之前就知道。我在中央委员会向舒梅科谈过这些事，而在推展

开来的广阔规模上，我是在侦讯过程中才了解到的。

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就致电工联代表大会抗议英国发生蹂躏犹太人暴行发言那件事，布雷格曼是否还记得，我针对“应该查证一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暴行”这句插话说了两遍，这样提出问题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光是电文不仅仅将发表在犹太报纸上这一点就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再加上这是对英国工党政府政策的抗议。你记得起来我提出的这个意见吗？

布雷格曼：首先，我在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什泰恩在主席团会议上就英国发生蹂躏犹太人暴行的事插进的那句话只是一句简单的问话，我认为这句插话语意双关，是反苏的。

（审判）长：这话的意思是：应该弄清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着暴行，是吗？

布雷格曼：是的，遗憾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问话，其中包括我和希梅利奥维奇。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有问题吗？

克维特科：是的。布雷格曼对诗人加尔金在进行供述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胡编乱造的才能感到愤慨。可这位原“国家监督员”把这种才能发挥得如此辉煌，其余的人又怎么能不愤慨呢。是他亲口说的，他记不得我在委员会里的发言，5个月才见我1次面。他当上主席团委员的时候我已不在机关里工作，可是他却依然有胆量编造出满满一篇记录有关我的事。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这可不是问题，而是讲话。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被告布雷格曼？

克维特科：在你当主席团的“监督员”的整个4年间，我在委员会领到了多少稿酬，总的说来我在那儿领还是不领什么稿酬？

布雷格曼：关于加尔金的才能我说两句。我讲加尔金是由于他对我进行了诽谤，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对克维特科过

去和现在都了解得很少，所以我无法提供那么多关于他的供词。关于稿酬的口供并非来自于我。审讯时是侦查员说，作家们，特别是克维特科，利用自己的文章和诗在委员会里大赚其钱。不过我并没有计算过，也没检查过，哪一个人利用什么东西领到了多少钱，所以克维特科在那儿领多少稿酬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审判）长：被告布雷格曼，侦讯时你供认（卷5的第156案卷页）克维特科给《埃尼凯特》报写文章并因这些文章而领到大笔的稿酬……

布雷格曼：我是说过，许多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都写过文章等等，并因此领到过大笔稿酬，在这些中间我也点了克维特科的名字。

（审判）长：审讯时问你克维特科的情况时，你曾供说：“……他和其他的人一样，居于领导地位……积极参与《埃尼凯特》报的事务，亲自动手为委员会写了很多东西，为此领取大笔的稿酬……”（卷5，案卷页156）。

布雷格曼：这是被夸大了。他给委员会写东西并给《埃尼凯特》报写稿——这是事实，但是他写的要比费费尔少得多。

克维特科：布雷格曼是从哪儿断定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与委员会出的书籍有关系的？这真是前所未闻的捏造。

布雷格曼：克维特科迟了整整7年多的时间。早在1945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我就说过在苏联作家协会犹太组和犹太人委员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并非形式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接合关系，这种接合关系对委员会的工作发挥着影响。所以克维特科在这里不必为我讲接合关系的这些话感到愤慨。我是这样看这种联系的：加尔金、努西诺夫、克维特科、费费尔同犹太组的领导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又同时在委员会里工作。他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出版书籍、文选等等，而并不是谈消除委员会工作中的缺

点问题。他们相互争论谁书写得好，谁书写得差。

克维特科：布雷格曼从很早的时候就认识费费尔，那他为什么没有了解一下，又是什么人妨碍了他去了解委员会的材料及委员会的来往信函，也就是委员会那件最主要的罪恶呢？

布雷格曼：首先，不能把了解委员会的材料和与费费尔相识看成是一回事。我很感谢克维特科提出了这样一项姗姗来迟的建议，但是我不愿意当一个苦苦向人求告的角色。让主席团的委员们了解主席团的工作，这本来是他们的直接职责，我干嘛要对着他们脱下帽子深深鞠躬去央求呢，而我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我曾试图通过洛佐夫斯基消除这种状况，但没有奏效。

尤泽福维奇：我想提供点情况。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对任何人我都没有说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应该撤销的话。第二，我也没有听见爱泼斯坦、米霍埃尔斯、费费尔说过这样的话，我更没有听见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布雷格曼本人说过，有人提出要撤销主席团的问题。

其次，我知道布雷格曼确实批评过爱泼斯坦，说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有毛病。这事布雷格曼对我说过，而且这也是真实的，但我却根本没听说过他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或是《埃尼凯特》报上有某些民族主义倾向而批评过爱泼斯坦。我还知道另一件事，在以爱泼斯坦、费费尔为一方，以马尔基什为另一方发生争论时，布雷格曼坚决地维护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反对马尔基什，这我是知道的。

再一点。在我被吸收进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之中以后，我就和布雷格曼及其他人一道主张，如犹太人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记录（卷33，案卷页15）所证实的那样，必须实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向主席团汇报工作的制度，我要求向主席团的委员们介绍犹太人委员会同哪些国外的组织和报刊有联系。

费费尔：请你说说，布雷格曼，你是什么时候有了我待在委员

会里有危害这种想法的？

布雷格曼：大约是在让我进入委员会半年之后，我就有了这样一种想法。

费费尔：那么请你告诉我，在洛佐夫斯基那里开会（你出席了，还有舍伊宁和我），我请求让我脱身去搞文学，我得要把一部国外题材的书写完。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主张不让我走呢，那是1946年的事？

布雷格曼：洛佐夫斯基曾召我们去过几次，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不过重点主要地不是放在费费尔身上，而更多的是放在了米霍埃尔斯身上，而且苏联情报局的领导对此给以热烈的支持。1948年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费费尔提出他忙于文学工作，应解除他在委员会担负的工作的问题。我当时的确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可以代替的人，而费费尔比其他人更熟悉委员会的事务。我当时说，如果有合适的可以替代的人，我支持这项提议。其他人也表示希望他留下来。

费费尔：你是知道我是一个有害的共产党员，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委员会的一大危害，可是当我提出申请，要求让我脱身去搞文学创作的时候，你和克维特科又异口同声地不让我走。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赶出委员会去，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现象呢？

布雷格曼：无论是在侦讯的时候还是在法庭的审讯过程中，关于你的民族主义活动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没有必要把我拉到这里边去，特别强调好像是我说的，主要的民族主义祸害就是费费尔。他当然是委员会全部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有：他同国外，同美国的“朋友”保持着联系，这些人还来过这里，他们对他们予以赞扬，等等。所以我想，对费费尔来说，比较恰当的办法还是自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把他从委员会里开除出

去。

什泰恩：我想问一问布雷格曼：他是否知道我有什么反苏性质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没有，据他的了解，总的说来我的积极主动精神怎么样？

布雷格曼：要说在委员会里做什么民族主义的和反苏的发言，那我得说，我不记得她有过这样的发言，我不能断言有过这样的发言，我也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说了与伦敦事件相关的那件事。

至于说她的积极性问题，费费尔可以更好地对此做出回答。我无法判断什泰恩的积极性，而且一般地说积极性这一概念是很不确定的。

什泰恩：请你说，我经常参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吗？

布雷格曼：我没有做过统计，我不知道你是经常还是不经常出席这些会议。

(审判) 长：谁还有问题要问被告布雷格曼？

被告们回答说，没有问题了。

14 时 45 分庭继续开庭。庭审从审讯塔尔米开始。

№1171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7日)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现在你向法庭供述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塔尔米：我不承认自己犯了起诉书控告我的那些罪状。起诉书加给我的那些罪名我没有犯过，为美国或其他国家效力而反对苏联的任何间谍活动我都没有干过，从来没有参加过犹太民族主义的秘密活动，一生中从未进行过任何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敌对活动，这是用起诉书的词句说的。

(审判)长：那么按照起诉书的实质问题说呢？

塔尔米：我已经说过了，加在我头上的所有那些罪名我都不承认我犯过。后边我会说清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没有任何证据作依据的空话。我请求在开始讲述履历材料之前，先准许我做几点声明。这几点，当我在侦讯终结书上签字的时候我就向侦查机关，包括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向检察长普里霍季科中校声明过。他们当时说，我可以把这几项声明向法庭提出。就在第一天，当向我交付起诉书的时候，我提出申请在案卷里附上我亲笔所写的书面供词，这些书面供词正是日期标为1950年9月，好像是7、26和28日的审讯记录的依据。事情是这样的，这些记录包含着交给侦查员阿尔乔莫夫中校的那些供词，他告诉过我，我可以或者是用书面形式或者是用口头形式做供述，我挑选了书面供述的形式。第一次我写了53页，然后又补充写了10~15页，后来侦查员对我说这还不

够，于是我又做了 23 页的补充。总之我一共亲笔写下了 90 或是 100 页的供词。问题是侦查员把我的书面供词改成了问答式的笔录，这些问题和答话就组成了标着 1950 年 9 月份日期的那些记录。

(审判) 长：你指的是有检察长诺维科夫参加的那次审讯的记录吗？

塔尔米：检察长诺维科夫实质上并没有对我进行审问，他当着我的面把用我先前交上去的供词编造的问题和回答口授给速记员。我当时，说真的，就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给我看记录的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在那上面签字。事实上这并不是审讯的速记记录，因为整个记录都是他自己口授给速记员的，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也没有听取我的回答，只有两三个问题除外。他就我揭发原沙皇暗探局的密探杜尔马什金的口供问过我问题，然后又问了我获得苏联国籍的情况。检察长诺维科夫记下的是我在人民的敌人的帮助下捞到苏联国籍的。

我声明说，我的苏联国籍是根据拉什克斯和梅涅斯的介绍得到办理的，那两个人后来确实被镇压了。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个手续，因为我的人籍手续是通过共产国际办理的。

总之我要说，我的供词被记得走了样，他们或是极力夸大我在委员会活动中的作用，或是对这种作用进行歪曲。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些，只是到了后来方开始指出这些过甚其词的说法。

审判庭从调查塔尔米的履历资料开始接着进行审问。

塔尔米对这个问题提出声明说。

塔尔米：在案卷里的供词中讲了 1912 年以前我的生活情况，其中列出了光说明我坏的一面的资料。我提出来这些供词里要加进说明我好的一面的事情，侦查员回答说他们只对坏的方面有兴趣。很清楚，单纯从这样一个角度评价人，那对这个人就会得出片面的概念。所以我想也说一说我这一生中的好事情。我从来没有，现在

也不认为我没有偷盗、没有杀人行凶、没有干不光彩的事等等是我的什么功劳，然而根据案卷里那些带着偏见选收进来的供词来判断、得出的印象就是我自幼便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塔尔米对自己的政治履历，特别是从美国回来之后这段时期，做了详尽的说明。

塔尔米：我虽然在美国住了5年，但却觉得自己并未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于是在俄罗斯发生了二月革命之后我就返回了祖国。在俄罗斯我联系上了党，这个亲人般的……

(审判)长：你是到的彼得格勒？

塔尔米：是的，是1917年7月中。

(审判)长：你立时就和犹太民族主义者联系上了吗？

塔尔米：《德尔托格》报的撰稿人莫伊谢伊·卡茨是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之一。

(审判)长：那是疆土党。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彼得格勒吗？

塔尔米：不，中央委员会不在那儿。

卡茨介绍我认识了“CC”党（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就是伊赛亚·雅科夫列维奇·胡尔金。不久这两个党——“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和“犹太社会党”——合并为一个“法列尼格捷”党。其全称是“统一社会犹太工人党”。

(审判)长：那就是说1917年你回到彼得格勒就沿着民族主义路线走下去了？

塔尔米：是的，我和这个运动有联系，因为我只知道很少几个其他政党。我被作为一个青年新闻工作者和社会疆土党的原中央委员介绍给胡尔金。胡尔金让我到基辅去，正计划在那儿出版一份报纸，拟由卡茨担任报纸的编辑，建议我到此报的编辑部去工作。我就这么办了。大约是在1917年8月我到了基辅，作了“奈耶-采特”（新时代）报的编辑人员。我在这家报社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从

俄文译成犹太文的翻译工作。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写些特写，少量的文章，短的小品文，偶尔也写诗。为了说明我那个时期的情绪，我想说一下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几篇文章。我记得还在十月革命之前我在《奈耶—采特》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文章。写作这篇文章是由于革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位领袖被杀害了。我在文中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其对付革命工人的恐怖手段。另一篇文章叫做《美国布尔什维克》。这篇文章讲述了美国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斗争，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这项斗争是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进行的，那个时候美国只有惟一的一个革命工人组织，因为美国社会党是改良主义的政党。我见过这场斗争，就把它描写出来了。我给文章定的标题是《美国布尔什维克》。

（审判）长：可你自己不愿意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吗？

塔尔米：我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也没打算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反对过布尔什维克。我得说我的理论知道……

（审判）长：这与理论知识有什么关系。你受过中等教育，你还需要什么样的学识？没有文化的人都纷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是他们有学识，而你却没有？你没有加入是因为你的目标不同。

塔尔米：是因为我是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民族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当然是敌对的。

塔尔米：虽然记录中说我是以敌对的态度迎接了十月革命的，我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因为我认为，既然我留在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是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的这样一个政党里，我的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就是赞同了它的这种敌对的立场。

（审判）长：在基辅，你在“奈耶—采特”报社当编辑时，被选为“法列尼格捷”党基辅委员会的委员，是吗？

塔尔米：是的，有一个基辅的组织，我被选为这个组织的委员会委员。

(审判)长：这个党要实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纲领？你在预审时曾经供认过：“……我们党的纲领是在俄罗斯国家的范围内实现犹太民族自治……然后再将其发展为疆域自治……”（卷22，案卷页70）。

塔尔米：是的，纲领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审判)长：就是说记录里记得是对的。

塔尔米：是的，记得对。

(审判)长：接下去你说：“……在基辅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全俄罗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塔尔米：这个不对。

(审判)长：为什么？

塔尔米：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概念上的中心。有过这个党的一个中心，那是在我去基辅之前就有的。我指的是《奈耶-采特》报。开始时侦查员在记录里写上了我在基辅组织起这个中心。结果就成了那些待在基辅的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好像是就在等待一个只有1年党龄的24岁的新闻工作者去他们那里组织民族主义中心。

(审判)长：侦讯时你下面接着供认：“……我们的实际工作方针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定，尽力支持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卷22，案卷页71）。

塔尔米：讲“我们”的时候，那指的是这个党，而不是我个人。我个人不论是同孟什维克还是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

(审判)长：可是这个党进行过谈判，而你是党的领导成员之一。

塔尔米：我不在领导人之列。

(审判)长：这个党在十月革命中是站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上，是和布尔什维克为敌的吗？

塔尔米：是的。

(审判)长：你是这个党的党员吗？

塔尔米：是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否认你对十月革命抱着敌对的态度？

塔尔米：我已经供述过了，我同情布尔什维克，但我本人却不具备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确信社会革命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要到来的，但我当时想这场革命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审判)长：侦讯时你后来又说，中央拉达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后，该党曾与之合作。

塔尔米：是的，当时该党在这个政府中有两名自己的代表西尔伯法布和胡尔金——这就是同中央拉达合作。

(审判)长：你供认了：“我本人在《奈耶—采特》报上撰稿，是完全拥护该报的反革命路线和我党中央的反苏立场的”。

塔尔米：这不是从主观上，而是从客观上讲的。

(审判)长：接下去你说：“……党和报纸开展了积极的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在中央拉达被逐之后，我们失掉了进行反苏工作的合法机会，缩减了我们党的活动，并把党的名称改为犹太人共产党以进行伪装”（卷22，案卷页72）。（宣读）。这就是说，在中央拉达存在期间党和报纸进行了反苏工作？

塔尔米：我个人没有进行反苏活动。但是在最后一刻竟弄得我连一个位置——记不得是轮船还是列车上的——都没得到。我迫不得已留了下来。我的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无法疏散，我就该随红军部队离开，特别是报纸当时已经停刊。但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慌神了，所以我认为在道义上我对所有这些负有责任。

(审判)长：不仅仅是在道义上，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办法疏散，那你就得想办法不要留在邓尼金那边。

塔尔米：这是我的一次严重失策。

当基辅再一次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之后，我继续留在犹太人统一共产党内，这个党后来同加入共产崩得的一些团体联合了。这是一个一切都混乱不堪的过渡时期。

后来我到乌克兰共产党（布）的机关刊物——犹太文报纸《科姆半》工作，一直干到波兰人发动进攻。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供说这个党的党员自称为共产党员，却又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联系。1920年春波兰人进攻基辅的前夜，我出席了同埃利亚舍夫的会见仪式。这是一位著名的犹太评论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准备到拉脱维亚去，于是为他举行了一次告别晚会。举办这次晚会是得到了城防司令的准许的，因为那个时候该城处于戒严状态。事实上这是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举办的庆祝会，但是我当时对这一点没有那么领会，所以我出席了这个晚会，但是没有发言。记得发言的人当中就有多布鲁申和贝格尔森。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莫斯科？

塔尔米：波兰人进攻基辅的时候，我被疏散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那个地方我在国家出版社工作。波兰人被从那里赶走之后，我立即就回到了基辅。

1920年我来到了莫斯科。

（审判）长：干什么工作？

塔尔米：在那儿我同在基辅认识的朋友——共产崩得的成员取得了联系。

（审判）长：共产崩得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塔尔米：这是一些原来的崩得分子和原来的“法列尼格捷”党的成员，他们想加入共产党，正就接受他们的问题进行谈判。在莫斯科我参加过其中的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别接受共产崩得成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预定在3月份在明斯克召集共产崩得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崩得将解散并建议其成员

以个人身份入党。我还必须说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崩得的成员有权参加俄罗斯共产党（布）各支部的会议。

我在莫斯科的初期——从 1920 年 9 月开始——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工作。

（审判）长：这项工作是什么呢？

塔尔米：计划在里加召开同波兰的和会，于是民族人民委员部犹太族处要我编写一份关于波兰白匪分子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犹太人施行的蹂躏和抢劫行径的备忘录。我花了 1 个月的时间编写这份备忘录，写出来后交了上去，然后由利特瓦科夫推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闻出版部担任英文翻译。在这一时期我见过几次这儿讲得非常多的那位爱泼斯坦。我早在美国就听说过爱泼斯坦，他在那儿作一家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但我本人当时并不认识他。在莫斯科，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闻出版部工作期间和他见过几次面并谈过话。那个时候我并不怎么满意自己这份翻译工作，因为我认为我有能力做更为重要的工作。我想当一名新闻工作者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爱泼斯坦，他建议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茨基提出申请，请求派我到美国去，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做更为有益的工作……

……在那个时期有很多工作人员通过共产国际这个途径被派到各个国家去，所以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申请。

（审判）长：令人无法理解你想干什么。你刚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可又突然要求把你派回去。这里在进行革命，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可你却想去美国？

塔尔米：我觉得在那儿我可以对共产主义运动更有益。

（审判）长：不管怎么说，你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帮助共产主义运动，可是你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却干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事情？

塔尔米：不是的。

（审判）长：这个情况你在侦讯时已经说到了（卷 22，案卷页

73)：“是的，居留美国时我也进行了积极的民族主义工作。1922年初，我的一位密友——犹太民族主义者拉什克斯自莫斯科来到纽约，我是在基辅做‘法列尼格捷’的中央委员时和他的关系就密切起来的……拉什克斯建议我做《乌弗博伊》杂志……的编辑工作，我接受了这项建议。我编辑的这本杂志在美国的犹太民众中间进行了反动的民族主义宣传……一直到1924年我都是做这家杂志的编辑”。

这件事在你接受侦讯时的口供的另一份记录中也有记载（卷21，案卷页304~305）。

塔尔米：这是不对的。我来说明一下。在我交给侦查员的声明中我指出了，所有讲这本杂志的民族主义活动的话都是我1950年8月提出的评价，而不是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时的评价。

第一，我是通过共产国际的途径派出去的，另外，我有一项任务是到德国后结束的，在那之后我就要去美国了。

（审判）长：为什么你去美国的途中在柏林待了5个月？

塔尔米：我等了3~4个月的签证。

（审判）长：你有什么任务呢？

塔尔米：我伴送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到德国，应当把他们送过去而不要受阻。1921年8月我到达纽约后，就和在我之先去那儿的爱泼斯坦取得了联系。他也是按共产国际的系统派去的，任务是到那儿把几个彼此常常争斗的秘密共产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整体。我到达的时候它们还没有联合起来。我经爱泼斯坦推荐到俄文报纸《火星报》去工作。该报是由纽约的俄罗斯工人共产党员秘密小组之一出版的。同时，得到爱泼斯坦和秘密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意之后，我和《民族》杂志建立了联系——这是一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杂志，但它同时又是美国知识分子的杂志当中最进步的一家，为苏联辩护并要求承认苏联，不过后来它改变了自己的路线。

我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发表我关于苏联文学的文章。我是第一

个把马雅可夫斯基介绍给美国读者的。为了驳斥反苏谰言我在这本杂志上刊出一些说明苏联政府和党的政策的官方文件。我是和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完全协同一致地做这项工作的。当这些小组联合起来的时候，这里提到过的那位亚历山大·比捷利曼成了它们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受设在莫斯科由人民委员部监督的犹太人社会委员会的委派，拉什克斯来到美国组织对苏联的饥荒的救济活动，确切说组织基本上是对犹太人的救济活动。他组织起一个犹太人社会委员会的分会“伊德格兹科姆”。这是一个苏联的组织。它的机关刊物——“乌弗博伊”杂志当然没有做任何反动的反苏工作。它做一些有利于苏联的工作，宣传已发表的讲苏联犹太人获得的成就的文章。

(审判)长：可是在侦讯中检察长对你进行审问的时候，你供认的却是：“……杂志在犹太人中间进行了反动的宣传，起了为崩得辩护、赞扬的作用。我任这家杂志的编辑一直到1924年”（卷22，案卷页73）。

塔尔米：这是他从前边的记录中摘抄过来的。

(审判)长：什么叫摘抄过来的？你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字？

塔尔米：我得说，只是到了这里，从你的解释里我才弄明白，侦查员有责任准确地表述被告人的一切口供，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

(审判)长：可是审问你的是检察长，记录他是根据你讲的话做的。

塔尔米：检察长什么也没有问我。他是根据前面侦讯时做的笔记口授了一份记录。

(审判)长：检察长是做审讯记录；你说所有这些都是他从侦查员的笔记中摘抄来的，然后你就提出声明，说法庭把你的口供记错了？

塔尔米：可以进行查对，这就是前面侦查员做的记录里边的那些话，我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至于说这些口供中的说法，我虽然表

示了反对的态度，但还是签字了，因为在客观上“伊德格兹科姆”和《乌弗博伊》杂志的工作中都有反动的成分。这种反动的成分在于“伊德格兹科姆”组织往俄罗斯运送的邮包只给犹太人，在那个苏维埃国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的时期当然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这有可能招致其他民族的人完全合乎情理的误解，甚至是愤恨。确实，我必须说，这个组织谈判的不光是个人寄送邮包的问题，也有同乡会提供的大批量的救济物资问题。这个“伊德格兹科姆”，特别是拉什克斯本人老是坚持要求在苏联当地这些由同乡会寄去的邮包只在犹太人中间分配……

……我还要提请注意，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曾到过纽约，很多时间我都陪伴着他，把他介绍给许多共产党员作家，带他进入了美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内。另外，我把他的几首诗译成了英语，还把《大西洋》这首诗译成了犹太语。

1924年组织起来了“伊科尔”（为了协助苏联的组织‘犹太会’）。“伊科尔”的书记是伊利亚·瓦坚贝格，共产党对这个组织进行监督并关注其工作。

（审判）长：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什么？

塔尔米：第一，募集资金并帮助“犹太会”工作，第二个任务是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

（审判）长：就是说“伊科尔”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

塔尔米：是的。

（审判）长：“伊科尔”同“卓因特”有联系吗？

塔尔米：“伊科尔”和“卓因特”没有任何联系。

（审判）长：可是“卓因特”也给苏联的犹太人提供过救济呀？

塔尔米：我不知道“卓因特”做了些什么，它提供过什么救济，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知道“卓因特”同“土地分委会”——由斯米多维奇领导的犹太人土地分配委员会——订有合

约。

(审判)长：“土地分委会”和“犹太会”是一回事吗？

塔尔米：不是的，“土地分委会”是管理犹太人的土地分配规划的政府机构，而“犹太会”是一个社会组织。“伊科尔”与“犹太会”有联系，而“卓因特”同“土地分委会”签了合约，它投资1百万美元在克里木组建犹太人移民区。

(审判)长：是无偿的吗？

塔尔米：打算在将来把这笔款还清。

(审判)长：“卓因特”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塔尔米：“卓因特”是犹太财阀的组织。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犹太人很多，所以他们当然就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让犹太民众跟着他们走，对犹太财阀们是有好处的。为此就成立了“卓因特”这样一个把此前存在的所有慈善组织联合到一起的组织。

(审判)长：“卓因特”救助的是些什么人呢？

塔尔米：所有各个国家的犹太人。

(审判)长：是用借贷的办法吗？

塔尔米：不是，这是一种以支持形形色色的教权主义者和反苏分子的政策为基础的纯慈善性救济。

(审判)长：这么说，这个组织是反动的了？

塔尔米：反动透顶。

(审判)长：罗森贝格在“卓因特”里担任什么职务？

塔尔米：这个罗森贝格其实是个雇用来管事的。

(审判)长：那么老板是谁呢？

塔尔米：是大资本家，比如说瓦尔堡，罗森瓦尔德，菲施。在那儿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彻底融合，所以在“伊科尔”和共产党这两条线上都一贯实行反“卓因特”的斗争。

№11716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8日)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继续供述“伊科尔”的工作。

塔尔米：我担任“伊科尔”执行部的委员到1928年。

(审判)长：领导人是谁？

塔尔米：领导人是瓦坚贝格。

(审判)长：阿尔马佐夫是干什么的？

塔尔米：那时他还没当上“伊科尔”的领导。

(审判)长：这个组织是由什么人创立的，经费从哪儿来，目的是什么？

塔尔米：它是根据共产党中央的倡议建立起来的。

苏联成立了“犹太会”之后，在美国就组织了“伊科尔”来协助“犹太会”，“伊科尔”是协助苏联犹太人移民垦殖的犹太人组织。在古犹太语里“伊科尔”的意思是农民，这似乎是一个双关语。在其他国家里也组织起来了协助“犹太会”的“伊科尔”组织。比如，在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国家就有这样的组织。美国的“伊科尔”的领导人，如我已经说过的，是伊利亚·谢苗诺维奇·瓦坚贝格，我是这个组织的执行部的委员之一。1928年党把瓦坚贝格召回去做另外的工作。我可以说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纽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几个左派工人组织和行业性的互助合作社。其中住房建筑业就为其成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它是党的物质政治基地，对党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十分重

要的是要由一个首先是性格坚强、果断沉着，还要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来领导这个合作社。瓦坚贝格符合这几项要求，于是党派他去做这个工作。我和瓦坚贝格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他请我接过“伊科尔”的书记这一职务。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喜欢行政组织工作，这不合我的性格，但是他的意见得到党的支持，因而我在1928年接受了这一职务。应该说“伊科尔”是作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而存在的，因为在那里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还有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不过他们具有进步倾向，同情苏联并进行有利于苏联的宣传。在这一方面，那些年在苏联犹太文化非常繁荣这一事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知道，在彼得留拉暴行时期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拯救了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等等。

除此之外，“伊科尔”还对苏联提供了物质援助。必须说，在我1932年离开美国之前这一段“伊科尔”存在的时期内，它向苏联运送了价值不少于25万美元的机器、设备、钱款，等等，也许足足有30万。这笔数量很小的援助比“卓因特”的几百万还要宝贵。

(审判)长：可是你在这儿说过，“伊科尔”追求的是民族主义的目的？

塔尔米：我本想在晚些时候谈这些问题，可是你既然问到了，我现在就说一说。我，正如同洛佐夫斯基在这儿说的那样，是“省悟者”之一。我在被关押期间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结果以前我觉得是正确的东西原来是错误的，在“伊科尔”和它的全部工作方面我也同样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今天认为，它的整个工作中，如实践所表明的，有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同样在“伊科尔”这方面给予过帮助的苏联“犹土会”的活动家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东西。

(审判)长：你在侦讯时的口供里（卷22，案卷页74）说：

“……我是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伊科尔’的领导人之一，我在那儿也宣传了犹太民族主义，而且我们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苏联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体制的问题”。

塔尔米：这不完全对。我请求法庭看一下1950年2月份的审讯记录，那份记录是我在布特爾监狱医院住了25天之后才签的字。在这份记录里一开始记的是：“伊科尔”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然后侦查员把“民族主义的”这个词勾掉了。再后来我重新评价了它的活动，确定为民族主义的。没有强迫我，没有给我施加压力，我是自觉地在上面签字的。

（审判）长：我宣读的你那些口供的第二部分是对的吧？为什么要特别突出犹太人。如果你领导的是一个亲苏的组织，那为什么要强调苏联的犹太人的艰难状况？

塔尔米：不完全是那样的。我们共产党员在“伊科尔”内部和民族主义者进行着斗争。这由下述事实可以得到证明：1930年在“伊科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要求一帮民族主义者退出“伊科尔”，并强使1926年曾和瓦坚贝格一起来苏联出席“犹太会”代表大会的那个雅科夫·莱温离开“伊科尔”。此外，当日特洛夫斯基声称，可以把这个“伊科尔”变为在群众中更为广泛的组织时，我曾给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铁锤》写文章表示反对日特洛夫斯基的主张。我反对他的主张并表明共产党人没有在进入某个组织的时候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像大衣一样扔在门外的习惯。

（审判）长：你曾供认，一方面是“伊科尔”在美国进行民族主义的活动，另一方面在苏联“犹太会”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它积极地进行反对苏联的破坏活动，在犹太人中间煽起民族主义情绪。

塔尔米：我要告诉法庭我为什么能“大彻大悟”，把自己对所有这些事情的看法都审查了一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1950年

7月底，在我经受了14个月的庭审和病患之后，办理我这个案件的阿尔乔莫夫中校把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问题和将之用于犹太人问题方面的论述拿给我看。虽然这些论述当中有很多，特别是有关犹太人同化问题的，我以前是知道的，现在它们在我的眼里却变了样。以前我是不懂这些事的，因为我脱离了犹太人问题。读完阿尔乔莫夫中校拿给我的东西后，我请他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传我，让我有一个考虑的机会。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看清了，在苏联，在犹太文化领域内进行的整个这项工作打的是苏维埃政权的旗号，并且仿佛是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显然是有那么一帮犹太民族主义者窃据了领导职位，令苏联政府和党的机关产生了误解。我弄明白了这项建设犹太人的中学、博物馆、技术学校的整个政策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和错误的。只要是和犹太文化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明白不可能用犹太语言去突出表现一切。整个世界文化只能用犹太语言来体现这种想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没有必要为了让犹太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一切就都得使用犹太语言。

(审判)长：你接下去供认：“在苏联我们有一些企业家窃取了那时成立起来的‘犹土会’和‘土地分委会’两个组织的领导权，把这两个组织变成了反苏的民族主义中心，干起了积极地破坏苏联国家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苏联的犹太人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给苏联的犹太人灌输一种民族孤立感”（卷22，案卷页74）。

你的这些口供说“犹土会”和“土地分委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的，这是对的吧？

塔尔米：是的，基本上是对的。

(审判)长：1926年“伊科尔”的代表瓦坚贝格和莱温来苏联的目的是什么？

塔尔米：“伊科尔”接到了“犹土会”请他们派代表来参加“犹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另外，约定这些代表要亲自

了解一下苏联的犹太人的生活，好让这些人以后可以说，瞧，我们亲眼目睹了苏联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

(审判)长：他们到过哪些地方？

塔尔米：去了乌克兰，克里木—加里宁多尔夫区，也就是去了有犹太人移民区的地方。在这之后，他们回到美国在犹太民众中间对此进行了宣传。不过，在对质时瓦坚贝格说，他据说在宣传中似乎推行了民族主义路线，但是我对这个却毫无所知。

塔尔米：……1928年苏联政府，显然是根据“犹太会”和“土地分委会”的呈报，做出决定，划出比罗比詹区供犹太移民之用，将来再在那儿建立犹太国家体制。这个没有记上，因为侦查员说正面的东西他不记，只记不好的东西。

(审判)长：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

塔尔米：1928年。

(审判)长：就是关于成立犹太自治州的那项决定吧？

塔尔米：不是，是关于划出比罗比詹供犹太移民之用，将来再在那儿建立犹太国家体制。关于成立犹太自治州是1934年宣布的。在这之前，好像是1927年，“土地分委会”派出一个勘察队去比罗比詹，领导人好像是布鲁克教授，这支勘察队回来之后，发表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关于比罗比詹的报告，讲了该地区的气候特性、面积、人口、矿藏——总之什么都讲到了。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开发比罗比詹的困难，说那儿有的地方有永久冻土，蚊蚋肆虐，以及其他的苦楚。苏联政府的这项决定公布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看成是对他们的直接进击，因为这一决定即将打掉他们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而且着重表明，犹太人在苏联不仅享有他们的权利、完全的平等和一切机会，而且他们还可以在苏联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击痛了他们，在《前进》和其他的外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这一事件开始叫嚷苏联政府把犹太人送

到西伯利亚——死亡地区去，以消灭他们。最初几年往比罗比詹移民的工作又组织得极其糟糕，这一情况更助长了这种情势。我想，在这件事情上甚至有有意识的破坏行为。此事的领导人之一竟是“土地分委会”派驻比罗比詹的全权代表，有名的托洛茨基分子，似乎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好像叫格林森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事。1928年到比罗比詹去的第一批移民（他们有数千人之多）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都回来了。他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后不说他们被困难吓住了，而是说比罗比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他们在极力找借口为自己从那边开小差回来的行为辩解，所以给比罗比詹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谎话。当时在这儿有一个来自美国的犹太通讯社的记者，他把所有这些谎言都极力地夸大了一番。这也是围绕着比罗比詹问题展开的反苏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伊科尔”当然立即出来为比罗比詹方案进行辩护，尤其是因为，如在这里已经讲过的，以前还曾有过另外一个在地域上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方案。那就是拉林的方案。他的方案是要排干锡瓦什湖和第聂伯河滩地的水，让这些地方同克里木的北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连绵的大片地区，就可以把犹太移民区安置在这里，并可超过比罗比詹的犹太自治共和国。曾向“卓因特”提出建议，要求拨供大笔款项进行改良土壤的作业。我不知道这个方案的结果如何，不过政府采纳了比罗比詹方案。

在移民开始从比罗比詹跑掉并制造反对比罗比詹的舆论的时候，“伊科尔”立即表示完全而热情地支持比罗比詹，支持这一方案。特别是我还记得，我写了一首讽刺诗来嘲笑这些比罗比詹人——这些逃兵及其一伙人。公众演出时演员们朗诵这首诗效果还不错。

那个时候“伊科尔”的主席是查尔斯·孔茨教授——这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他列宁曾写道：“这是美国惟一的一位彻底

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个孔茨 1928 年曾到过苏联。他还同美国的农场运动有关系，相信集体化。在苏联开展集体化的时候，他认为这就解决了农村的整个问题，他坚决拥护最广泛的集体化。

他也看到了比罗比詹对犹太人有着同样的机遇，1928 年政府的决定一公布，他就亲自到比罗比詹去了，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结识了很多移民，也结识了领导等等，回到纽约之后他当众声明，反对比罗比詹的运动是不对的，比罗比詹完全适于大规模安置移民。根据他的提议，“伊科尔”在美国购置了 2 部大型挖掘机、8 部 60 马力的履带拖拉机、几部载重汽车、电站设备和木工厂设备，总价值为 1 亿 2 千万美元。这对于比罗比詹的发展，对于彻底反击对苏联的挑衅性攻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根据孔茨的提议还决定派出美国专家组，其目的并不是考察比罗比詹是否适于安置移民，因为我们相信苏联政府，认为既然这个地区被划定安置犹太人，那么它一定是完全适宜于做这件事的，但是为了反击对苏联的这些攻击，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考察还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如果到比罗比詹去的美国专家不是“伊科尔”的成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人士，让他们亲眼目睹一切，让他们讲出整个这场反对苏联的运动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会有好处的。这就是给这些“伊科尔”的专家提出的基本任务。因此邀请了美国著名的土壤学家加里斯教授。他又带上了自己的秘书索尔斯教授，然后他又建议邀请孔茨教授，农业机械化教授杰维德森。

此外，瓦坚贝格和布朗也参加了专家组。

(审判) 长：又是瓦坚贝格？

塔尔米：是的，瓦坚贝格、我和布朗是“伊科尔”委员会的委员。

(审判) 长：在侦讯时你供认（卷 21，案卷页 24）“我们考察

了整个比罗比詹地域，了解了土壤的性质、农作物、气候条件、工业能力和居民的生活条件。回到美国以后，我们用犹太文和英文出了一部书，详细叙述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比罗比詹的一切”。

塔尔米：完全对，我只想说明，我们在比罗比詹待了5周。这个面积有3万5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尚有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我们在这5周的时间里，徒步、乘拖拉机、骑马等等（走过了）1千多公里的路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可能对一切都详细考察。我写的《在处女地上》那本书里非常清楚地讲述了考察队在比罗比詹所做的事情……

……《在处女地上》这本书是我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感，热爱并且敬重苏联的情感撰写的。

（审判）长：你说这部书是你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感写出来的。可是从鉴定的结论中却看不出这一点。“塔尔米在他的《在处女地上》一书中，从敌对的反苏立场出发对苏联的现实进行了阐述。他以‘客观的态度’为借口，勾画了一幅诬蔑诽谤性的、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苏联远东地区和苏联人的生活情景。”

№1171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塔尔米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9日)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对鉴定的结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塔尔米：我已经举出一些例子说明这鉴定书写得多么有偏见。它写得太过分了，就连起诉书都没有认为可以控告我以反苏的立场写了这本书，尽管起诉书的写作者并不大在意用比较翔实可靠的证据来论证控告我的各条罪状。

(审判)长：可是你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你并不否认鉴定的结论。

……可是并没有人强迫你在这些记录上签字呀？

塔尔米：一般地说我没有被强制地签过什么东西。我是想说，如果我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被逮捕的，那么我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知道我面对的是敌人，我应当把他作为敌人来对待……我有足够的坚定精神不向他提供任何口供。可是当我面对苏联的侦查员的时候，虽然他断言我是一个敌人，可是我却不能把他看作敌人，而把他看做一个苏联人，我要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做。经过第一周的审问之后，在库兹米申中校接手管我这案子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份提起控告的决定，并写了一份记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承认自己犯有对你提出控告的各条罪行？”。我回答他说，我不承认自己犯有这些罪行。我这句话他没有记，而是记上了我承认我在1917年参加过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法列尼格捷”，等等，是有罪的。我

告诉他我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引用高尔基的话对我声称：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我开始反驳说还没有证明我就是敌人，可是他却回答我说，既然我被逮捕了，那就意味着我是敌人。他还对我说明，我没有权利给他指出在记录里写什么不写什么，只能在认为侦查员说的不对时提出异议。

这是那位以苏联国家全部要案侦查处科长的身份签字的侦查员对我讲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这可是受到苏维埃政权信任的一位苏联人说的。我尤其要说一下阿尔乔莫夫中校采用的一个心理上的步骤，就是他把辑录起来的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给我读，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一些事情改变了认识。我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因为是他给了我这份辑录让我读，他从而承认了我也是一个苏联人，我可以和他用同一种语言讲话。

要知道在侦讯期间，侦查员是你惟一可以与之交往的活生生的人，这是个苏联人，不想为每一句话和他争辩。归根结底我想还是要根据事实而不是说的话对我进行审判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要在不符合事实的供词上签字呢？

塔尔米：我不愿意为每一句话去争辩了。我已经被单独监禁29个月了……

(审判)长：这都对。如果这不符合事实，你是不该签字的。

塔尔米：有一部分是属实的，不过我声明，我没有鼓吹任何反苏的言论，对这个问题的供词是夸大了的。

因为这本书贝格尔森读了，是他给侦查员翻译的，我想问问他，我在对法庭的供述中是否正确地传达了某些引文的内容。

(审判)长：贝格尔森，塔尔米关于他那本《在处女地上》的书的口供你认为正确的吗？

贝格尔森：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主要的问题是塔尔米协助外国人考察了比罗比詹的一切，从我们目前所受的这场审判的精神

这个角度考虑，从这个观点上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就是说不应该把外国人送到比罗比詹去。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曾供说《在处女地上》这本书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和谍报性质的文字材料，它为外国间谍提供了情报，你现在对这一点予以证实吗？

贝格尔森：我不认为这本书使外国侦察机关有可能获得什么资料，但是我认为那些教授们，那个专家组的成员们有可能向外国的侦察机关转送了其他的，更为广泛的有关比罗比詹的资料。

(审判)长：你回答问题。你认为塔尔米的这本书是民族主义的和谍报性质的，或者不是？

贝格尔森：那个时候在苏联对书籍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那本书在这里也是可以出版的，可是今天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就不会让它出版了。

(审判)长：可是塔尔米引证米哈伊洛夫的书《面对祖国的地图》来辩解，那本书里也引用了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料。

贝格尔森：这本书我没有读过。

(审判)长：贝格尔森，你来说说，塔尔米讲鉴定摘引出来的那些句段选择是带有成见的，如果把它们完整地复现出来，文句的意思就改变了，是这样的吗？

贝格尔森：如果整页地读下来，而不是只读鉴定摘引的那些单个的句子，意思就会像塔尔米说的那样。

(审判)长：那么你是专门这样来挑选摘录这些文句的吗？

贝格尔森：不是的，我把整本书都读了，翻译出来的要比案卷里有的多得多。

塔尔米：我声明，如果是客观地，而不是带有偏见地来阅读这本书，那么就能立即看得出来，书中没有任何反苏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没有任何谍报性质的或是泄漏国家的什么机密的内容。所以

我认为，此书在这份鉴定书中遭到了完全是无端的彻底的诋毁——黑白被颠倒了。

我想问一下，瓦坚贝格是否还记得，这本书是 1930 年第一次发表在《自由晨报》上的，当时有没有可能在《自由晨报》上发表反苏内容的书籍？

瓦坚贝格：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自由晨报》上登载过叙述比罗比詹之行的文章，但我无法说刊出的样式和后来书中描写的完全一样。《自由晨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美国共产党中央出版的一份共产主义的报刊，显然反苏内容的书是不可能在那上面刊出的。相反我敢认定，塔尔米的这些文章，书也是一样，在驳斥就比比罗比詹安置犹太人的问题向苏联发起的一切攻击这件事情上是发挥了良好作用的。

塔尔米：我想这实质上已经把我那本书的问题说清楚了。

（审判）长：阿尔巴佐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塔尔米：这是美国共产党的一个老党员。

就是说，我转到《自由晨报》去工作了，那儿的主编是奥利金，而编辑部的责任秘书是诺维克，那时诺维克正在欧洲各地旅行，我不得不代理他的职务。这种情况一直有 1 年或 1 年半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提出请求允许我返回苏联。

（审判）长：向谁提出请求？

塔尔米：向共产党提出。

（审判）长：你是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吗？

塔尔米：是的。完全是正式的。第一，在美国待了 11 年，我怎么也无法适应这个环境，在那里从来没有像在家似的感觉。另外，我也根本没有永远留在美国的想法。我在那儿只有置身在共产党员中间时才感到自己是在家里。

（审判）长：你在预审时说你是肩负着敌人交待的任务来苏联

的？

塔尔米：这是不对的。

(审判)长：怎么不对，你的口供是这么说的(卷22，案卷页14)——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我领受了犹太民族主义组织“伊科尔”的一项任务：在“犹太会”主席团充当它的代表。我在“伊科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同谋者、犹太民族主义者瓦坚贝格在1933年大约比我晚半年回苏联，他在离开美国时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

侦查员对你讲了瓦坚贝格的事，问道：你的同谋者瓦坚贝格已被我们逮捕，在1949年5月26日审讯时供认，他来苏联是承担了“伊科尔”的秘书长阿尔马佐夫交办的间谍任务的。

阿尔马佐夫也给你交待任务了吗？对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是——“是的”。又问你：“任务是什么？”你回答说：“我必须在‘犹太会’主席团代表‘伊科尔’，安排好向美国寄送关于苏联的犹太人的状况、关于比罗比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的情报，还有关于苏联的犹太组织的活动情况的情报”。

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

塔尔米：这个“是的”不是肯定也给了我同样的间谍任务的，而是肯定我接受了在“犹太会”充当“伊科尔”的代表的任务的。

阿尔马佐夫也像对瓦坚贝格那样给我布置了这项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间谍任务。

除此之外还交给我办一件事情，我也没有拒绝。《自由晨报》的编辑奥利金和美国共产党中央犹太处请我从苏联给共产党的《自由晨报》写文章来。我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表明这份报刊是美国惟一在苏联享有采访权的报纸对该报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事业有好处，我就同意了。这项任务在侦查员的语言中就获得了一个“间谍性质和民族主义的任务”的名称。

(审判)长：(对瓦坚贝格讲)在预审时说过，你接受了间谍任务。你证实这一点吗？

瓦坚贝格：不，我不能证实。

塔尔米：让瓦坚贝格说说，他是否知道我给阿尔马佐夫寄过什么东西。

瓦坚贝格：无论是塔尔米还是我都没给阿尔马佐夫写过一次东西。

(审判)长：既然请你们写，你们为什么又不写呢？

瓦坚贝格：那个时候比罗比詹的情形并不令人愉快，无助于宣传工作。

(审判)长：你们可以写事情很糟呀。

瓦坚贝格：我们写这个干什么。我问过塔尔米：“你给阿尔马佐夫写东西了吗”，他说：“没写”。他问我写没写，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年年如此。

(审判)长：关于阿尔马佐夫你们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瓦坚贝格：据我估计，他是在什么地方从事左派运动。他是共产党员，多年来一直支持福斯特。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战前你在哪儿工作？

塔尔米：我在外语文学出版社作了5年的英文部主任。到这个时候第一次用英文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列宁的12卷集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都是在我负责出版社的工作时期出版的。这些书是我亲自翻译并校订的。在我负责的那个时候，还做了很多政府布置下来的工作，例如1933年出版梅特罗-维克尔斯诉讼案的速记报告，1937年出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审判案的速记报告，以及一系列类似的报告。哪一次在印刷厂都是一干就是40个小时。这些速记报告的出版工作是这样组织的：案子结束后1~2天用英文印行的成书就已经出来

了，可以按预定的计划发送了。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你在侦讯时的口供里说(卷22，案卷页16)“1937年‘犹太会’和‘土地分委会’的敌对活动被揭露出来，于是我们同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群体的罪恶联系暂时中断了”。

接着你对侦查员所提的问题回答道：“是的，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美国的民族主义群体的联系开始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

塔尔米：我可以说直到1950年8月以后才开始把“犹太会”和“土地分委会”的活动看做是有害的和民族主义的。“伊科尔”有可能也是一个同样的敌对组织，它参与这一活动的程度有多深，其敌对的性质就有多强。所任命的清查“犹太会”的委员会发现那里一切正常。可是，当“犹太会”已经被撤销之后，发生了这样几件事——“犹太会”的领导人被逮捕，其中包括责任秘书埃德尔曼，我回来之后同他是有联系的。而两年之后埃德尔曼被释放了，显然是在1940年并不认为他的活动是犯法的。因此我认为自己在“伊科尔”和“犹太会”系统的活动并不是违法的。我在讲我自己的这种供词上签了字，我想就此做一声明：签字时我是有欠斟酌的。因为我至今仍不明白，间谍们违反一个国家的意愿而获取到的间谍情报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怎么可以把“间谍情报”这个专门的名词和我们的、包括我个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呢，我弄不明白。

我是一个资深的译员，如果要由我来把这个词语译成英语的话，我会感到非常困难的。

我在这样的供词上签了字，是因为我长期受审而多日夜不能寐，那个时期心情抑郁沮丧之故。

所以我要说明这是注意力衰退的结果，显然就是在这样一个时

候这个词溜了过去而未引起注意。

(审判)长：你是由什么人推荐，在什么时候进苏联情报局工作的？

塔尔米：……1941年战争爆发之后，我在7月2日报名参加人民武装，我去到集合地点，已经给我编了队，告诉我在某某日来，出发上前线。

当我背着背囊，带上所有的东西来到集合地点的时候，我和其他来的人被告知：“先回去上班，到该来的时候再通知你们”。这大约是7月10日的事，确切的时间记不得了。

大概是7月12日，出版社社长把我叫去说，苏联情报局打来电话，要我和出版社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去见洛佐夫斯基。我们3个人就去了。我们来到中央委员会后，让我到一个房间里去，一进屋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罗科托夫。他做过一个时期的《外国文学》杂志的编辑，还编纂过英文出版物。他告诉我：“我们推荐你到苏联情报局去工作”。如他向我说明的，苏联作家协会在苏联情报局之下成立一个宣传处，这个处将把著名的苏联作家的文章寄给英国报刊，我就是翻译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一项比较重要的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我就同意了。然后让我去了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那儿有好几个人，其中就有利特瓦科夫的妻子。开了一个关于组织这个翻译处的小型会议。大约在1941年的7月16日我就开始了在苏联情报局的工作。

塔尔米关于他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做的工作供述如下。

塔尔米：有的时候我们应邀出席一些宴会，参加一些会议，我们，特别是我在委员会的活动也就是这一些。克维特科在这儿说我从来不谈委员会的事。这也证实了一个情况：爱泼斯坦和我的关系最密切，但是委员会的事务他却从来也不找我，而总是找希梅利奥

维奇，总的说来，我在委员会里什么作用也不起，况且1942年2月15日我就离开了古比雪夫，在莫斯科苏联情报局工作。那个时候洛佐夫斯基在古比雪夫，委员会也在那里。在莫斯科我受我的顶头上司克鲁日科夫领导。在这一时期我同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

洛佐夫斯基：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苏联情报局的机关有一部分又回到了莫斯科。那个时候在莫斯科是谢尔巴科夫，在古比雪夫是我。莫斯科一直不断地给我发电报，要求我派译员过去，因此才在2月份把塔尔米派到莫斯科去了，他在那儿一直工作到我们迁回去的时候。

（审判）长：塔尔米在莫斯科工作了多长时间？

洛佐夫斯基：他从1942年2月一直工作到1943年8月底。

塔尔米：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参加了犹委会的活动——出席了第三次全体会议。我什么也不想对法庭隐瞒，因此我要讲一讲在费费尔临去美国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次短暂的谈话。费费尔来到了莫斯科，他好像是给我带来了和我很要好的瓦坚贝格的信。他把东西交给我并告诉我他要到美国去，请我给他提些建议他在美国该怎么做。他向我提出这种请求是因为我在那边住过，可以给他提些有益的建议。我对他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我听说米霍埃尔斯爱喝酒，就警告费费尔说，在美国有很多敌人，他们会利用每一个失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对费费尔说这一点是因为他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

第二条建议是这样一类性质的——我警告费费尔说，在美国会有人努力想和他结交，这是必须加以防范的。会遇到像莱维、奥帕托舒等等一类的人，这种人，如我强调说明的，是苏联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会试图在犹太文学方面和我们的代表团取得联系，目的是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捞取资本。关于《自由晨报》的原撰稿人纳德尔我也是这样讲的。

(审判)长：被告费费尔，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

费费尔：我记不清是不是谈过纳德尔了，因为我仿佛记得早在我们去之前他就已经死了。至于莱维特和阿帕托舒，塔尔米确实对我做过警告。不过我并不需要这些警告，因为我们一直在报刊上和他們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在《自由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他们。我们的代表团本来就是处在领事馆的严密监督之下的。

塔尔米：这样，我在委员会的活动仅只是在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了一次言。那还是在基斯洛夫胡同的红厅里的事。当时费费尔做了访问美国的报告。报告使用的是半开玩笑的口吻。所以我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去参加这次全体会议的。爱泼斯坦请我发言，我发言讲了几句话。

(审判)长：关于犹委会进行宣传民族主义的活动问题的鉴定书你有什么话要说。

塔尔米：在1950年8月我对委员会的活动做出重新估价之后，我认识清楚了鉴定所说的事情当中，有很多我实质上早在1950年对侦查员的供述中就已经讲过了。我已经举出事实确证民族主义是有的，这表现在委员会的领导者们为崩得分子提供了讲坛这件事上。除此之外，到处都大肆强调犹太人的成就，宣传美国的犹太人各个阶层团结一致，这首先就说明了有民族主义。

我读过鉴定书之后曾说，鉴定书所指出的情况是对的。从我的体验来说，我可以确认，我过去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出版《埃尼凯特》（《团结》）报这件事本身就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报纸——这不仅是集体鼓动员，还是集体组织者。《埃尼凯特》报想组织什么人和什么事，又是为着什么？一动脑思考这件事，就会明白这里边隐藏着一种骗人的做假行为。《埃尼凯特》报上有一个常设栏目讲述外国的犹太人生活。

苏联的犹太人为什么要特别对外国的犹太人的生活予以关注？

这有什么必要？这就是民族主义。我无法指出刊登民族主义文章的具体事实，然而报上有民族主义的东西——这是确定无疑的。

(审判)长：你为什么去犹太教堂？

塔尔米：我已有45年没进过犹太教堂了。

(审判)长：可是案卷里有材料说犹委会的成员参加了祭祷法西斯受害者的活动？

塔尔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参加祭祷活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可是我没有去参加。总地说来我从12岁起就再没进过犹太教堂。

(审判)长：那么说你没有参加。为欢迎梅尔松到来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是怎么回事？

塔尔米：我听说是在梅尔松来到犹太教堂的时候，她受到了欢迎，有一些人甚至吻了她的衣裾。过后我曾和瓦坚贝格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感到吃惊，革命成功已经33个年头了，从哪儿冒出来这样一种鲜明地表露了民族主义的行为呢。我很惊讶，苏联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一个我们很陌生的种族啊。我们甚至连语言也不是共同的。所以我在入狱之后对一切进行了再次的认识评判，以弄明白那一次民族主义怎么会突然爆发出来，怎么会发生那次反苏的示威行动时，我得出一个结论：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四周都笼罩着犹太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心。而《埃尼凯特》报则是组成这个民族主义链条的环节之一。我进一步的思索使我找到了这种民族主义表露的另一个源头。贝格尔森已经在这儿说过了，犹太教是一种粗暴的民族主义宗教，它整个地建立在犹太人一定要期盼把巴勒斯坦归还给其用作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疆土这一点之上。所以在还没有以色列国家的时候，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当以色列国变成了现实，而犹太人（信教的）每天都反复说，今天我们在这儿，明天就在以色列国了（祷告词中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就具有很大的作用了。所以，当这个国家的代表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看成了救世主，由此就生出了那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示威行动。

(审判)长：被告人塔尔米，法庭再没有问题要问你了。

塔尔米：请允许我再做些补充。

(审判)长：说吧。

塔尔米：我要再一次强调，我同犹太作家组很少往来，到那儿去过3~4次。我并不是给自己表功，我从1933年起就不读不看犹太文学作品。瓦坚贝格可以证实，他曾问过我——我为什么不读犹太文学作品，我回答他说，我不读犹太文学作品是因为我感觉不到那些书同人民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古犹太语在苏联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这不是活着的人讲的语言。它是一种人为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使我不愿意读犹太文学作品，何况我还对其他一些事情有兴趣。诚然，有些作品我买了，不过只是粗粗地浏览了一下。

其次我想说，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当闲差，而那里没做什么事这一点，是可以很容易进行查证并调查清楚的，并不是我这几年里的全部活动。我整个这一时期都在苏联情报局工作，而且我要告诉法庭，我于1948年4月22日被解除苏联情报局的工作。这是我得知我的儿子在柏林被捕之后发生的。儿子被捕的事我当然立即报告给了我的首长特罗扬诺夫斯基，过了一些时候我就被解职了。

(审判)长：你在侦讯的口供中谈到过苏联情报局机关杂乱无章，工作不合规矩等等现象。这是真的吗？把事情再说一遍。

塔尔米：我认为苏联情报局领导组织工作的策略是不对的。我认为追求寄往国外的材料的数量在一些情况下损害了质量。我没有把这认为是一项大的成绩。我要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属于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这种

策略是不正确的。此外，苏联情报局内缺乏集体生活的感觉。全体大会是召开的，然而存在一个统一的集体的感觉却没有，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这一点我也是说过的。我认为是不对的还有：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虽说在形式上算作是共产党员吧，比如说约翰·费希尔，却可以在苏联情报局无拘无束地游来荡去。费希尔经常随随便便地来我们这里，硬要人做这做那。这事我在自己的供词里说过，我现在还是确认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大正常。我和瓦坚贝格有一次说起，苏联情报局的译员哈涅尔同外国的记者们交往过密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

所有这些现象实质上都是不正常的，但这是我在苏联情报局期间自始至终延续下来的。我还要说，我1948年4月22日被从苏联情报局解职，如我曾说过的，是特罗扬诺夫斯基为推卸责任而采取的一个完全公开的行动，因为不仅没有停止向我布置工作，而且还交办过十分重要的工作。我被解除工作后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阅看约·维·斯大林的传略并将之译成英语。这项工作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完成了而且我觉得完成得不错，特别是因为特罗扬诺夫斯基后来告诉我海金因我在先前完成的译稿中发现的错误受到了党内申斥。还曾把李森科的报告交给我翻译。在被捕前的那几个月我还翻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王世杰^①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这是一篇批判铁托集团的文章，它先是发表在《真理报》上，要我把它译成英文。我发现《真理报》上有一处政治错误。我要特罗扬诺夫斯基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文章里有个小标题“世界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我去找特罗扬诺夫斯基，对他说怎么能这样讲呢，还有苏联呢，在苏联既没有压迫民族也没有被压

^① 原文如此。此处显然是错误的。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委员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是刘少奇的文章。

迫民族。原来《真理报》上有时也会漏过这样的错误。征得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同意后，我把这个地方简单地译成了“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我举出这件事是想说明，假如我有民族主义思想，我就发现不了这个问题。我受命把《苏联建设》杂志译成英文。我翻译了一期就再没有来得及做。

我还想说，1932~1933年间我来到苏联的时候，经过多年的漂泊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了祖国。我曾经说过，1921年我去美国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我现在无法准确地说出事情的经过情形，但是这种情绪当然是有的。

我留恋集中浓缩在纽约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可是在1932年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这种生活习俗已经让我感到憎恶，对它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到了苏联以后，我感觉到自己已是庞大的苏联人民的一员，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通常我做什么事都是全心全意地做的。我总是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空闲和无事可做。我没有时间用于其他目的。当然，我也去看戏，去犹太组参加文学晚会，但是次数不多。对我来说犹太人问题早已不再存在。对于我来说不仅是犹太人问题不复存在，就是民族问题也只是从苏联的盟邦为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个观点来说才存在。只是从这个观点上说，对于我才存在民族问题，由于我对犹太人问题没有兴趣，我也就没有看出犹委会中出现的那些显露出民族主义的现象。西班牙和中国发生的事情要比这些犹太人的事务更令我感兴趣。我还想说，我的家属，说准确点这实际上是我妻子的家人，她的弟兄、姐妹、姐妹的丈夫、兄嫂弟媳等等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党员或者共青团员，而且从民族组成上说这个家庭里边既有乌克兰人，也有犹太人，还有俄罗斯人。他们彼此之间生活得很和睦。

我同瓦坚贝格和他的妻子柴卡·瓦坚贝格关系很好。可以问问

他们，在我和他们友好交往的整个期间，他们是否听到我讲过什么反苏的观点……

(审判)长：我已经给你宣读过柴卡·瓦坚贝格对这个问题的供词了。

塔尔米：如果她要老老实实说的话，她会对这些加以否认的。

(审判)长：她为什么要否认自己的口供呢。

塔尔米：这个我说不上来，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反苏的话。

相反，她自己倒是有过一些庸俗的牢骚话，我曾经给予严厉的斥责。比如说1947年12月废止票证制度之后，白面包的供应曾经有过中断现象，有很多人就对此发出怨言，尤其是柴卡·瓦坚贝格也讲过这样的话。我当时曾跟她说，我刚刚从尼基塔门来，还看见有人拿着白面包，所以说她的牢骚话没有根据。于是柴卡·瓦坚贝格对我说：“你用不着去排队，所以在你看来什么都是一派大好”。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庸俗的言谈，我把她呵斥了一顿，那次谈话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的儿子是在1947年被捕的，1948年2月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没有流露出一点点不信任的态度，也没有讲过任何反对苏联司法机关的言论。

(审判)长：他是因为什么被捕的？

塔尔米：我不太清楚。

(审判)长：案卷里有查询材料。

塔尔米：那里边还有他关于我的不实口供。他不可能知道我以前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我曾经参加过崩得，可是他却这么供说。我的儿子在苏联军事当局经济局工作，那里对他的反应极好。他在鲁坚科（将军）的属下工作，鲁坚科本人对他的反应非常好。据我了解，他被捕据说是因为仿佛同美国人会面。

(审判)长：他们向他们通报了一些情报。

塔尔米：他没有通报任何情报。在军事检察院我被告知，他是根据第58-1条B款受到控告的，后来法庭把控告罪名改定为第58-10条第2节和其他一些款条。

(审判)长：这就意味着是反苏言论。

塔尔米：事情不在这儿，他不可能有什么言论。在他那儿找出了那个坏蛋维克托·克拉夫琴科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就是逮捕他的主要原因。

(审判)长：那就是说，定的是保存反革命书籍罪。

塔尔米：我确信是这本书成了逮捕他的理由。在向他赠送此书的时候，他出于糊涂没能拿出苏联人的尊严拒收。为什么他没有能拒绝呢？就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对他讲，在苏联不允许随意读书，而他为了证实情况正好相反便同意了收下这本书。我觉得这就是判他有罪的主要原因。那个坏蛋罪有应得的后果由我的儿子承当了。尽管我的儿子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并不认为他是反苏分子和罪人。我没有对任何人讲我认为苏联司法机关做得不对，也没有人知道我儿子被逮捕的真实原因。我儿子被逮捕的事我只告诉了特罗扬诺夫斯基、瓦坚贝格和他的妻子，尽管我认为我儿子被捕是个错误，我却对任何人一次都没有讲过对苏维埃政权愤恨的话，相反，我却总是表示我相信苏联的司法机关会纠正这个错误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探视我的儿子，以了解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他会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我，是不会说谎的。我想把全部材料收集起来，以便弄清楚向哪一级申请为我的儿子恢复名誉。我已经拿到了西伯利亚方向特快列车的车票，但是第二天我就被逮捕了。也因此对我进行了搜查。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札记、笔记和一本记载与我儿子被捕相关情况的日记。我在这本日记里记下了我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被审查、检验过了，所收到的儿子的信件也是这

样，在所有这些东西里边并未发现任何反苏的东西。假如在那些物品里边发现了什么反苏的东西，那么在案卷里是会反映出来的。

我认为我没有把儿子保护好，他发生这种事情的很大的罪责是在我的身上。1947年他来莫斯科时告诉我，美国人送了他一份礼品，他不愿欠人情，想送他们一件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不是对他进行责备，而是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把这一切都当成了苏联人要让美国人看一看：我们可以送比他们的礼品漂亮得多也贵重得多的东西这样一种爱国之心的绝好的表现。我去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0号大街一家手工艺品商店，选购了几件象牙制品——一个烟盒，几个烟斗。为这我花费了14个多卢布。我儿子把这几件东西送给了美国人。在审理他的案件时我把这个情况写出来给法庭了。

（审判）长：你没有给儿子指出，让他不要收这些美国人的礼品，而是亲手推他去搞这种联系。

塔尔米：是的，后果就是我亲手推他去这样做的。

（审判）长：除第58-10条第2节外，你儿子还被控泄漏国家机密。

塔尔米：是的。但是后来鉴定认为没有泄漏国家机密的事。

（审判）长：总之你是说尽管你的儿子被不公正地判了罪，你却对此没有做任何非难？

塔尔米：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没有责难过什么人。

我还要说一件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事情。曾经问过我，我为什么要接待并且会见诺维克——他到底是个外国人哪，这件事我对检察长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在那个关于“铁幕”的谣言诽谤盛行的时期，我若是有什么地方让诺维克觉得我怕和他接触的话，那么这就会招致对苏联更多的诽谤。因为来的这个人总还是和我相识25年之久了。我认为和他会见是我作为一个苏联人必须做的事。

西蒙诺夫写过一部剧《俄罗斯问题》，剧里边讲的是一个叫史

密斯的新闻工作者来到莫斯科，他根据他在苏联同苏联人会见并无拘无束地谈了话这一事实，写了一本称赞苏联的书。就是说这部剧告诉人们，同外国人是接触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问题：只要一个苏联人会见了外国人，那他立即就不再成其为苏联人了，那么我们的状况就太奇特了。我那部《在处女地上》的书写了1929年苏联人是充满了怎样的自尊同外国人讲话的，那么在1949年这种状态就尤其要表现得更为鲜明才是。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比所有这些外国人强而有力，我们用不着害怕和他们交往。

我应该说一下，1949年5月份到莫斯科，到我们苏联，又来了一位《自由晨报》的代表——在美国很有名气的漫画家威廉·格罗特。他5月2号或是3号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工作很忙，近日又要出差。我问他在莫斯科能停多久。他回答说很快就要到列宁格勒去，他是受全苏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的。我不想和他见面，因为我觉得在共产党人萨尔茨曼，据我们得知，没有被发给苏联入境签证这样一个时候，和外国人，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外国人，会面不好。我当时对瓦坚贝格说过，在美国人很难获得签证来参加反战大会这样一个时候，对待能够获得这种签证的人要特别谨慎。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不愿意会见格罗特。

这样我和他就没有见面。

№1171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9日)

6月9日18时45分开始审问瓦坚贝格。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你承认自己有罪吗，犯的是什么罪？

瓦坚贝格：我认为自己的罪行是1942年我曾为犹委会工作了几个月，并且撰写了一篇民族主义内容的文章在美国的电台播出。我也承认我了解犹委会在其成立的初期寄出的文章的性质，我还知道委员会把自己的材料寄给了哪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刊物、通讯社和报纸。我不承认自己有从事间谍活动和通敌的罪行。

(审判)长：你简短地讲一下自己的履历。

瓦坚贝格：我生于奥匈帝国加里西亚省的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我父亲在采伐场当伐木工人，后来作验收员，再后来迁居美国，在那里的一家缝纫工厂每天伏身在缝纫机上干14个小时的活儿。他曾3次迁往国外到美国移居，一辈子都是做工。只是到了这一生的晚年，已经快70岁的时候，才干起了售卖不动产的中介活动。在美国我有一个做律师的兄弟和一个嫁给了影院管理人的姐妹。

伊·谢·瓦坚贝格按照审判长的要求对法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履历，自己参加加里西亚—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经过。伊·谢·瓦坚贝格很早就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是犹太社会工人党—波阿列伊锡安的著名活动家。

(审判) 长：“波阿列伊锡安”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瓦坚贝格：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纲领混乱不清，是民族主义的。

在“波阿列伊锡安”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两个联盟：共产主义联盟和右派联盟。加入右派联盟的有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加入左派联盟的是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佐克人和俄罗斯人。居中间立场的是最大的一个代表团——波兰代表团。然而我们幸运的是那正好赶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逼进华沙的时候，恰恰是在大会要投票表决我们提出的接受共产国际纲领的决议案那几天，有传闻说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已经到了华沙的大门口。由于这个缘故波兰代表团加入了我们这个联盟，于是我们以多数票接受了共产主义纲领。我详细讲述这些是因为这表明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复活过程，由于起诉书断言我是怀着敌对的阴谋加入共产党的，我就想表明我并没有这样的阴谋。不错，我当时是想可以让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兼容并存的。

1920年底我移民美国。在那儿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我同波阿列伊锡安党的左派分子联系上了，并被推举进入中央委员会，1921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之后，我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并开始在本党的党员中间进行鼓动，以求接受全部21个条件而加入共产国际。就是在这次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列宁参加了这个小组），决议中泛泛地对犹太复国主义，而着重地对波阿列伊锡安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潮流进行了谴责。我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从根本上进行修正，1921年年中我脱离了改良主义者队伍，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并且差不多彻底摆脱了民族主义，就是说转变的过程完成了。还在“波阿列伊锡安”组织内的时候，我就同一些共产主义组织，

特别是和美国共产党的德国部建立了联系，受它的委托，我在美国的德裔人居住的城市巡回了一圈，做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奥地利和德国的形势、关于苏联的斗争和关于共产主义纲领的报告。

1922年1月1日我这次巡行回来之后，就到德文报纸《纽约人民报》编辑部工作，该报当时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一直到它的编辑换人为止。整个1922年和1923年的半年时间我都是在这家共产党的报纸编辑部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在“波阿列伊锡安”党员中间鼓动参加共产党，也是为了这一目的同当时领导美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亚历山大·比特尔曼建立了联系。我听从他的建议，留在“波阿列伊锡安”党内，以便帮助更多的人转入共产党内。自1922年起我就和比特尔曼商谈自己的工作，并在波阿列伊锡安党员中间做破坏工作，目的就是废除民族主义的纲领，使这个党的多数党员为加入共产党做好准备。到1924年事情已经酝酿成熟，我带领着75%或80%的波阿列伊锡安党员一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我从13岁起就靠做家庭补习教师赚钱过活。我想以此说明在生活中我一贯是非常勤苦的。

我是和一大批前波阿列伊锡安党员一起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入党的时候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3项请求。第一项请求——我的党龄从1921年开始计算，因为我从这一年开始就做共产党的工作；第二项请求——为我们这些在纽约和芝加哥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全体原波阿列伊锡安党员组织一个单独的党支部。当时有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诚然这种形式是不对的，但确实有过；第三项请求——请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转达我的一项建议：在共产国际之下设立犹太部来协调各个共产党下设的犹太组的工作。在美国的、法国的、波兰的和苏联的共产党之下当时就设有犹太组，我认为这是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

(审判)长：波阿列伊锡安党当时是在你的直接领导之下，你是它的领袖。

瓦坚贝格：完全正确。那个时候我原先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又有点沉渣泛起，不过后来我把它彻底根除了。我的这些提议曾发表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案卷里是应该有的……

……但是起诉书认定这是我的敌对活动，断言我入党怀有充满敌意的阴谋。在资本主义国家抱着那样的思想加入共产党那可是太轻率了，因为美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的党，而是相反，在那个时期共产党还没有公开。

(审判)长：1924~1929年这段时期你干什么了？

瓦坚贝格：1924年“伊科尔”就组织起来了。

“伊科尔”不光是一个救助组织，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那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的第七个年头，苏联人民遭受了国内战争、外国干涉等等所带来的创伤之后刚刚开始恢复元气。美国的民众被反动的刊物上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故事等等东西吓坏了，共产党很难接近他们。另一方面，尽管有很多关于苏联的流言蜚语，民众对苏联还是怀有同情、友好情感的，所以党必须把这种情况用什么办法利用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援助苏联。正因如此，像“伊科尔”这样的组织的任务就是接近其余的群众、小职员、小资产阶级，接近劳动大众，对这些人讲一些共产党的言词是无法接近的，可是如果去给他们讲一些关于苏联的故事，他们是会听的，他们就会对你，对共产党员另眼相看。因此说这样做一方面是对苏联有利，另一方面对进行这种宣传的共产党也有利。

直接推动了组织“伊科尔”的，是在莫斯科建立了“土地分委会”的组织以及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政府的委员会来处理犹太人的土地规划，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全俄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大楼内，并把这件事首先通知给美国的犹太劳动者。当出现了组织“伊科尔”的问题时，美国的党和我们，共产党员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些想法办事的。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和谁统战？伙伴可不怎么样——犹太民族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曾经有过一些犹太作家当时认为他们不会拒绝帮助苏联的犹太人，也不会从一个失掉了阶级性的分子变成工人。比如就有过那么一位叫奈杰尔的作家，他说这是一件重要而又有益的事情，应该帮助俄罗斯的犹太人，但是他不能同犹太共产党人一块干，如果共产党人也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让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党外的人士去办。在这里备受称赞的阿帕托舒后来也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在“伊科尔”里我们是怎样安排我们的宣传活动的呢？首先，在讲述苏联的各项宏伟的建筑、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指出苏维埃政权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加以扩展，正努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其中也包括犹太人问题。然后我们就讲犹太人，在沙皇俄国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现在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指出目前不光是有了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因为苏联政府认为仅仅在政治上权利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物质—经济上的权利平等，所以俄罗斯人帮助所有各个民族，让他们把自己的精神政治水平也加以提高，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才进行土地规划并招犹太人去。特别说明在农业方面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犹太人是怎样参加到地里的劳作中去的，如何整村整镇地进行移民。我们对美国的犹太民众讲解时说，没有我们的援助苏联的建设还是要进行的，但是援助能为苏联减少一些实现这一重大事业时的困难。

我们那时曾经指出，在苏联正组织犹太民族区，也就是创建犹太国家体制的要素，在划出比罗比詹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犹太自治州之后，我们也指出这是犹太国家体制的要素。

(审判)长：你曾说过你在“伊科尔”里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工作。

瓦坚贝格：这一点我后面要说的。我想说我在这里讲了个大概的“伊科尔”活动的这条路线，我们的宣传工作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有重大的缺点。

(审判)长：你在侦讯时曾供认(卷19,案卷31)“从‘伊科尔’一组织起来我就担任它的秘书长，我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执行了列瓦庸派的指示，并在‘伊科尔’组织的各种工作小组中安插了他们的人……同时，我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领导‘伊科尔’的工作，促使‘伊科尔’在成立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民族主义组织，它进行工作和宣传的出发点并不是各国犹太人团结一致的原则……我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旨在同化犹太人的民族政策，竭力宣传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家的主张，并把这一问题置于‘伊科尔’全部工作的中心”。

瓦坚贝格：这不是我说的话，是侦查员的话。不过我是学法律的，我清楚我签字的是什么东西。

“伊科尔”的工作有哪些毛病呢？第一，这是一个单纯的犹太人组织，第二，它的活动同美国工人阶级的整个活动相脱节，尽管它源源地向党提供大笔经费，用来支持党的刊物和吸收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先是作同情者，然后是党员。但是我重说一遍，“伊科尔”的工作本身却是脱离革命工作的。我们当时没有经验，在这件事情上犯有一些重大错误，因此在“伊科尔”的工作中无疑是有民族主义成分的。但是这个组织无保留地同苏联友好，它的活动以援助苏联为宗旨，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伊科尔”的全部措施都一直是在共产党的监督之下实施的。而且在“伊科尔”的内部我们也在同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塔尔米可以

证实，这些民族主义者把我当作他们的死敌，因为我要是做什么事情，就拿出全副精神去做，因为我同他们把“伊科尔”的工作拉上另一种轨道，民族主义的轨道的企图进行了最为强有力的、坚定果断的、毫不容情的斗争。

(审判)长：“伊科尔”只办理犹太人的问题吗？

瓦坚贝格：“伊科尔”的工作不仅仅是援助苏联的犹太人，而是做有利于苏联的宣传。我们建立了后备，党从这里不断获得资金和人员。

(审判)长：可是你在侦讯的时候说过，宣传工作依据的原则不是各国劳动群众的团结一致，而是各国犹太人的团结一致。

瓦坚贝格：请你允许我连贯地讲述全部情况，然后我再来说明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记录，你在案卷里可以看到还有更糟的记录，我在那上面承认了进行间谍活动。

(审判)长：你还供认过，除你们之外，“卓因特农业组织”也进行过民族主义工作？

瓦坚贝格：我要说我本人给美国的报刊写过一系列文章反对“卓因特”，给《自由晨报》写过，也给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铁锤》报写过。另外，我本人在许许多多会议上讲话反对“卓因特”和“卓因特农业组织”，指出了他们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全部企图。我比别人更加了解这些组织，因为我本人有一段时间曾与民族主义者为伍。这我不光是说一说，这都记载在发表于报刊上的数百篇文章中了。

我在“伊科尔”组织中一直待到1927年，那一年根据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我被调去做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工作——调入工人住房建设合作社。在政治、住房、党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党认为应当往那方面注入新鲜的血液。我被派到那里去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批领导这个合作社的党的工作

者认为，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革命，而通过合作制度达到共产主义。再加上他们又都吃素，所以在为合作社的工人社员设立的休息营地的食堂里挂出了大幅的标语：“通过素食走向共产主义”。总之，在那儿出现了从各种观点来说都是很复杂的局势，于是党决定派我到那里去整顿局面。这个工作我一直干了两年，到1929年。1929年底我到苏美贸易公司去作法律顾问。我先前没有说在美国我一面工作，一面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从1923到1926年，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我到苏美贸易公司去工作与当年曾轰动一时的苏联黄金案有关。那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苏联开始在美国大量采购技术设备。为了确保顺利进行采购，苏联国家银行往美国运送了价值5百万美元的金锭。这种业务手续是秘密进行的，但是法国银行里有人同美国有联系，因此在装载着金锭的轮船到达之前，在美国就已经知道它所载的货物了，于是在轮船到达的时候，几名法院的官员登船对这批黄金进行查封。他们是代表白俄侨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侨民说这正是沙皇俄国的国家银行的保险柜和地下室里的那批黄金，是属于他们的。那批黄金被查封了。那是1929年，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极端仇视苏联的，所以才发了这么一份查封证。这个问题不仅具有财务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派来了一位法律顾问，另外还委托苏美贸易公司为此案提供一名可靠的律师。当找到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那儿就让我转入苏美贸易公司工作。由于这样一件案子我也就进了苏美贸易公司工作了。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按照纽约的法律组织起来的美国的股份公司。所有的股份，全部的资本都归一个人所有，这个人就是苏联的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长、领导人等等都由它来任命，但形式上这还是一家美国的公司。

我在这件黄金案中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必须证明每一锭黄金的来历，证明这些黄金并非来自原沙皇俄国国家银行的地下室，而是

苏联的黄金，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采掘到的。我们最后在各级法院的审理中打赢了这场官司。于是开始了一连串对苏联的攻击。特别是攻击苏联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那时美国石棉不足，要进口，苏美贸易公司被控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出售石棉。在木材出口方面控告说这些木材是苏联使用苦役犯人的劳动采伐和运送的，而由于美国有法律规定……

(审判)长：这些同你的案件无关。

瓦坚贝格：这同我到苏联来有关。因为在那里使用苦役犯人的劳动生产的物品是不准出售的，所以就接到了禁止进口材等等的要求。

No 1171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0日)

(审判)长：现在你来供述你到苏联来的情况。你到苏联来过3次吧？

瓦坚贝格：是的，我来过3次——第一次是1926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31年，再后来，1933年我就来长期定居了。

(审判)长：详细讲讲你来苏联的情况。

瓦坚贝格：是不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履历讲完呢？

(审判)长：那好，你接着讲吧。

瓦坚贝格：起诉书中说我在苏联从事敌对活动16年。1933年我受邀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因我在苏美贸易公司工作过而对我有所了解，所以请我去了那里。1933年美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政府这个时候已经由罗斯福领导，政府的方针也改变了。苏美贸易公司的工作比较容易做了，于是就建议我向美国党中央请求返回苏联，因为在这里我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在中央委员会我得到了调动的命令，就到苏联来了。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加入苏联国籍的？

瓦坚贝格：1935年。

(审判)长：什么时候来到的？

瓦坚贝格：1933年。我的护照在另一个地方——工农红军政治部，发给我所需的美元办理护照的延期手续。通常我是去找美国

大使馆，就给我把护照延长一定的时间，直到1935年护照到期，我被告知我可以取得苏联国籍，于是我去工农红军政治部要我的护照，加入了苏联国籍。因为我是来做对美贸易方面工作的，所以就派我去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大的木材出口联合会。在那儿我待了8年，从1933年到1941年我患了血管梗塞无法工作时止。由于爆发战争，这个组织疏散到了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后来从那个地方又给我发来重新去他们那里工作的邀请……

……说我1926~1929年来过苏联，同原来的崩得分子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获取关于苏联的材料，这是对的，但是说我获取谍报材料却是不对的。我1926年到这里来干什么呢？1926年召开了“犹土会”的成立大会。“伊科尔”成立起来后是同“土地分委员”保持关系的，可是“犹土会”召开大会的时候，“伊科尔”决定要同社会组织保持联系。而“犹土会”正是这样的组织。

“卓因特”不想同“犹土会”发生任何关系，它同“土地分委会”有关系——这是一个政府委员会，这是一些郑重认真的人，而“犹土会”是个社会组织，那儿是一帮共产党员。为了同“犹土会”建立起自己的关系，“伊科尔”派我和莱温作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莱温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但他却是我们在“伊科尔”工作的伙伴。出席大会的应该是派一名非党员和一名党员。

在“犹土会”的代表大会上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克里木问题。一伙代表在拉林的带领下提出了排干锡瓦什湖沼泽的水、把这一地区同克里木的北部连接起来、迁入犹太人以建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的方案。即使说排干沼泽的工程会减缓移民的速度，犹太人共和国总还是会建立起来的。多数人则说主要的问题是要迁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以便更快地把犹太人从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况中拉出来，让他们参加劳动……

(审判)长：这么说，“伊科尔”和“卓因特”两方面的民族主

义倾向发生了冲突。“伊科尔”是通过“犹太会”提出克里木问题的吗？

瓦坚贝格：“伊科尔”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也反对克里木方案。

（审判）长：那么“犹太会”内的民族主义者提出这种问题了吗？

瓦坚贝格：也没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犹太会”的人（他们这些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反对拉林等人的方案，米·伊·加里宁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犹太会”的人反对向克里木迁居犹太人的方案。在大会上，我方才已经说了，米·伊·加里宁讲了话，他述说了党和政府为犹太移民都做了哪些事。他还指出苏联的犹太人渴求有自己的国家组织是一种健康的现象，因此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协助。我理解了实际上也确是这样的，后来我在美国按同样的意思报告了这个问题，可是侦查员却认为这样做有过错。大会进行辩论时我没有发言，只在第一次会议上转达了美国劳动者的祝贺。我在内心里是站在反对克里木这个主意而赞成继续让犹太人参加在田地里进行有益的劳动那一部分“犹太会”的人那一边的。开完代表大会，我去了乌克兰南部地区和克里木当时已有的犹太人移民区，想亲眼看看这些昨天还是小商小贩的人在那里是怎么安置的，情绪如何，自我感觉怎么样。在莫斯科我拿到了在“犹太会”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人使用过的那些材料，后来这些材料也发表了。返回美国以后，我进行了一次巡行全国的组织活动，在会议上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为了使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参加到这项事业中来而重新安置犹太人的工作进展的情况，等等。这就是我在1926年获得的关于苏联的情报和材料。

就是在审问我的记录及整个这份案卷中，也都没有任何地方暗

示出这在1926年是什么谍报材料，我认为这完全是侦查机关空口无凭的断言。这就是1926年那次来的情况。

我到这里来心是纯正的，手是干净的，不是苏联的敌人而是苏联的朋友，不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而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苏联的生活和劳动，为了以后把我的所见所闻告诉给美国听我演说的那些人们。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1926年你已经到过苏联了，你为什么在1929年还要到这里来呢？

瓦坚贝格：1929年美国的报刊和资产阶级舆论界纷纷发表反对划定比罗比詹地域供犹太人迁居的议论。抨击的言论荒诞古怪得出奇：什么那个地方有乌苏里虎，有熊啦，是不适于移民的地区啦，什么苏联政府故意想把苏联的犹太人放逐到那里去，让他们置身于日本人的炮火前沿啦。但是在美国还有一些人的看法摇摆不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他们证明苏联的政策是正确的。当然，对于“伊科尔”来说，有苏联政府的决定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派任何小组，不需要看任何证据等等。我当时在合作社工作，但是我必须说，我一直保持着同“伊科尔”的联系，在秘书处和执行部两个机构都是积极工作的成员，还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所以我对塔尔米领导“伊科尔”期间自己积极参与它的工作，甚至对阿尔马佐夫领导该组织期间我起程去苏联之前的活动都负有完全的责任。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听过我们的讲解之后说：“……反正都一样，你们也没到那里去过，也许那儿真的就是永久冻土区，根本没有办法在那里耕作，也许那儿真的全是密林、沼泽、湖泊、一片汪洋，干嘛要让犹太人到那儿去呢？”为了让这些摇摆不定的人信服，为了击退对苏联这一项措施的攻击并证实这些全都是造谣，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小队。我记不得小组是根据谁的提议成立的了。好像是塔尔米说过，是根据孔茨或是布兰特的提议，我记不得了。党同意了。对这次旅行付的报酬很高，比如加里斯教授就得到了5千美元，其他人

也拿到了一大笔钱。

(审判)长：可是你在这边，在苏联也是领了钱的吧？

瓦坚贝格：我们在苏联没有领任何钱。我本人没有被列进这个“伊科尔”的小组。小组最初是由3名美国专家组成，而且我必须说，加里斯是美国他那个领域里声名卓著的人物，是南部一个州的大学校长，那可是一个很保守的地区……

(审判)长：他是哪个民族的人，是犹太人吗？

瓦坚贝格：小组的报告在纽约用犹太文和英文发表，并由“伊科尔”分别寄给所有要这份材料的人。这个小组的报告有可能被美国的、日本的、其他国家的侦察机关所利用，因为任何组织一提出要求，“伊科尔”就会马上寄过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里面有间谍情报，我没有讲过这种话。我曾要求侦查员把小组的这份报告附在案卷里，在莫斯科我的住宅里的书柜中就有这个报告。侦查员表现出一种倾向——我作为一名律师对这样一种倾向不能赞同——用证人关于物证的供词来替代这些物证。既然有这个小组的报告，要这些供词干什么？

(审判)长：哪儿有这份报告？

瓦坚贝格：我家里的书柜里有。当我在这儿收到起诉书的时候，我曾请求侦查员把该小组的这份报告附在案卷里。我对侦查员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耍心眼，争执辩论呢，你最好把那份报告拿来附在案卷里。难道我能记得住25年前在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吗？在1945年的目录中说它是具有回溯效力的，也就是说那个目录可以应用于这份报告。应该把目录拿来看一看，报告里边的那些资料是否在它的禁令范围之内。可是不知为什么侦查员却认为只能就我的口供判断，而不考虑写在报告里边的东西。我们没有把这些看做是间谍情报。1926~1929年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连想都没有想要收集那样的材料，就是不准宣扬的材料。我们收集的材料是

于苏联有好处的，因为那些材料是需要对国外进行宣传的，假若那是机密的话，我是什么时候也不会这么做的，我的原则就是只收集有必要且对苏联有益的材料……

……侦查人员认为，既然我会见了“‘伊科尔’执行部的委员”莫里斯并且说起过比罗比詹，就意味着我还是间接地向他传递了情报。请允许我对此做点解释。第一，莫里斯并不是“伊科尔”执行部的委员，他住在苏联，在珠宝贸易所工作。

(审判)长：侦讯时你说过，你向莫里斯通报了与比罗比詹有关的一切问题。你还说：“……在同莫里斯的谈话中我还告诉他，我们感兴趣的在苏联建立国家单位的问题进展极差，并与此相联系，对他讲出了自己对苏联政府政策的不满”（卷19，案卷页74）。

这是1949年2月18日的记录。

瓦坚贝格：我不能确认这段口供，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我从来没有讲过对苏联政府的政策不满的话。我和他谈过一次话，但是谈话的内容就是我前面供说的那些，1937年我还会见过布季什，1936年会见过诺维克。我对他们讲的是同样一些话，就是暂时还没有多大的成绩。起诉书中说，我给了他们令他们感兴趣的材料。我跟他们说了比罗比詹发生的情况，但是我没有往美国寄任何材料。

(审判)长：你看，5月26日的记录（卷19，页卷页140）里是这么写的：“布季什和诺维克一样，不仅对关于比罗比詹的情报感兴趣，并且还希望获得关于苏联的经济状况的谍报性质的详细资料。就是通过所有这些人我把获得的材料转交给了美国人”。

瓦坚贝格：这份记录是用实话和谎言巧妙编织出来的，从第一页右上角的第一个词谎言便开始了。

(审判)长：怎么着，你否认自己的签名吗？你的签名正就在这个地方的角儿上。

瓦坚贝格：角儿上写着“速记稿”。我否认这个，这是可以查

对的，因为记录本还保留着。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速记记录吗？我声明，没有，这些提问和回答都没有。这一份记录是5月26日给我拿来的，我用了40分钟在那儿把这36页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并签上了名字。这简直是一场噩梦。这个记录的第四页一开头那个地方说：“在波阿列伊锡安我并不怎么积极”，我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是中央委员。侦查员需要这样做是为了让人在记录里看到有的事情我是否否认的，因为在下一页上跟着就是揭发，我再一次声明，一切都是事先打好字的，没有做过这些回答和提问。

（审判）长：可是这些你已经签字加以确认了。

瓦坚贝格：我告诉你，我是在神志清醒记忆健全的状态下签的字，我是有意识签的字，而且我知道这是给我的判决签字。那是为了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我相当快地，还在侦讯的初期就掌握了进行侦讯的几条规则。

并不是被捕的人说什么侦查员都记录下来的，另外侦查员对被捕人的口供的解释也与他供述的不一样。

他们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任何可以作为给被捕者辩护的东西都不往记录里写。对你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承认罪过。如果你们有什么可以辩护的东西，那你们可以去对法庭讲”。如果拿出任何一件事情，把它从周围的环境中割离开，赤裸裸地摆出来，那情形就会像照哈哈镜一样。然而这是同辩证法的所有规律相抵触的。这样得到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歪曲，而侦查员却只取与实际割裂开来的事件。比如，那里边有一个地方说到我属于洛夫斯坦集团。我必须说明，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敌人的突袭。我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例子。第二，侦查员说：我不是你的秘书。就是说，他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写。这也是对的，一切都应该叙述得简要、文句通顺，等等。但是他却把这解释为：我不能按照你说的那样写。他不记我说的话，而是从控方的角度怎么使他满意就怎么写。还有一条

规则：“不许你过问提出的问题，提问题——这不关你的事”。可是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1929年你在比罗比詹进行过间谍活动。你确切地说一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当然是回答说我在比罗比詹没有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做了什么事情。后来我在已经写好的记录里看到：我的口供没有开头那一部分。我没有办法不承认，他记下了我讲的事情，但是不完全。还有一份记录记的事同我没有关系，可是突然就冒出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令你这个美国侦察机关的间谍感兴趣的了？”我回答说：“你是知道的，我不是美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可是关于我对某些资料是不是感兴趣那一点我还是做了回答，于是就把这同我答话的前半部分割断记了下来。就这件事我对他讲过：“随便哪位检察长都会把案子退回来让你做补充侦查的。如果你有根据说明我是美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可是在整个案子里却没有一点迹象说明我被招募，我干过什么事情，案子一定会退给你进行补充侦查的。你没有任何根据，怎么可以写上我是间谍呢？”。在第206条签字之后，我对他也这么说过：“把这个勾掉，案子会给你退回来的”。我声明，案卷里边就没有办理得合乎规定的记录。

再往下说。从第一天起就对我说：“你是个罪犯，在这儿是不抓无罪之人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明白了，既然是这么回事儿，那就得坐牢了，对此又不心甘情愿，那么走出牢狱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劳改营，再无他途。既然如此，就得加快办理此案，可是侦查员却天天反复地说：你延误侦讯，该结案了。29日做了一份记录，他说：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们把案子结束吧。我在这份应该让案子终结的记录上签字已经3年多了。还有一点。当然还可以抗争，什么也不承认，等等——这是仅有的一种抗争手段了。可是我坦白地对你说，我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不胆小怯懦。但是有一点可就完全不同了——你是在向谁做抗争？我是多么羡慕那些面对沙皇的暗探局或

是美国的警察局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呀。你可以看一看我的记录，我于塔尔米在这里说到这一点之前 3 年，就对侦查员讲过这种话。

(审判) 长：处处都应该讲实话，可是对敌人都必须隐瞒。

瓦坚贝格：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有阶级性的，而既然真理是具有阶级性的，于是你就会想，也许他确实是对的。

(审判) 长：如果他确实是对的，那你到了法庭上为什么还要翻供呢？

瓦坚贝格：也许他的确是对的。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一生……

……我讲到了我没有一点意愿同侦查人员抗争，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一般的真理，我知道有带阶级性的真理，而代表阶级性真理的是人类的先进队伍——苏联，而我面对的就是那个受苏维埃政权的委托捍卫革命的法律的机关的代表。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的一生，为此就需要有一些方位标。侦查员给了我这个方位标。在刚开始侦讯的时候，我一直对我从事过间谍活动等等的说法进行反驳。他坚持说这是几次间谍旅行，特别是我同诺维克的谈话，我交给他的那些情报都是谍报性质的，等等。我举出论据说我没有罪恶的蓄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间谍。他说，把你那套法学忘掉吧，你是从哪儿得出来的，依第 58-1 条 a 款，控告的构成中需要有犯罪的故意，而依其他各款，特别是关于间谍活动的条款，就不需要有犯罪的故意呢。如果他这样对一个法学的外行人说，那他是不相信的，而我作为一名律师相信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要一个苏联人同间谍谈了话，并向他转交了一些资料，内容丝毫无害的资料，而即使他并不知道此人是间谍，即使没有转送谍报资料的故意，就是说单是他同间谍谈过话这一事实，就足以让这位苏联人成为犯了第 58-1 条所规定的罪行的罪犯。既然如此，我就承认了，(那是在 1949 年 2 月 6-7 日之间的夜里) 我从事过间谍活动，在

这之后一切就进行得很顺利了，既然我已经把这桩最重的罪名——背叛祖国承担起来，其余的一切对我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我就在记录上签字。后来，在我第一次签第206条的时候，以及在我签过之后，我找了军法少将尼古拉耶夫，请他准许我问他一个问题。“说吧”，他讲，“不过这很奇怪，你签过字后方提问题”。在那位侦查员也在场的情况下我问他，根据苏联的法律，犯第58-1条的犯罪构成不需要有犯罪的故意，是不是这样。他回答我说，这是认定那一类罪行的要件之一。我向他表示感谢。在第二阶段侦查开始之后，那已经是过了20个月之后了，我抓住1951年秋才出现的第一次机会，对检察长诺维科夫（案卷里没有这一份记录），对侦查员，后来还对检察长普里霍季科都说了，我不承认从事过间谍活动，我否认1949年承认进行了某种形式的间谍活动的全部口供，我撤回这些口供而不予以确认，我今天对法庭也做同样内容的声明。我受到了误导，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样干的。

（审判）长：可是在1950年2月23日的记录中，你又一次确认你和诺维克相互联系进行间谍活动。

瓦坚贝格：那是2月26日我在第206条上签字之前的事。

（审判）长：你讲一讲你同施洛斯贝格谈过哪些反苏的话？

瓦坚贝格：我只是消极地听。我和她并不熟，我没同她谈过任何反苏性质的话。我记得她曾对我讲过，她到过里加的海滨，在那儿碰上了一些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他们很孤僻，不愿同外界交往。

（审判）长：可是你曾供说（卷19，第110页），她断言在我们苏联实行的是歧视犹太人的政策。她反对禁止同外国人结婚的法律，还讲过一些反苏的笑话。是这样的吗？

瓦坚贝格：后面这两件事情我可以证实。我证实她讲过一个笑话，就只一个，还有她说过她不喜欢禁止同外国人结婚的法律。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

(审判)长：禁止同外国人结婚的法律吗？

瓦坚贝格：是的，我不理解这部法律的意义。

(审判)长：她是反对禁止同外国人结婚及自由出国的法律吗？

瓦坚贝格：是的。这是与这部法律有关的。

(审判)长：怎么着，她是想嫁一个美国人，离开苏联吗？

瓦坚贝格：那正是有 12 位已婚妇女写信想去国外的那个时期。

(审判)长：她说过在苏联实行的是歧视政策吗？

瓦坚贝格：这样的话她没有讲过。根本就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在苏联歧视犹太人的话，仅有少数几次谈及了个别的表现出反犹太人思想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有过的。

(审判)长：那在内容上对苏联的现实进行卑鄙的诽谤的反苏笑话讲过吧？

瓦坚贝格：对。

(审判)长：她讲过，在里加的海滨她结识了一些列宁格勒的大学生，那些学生行为很孤僻，对她讲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件事记录得对吗？

瓦坚贝格：对。她讲过这事。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被吸收参加犹委会的工作的？

瓦坚贝格：1942 年。

(审判)长：那么在这之前由于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被捣毁，你担心自身会毁掉便开始过一种比较封闭式的生活吗？

瓦坚贝格：不是的，这不符合实际。

(审判)长：可这是你讲过的话呀：你担心自身会毁掉，便过着一种封闭式的生活。

瓦坚贝格：整个这一段话是侦查员杜撰的，而且总的说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把我的话拿来，说它具有另一种意义。

(审判)长：爱泼斯坦从莫斯科来时，他对你说过犹委会的任

务吗？

瓦坚贝格：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会给犹委会提出的任务是在国外开展关于苏联的广泛的宣传活动。

(审判)长：难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做过决定吗？

瓦坚贝格：他就是简单地那么一说中央委员会。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是说：“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等等。

(审判)长：他没对你说，在委员会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吗？

瓦坚贝格：没有，他没说过这种话，也不可能说这种话，这出于下面两种考虑：第一，在这些人的圈子里，“民族主义者”这个词被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词，人人避之犹恐不及。如果说谁是“民族主义者”，那听起来就是一种侮辱，会被要求举出证据的，还会提交声明，等等。所以他不可能对我说在委员会里可以干民族主义的工作，尤其是不可能说在它的合法渠道的掩护下干什么非法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跟我说这种事，那我一定会领他去看医生或是把他送到安全机关去，不过我多半会领他去看医生的，因为我还没见过他是这么一种样子的。

(审判)长：他让你担任什么职务？

瓦坚贝格：参事。

在这个职位上我作为在编人员干了大约5~6周，后来我就生了病，被送进了医院。我回来之后恢复了同委员会的关系，不过已经是编外人员了，再往后就彻底和他们脱离了。这样，我担任这个在编的职务可能有5或6周的时间，就是从6月初到7月上旬这段时间……

(审判)长：后来你干什么了，你同犹委员的联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瓦坚贝格：我在开始供述时就说了，我了解那一时期发往国外

的材料的性质，也知道这些材料究竟发到哪里去了。我是怎么了解到材料的性质的呢？并不是他们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修改润色了，而是这么回事：大部分材料要用电报发出。为此就必须把材料译成英文。那儿惟一的一位译员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由她来翻译，爱泼斯坦进行审查。爱泼斯坦英语方面的学识有限，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担心她可能弄出什么错误来，译文必须要由另外一个什么人过目。这种事在莫斯科组织得非常好。那里不仅有很好的专门的翻译人员，还有审查编辑部对俄文原文和英文译文进行校订，然后再由翻译处处长审阅，只有经过这些道手续，由翻译处处长签署之后文章才能发出。审查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在古比雪夫一开始这些都没有。材料由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翻译，爱泼斯坦审看，她很不安，觉得担心。于是我不是作为公事，而是出于友情承担起亲自审阅这些译文的任务。这么一来，我在最开初的阶段就了解了这些往外寄的材料。在这之后有一段时间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总算争取到了由一个人来专门审看这些译文，这项工作派给了鲍罗廷，此人当时被洛佐夫斯基任命为在古比雪夫的苏联情报局和犹委会的主编或者是书刊检查长。他阅读所有的文章还审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译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里组织起来了名为翻译处的机构，一个姓安德列耶夫的人当上了该处的头头，此人是由谢尔巴科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这是他 1949 年 5 月亲口对我讲的。有些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是在 5 月份。事有凑巧，在列福尔托沃他竟和我关在了一个囚室里，他是马其顿族人，他还被指控犯有马其顿民族主义的罪行，因季米特洛夫亲自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要求，他于 1945 年底去了保加利亚，得到了出境的准许。在那里他在外交部担任很高的职务。1949 年 4 月他在保加利亚被安全机关逮捕，被送交苏联的安全机关，在 5 月份的头几天到达，碰巧他竟和我俩一块在一间囚室里蹲了 5 个月。我和他都向侦查员报告过

我们俩认识，但是因为我们这两件案子互不相干，也就不了了之。

(审判)长：他是间谍吗？

瓦坚贝格：他的案情我不了解。就这样在一个半至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了解了犹委会的材料性质，我必须说，在那个时期里材料中虽然对犹太人有某些言过其实的地方，这也是爱泼斯坦的作风所固有的，但是民族主义的东西那个时期还没有。当然也可能有这种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出来。这些夸大的言词使我的感情受到了侮辱，但我当时并没有发现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也知道材料寄给了哪些组织和刊物，这些我是从同爱泼斯坦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他和我谈过他的一些想法。我知道文章是发给资产阶级保守的、反动的、甚至是宗教的报刊，直至极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犹太通讯社的。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我是这么考虑的，在宣传机构建立的同时，党和政府就给这个宣传机构提出了把关于苏联的真实消息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的任务，首先是传送给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其次还有其余的人……

(审判)长：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往哪些地方都寄了些什么？

瓦坚贝格：在侦讯时宣读过，鉴定的结论也说了，材料不是寄给代表一定阶级的刊物去，等等。我说，我认为给这些刊物寄的想法是对的。这些问题爱泼斯坦同尤泽福维奇和洛佐夫斯基都商量过。我无法理解尤泽福维奇的态度，他一方面对爱泼斯坦评价甚高，另一方面又说爱泼斯坦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犹太人问题上能提出些什么样的建议，爱泼斯坦都办理些什么样的犹太人问题？他为什么学习犹太圣法经传？

爱泼斯坦办理的是苏联的宣传问题，并就这件事同尤泽福维奇和洛佐夫斯基商讨过。

(审判)长：爱泼斯坦做的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吧？

瓦坚贝格：我在这一时期没有看出什么民族主义来，可是后来我看出这些材料里边民族主义的东西很多。这一点我以后再说。

(审判)长：现在来说委员会本身的人员配备。你以前说爱泼斯坦、洛佐夫斯基在委员会里是基干，在委员会的四周围了一大圈民族主义者，例如贝格尔森，克维特科，费费尔，作为洛佐夫斯基的代理人的尤泽福维奇这样一些人。可是现在你却说当时你没看出有民族主义的东西。

瓦坚贝格：使用这样一种说法的口供我不能加以确认。我要说，我不能设想在那个时候有什么人希望组织一个什么民族主义中心并开展民族主义的宣传。这个委员会后来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这是事实。这个委员会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工作——这也是事实，可是要说在组织这个委员会之初哪个人就有什么样的犯罪的企图，这我过去没有看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过在被邀请参加犹太委会的人当中是有民族主义者的。

(审判)长：举例说呢？

瓦坚贝格：贝格尔森，霍夫斯坦——甚至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

(审判)长：克维特科，马尔基什。

瓦坚贝格：我已经把马尔基什认定为民族主义者了。同克维特科我见过面，但是我对他的创作了解得很少，因此我无法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奥尔兰德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塔尔米呢？

瓦坚贝格：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我现在说的是犹太作家。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今天我都不认为塔尔米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战时他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发作——这都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情形我也有过。

(审判)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表现在哪些方面？

瓦坚贝格：这是很难觉察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震撼，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感受。在这样的时期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飘浮在空气中。在这场战争中，比如说，就有民族主义的细菌飘浮在某一部分犹太人中间。

(审判)长：你对此做何解释呢？

瓦坚贝格：这首先是由于希特勒实行了一种残忍狠毒的政策，这种政策让很多人又记起来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关于这一点爱伦堡说过，希特勒让他又想起来他母亲的名字叫哈纳。

(审判)长：可是在苏联并没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基础，为什么还有这种情绪呢？

瓦坚贝格：如果说在我国这也有所表现的话，那它是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我认为犹委会领导人——首先是共产党员的——的一个很大的罪过，就在于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同犹太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斗争。

如果说在我们苏联某一部分人群中间发生了一些民族主义情绪，那我们很容易处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我认为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解决好反犹太主义的表现和铲除犹太民族主义的土壤。

(审判)长：你和塔尔米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发作是些什么情况呢？

瓦坚贝格：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也许它什么也说明不了，也许能说明点什么。那是1943~1944年，很可能是1943年的事。我得了病，而医生们不能确珍。他们建议请包特金医院神经病科主任贝霍夫斯卡娅来。这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她来给我看病的那一天，正好赶上政府公布给科学、艺术等等工作者分别颁发斯大林奖金的决定。细看获奖者的名单，她发现在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人员当中有28%或是30%的人是姓犹太人的姓氏。而在这之前5

分钟她对我讲，当天或者也许是前一天她和莉娜·所罗门诺夫娜·什泰恩走在高尔基大街上的时候，什泰恩对她讲在医学杂志编辑部所有的犹太编辑人员都被解职了。贝霍夫斯卡娅说，什泰恩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两眼流着泪水。

(审判) 长：这是 1943 年的事吗？

瓦坚贝格：是 1943 年底或是 1944 年初。我当时对贝霍夫斯卡娅说：“……几分钟前你还给我讲反犹太主义的表现，可是现在又兴高采烈地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中有约 30% 的犹太人。这些人当中有工程师，科学家，机械专家，设计师，等等。怎么谈得上反犹太主义呢？”

(审判) 长：就是说贝霍夫斯卡娅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思想，那么你呢？

瓦坚贝格：那天晚上塔尔米来我这儿，说（和通常的情形一样，我和他俩先交换看法，然后坐下来下棋）“我今天看到了获奖者的名单，我计算了一下，其中约 30% 是犹太人”。这种统计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必须说，这种情形我也是有的。这就是民族主义复发的一种现象。确实，这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民族主义的细菌终归是有的。

(审判) 长：在你和塔尔米的身上？

瓦坚贝格：是的，我身上有，塔尔米的身上也有。

(审判) 长：这样，这种细菌一直到最近都存在？

瓦坚贝格：最近我远远地离开了这些。

(审判) 长：也许它没有在外部的表现出来，但在内心里是存在的？

瓦坚贝格：我对此很难做出客观的评判。也许它在内心的什么地方还存在。我只能确有把握地说，我在这儿的牢狱中已经把它彻底地铲除掉了。

(审判)长：如果你身上存在有这种细菌，你为什么不把在委员会最初一个时期的工作认定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呢？因为那个时候马尔基什、克维特科、贝格尔森、霍夫斯坦——如你所说的一帮民族主义者——都进入了委员会，那就意味着文章的性质、工作的方针，一切都应当带上民族主义的倾向的？

瓦坚贝格：我开始时没有看到犹委会工作中有这种情形，不过后来就开始有所发现。

(审判)长：难道说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这一事实本身不是就给民族主义的发展鼓了劲了吗？

瓦坚贝格：不，决不会的。

(审判)长：你供说在委员会里汇集了民族主义者贝格尔森、霍夫斯坦、马尔基什等等这样一帮人并非事出偶然，这是真实的吗？

瓦坚贝格：当然不是偶然的，没有其他的作家。

(审判)长：难道委员会只可以吸收作家参加吗？

瓦坚贝格：为了写文章需要有作家。

(审判)长：可以吸收作家参加工作，但可以不要他们加入委员会。

瓦坚贝格：我要说，我认为犹委会工作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组织主席团。

(审判)长：在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立即就有了《埃尼凯特》报吗？

瓦坚贝格：是的，这份报纸产生在最初那个时期，可是在什么时候我记不得了。

(审判)长：从案卷材料可以看出来，《埃尼凯特》报进行的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活动。

瓦坚贝格：是的，报纸上有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

№ 1172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瓦坚贝格和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1日)

接下来法庭审理进入下一个问题：评价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给外国的出版社、报章和杂志的材料所做的鉴定。

瓦坚贝格：……当然，如果把“1945年的目录”作为一份材料附在这上面的话，那就很难断定材料的性质了。这里提到了米哈伊洛夫的书，那本书我也读过。我要顺便说一下，米哈伊洛夫是一位很好的地理学家，除开这本书，他还写了16篇讲16个共和国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他既使用了这本书里的那些材料，又采用了一些分别讲述每一个共和国的补充材料，说到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些什么资源，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情形怎样。而且为了让外国的侦察人员比较容易了解这些资料，还把这些文章登载在莫斯科出版的供国外阅读的《莫斯科新闻》报上。

我在这儿读了两本费斯曼院士的书，那里边也有很多材料如果用“1945年的目录”加以衡量，也是会符合于其中的很多条目的。

我读过一本1951年出版的书名叫《莫斯科人》的书。这本书很厚，讲述的是先进生产者。书中展示了几十家大工厂：发电厂，“镰刀和锤子”工厂，还有其他好多工厂，而且书中甚至描述了这些工厂的生产过程，以及先进生产者如何改变这些过程，使之更加完善。

为调查泄露国家机密问题，鉴定人员所分析的那种材料不仅仅是犹委会寄了，苏联情报局和其他的委员会也寄过这类材料，同样性质的材料在这些书里边也有，但这都不被认为是泄露机密。也许像《有色金属》这篇文章、巴赫穆茨基的报告这些东西是有害的——这些事当然是不应该做的，但是从大体上说委员会的材料如果说在这方面很具体的话，那这种具体的写法也不带有谍报的性质……

(审判)长：你怎么的，是不是不同意关于向美国传送间谍情报的鉴定书的结论呀？

瓦坚贝格：既然有这样一部法律，那我是同意的。

我认为，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鉴定书是一份很好的、很郑重的文件，是一份正确的文件，可是于违犯国家机密问题所做的概括和结论我不同意。

(审判)长：你不同意？可是你刚刚还说你同意的。

瓦坚贝格：我同意说这违犯了国家的机密，但是不同意鉴定人员说犹委会的领导人意图做什么什么事情，并在这种伪装下寄发谍报材料这种结论。我认为没有人问他们这种事。

(审判)长：问谁？

瓦坚贝格：鉴定人员。第二点。他们没有充足的材料做这样的结论，因此也就没有人问他们这个问题。给鉴定人员提出的与三组文件有关的惟一一个问题是公布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那些材料，应用“1945年目录”衡量是不是违犯了国家机密法？

(审判)长：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包含有国家的机密？

瓦坚贝格：是的，他们应当回答——是或不是。此外再没有向他们提任何问题，可他们却对工作表现出一种浮皮潦草的态度，比如说，甚至把加拿大的城市搬到了美国。哈恩就民族说是英国人，同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把他和委员会的活动混到了一块，

最终做出了委员会的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的结论。更有甚者，他们竟下结论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国时违反苏联的法律，答应负责向美国交送谍报性质的资料。

第一，没有人问他们这个。我不是刑事诉讼专家，但是我觉得鉴定专家没有权力超越范围，而如果去回答一个问题，就必须用某种办法找出根据……

……我说过了，我同意他们的结论是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说（鉴定组）引证法律做出了回答。既然规定了宣扬某种某种资料是违犯关于国家机密法律的，那么就应该对此进行惩治，因为这是犯罪。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因此我在本质上同意委员会的论断，但不是同意它的所有结论，而只是在本质上说。

（审判）长：对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国外之行你了解些什么，他们在那边领受了什么任务？

瓦坚贝格：他们领受了什么任务，这我没有办法说。我和费费尔从来不是朋友，但也未相互为敌，我和他俩关系正常。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在委员会的大楼里碰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告诉她他带来了许多人对她和我的问候。她回到家里，说让我跟费费尔谈一谈，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到他家里去。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费费尔的家里（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去费费尔的家里）。我们在他家坐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有近两个小时，他详细讲了在美国和人会见的情形，会见过哪些人，都谈了些什么，等等，讲了同魏茨曼的会见（由于时间过了很久他也许忘了，但他对我说是魏茨曼在宾馆接见他们的，可是在这儿他说是在饭店里。这当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关于同魏茨曼的谈话他讲的和在这儿说的一样。关于同罗森贝格的交谈他讲的和他在这儿说的也差不多。

（审判）长：你说过，罗森贝格在同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谈话时，提出了一个很久以来一直牵动着犹太民众的心的问题，就是在

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并且要求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苏联推动这个问题。

瓦坚贝格：他不可能这样要求。我想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不大会让他挂心，克里木总的说来令他们感兴趣是因为“卓因特”往那个地方投放了很多钱，他们感到在这件事情上丢了面子，因为苏联政府甚至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姿态——把一部分钱还给了他们。

费费尔曾经告诉过我，罗森贝格问过他克里木的事情怎么样，并且声称，如果重新开始移民，“卓因特”准备还为这件事提供援助，但是他没有说黑海、土耳其和巴尔干。我在这儿接受侦讯的过程中坚信，同罗森贝格的谈话并不是像起诉书中费费尔第一次口供中所记述的那种情形，尽管费费尔在他的口供中说，罗森贝格确实说过克里木这就是黑海，是土耳其，是巴尔干。

也许费费尔在同我谈话的时候改变了罗森贝格讲的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我，在说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罗森贝格说加利福尼亚在很多方面都不如克里木，因为克里木这就是黑海，如果仔细看，甚至连土耳其都看得见。这种说法我认为是玩笑话。如果这种谈话是认真的，那费费尔是一定会把这告诉我的。不错，我和费费尔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特别友好的，不过他还是应该告诉的。他跟我讲了同布季什、诺维克、恩施泰因、查尔斯·卓别麟的谈话，他讲了关于“卓因特”提供援助的谈话，如果关于克里木的这段谈话不是玩笑性的，他是会说明这一点的。这段谈话的内在逻辑性只能让人感到疑惑。如果再加上这次谈话是在领事馆的译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话没有讲过。假如说这种话确实是在译员在场的情况下，以一种很郑重的形式讲出来的，那么译员定会把这个事报告给谁就报告给谁的，特别是罗森贝格若是说到美国政府的援助的话。我非常熟悉罗森贝格这个名字。罗森贝格是一个同美国金融界的高层人士有联系的机敏的律师，老奸巨猾的政

客。

从苏联来了两个人。罗森贝格非常清楚，如果是从苏联派来的人，那么这些人必定是共产党员，甚至比这还厉害——是间谍。罗森贝格本人对犹太文学从来都没有兴趣，也不懂犹太语，突然来了两个人，他就把这么重大的事情讲给他们，把这么重要的底牌亮了出来。这哪有什么逻辑性？

(审判)长：如你所供，逻辑提示我们，他们从美国回来之后委员会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按美国的指挥棒行事、执行美国的任务的组织，后来就提出了克里木的问题。

瓦坚贝格：这个说法不是我提的。“指挥棒”这个词不是我用的。但是说委员会是按照这些美国顾主的要求或请求干这些事情的，这难以置信。布季什、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可不是罗森贝格。

(审判)长：你接下来供说，爱泼斯坦也讲过，战争为解决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创造了条件，于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便按洛佐夫斯基的布置写成了这么一份呈文。

瓦坚贝格：这是从洛佐夫斯基的口供中摘取出来的。关于侦讯记录的说法和内容我只有一句话可说，我对此不负责任。

(审判)长：可是这都是你做的供述？

瓦坚贝格：是的，我供述了，但是我现在要说我是怎样供述这些的。

(审判)长：关于克里木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和从什么人那里知道的？

瓦坚贝格：从爱泼斯坦那里知道的。有一天我到委员会去了，爱泼斯坦面带笑容地对我说，他和米霍埃尔斯及费费尔去见了维·米·莫洛托夫，他们提出了克里木问题，据他说莫洛托夫仿佛告诉他们得写一份这方面的呈文。这样一种答复，如爱泼斯坦所说，就暗示着莫洛托夫并不反对此事。因此爱泼斯坦说目前正在“分配部

长职位”，已经建议由他担任这个犹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这当然是个笑话，我没把这当一回事，因为说的都是玩笑话。然后爱泼斯坦告诉我，要起草一份关于克里木的呈文。我还想说这么一件事，在我和爱泼斯坦乘坐一节车厢从莫斯科向外疏散时，他提起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共和国的问题。我回答他说，已经有犹太人自治州了，让愿意迁居的人尽可能地迁过去就是了。总之，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案都是痴迷于想入非非的计划的一种行为。

(审判)长：那么下边这样一些事实该如何看待：派遣犹太人状况考察组，如克维特科去克里木，派某人去乌克兰，向政府提出什么地方欺压犹太人的问题，邮包问题等等？照你看这算什么？

瓦坚贝格：依我说，这应该分别看待。克维特科为了以后给外国报刊写特写，作为委员会的记者到克里木去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在他回来之后，他们发出一片喧嚣，并且闹到了农业人民委员部去——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而且也不属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我一贯认为委员会寄发材料外，不应该做任何其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宣传机关。我是反对成立主席团的。可是在我对爱泼斯坦讲出这种看法时，他却对我说：“怎么着，你比中央委员会还有头脑？”他总是往中央委员会身上推。按照我的解释任何其他的工作都不属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的过程中，瓦坚贝格在讲同霍夫斯坦的关系时曾说过，霍夫斯坦反对同化犹太人，从他的这些谈话里可以领会到他为不是生活在巴勒斯坦而感到遗憾。法庭对瓦坚贝格的这一口供进行更加确切的调查。

瓦坚贝格：我确证这一点。这是确实的。

(审判)长：可是你曾供说，在你和霍夫斯坦之间有过这样的交谈是完全可能的。霍夫斯坦了解你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他才毫无拘束地同你谈这些话题。

瓦坚贝格：这不是我回答时说的话，而是侦查员的创作，不过我没有同他争论，在记录上面签了字。

(审判)长：可是你说过，1942~1943年他和你有过民族主义内容的交谈？

瓦坚贝格：他去过古比雪夫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我们交谈了10来分钟。总的说来我和他从来没有有什么深交。

(审判)长：那就更不对了。你们彼此并没有深交，可是在1942~1943年他却突然和你谈民族主义的话题，并且表露他对不是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遗憾。

瓦坚贝格：他并没有直接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却得出了他怀念巴勒斯坦这样一种印象。

(审判)长：既然一个人嘴上讲的心里想的都是巴勒斯坦而不是自己的祖国，那么这就是一次鲜明的反苏谈话。你也说了，他和你这样交谈是因为他相信你，还因为你本人在情绪上也是民族主义的。

瓦坚贝格：他为什么相信我，我不知道。

(审判)长：这可是1952年的审讯记录，昨天你曾声明说，1952年经你签字的所有记录都是真实的。

瓦坚贝格：我说过，我不承认我在1949~1950年间所做的一切关于间谍活动问题的供述，而1952年我只是尽力去把已经写在老的记录里边的那些东西性质减轻一些。然而在那里边也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东西。

(审判)长：这是1952年2月11日最近的一次审问你的记录。这关系到关于间谍活动的录供。你在这里边说，存在着一个广泛的间谍网，这些人到处奔波，搜集情报。

瓦坚贝格：是这样，但不是间谍情报。有一个记者网，他们搜集情报，然而可不是间谍情报。

(审判)长：不过显然是令外国的侦察机关感兴趣的那种情报。你先前正是这么说的。

瓦坚贝格：我无法否认这些情报有可能成为侦察机关的掌中之物，但是那里边有没有间谍情报，这还是个问题。

(审判)长：你同“黑皮书”的出版有什么关系？

瓦坚贝格：没有任何关系。

(审判)长：你了解对这本书所做鉴定的结论吗？

瓦坚贝格：我已经做过供述，为什么我认为鉴定的结论是正确的。虽然我不了解此书的内容，和它的出版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了解了这一伙人——委员会的成员和几位鉴定结论中点了名的作家，这就可以说那里边有民族主义的言论。

(审判)长：你曾供说（卷20，案卷页279）“……我了解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切根据对鉴定专家们的结论表示赞同”。

瓦坚贝格：这一点我确认。

(审判)长：检察长普里霍季科1952年3月6日审问过你吗？

瓦坚贝格：是的。

(审判)长：你还是声称你部分地承认（卷20，案卷页288）自己犯有散布民族主义思想的罪行……

瓦坚贝格：一切民族主义思想都是与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审判)长：你重说一遍，你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

瓦坚贝格：我曾经有过一种看法，这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就是尽管苏联和美国的犹太人的思想意识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之间依然有某些共同之点，具体说就是犹太语言和先进的文化遗产。苏美两国的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共同性是建立在语言的共同性之上的。

这一点我现在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鉴定书中所有这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结论，都是正确的。

(审判)长：你认为自己的这些供述都是真实的吗？可是接下来给你提了一个问题：“你 1933 年到苏联来负有敌方布置的什么任务？”

瓦坚贝格：我已经解释过了，我没有去注意问话。当问我：我来苏联负有敌方布置的什么任务时，我没有注意这句问话，就回答说阿尔马佐夫交待我办这个办那个。

(审判)长：你当时就该声明，你没有承担任何敌方的任务。检察长可是对你直截了当这样问的。

瓦坚贝格：记录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时候，就冒出来了“敌方布置的”这个词，而我又不能变更提问。

(审判)长：可答话你是可以变更的。你本该写上没有承担任何敌方布置的任务。

瓦坚贝格：这是惟一一份经我亲手改过几个词的记录……

(审判)长：在两个页面上都有你改动过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有把这句话改过来呢？

瓦坚贝格：我只有得到侦查员的准许才能写进补充的东西……

(审判)长：可是从答话里边得出的结论就是你到苏联来是负有间谍任务的？

瓦坚贝格：你会发现那里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比罗比詹‘伊科尔’的小组搜集了间谍情报吗？你是这样说吗？”后面我的回答是：“这一点我不否认，确实小组搜集过情报”。在记录里就成了我不否认小组搜集过间谍情报。既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就无法否认。可是侦查员却说：我没问你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这事的，是在侦讯时还是在侦讯之前。这就是做记录的技巧。

(审判)长：最后是这份 1952 年 3 月 8 日的最近的一次审讯记录。根据第 58-10 条第 2 节向你提出了追加控告。

瓦坚贝格：一开始那里写的是第 1 节。

(审判)长：对你的指控由第1节改成了第2节，这是因为罪行是在战时犯下的。

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卷20,案卷页32),你说：“我承认自己有罪”。

瓦坚贝格：这是部分地承认，因为问题是与民族主义有关的。

(审判)长：就是说你承认自己犯有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罪行？

瓦坚贝格：我承认我援引的那篇文章里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我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是有罪的。

(审判)长：你还在其他什么事情上有民族主义的活动呢？

瓦坚贝格：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自己有什么民族主义的行为。

(审判)长：你还有什么要对法庭声明的？

瓦坚贝格：我基本上都说了。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我只稍稍说几句。

我想直接而确切地驳斥起诉书中所指出的各点。第3页上说，我，还有其他人，早在犹委会成立之前很久，就曾不止一次地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发起突然的攻击。我断然声明，无论是在委员会成立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我都从来没有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进行过突然的攻击。相反，所有这些年，也就是说差不多30来年，我一直在我生活和为苏联谋利益而忠诚地工作的那些国家里，执行旨在巩固同苏联的友谊的政策。我在这儿已经讲过了，我在美国——在苏美贸易公司和在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12~13年间，在两个世界相接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期间，是不遗余力地从总体上维护苏联的利益，并对苏联的利益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得到保护、免受损害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断然否认从前什么时候我曾执行过与党和苏联政府为敌的政策。

起诉书接着说，在临近犹委会成立的那个时候我，还有其他

人，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备一有机会就加紧进行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工作。我声明，我不仅没有准备加紧进行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工作，而且相反，准备继续做有益的工作。我昨天供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期望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确实渴求一有机会就加紧进行破坏工作的话，那么在犹委会成立之后，也就是有了一个广阔的活动天地之后，我一定会对这个机会加以利用的。可是已经得到证明的，是过了最初的几个月之后，我竟然放弃这个我热切“盼望”的机会，转而去干别的工作。这里边哪有什么逻辑性？侦查机关怎么能解释得清楚，为什么我1942年在古比雪夫的时候避开了这个赐给我进行破坏工作的机会，而开始做另外一种——有益的工作呢。如果我想干破坏工作的话，我或者是在1933年来到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前还在纽约，在苏美贸易公司这个关键部门工作的时候就干了。如果我想进行破坏工作，我可以在那边做，而不必到苏联来，为了比罗比詹而通过“犹太会”搞间谍活动。我在全苏木材出口联合公司工作了8年，在数十年的时间一直力求过老老实实的生活，为苏联的利益忠诚地工作。对控告的各点我就不一一都讲了，不过第26页开头有一点我却必须说一说，那个地方说“被告人塔尔米、瓦坚贝格、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1946年向诺维克转交了关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以及关于苏联的犹太人的状况的间谍情报，对此一问题从反苏的立场上进行了阐述”。塔尔米在供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至少他本人没有做这种事。而我说无论是我，还是塔尔米或是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们三个人，谁也没向诺维克转交过任何关于我国经济形势的间谍情报或是什么其他的间谍情报，也没有从反苏的立场出发阐述过任何问题。起诉书中其余的一些论点情形也是这样。为了不一一地去细讲控告的所有各点，我做一总体的声明：对于起诉书断言我据说是在委员会存在的某一个时期仿佛进行过敌对的

活动，这是不对的，它不能为收入这42册案卷中的材料所证实。我承认自己有罪的惟一的一点，我已经对法庭讲过了。我还说过在我供述的一开始，我承认了我了解委员会在最初的时期寄出的文章的性质，后来在供述的过程中我解释过我不认为委员会把自己的材料寄过去的那些地址是不合适的，在委员会成立的初期我没发现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样，我认为对我提出的各项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实的，惟一的例外是那篇文章，按照我的看法，那也只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不是罪行，它可能源于某一个短暂的复发。我再一次声明，我没有民族主义的意图，从1924年一直到今天，也许只有这次细菌作怪除外，它出现在战时，后来很快就被消灭了。

(审判)长：出现在你身上？

瓦坚贝格：是的，在我身上。由于我还被控告犯有第58-2条规定的罪行，当然很希望就所控告的3个基本点，也就是克里木问题、民族主义活动和泄露国家机密进行一次总体的陈述。我现在不讲了，也许以后我在体力上还会有能力，我可以获得你的准许后，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以后对自己的口供进行补充。也许我还要行使一下这一项权利。

(审判)长：其他被告有什么问题问被告瓦坚贝格？

给瓦坚贝格提的问题不多。

这些问题表明瓦坚贝格只同塔尔米关系比较密切，而与相当多的一部分被告只是点头之交。瓦坚贝格没有同他们会过面，交谈过。

费费尔：请你说一下，在你居留美国期间戈尔德贝格什么时候反对过苏联吗？

瓦坚贝格：公开地从来没有反对过。

费费尔：苏联的犹太文学是否影响过，这儿就有好几位犹太文

学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它是否对美国的劳动者和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瓦坚贝格：我对此应给以肯定的回答。我要证实美国有一批作家、诗人、短篇小说家、特写作家是在苏联犹太文学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法的。苏联的犹太作家的作品也对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印象和影响，应该说，在那里阅读这些作品的兴趣很浓。

费费尔：你和柴卡·谢苗诺夫娜到我家里去的那次，从我和你们的谈话中你感觉到了我在美国人面前的那种兴奋，或是我给你们讲过反动的犹太报刊对我们进行的抵制，还有是怎样不得不去克服这些困难并同他们进斗争的。

瓦坚贝格：你讲了你们不得不去克服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特别是在《前进》报社那次，还讲到几个试图破坏你们的工作的犹太资产阶级作家。

费费尔：你在《埃尼凯特》报上读过我的文章吗？

瓦坚贝格：总体上说读过。

费费尔：那篇反对战争贩子、反对美国的犹太人反动分子的讲以色列国的文章你读过吗？

瓦坚贝格：是的，读过……

……有过一篇或者是讲以色列国或者是讲我们对以色列国犹太人的态度的文章，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其中有一个不正确的提法，文章里有些民族主义的东西。总的说来你写的那些文章是正确的。

在被告们提完了对瓦坚贝格的问题之后，对瓦坚贝格的审讯于6月11日12时15分结束。

休庭两个小时之后，审判庭开始审讯他的妻子柴·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现在你向法庭供述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在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期间，翻译了一些根据鉴定确认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自己有部分罪过。我作为一名译员在多大程度上负有责任，这我不知道，法庭将做判定。在所指出的泄漏了军事机密的文章和材料的目录单中，除一篇我已记不得标题的关于比罗比詹的文章外，我找不出我翻译的文章。

(审判)长：那篇文章是什么标题？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记不得了。

(审判)长：那是谁写的文章？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也记不得了。没有我翻译的文章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反法西斯委员会寄发的文章大部分都是用犹太语寄给犹太人报刊的，所以没有必要翻译。有一个时期材料是用电报寄发的，那时就要译成英语。另外，供反法西斯委员会用的材料不是由我一个人翻译的，苏联情报局里还有其他的译员。

(审判)长：在委员会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委员会里按编制说我是惟的一个译员，但是我没有在委员会里工作，不在委员会上班。要翻译的文章我是在苏联情报局拿的。我还想说，在我的记录里讲到的关于拉沃奇金和萨尔茨曼的文章没有被作为泄漏国家机密的文章列入目录单。侦讯的时候我一直说那里边没有任何泄漏国家机密的東西。我还要指出，所有的文章都是要经过苏联的书刊检查机关审查的。

(审判)长：经哪个书刊检查机关审查？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苏联情报局下设的苏联书刊检查机关，1946年在几个反法西斯委员会之下组织起翻译处之后，

材料就又由审查编辑部审阅了，审阅之后送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书刊检查处。

(审判)长：在这方面你承认自己有什么罪？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就是我翻译了这些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材料。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审判)长：你否认你翻译的那些文章里有间谍情报，但是却有过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是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否认控告提出的我按照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的指示翻译过间谍材料，我同戴维斯和诺维克有间谍性质的联系，以及我是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你是什么时候迁居国外的？你是1901年生于一个犹太教堂职员之家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不是的。我父亲是犹太教徒的屠宰手。侦查员怎么也弄不明白什么是犹太教徒的屠宰手，还问过另外一位侦查员，可还是写上了我的父亲是犹太教堂的职员。屠宰手是屠宰场宰杀牲畜的人。我出生在父亲于兹韦尼哥罗德市去世几个月之后。父亲去世后留下了我们7个孩子，我们住在爷爷家中靠他来扶养。妈妈把两个大些的男孩，一个15岁，一个11岁，留在兹韦尼哥罗德，带上5个小些的孩子来到沃伦省罗加乔夫镇爷爷的家里，我们在那儿一直居住到1914年去美国。

(审判)长：屠宰手是教徒。犹太人买的都是屠宰手宰杀的牲畜的肉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的，这叫洁净的肉。

(审判)长：在宰杀牲畜时是要做祈祷的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的，一定要祈祷……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一家革命前移居美国。

在那里她在几家社会组织里作事务性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在犹太工人协会工作。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犹太工人协会是一个从事工人寿保险活动的组织，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它同时还在工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化教育工作。

（审判）长：这就是利普斯基领导的那个组织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利普斯基领导的那个组织是我在1916年工作过的那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审判）长：后来你就转到犹太艺术剧院去工作了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在犹太工人协会工作的时候，在业余时间学会了俄文和犹太文打字。我学会打字之后就开始从犹太艺术剧院拿点活儿业余干，我给剧院打剧本和分角色的台词。

我在犹太工人协会工作到1921年初。1921年我生了病，因病离开了那里。我一直病了好几个月（我的手臂骨折），到1921年末我到犹太通讯社去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就懂犹太语，而且还会用犹太文打字机，而犹太文打字员照常言的说法是“少得可怜”。犹太通讯社是一家私人企业，它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苏联，都有自己的记者，他们向美国发回阐述其他国家：苏联，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的材料。犹太通讯社把这些材料在犹太文的和英文－犹太文的报刊上传播……

……起诉书中说，我在居留美国期间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

我不明白这种论断，但是我觉得这指的是政治上的参与，可是我干的是事务性工作，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我整天工作，晚上学习，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懂这种论断。如果说我干的这种打字员的工作可以被认为是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的

话，——那我根本无法理解。我从来没有参加任何民族主义的组织
……

1922年我嫁给了瓦坚贝格。当时瓦坚贝格是波阿列伊锡安分子。我嫁给他当然并不是出于政治信念的原因。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关于他自己的情况瓦坚贝格已经说了，他1924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通过瓦坚贝格我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这是一些与我此前交往的人完全不同的人。在这之前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些大学生，而现在我认识了爱泼斯坦，诺维克，亚历山大·比捷尔曼，苏特，杰龙，塔尔米，布季什。不错，布季什以前我也认识，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在1921年就曾在—起工作。这一批共产党员朋友以及我开始阅读共产党报刊这一情况，对我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为《工人日报》和《自由晨报》组织读者。那时常组织群众大会和游行，我就散发传单，发送这些大会的门票。

我记得共产党组织反对法院判决处死萨柯和范齐蒂的示威游行的时候，我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散发过那些传单，我们募捐帮助萨柯和范齐蒂。确实，我从未参加过党，但我属于被称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那一类人。

1926年瓦坚贝格被选为出席“犹土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我和他一起来过苏联。这是我离开俄罗斯12年后第一次来苏联。我去了我的故乡，还到过克里木，我是和瓦坚贝格一起到那里去的
……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对她在30年代初返回苏联做了下面这样的解释。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那几年在美国正是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千百万人失业，而我看到在苏联这里根本没有必要对明天感到担忧害怕。于是我便产生了到这里定居的愿望并且决定下来。

我怀着这种愿望和决心回到了美国。我使劲劝说丈夫，他勉强地开始办这件事。他是个党员，很积极，他觉得他在苏美贸易公司干的是好事，而我却越来越向往苏联。那个时候美国知识分子中间进步的人士都特别向往迁到苏联来。

我记得我是多么羡慕 1932 年离开那儿回来定居的塔尔米。1932 年我被解雇之后，我的愿望变得特别强烈起来。1931~1932 年我丈夫再一次被派到苏联来出差。在这儿他谈了调他到这边来的问题。这让我高兴得要命。那次是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谈的。1933 年他得知邀请他去苏联工作，并提供住宅，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1933 年 4 月 16 日我们离开美国，来到了这里。

起诉书中说，我到达这里之后，同居留在此的美国人建立起联系，造谣诽谤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我否认起诉书的这一部分内容。我从来没有捏造谣言诽谤过党中央和政府的官员。最初几年里我的朋友有塔尔米、纳格勒一家、爱泼斯坦、拉什克斯，有时候我和库什尼罗维奇一家有些往来。

我记得 1934 年我在街上碰到了菲舍尔，我知道他很会讲演，总是做一些关于苏联的讲座，他邀请我到他家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菲舍尔，我不把这次见面看成是犯罪也不认为这就说明我坏。

我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1933 年去了科技协会。科技协会就是科学工作者之家属下的全苏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我做这份工作是由纳格勒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推荐的，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我做过前面我已经说过的那份工作而认识我的。我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被派到外事室去担任秘书。这个机构大约有 12 名工作人员。根本没有什么外事活动，但是外国专家和俄国专家之间有些联系工作要做。这叫做交换意见，交流经验……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讲她在苏联情报局作译

员的工作时，做了如下的供述。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记得很清楚，在最近几年送到翻译处的材料 90% 都是斯拉夫人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的，而犹太人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平均一个月只送 8~10 篇文章翻译，因为他们开始把给犹太报刊的材料用犹太文寄发了。根据登记簿可以很容易地就查对出来我说的是实话。只需要把翻译处最近几年的登记簿拿来看一下。而且在那儿工作的还有一名女译员。工作程序我觉得是很好的，有 4 个人签字。翻译完了之后，材料又转给懂得材料所译语言的编辑（这是审查的第五个阶段），然后由审查编辑

从苏联情报局分出来以后，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成立了一个审查编辑部。

（审判）长：奥斯特洛夫卡娅断言由于你们开始寄发犹太语的文章，翻译文章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了，她说的对吗？

费费尔：在我们用电报发寄材料的时候，把文章译成英文是有必要的。可是最后那段时期不再给我们外汇去用电报发稿了，于是只好利用通过其他渠道寄发文章的办法，但是在技术上这是怎么办理的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承认过你给美国人供应过间谍情报？

费费尔：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我根本没有讲过寄送间谍情报的话，我和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要这样做的协议。

（审判）长：寄发过犹太语的文章吗？

费费尔：是的，也用犹太文寄过。我可以断言所有的材料上都有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印章和签证，附在案卷里的文章没有登记单我感到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寄出去了，我们淘汰下去的很多。比如说巴赫穆茨基的那篇报告我就不记得我们曾把它发了出去。

（审判）长：（对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预审时审问到你时，你还曾承认在莫斯科遇到某几个外国人时曾口头上向他们传递了一些间谍性质的情报，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有罪的（卷25，案卷页24）。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预审期间我一直没有确认这一点。我没有同外国人进行过任何间谍性质的交谈，我认为我讲的那些数字并不是国家的机密。

（审判）长：为什么在预审时在你的理解中这些是谍报资料，而现在你却不认为这些资料是间谍情报了呢？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那种侦讯让人非常痛苦，我迫于无奈就像6月20日的那份记录一样，在这份记录上签了字。

（审判）长：可是关于诺维克的事你并不是在1份记录里，而是在好多份记录里都承认了的？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茨韦塔耶夫中校主持侦讯的那段时间，侦讯让人那么痛苦，以致在那之后我对任何侦讯人员都非常害怕，我就在那些我认为是满篇谎言的记录上签了字。我不想在这样的记录上签字，也不止一次地拒绝过签字，可是去单人囚房的那条路我太熟悉了。我没有别的出路，我迫不得已在那些记录上签了字。

（审判）长：你曾经讲过，在莫斯科诺维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你跟他说了一些关于犹太人在苏联受到歧视的诽谤性反苏谣言。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没有对侦查员讲过这样的话。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暗示，这些都写在我丈夫的记录里。我一直否认，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但是最终还是迫不得已签了字。现在我对此断然否认。

（审判）长：你曾供认你告诉过诺维克，在我们国家存在着歧视，莉娜·什泰恩曾就此写过申诉。诺维克自己也对你倾吐了他对苏联的敌视观点，声称在美国无论是他还是其余的人都对苏联1939年同德国签订条约，特别是苏联政府对隆东和他的妻子采取惩罚政策感到不满（宣读卷25，案卷页26）。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说一下关于隆东的事诺维克是怎么对我说的。

（审判）长：你供认他对1938年逮捕隆东和惩处他的妻子玛丽亚感到激愤，请你转给玛丽亚·隆东1200卢布。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只有这一点是符合事实的。我确实拿了这笔钱并转交给玛丽亚·隆东了。

条约的事我对侦查员讲了，但是他记录的完全不一样。诺维克说，同德国签订条约以后，他不得不在《工人日报》和《自由晨报》做大量的工作，写很多文章来打退黄色报刊的攻击。他说他和其他一些人一到夜晚就坐在那里解释这个条约的意义。这就是我向侦查员转述的话，可记录里边写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审判)长：可是你对记录做过修改，也是你亲笔在记录上签的字呀？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经我修改的只有一页。我当时犯了幻觉症，这份记录我没看就把字签上了，前后只用了5分钟。我想侦查员会证实这种情况的。

(审判)长：那么你的丈夫，瓦坚贝格，又是怎样把数目字和其他的机密资料转告给诺维克的呢？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座的人谁也没有给诺维克提供任何机密资料，我们是大家在一起谈话的……

(审判)长：那么同诺维克的这一次——在电车，在汽车里边——的谈话呢，他搜集情报了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这全都是谎话。

(审判)长：那这侦查员是从哪儿弄出来的呢？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不知道。他说：瞧，你丈夫供认了这个那个，我说，也许我丈夫发疯了，我从来没有听见诺维克说过任何反苏的话……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诺维克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自由晨报》的编辑，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我再说一次，我看不出有什么材料能够推翻这一点。

(审判)长：你在侦讯期间都肯定说，你同诺维克谈过民族主义方面的话题：歧视，同化等等问题。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没谈过这方面的话。

(审判)长：对你的控告就有这一条罪状：你在1945~1946年为他同美国间谍诺维克和戴维斯之间建立起联系，你为这两个间谍提供过谍报资料。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审判)长：你认识戴维斯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认识，我见过他两次。

(审判)长：你把居住在比罗比詹的犹太人的数量告诉了他，还给他提供了有关苏联的诽谤性情报？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没有，这一点我不予确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戴维斯是1945年5月份在爱泼斯坦下榻的“梅特罗波尔”宾馆爱泼斯坦的房间里。当时我是和瓦坚贝格一起去的，在场的有爱泼斯坦的妻子，有纳格勒和另外几个人。那时获得了胜利，一片欢腾，所有谈话说的都是这件事。我第二次见到戴维斯是在爱泼斯坦的办公室，在爱泼斯坦死的前一天或两天。

(审判)长：你是这样说的：“我在爱泼斯坦的办公室里和美国间谍戴维斯见过几次面”。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第二次见到他是1945年的7月份。我走进爱泼斯坦的办公室的时候，听到爱泼斯坦说：“在我们国家不可能有反犹太主义现象”。

(审判)长：戴维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加拿大的记者。这儿有人说他是加拿大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尤泽福维奇：他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好像还是政治局委员呢。

洛佐夫斯基：雷蒙德·戴维斯是加拿大好几家报纸，其中包括几家犹太人报纸的记者。他好像是1944年到这儿来的。我们给他提供了材料，和我们给其他我们加以利用的记者提供材料的情形是

一样的。说他是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的消息是不确实的，因为我曾向马努伊尔斯基问起过他，他说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戴维斯……

尤泽福维奇：我自己曾亲眼见过（虽说我的英语并不怎么好，但读还是可以的）他的有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廷博克签名的中央委员当选证书。另外他还有由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发给的一份委任书。我记不得这家报纸的名称了，我只知道我们工会刊物的一个栏目在这家报纸上登载过。

（审判）长：这份委任书里是怎么说的？

尤泽福维奇：说他是中央委员，以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机关记者的身份受派来苏联。

（审判）长：不太可能发这种委任书。

尤泽福维奇：我眼睛可不瞎。

（审判）长：（对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关于克里木的谈话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对此我一无所知，这是侦查员提示给我的，而我一直在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审判）长：爱泼斯坦向你发过牢骚，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没有带他一起去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爱泼斯坦的妻子曾跟我讲过，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们就去向米·伊·加里宁做汇报（在这儿我才得知他们是去找的维·米·莫洛托夫），她的丈夫对没有带他一起去很生气。

（审判）长：瓦坚贝格对你说过没有，他从贝格尔森讲的话里了解到中央委员会曾指示委员会不得派代表去参加犹太人代表大会？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他说过，在贝格尔森被捕的前一天，他曾和贝格尔森谈起过一封未署名的信件的事，那信是联共

(布) 中央收到的，讲在瑞士要召开一个什么犹太人代表大会。

(审判) 长：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说应当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名义派代表去瑞士出席代表大会。这是贝格尔森对我丈夫讲的。

(审判) 长：瓦坚贝格，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吗？

瓦坚贝格：我怎么不记得了。

(审判) 长：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你和你丈夫两个人谈过米霍埃尔斯之死的原因吗？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大约在我被捕的前几天，雷曼曾跟我讲过此事，说她的一位朋友莫克里切夫认为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在安全部。我把这句话理解成了完全是另一种意思，不是这里写的那个意思。我给丈夫讲了，他说：“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我不许你再和雷曼见面，这是谎言和诽谤”。

(审判) 长：你为什么重复说这些呢？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明白这事应该向安全部报告。这是我被捕前几天的事。我没有把这事跟任何其他的人讲。这事正赶在我和我丈夫刚刚做完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几天，我当时确实想应该把此事报告给安全部。

(审判) 长：你还供认过塔尔米和他的妻子索菲娅·阿布拉莫夫娜曾经到你家去，并讲出了一些反苏的观点，谈了一些反苏的话。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现在讲一讲我对侦查员供述了些什么，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在塔尔米和他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友莱坎德在我家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件事。在谈话中我说了有几位犹太人教授被从莫斯科大学解职了。塔尔米对此情绪很冲动，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道，这是诽谤，是说谎，接着就从房里走了出去。塔尔米的妻子为人比较稳重，她说决不可能有这种事，即使有什么

胡作非为的人干出了这种事，那还有党委会去管这种事。我把这件事对侦查员讲了，侦查员却把这件事写成是我们谈了犹太人的同化问题。

(审判)长：敌人放出谣言，你就把这些谣言加以扩散。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这是听来的，感到困惑不解，就试图在自己的几个接近的人中间把这事弄个清楚。

(审判)长：就是说你肯定这一点：塔尔米发了火，甚至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对这些谣言进行解释时是心平气和的。我懂得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但却有的，尤其是我犯了个错误，重复讲了这种谣言。第二件事。我听说贝霍夫斯卡娅讲过，莉娜·所罗门诺维奇·什泰恩曾给政府写信讲了个别的这种事件。我认为如果什泰恩把这种事写信报告给政府，那她是做得对的……

(审判)长：诺维克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旅行回来之后你见过他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没见过，他讲了基辅遭到破坏的情况，讲了在巴比亚尔沟枪杀8万犹太人的事，讲过人们住得很挤，因为房子被毁的太多了。

(审判)长：难道他没有跟你说过犹太人想返回乌克兰受到阻碍？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仅仅是当我的面没说过，从总体上说我也不相信诺维克会对什么人说这种话。我了解诺维克这个共产党员，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审判)长：你和你兄弟通信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的，我和兄弟通信，收到过邮包，我和妹妹也通信。侦查员曾跟我说过，我们知道你写了一些

很好的信。

(审判)长：他是从哪儿知道的？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都写了些什么？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写了我在苏联自我感觉怎样。妹妹患着和我一样的病——糖尿病。我写了我们苏联的优越性，我住医院、取药的情况，妹妹的丈夫是一个工人，在那边就医治病花费是很高的。

(审判)长：在整个侦讯期间你都供认你曾对你丈夫、塔尔米、贝格尔森倾诉过反苏的情绪。

被告塔尔米，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当着你都讲过什么反苏的话？

塔尔米：从来没有过，只有那么一次她讲了几位教授被大学解职的事，就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她可能还这样说过，也许是某个犹太人胜任不了工作，人家把他免职了，而他害怕说出是他不能胜任工作。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塔尔米对你说过米霍埃尔斯是被安全部机关暗害的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后来听赖恩说米霍埃尔斯是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害的。12月份和塔尔米谈过什么吗？费费尔的被捕和委员会的解散毫无联系，我们揣摩不出是怎么回事，塔尔米就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米霍埃尔斯被杀害了，费费尔被捕与此有关。话就是这么说的。

(审判)长：我和你讲的是1950年那次审讯的记录，你在那里边也确认了同诺维克、同你丈夫、塔尔米谈过反苏性质的话，还有你和你的丈夫向诺维克通报了苏联的形势等等。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说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些话，

而检察长记下的却是侦查员先前所写的那些东西。

……这不是什么速记记录。我说塔尔米没说过这个话，他们写的却是说过。

(审判)长：可是审判现场就有速记员？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有，可是我说的话她不记录，而是记检察长对她说的话。

(审判)长：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说的话没有记录下来。可以问一问所有在场的人。

(审判)长：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说记录的是检察长口授的话。

(审判)长：1952年2月5日(卷26,案卷页209)你供认：“因为时间太久，我已记不起我译过的那些文章的标题，但是在贝格尔森的个别文章里表露了民族主义，甚至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说的是一次有过这么一回事，爱泼斯坦针对贝格尔森的一篇文章说那篇文章是民族主义的，不得不进行加工，但是我本人并没有见过这篇东西。

(审判)长：现在来看你翻译的那些文章，你对法庭供认你翻译的很少，没有深入考虑文章的实质，只能发现一些文学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错误。可是在预审时你供认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在回答你翻译过哪些文章这个问题时你说：其中我翻译过寄送到美国去的文章。问：是哪一些，你说：“……我们在这些文章里写了……”。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是委员会写，我说的是我们。

(审判)长：并且尽力把犹太人在前线和在劳动中的特殊作用

表现出来。你翻译了关于戈诺尔的文章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翻译过写萨尔茨曼、拉沃奇金，好像还有贝霍夫斯卡娅的文章，可是写戈诺尔的文章我记不得了。

(审判)长：这些文章里有间谍情报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那里边什么谍报性质的东西都没有。

(审判)长：那么民族主义的情绪那里边有没有？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那里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些文章写的是他们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事。

(审判)长：关于尤泽福维奇。侦讯时(第25卷的第135案卷页)你供认了你同尤泽福维奇有联系。你同他谈过哪些反苏的话？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侦查员问我：你是从哪一年认识尤泽福维奇的？我说：他妻子我从1931年就认识，他本人是从1940年起认识的。他就记上了我从1931年起就认识尤泽福维奇，然而在1940年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侦查员声称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声明我不了解这一情况。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尤泽福维奇是民族主义者。侦查员问：你和尤泽福维奇谈过什么反苏的话？我回答说，我本人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也没有听见尤泽福维奇说过任何反苏的话。我对侦查员说的就是这些话。可是在6月20日的记录中却记载着，我供说尤泽福维奇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尤泽福维奇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讲过任何反苏的谣言。我一直是这么对侦查员讲的，现在我还是证实这些话。

侦查员对我说过，“你的供词——我的解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对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审讯从6月11日

下午开始，到同日晚上已接近尾声。

20 时零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20 时 40 分继续开庭。

(审判) 长：被告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审判庭讲？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想对据说仿佛是我翻译的那些文章的民族主义性质问题做些补充。我要说我从来没有翻译过含有民族主义内容的材料。我要说在我翻译材料的时候，不光是我在这里翻译的那些，也包括其他的材料，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看出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性质。我从来没有看出来材料里边有什么突出犹太人英雄气概的地方。我认为既然寄的是关于苏联的犹太人的材料，那么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因为材料是经由书刊检查部门审看过的，只是当它们成了被收集到这里边来的这种样子，才显出一种相当奇怪的情形。我自己从来也没收集过材料，也没写过文章，我不明白我那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起诉书讲到了委员会的间谍活动。我声明对于委员会的工作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委员会寄来要翻译的那些材料，可委员会干了间谍活动的事，我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材料是用来宣传苏联的，如果搀杂进来什么包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那我可没有料想到。鉴定说是有这样的材料，那我就应当相信鉴定的结果。我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审判) 长：谁有问题要问被告？

贝格尔森：为什么爱泼斯坦到你那里去时，说到我的文章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也许还谈过我别的什么话？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没谈过别的。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晚上我顺便来到委员会，看到爱泼斯坦正坐在那儿修改一篇文章。因为在这之前他说过他头痛，我就问他为什么在那儿耽搁这么

长的时间。他回答我说他的工作很多，并且指着 he 正修改的那篇文章（我记不得文章的标题了）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民族主义的，那篇文章正是你写的。

贝格尔森：很遗憾，他从来没对我进行过批评。

（审判）长：谁还有问题？

费费尔：我可以提问吗？（对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你说了我、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从来没有交给你翻译间谍材料。那么总的说有没有我亲自交给你什么材料翻译的情况？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起诉书中说我按照费费尔、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的布置翻译了谍报材料。我说无论是在古比雪夫还是在莫斯科你都从来没有把材料直接交到我手上进行翻译。我是从委员会的秘书或是苏联情报局的秘书那里接受翻译材料的。

（审判）长：费费尔本人从来没有交给你材料进行翻译吗？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从来没有过。

（审判）长：被告们还有什么问题？

被告们回答说再没有问题了。

审判庭没有宣布休庭就开始审讯祖斯金。

№1172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祖斯金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2日)

(审判)长：被告祖斯金，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祖斯金：我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团委员，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负有责任。由于已经得到确认并且为确凿的材料所证实，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了反苏的敌对活动，那么我也对此负有责任。我所犯罪行程度的轻重法庭会做出判定。

(审判)长：那么你说一说你自己的活动。

祖斯金：我想宣读一下关于我的供词的声明。

(审判)长：你可以通过书记员把你的声明交到审判庭来。

祖斯金：首先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经过三年半时间的侦查还没有弄明白米霍埃尔斯是个什么人物，祖斯金又是个什么人物。侦查材料中说犹太剧院是由米霍埃尔斯领导的，在他死后由祖斯金领导。

(审判)长：那咱们就来把这件事弄个明白。这么说你承认你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名主席团委员，进行了反苏的民族主义的工作。

祖斯金：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名委员对委员会的活动负有责任，而我做了什么工作这要由法庭来判定。我既不承认自己犯了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罪行，也不承认犯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

(审判)长：既然你承认你对委员会的活动负有责任，那就是说你同时就认为自己在实质上是犯罪的。

祖斯金：我在形式上负有责任是因为我是主席团的委员，而我

的活动是什么，这要由法庭按照我的口供和证人的证言去判断。

(审判)长：对你是 1949 年 1 月 11 日提起控告的，在问你“你是否承认自己犯了背叛祖国、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的罪行”时，你说“是的，我承认我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保持着联系”。

祖斯金：请准许我声明，我否认这些由我亲笔签字的供词。我举两个侦讯过程中的例子。我被捕几天之后，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传召我去，向我提出好些问题。被捕时我对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一点也不知情。他问我一个人及我所了解的情况，我都对他讲了。过了一天，在党中央大楼的什基里亚托夫的办公室里，同一位其社会地位我十分清楚的人物进行了对质，我想说明我为什么要否认写在记录里并经我亲笔签字的所有口供。

对质时在场的有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什基里亚托夫、那位人物和我。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位人物的一切我都讲了，不过所有这些都受到了他的反驳。后来部长对我说，审讯时你的态度是老实的。

第二件事。在和佩尔索夫对质的时候，拉斯瑟普宁斯基对我说，这个人让侦查机关感兴趣，他受部长的委托问我这个、那个和其他事情，后来他说我值得信任。在这之后我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半，我央告，我请求让我和主席团委员们进行对质，终于让我和费费尔对质了，他说我不是一个积极的委员，但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过错。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对我提起控告，控告的罪名令人害怕，又不安排对质，进行对质我是能够证明自己无罪的。

我在剧院、影院甚至安全部的俱乐部里都工作过，我指导过边防部队演出团的演出。我从 1932 年起担任斯大林区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后来又第二次当选为代表。我的整个一生就是这样。

案卷里讲到了费多谢耶夫的证言，这个人属全苏艺术事务委员会的话剧院的副院长，他在这些证言中称我是人民的敌人。这事

是我在开庭的前一天才知道的。怎么会这样呢，这位负责干部认识我这个演员多年，他了解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当上了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的，侦查机关里有他的这种证言，却不安排我同他对质。我想问费费尔一个问题，可以吗？

(审判)长：问吧。

祖斯金：费费尔，请你说一下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费费尔：有1/4个世纪了。

祖斯金：我俩的相互关系怎么样？

费费尔：关系正常。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私人的友谊，不过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也不错。

祖斯金：我在莫斯科去过你家吗？

费费尔：没有。

祖斯金：那么我是主席团的一个积极的委员吗？

(审判)长：他对这一点已经供述过了。

祖斯金：是否给我布置过犹委会方面的什么任务？

费费尔：有两次曾要你写关于剧院演员的文章，你也写了。

祖斯金：我给犹委会起草过什么信函和文件没有？

费费尔：没有。

祖斯金：你和我就委员会的事务交换过看法吗？

费费尔：没有。

祖斯金：起诉书中说，被告人祖斯金作为一名积极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与苏联为敌的活动。

(审判)长：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的，现在你对法庭说一下你同米霍埃尔斯相识很久了吗？

祖斯金：26年了。

(审判)长：如你在侦讯时所说的，是从1921年在莫斯科犹太剧院一起工作时开始的？

祖斯金：是的。

(审判)长：他的权威对你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吗？

祖斯金：那是在初期，从1939年12月21日到他生命终结这段时间，我们两人不断地争吵。

(审判)长：你曾形容说米霍埃尔斯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喜欢讲空洞而漂亮的话，爱好虚荣，这是真的吗？

祖斯金：我想，我要剥掉米霍埃尔斯的伪装并不是要给自己谋求荣誉，而是要讲出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在法庭上讲的是米霍埃尔斯，可是我了解的是沃夫西，米霍埃尔斯和沃夫西两个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个沃夫西把我弄得动了自杀的念头。我为什么要对费费尔提出问题？因为我同米霍埃尔斯从1939年开始，我说的是同沃夫西，就不说话。我只同米霍埃尔斯说话，因为我同剧院有关系。这很有趣。祖斯金——米霍埃尔斯，战前很久的时候我去了区军事委员部，区军事委员接见了，他拿过我的军人身份证，一边看一边说：“为什么只有一个姓祖斯金，米霍埃尔斯写在哪儿了？”在起诉书中这两个姓氏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然而谁也没有在自己的供词中讲到祖斯金。我一直在等待讲了米霍埃尔斯之后，跟着就是祖斯金，可是没有，没出现这种情况。

(审判)长：这说明你跟他的关系太密切了。

祖斯金：那是在舞台演出方面。

(审判)长：你确认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就是你的口供(卷23，案卷页51)“我也不必隐讳，我知道米霍埃尔斯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民族主义者”。

你看，谈到他的犯罪活动，你声称过去和现在你都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吧？

祖斯金：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这些话题。

(审判)长：可是我面前摆的就是你关于这件事的供词。

祖斯金：我否认所有的供词，我现在讲实话。另外我再一次声明，没有让我和任何人对质。

（审判）长：进行对质的目的是把事情弄准确，做揭露。你自己已经把一切都承认了，为什么还要让你去对质呢？

祖斯金：在形式上我对犹委会的活动负有责任，但具体讲我绝对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的，无论是在委员会方面还是在剧院方面的罪行。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经做过供述：“我受到米霍埃尔斯的影响，感染了他的民族主义的反苏情绪，最终自己滑到了公然为敌的道路上去了”（卷23，案卷页53）。

祖斯金：我同他是根本不说话的……

（审判）长：可这是你自己这样供认的？

祖斯金：是的，我这样供认了，因为有几位侦查员对我说，他们不相信我。

（审判）长：可是你刚才还对我们说过，侦查人员是相信你的。

祖斯金：我不请求法庭给予任何宽大，我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你们根据我所做的事情而不要根据记录去审判我吧。

（审判）长：这种口供是不能忽视的。法庭的任务就是要查对你的这些口供。

祖斯金：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假的。

（审判）长：可是当其他的被告在这儿揭发并指出你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剧院上演些什么样的剧目、你在这个剧院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你对哪一个人也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声明说他们讲的不符合事实吗？

祖斯金：请你相信我，医生了解我的状况，我常常一连几天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而你要求必须准确地提出问题，这我不是总能做得到的。

我只想提供一个情况。格拉诺夫斯基当了 10 年的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米霍埃尔斯干了 19 年。他们两人加在一起是 29 年，而我担任剧院的艺术指导总共才有几个月。是谁指导了上演的剧目，谁对此负有责任，我和这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格拉诺夫斯基独自包揽了犹太剧院的工作，另外，利特瓦科夫担任剧院的思想上的领导人 17 年。在 3 年的侦讯期间是可以调查清楚祖斯金在剧院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虽然我提出过这种请求，但却没有这样做。

(审判) 长：你曾肯定说你受到米霍埃尔斯的影响，走上了敌对的反苏道路。

祖斯金：我断然否认这种说法。

(审判) 长：你自己说过，和他谈话时你讲过，在苏联，犹太文化受到压制。

祖斯金：我否认这个说法，因为关于这种事我跟他什么也没有说过。让这儿所有的人来证实一下，我同他们哪一个人讲没讲过什么反苏的话？

(审判) 长：也许你本人并没有讲什么表现民族主义的、反苏情绪的话，但是根据事情进展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你作为主席团的一名委员，是支持它的敌对活动的，因为你对它所实行的路线一次都没有表示过反对。是谁介绍你参加委员会的？

祖斯金：不知道。

……不，我不会讲话，我只能演角色，我只能读写好的东西。

1941 年 10 月 15 日我随剧院疏散到了塔什干，从这个时候一直到 1943 年 10 月 3 日我就在那个地方，哪儿都没去。所以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同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召开第三次群众大会之前，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同委员会有关系。

(审判) 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是怎么知道的？

祖斯金：我接到了去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参加第三次犹太人反法西斯大会的请柬……

(审判)长：你在会上讲话了吗？

祖斯金：没有，我没有讲任何话。

当时爱泼斯坦告诉我：“请你到克鲁泡特金大街10号来，要在那儿召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全体会议，你是委员会的成员”。我跟他谈：“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早点通知我？”在塔什干有相当一批人去参加过第二次全体会议，我却不知道这件事。

军事审判庭审判长随后提出的问题意在查清祖斯金同和他一起接受审讯的一些文学活动家的相互关系。审判长希望了解他们，特别是和费费尔谈话的性质。

祖斯金：我同费费尔在相识的25年间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民族主义方面的话。我知道，希梅利奥维奇同米霍埃尔斯很要好。我同在此的任何一位犹太作家都没有谈过民族主义性质的话，我只是在我们一起研究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才同他们有交往。

(审判)长：你曾经供认过，进入主席团的大多是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爱泼斯坦，费费尔，米霍埃尔斯和尤泽福维奇。

祖斯金：我否认自己的这些供述。

(审判)长：你可是说过你在侦讯时讲的都是实话的。

祖斯金：我曾请求给我机会进行辩白，因为我没有任何罪过，还曾请求让我进行对质。

(审判)长：一切都是你亲口承认了的。假如说是费费尔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你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另一码事了；那时当然就需要进行对质，因为你已经把一切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对质呢。

祖斯金：因为对质时我会证明，我没有跟这儿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谈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话。

(审判)长：你说过一切重要问题你都是同洛佐夫斯基商量的。

祖斯金：洛佐夫斯基被称作“加比”并不是偶然的，在犹太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村社之长。这也适用于沃夫西，但对米霍埃尔斯不合适。我这一辈子和洛佐夫斯基只谈过一次话，对他总共只讲了那么5~6个字；那还是1943年10月3日演出季开幕那一天的事。上演的是《卖牛奶的台维》，是米霍埃尔斯参加的最后一次演出。一位女检票员来到我身边说：“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请你去找洛佐夫斯基，以米霍埃尔斯的名义请他去见米霍埃尔斯”。我就走过去说：“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后台去”。然后我把他们送到了后台。这就是我和洛佐夫斯基的全部交往情形。

(审判)长：那么“加比”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祖斯金：我现在来说说这件事。我们有时候在米霍埃尔斯的办公室里进行排演。有一次在进行这种排演的时候，米霍埃尔斯接到一个电话（我记得米霍埃尔斯说了科列斯尼科夫这个姓名），通话时米霍埃尔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洛佐夫斯基的声音说：“那么咱们的‘加比’怎么说呢？”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米霍埃尔斯总是说，他同洛佐夫斯基见面感到不痛快，因为米霍埃尔斯总是用名字和父称来称呼洛佐夫斯基，而洛佐夫斯基却用姓氏来称呼米霍埃尔斯。米霍埃尔斯对此感到极为不快。而且我觉得在洛佐夫斯基来剧院的时候，米霍埃尔斯从未对他表示出特别的尊敬。

我这一辈子再没和洛佐夫斯基说过话。开会时我听人们常说：“这件事得到了洛佐夫斯基的同意”。于是我从这里边就领悟到洛佐夫斯基在委员会里的作用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苏联情报局的局长，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归他管。

我不知道1946年委员会划归中央委员会管辖了。我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式样的生活，委员会的生活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把

这份工作当作是一项什么义务似地去履行。我极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人们对此都已习以为常，女秘书在通知我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常常说她深信我不会出席这次会议。

(审判)长：你常到委员会去吗？

祖斯金：去得很少。

(审判)长：大致地说呢？

祖斯金：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我只记住了佩尔索夫的报告。把我抓起来之后，从我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就把其他人的供词读给我听。

(审判)长：给你读了哪些人的供词？

祖斯金：洛佐夫斯基的。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被逮捕的时间比你晚一个月，怎么可能给你宣读他的供词呢。你是什么时候被逮捕的？

祖斯金：1948年12月24日。

(审判)长：就在当天你就供认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事情。在那些供词里你承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还讲了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这可是审讯你的记录啊。

祖斯金：那些都是别人提示给我的。比如说有一份关于克里木的供词，可我只是到了这儿才得知克里木问题是1944年1月的事情，而我在1944年4月11日之前根本不知道委员会里做的是些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供了克里木的事？因为我被带去审讯时身上还穿着住院服，头脑昏昏沉沉的。要知道我是被从医院里抓来的，我正在那里进行治疗，而且我患的是这样一种病，我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我是在沉睡的状态中被逮捕的，直到早晨我醒过来才看到我被关在囚室里，得知我已被捕。

审讯时对我说我是“国事犯”，要求我供述我的犯罪事实。我回答说既然国家全部逮捕了我，那就是说是有原因的。我被告

知，侦查人员一切都知道了，我必须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被逮捕的。于是侦查员开始把什么人的供词读给我听，问我：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是否听到过什么有关洛佐夫斯基的话。我说我听到过这个姓名，然后我就在昏沉的状态下对侦查员“讲了”类似的关于克里木的话，而实际上我对这个事一点都不了解。

(审判)长：你是从哪儿知道米霍埃尔斯会见了魏茨曼以及那些民族主义性质的谈话的？

祖斯金：关于那些谈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审判)长：瞧，这是你的供词。

祖斯金：我已经说了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了那些供述的。

(审判)长：你说过你是在对你完全信任的情况下进行供述的。

祖斯金：我讲的是我取得信任的两件事……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是什么时候对你讲的他的那次旅行，和人们会见，美国人交给他的那些任务？

祖斯金：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想既然把我逮捕了，那就是说要进行审判，法庭会弄清楚的。我请求在我这件具体的案子上对我说明我所犯下的那些具体罪行。

(审判)长：你讲一讲这些供词！

祖斯金：是关于他去美国进行侦察我所了解的情况吗？我了解到他在那儿会见了卓别麟、一些演员、科学家恩施泰因。我是在他回来以后讲起这些的时候知道的。

(审判)长：我是问你，你是怎样了解到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美国之行的细节、同魏茨曼和戈尔德贝格会见的情形的？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在犹委会的会议上就他的这次访问做过报告，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偶尔也参加一下会议……

(审判)长：我最后一次问你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美国之行的情形，你供述吧。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我本人毫不知情……

(审判)长：对克里木问题你都知道一些什么？

祖斯金：1944年1月份在委员会的会议上研究过这个问题，可是有我在的时候从来不谈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参与所有这些事情，我与这儿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会过面。

(审判)长：你说说剧院里接见来访者是怎么回事，你曾供说：“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接见来访者之后，米霍埃尔斯就怒气冲冲”。他（宣读）“骂苏联政府据他说仿佛是在侮辱犹太人”（卷23，案卷页60），你的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从美国一回来，立刻就开始有人到剧院里来。他们就像找牙科医生看病那样，坐在那里排队等候。本来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有一次我去演出，看见米霍埃尔斯面色苍白地走出来，直接就坐到了楼梯台阶上（他喜欢让人怜悯他），他对我说：“这么早你上哪儿去？”“早什么呀，”我回答说，“都5点30啦，7点30就要开演了”。“真的5点30了么，”米霍埃尔斯说，“可我还一点什么也没吃哪，这些犹太人把我折腾苦啦，这个人没有被学校录取，那个人没有被录用工作”。我说：“难道说你管这些事吗？”因为他是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代表。米霍埃尔斯回答我说，委员会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说：“什么人给了委员会过问这些问题的权力，如果你认为委员会应该管这些事，那让他们去找委员会去好了”。

(审判)长：你是说他怒气冲冲，骂苏联政府据他说仿佛是在侮辱犹太人。

祖斯金：他开始接见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开始妨碍我们工作了，甚至还有人拉开我们大厅的门看我们排演。有一天我对米霍埃尔斯说，如果他不终止这些接见活动我就要找有关部门去报告，因为这妨碍了工作。

(审判)长：他们进了后台吗？

祖斯金：他的办公室就在后台，离我们很近。

(审判)长：是谁让他们去找剧院的？是委员会吗？

祖斯金：我不知道。

(审判)长：他们为什么不到他的家里去呢？

祖斯金：我哪里知道呀……他上午接见他们，排演完了也接见，爱泼斯坦也常来，所以1946年全年他就没在剧院里上演一部新戏。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就看着不管管呢，你是副手啊？

祖斯金：我是一名演员。

(审判)长：米霍埃尔斯的副手是谁？

祖斯金：没有人。我是他死后任命的。

(审判)长：可是剧院里应该有艺术指导和副艺术指导？

祖斯金：没有副艺术指导。

(审判)长：导演有吗？

祖斯金：没有，糟糕就糟在这儿了。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呢？

祖斯金：还有院长菲什曼呢。所有这些他们都是看到了的，我又不能和他们吵闹。

(审判)长：你自己写过文章吗？

祖斯金：我偶尔写写。案卷里边有两篇我的文章，从中可以断定……

(审判)长：你说你写过显然是诽谤性的文章，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祖斯金：我不是新闻记者……我写的是什么呢？1948年1月24日共和国的功勋演员施泰曼亡故。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短文——几句亲切的话。这么一篇文章里能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东西？

(审判)长：我不知道，我是问你。你自己是这样供认的，可

是现在又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

(审判)长：你还写了什么文章？

祖斯金：8月份又死了一位演员……

(审判)长：就是说你只写过悼念死者的文章？

祖斯金：不是的。莫斯科建城800周年时，我们这个团体有3位演员和其他剧院的演员一起被授予功勋演员的称号，而且其中有1人是钟表技师，2人是服装师……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只写过与戏剧有关的文章？

祖斯金：全是这方面的。

(审判)长：这些文章里边有些什么民族主义的和诽谤性的东西？

祖斯金：一点也没有。我曾对侦查员说过：“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可以把文章拿来看一看”。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把所有的文章读个遍呢！”有一篇文章是我应别人之请为欢迎纽约的演员给《自由晨报》写的。人们获得功勋演员的称号高兴得都哭了，怎么能不写呢。

(审判)长：那么别的，包含有民族主义情绪和间谍情报的文章你写过没有？

祖斯金：我怎么能写这种玩意儿呢。我与那些可以写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着，收集过什么情报吗，我是干什么的，是新闻记者，是报道员吗？

(审判)长：你是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而在委员会里讨论过“犹太人问题”，有过民族主义性质的议论，等等。你自己就说了，你听过佩尔索夫那个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报告。

祖斯金：请准许我讲一下我对这事是怎么看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那次会上听着报告，我把这看做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只在德国人刚刚跑掉的那些地方可能有的那种反犹太人主义的事件。

我知道个别的事件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却不可能做任何的概括。我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的称号，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东西呢，我怎么可能认为在苏联有反犹太主义呢。

(审判)长：佩尔索夫的报告你听了，并且说它是彻头彻尾民族主义的、犹太主义现象。

(审判)长：在第23卷第106案卷页上你又一次供认了已说过的事情，对作为演员的米霍埃尔斯和作为普通人的米霍埃尔斯进行了评说(宣读)……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审判)长：就是说这些供词是真实的？

祖斯金：完全是真实的。对每一点评介我都可以举例加以证实。1945年战争结束后，我曾对米霍埃尔斯说：“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我想给你交一份申请书，我想退出主席团，因为我反正什么事也不干”。他告诉我说，目前委员会毫无作为，不过很快一切就要结束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以后也就不会有任何委员会了。这是他本人对我说的。

(审判)长：你在自己的供词中说，关于瓦坚贝格和他的妻子，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和在委员会里搞反苏活动的米霍埃尔斯关系很好。

祖斯金：这事一点都没有。我不请求任何宽恕，但是我想把实际的情形讲出来。我从来没有在米霍埃尔斯的办公室里碰上过瓦坚贝格和他的妻子。

(审判)长：你还说过，瓦坚贝格同爱泼斯坦也很要好？

祖斯金：既然瓦坚贝格和爱泼斯坦一块在美国待过，有可能相互认识。我讲过这种推测的话。

(审判)长：瓦坚贝格夫妇到米霍埃尔斯的办公室去干什么？

祖斯金：我没有在那儿看见过他们。

(审判)长：可是你供认过这件事呀？

祖斯金：我供认这件事是因为任何人对我都是什么都不相信。我不想过我在监狱里经受的那种生活。监狱里的生活让我感到痛苦，我就对侦查员讲，愿意写什么就都写上吧，我可以在随便什么样的记录上签字，但是我希望能够活到开庭那一天，到了法庭上我可以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讲出来。这话我对侦查员和检察长都讲过。我问过检察长科茹拉大尉，我也问过在列福尔托沃审问过我的那位检察长普里霍季科，我有没有权利和机会发言反驳我读过的这42册案卷。我被告知：“一切将由法庭判定”。我急切地等待着我可以站到法庭上，并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讲出来的这个时刻到来。

我可以讲出很多很多事情以及对法庭有用的东西。我和米霍埃尔斯在一栋楼里住了同时也在一个剧院里演出了26年。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我感到奇怪的是，竟把这样一些诽谤性的谰言加在了我的头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传唤那些可以为我这一案作证的人。多年以前《真理报》的编辑人员雷克林写一个什么剧本，他邀请我到 he 那里去，就在那个时候我和瓦坚贝格及他的妻子有过一次较近的接触。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并同她认识了。

(审判)长：据你的看法，马尔基什有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祖斯金：我想是的。

(审判)长：你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祖斯金：请准许我声明一下，我和马尔基什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在我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马尔基什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朋友和参谋了。那是1938年的事了。马尔基什尽管性情急躁，却是一个异常温情而又非常顾家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厚的父亲，对待亲属们极好。他的一位女亲戚说他是一个最为温柔体贴的人。他那位已过中年的姐姐讲到 he 时感情深沉，满心喜悦，她说这样的弟弟

再也不会有了。

(审判)长：你曾讲过，你和他人一起进行了民族主义活动，个别的委员，例如莉娜·什泰恩，曾当着你的面对苏维埃政权进行诽谤……

祖斯金：我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审判)长：你讲你和她并不认识，但是在一些会议上碰到过她，她在会上诽谤苏维埃政权。她的一次这样的发言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印象。甚至连米霍埃尔斯都出来讲话以缓解什泰恩发言的激烈程度。

祖斯金：什泰恩的那次发言我没有听到。是侦查员读给我听的。

(审判)长：我不知道侦查员跟你说过什么，但是我面前摆着一份经你——一个有文化的成年人——签过字的书面材料。

祖斯金：我请求查明我实际上所犯的罪。

(审判)长：你以前知道委员会同境外，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反动组织保持着联系吗？

祖斯金：我以前知道委员会通过苏联情报局往外寄发材料，委员会的直接任务就是给一系列的机关刊物送通讯报道。具体的是寄给那些刊物我不知道。

(审判)长：委员会的通报给你寄吗？

祖斯金：寄的。

(审判)长：可是从这份通报里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

祖斯金：我看得出这是作为一份显然是经过检查的通报而正式印制的，就像委员会的全部活动都要经过检查一样。

(审判)长：你已经受到过就间谍活动鉴定书进行的审讯了，你确认了鉴定所做出的全部结论吗？

祖斯金：鉴定摘引的那些东西我看过了，我也同意这无疑都是些谍报性质的东西，不过对这些我一点都不知道。

(审判)长：你看过了关于民族主义宣传的鉴定书。你同意这份鉴定吗？

祖斯金：我同意马尔基什关于剧院所做的供述。

(审判)长：就是剧院进行了民族主义的工作？

祖斯金：是的。

(审判)长：可在那里你就是骨干演员之一呀？

祖斯金：我正想讲一讲我在剧院里所起的作用。

(审判)长：对你进行最后一次审讯时检察长科茹拉在场，这是1952年3月4日的记录。你承认自己有罪，供说：“确实，作为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和其他的成员一起对委员会被变成了一个进行反苏斗争的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的中心负有责任”。

祖斯金：但是检察长科茹拉却没有把我的请求记录下来，我请求给我进行某种辩白的机会（这个请求我已经提了3年了）。我根据鉴定认为犹委会进行了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但是我请求检察长科茹拉核查一下我本人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审判)长：这儿还顺便讲到了：“……这么一来，从主席团成立之时直到委员会撤销之日，我一直担任主席团的委员”。就是说，主席团一组织起来你就被列为它的一个成员了？

祖斯金：一点不错。

(审判)长：接下来你说：“作为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的洛佐夫斯基把诸如米霍埃尔斯、费费尔、马尔基什这样一些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包括进委员会里来……在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自美国回来以后，这种民族主义的活动暴露得特别明显”。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祖斯金：是真实的，不过我要请你问一问这儿所有在场的人，他们能讲出我在委员会干的什么活动？

(审判)长：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是认为洛佐夫斯基把一些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马尔基什包括进委员

会里来的吧？

祖斯金：是的，这些人经过侦讯结果都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审判)长：经过侦讯！难道以前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祖斯金：关于马尔基什，根据他的戏剧我是知道的。

(审判)长：关于费费尔呢？

祖斯金：他自己都说他没有和我做过民族主义内容的谈话。

(审判)长：关于米霍埃尔斯呢？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每一次都遭到我的反对。

(审判)长：就是说你以前就知道这些人是民族主义者。那就是说，你的供词说洛佐夫斯基把马尔基什、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这样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包括进委员会里，这说得是对的？

祖斯金：苏联情报局归洛佐夫斯基管，就是说整个的主席团都是经过了洛佐夫斯基的手的，那就意味着是他把所有这些人，我也在其中，包括进去的。

(审判)长：接下去你说：“……在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从国外回来之后，委员会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有关苏联的经济、生产等等的情报的工作。所有这些情报都寄到国外去了。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名委员对此应该负有责任，因为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祖斯金：我知道——这几个字删掉，我不知道这回事。说情形是这样，我是根据鉴定来判断的，并作为一名主席团委员对一切承担责任。

(审判)长：关于剧院，你说剧院是民族主义的巢穴，它周围汇聚了一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如像马尔基什，多布鲁申，贝格尔森等等人。是这样的吗？

祖斯金：是这样，根据还是我在案卷里看到的那些材料。

(审判)长：你和菲什曼及其他人有过反苏性质的交谈吗？

祖斯金：我曾请求传唤菲什曼及其他人，让他们讲讲他们对我

的了解。我有意识地讲出了他们的姓名。菲什曼是党员，是剧院的院长，有一段时间他在敖德萨主管艺术事务局。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我说出这些姓名是想一定会向这些人去调查，他们就会揭露出来我讲过这种话，或是证明我是无罪的。

祖斯金请求审判庭听听他讲自己的履历。祖斯金用了1个多小时讲了他的一生、创作道路、犹太剧院的发展经过。然后他试图给自己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所做的供述做个总结。

祖斯金：如果允许的话，我讲一讲我承认自己犯了起诉书中所说的哪些罪行。

我确认起诉书引用马尔基什关于剧院的供词所写的内容，但是我不承认自己在那份上演剧目问题上有罪，我是反对那个剧目的，也为那个剧目和米霍埃尔斯争吵过。

第二，起诉书说我是一个积极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和费费尔、马尔基什及米霍埃尔斯一起进行了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敌对活动。

我对此断然地、坚决地予以否认。我断然否认第一，我是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的同谋，第二，我没有进行过任何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敌对活动。顺便说一说，米霍埃尔斯在美国自称是教授，而不是演员，而当演员这正是我的生命，难道我会为了那个连说自己是演员都觉得可耻的该死的美国去干间谍活动吗。

第三，起诉书说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根据同洛佐夫斯基达成一致的意见，于1942年推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有我，参加到委员会里来，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骨干，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后来就是靠这批骨干力量进行他们的反苏活动的。

1942年我在塔什干，一直到1943年10月份才离开。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被吸收进委员会，也没有给我寄送任何材料。致“犹太

兄弟”的呼吁书我就不知道，可是那上面竟有我的签名。我绝对不能接受说我是民族主义的骨干力量，他们依靠我进行反苏活动的指控。我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我成了一个不谙政治的傻小子，我出席过几次主席团的会议，但都坐在那里从来没有发过言也没参与过辩论，我信任了领导主席团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老共产党员，是党龄长、社会资历深的领导干部。我信任他们，认为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审查的。我记得有一次古别利曼问：有没有发寄不准寄的东西？他们对他保证说一切都是经过审查的。

贝格尔森：是谁这样保证的？

祖斯金：我说不出是谁，我的记忆力很差，我已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我已经有4年的时间几乎不能睡眠了。我相信了这些人而丧失了警惕性。我太相信爱泼斯坦、费费尔和1946年之前一直指导并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委员会的洛佐夫斯基了，也太相信国家监督部副部长布雷格曼以及古别利曼了。有这些作为柱石的人物在，我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的。

我是一个演员，我的罪过就在于我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演艺工作上了。我到委员会里来，充当着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对那些问题我无动于衷，而干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事情我却是不知道的，让受审的人们说一说——有没有让我写过什么关于苏联的经济、产业等等的文章？没有过。在全体人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的会议上，我在出席会议的全部时间里说没说过哪怕是一句反苏的话？没有过。

我的罪过在于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我1947年没有去过委员会。在这以后费费尔在一次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对祖斯金近期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表示欢迎”。积极性体现在哪里？辩论的时候我从来不发言，他们的事也不让我知道。费费尔肯定说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委员会的事情，关于米霍埃尔斯我已经讲过了，和这儿在场的人我全都没有谈过话。请问，我怎么会是

委员会进行民族主义的、间谍的活动的积极的骨干力量呢。戈尔德贝格我只在剧院里见过，举办宴会我不参加。克维特科说米霍埃尔斯希望把犹太作家组抓在他的手里。我请你们问一问克维特科，在马尔基什和克维特科领导这个组期间，我参加过这个组的一次会议没有。可是却控告我还在剧院以外进行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活动。

我在苏联的艺术方面没有做任何有损名誉的事。多年来我一直是演员之家的积极分子之一，我没有任何反苏的表现。我是区苏维埃的代表；我怎么可能去干什么反对把我培养成人的那个国家的事情！我是一个裁缝的儿子，父亲曾梦想让我受教育，我今天已经拥有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乌兹别克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莫斯科戏剧艺术学校的副教授，没有国家的培养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至死都将忠诚于我的祖国，我为什么要去干不管是什么样的反祖国的活动呢！

我现在站到了苏联的法庭之上，让苏联的法庭对我做出最严厉的判决，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生活在世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痛苦。我只希望能够活到可以向法庭证明我没有犯任何罪的那一天，即使判处我最严厉的刑罚——极刑，我也就满意了。活下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被关在监狱里对我比死亡还可怕。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活到我站到法庭面前讲出全部真实情况的那一刻……

(审判) 长：请讲实质问题。

祖斯金：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惟一盼望的就是让你们相信我在剧院和委员会里所做的工作中，没有进行任何敌对的活动。

现在我想讲一讲米霍埃尔斯的葬礼。这儿在场的好多人都说到了米霍埃尔斯亡故的详情，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事实弄错了，我却可以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因为米霍埃尔斯之死的整个过程我都了解。所有在这儿谈及此事的人说得都不对。

(审判) 长：你有什么话要讲呢？

祖斯金：我想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情况。马尔基什在这儿说到我给他读过的那封米霍埃尔斯写的信。那是1946年庆祝我工作25周年的时候。演出终了观众散去之后，我被叫到了台上，在简朴但却热情友好的氛围中全体人员向我表示祝贺。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大花篮和里边放的一封信。我被告知这是米霍埃尔斯送来的。这是说明米霍埃尔斯没有和我讲话，而是送过来一封信的又一个证据。信是这样写的：“祖斯卡（在他有好感的时候就这样称呼我）！不管怎么样，不论你愿意这样还是不愿意，你都必须替代我在剧院里的位置。米霍埃尔斯”。我把这封信给马尔基什看了。

（审判）长：那是哪一年？

祖斯金：是1946年。所有这些就是在对费费尔说我和其他一些人散布米霍埃尔斯是被谋杀的谣言的那些材料进行驳斥之前的一段序幕故事。

后来在我们准备十月革命30周年的庆祝活动，夜里3点钟大家已经都散了，我也准备走的时候，米霍埃尔斯告诉我——你留下。我留下了。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用李尔王的那种戏剧手势指了指他椅子上的那个座位。“你很快就要坐到这个位置上了。”我告诉他我对坐这个位置极少兴趣。接着米霍埃尔斯从衣袋里掏出一封匿名信，读给我听。这封信的内容是：“丑陋的犹太人，你飞得太高了，可别把脑袋飞掉了”。他给我看了这样一封信，但是我却对任何人，甚至对我自己的妻子都没有说起过有这么一封信。完了米霍埃尔斯就把信撕碎扔了。他是当着我的面这样做的。1948年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米霍埃尔斯到明斯克去我不知道，他从剧院走开我只能解释为有什么重要的客人来了。这是常有的情形。1月11日剧院院长把我叫去说，米霍埃尔斯从明斯克打来电话，请我，祖斯金，悉心照料当前这部戏的演出，因为要有一些重要人物出席观看。院长告诉

我米霍埃尔斯将于14日回到莫斯科。

13日上午我们在剧院开始排练，突然听到米霍埃尔斯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可怕的喊叫。院长正在打电话，他用一种令人恐怖的声音追问：是谁？什么？死了！两个人都死了？米霍埃尔斯？你是谁？我们跑进办公室，他告诉我们，清晨7点钟工人在上班的路上从雪堆中找到，确切说是发现了两具尸体，经查是戈卢博夫和米霍埃尔斯。然后院长给相应的机关打电话，从那里得知这两个人都死于汽车车祸。是很确切地这么说的。

那时就传出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怎么会出这种事，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我们大家却丝毫没有怀疑对我们宣布的情况。14日上午米霍埃尔斯的灵柩运到莫斯科。在这之前同米霍埃尔斯关系很好的兹巴尔斯基院士给我们打电话说，灵柩一到剧院立即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想看一看尸体是怎么个样子，能不能停放出来供人们告别。于是在11点钟尸体一运到，兹巴尔斯基院士、沃夫西（米霍埃尔斯的兄弟）和画家特施勒就来了。

镀锌的棺材被打开的时候，有我们5个人在棺材旁边，我们看到鼻部已经破穿，左边面颊全是淤斑，于是兹巴尔斯基院士对我说，他要把尸体拉到他的研究所去，在那儿把面部修整一下以便于停放出来。晚上6点钟兹巴尔斯基院士带着他的几位助手一块来了，也把米霍埃尔斯的灵柩拉来了。棺材被放在一个台座上，打开了所有的聚光灯，总之布置了一个适于停放的环境。又忙碌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这才说人们可以进来告别了。

来告别的人非常多，克维特科说这一切都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剧院组织的，他的说法不对。艺术事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莫斯科各家剧院的领导人员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我也在现场，我身边坐着泪流满面的塔拉索娃，她太爱米霍埃尔斯了。

葬礼的费用是国家支付的。而且埋葬的是演员米霍埃尔斯，而

不是沃夫西，是由戏剧界人士埋葬的，数百个花圈里边有4个犹太人送的。巴尔索夫和科兹洛夫斯基参加了守灵，在追悼仪式上讲话的有贡多罗夫、苏普伦，代表委员会讲话的只有费费尔一个人，而且他使用的是俄语。我也不得不代表剧院说了几句话，不然会很难堪的。讲话的还有法捷耶夫，祖博夫和其他一些人。出席的人员中有很多俄罗斯人。剧院对面的那所女子中学全体人员参加了葬礼。

兹巴爾斯基来参加葬礼的时候告诉我，米霍埃尔斯无疑是由于一场汽车车祸而丧生的，他对我解释说一只手臂折断了，另外还有同一侧的面颊满是淤斑。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撞到了另外一辆车上，他们两个人被甩到了一旁，就是说他们是因车的撞击而死亡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对我说，他的死相还是挺好的。如果能对他立即加以救治，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可是他被冻死了，因为他在大雪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在兹巴爾斯基告诉我米霍埃尔斯死于车祸之后，我还可能说他是被杀害的吗，可是这里边甚至说我散布过他是被杀害的谣言。

(审判)长：祖斯金，你供述完了吗？

祖斯金：没有，请准许我进行补充。

(审判)长：说吧，不过要简短一些。

祖斯金：我说到了开始和米霍埃尔斯的遗体告别。我守在灵旁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家属和剧院的人员也站在那里。这时有一位姑娘——剧院的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说，有一位你们已经知道的“人士”站在那里。我走过去请这位“人士”站到另一侧去，因为这一边的人太多了。这位“人士”向剧院人员表示哀悼，然后就问道：“我问你，你了解米霍埃尔斯死亡的情况吗”。我说：“我们有专门的通知书”。“你说，你认为这一切就那么简单吗?!”这个时候灵柩旁边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叫。这位“人士”说：“你去看看那边是怎么回事”。我就去了，那儿有一位姑娘昏倒了。等人们

把那位姑娘救醒过来，我回到那位“人士”站过的地方，那儿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审判)长：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默读一遍，然后说一下你的这些供词是不是全是对的(交给他去读)?

祖斯金：不对。

(审判)长：这不对吗?

祖斯金：不对。我走到那位“人士”站过的那个地方，那儿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份记录里写的是据说这位人士仿佛说了，米霍埃尔斯是由于当局的原故死亡的，而侦查员则希望写上苏联当局……

(审判)长：这里边没有那种说法。是这么记的：“从所说的一切中我明白了，米霍埃尔斯的死是蓄意谋杀的结果”(宣读)。

祖斯金：我想把话说完。这个时候费费尔走到我的跟前，我就对他说，我想他们两个人都喝醉了。费费尔说他和米霍埃尔斯一块吃的饭，米霍埃尔斯一滴伏特加酒都没喝，因为他正在等候中央委员会的接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怎么可能说杀害的话呢。这让我感到非常恐慌。

(审判)长：(把案卷交被告祖斯金阅读)这一段记录得对不对?

祖斯金：最后一句“简单吗”这个词的后面应该是句号，而不是问号。也许法庭想知道我是怎样到犹太教堂去的吧?

我去了歌舞巡回演出协会，有一位俄罗斯姑娘——歌手——告诉我，“他们要到犹太教堂去听音乐会，亚历山德罗维奇要在那儿演唱”。我在莫斯科一次也没去过犹太教堂。我来到犹太教堂，看到科兹洛夫斯基、雷兹曼、乌乔索夫都在那儿。那儿开的是一场真正的音乐会。票我并不是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拿的。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唱完我就走了。在犹太教堂和我坐在一块的有克维特科、乌乔索夫。

在法庭提完了对祖斯金的所有问题之后，开始由被告

们提出问题。

贝格尔森请祖斯金讲一讲，他看出贝格尔森在剧院里上演的那些戏剧哪些地方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祖斯金否定了对贝格尔森的戏剧的这种指控。

希梅利奥维奇：祖斯金，请你说一说，你在莫斯科或是塔什干或是其他哪个城市，什么时候听到过没有有辱于我这个苏联公民和党员的意见，或是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行为有什么类似的问题？

祖斯金：一次也没有。我对你了解极少。

希梅利奥维奇：在你现在回答了我所提的问题之后，我在不了解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在预审时在你的供词上签了名字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你在预审时签了字的那些关于我，希梅利奥维奇的口供与事实不符合？是你出于某种缘故诬赖了我呢？

祖斯金：是的……

希梅利奥维奇：你记不记得《卖牛奶的台维》和《20万》演出过多少次？

祖斯金：《20万》演出过300~400次，《卖牛奶的台维》上演的次数要少得多，具体是多少次我记不得了。

希梅利奥维奇：你是否认为我现在问到你的这些演出活动唤起了观众对繁荣昌盛的往昔感到惋惜的情感，或者是这些戏剧表现了犹太人已经陷入了绝境？

祖斯金：《20万》这部戏是1923年上演的，在形式上是属于形式主义的。它表现了犹太人的阶级分化，剧中表现出富豪们做作出来的面目彼此是相似的，同时也表现了工人们的乐观愉快的精神。这本戏和莫里哀的《贵人迷》那部剧相似。对《卖牛奶的台维》那一部剧我要说，在米霍埃尔斯受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应得的申斥之后，那部戏就开始以另外一种编排形式演出了。卖牛奶的台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尽管生活中充满了风浪，他还是顽强不

屈地走过来了。

(审判)长：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为什么申斥了米霍埃尔斯？

祖斯金：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对米霍埃尔斯指出，他把犹太人表现得也太丑陋了。1938年这部戏演出时它已经是另一种样子了……

马尔基什：请问你，你在我的戏剧作品里发现了哪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你是否还记得起来我的作品中你所扮演过的那些角色身上民族主义是怎样表现的？

祖斯金：关于我提及的那两部戏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科尔尼德拉》那部剧我倒可以说一说。

马尔基什：那么是讲《科尔尼德拉》了。你是讲自己的想法还是转述米霍埃尔斯的看法呢？

祖斯金：我听过一次这部剧，我感到它是民族主义的。

马尔基什：你能不能从这部戏里举出哪怕是一个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的情节？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毫不含糊地对我说过部戏是民族主义的。

马尔基什：这话他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在我诵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在我走后？

祖斯金：米霍埃尔斯是在一次你没有参加的排演时这么说的。

费费尔：你在自己最后的供词中是讲过犹太会被多布鲁申、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马尔基什变成了间谍中心的话吗？

祖斯金：我否认这一点。

费费尔：你还供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去进行宣传工作，而是寄发间谍情报。这是你从42册案卷里面了解到的吗？

祖斯金：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讲的一切事情在被捕前我全都不知道。

对被告人祖斯金的审讯到此进行完毕。

审判庭没有休庭就开始审讯莉·所·什泰恩。

No 1172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什泰恩的审问记录

(1952年6月12日)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你向法庭供述一下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什泰恩：我要说我对自己的态度在开庭之前和今天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开初我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是今天我却不认为自己有罪了。我先前认为自己的罪过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科学院院士，既然同意了担任主席团委员，就应当对此事比较认真地对待，更多地关注那儿所做的事情，而我对此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能减轻我的罪过。了解了这42卷材料的内容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那儿干了很可怕的事情，于是我想我太轻视了这件事，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是有罪的。

从在这儿的法庭上，我又得出一个结论，我不能对此事承担什么重要的责任，因为即使我对一切都予以关注，那我也弄不懂这种事情的整个违法犯罪的性质，因此那里的情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还觉得这些卷册里边包含的内容比那边实际发生的事要多得多。

我的罪过在于我让自己有可能受到怀疑。恺撒的妻子是绝对不能有嫌疑的，或许应当说绝对不应该有嫌疑。对于一个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是可以怀疑的，对党员也可以，如果他的行为有可能引起怀疑的话。

早在我于法庭上了解到对委员会提出的那些指控之前我曾对自己说过，我应当承认自己犯了像哨兵站岗时睡着了那样的罪。如果

我受邀担任了主席团的委员，那我就等于是一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睡觉的哨兵，如果他偶然一次睡着了，那么他就应当为此受到一定的惩处。而我正是那个站岗睡着了的哨兵。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主动去关心，而不是满足于听别人说一切都做得很好。我应该去检查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可是我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对于科学问题我任何事情也不会不加证实就轻易相信的，我一切都要查证。在科学上我感到欣慰的是至今（我的第一篇论文写成至今已经整50年了）没有一次实验，没有一篇发表的论文会受到怀疑。因为在发表什么东西或是讲什么问题之前，我对一切都要仔细验证。我责备自己：为什么在科学上，在工作上我那么严格，那么谨慎，而在这一方面却对我所担任的主席团委员的工作如此轻率呢。但是我看不出，即使我细心关注这些活动，我又能做些什么，而这决定着该如何评价我的一生。

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我听得 very 仔细。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世界主义——对我的控告这两个方面都有。

（审判）长：这是你自己对自己这样控告的。

什泰恩：我要说，人们对你们讲的关于侦查过程的情形（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就是像他们说的那种样子。这样的侦查并不是侦查——这是引导法庭产生谬误。我话要说得尖锐些，我有时讲话是很尖锐的。这事被弄得乱七八糟……

（审判）长：是什么人把事情弄乱：是侦查的时候还是在法庭上？

什泰恩：问题就在这里：法庭本可以在2~3天内把一切问题都解决的。我把这42卷东西算弄清楚了——可我是习惯了工作、分析、阅读的。不过这件工作确实是异常困难的。

（审判）长：你是从什么时候担任主席团委员的？

什泰恩：给我的通知说1944年春我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审判) 长：在这之前你是委员会的成员吗？

什泰恩：也许把我登记成委员会的成员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审判) 长：预审时你说你从 1944 年做了主席团委员。那是在圆柱大厅开过群众大会之后不久的事。你最后一次去委员会是什么时候？

什泰恩：1947 年，我在会上发言讲致电抗议英国发生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问题那个时候。那好像是在 10 月份。总的说来 1947 年全年我就没到犹太会去过，也许总共去开过两次会。我是所有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苏联科学工作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总之是所有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我在科学工作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是很积极的。

(审判) 长：所有委员会的会议你都参加吗？

什泰恩：是的。我是很积极的。那正好是战争爆发之后不久那段时间。当时我经常发表讲话，因为我还是国际大学妇女组织，一个为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就是这样考虑到我同一些国际组织有联系，不断向我发出邀请，我也就多次用英语、法语、德语发表讲话。我在苏联科学工作者系统发表讲话也很积极。我组织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在阿拉木图，我曾疏散到那里去了一段时间，这个委员会的分会在鄂木斯克，第二医学院我领导的一个教研室曾经设在那里。

(审判) 长：什泰恩，你说一下，在做关于游击队的报告时你是否正出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议？

什泰恩：记得我是出席了会议，当时那儿正有一个人抱怨说……

(审判) 长：不接受犹太人参加白俄罗斯支队？

什泰恩：是的。在这儿我听到有人讲这个报告给某些被告留下的印象，但是我却认为它的意义根本不是这个。我知道同一次讲话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领会。

(审判)长：你供认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讲了在苏联犹太人受歧视的事，你坚持写信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机关，你的这些供述是真实的吗？

什泰恩：有过这事。我讲一讲关于这封信的情况。我把信写给了约·维·斯大林，而且信是有了一定的结果的。我在那次会议上讲的正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遭到了拒绝，那不能就认为是欺负犹太人，不能认为这就是歧视，不能认为这是来自上层，因为我有有力的根据说这是那个欺辱了你的人的个人创造”。

这被认为是我的反苏活动，因为除此之外在案卷材料里再也找不出什么来了。我要说，从我来到苏联那一天起，我还从未碰上过对我哪怕有一点点侮辱的事情。我用俄语表达意思比用我以前说惯了的语言要困难。

(审判)长：你说惯了哪种语言？

什泰恩：法语。

(审判)长：你曾供认，在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的会上谈到选题计划时，你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发了言。你要求委员会写更多的文章，对我国的报刊避而不谈犹太人的作用表示愤慨（第10卷的第83案卷页）……“在这次会上我重又提出了关于据说仿佛存在着歧视犹太人现象的问题，要求委员会向政府机关提出这个问题……”

什泰恩：不完全是这样。

(审判)长：侦讯时你曾经承认过，你对苏联的歧视犹太人问题提出过民族主义的建议。你对此加以认证吗？

什泰恩：我否认这一点，我已经相当成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

法。

(审判)长：你为什么否认？

什泰恩：因为这和我所想的不符。

(审判)长：你是一名党员，已近老年，又是科学院院士，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供词上签字呢？

什泰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样签的字，什么时候签的字。

(审判)长：讯问过你《埃尼凯特》报的事吗？

什泰恩：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份报纸，也从来没有给它写过稿子，假如，我给它写写稿子，读一读，也许是会有些好处的，但是我不会用这种语言写作。

(审判)长：关于英国发生蹂躏犹太人暴行那件事；那是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上。你在预审时供认：“……当提出要我在抗议蹂躏犹太人暴行的电文上签字的时候，我拒绝了”。问你为什么？“因为关于这件事的材料在我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还说了，我知道英国发生的个别一些蹂躏暴行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苏联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什泰恩：这不是我的供词。

(审判)长：这儿有你的签名。这是1952年1月30日的审讯记录（卷10，案卷页96）。

什泰恩：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是说应该核查一下是否真地发生了那些蹂躏暴行。我不习惯不进行核对就签字。

事情是这样的。说准备写一份抗议英国发生的蹂躏犹太人暴行的函电。这些事件我一点都不知道，虽然他们说这些都刊登在我国的报刊上。在这儿有人说我犯了一个政治性的错误，因为如果有人说准备写这样的抗议电文或者是某种呼吁书的话，那么这就是已经取得了上面的同意的，这差不多就等于是政府的指示。可是我不懂这些。另外，我很熟悉英国的情形，我了解人们在那儿的生活，说

那儿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觉得缺少根据。

(审判)长：可是那儿有法西斯分子活动啊？

什泰恩：那要看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在哪个小镇上有两个商人吵了起来，其中有一个是犹太人，正好把他的橱窗打碎了，如此等等，难道能把这种事说成是蹂躏暴行吗？

(审判)长：费费尔，你来说明一下是怎么个情形？

费费尔：当时《真理报》发了一条消息，说在英国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劳动报》对此事报道得比较详细。我读到这些消息后，就打电话问舒梅科：有没有必要抓住这件事写一份抗议书，以揭露在其任期内发生了这种事的工党政府。舒梅科告诉我，等他把这个问题磋商一下之后再给我打电话。过了一些时候舒梅科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份抗议书建议由我来写。我就写了一份有2~3页的抗议书，交给了党中央对外政策部。

对外政策部对这份抗议书进行了审查，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让我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通过这份抗议书。还提出这次主席团会议要有诸如什泰恩院士、马尔夏克、爱伦堡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物参加。这事是由米霍埃尔斯通知的。主席团会议的进行情况是正常的。所有出席的人都发了言，表示抗议。

我记得什泰恩提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

(审判)长：布雷格曼，你来说明一下是怎么个情形？

布雷格曼：什泰恩说了一句：“写抗议书之前应当看一看蹂躏暴行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的理解是她这句话是模棱两可的，在政治上改变了原有的意义。

费费尔：对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像方才布雷格曼讲的这种话我不记得。什泰恩对英国发生蹂躏暴行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不是应有的态度。我说《真理报》和《劳动报》刊登了这样的报道，这种事情的本身是令人不快的，不过这在英国是可能发生的，因为

那里发生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事件，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必须说什泰恩讲的这句话引起了反应，它的影响也是让人很不愉快的……

(审判)长：侦查员曾经向你宣读这份鉴定书的一些摘录，然后问你，你认为这份鉴定书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你说你对委员会进行间谍活动问题的鉴定结论没有异议，然后又说你本人并不知道这个委员会进行间谍活动。

什泰恩：对这些问题我并不懂。我认为，如果对什么事情进行争论并提出反对意见，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对这样一些问题我认为我并不大明白。

(审判)长：关于民族主义活动的鉴定书的内容你了解吗？那里面也提及了你的姓名。

什泰恩：那上面写道，我交给美国人一本学术论文集……

(审判)长：那已经属于你同外国人联系方面的事了，而现在的问题说的是你所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你曾经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做过民族主义的发言吗？

什泰恩：这事我无法想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许我就是个民族主义者。我得讲一下我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审判)长：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到选题计划的时候，提到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给犹太人带来了什么》这篇文章的问题。这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你在自己的发言中说，应当用另一个题目写文章，就是：《犹太人为苏维埃政权贡献了什么》。

什泰恩：这种讲法是带有一些偏见的。

(审判)长：可这是从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中摘出来的。

什泰恩：我是怎样理解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呢？我认为并不存在犹太人的民族问题。我无法想象存在没有疆土的民族。即便是

在苏联也没有生活在自己的疆土上的犹太人。如果说的是生活在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关于犹太民族我没有这个概念。

(审判)长：我向你提出问题，而你却给我讲关于犹太人的课。我提的问题是——你发言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声称，在报上应该写的不是苏联人民而是犹太人，要把犹太人摆到首位。你观察一切的出发点是——这会给犹太人带来什么？不是苏维埃政权给犹太人带来了什么，而是犹太人为苏维埃政权贡献了什么吗？

什泰恩：一切都取决于这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讲的。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来解释我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那么我就解释一下。我来到苏联，从未想到过在填写民族的时候我得填上我是犹太人，在这一栏里我总是写“苏联人”。我已经加入了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写“犹太人”？我从来没这么写过。后来跟我说必须这么填。既然说了必须这么填，我也就开始填写“犹太人”。但是这并不能反映任何问题，因为我是永远也不会否认自己的民族属性的。我想都没有想到过我处处都得标明我是犹太人。当然，我并没把这看成是一种屈辱。不是常讲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等等吗。

(审判)长：我们说的是一份记录着你讲过的话的具体文件。

什泰恩：在这里边不会记录有我讲的话的，因为我就没讲过这件事。

(审判)长：这不是写在审讯记录里，而是写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里的。

什泰恩：我来做个解释这相当于什么情况。即使是今天问我：我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或者不是，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回答不上来的。这被当作是一种罪行，而在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为什么说到犹太人要感到羞耻呢？

(审判)长：那你对一切现象都是从这会给犹太人带来什么这

样一种观点进行观察，这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什泰恩：我不是这样观察的。如果那上边是这样记着的话，那这只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我说话的方式带些法国的特点，我这样讲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审判)长：这么说，“犹太人会由此获得什么”是你的话了？

再下面。当委员会的会议上做关于游击队的报告时，那是在1944年8月30日，你问道：明斯克获得解放的民众是怎样接待从游击队归来的犹太人的家属的？是怎样安置他们的？有没有消息说明他们在做些什么？对此的回答是：城里人的情绪不好，市民有很多反犹太人的举动……

鉴定书对这件事写道，什泰恩极其蛮横无礼地公开表述了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立场，她说：“关于德国人所干的事情已经讲得和写得很充分了。现在我们重要的是要判明我们将要与之一起生活的那些人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要掌握那些现在正在罪责推脱得一干二净的人的姓名”。

什泰恩：这里有一点，还有这么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个教授在德国人占据时期当过市长。这样的人后来当然被揭露出来了。但是我说了，还是有一些人逃脱了罪责，对待这些人要小心，因为这是一些散布不愉快东西的人。

我知道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对待犹太人是很好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侄女，在德国人进入明斯克的时候她带着生病的老母、抱着孩子离开了那里。她对我讲过她的邻居怎么帮助她，人们怎么帮她抱孩子等等。在她重又回到明斯克的时候，她又受到了人们对她良好的对待。

(审判)长：你的发言总是说犹太人受欺负，对他们要求的太多。我现在宣读一下你在1947年10月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你说：“最后，我们该当……”等等（宣读）

什泰恩：我是说应该讲讲苏维埃政权给犹太人带来了什么。我看到每一家工厂、每一个机关都在写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3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而如果有必要单独写一写犹太人这方面的情况的话，那么我认为讲犹太人在这3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是更为正确的。如果说从前千百万人一无所有，如果说现今这些人获得了一切，成了教授、将军，也就是可以这样说，达到了文化的最高形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带给他们的。这样做不是很漂亮吗。苏维埃政权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好处，没有一个人从苏维埃政权那里一无所获。于是我就提出一个问题：“犹太人为苏维埃政权贡献了什么”，目的是想表明他们是用什么来回报对他们的关怀的。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不太久之前——1952年3月11日——检察长对你进行了审讯。当时曾向你出示关于提起控告的决定，其中说你犯了第58-1条a款规定的背叛祖国、第58-10条第II节规定的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活动及第58-11条规定的你加入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等项罪行。你回答说控告的实质你明白，你承认自己犯有下述罪行：从1944年起担任主席团委员，参与了由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克维特科及他们的其他一些同谋者指导的它的那些敌对活动；在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言时你讲过据说在苏联仿佛存在着压迫犹太人的现象。“在自己的熟人范围内我讲过有必要保存古犹太的语言和文化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我曾经给苏联政府首脑写信及反映虚妄的歧视犹太人现象……”（卷10，案卷页52）

你的这些供词是对的吗？

什泰恩：我该讲什么呢？当然，我不认为自己犯了第一、第二、第三任何一条罪。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从来没有散布过任何消息，从来没有造谣诽谤过。这有什么可特别进行争论的。在1950年，好像是3月份吧，检察长对我进行审讯的时候，那是一位将

军，我记不得他姓什么了……

(审判)长：我说的那位检察长是科茹拉大尉，记录是1952年3月11日的。

什泰恩：那是在科茹拉对我进行审讯的两年之前。

(审判)长：是尼古拉耶夫将军吗？

什泰恩：是的。他讯问时科马罗夫和侦查员拉斯瑟普宁斯基在场。当时我对他讲，事实本身是有的，但是对事实的解释却不对。对此尼古拉耶夫检察长告诉我，这些我可以到法庭上去说。

(审判)长：怎么是到法庭上！你受到了控告，也有可能你供认的东西会让你这个案件连法庭都到不了。我具体地问你：你是否承认曾在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言要求，委员会的领导人向政府提出保护据说仿佛是受到了歧视的犹太人的问题，从而犯了罪？

什泰恩：我说的是应该把流传的那些议论报告给政府。我认为这件事用不着保护任何人，但是应该给传播这些流言的人打手板子或是敲打敲打他的脑袋。

(审判)长：委员会应当进行反宣传，而如果有个别的反犹太人事件，举例说祖斯金作为犹太人受到了侮辱，那么他可以提出申诉，有刑法——根据该法第59-7条款，任何一个侮辱了他民族感情的人都应负刑事责任。为什么要你来讨论这些问题？现在你被控告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因为委员会成了这一切的中心。

什泰恩：在主席团的会议上只有一次提出了收到好些封申诉歧视犹太人的信件。

(审判)长：是谁在主席团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什泰恩：我不记得了，大部分主席团委员我都不认识。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说，既然收到这种申诉，那么就该报告政府有这种现象存在。而且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尽管也许不是像他们讲的那种样子。举例说吧，有哪一个犹太人没有被高等学校

录取或是被解除了工作。可是他不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资质不适合做这种事，而说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才这么办的。

(审判)长：怎么，你莫非不知道那些把俄罗斯人，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免职、开除出党、送上法庭等等的事例吗？

什泰恩：问题是在1943年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足以表明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加以区别的事情。在1943年，那是春天的时候，一个同事——施托尔教授来找我。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建议他申请辞职，并且告诉他，他的情况不会改变，他将保留自己的实验室、工薪，但不能主持教研室的工作了。施托尔问：“理由是什么？”校长回答他说，在罗蒙诺索夫学府^①一个教研室由犹太人领导这不合适，并且给他举出了好些其他的已经离职的人。

因为施托尔以前曾经在我那个研究所工作过，所以他认为我会接受他回到我那里去，可是我却告诉他不要理会这件事，也不要申请辞职。

可是问题在于校长曾对他解释，据他说仿佛有这么一项决定。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根本不要去理会这件事。如果他想免除你的职务，就让他去免好了，还有对他的作为进行申诉的权利呢……

(审判)长：就是说你否认你曾做过这样的发言？

什泰恩：我再说一遍，我的发言提到过我昨天讲的那封信。

(审判)长：哪封信？

什泰恩：我给约·维·斯大林写的那封信。

我想讲一件极好的事例。我担任过一本出版多年并为人提供了很多帮助的医学杂志的主编。编辑委员会有两位工作人员，确切说是两位秘书，姓的是非俄罗斯人的姓氏。我被叫去告知，这两名秘书须换掉。那是1943年那个时候。“为什么呢？”我问道。“必须换

^① 即莫斯科大学。

掉。”别的什么话也不跟我讲。我不同意。就对我说，你是一名党员，你了解了原因之后就不会再有异议，不会不同意了。有这样一项决定：必须减少编辑部的犹太人的数量。你要知道，他说，希特勒撒传单说苏联到处都是犹太人，这贬低了俄罗斯人民的文明程度。

（审判）长：这是谁说的？

什泰恩：科学院院士谢尔盖耶夫说的。

（审判）长：他是什么人？

什泰恩：医学科学院正式院士，研究所所长。他还说，有一个决定，要求减少犹太人的数量——领导人员、主任医师几乎要减掉90%，等等。我说如果这么对待这件事，那么我也得撤掉，我的姓氏也不是俄罗斯人的。他回答说国外对我太熟悉了，因此这事牵涉不到我。我说我无法同意这种建议，我还得考虑考虑。

当天晚上我在科学院的一次什么会议上碰到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他是科学院院士），我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定。他瞪大了双眼说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应该把这事报告给有关部门，他当时就对我说，如果我能给约·维·斯大林写一封信，那更好。过了不长时间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马林科夫和沙塔林在那里。马林科夫对我关切而周到，他说，约·维·斯大林把我的信转给了他，还建议找我谈一谈。我和他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对他表明我一刻也不怀疑这是敌人干出来的事，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也有可能出了发出这样指示的那种人。

格·马·马林科夫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搞破坏活动的间谍及其他的人被不断地秘密派到苏联来，这种事是有可能的。他还痛斥了谢尔盖耶夫。对我却说我的做法是正当的，必须把编辑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也确实，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切都立即终止了。希梅利奥维奇说得对，米季列夫受到了好一顿的痛斥。我认为我履行了一个苏联人和一名党员的义务。

(审判)长：可是你为什么非得要在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什泰恩：我对大众更为熟悉。如果一个人开始进行申诉，那么他就不会仅限于提起申诉了，他会把这些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听，这样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害。事情的这一个方面比公开讲这些事还要危险得多。有的人干有害于国家的勾当却利用党和政府的指示作掩护，他们造成的损害很大。我认为我公开讲这种事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

(审判)长：你的供词里边说，你在自己的朋友范围内发表过民族主义的观点？

什泰恩：我不是古犹太语的拥护者，我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在我们家里一直是讲德语的。

(审判)长：你曾向检察长供说，在我们国家西方科学的成就受到忽视？

什泰恩：我一贯持有，现在依然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必须讲它的历史。我只能根据一个问题的历史来写自己的学术著作。

(审判)长：可是你说过，我国的科学落后于西方的科学，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什泰恩：在科学领域内有一些问题不仅是在我国，而且也在英、法等等国家同时进行研究解决。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决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地方所做的事情。我不能想象只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科学。我不否认我国科学思想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有成就，但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如果以原子能问题来说，那么它是源于门捷列夫的著作，源于他的周期系。这些都是我国化学的基础，但是也不可忽视在我们周围所做的事情。我这个人不大懂政治问题，但是我在科学领域工作了50年，我认为我们不能同任何人

隔绝孤立起来。这一点我对我的同事们也说过。

(审判)长：1949年2月10日审讯时(卷9,案卷页73)你说过,科学超脱于政治之外(宣读)……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吧?

什泰恩：这是侦查员写的。这已经是他的作品了。

(审判)长：你不同意这些吗?

什泰恩：我认为科学确实应该超越于政治之外,至于其余的东西,那都是侦查员写上去的。

我说过科学没有国界,没有祖国,只有艺术有它自己的祖国。如果我们随便拿一个科学问题,看一看它是怎样发展的……;难道能够说科学有祖国或者是背叛祖国。而什么是抽象科学或者非抽象科学,那我不知道。当然,是有有祖国的科学的;例如说政治经济学和一般地说所有的政治科学,它们毫无疑义是同祖国,同国体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国际性的。

(审判)长：就是说,依你看这些供词记录得不对?

什泰恩：是的,记得不对。

(审判)长：那么抽象的世界科学思想理论呢?

什泰恩：我不知道什么叫作抽象科学。我能在这儿对你讲话我已经很知足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本人弄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自己为人诚实,率直,也许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这儿有很多问题我一点儿也弄不懂……

(审判)长：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事弄清楚。我问你,你曾经供认,你来到这里,来到苏联之后,看清了由于你是在国外的环境中接受的教养,因而这里有许多事情与你格格不入,另外对在初期你的工作没有得到赞同你感到不满,所以你保持了敌对的立场,是这样的吗?

什泰恩：我在日内瓦一切都很充裕,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一切都放弃了,我放弃就是为了在苏联工作,我每年都要被派到国外

去出差，我有许多机会留在那里，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

(审判)长：你最后一次到国外去是哪一年？

什泰恩：1935年。1936年我也有机会到那里去，但是我拒绝了。假如我有反苏情绪，我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回到国外去。在那边住宅和教研室给我保留了5年，他们以为我会回去的。我当然并不后悔，我到这里是来对了。

(审判)长：你还被控同美国人有联系，向他们提供关于科学问题的间谍情报？

什泰恩：当然不是那么回事。

接着审判庭具体审查莉·所·什泰恩分别同外国的科学家——包括英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化学家特里普、大微生物学家、教授马德等等人在内——的会见。虽然莉·所·什泰恩断言，同特里普和马德的交谈具有极强的学术性质，其中谈到在医学上使用链霉素的方法，顺便说，这两位英国科学家还给了她1200克链霉素，但是审判长总结起诉书中讲的这些情节时，还是指出了：

(审判)长：到那个时候你入党已经有10来年了，应该知道警惕性、谨慎小心等等问题了。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不能这样轻易地相信人。

什泰恩：如果不是轻信，我也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了，但是我并不为我轻信感到懊悔。我今天站到了法庭上，我明白我的每一句错误的或是不小心的话都可能对我有害，然而我想到我的坦率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坏处还是很愉快的。我是一个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我并不为此感到懊悔。我有幸结识一些很好的人，我有幸，也有机会见过我国一些最优秀的人。在国外，比如说在日内瓦，我的朋友也是一些极其优秀的人。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人。这些人后来对我们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说，如果我的朋友当中没有

这样一批人，我对生活的看法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你说得完全正确，我对所有的人都是很容易相信的。如果将来我还会活下去，那么在未来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审判)长：审判庭再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了。

什泰恩：我想对法庭讲一讲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审判)长：你的履历我们很清楚。

什泰恩：我没有写过履历。

(审判)长：我们知道你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在日内瓦读过书，在那儿受了高等教育，然后从事学术活动。1924年由巴赫院士推荐来到这里，在这里开始在科学院工作。对这种活动没有人控告你。

什泰恩：讲一讲自己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请求给我一个机会说说自己，好让你知道你审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说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那这还不意味着我必定要和苏维埃政权作对。

(审判)长：这是你自己说的。

什泰恩：当然，我接受的是另外的一种教养。我从不会对一个人说他在撒谎，而是说他弄错了，尤泽福维奇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只不过是他的印象而已。我想讲一讲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法庭准许我这么做。

(审判)长：讲吧。不过你说一下，你确认你受侦讯时所做的供述吗？

什泰恩：不，一份供词也不确认。

(审判)长：为什么呢？

什泰恩：因为那里边没有一句话是我说的。

(审判)长：那你怎么在上面签字了呢？

什泰恩：我讲一讲当时的情形。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感到

大惑不解。那是在7层楼上，对待我的方式很奇怪。房间里边的人很多，那儿坐了好几位上校、将军，马上给我提出问题，我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苏联的，是什么人派我来的，我是为哪些老板干事的。这听起来好像我是到苏联来当间谍和搞破坏的。我感到莫名其妙。我问什么老板，什么任务？……然后过了两天我被叫到部长那里去。他问我：你认识热姆丘任娜吗？我说——认识。问是什么样的交情。我说是在丘吉尔夫人的招待会上和她认识的，后来她来研究所的时候我又碰上过她一次。问我为什么要和她谈话，以及她为什么来找我。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和她认识了一下，我认识的人多啦。部长说：“你考虑考虑，过几天把一切都对我坦白地讲出来，如果你能全讲出来，你就可以回去干自己的工作”。我等待着传唤，可是我却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感到痛心，我的工作本来进展得很顺利的。就拿我研制链霉素的工作来说吧，我已经救治过好几个人了。在被捕前给我写来了很多感谢信。

（审判）长：就是说你承认了自己犯罪？

什泰恩：在哪儿？

（审判）长：在预审过程中。

什泰恩：我什么罪都没有承认，我在记录上签字是为了从这儿出去。

（审判）长：你自己在承认进行过反苏活动的供词上签了字，你还怎么能从这儿出去呢？

什泰恩：我曾希望有机会同部长谈一谈。我要说我有充足的印象说明正在给我搜寻犯罪的要件。假如我有反苏的情绪，那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到这里来并且留在这儿呢？我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出差，有那么多的机会留在那儿。照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吸引我回到这里来呢？我为什么离开了把我教养大的那个环境？总不会是为了在这里过更好的生活吧，我的一切都是很充裕的，我也不寻求荣誉，荣

誉我也是有的。这也许有失体面，但是我不得不说说我自己。人家告诉我，每逢要列举3个生理学家的名字的时候，其中总会有我的名字。我为什么到苏联来呢？因为我认为这里正在创造一个最美好的世界，我有一切根据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认识日内瓦那些最优秀的人物……

（审判）长：预审时你曾经供认，你进行了反苏活动。这与你的志向怎么可能兼容并存呢？

什泰恩：如果你能观察一下进行侦讯的过程，你对我因不愿在侦查员写的那部小说上签字，而3次被从内部监狱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这一事实会做出何种解释呢。

（审判）长：那里是监狱这里也是监狱，这有什么区别呢？

什泰恩：那个地方是进入地狱的大门，或许偶而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那儿都搞些什么勾当。我诉怨的不是被关进单人囚室，一个人比和坏人待在一起要好……当我在最长的一份记录上签名时，我看到这是把几次审讯糅合到一起的东西。我在那个地方被关了3周，其间我被传唤到这里来一次。那是2月初的事，我在这儿待了10天之后，由于没有问出什么来，我又被送到了那里。那儿房里的地是水泥的，牢房供暖很差，通风窗很小，还不总打开，而且伙食极差，令我难以下咽。在这种地方到底能支持多久呢。我可不想死。今天我还是不想死，因为我还没有为科学事业做完我应做的一切。我在苏联所做的事情，我认为从医治人这个方面说是最近10年最为宏大的工作之一。

22时25分审判长中断了对莉·所·什泰恩的审讯，宣布休庭。到此，1952年6月12日（星期四）的开庭审讯结束。一直过了两周，到6月26日才接着开庭。审判庭没有恢复对什泰恩的审讯，而是秘密开庭对鉴定的结果进行调查。

№03418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6日)

1952年6月26日12时30分，鉴定人阿·马·索尔达托夫—费多托夫、列·彼·奥利尚斯基到庭。鉴定人基塞尔则因为休假没有出庭。

审判长查验出庭的是否确为鉴定人本人，鉴定人对自己的身份陈述如下：

——我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索尔达托夫—费多托夫，是联共（布）党员，大学文化程度，文学系毕业。自1946年起在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工作，现今任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第五科副科长。

——我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奥利尚斯基，1919年加入联共（布）党，大学文化程度，现任苏联军械部属下监察局副局长，公务的性质同判定文件和情报的保密等级有关。

对法庭的提问由索尔达托夫—费多托夫作答。

问：鉴定组就苏联安全部要案侦查处处长助理1952年1月18日决定中1~78项所列文件做出了案情结论（1952年1月30日），对这一结论鉴定组是否予以确认？

答：是的，我们确认我们1952年1月30日所做的我们的鉴定结论。

问：鉴定组阅读的是上述决定1~78项所列文件的原件，还是提供给鉴定组审看的是这些文件的复制件和作为物证附在此案卷宗里的这些文件的摘录呢？

答：供我们使用的是这些文件的复制件，这些都已经附在本案我们出具的鉴定书上了。在我们分析这些材料时，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文件的原件存放在什么地方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依据预审机关提供给我们的那些材料得出结论。

问：是否曾把犹太会的案卷、卷宗和与上述文件相关的派工单原件提供给鉴定组使用，鉴定组是否对这些文件的登记单原件进行了验证肯定，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鉴定组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登记单附在案卷里？

答：原本的案卷和犹太会的卷宗没有交送鉴定组。提供给我们材料复制件也没有带登记单。

问：鉴定组是否已经查明它所审看的文件中有哪些已经寄送到国外去了？

答：侦查机关没有对鉴定组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审看材料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都已经寄送到国外去了。我们也无法说出在犹太会里发寄这些文件的程序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依照现行的规定，一切寄往国外的材料都必须经过书刊检查机关的仔细审查。在这件事情上我很难说这些材料是否经过了书刊检查。

假如说鉴定组在给出自己的结论时，是知道所有这些材料都是按照规定的程序通过了书刊检查的，那么，我确信我们对这些材料就会是另外一种态度了。我们认为这些材料是经过某种其他的渠道，避开了书刊检查机关寄往国外的……

问：鉴定组是否已经根据登记证查出了准许把这些文件寄往国外的那些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检查员和其他的负责人员的姓名？

答：由于我们这些进行鉴定的人认为，犹太会的全部材料都是通过非官方的途径，某些秘密的渠道寄往国外的，所以我们就没有产生过调查是哪些检查员对这些材料进行的审查这个问题。况且

文件又没有带可以表明这些材料是经过书刊检查机关相应的审查之后，经由官方途径寄送到国外去的登记证。

问：为什么鉴定组在判定犹委会文章中信息的机密等级时依据的是1945年的，而不是1948年的出版目录呢，在鉴定组进行工作的那个时期，1945年的目录还有效吗？

答：我们以1945年的目录作依据，是因为这个目录直接规定了这样或那样的信息是否可以在公开的报刊上刊载，而1948年颁布的部长会议的目录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具体。1945年的目录从1948年起就已经不再有效。

问：鉴定组是根据什么资料做出的结论，说从美国发给犹委会的那些征询和信函是来自于美国的反动的而非进步的群体的代表呢？

答：这是基塞尔的说法，我们同意了。现在我们无法肯定这些征询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反动群体，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这一点的确切情报……

问：鉴定组根据什么做出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期间曾经做出保证向美国人通告国家机密资料的？

答：我们是在阅读了备忘录的摘录之后得出了这种结论的，这些摘录里边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保证向美国寄送关于犹太自治州——其中包括人口、工业、文化设施等等——的情报。我们认为，国外要的材料只可能是国家的机密。

也是根据这份文件我们得出结论：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的这种活动是间谍活动。我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出进行间谍活动和经济间谍活动的结论是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的。

问：请你给审判庭讲一讲你们鉴定犹委会材料的工作程序。

答：我们被召到安全部的侦查处，要我们阅看案卷里边的那些文件，然后对问题做出答复。

我——索尔达托夫—费多托夫和基塞尔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而奥利尚斯基是在鉴定书已经差不多写好了的时候，才参加到这项工作里边来的。

在我们研究这些材料的期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奥利尚斯基。我在这儿的法庭上是第一次和他碰面。

我们在研读侦查机关提供给我们的材料的基础上，对案卷做出了自己的结论，结论的写作者，确切说是编辑人，是基塞尔……

对某些文件我们在鉴定书中加上了附带条件，即某一篇文章里所载的资料，如果以前曾在苏联的正式报刊上发表过，则不构成国家机密。

我们加这样的附带条件，是由于我们不可能调查明白以前是否发表过这些资料的事实，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所必需的能够说明犹委会文章所载的消息中，哪一些从前在苏联的正式报刊上登过，哪些没登过的正式资料。

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向侦查机关做过声明，对此给我们的回答是：这和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鉴定人奥利尚斯基对审判长的问题回答如下：

——我在最后参加了鉴定工作，不过，在侦查员关于吸收我做本案鉴定人的决定上，1952年1月30日这个日期与实际不符。

关于吸收我为鉴定人的文件，我是与在鉴定书上签字的同时签的字。

确实，当我着手工作的时候，鉴定结论，就是鉴定书，已经由鉴定人基塞尔几乎全都写好了。

那是我们工作结束之前的3~4天。

问：《埃尼凯特》报上是否刊登过下面这些文章：第聂伯罗夫的《苏联工业的新任务》；哈温的《在哈萨克斯坦的远山之中一个开采磷钙石的储量丰富的矿场即将建成》；谢格洛夫的《听莫洛托

夫同志做报告》；所罗门诺夫的《和平劳动的第一批成果》；赖泽尔的《在新的环境中》？上述文章是否发给了外国？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鉴定组能否（指出）是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哪些检查员和犹太委员会的哪些负责人准许寄发和刊登这些文章的，是在什么时候，能否具体说明这些文章里面包含有国家机密的信息是什么原因？

答：鉴定组无法回答上述文章是否寄往国外，或是否曾在《埃尼凯特》报上刊载的问题，因为侦查机关没有给它提出这样的任务。

鉴定组认为，下列文章里所含信息的情况是：

(1) 第聂伯罗夫的文章——表明军工厂转产和平时期的产品，另外还指明了这些工厂的所在地，等等；

(2) 哈温的文章——《在哈萨克斯坦的远山之中》暴露了哈萨克斯坦磷钙石的储藏量；

(3) 谢格洛夫的文章——《听莫洛托夫同志做报告》是关于苏联工业的一篇概述性资料。谢格洛夫援引的苏联报刊超出了鉴定组的视野范围；

(4) 所罗门诺夫的《和平劳动的第一批成果》和赖泽尔的《在新的环境中》两篇文章里也含有这样的概述性资料。

根据1945年颁布的供公开报刊用的信息目录，鉴定组认为此类信息只有经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准许才可发表。是否获得了这种准许，不在鉴定组的任务范围之内……

至于我们对扎别利申斯基的那篇《有色金属》的文章所做的结论，我可以说虽然此文曾刊登在《红海军》日报上，我们还是得出结论，把这篇文章寄往国外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

1945年的目录规定了发表关于工业和铁路运输的资料的特别程序。这一类的信息只有得到部长会议的代表准许才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我们正是根据这一规定给这样的文章，其中包括尤泽福维

奇那篇讲到建设新的铁路线的文章，做出自己的结论的。

我还想说，如果在我们审看的文章当中有通过了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检查的文章，那么应该把这些文章从我们的鉴定书中删掉。关于此事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问：鉴定组以 1945 年的目录作依据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还是侦查机关指定的？

答：苏联安全部要案侦查处处长助理格里沙耶夫中校当时就告诉我们，在我们评定交给我们的那些材料的机密等级时，必须使用 1945 年的目录。1945 年的目录把所有关于在报刊上发表材料的问题都汇集到了一起，它是惟一的一份这样的目录。实际上这份目录并没把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罗列出来，而是指出哪些信息禁止发表。

鉴定组没有向侦查机关提出采用 1948 年的目录的问题。

问：鉴定组对自己的证言还有什么补充？

答：我们在这儿的法庭上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在预审时提出的结论不全面且有局限性。弄成了这样一种情形：由于我们没有弄明白研究材料并对之做出结论的时候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和职责及所享有的权利，鉴定组没有要求侦查机关提供为做出全面而正确的结论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我们当时认为，既然是把一些复制的文件交给我们阅看，那就是说该是这么办。

在给出结论的时候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绕过了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检查机关的检查，通过秘密途径发到国外去的。所以我们没有去调查应对发寄这些材料负责的检查员和编辑们的姓名。

可以做这样的论断：在现行的对报刊的监督制度下，没有可能在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含有机密资料的文章，或许刊出过某一篇个别的文章，但这只可能是极个别的错误。

此外，鉴定组对自己的证言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14时30分宣布休庭。鉴定人被要求对审判庭的提问做出书面回答。19时45分审判庭继续开庭。索尔达托夫—费多托夫代表鉴定组宣读了该组对审判庭的提问所做的书面回答。

审判庭在听取了鉴定人的回答后决定：“将鉴定组对审判庭提问的书面回答附在控告伊·所·费费尔等人的刑事案件卷中”。20时30分审判长宣布审判庭闭庭。

№03419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和 证人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7日)

根据法庭的决定，鉴定人索·雅·戈多夫斯卡娅出庭。另一名鉴定人菲格利曼没有到庭，因为正在克里木沿岸例行休假。

审判长查验出庭的是否确为鉴定人索·雅·戈多夫斯卡娅本人，鉴定人对自己的身份陈述如下：

——我叫索菲娅·雅科夫列夫娜·戈多夫斯卡娅，1927年加入联共（布），大学文化程度，现任全苏书刊出版登记局书刊年鉴高级图书编目员，熟练掌握犹太语。

戈多夫斯卡娅确认了由她和鉴定人菲格利曼共同出具的1952年3月12日对纽约1932年用犹太文出版的列昂·雅科夫列维奇·塔尔米所著《在处女地上》一书的鉴定结论。

接着戈多夫斯卡娅回答了法庭的提问。

问：鉴定人对自己的结论：《在处女地上》一书描绘的全是诽谤性的、被歪曲了的远东苏联人的生活情景，是否予以确认，另外该书是否也写了苏联现实的好的方面？

答：《在处女地上》这本书一开头并没有诽谤的倾向，可是书后面的内容对苏联的现实就有诽谤了。

比如说，塔尔米把哈巴罗夫斯克市描写成一个设备简陋、建筑

得很差的城市，并把这归咎于该市的居民……在另外一个情节中，塔尔米写了一个俄罗斯村庄和一个朝鲜村庄，并把两者做了并非有利于俄罗斯村庄的对比。

塔尔米写道，这个俄罗斯村庄虽然只有3~4年的历史，但情况却比那个朝鲜村庄差远了。

我理解这个情节是强调俄罗斯族的苏联公民懒于去修建他们的完善设施。

也许别的人对这个情节会有不同的领会，但是我个人就是像我上面说的这样理解的。我向侦查员申述了关于这个情节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的疑惑。

我感到，从我这方面讲，3~4天的时间阅读分析这部书就给出对此书的这种结论是一种过于轻率的行为。我认为更为适当的办法是把此书全文翻译出来，使法庭有可能亲自客观地去了解它的内容。

问：鉴定人是否确认《在处女地上》一书中有一些构成国家机密的信息？

答：在塔尔米所著《在处女地上》这部书中，有几个情节据我们看在当时是国家机密。

比如说，对金矿的描写，中东铁路上发生冲突时苏联炮舰停泊的位置，对制材厂的描写，比罗比詹工业的增长，等等。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记载在鉴定书的第10~12页上了。

13时25分宣布休庭。休庭过后，14时35分戈多夫斯卡娅当庭宣读了对审判庭提问的书面回答。

对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书面的回答是这样的：“书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把这些举列在第10~12页上了）据我们看在那个时候是国家机密。除所举的事例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事实。也可能就连我们所列举的事例也不构成国

家机密”。

14时45分宣布休庭。10分钟后，14时55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继续秘密开庭审讯。

书记员报告，被传唤出庭的证人尼·尼·普赫洛夫到庭。

审判长查验出庭的是否确为证人尼·尼·普赫洛夫本人，证人对自己的身份陈述如下：

——我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赫洛夫，1912年生人，1929年加入联共（布），大学文化程度，以前曾担任过第205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现今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普赫洛夫回答了法庭的提问。

（审判）长：证人普赫洛夫，你对法庭讲一讲你所了解的在第205所编写关于英国的殖民政策的材料的情况，这份材料根据洛佐夫斯基的请求由你转给了苏联情报局，后来洛佐夫斯基又把它寄到国外去了。

普赫洛夫：1946年帕纽什金同志给我打电话说，需要编写一份概述外国报刊和广播有关英国的殖民政策的消息的资料。同时帕纽什金同志说，这份材料要送到苏联情报局给洛佐夫斯基，然后再把它转交给某一个进步的外国记者。帕纽什金同志说明材料基本上要从英国的报刊和广播中选，好用英国的材料打英国自己的嘴。

这份概述是根据英国报刊上刊登的和英国广播电台播出的材料编写成的。帕纽什金同志对我说，在所里边编写出来的这份文件要在苏联情报局进行文学加工，然后交由一位进步的外国记者到国外去发表。

1949年因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索要，我把所里保存的这份文件的副本给他送了去，而他又把该件转给了安全部的原部长阿巴库莫夫。

后来这份材料被归还给联共（布）中央，在那儿被存入了档案。

1952年3月，我又把它从档案里找出来，送给了伊格纳季耶夫^①同志的秘书室，目前它就在那儿存放着。

在联共（布）中央的档案馆里有这份材料送给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时所附的送件函的附本。

我认为这是一份秘密材料，因为它是在一个保密的研究所里写成的，假如它在国外发表之后让人家知道了这份材料是在属联共（布）中央管辖的机关里准备的，那就会很难堪。

但是我不认为这份文件从内容上说是国家的机密，因为它是根据外国报刊和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编写的……

审判长宣读从审讯尼·尼·普赫洛夫的记录中摘出的部分（卷31，案卷页1~4）。

普赫洛夫：据我看，这份记录删掉了我评估那个关于英国的殖民政策的材料的机密等级及讲那材料是按照帕纽什金的指示编写的那些证词。

接着证人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他说：“预审时我受到两次审问，可是两次审问只做了一份有5~6张正反两面写的纸的记录。

我不知道为什么案卷只附了记录的复制件，准确说是记录的摘录，而不是记录的原件。审讯时我除了对第205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格林杰尔同尤泽福维奇的联系过于密切表示疑惑之外，没有谈及任何其他的问题。这两次同侦查员的谈话都是围绕着那份关于英国的殖民政策的材料进行的”。

17时10分审判长宣布闭庭。

^① 伊格纳季耶夫·谢·杰（1904~1983），曾任联共（布）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部长，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03420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鉴定结果的调查记录

(1952年6月28日)

1952年6月28日，星期六，13时10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又一次秘密开庭审讯。鉴定人尤·鲍·卢金、格·伊·弗拉德金和谢·弗·叶夫根诺夫出庭。审判长查验出庭的是否确为鉴定人本人，鉴定人对自己的身份陈述如下：

——我叫尤里·鲍里索维奇·卢金，是《真理报》编辑部文学艺术部副主任，大学文化程度，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民族学系文学专业，非党员。

——我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弗拉德金，苏联作家协会对外委员会主席，文艺批评家，语言学副博士，联共（布）党员。

——我叫谢苗·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夫根诺夫，苏联作协理事会副责任秘书，《各族人民友谊》文集编委会委员，批评家，文化程度大学肄业，1931年加入联共（布）党。

鉴定人谢尔比纳因休假没有出庭。

鉴定人回答了法庭的提问。叶夫根诺夫讲述了鉴定人进行工作的情形：“小组的所有人员都是在同一天，1952年1月下旬旬初，着手研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材料。在各个文件上正式记载的是1952年2月13日。一开始我们被召到了苏联安全部，在那个地方格里沙耶夫中校

口头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后来过了2.5~3周，他又把这件事写成了记录。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一块工作的，每天大约工作9个小时，星期天除外。鉴定人谢尔比纳由于本职工作排得很满，所以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要少。

侦查机关提出了大量的文件要我们研究，其中有一部分我们未能使用，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可能把它们作为民族主义的东西包括进鉴定书中去。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的著作。鉴定人还读了伊·爱伦堡写的《关于一封信》那篇文章。

小组总计工作了一个多月”。

问：鉴定组阅读的是上述决定第1~122项所指明的文件原件，还是给鉴定人阅读的是这些文件的复制件和作为物证附在此案案卷中的这些文件的摘录？

叶夫根诺夫：交给鉴定组的犹委会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几乎全部是复制件。我们选出其中的一部分加进鉴定书中，这些东西现在作为物证附在本案的案卷里边。

问：是否曾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的卷宗、案卷和同上述文件相关的派工单提供给鉴定组使用，鉴定组是否对这些文件的登记单原件进行了验证肯定，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鉴定组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登记单附在文件上？

叶夫根诺夫：鉴定组没有任何卷宗和案卷的原件，我们认为，既然复制件上有安全部工作人员的签名，那么这些文件就是正式的……

问：除了《埃尼凯特》报的编辑和犹委会的领导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应该对在《埃尼凯特》报上刊登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负责？

弗拉德金：第一，既然犹委会属苏联情报局管辖，那么苏联情

报局的局长洛佐夫斯基也应当对此负有责任。另外，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审查这些文章的检查员们和联共（布）中央监管这家报纸内容的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叶夫根诺夫：还要说一下，从交给我们的全部材料中，我们只挑选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材料，但是那里边也有很多内容符合苏联精神的好文章……

问：能否认定犹委会正式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弗拉德金：我们从侦查机关那里得知，解散犹委会的原因是它的活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我们对犹委会群众大会上发言的文本进行审查研究，从中发现了民族主义的言论。

我们认为，团结全世界的犹太人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是应该宣传的，但是不能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可犹委会正是滑向这种立场上去了。

此外我想说，我们不知道，我们鉴定组对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和文章，包括我国报刊发表的在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认定将会被用来对犹委会的领导人进行刑事控告……

问：鉴定组得出结论，说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是在洛佐夫斯基的支持下进行的（卷 33，案卷页 60），其根据是什么？

叶夫根诺夫：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对格里沙耶夫中校声明，我们无法对洛佐夫斯基同犹委会的关系做出广泛的阐述。

我们做出这种结论的根据，是在犹委会的文件中多处举证说洛佐夫斯基帮助犹委会进行工作，就某些问题征求他的同意，甚至在 1946 年之后也是如此。

卢金：（对叶夫根诺夫和弗拉德金的证词补充如下）我想要说明，在我们审阅犹委会材料期间，我们该当产生一个疑问：怎么竟

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呢。

我想，如果检查员事先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启发，一篇文章或是文章中的一句话可能还不会让他想到犹太会的整个工作有问题。可是交给我们鉴定人员一大批这样的文件，而且我们都已经有了要在这些文件里寻找的正是一些有问题的东西的精神准备，这些材料的民族主义性质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心情沉重的印象。

问：据鉴定组看是什么人把犹太会变成了在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鉴定组为什么认为犹太会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卷33，案卷页33）？

叶夫根诺夫：没有给鉴定组提出过犹太会每一个成员的犯罪构成要件和个人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自己的结论中仅仅指出了犹太会主席团委员中有哪些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比较突出，比如说我们根据一些人在犹太会主席团会议上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点出了什泰恩、希梅利奥维奇等等人的名字。

鉴定组掌握了一些说明犹太会管起了不属其职权范围的问题的事实，例如把疏散出来的犹太人遣回乌克兰和克里木，对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和物质方面的问题提出申请，最后还有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这些事实使我们有根据下结论说犹太会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这一点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情况得到证实：在以色列国建立起来的时候，犹太会围绕着这件事掀起了一股十分激越的民族情绪的狂潮，直至组织广播群众大会。

弗拉德金：我还想强调一下在讨论致苏斯洛夫同志的信的时候希梅利奥维奇的一句插话，希梅利奥维奇说应该从这封信里划掉关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的说法。此外，对待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在那儿安置波兰的犹太人的问题，在不同意选定比罗比詹的事情上，犹太会的活动都有耍两面手腕的因素。

问：鉴定组对自己的证言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叶夫根诺夫：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曾想了解政府方面在撤销犹委会的时候是个什么说法。格里沙耶夫中校告诉我们，犹委会是被作为民族主义的中心而撤销的。根据这一点，又加上看到犹委会把他们的记者作为全权代表派到苏联各地，这些人把从美国送来的钱款和包裹全部分发给犹太人，犹委会的领导人就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上进行活动，这样我们才表示确信犹委会在激发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国外人们已经把它认作是犹太人的官方机构了。

根据这些我们认为，客观地说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护犹太人据说仿佛是受到了妨碍的权力的民族主义中心。那些落后的犹太人就是这么看待这事的。

对犹委会的这些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的活动做一个评估，可以这么说：在这一方面第一阶段是米霍埃尔斯和米霍埃尔斯最好的朋友希梅利奥维奇起了特殊的作用，后来，在第二阶段，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接下来是什泰恩和马尔基什，什泰恩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而且出生就是；马尔基什虽然几乎是没有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发表的关于米霍埃尔斯之死的诗作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性质……

假如侦查机关是像在这儿的法庭上这样给我们提出问题的，也许我们的结论会更加全面一些。不过在我们拟定鉴定书的过程中，我们曾定期地把它送给安全部的侦查处审看，看来那边对鉴定书是满意的。

弗拉德金：（补充说）我想再一次说明，1952年2月23日的鉴定书反映了我们完全确信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发往国外及《埃尼凯特》报刊登的那些犹委会的文章，也就是我们鉴定组研究的这些材料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接着鉴定人叶夫根诺夫、弗拉德金和卢金声称他们对证言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16时10分审判长宣布闭庭。

1952年7月2日12时20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继续开庭。

(审判)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查了被告们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提出的请求后，做出裁决：对所提出的请求不予满足(宣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1952年7月2日的裁决书)^①。

然后审判长开始对什泰恩继续进行于6月12日中断的审讯。

^① 见本专题文件№11724。

№1172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什泰恩的审问记录

(1952年7月2日)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上次开庭时你对自己的情况做了陈述，对你的审讯已经进行完毕，法庭再没有问题要问你。你希望对自己的供述做什么补充吗？

什泰恩：我想说我是十分急迫地等待着这次审判的，我怕我活不到这一天，而我又不愿意带着加在我身上的这些指控死去。我没有把握一定能活到这个时候，所以我写了一份自传，把我这相当长的一生简要地反映出来。因为我现在还活着，所以我想把它简要地讲一下。

(审判)长：请你简要地说一说，因为你的履历法庭是知道的。

莉·所·什泰恩用上午开庭的全部时间，1个半小时还多，讲述了她的一生。她讲了一个波罗的海沿岸犹太家庭的姑娘在日内瓦接受高等教育，又留在大学里做科学研究工作的经历。

在20年代她接受邀请来苏联工作。她的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好评。她被委任为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科学院正式院士。

什泰恩：……我来到苏联之后，就下定决心终生献身于科学，而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好评。我能够做出一些贡献，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快乐。和我对立的人是否会消逝，我自己是否会消逝，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所做成的事情会存在。但是我不愿意带着现在

使我遭到玷污的耻辱离开这个世界。

和我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女囚对我说，侦讯时我反正不管什么都会签字的。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时刻，我感到我要发疯了，在这样的时刻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别人都可能讲谎话的。

(审判)长：你出庭受审已经有1个半月的时间了，可是你感觉自己的状况还是挺不错的。

什泰恩：是不错。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感到很不好呢？

什泰恩：这事该怎么说呢。我可以讲一讲供词是怎么做出来的。每一份记录上都写着：“根据我的叙述所做的记录经我看过，记载无误”，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监狱里被关了3年半，这段时间里有3年都在进行审讯。还有一些日子我一天被审问两次。经过整夜的审讯，早晨回到囚室以后，不仅不让你睡觉，连坐都不让你坐。当时的境况让我感到情形很不好，我会发疯的。人一旦发疯就对什么都不负责任了。

我只有惟一的一种可以活到开庭之日的办法，而我所盼望的就是这件事。我并不怕死，可是我决不愿意带着辜负信任、背叛这样一些耻辱死去。我可是一贯都受到信任的，一些负有极高责任的人信任我。

我拒绝承认向我出示的所有那些我的供词。

我从来不是一个反苏的人。从我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立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科学事业，这一点我也做到了。我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获取什么，也不追求任何东西，我和别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在我的生活中不知怎么回事一切都那么轻松顺利，但我却从来未曾为了个人的利益去追求什么。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身后留下一份美好的、有益的事业。这才是我所希望的，这种想法我从孩童时期就有了。在我还很年青的时候，我梦想

成为一个英雄，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那是很久以前了，而现在，确切说是后来，我明白了，没有任何目的地奉献生命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应当把自己的生命用到美好的和有益的事业上去。

如果法庭最终认定我还有用，我也许还来得及做成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在这段短暂的休庭时间里我逐一地回想了所有的事情，我没有发现自己有哪一个举动行为可以让人说我是背叛，造谣诽谤，等等。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进行造谣诽谤，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我的过错就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努力证明的是一种情形，而在生活中我的所作所为却是另一种样子——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是轻率的。在自己的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上我是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之上的。我的报告被发表出来，这就是说它被认为是有益的……

(审判)长：你供述完了吗？

什泰恩：是的，当然我想说的话还是很多的。

14 时零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4 时 30 分法庭继续开庭。审判长宣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拒绝被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所提请求的裁决书。

№1172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判决书

(1952年7月2日)

1952年7月2日于莫斯科市

苏联最高法院判决书

СИ - 0065 /522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由

审判长军法中将切普佐夫

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及

军法少将德米特里耶夫

审查了法庭审讯期间由以下被告人提出的请求：

1. 费费尔、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克维特科、什泰恩、塔尔米、希梅利奥维奇和祖斯金请求把们写的文学作品（诗歌、长诗，中篇小说和文章）附在案卷中，这些作品能够说明他们应该得到肯定的方面；

2. 克维特科请求法庭作为证人审讯科·伊·楚科夫斯基、薇·瓦·斯米尔诺娃、С.Д. 米哈尔科夫、К.Ф. 皮斯库诺夫、叶·彼·米茨克维奇、帕·格·狄青纳和叶·亚·布拉吉尼娜，这些人曾和他共事而了解他，可以对他的诗歌予以肯定；

3. 洛佐夫斯基请求在案卷中附上几份寄给美国报刊但不含机密消息的材料，并考虑到，各项请求中所指明的文学作品与他们提出的指控的实质并无直接关系，而克维特科关于由法庭审讯证人的请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对上边列出姓名的证人没有坚持追问本案指控克维特科的实质问题，所以举列的证人只能对他的文学创作做出评述。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不认为有理由满足上列各项请求，

裁决：

对被告人费费尔、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克维特科、什泰恩、塔尔米、希梅利奥维奇、祖斯金和洛佐夫斯基所提的请求——不予接受。

原本经相应人员签名。

与原本核对无误。

军事审判厅法庭书记员、上尉 阿法纳西耶夫（签名）

№11725

费费尔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2日)

(审判)长：被告人费费尔，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费费尔：我提请你注意下述几件事情。

本案里始终有一种说法，就是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从美国回来之后，为了搜集有关苏联的间谍情报并寄发到国外去，以满足按照这种说法是美国的反动人士的需要，组建了一个专门的记者网络。

我想举出几件足以推翻起诉书所断言的这张网络中的记者们由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进行指导这种说法的事实。

第一件，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关于收集机密情报的话。我们提出过收集有关工业企业等等的材料及撰写这方面文章的要求。我想请法庭注意，米霍埃尔斯从未做过什么指导，没管过记者的事，也没会见过记者。至于爱泼斯坦和我，我们确曾要求他们按照谢尔巴科夫和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撰写关于工业企业的文章，也就是做成这个委员会想做的那些事，不过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记者网络；从建立委员会之初就没有，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也没有。我们回来之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活跃的局面，但这主要的不是从美国回来，而是迁址到莫斯科，有了许多其他机会的关系。

我对法庭声明，建立记者网络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不存在任何记者网络。曾经派遣过一些委员会的代表、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到地

方上去出差。为此1年给我们拨款5千（卢布），靠这些钱跑不了多少次。

我和米霍埃尔斯到美国去了一趟之后，那里对苏联的兴趣增长了，因为我们在有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做过演讲。这些群众大会被当作了宣传苏联成就的讲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记者们写了不下300~400篇文章，这些文章安全部侦查处都有。这些人都受到了侦讯，但是这300~400篇文章中却没有一篇被收进这42册案卷里。这又做何解释呢？

如果真的组织了一个小组来收集谍报材料的话，那么这些文章至少也该有一部分要纳入案卷中，作为控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变成了间谍中心这样一条重大罪状的物证。

关于比罗比詹我们写得那么多，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外国的犹太报刊对比罗比詹的兴趣很浓。委员会特别关注比罗比詹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在美国反动报刊正在进行有系统的反对比罗比詹的宣传，他们力图证明（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个地方什么事也没干，犹太人不去那个地方。我们的文章打击了敌人。鉴定人，包括图书出版管理总局领导人之一的费多托夫-索尔达托夫在内，是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发表，什么东西不能发表的。我肯定没有一篇文章是未经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或是中央委员会的审查编辑部的准许就寄出去的。

鉴定人，包括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目录科领导人费多托夫-索尔达托夫在内，对待这样一项重大任务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草率的态度。不过还有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我请你们翻开第32卷第112页，看一看《自由晨报》的信件。鉴定组依据这一封信下结论说，美国的反动群体索要机密情报，而我们就给他们寄。这难道是鉴定人诚实正直的做法吗！？反动群体竟是诺维克和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由晨报》。我仔细看了这些鉴定书，我确信鉴定人做结论是带有

偏见的。

……难道接受对安置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的子女的斯大林格勒儿童之家的救济是不体面的？难道说从阿姆比詹获得这种救济就会造成犹太委会对阿姆比詹的某种依附关系？而这却被鉴定组看成是因寄送机密情报而付给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笔巨额酬金。

在这个地方说到了食品邮包。我忘了说我曾派犹太委会的事务秘书去接受这些邮包并向托儿所转交。托儿所开的收据就在案卷里。这难道可以看做是反动群体付的酬金吗！？

鉴定书的第11页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在美逗留期间，给他们布置了收集有关苏联的工业和文化的情报并寄往美国的任务”。但是那个地方并没有说我们商定寄送机密情报。可接下来鉴定组就下结论说我们寄了机密情报。这个结论是从哪里得出来的？鉴定组这样做是昧良心的。给我们交待的任务是要我们尽可能多地往美国寄关于苏联的文章，我们文章寄得越多，受到的赞扬就越多。我们寄出的情报除了好处之外不会带来别的结果。而费多托夫-索尔达托夫想必是知道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被抓了起来，就认为现在必须把一切都推到他们的头上去。他说在1943年我们就往美国寄送过间谍情报，这可是在1948年我们收到诺维克的那封来信之前。

我们收到过来自许多国家的咨询信：来自美国的，阿根廷的，古巴的，巴西的，墨西哥的，波兰的，罗马尼亚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赞同的回答的。难道说在讲述苏联的经济、产业和文化方面成就的文章里就只能提供间谍情报，而不能写真实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文章是用来阐述反对战争贩子、法西斯的残余势力，反对崩得反动派、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所有这些都是用来粉碎敌人，而不是危害苏联的。所以我认为鉴定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不诚实的。

费多托夫-索尔达托夫忘记了他这个鉴定人的职责是他必须作一个公正的人，客观地对待这个案件，尤其是因为他是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领导人之一。

我得出的结论是：鉴定书写得不客观，有偏见。没有日期、登记证、评论人的图章——这是一份荒谬的鉴定书。把《自由晨报》说成是反苏群体的代表这是不道德的。

费多托夫-索尔达托夫的鉴定书是想抓间谍想疯了，或者是企图把苏联的法庭引入迷途。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些关于我们在美国的关系的事实。我们是有一些关系。这不错。有一些照片可以表明我们会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是的，我们会见过，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利用这些会见来达到什么目的。我要说，对这些关系我们是为了有利于苏联而加以利用的。

我讲一讲魏茨曼。我对法庭声明，我们是利用魏茨曼来促使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参加接待代表团的委员会的。必须说，没进行这次会见时，那些人并没有参加进去，可是后来他们都支持了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法西斯。在会见魏茨曼之前，有一些著名的活动家不愿意参加我国大使馆开展的工作，而在会见他之后他们参加到这种工作里边来了。

同罗森贝格我们签订了一项对苏联政府有好处的合同。

我们利用犹太通讯社的领导人兰多^①为苏联做好事，他把我们的文章分发给世界的300家犹太报社。

我们也利用了戈尔德贝格来为苏联谋取好处，他后来写了一部反对苏联的敌人的书，多次组织晚会，群众集会。

^① 雅各布·兰多（1892~1952），新闻工作者兼出版家。海牙犹太通讯社的创建者之一。

斯蒂芬·魏斯我们也利用了，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反对托洛茨基。有一张照片是我和斯蒂芬·魏斯握手。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就是他那次讲话完了我和他握手。我们在美国逗留期间也利用了肖洛姆·阿什。这位最著名的作家——现代的犹太经典作家（我们曾被告知，让肖洛姆·阿什成为《自由晨报》的撰稿人很有好处），成了《自由晨报》的撰稿人。我们到他的别墅去了，和我们一道去的还有基谢廖夫。我听说他很喜欢亲自在厨房做饭，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系上白围裙做肉排。3天以后阿什就在《自由晨报》上刊登公开信，指出他已担任《自由晨报》的撰稿人，因为这是美国最诚实正直的一家报纸。

我们还利用了恩施泰因。我们希望他能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为此在他的住宅里安装了麦克风，他做了广播演说。他讲了苏联所获得的胜利，并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帮助苏联。

这里提到了《埃尼凯特》报上的一个曾寄来一块表的人捷利姆的名字。应该说，由于捷利姆的努力，为遭受法西斯之害的苏联公民收集了2百万套衣服。我们就是这样利用捷利姆的。我们在伦敦的时候，我们利用了索塔古先生，此人是一个极大的工厂主，他的工厂以其产品为几乎是25%的英国人提供了服装。我们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东西。他当时正在伦敦出席工厂主的代表会议。当我们已经回到这里的时候，运来了大约200包衣服，收货人地址写的是：“‘红十字会’，米霍埃尔斯及费费尔收”。

接下来审判员调查了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料是用什么方式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转交时费费尔是否在场。

审判员：被告泰乌明，你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份资料你给哪位书刊检查员看过吗？

泰乌明：那份材料我没有给书刊检查员看，因为作为编写这份资料的基础的那些材料当初都经过书刊检查——那是一些从寄到

国外去的文章中摘出来的材料，还有一些东西取自苏联发行的报纸，那份资料里边没有新的消息。

(审判)长：被告泰乌明，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要补充的？

泰乌明：我请求法庭看一看这份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料。洛佐夫斯基在这儿说过，侦查人员手里有这个资料。如果能让我看一看这个东西，我能够准确地回想起来编写使用的材料我是从什么地方选来的。

编写这份资料所用的材料，我是从这些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的文章中选的，他们给报社提供这种综合性的文章，而且文中都有工业、文化等等恢复情况非常详细的数据。

1947年底，在莫斯科这儿出版了一本名为《苏维埃爱沙尼亚》的书。那本书是由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编辑的，它通过了书刊检查。那本书里的信息和我那份只有两页的资料的内容自然是无法相比的。

审判员：预审时你曾供认过你同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谈过反苏的话？

泰乌明：不，从来没有谈过。我个人没有参与过这样的谈话。在我的供词中是说我听过这样的谈话。这是真的，这种事共有3次。这件事我已经向法庭详细供述过了。

审判员：谈过反苏的话吗？

泰乌明：谈话是有过的，但并不是那样一种形式。我的罪过在于我本应该做出某种回答，可是我却没有说话。既没支持也没反对。既然我对这种谈话没有做出反应，那就是说我自己也被感染上了这种情绪。

审判员：预审时你做了相反的供述。

泰乌明：给我拿来的是已经写好了的记录。就这一点来说我是对我自己进行了造谣诽谤。我3年半的时间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可

怕的感觉之中：我被认为是一个间谍，我直接地帮助了间谍。我的整个一生都与这一切相抵触。我对犹太人问题没有兴趣，然而我对波罗的海沿岸的问题感兴趣，我的心思全在这些问题上。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的政府成员认为我在波罗的海沿岸及其文化这些问题上是个内行。我没有做任何反苏的事情，没有谈过任何反苏的话。

审判员：被告费费尔，有过这样的谈话吗？

费费尔：我否认同泰乌明谈过任何反对苏联政府的话。我和泰乌明几乎不认识，就算是我有这样的心情，我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她呢。

（审判）长：被告泰乌明，起诉书认定你从事间谍活动，是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者，1945年还曾向戈尔德贝格转交谍报材料，这些都是你的罪行。我问你，是洛佐夫斯基交代你审阅并校改犹太委会寄往美国去的那些文章的吗？审问过你这件事吗？

泰乌明：侦讯时从来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在任何一份记录里你也找不出这样的材料，因为我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审阅和校改过。在我看到起诉书中的这种提法时，我浑身都颤抖起来。本来已经确切查明，除了我曾在组织事务方面帮助他们组织群众大会那件事之外，我同犹太人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点洛佐夫斯基和我的顶头上司都可以证实。

（审判）长：你还想对自己的供词补充什么？

泰乌明：我恳求把起诉书中的这个错误加以改正。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宣布休庭。

16时35分继续开庭。

（审判）长：被告马尔基什，你对自己的供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马尔基什：我想对我的主要工作——文学工作做一些补充，围

绕着我的文学创作，在看法上有一些混乱，准确说是企图造成混乱，所以我想讲一讲我的文学创作工作。

马尔基什拒不承认控告他的作品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罪名。他还讲了他对同案被告人的一些供述及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看法。

马尔基什：……这儿有人说马尔基什有一股民族主义的气味，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归根结底民族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东西，那是有具体体现的，是行动。

我说了我拿着书去找洛佐夫斯基的时候，他接待我的态度不好，我这么一提洛佐夫斯基也想起来了。他说他同作家协会的一位委员谈过，那人说我有民族主义的味道。我不想给洛佐夫斯基提什么问题，我在他那儿只待了3分半钟，他是什么时候抽出时间和别人商量我的事，再拒绝帮我出书的呢？我只想说，在那个时候，1938年，我的那本安排赶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出版的书已经在创作之中。书的名字叫《公民的呼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第聂伯河上的曙光》和《人民之路》两本书正在翻译。请问，叶夫根诺夫明明知道我心里装的是民族主义还出版了我的3本书，他这样做莫非是在犯罪吗……

希梅利奥维奇：我并不知道马尔基什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是布雷格曼有一次曾对我说他有民族主义的气味。但是他本人有10年没有见过我，我们两个人有10年没有会过面，他对犹太文学不感兴趣。他说马尔基什送了他一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去了。

我送给他一本书，不是犹太文的，是俄文的，他还是照样放到了书架上。不了解，不见面，不相聚，怎么可以这样讲一个人呢？

我们面对着法庭，每一句话都应该加以考虑。我请问，我的书里边的民族主义味道表现在哪儿？那里边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东

西。

我就不去讲贝格尔森说我指手画脚的那些话了，不过我指手画脚在刑法典里还没有什么规定。难道说这也是民族主义吗？！

祖斯金说，在他参加演出的我写的戏剧里他没有看出有民族主义（他扮演的是区委书记和集体农庄庄员），不过没有被接受演出的那些剧本有某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怎么可以这样不好好考虑就随便说呢。剧本受到了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嘉奖，米霍埃尔斯没有接这部戏是因为我在这之前已把它交给乌克兰的一家剧院了。米霍埃尔斯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告诉我，这是一部优秀的剧本，盼这样的剧本已经盼了20年了，他还往我家里打电话，为我写出了这样一部剧向我的妻子表示祝贺。可是过了两天他就说，我们不能表现剧中所塑造的那样的事物。

费费尔我就不说了，因为他的供词根本用不着注解，我不想去讲它。

说一下犹太作家组。费费尔在他的供词里边说，该组变成了某种民族主义的了。我必须说，这个组没有做什么纲领性的活动。我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书记……

为什么费费尔要把这称之为宗派？他住在基辅，并不知道我们这里干些什么。无论是克维特科，还是贝格尔松，或者是爱泼斯坦——我很少见到他们，费费尔我几乎就没有碰上过——都不会说这是一个宗派。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我请法庭相信我的话。

他们要把犹太人拉回到民族话题、民族文化上去，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他们保卫犹太教堂的文化，乔布鲁茨基的文化。他们人为地让苏联的犹太文学脱离健康的苏联文化大潮，把它赶进羊圈里边去。这是不理解革命的规律，不理解前途、历史进程这种犯罪的行为的结果。

塔尔米在这里说过，他同犹太文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且问

瓦坚贝格：“我同我的儿子讲的是犹太话吗？”瓦坚贝格回答说：“不是”。然后希梅利奥维奇发言，他问，我讲过犹太民族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我听到这些事情感到羞耻。让人感到犹太语在我们苏联是被禁止使用的。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用犹太语写作，也不在于能否写小市镇的犹太人，问题在于怎么样去写。我盼望苏联文化把犹太语送进历史。这种语言就像一个干粗活的工人把活儿已经给民众干过了，让他们拥有了歌声和哭泣。在人民生活于同俄罗斯隔绝的犹太人居住区中的那个痛苦的年代里，它给予了人民一切……

（审判）长：还想补充什么？

马尔基什：关于我那首《献给犹太战士》的诗我还想说几句。对我的控告正是围绕着这首诗开头的。

这首诗我不是按照常规写的。我当时写的东西很多，写过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写过潘菲洛夫师官兵，普遍的英勇精神，我也希望犹太士兵不要落在他的兄弟和朋友——与他并肩走向胜利的俄罗斯士兵——的后边。我不希望让人家说犹太士兵是在塔什干的军需站里服兵役。

俄罗斯的大自然像对任何一位苏联诗人一样，把它那无比的美妙注入到我的心里，这我是绝不能交给任何人的。如果说美国的一位我并不知名的作者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感觉得出马尔基什具有俄罗斯的广阔胸怀，那么我完全有权认为我是俄罗斯的真正儿子。

我现在面对法庭就如同面对最高的良知一样。我说任何文学上的功绩都不能减轻，不能消免我的罪责，但是任何诽谤中伤也取代不了真情，因为进行诽谤中伤的人看不出来他们那些诽谤谰言是软弱无力的。在我们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无辜受过的人，所以我说，如果法庭从我30年活动中的口头讲话或书籍中能找出一行一

句有民族主义弊病的话，那就让我受到法律的最严厉的制裁。

(审判)长：被告尤泽福维奇，你对自己的供词还有什么可补充的？

尤泽福维奇：我在法庭这儿把对间谍活动的鉴定结论检查、阅读了一遍，结果发现对做结论的全部文章中的半数都讲的是各种各样的“如果”，其中鉴定书说如果这些材料以前未在报刊上登载过，则不应发表。属“无如果”这一类的只有《红海军》日报上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应该指明该文所列举的材料他是从什么地方引来的。图书出版管理总局也是可以对这篇文章怎么可以发表提出详尽说明的。我觉得被告席上没有一位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准许某一篇文章刊出的权力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我曾请求《劳动报》的编辑对《工人阶级的伟大功勋》这篇文章给我做一个结论。我的这一请求没有得到满足。

格里沙耶夫中校给我解释说，无论是《劳动报》的编辑还是《真理报》的编辑都不可能对什么可以宣扬，什么不可以宣扬这种问题有专门的知识。说为此必须熟悉特别的指令、目录、规定等等。我要说我弄不懂为什么对我加以拒绝。根据法律我是有权让某一个人参加进来做鉴定人的，为什么我提出让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局长参加鉴定组的要求遭到拒绝——我不知道。

(审判)长：在把任命鉴定组的决定通知你的时候，对你解释过你的权利没有？

尤泽福维奇：没有，没有解释过。我在侦讯时和在法庭上总是说我说的全是实话，而且不打算去脱逃。

我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明鉴定毫无意义，是站不住脚的。

(审判)长：关于间谍活动的鉴定吗？

尤泽福维奇：是的。

(审判)长：起诉书指出，1945年尤泽福维奇向戈尔德贝格转

交了一份关于苏联的工业运输业等的机密材料。

尤泽福维奇：我按照洛佐夫斯基的指示交了几份以前曾在共产党的和工会的报刊上发表过的，就是说已经事先通过了书刊检查的文章的复制件。

（审判）长：预审时你自己承认在这件事情上犯了罪吧？

尤泽福维奇：在我从第 205 研究所拿到洛佐夫斯基要我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材料时，我是应该向洛佐夫斯基要，而洛佐夫斯基又该向上边的什么人要一个“准许”给这份文件的批条的。

（审判）长：洛佐夫斯基得到了这种批准了吗？

尤泽福维奇：这我就说不上来了。我只能这样说：转交给戈尔德贝格的那份材料他只会利用来做有利于苏联，而不是有害于苏联的事。

（审判）长：但是转交这样的材料是要经联共（布）中央准许的吧？

尤泽福维奇：这是我失误了。

（审判）长：你犯罪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尤泽福维奇：就是疏忽，我没有想到要那么一个条子，没有留个后手。

（审判）长：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是没有留后手吗？

尤泽福维奇：如果坦白地说，那么就是的。我疏忽了，我承认这一点。我当时认为，既然是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当着我的面同第 205 研究所所长谈的，给他解释要什么样的材料，干什么用，我还能想到这是什么坏事吗。

（审判）长：你还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

尤泽福维奇：还有我轻信了格罗斯曼的那份材料。

（审判）长：格罗斯曼的什么材料？

尤泽福维奇：为“黑皮书”写的材料。讨论这份材料的时候，

我发言尖锐地批评了该书关于“明斯克犹太人区”那一部分的问题。后来还为此向我表示感谢。等别人告诉我这份材料经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同意并通过了，我也得到了洛佐夫斯基的指示，要我准许发表这份材料，我断定这是纽伦堡审判的需要，就签署了那么一份电报。

费费尔说，我表示赞成修建牺牲于战争的犹太人纪念碑。让大家看一看第33卷第273页就清楚了，这符合不符合事实。至于爱泼斯坦什么问题都找我商量的说法，贝格尔森的发言已经对它进行了驳斥，因为他看到了给政府的呈文是怎样拟写的。

祖斯金在这儿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爱泼斯坦和米霍埃尔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连几个小时地商谈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事务。我想提供几点情况来补充我对自己在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供述。在那些场合我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讲话的，说我有些发言是民族主义的毫无道理。

我想举出几件可以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事情。第一，我讲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应把自己的材料不光寄给犹太报刊，也要寄给其他报刊的主张（卷33，案卷页16）。

第二，为纪念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5周年，我在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和斯拉夫人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共同起草一份公开的呼吁书（卷33，案卷页152）。

第三，庆祝纽伦堡审判，我发言要求反法西斯委员会发表一份不仅致犹太人也致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呼吁书。我讲话要求给尼·米·什维尔尼克写贺信（卷33，案卷页34）。

我已经62岁了，我整个的一生和工作都是清清楚楚的，我从来没有欺骗过苏维埃祖国，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能力尽可能地为苏维埃祖国效力。但是我绝不能允许说我干了间谍和民族主义的活动，这也是毫无道理的，荒谬的。

至于说民族主义的或是反苏的谈话，那是没有的事情。我一直做独立的领导工作的，我是自愿地自动离开去干科学研究工作的，没有人给我委屈受，我一次也没有被开除出党过。我从来不是一个两面派。我一贯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之上，同民族主义的敌对的秘密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无法设想洛佐夫斯基、贝格尔森、克维特科和瓦坚贝格是间谍等等。我想，这是一些荒谬的指控可怕地交织到一起了，至于我本人，我愿意向法庭保证，不论法庭做出何种判决，都没有任何力量（即使我不能被宣告无罪）能使我产生反苏情绪。在这3年半期间不管我同什么人同在一间囚室，我对侦讯情况，对自己的案情没有透露过一字一句，不论等待着我的的是怎样一种命运，我将永远忠于党和苏维埃祖国。

18时1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1726

洛佐夫斯基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 补充供述

(1952年7月3日)

(审判)长：被告洛佐夫斯基，你想对供词做些什么补充？请注意，现在说的仅仅是补充。

洛佐夫斯基：起诉书在对我的指控方面是有根本性的漏洞的。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它都经受不住批评。而且同正义、逻辑和理性是矛盾的，下述各点就可以证明这种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这几十册案卷都是以这样一点为依据的，就是据说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仿佛是别出心裁地把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派出国去，他们建立了违法的联系，意在要美国的犹太人帮助我们去同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做斗争。

然而，不是从这些材料里而是由口头的供述中可知，而且关于此事还有文件，同罗森贝格的联系是按照苏联外交部部长兼会议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的交代建立的。接下来又知道同魏茨曼的会晤是得到大使馆的准许并经维·米·莫洛托夫电报批准的。

接着还知道斯蒂芬·魏斯及其他一些人发表讲话维护苏联，号召为苏联募捐。莫非说这些维护苏联的演说，还有按照维·米·莫洛托夫的交代进行的谈判，难道说这些都是违法的联系吗？

我已经说过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古比雪夫，而电报是由维·米·莫洛托夫从莫斯科发出的。这些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没有异议而出去的代表们该怎么办

呢——不服从维·米·莫洛托夫的指示？这才是起诉书和这 42 册案卷材料的要害之处。然而，起诉书的编写者觉得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据他们说，是根据我的指示同犹太资产阶级勾结起来的这还不够，为了加重罪名在起诉书的第 2 页上有如下一段论断：犹委会变成了一个进行由美国的反动集团操纵的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我与我的同谋们，关于这一点另外再讲，同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们有着直接的勾结。

我要问哪儿来的美国反动集团，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是从 1952 年的报纸，而不是 1943 年的报纸上拿来的。在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去美国的那个时候，还是罗斯福的政府，我们同它是结盟的。当然，罗斯福追求的是他自己的目的，可是我们和他是同盟关系。当时反动集团说的是反对罗斯福和苏联的美国法西斯集团。当时反动集团说的是那些宣传反对我们、支持德国的匪帮。美国的反动集团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罗森贝格还是斯蒂芬·魏斯都不属于这些集团。大多数的人当时是站在罗斯福一边的，虽然也有少数人出于其帝国主义的目的反对他而支持德国。

那么在 1952 年美国的反动集团意味着什么呢？这说的就是杜鲁门，那位曾经在我们这里担任过武官、后来写了一部反对苏联的书的将军和其他一些人。这就是在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专断独行、豢养着西区党卫队将军们的那些法西斯的、半法西斯的分子；这就是企图制服朝鲜的那些法西斯的、半法西斯的分子，如果说他们并没能制服朝鲜的话，那你们是明白因为什么原因。

侦查员有什么权力把 1952 年各方力量的分布情形用于 1943 年各方力量的分布情形？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同美国的哪些集团有联系，在什么时候？让他们哪怕是举出一个人的名字来也行啊。尽管进行侦讯的有 25 位侦查员之多，却没有一卷材料有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件事。难道从政治的角度说这是正确的吗，难

道这经得起从法律的观点进行批评吗，再不然我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再能够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可以大笔一挥写下这里所写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写上——美国的反动集团，罗斯福，罗森贝格，所有这些人都是——伙。

列宁说，必须明白，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分歧意见是有它们的影响的，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去客观地对待与人的生命相关的问题，却突然给我扣上了与美国的反动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此外还要了一个手腕——把反动的犹太资产阶级与美国的反动集团等同起来。而这两者远不是一回事。我真弄不明白怎么可以毫不负责地写出这样的东西，这可是关系着许多人生命的事啊。

我引用一句学生们的用语——把苍蝇变成大象，再去卖“象牙”。为这根令人生疑的象牙要价15颗人头，其中包括我这个曾为革命运动和反对右派及党和苏联的其他许许多多敌人的斗争做过一些事情的人的头颅。

我没有可能从这些卷材料里把克里木的景观，也就是所写下的有关克里木的一切，摘抄出来。可是一切正如费费尔在这儿所解释的那样，是从克里木的景观开始的，而以我想把克里木作为登陆场去出卖而告终。起诉书中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把所有这些关于克里木的论断摘抄出来，那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它们在不断膨胀。开始是费费尔供述的罗森贝格说，克里木——这就是黑海，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不过后来费费尔声称罗森贝格没有说这样的话，这是侦查员的说法。

随着对其他被逮捕的人审问的进行，这一说法就开始增长涨大了，每一个侦查员都要加点东西，到最后克里木周生长出了厚厚的毛，使它变成了巨大的怪物。登陆场就是这么弄出来的。这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什么，根据是什么？据说仿佛是有什么人报告说美国政府干预了这件事。这就是说罗斯福了。我要说，1943年秋天罗

斯福在德黑兰会晤了斯大林。我有胆量请你们相信，在德黑兰谈了些什么我比所有的侦查员加在一起了解的还要多，我得说在那儿根本没提克里木的事。1945年罗斯福带了一大批侦察人员乘坐多架飞机来到克里木。他来既不是找费费尔，也不是找米霍埃尔斯，更不是为了向克里木迁移犹太人的事，而是有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带有血腥气的说法变得那么尖锐呢。霍夫斯坦、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或是祖斯金，还有好多其他受人尊敬的人又能通报些什么消息呢？他们对这件事懂得多少，这个说法又是因为什么被斟酌得如此周密呢？这是因为侦查员们相互之间已经商量好了，一些人稍微加上一点，别的人多添一点，结果就成了洛佐夫斯基想要把克里木出卖给美国的反动集团。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说法，那么就会看出来这些并不是由那些遭到逮捕的人说出来的。就像什泰恩对这个问题能讲出什么来。她对这件事什么也不懂，顺便说，他们所有的人——马尔基什呀，祖斯金呀，所有的人完全变成了深谙“国际问题的专家”了。

(审判)长：你应该说还没有对法庭讲过的那些事情，可是所有这些你都已经说过了。

洛佐夫斯基：这是我的最后陈述，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讲话了。

(审判)长：不，你以后还有机会做最后的陈述。

洛佐夫斯基：可是至少得要活到最后陈述的时候。所创作的关于克里木的神话纯属无稽之谈，这里用得上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一句话：这是“在大脑里制造出来的虚假事物”。我被控进行间谍活动……

(审判)长：你在重复已经讲过的话。

洛佐夫斯基：我想说一些没有讲过的事情。我并不精通苏联的刑法，不过我不认为法典中会有那么一条说物证可以用侦查员非物质的编造替代。有文件，就在侦查科，为什么这里边不见这些文

件？

(审判)长：你说的是第205研究所的那份材料吗？

洛佐夫斯基：不是。我说的是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带到美国去的那些材料。

(审判)长：就假定说第205研究所的材料是非机密性的，你为什么不经中央委员会的准许就把它交给了戈尔德贝格了呢？

洛佐夫斯基：我不必请示，我被安排在苏联情报局……

(审判)长：那材料是由一个并不归你管辖，而是归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管辖的研究所准备的。编写这份报告的事你和什么人谈过吗？

洛佐夫斯基：我跟普赫洛夫通过电话，对他讲了我需要些什么，是干什么用的。征求同意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他隶属于对外政策部，应当由他去征询意见。我给他讲了，这是美国的新闻记者戈尔德贝格用的，他要写一本反对英国的书。这种事我办过几百次了。我们让美国人写书反对英国人，又让英国人写书反对美国人。

为了证明我据说仿佛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和政治思想上的鼓舞者，举证了40篇文章。可是对报上刊登的文章负责的是机构的领导人，就是说，如果文章，一篇明显是不能用的文章，刊登在《红海军报》上，那么对此负有责任的显然是部长和《红海军报》的编辑，书刊检查员、部主任和作者也要负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一条规定，任何一篇刊登在报章上的文章都可以剪下来，寄往国外。我要问，为什么没有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坐到这个“光荣的”席位上来。是因为他们没有罪？那我为什么有罪呢？谢格洛夫把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讲错了。谢格洛夫在哪儿？为什么这里不见他。这两件事使人对控告我进行间谍活动的所有其余材料都产生了疑惑。由2万篇文章中挑出来的这40篇文章就是控告进行间谍活动所依据的全部材料，其他的再什么都没有

了。因为有3份文件大概是由于从间谍活动的角度看没有问题而被隐瞒了。这样做是为了洗刷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因为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在犹委会隶属对外政策部领导期间通过的。这样做是为了把一切都推给洛佐夫斯基。

这个关于间谍活动系列当中最后一个论点是我亲自接见了戈尔德贝格，并据说和他仿佛是建立了间谍联系。我接见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几百个记者，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难道说戈尔德贝格就是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这真是一派胡言。美国的反动集团有重要得多的代表。

犹委会的主席团被认定为间谍中心——这是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经验相矛盾的，这种谰言同我国与反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相矛盾。在主席团的内部可能有某些委员从事间谍活动，但是要说整个主席团都干这种事情——这在政治上是荒谬的，这与健全的理性也是相矛盾的。

当然，如果是费费尔肯定说他进行了间谍活动，那是他的事。我怎么也忘不掉那段由侦查员拟写好而经布雷格曼签字的供词，那段供词说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仿佛暗示过我国的反犹太主义来自“上边”。这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不对的，希梅利奥维奇在他的信件草稿中说，发生反犹太人现象的根源是没有文化，这同样是不对的。这不对，在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在沙皇俄国，反犹太主义是自上而下发生的，来自于政府、教会等等。在苏联反犹太人现象既不可能来自下边——工人和农庄村员，也不可能来自上边——政府和党。个别的反犹太人的表现是一条反革命的途径，不过这条路线在苏联可能会导致对实行这条路线的人来说是可悲的结果。

我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我们必须在外国进行宣传活动。我会见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工作者，有的人写这种东西，有的人写那些事情，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正确地组织宣传

活动。所以提出出版支持苏联的书籍问题的时候，我想方设法为这件事提供帮助。我认为如果一个新闻工作者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能写一本从积极方面讲述苏联的书，那是好事。如果继任我的波诺马廖夫持相反的观点——那是他的事情。我可一贯是这样一种看法：任何有利于苏联的宣传活动都是有益的事情。如果是从提供任何消息都是进行间谍活动这样一点出发，如果积极开展工作就是进行间谍活动，如果同那些从积极方面去写苏联的新闻工作者们的联系是间谍活动，是间谍联系，如果“犹太人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的口号是民族主义，假如得到证实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带到美国去的材料是谍报材料，假如有证据说明我有民族主义思想，假如真的证明了我同美国的反动集团有违法的联系，那时起诉书与我讲的话之间才不会有矛盾。我认为这些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物证。没有得到证实我有民族主义思想，也没有证据。侦讯的那些记录在一些说法上是太相似了。侦查员们休想把美国反动集团走狗的套子套到洛佐夫斯基的脖子上。侦查员们休想把我赶到民族主义者的巢穴里边去。你们在这里更易于正确评定我供述的整个目的。

最后的三点意见：所有的记录、各份起诉书都提到了洛佐夫斯基及其同谋者。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同谋者呢？这就是我30年中只接触过一次的祖斯金，那一次他是告诉我米霍埃尔斯请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们甚至没有说过话的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也是这样的同谋者。这样的同谋者还有1942年曾找我谈了点事情、在我那里待了不到3分钟的霍夫斯坦。1942年向我报告过爱泼斯坦情况的伊利亚·谢苗诺维奇·瓦坚贝格也是这样的同谋者。这样的同谋者还有希梅利奥维奇。这算是什么呢？

（审判）长：你是认识爱泼斯坦、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的。所有事情都是你领导的吧？

洛佐夫斯基：我认识他们和认识其他人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甚

至不知道什泰恩是党员，在自己供述时是把她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讲的。还有苏联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泰乌明也是这样的同谋者。如果认为他们都是我的同谋者，那么我这样的“同谋者”数量还要多得多。我1942年认识了费费尔，很一般的泛泛之交，1945年他和米霍埃尔斯一起来找我，我对他才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我和尤泽福维奇交往较深——从1917年开始的。这也是同谋者吗？我认识在安全部工作的爱泼斯坦。这都是从哪儿说起呀？证据在哪儿呢？没有这些证据。如果说先前曾经有过某种可以表示出民族主义者洛佐夫斯基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系的嫌疑，那么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这样，说我有同谋者没有得到证实，说我从事间谍活动没有得到证实，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没有得到证实。然而起诉书却以极大的勇气说我从1919年起一直是党的敌人。尤有甚者，那里边竟说到犹委会成立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备一有机会就加紧进行破坏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工作。从1919年12月到犹委会初具雏形的1941年12月，22个年头过去了。我干了什么破坏工作，为什么非得等到打起仗来，等到委员会成立再进行破坏工作？证据在哪儿？除了1938年同贝格尔森见过2或3次面以及同努西诺夫和马尔基什见过两次之外，什么都没有。

如果法庭不问我，不要我提供材料说明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干了些什么，我是如何同右倾分子进行斗争的，在共产国际干了些什么，是为什么到国外去的，显然法庭并不怀疑在这22年里我并没有干破坏工作。莫非说真的必须在世界大战期间专门成立一个犹委会来着手搞破坏工作吗？

这里边没有一点合乎逻辑的东西，这里边没有健全的理性，这里边既没有政治上的、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义。这42卷材料究竟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是怎么使得所有这25位侦查员都走了同一条路呢？这是因为进行诉讼就必须有一幅构想图，要有那么一位代表人

物，要有那么一个人名，因为侦查的领导人——要案侦查科副科长科马罗夫上校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定势，这事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我还想再说一遍。他曾经对我说过，犹太人是一个卑鄙的民族，犹太人是骗子、坏蛋、败类，反对派全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嘀嘀咕咕地对苏维埃政权发泄不满，犹太人想把俄罗斯人全部消灭。这些都是科马罗夫上校对我讲的。如果他有着这样一种心理定势，很自然的，他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有着摆在你们面前这42卷的一棵大树就由此推演出来了，这42卷材料里关于我没有一句真话。

结论：我在自己的供述中把一切情况都讲了，我现在跟你们说，也是以我这颗已经衰弱下来的心脏的全部热血，重复地讲——我没有犯民族主义及背叛祖国和政府的罪。

13时3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4时15分继续开庭。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新的补充吗？

克维特科：控告的第一点从头至尾完全不符合实际。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和过去都没有做过可以让人当作提出这种控告的口实的事情。我并不指望法庭听我一说就能相信，尽管说的都是实话。法庭审判过不少各种各样的说谎的人。但是我希望法庭核查一下我所举出的事实，审问证人，以了解关于我的真实情况，由十月革命确立的布尔什维克的真实情况，人民的真实情况。虽然在1941年之前形式上我并不是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党员，但是从十月革命一开始我就在精神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所以我应该像任何一名党员一样，为整个这一时期自己的行动负责。你们面前摆着我所做过的事情的完整的清单。我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苏联社会人士的面前进行的，一切都是可以查对的。现在我请求你们给我机会来一件件地列举这些事实。费费尔在他的供词中说，我在基辅发表了我

的一部长诗《埃奥纳萨·乌埃尔》中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描述了一位乌曼斯克的工人、红军战士，他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城市和乡村的重建工作的情形。费费尔在他的供词中称这一章是反苏的，这样他就有意识地欺骗了侦查人员，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章编进了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推荐、经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核准的文学课本里了……

这样，在实际上费费尔关于此事的供述原来是对我的恶毒的诽谤。

再说我1919年写的那一部长诗。那是犹太文学中第一部写红军的长诗，长诗的名称是《在红色旋风中》。诗中讲的是苏联人民反抗压迫者的那种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力量（读诗“和非犹太族兄弟肩并肩，我们结成同心协力的队列，舍生忘死地去把敌人战胜，将他制服，令他俯首。我们已和父辈一刀两断，等等……”）。

这首诗写于1918年，1919年在基辅重印，1937年再版，那本书还收入了1918~1921年间共产党报刊上刊登过的诗作。

我还被指控在国外的時候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我要说明在柏林根本就没有犹太人的刊物，在那儿出版了……

……参加儿童文学会议的作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和另外一些人。他们也看了我这方面的作品，认为这是符合苏维埃精神的现实的作品。就在那个某些犹太人因犹太民众被同化而忧愁的时候，我专心致志地做把作品译成俄文的工作。结果我失去了几百名犹太语读者，却获得了数千名俄语读者。这样一来，我就参加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中来了。我那首《致伏罗希洛夫的信》的诗被收入中学学习用书当中。

我在这次儿童文学会议上发言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来到会场，人们起立向他表示欢迎，他让继续开会。会议结束时我朗诵了新诗——一首摇篮曲，歌颂了在苏联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斯大林对所有的人的帮助。

会议的代表们受到谢尔巴科夫的接见，他在讲话中指出儿童文学发生了转折。

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和证据说明我是全心全意忠诚于党和苏联政府的。在我逗留国外期间我履行了有利于苏联的秘密任务。起诉书举不出一件能够说明我进行过反党斗争的事例。那种事例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各族人民的见解和爱好和平和友好的感情，痛斥了民族主义的、敌对的观点。1919年期间的作品可以证实这一点。我的所有作品都会让儿童在心里产生热爱党、无限忠诚于祖国和其整个伟大事业的情感。苏联的批评界承认我的《致伏罗希洛夫的信》、《摇篮曲》及其他的作品是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鉴定组分析了我那些写给苏联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品，那么它就会确信我在30年间所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充满了对生活中愉快和光明的东西的颂扬。那里边没有一点说到民族主义，说到肮脏的反苏的东西。

所有上述事实证明所控告的第一点没有任何根据，也不符合事实。

控告的第二点说我和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及爱泼斯坦相勾结。我已经讲过了没有这种事，但是我没有引证事实、理由，现在我想列举事实和理由。说我同费费尔、爱泼斯坦相勾结以便利用犹委会达到罪恶的目的的控告不符合事实，并为下述事实所推翻：我和米霍埃尔斯无论是在委员会成立之前还是在委员会存在的时期内都极少见面。我不是他演的戏剧的崇拜者，和他既没有过亲切的，也没有过友好的或是正式的谈话。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友好的，费费尔会当庭承认米霍埃尔斯从来不同我商量事情。

我和费费尔两个人，从1925年我返回俄罗斯的家里那一刻，直到1936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公开敌对的，而在政府制止了费费尔和其他一些人在乌克兰的犹太文学中主宰一切的状况之后，公开

的敌对变成了始终没有改变的互不信任，互不友好。1935年之后，我已经多半时间住在莫斯科，做翻译我的作品的工作，而费费尔住在基辅，我和他没有会过面，我们两个人没有开诚布公地单独谈过话，没有谈过政治问题，也没谈过犹太人问题，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太令人感兴趣的诗人和差劲的剧作家，他对我大概也是同样的看法。我并没把他看做是我的竞争者，但却认为他是一个能干得出坏事的阴险的人，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贪图金钱的虚荣心很重的人。我在古比雪夫一见到他，马上就想到得离他远点，我不顾爱泼斯坦的规劝……从古比雪夫跑掉了。

……犹委会的上层人物认为我不适合搞委员会的思想政治活动，就没有把他们的计划告知我。我担任秘书职务是有名无实的。之所以要这样做或者是由于我的名字比费费尔和爱泼斯坦两人的名字更为苏联读者所熟悉，或者是为了控制一直和他们敌对的马尔基什。也不排除是谢尔巴科夫推荐了我，他们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种可能。有一点是清楚的，我没有和他勾结，没有参与犯罪的事情，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所控告的这一条罪状与事实不符……

我也不承认自己犯有所控告的第三条罪状：向新闻记者们布置间谍任务。犹委会实际工作的整个程序就推翻了这一条控告。向记者布置寄发材料任务的是责任秘书或者责任编辑，开始时是爱泼斯坦，后来是费费尔，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人。在委员会在古比雪夫工作的开初几个月里有过这么一回事。爱泼斯坦要我给作家卡甘发一封通知他寄材料的信函。这是惟一一次我签署了一封发给犹委会记者的信。但是因为什么，根据什么提出控告，肯定我索要的一定是谍报材料？并没有这样的根据……

这一条指控是以一些自私自利的人胡编的口供为依据的，与真实情形毫无共同之处。

起诉书的第四点断言，我到克里木去是为了搜集关于这个州的

经济形势的情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进行这一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应当懂得经济问题或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大家都知道我并不具备这种知识和长处。我同侦查员争了很长时间，向他证明这种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另外，难道说占科伊四周的几个犹太人居住区就成了一个州吗？我会见的全是俄罗斯人。犹太居民当时几乎还没有人回来，他们还在疏散地，居住区里仅有的犹太人全是藏在俄罗斯邻居的家里才得以从法西斯匪徒手下死里逃生的。我在居住区就住在俄罗斯人的家里。关于法西斯匪徒残暴兽行的材料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得来的。同那些当时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根本不可能交谈，因为他们还没能从所经受的苦难当中，从眼见身受的一切当中镇静下来，当时他们的亲人、儿童和老人被活活地扔进水井里边。

我确切地讲一讲我那次去克里木犹太人居住区出差的实际经过情形。在辛菲罗波尔我去了州委会请求秋利亚耶夫接见，他很好地接见了，他说我必须到现场去了解法西斯匪徒在居住区里犯下的残暴兽行。他答应在这件事情上给我提供帮助。我给他看了《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其他一些中央报刊的编辑部给犹委会寄来的被疏散出去的居住区居民们的信件，这些人请求告诉他们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关于落到德国人手中的人的消息，以及解决让疏散的人返回原地的问題。政府有一项决定，要把有专门规定名额的一批人迁往克里木，我当时甚至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秋利亚耶夫说他本人也收到了许多这样的信，可是他现在正忙着处理从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移迁人口的事情，等这事办完之后就着手去办理回迁疏散出去的犹太人的问题。

（审判）长：关于这次谈话你已经对我们讲过了。

克维特科：返回莫斯科之后，我在主席团的会议上把这一切向主席团的委员们做了口头的通报，没有任何书面报告。我举出了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救助犹太人的事例。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可以

证明。我讲了法西斯匪徒把老人和孩子活活地扔进水井和土坑里，讲了在叶夫帕托里亚枪杀俄罗斯人，活下来的犹太人情绪阴郁。很明显，这些人的心理状态遭到了破坏，正常的生活还没有安顿妥当。有可能还留下来一些法西斯的间谍，他们试图制造各种各样的喧嚣。

听了我的口头通报之后，没有人在主席团会议上批评我，相反，主席团认为必须把一切都报告给农业人民委员部。有什么人起草了一封信件。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人从来都没有写过关于我的克里木之行的书面报告。关于这件事也从来没有给国外写过一个字。我认为我把我所了解的情况报告给苏联政府，我的做法是对的。我的做法和一切给约·维·斯大林和政府写信的苏联人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条控告不符合事实……

我断言，我本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以在刊物上发表讲话的形式，无论是通过勾结还是以行动，都从来没有犯过指控我的反对祖国的罪行，据以加罪于我的事实并不存在，指控是以某些自私自利、人格卑劣的人编造出来的口供和我的错误为依据的，我的错误的性质不能成为指控如此严重罪行的根据。我认为我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全心全意地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事业，控告我背叛祖国我认为是一个悲剧。我请求，为了查明关于我和我的活动的真实情况，核查我列举的事实，了解一下我写的书的内容，询问证人。请求去了解俄罗斯报刊对我的工作的评论。请求讯问我在其间进行活动的证人，他们就是楚科夫斯基，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米哈尔科夫，皮斯库诺夫，布拉吉宁，德米特里耶夫斯卡娅，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米茨克维奇（他能讲出我在德国时的工作情况）和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狄青纳。

（审判）长：在审讯开始时你回答法庭的问题时说过，你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你承认自己部分地犯了什么罪？

克维特科：我就是现在也还是这么说。我那时和现在都相信控

告犹委会说它给苏联政府造成了损害这一条罪状。我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呢？根据就是鉴定书和侦查材料。由于委员会造成了损害，而我也在那工作过，这就是说这种损害要有那么一部分落在我的身上。这种事我不会按照法典里边的说法表达……

(审判)长：控告你的罪名是背叛祖国。

克维特科：这种事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没有的。

审判员：你没有写过任何关于你克里木之行的书面报告吗？

克维特科：没写过。

审判员：被告费费尔，克维特科写过书面报告没有？

费费尔：就我所能记得的说，报告是口头的，没有书面报告。

审判员：是谁给农业人民委员部写的呈文或是信件？

费费尔：在克维特科做报告的时候，爱泼斯坦做了些简单的记录，因为他记日志，后来他根据这些记录起草了一份呈文。

审判员：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是和什么人一起去农业人民委员部的？

希梅利奥维奇：有米霍埃尔斯，古别利曼，我和克维特科。

审判员：你看到了转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份文件了吗？

希梅利奥维奇：直到1952年侦讯的时候我才看见了那份文件。

审判员：是大家一起去见人民委员的吗？

希梅利奥维奇：是大家一块去的。

审判员：文件是谁转交的？

希梅利奥维奇：这个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交给安德烈耶夫或别内迪克托夫的。这之前在接待室里米霍埃尔斯拿了一封很短的便函让我签字。

审判员：你们当中是哪一个人向别内迪克托夫汇报的？

希梅利奥维奇：是克维特科，古别利曼，米霍埃尔斯。报告了克里木犹太人中学的状况。我是根据克维特科的通报知道这份材料

的。

(审判)长：案卷里边有两封写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信。就是这两封，上面有4个人的签名：米霍埃尔斯，克维特科，古别利曼，希梅利奥维奇。信的一开头写着：“敬爱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接下来写道，所有的犹太人都没有衣服和鞋子穿，并说了个农庄的名字作为例子。你去过马因菲尔特的家吗？

克维特科：大概去过吧。可是我是写给政府，而不是写给什么人的……

(审判)长：被告克维特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克维特科：没有了。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贝格尔森：我有补充。

(审判)长：你说过，你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你承认自己有什么罪？

贝格尔森：我如我已经说过的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由于委员会的工作超出了正式确定的任务范围，由于所有这些事情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那么我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与此也是有关系的。

(审判)长：你承认进行了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吗？

贝格尔森：不，我没有进行过任何间谍活动，与谍报材料也没有任何关系，在逮捕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些材料，以前我没有承认过自己犯了这种罪，现在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

(审判)长：你想对法庭供述什么？

贝格尔森：我参加过“文化联盟”，但是我要说，早在邓尼金1920年侵占基辅之前小人民委员会就曾拨出大笔钱款作为“文化联盟”的经费。所以，即使“文化联盟”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

组织，我也不可能认为它是反苏的组织，因为那时没有办法猜想得到可以拿着苏维埃政权的钱去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我认为我没有坏的意图。

在这儿人们已经说过了，我在《奈耶-采特》报上没有写过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東西。

在两卷预审材料的一卷里边，举出了我的一封信，认为那是反革命的信件。那封信是我在1919年写的，它也发表了。从信里边引出一段话来进行指控，那段话是说在发生大的革命时期，艺术退居次要地位，因为社会人士都忙于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可是不久前我在科瓦廖夫的《希腊化国家》一书中看到了同样的思想，所以在我的那封信中没有任何反对苏联的东西。

我是一个职业作家，而且从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我就追求技巧，而追求技巧就是追求揭示生活的真实，我说在革命的最初年代，我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怨恨，我说的是实话。我说我对布尔什维克有好感，我说的也是实话，因为布尔什维克是以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人，把自己的真理直接地讲出来，这对于作家来说就是一种贡献。

可以证明我对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怨恨的，是我在国外一定居下来，我就拿起笔，开始写作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正面作品。无论是在我在国外的那个时期，还是现在，这些书在苏联都出版过。我写过两篇反对叶夫谢科派的文章，这我已经说过了。我说了，这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再也追不上革命了。这是反对进了政治局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全是一些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被从生活中扫除了，可是侦查员却给我加上了我写书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名。

我在国外的時候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缺陷，对苏联产生了热爱，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逐渐改造过来

了，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毕竟是有脑子的。转变到苏联的思想上面来我要比别的人困难得多，但我总还是转变到这方面来了。

我在国外滞留时间那么长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

……

从1921年到1934年期间，我在国外的行动所有共产党——波兰的，美国的，罗马尼亚的——的犹太部都是了解的，从1925年起他们全都在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过我写的东西。犹太文共产党报纸《阿根廷》在卫国战争的第一年，就转载了我写列宁的《火星报》年代革命工人运动的整本书《青春年代》，共600多页。

如果我是苏联的敌人，我是有机会留在国外的，但是我没有留在那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核查的，我也有一切根据推想对这些事都已核查过了，一切在国外有声望的人都没有躲过，也不可能躲过国家政治部锐利的眼睛。在1926至1934年间，我这个仿佛是从苏联逃跑了6次的人曾5次获准出境，所以说我还不是一个不起眼到对我根本不知道的人。我每一次来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的报纸上都有报道，而1931年8月我的到来《消息报》做了报道，就是说国家政治部机关是知道来的是什么人的，但是他们还是准许我再次出境了。1934年经他们批准给我发了苏联护照。对于那些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时起就同这个政权、同党进行斗争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想说一说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我那没有消除净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我极其依恋犹太语这个工具。我用这种语言写作了28年，它虽然有一大堆缺点，但是我喜爱它。我知道我未来的生命没有多长了，可是我就像一个儿子爱自己母亲一样喜爱它。我非常羡慕俄罗斯作家，因为俄语丰富多了。

我来到苏联时恰逢阿穆尔河沿岸州被划给犹太移民居住，并宣布此地为犹太自治州。我领会这是党和苏联政府希望给犹太劳动者

提供一个恢复他们所缺少的民族特征——领土共同性的机会。既然政府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这是一件好事。这里边是否包含有民族主义思想？让法庭去判定好了。不过我说实话，这是符合我的心愿的，我到比罗比詹去了3~4次，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苏联国土，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对它进行歌颂，述说那里的人们，而且赞颂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单单在于语言，问题在于习俗。从一种习俗转换成另一种习俗是困难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法庭弄明白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我希望犹太人能够完成从一种习俗到另一种习俗的转换，不是在像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那样的大城市里，而是就在自己的那个地方。这算不算是反对同化的斗争呢，让法庭去判断吧。

起诉书的第二点说我积极地参加了为美国人收集关于苏联的间谍情报的活动。我坚决地拒绝承认这一点。

(审判)长：对这个问题你已经做过供述了。

贝格尔森：可是我还有一些能否定这一点的事实，我想向法庭证实这一点。

(审判)长：让你做补充是为了让你对自己的供述补充一些你还没有讲过的事情，可你老是重复已经说过的事情。

贝格尔森：这里边就有我还没有说过的事情。在我到古比雪夫之前，我主持《埃尼凯特》报的文艺部的工作。爱泼斯坦向所有的新闻记者发出了通告信。这件事克维特科在这儿已经说过了。爱泼斯坦熟知所有的人。到我到古比雪夫的那个时候，材料已经开始寄来，但是我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过校订，也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古比雪夫做的完全是另一件工作。由犹太会和《埃尼凯特》报的7个人领导这项工作，准确说是做这项工作。爱泼斯坦是责任秘书，瓦坚贝格是他手下专管此事的人员，克维特科是爱泼斯

坦主管广播工作的副手，加尔金挑选寄往莫斯科的材料，奥尔良德是犹委会的主编，费费尔是爱泼斯坦主管《埃尼凯特》报的副手，我主持文艺部的工作。米霍埃尔斯只是偶尔来一下。爱泼斯坦亲自到洛佐夫斯基那儿去，他去只带副手，由于我是文艺部的主任，所以我没有必要上那儿去，因此也就不带我去。我没有给任何记者写信，也没有做过收集情报的指示。

洛佐夫斯基说《埃尼凯特》报的民族主义性质是我让它带上的。或者确切一点讲，他是说，使《埃尼凯特》报带上民族主义性质的那些人里边就有贝格尔森一个。

洛佐夫斯基：我就没读过《埃尼凯特》报，我和它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法庭是很清楚的。

贝格尔森：洛佐夫斯基在他的供词中说犹委会宣传犹太人具有独特性。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尤泽福维奇曾经说，必须通过犹太人这个棱镜来展示苏联的生活。爱泼斯坦讲的和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正是他们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的犹委会以及其中的《埃尼凯特》报确定了这样一种活动的性质。爱泼斯坦说过，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工人及目前已经对苏联抱同情态度的工人不需要犹委会的材料，宣传的对象主要应该是那些阅读与苏联为敌的犹太报纸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爱泼斯坦设法去适应这些人。他曾经说，只有通过展示苏联的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展示法西斯匪徒灭绝犹太人的行为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所有这一切洛佐夫斯基不可能不知道，看来，这是一种以外国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对苏联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不感兴趣这一点为依据的普遍方针。

接下来起诉书指控我 1947 年怀着进行间谍活动的目的去了基辅。

1947 年我受犹委会的派遣（在整个期间惟一的一次派遣）去了基辅，目的是了解乌克兰科学院下属的犹太文化研究室的工作情

形，写一篇报道这项工作的文章。

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从事收集民间口头创作、民歌及对语言进行语文学研究工作的研究室不可能是间谍活动感兴趣的目标。

起诉书指控我于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在苏联逗留期间，把有关比罗比詹的情报传递给他们，不过没有说是什么样的情报。我已经对法庭讲过，在邀请戈尔德贝格到我那里吃饭之前，我曾通过尤泽福维奇征询洛佐夫斯基的意见，该不该这样做，还是通过尤泽福维奇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重复说这件事是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当我饭后到“民族”宾馆回拜戈尔德贝格的时候，我看到他那儿摆着几期《埃尼凯特》报，在这份报纸上是常有关于比罗比詹的报道的。我看出来戈尔德贝格不知对什么事情感到不满。他连手都没有跟我握就问：“请问你，是哪些犹太人到比罗比詹去？”我想了一想说：“去的是完全胜任生产劳动的那一些人”。在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和我说起过比罗比詹。这就是我传递给戈尔德贝格的全部情报。

关于诺维克。我从1928年认识诺维克，知道他是一个正直而忠诚的共产党员，25年来他几乎是每天每日真诚而热情地在《自由晨报》的版面上劳作，一次次地打退对苏联的诽谤性攻击。我知道他是一个勤奋劳作的共产党人，愿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而贡献终生。

比罗比詹使诺维克感兴趣，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引起美国的注意及对犹太劳动者和苏联的同情的的手段，由于这些人在美国深受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之苦，那么《自由晨报》通过展示联共（布）和民族政策，就可以让这些产生某种希望。

诺维克曾和我一块在比罗比詹逗留了一段时间，他根本不知道那儿的一切情形。

18时1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1727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布雷格曼患病的裁决书

(1952年7月9日)

1952年7月9日

裁 决 书

莫斯科市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由
军法中将切普佐夫任审判长
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及
军法少将德米德里耶夫任审判员

由于收到了医生关于布雷格曼身患重病，不省人事，因而无法出庭进行供述的诊断，对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被依据俄罗斯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和第58-2条控告一案能否继续进行审理的问题进行了磋商。

根据上述情况，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裁决：

对被告人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的刑事案件在其痊愈之前暂停审理。

将布雷格曼一案的侦讯材料从总案中抽出另案办理。

原本经相应人员签名。

与原本核对无误。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书记员、

上尉 阿法纳西耶夫（签名）

№ 11728

贝格尔森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9日)

(审判)长：被告贝格尔森，你对自己的供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贝格尔森：我想讲一讲我那些被鉴定为反苏的文章。

我写过几百篇文章，有6篇被送去鉴定。其中有一篇标题是《年青的苏联犹太人》。那篇文章是为了纪念红军的建军节而写的。文章的任务是要反映出年青的犹太人在沙皇军队中的表现和新的苏联年青犹太军人之间的差别。必须要考虑文章所针对的读者。我针对的对象是已经从苏联移居国外、现今是委员会进行工作的主要群体的那一些人，应该对他们展示出苏联的犹太青年今天的表现。

我从《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选取了一些东西写进了这篇文章里，那篇文章讲的是4位共青团员建功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犹太人。我就拿这个犹太人作了典型。在整个这一时期我也不止一次地写过俄罗斯人。有证据说明与苏联敌对的报刊为我写俄罗斯人而骂我。这是海菲茨告诉我的。

所有这6篇文章我都能举出这样的事例来，可是这些文章却被说成是民族主义的而加罪于我。

(审判)长：被告霍夫斯坦，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补充吗？

霍夫斯坦：我不准备滥用你的一片好意。我从来都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起诉书里边说我不仅是委员会的成员，而且居于领导地位，说我是苏维埃政权和党的敌人。

我想说，我不能承认我犯了所指控的这些罪，我想法庭会给我机会，让我自由地在我的亲人中间度过我的余生，让我可以用尽心尽力的劳动为劳动人民服务。

(审判)长：被告伊利亚·瓦坚贝格，你对法庭的侦讯有什么可补充的？

瓦坚贝格：我想对我在美国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再补充上几点，因为这已经反映在起诉书里边了。

1. 我在20年代后半期的几年里，曾在犹太共产党的报纸《自由晨报》上定期写政治评论和政治文章，在这些评论和文章中我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同犹太复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犹太民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2. 在“伊科尔”内部，我在那一时期曾在口头上和刊物上不止一次地发表意见，反对犹太资产阶级组织“卓因特”和“卓因特农业组织”——对这些组织的反动实质和它们所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

3. 我一直在为反对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企图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他们也把我认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4. 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眼前进行的，许多这儿在场的人也是知道的。爱泼斯坦也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他邀请我来犹委会工作，他邀请的不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正好相反，邀请的是一个在美国的多年工作中他所了解的共产党人。

现在来说控告的罪名。我被控告共同进行犹委会的民族主义间谍活动，此外还有个人进行间谍活动。要说我参与了委员会的犯罪活动——我敢肯定地说，无论是制定委员会的活动计划，还是确定这种活动的方针，无论是讨论委员会的什么措施，还是委员会进行实际的工作，不管是组织寄发民族主义的、谍报的或是其他什么性

质的材料，我都根本没有参与。

我已经向法庭供述过，并且希望已经证明了我和委员会的全部联系仅仅是 1942 年我担任过 5~6 周委员会的在编专员的职务，履行过照章办事的而不是犯罪性质的任务。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事了。所以说，起诉书中所讲的所有主要罪行，即间谍活动，民族主义活动，关于克里木的谋划，我根本就没有参与。

起诉书的第 31 页说，这些罪行除瓦坚贝格本人供认不讳之外，此前已被判罪的他们的同谋者的供词、证人和证言、鉴定的结论、物证和文件也都揭露了他是有罪的。这事应该分解开，对每一个被告分别进行追究。这件事不能由我来做，但是我却可以根据我所看到的材料断定，无论是文件还是物证，不管是鉴定的结论还是此前已被判罪的人，即所谓的同谋者的供词都没有任何，确确实实是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我犯了罪的东西。那么还剩下什么东西了呢？剩下的就是证人的证言和本人的供认了。我们来看一看证人的证言。材料里边有 4 位证人：祖斯金、贝格尔森、费费尔和塔尔米对我这个案件的证言。

要说祖斯金的证言，那么他供说的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在米霍埃尔斯的接待室里见到过我，再说他在法庭这儿又不承认这些供词，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证言无关紧要。

说到贝格尔森的证言，他是供说他曾在文学晚会上，个人交往的场合，碰上过我，谈过话，他从中得出一个印象：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这种指控没有证据。

塔尔米供说我给诺维克提供过间谍情报，这关系到我个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可是这些证言同样没有证据加以证实。至于说费费尔的证言，那么第一，他说我在委员会工作时是 1943 初离开委员会的，这样他就确证了我的供述，而不是侦查人员的说法。费费尔供说，我曾写过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他从而也就证实了我在这儿讲的话，

而不是侦查人员的结论。费费尔说，爱泼斯坦曾讲过在美国人们知道我，而我了解美国，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最后，费费尔讲了那份对同乡会的呼吁书，起草这份呼吁书的事我已经承认了。

结论：证人的证言中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实我参与或者共同参加了起诉书所讲的所有那3条根本性的罪行，即关于克里木的密谋，收集间谍情报和勾结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民族主义的活动。还剩下什么了？只剩下我本人的供词了。我必须说，审判长公民，我无意对本人的供词采取轻率的态度，我承认本人的供词是具有很重的分量的，对之应该采取更为严肃的态度。然而本人的供词又不是不容置辩的或者不可加以推翻的事实，这不是绝对的证据，为此有审判监督程序，有法庭去进行比较、相互联系等等，以便证明这些预审的供词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

关于我在预审时的供词我已经讲过了。我要说，我在预审时所做的供述已为我在法庭上的供述所驳斥，为那些存在而在这42卷材料里边却没有的事情所驳斥，因为这些卷材料没有一卷能证实我参与了委员会的间谍活动，没有一卷能证实我参与了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没有一卷能证实我参与了克里木问题，而是相反，我证明了，证人们也证明了我反对这种想法的，证明了我反对犹太人这一选题，并力争写其他题材的。我的供词得到了塔尔米、尤泽福维奇和费费尔的证实，他们在法庭这儿证实了我所做的那些供述。这样我就证明了自己无罪。

……

因此，我做这样一个归纳：对第三个主要点——瓦坚贝格是苏联的敌人——的这项控告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对我的控告没有得到证实。

至于说我个人进行间谍活动，那么这说的是第三点。这就是1929年的比罗比詹之行。我不讲1926年我出席“犹太会”代表大

会的事了。说一说 1929 年去比罗比詹的事。在这次旅行期间我观察了移民们的生活环境，观察了他们是怎样适应新的生活的。了解了苏联政府为比罗比詹提供的优惠条件。我参观了 3 个集体农庄，我的工作也就此结束了。公诉方说这是收集间谍情报。可是这并没有证据加以证实。然而我可以针锋相对地举出塔尔米的书为证，那本书讲到，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任何谍报性质和反苏性质的事情。这本书证明我和塔尔米所关心的仅仅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事，它驳斥了提出的指控。

我还被认定有执行阿尔马佐夫的所谓“敌方任务”的罪行——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用公诉方的话说——这是美国反动集团的谍报任务，而事实上这是“伊科尔”——一个同苏联友好的组织，一个美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秘书长提出的一项请求。他请我时不时地对有关比罗比詹的建设成就的材料进行通报。

起诉书说除了关于比罗比詹的情报外，我还报告过关于苏联国内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的情报，并把这些情报转寄到美国去。

起诉书这种空口无凭的说法，顺便说一下，在这些过了 40 个月之后由侦查人员花了 4~5 天的时间编造好的文件里并不少见，这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得有多么匆忙。在整个案卷里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而且也不能断言我就是那里边把我形容成的那样一个人。这些文件里的那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关于诺维克我在这儿就什么也不讲了，既然安全部认为他是个间谍，那我也就不去对诺维克进行颂扬了。如果出于国家安全的缘由不能对他是间谍这一点进行论证，如果说对此公开做出了宣布，必须予以考虑，我甚至认为这也是可以的。但要追究我协助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责，公诉方就必须证明我知道或者是（在具有合理的警惕性的条件下）应当知道诺维克是一个间谍，他是一个美国的特

工，可是既然没有这样做而且情况相反，既然我看到了给他发了入境签证，既然我看到了为他在全国自由旅行并收集情报提供帮助，那么就是说安全机关是信任他的。那怎么可以要求我不和他讲话，不为他这个到我们国家来、我又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人完成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提供方便呢。

所以，起诉书所说的这3件个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我肯定是没有得到证实的。

那么我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呢？我承认我犯的罪行是：我在自己惟一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就是在苏联的犹太人和美国的犹太人之间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然而依然有着某些共同之外，具体说就是犹太语言和先进的文化遗产。在这一表述中我现在仍然能找出民族主义的成分。我必须说，这样一种概念——民族主义是和世界主义相互排斥的，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但是今天一切都混乱了，在美帝国主义提出了世界霸权的口号而丘吉尔标榜“欧罗巴合众国”的今天——一切都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

现在我想说一下我先前曾经提到过的贝格尔森的供词。

贝格尔森在他的供词中说，他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自认是民族主义者。他在这里给我，也给塔尔米提出了问题，这在实质上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我同你谈过文学问题没有？你和我两个人的观点有什么差别吗？”接着他便下结论说，既然观点没有什么不同，那就说明我是和他一样的民族主义者。对此我必须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这儿有一个人说过，贝格尔森比任何人都更为经常地反复讲“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这几个词儿。对的，贝格尔森常常说这样的话，我也确信他说这话是真诚的，他也相信他明白这话的意义并且正在贯彻这句话。可是罗马人早就说过：“当两个人做同样一件事的时候，这就不是同样一件事”。贝格

尔森和我之间终归还是有差别的。我没有古犹太文化的功底，我受的是另外一种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是一种与贝格尔森的不相同的东西。在他单纯地搞犹太人题材的时候，我毕竟写了一些其他题材的东西。我写过司法题材，用英文写了一本篇幅很大的关于合作制的小册子，并且翻译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因此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我要说我不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与民族主义也没有有什么关系。

出于所有这些想法，我请求军事审判庭注意，对我的控告并没有得到证实，从而做出相应的结论。

我还要说，在侦讯时和在庭审过程中我没有讲过任何关于塔尔米的坏话，他说我仿佛是说了他的什么坏话是不对的。

只有那么一个词儿。在一次让我好多个夜晚睡不着觉的审讯的记录里写着，塔尔米当年对十月革命持仇恨的态度，但那不是我的话。我说的是“观望态度”，后来和侦查员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同意使用“否定态度”这个词儿，最终侦查员却写上了“仇恨态度”。

我想说，我不知道塔尔米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知道他是一位忠诚老实、奉公守法、毫不妥协的苏联爱国者。

最后，再说两句关于我讲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供词的话，就是审判长公民在这儿对我宣读过的那一段。我不去讲这些供词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些供词是用侦查人员的语言讲的，是从侦查人员的观点记载下来的。对此我还应该补充说，在我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30年间，我没有听见她说过一句有悖于苏联的话。相反，她一贯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和苏联最高度的忠诚。

14时2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小时后法庭继续开庭。

审判长宣读军事审判庭关于把指控所罗门·列昂季耶

维奇·布雷格曼的材料从本案中分离出来及因病暂缓对其进行审理的判决书。^①

(审判)长：被告希梅利奥维奇，你对法庭侦讯还有什么补充？

希梅利奥维奇：我有机会在1952年阅读预审的42卷材料，了解它们的内容，给我指明的那些内容。有机会在两个月期间出席军事审判庭所有的各次开庭审讯，庭讯时的情形是35年来第一次完全平静的，面对军事审判庭我要给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1. 在原犹委会里对我这个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是否曾保守过秘密？我的回答是：“是的，保守了秘密，而且是严格的保密”。我要谈一谈这个问题，列举一些事情。

收到美国“黑皮书”排样的事我是到了法庭上才知道的。1946年出版了“黑皮书”，而我是在1952年向我出示关于指定人员对该书进行鉴定的决定时才得知的。……^②年费费尔写关于“黑皮书”问题的信我是在法庭上知道的。收到“黑皮书”的事我是在法庭上知道的。党中央委员会对犹委会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检查，我是在法庭上知道的。同帕纽什金和苏斯洛夫谈封闭委员会的问题我是在法庭上知道的。莫洛托夫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监督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波波夫关于把馈赠物品分配给居民的批示我是1952年得知的。什基里亚托夫会见克维特科和费费尔我是在法庭上得知的。戈尔德贝格是一家反动报纸的编辑这个情况我是1952年得知的。戈尔德贝格同米·伊·加里宁谈话，据说加里宁仿佛告诉戈尔德贝格，现在有一个自治州——比罗比詹，以后还会有一个自治共和国，这我是1952年从戈尔德贝格发来的电报中方了解到的，这封电报附在案卷里。由米霍埃尔斯、费费尔和爱泼斯坦签字并呈送约·维·斯大林的关于克

^① 见本专题文件No11727。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年代字迹不清。

里木的呈文，我在 1952 年之前一直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它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个问题遭到维·米·莫洛托夫的拒绝——口头的或是书面的，我直到 1952 年才得知，这样的事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这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对我保守秘密？我只说我自己，因为在莫斯科未必会有什么人不把我看作一名党员，一个苏维埃人，一个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定原则性的人而相当敬重的。他们把自己的活动向我保密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必定要干预他们的活动，并阻挠他们干这些事情的。

在这儿说到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过以色列问题。那次会议是 1948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而我在 1948 年 10 月 1 日就和做医生的妻子一起到基斯洛沃茨克市去了，10 月 21 日正在捷尔任斯基疗养院，就是说 10 月 21 日我不可能出席这次会议。斯列帕克关于以色列的报告我不知道，也不了解会议记录中都记了些什么。克维特科在这儿已经说了，犹委会的记录是不能相信的，而布雷格曼说过，有一次他出席了主席团会议，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讲了话，可是后来他看了记录里边对我那次发言的记载，感到惊骇万分。在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公民几次追问费费尔，我是否在主席团的会议上提出过扩大犹委会职能的问题时，虽然费费尔说了扩大职能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我还是要说我从来没有提过扩大犹委会职能的问题，我只不过讲过要扩大反宣传和宣传工作，如果主席团会议的记录里记的是我讲要朝着保护犹太人的权利方面扩大委员会的职能，那么这份记录，这一部分里的真话就和现时莫斯科及莫斯科州大地上的积雪一般多。

接下来，说到我同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的会见，我否认在这里讲的那些关于我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同他们互吻的话。这是没有的事。无论是尤泽福维奇还是布雷格曼都对此没有予以证实。那么有谁会看到这个场面呢？就只有侦查员才会看到了，他于是就把这事扣在了我的头上。“美好的犹太人心灵”这句话还是不足以提起控

告的，因为这句话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现在来说同戈尔德贝格的违法的联系。对这个问题我讲的比记载下来的还要多。我讲了我和他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会见的，讲了我没有进行任何交谈。说我曾两次拜会诺维克，对戈尔德贝格特别厚待——费费尔并没能证实。关于克里木问题。费费尔在回答审判长公民的问题时说，关于克里木问题他和我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终于，费费尔说了实话。审判长公民给费费尔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在场的人当中谁是民族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费费尔回答说，他不认为我是民族主义者。这就是说，指控希梅利奥维奇是民族主义者的罪名不能成立。费费尔不认为希梅利奥维奇是民族主义者，也否认他曾同我交谈过克里木问题这个情节。费费尔还否认希梅利奥维奇曾经攻击过苏联政府及其他的领导人。费费尔只说到我曾讲过一些关于波波夫的话，不过这件事我后面再说。

还想说一点，就是侦讯时费费尔是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招供的。或许有那么一次曾用手指着对费费尔进行过威胁，可是此外对他再也没有威胁过，所以说他的全部供述都是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费费尔在审判庭发言时说，“我们，对我们”这两个词儿他用得非常频繁。说在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从美国返回后，他们曾同我和尤泽福维奇在一起就克里木问题进行串通，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没有和我这个被他们认为是“下层群众”的人谈过任何话。接着费费尔讲了给约·维·斯大林的呈文。这份呈文我是在1952年进行对质时才第一次听说的。以前我曾听说给维·米·莫洛托夫送过这种呈文。认为希梅利奥维奇曾和努西诺夫交谈过这份呈文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既然费费尔在审判庭上声称没有跟我谈过任何有关克里木的话，那么他又怎么能够断言他曾经在努西诺夫那里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呢，费费尔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费费尔这样做，对我进行造谣诽谤。对费费尔

的侦讯可一直都是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侦查员们对待他是很好的，我可不能说侦查员留明也是像侦查员对待费费尔那样对待我的。在我被关押在列福尔托沃的最后的6个月期间，我在第一份侦讯终结书上签过字之后，曾请求给我一副眼镜——却并没有把眼镜给我。我有14个月没有收到转给我的钱了，可是费费尔每一次都能向他的家人转致问候，可我从留明嘴里只听到一句话：我的家属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将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可是那个时候还是接收了我的家属送来的转交物品的，尽管这事不跟我说，也不把东西交给我，也就是说我的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可是从1950年9月1日到1951年11月17日，也就是1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收受我的家属给我送的任何东西，我的家里的人也就不知道我是死是活了。

费费尔还说，在什么样程度上——是不是思想上的，他不知道，不过米霍埃尔斯和希梅利奥维奇是有联系的。我也是讲过的，我和米霍埃尔斯很友好。然而这儿说的可是犯法的联系。既然他不知道我和他之间是不是思想上的联系，那他为什么在我被捕的前两天，也就是1949年1月11日，供说希梅利奥维奇是米霍埃尔斯的头号民族主义问题顾问呢。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公民在第一天的夜里见了我劈头一句话就是：“这就是米霍埃尔斯的头号顾问么?!”费费尔就这样在不知道我和米霍埃尔斯之间的联系的性质是否是思想上的这种情况下，给我加上了“头号顾问”的称号。

现在说马尔基什的供词。在我问他为什么把我说成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把我算作民族主义者的依据，是他知道我和米霍埃尔斯关系很好，而他和米霍埃尔斯斗争了20年，他并且声称，他是直到看了案卷之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的。马尔基什说，他是1952年看到各卷预审材料的，可是早在1949年他就把我列进了民族主义者之中。我要说这真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在这儿有人提到尤泽福维奇在预审时曾供述过我的事。这事我是到了这儿才知道的，因为给我看的那些册案卷里没有记载这件事。

我想补充说我那篇关于包特金医院的文章写于1948年12月中旬，也就是在委员会被封闭之后。文中没有任何机密的东西。文章是应苏联情报局的稿约写的。

(审判)长：你对侦讯还想补充什么？你在审判庭上对你接受侦查时的口供已经讲得很充分，很详尽了。

希梅利奥维奇：我要说，审判长公民，有些不是原则性的、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我是明知不对但还是签了字的，我当时就告诉侦查员留明这是不对的。我签上字这是不对的。我在说不记得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话上签了字。我想说我不断地请求留明；3年来我一直请求留明准许我给部长写封信。1949年4月中旬我就开始请求这样做。

(审判)长：这件事你已经说过了，你说完了吗？

被告祖斯金，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请你不要重说已经讲过的事情，要说还没有讲过的事，说审判庭还不知道的事。

祖斯金：我要讲很具体的事情，只说一说6月11、12两天在我向审判庭做混乱不堪而又喋喋不休的供述时讲的那些事情。

我利用休庭的时间努力去记忆所有被审问过的被告人的供词，并仔仔细细地对起诉书进行分析，把它的每一页都反复阅读了好多遍，于是我发现了一个关于我的奇怪情况。起诉书共写了45页。在全部这45页上我的姓氏——祖斯金——共提到6次，有4次出现在第1和第2两页上，那个地方说我和米霍埃尔斯一起，把剧院变成了由美国的反动集团操纵的间谍活动中心。

从第2页开始说到的13名被告人中间没有我的姓名。一直到第11页止，对这13名被告人进行了评述，结果查明他们在犹委会

成立的那个时候已经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是一有机会就要加紧进行破坏党和苏联政府的工作的。就是说我并不在他们之列。下面在第 12 页上写着：“……根据这种情况，爱泼斯坦按照同洛佐夫斯基达成一致的意见于 1942 年把本案的被告人克维特科、马尔基什、贝格尔森、希梅利奥维奇、祖斯金拉入犹委会，他们形成了民族主义的骨干，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后来依靠他们开展了反苏的工作”，然而在 1943 年 9 月 27 日之前我一直住在塔什干，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到过犹委会。

起诉书的第 16 页说：“根据洛佐夫斯基的指示，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尤泽福维奇和希梅利奥维奇在 1944 年的 1 月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克里木这片土地提供给犹太人使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1944 年 4 月 11 日之前我本人同犹委会没有任何关系，可见，围绕着克里木发生的整个这场喧嚣，是我当上犹委会主席团委员之前的事情。在犹委会的会议上有我出席时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列出了 14 个帮助收集机密材料的被告人的具体姓名。本案所追究的 14 名被告人全部被作为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人员点出了姓名，只有我祖斯金除外。

我出席过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我再说一遍是正式的会议，连那种会议也只是偶尔去去，犹委会的问题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没有心思做这种事。在所有这些卷侦查材料里边，具体说到我个人在犹委会中进行工作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在 45 页的起诉书中也同样没有讲这个问题。这也可以从其他被告人的供词中看得出来，他们讲犹委会的活动时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大概只有被告人费费尔一个人引用米霍埃尔斯的话，把我说成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却又没有这样做的像样的依据……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侦查机关为什么不具体讲我个人在犹

委会这方面进行的犯罪活动。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是死了，但是还有费费尔，他在对质时供说他从来也没有按照犹委会的系统给我布置过什么任务，在审判庭上他也证实了他的这些供述。

我从来也没有和任何人进行过一次类似反苏性质的谈话。

最后我想说，无论是费费尔还是米霍埃尔斯都不能算作是我的同谋，我也不能算是他们的同谋。我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受过任何任务，没有同他们做过任何交谈，我那时只是出席过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同他们交往密切。在正式会议之外我同他们没有来往关系。

米霍埃尔斯认为，犹太剧院首先是犹太人的剧院，观众在那儿应该能够找到别的剧院没有的东西。我对他说，犹太剧院这首先是用犹太语演出的苏联剧院。这就是我想在这儿提一提的那个定义。

我想说一说费多谢耶夫的证言，他认为《犹太人区的起义》那部戏有毛病。那部戏是1947年初，米霍埃尔斯还活着的时候上演的。在那之后米霍埃尔斯活了整整一年，如果是费多谢耶夫批评这部戏，那么为什么早在米霍埃尔斯还活着的时候，他看过这部戏而不要求把这部戏从剧院的剧目上撤下来呢？

最后我可以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自己犯了对我提出控告的那种没有根据的、没有具体内容的罪行。我根本没有积极地参加工作，我仅仅是看到了会议上的情形，所以我不能对委员会里所做的事情负全面的责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有嫌疑的。在这样一点上我可以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我把全篇起诉书都极其仔细地看过了，但是没能找出一件事情能够说明可以对我提出这么可怕的控告。我现在期望并且相信审判庭会对我在犹委会的工作做出公正的判决。

20时2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952年7月10日13时45分审判庭继续开庭。

No 11729

塔尔米等人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10日)

(审判)长：被告塔尔米，你对自己的供词有什么补充吗？

塔尔米：……我有民族主义思想，那基本上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个时期，就是我生活于其间的犹太民众在沙皇俄国和其他的国家里遭受压迫的那个时代。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于犹太劳动群众的利益。诚然，这种利益当时被我理解错了，然而我那时就是那么理解的。可是这仍然不属于犯罪的范围，若是让我说，那是一种谬误。不管怎么样，我的民族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沙文主义的东西，不宣传犹太民族特殊，优秀。相反，我是一贯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的……

接着塔尔米详细讲述了在20年代他作为美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在美国进行的活动。

塔尔米：我对审判庭陈述了可以找到文件加以证实或是活着的证人加以确认的事实。我希望对我的审判不是以毫无根据的说法和连十分之一的真实都没有的概括为依据。我希望对我的审判能以我所讲的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表明，我能够用我30年真心实意、热诚忠实的工作，为苏联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服务的行动，来驳斥起诉书中那些指控我的说法。

(审判)长：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你要对自己的供词补充些什么？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想补充说，我不否认转交某

些机密资料可能是我的一种疏忽，但并不是有意的。我肯定，我从未听见诺维克讲过反苏的言论。

预审时我曾经说过，我曾对诺维克讲，有一段时间从疏散地返回的犹太人只能住在很拥挤的住房里，而这话却被侦查人员解释成不给犹太人房子住，还对他们进行压制。我记得非常清楚，曾经谈到过在疏散的时期犹太人获得了新的技能并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可是这却被解释成对犹太人进行压制，不安排他们去做原来的工作。

我得说我受到的侦讯格外痛苦。审问我的时候桌子上摆着橡皮棍子。由于我是委员会的编内人员，侦查员认为什么事情我都该知道，于是他就没完没了地对我进行威胁。我老是受到威胁说要狠狠地打我，让我变成残废，等等。洛佐夫斯基在这儿说过，这种做法并没有把他吓住，可是我必须说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处于一种狂乱的状态。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都听见侦查员说要打我，要狠狠地打。在我那已经失常的想象中，我老是听到据说仿佛是在挨打的我的丈夫的喊叫声；我被弄成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开始寻找罪行，开始对侦查员讲的内容表示同意，并为自己凭空臆造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和戴维斯的谈话就是我编造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关于歧视的谈话，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戴维斯，只不过是我去爱泼斯坦的办公室时在那儿看见过他一次。只有我在审判庭上的供述才是真的。我想说说下面这些问题：我在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并没有任何犯罪的地方，所有的翻译文章都是给图书出版管理局翻译的。我没有从委员会的领导人那儿接受过任何工作，任何要翻译的文章。我有时候听到人谈论，说在某某地方解除了犹太人的工作，某某人没有住房，这种话我听到过，但是却从来没有把这当作是政府对犹太人的压制。地方上对待犹太人的许多岂有此理的事情我都理解为地方上的领导人的不正确的行为，并且认为政府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的错误仅仅是我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驳斥，而是默不作声地听着。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从这里边做出结论，说犹太人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什么压制。7月20日的记录里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对的，那儿记载着说我仿佛是对施列斯贝格讲，政府正在努力让对米霍埃尔斯的纪念被忘却，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纪录里的东西全是臆造出来的和被歪曲了的。硬说我有一些我自己知都不知道的朋友。跟我说我认识列昂·布卢姆——我却不认识这个人。侦查员对我说：“反正你就签字吧”；我就签了字，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对我都已无所谓了。我也不认识安娜·路易莎·斯特龙金娜，我只在出版社见过她一次，她的外貌我能说上来，但和她却从来都不认识。1949年关于我在美国的朋友的那最后一份记录与事实不符。

1947年安全部的代表来找我，表示想要一份我在美国认识的并且可以为安全部机关所利用的人的名单，我给了他这样一份名单。这是一些艺术界、科学界、文学界、商业界的人。15年前我认识这些人，他们当中有一些可能都死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份名单交了。这份名单当中有像哥伦比亚学院教授孔茨——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及其他几个这样一些人。安全部的代表对我说，这些人可能被用于良好的意图和目的。所有这些我认识并且提供出来的人，最后都被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往来关系，加在了我的头上，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觉得，1935年国防人民委员认为有必要派我秘密赴美执行任务，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对我是信任的，对我进行了审查，认为我是可以去美国的。整整过了3个月，我完成了任务，秘密出差后返回，为此我受到了嘉奖。

当然，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时可能出错误，发生庸俗的议论，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谈论过反苏的话。塔尔米的发言举出了我对于排除买面包发议论的例子。这样的错误我是可能有的，但是这件事只从庸俗的观点来看待。我没有任何反苏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诽谤过政府，我希望审判庭能把我这宗复杂的案件审理清楚。

（审判）长：被告什泰恩，你能为自己的供词补充些什么？

什泰恩：我十分迫切地盼望到法庭上来接受审判，要尽可能地快。我为什么要这样期盼呢？因为我认为法庭会把我这宗案子审理清楚，并给予我的所有行动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从来都不认为可以用不怀好意的态度来看待现时的事情，即苏联的实际状况，更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我提供了一切工作的机会，我也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这种工作。我认为必须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这项工作。而我30年来所试验的东西获得了实际应用。

我谴责我自己做事不理智，为自己遭受诽谤提供了机会，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是滔天的罪行，因为我的这种行为也给苏联的保健事业造成了损失。今天本来还有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是应该得到挽救的。我希望今后我还能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我不去讲我并非那个把犹委会变成了一个中心的组织的首领这种事，因为这在先前已经讲过了。我认为对我在委员会里进行的活动所提出的控告是不对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委员会里工作，也不可能做这种工作，因为我对委员会的那些事务全都不熟悉。但是我觉得自己当时认为对这个工作可以不加过问，不采取什么行动，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有罪的。我对委员会的工作不感兴趣，然而我也没有想到那个地方会干什么敌对的事情，而是看到这是一个类似于慈善团体的组织，类似一个小的协会，与革命前有过的那些协会相仿的协会。但是我应当对这个问题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假如我对这个问题是很认真的，也许我能看出那儿存在着什么毛病。

我否认我讲过任何民族主义的反苏的话。我没有说出过一个反

苏的字。我对犹委会的会议记录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因为记录没有反映我想要讲的意思。

我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发生变化，有了进展，而这些是需要加以考虑的，可是我还是继续像在日内瓦居住时那样生活。我对人完全没有任何警惕性，没有任何警觉性。我热爱真理，并努力做一个更加诚实的人，我也以为人们都是这样的，我不相信他们会把什么利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过错。

我了解国外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在国外老是说不让苏联人和外国人接触。我想要表明这不是真的。我曾对外国的科学家朋友说：“如果你们想来就来吧”，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人有兴趣，而是我想表明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来过一批瑞士人，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女友的丈夫，他是大使馆的秘书，在一次官方的招待会上我碰上了他。他走到我身边说：“我带来了到您的问候，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到您那儿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是被禁止会见外国人的，我不想让您为难”，然后他又补充说，他受到监视等等。我告诉他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如果您明天愿意到我的研究所里来，那么您就来好了，您会看到没有什么人监视您。我没有邀请他到家里去，因为我家的条件不合适。

(审判) 长：他对你说受到监视了吗？

什泰恩：是的。他说他觉得在对他进行监视。

(审判) 长：你还想说什么？

什泰恩：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向任何人转交任何机密情报。谈不上我给马德提供什么情报的问题。马德是一位大细菌学家，但是对我从事的这门科学他没有兴趣。美国科学家一般是很狭窄的，他们通晓自己这个科学门类，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个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情况，就是在治疗的初期必须给大剂量的链霉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讲的情况对我来说很重要，这

证实了我的想法。至于莱斯利——我跟他没有谈过任何科学上的问题。

(审判)长：马德是干什么来的？

什泰恩：他是奥帕林通过全苏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的。这都是奥帕林的客人。

(审判)长：在科学方面你们的研究方向不同，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和他会面的呢？

什泰恩：马德和莱斯利来到以后，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带来了我兄弟的问候。我对同他们会见很有兴趣，因为我知道他们在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另外我也很想知道弟弟的情况。

现在说说特里普。她是外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不过她也是我所在的那个团体——“国际大学妇女联盟”——的成员。我没有向她转交任何情报。

15时1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03421

费费尔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补充供述

(1952年7月10日)

20时10分审判长宣布被告费费尔被带到法庭。费费尔在回答审判长的提问时声称，他不能“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那首诗是“他的一个错误”。

费费尔：在审判庭上我讲了马尔基什及其他的犹太诗人和作家的个别的民族主义的错误，然而关于他们作为一种罪行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一点也不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我都已经报告给安全部的机关了，这一点审判庭可以进行核查。

我预审时关于某些人的民族主义所做的供述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不是真实的。

我确认我关于卡甘的供述。至于说关于舍伊宁（检察长）的供述，那只有讲《艾里斯》那部戏的民族主义内容方面是真的，不过这件事我仅仅是听米霍埃尔斯怎么说就怎么讲的。我对舍伊宁在纽伦堡审判中所起的作用的供述我不给予以确认。总之，关于他的事情审讯采用了拷问的方式。

我在预审时对我所知道的某些人的所有民族主义表现，提供的一直是真实的情况，可是后来经过侦查员的校订，我所有的供词都有了另外一种意味。我往上签名的记录通常都是侦查员事先已经做好了。

我关于爱泼斯坦的供述基本上是真的。我在安全部曾经写

道，他的一些言论在我听来是有悖于对苏维埃政权应有的态度的。

埃廷格尔非常关心以色列国的前途，对苏联政府参与这一问题软弱无力极为不满，另外，他对苏联推广李森科的经验 and 学说也表示不满。

是爱泼斯坦介绍我同埃廷格尔认识的……

……我在审判庭上，特别是第一天，3月8日那天，努力坚持我在预审时所做的供述。出现这种事情是因为在那之前3天曾传我到苏联安全部侦查处去同兹巴尔斯基对质，然后库兹明先是当着日鲁欣的面，然后又在科尼亚欣在场的时候警告我，在法庭上我的供述必须和侦讯时的供诉一样。

在法庭上我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讲法是受到了同库兹明的谈话的影响的，因为我不愿意落入希梅利奥维奇的那种境地。

对其他问题费费尔供说：

犹委会在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错误，但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妥善安置犹太人的问题是米霍埃尔斯个人办的，这同犹委会主席团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主席团组成人员的挑选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而是以这个或是那个人的知名度为依据的。

比如说主席这个职位就曾拟定过兹巴尔斯基、坦基洛维奇、扎斯拉夫斯基及其他几个候选人。

扩大犹委会的职能基本上是1945年之前的事，归结起来的不过是给联共（布）党中央和政府写了几封信，但这是我就任责任秘书职务之前的事。

犹委会同“德尔埃梅斯”出版社、国家犹太剧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犹太文化研究室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这同样说明了加给犹委会的“民族主义中心”这个叫法不能成立。

对《埃尼凯特》报的鉴定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不能

设想在苏联国内众目睽睽之下可以有像鉴定所形容的那样的敌对性报纸。

我还想说，在犹太人中间过去有现在依然有民族主义的情绪，1948年由于成立了以色列国，这种情绪表现得特别强烈，关于这一切我都向安全部机关做了汇报。比如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一位姓罗加切夫斯基的工程师到犹委会来找我，他说在他家里一些犹太人工程师聚集到一起，讨论据说苏联存在的歧视犹太人的问题，打算讨论完了给政府写信反映这种事。罗加切夫斯基邀请我也到他家去。我当然是拒绝了这样做，然后把一切都向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做了报告。

随后一次罗加切夫斯基告诉我，他倡议组建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去，还交给我一份关于这件事的书面申请，请我把它转给上报机关。我把这份申请书转交给安全部了。

最后费费尔说：

我再一次向审判庭声明，我对某些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全部供述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但却被侦查机关渲染夸大了。

我对自己的供词此外再没有什么补充了。

21时零分审判长宣布审判庭闭庭。

1952年7月11日12时45分审判庭继续开庭。

№ 11730

被告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上的最后陈述

(1952年7月11日)

审判长宣布本案法庭调查完毕，由被告做最后的陈述。

被告费费尔：审判长公民，审判员公民们！我所知道的本案的情况我已经全都对审判庭讲了。

我想请你们相信，我在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中从来都不是一个候鸟式的人。

我的生活是和我的创作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关于布琼尼骑兵的诗。我的全部生活和创作都是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作品总是刊登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报刊杂志上。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这样写：苏联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是贯彻约·维·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学说和学习俄罗斯民族伟大榜样的结果。

30年来，我有幸歌颂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并比写犹太人更多地去书写俄罗斯和乌克兰，有的人甚至为此对我进行非难。

我请求审判庭考虑我所讲的一切，不要剥夺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苏联人民服务的机会。

被告泰乌明：我想告诉审判庭，我在把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资料交给戈尔德贝格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有益于苏联的事情。我是想利用戈尔德贝格来宣传苏联的成就，我以前就曾利

用过许多其他的外国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这样做。我总是尽力利用一切可能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在戈尔德贝格这件事情上我显露出在政治上目光短浅，上了美国的间谍暗探的当。

我生活中惟一的乐趣就是我的工作，我也以此自豪。我还希望今后能以忠诚老实的工作来补偿这次的错误。

我的第二个罪过是我3次都没有对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谈话给以反击，但是我声明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请求审判庭在对我做出判决的时候对所有这一切予以考虑。

被告马尔基什：审判长公民，审判员公民们！我非常清楚偷盗并不是从撬保险柜开始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从公开宣传种族的优越性开始的，而是始于无意识地过分强调自己个人的优越性，这就是盗窃由之开始的那枚“小小的硬币”。

我并没有这样一枚“小小的硬币”。

我想告诉审判庭，我的整个生活及我的文学创作和活动——就是同文学中的落后现象做斗争。

我被称做不安分的人，我为此在美国受到激烈的斥骂。

我所有的书都充满了这种斗争。我是苏联作家当中的普通一兵，当过《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记者。

1934年在苏联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上我朗诵自己的一首诗，我在诗中说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写“小镇上的犹太人”了，为此我遭到痛骂。

第一代苏联作家30年的活动中犯了许多许多的错误，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朝着共产主义的顶峰前进。

我们当今这一代苏联作家进行的工作超前了千年之多，这种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所以我说，如果我的作品今天不算好，那么我感到骄傲的是它们将成为未来的苏联的荷马们的养分，未来的苏联

文化决不会把我的这块小小的砖头从伟大的共产主义建筑中丢弃出去的。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的名字几乎没有被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联系到一起，因为我和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误会，我竟然为犹委会的活动分担了责任。

在侦查的第一阶段，并没有把我归入对犹委会的活动负有责任的人员之中，只指控我宣扬吹捧非苏联的书籍。

在监狱关押期间我并没感到自己犯了什么罪，尽管为家里人感到难过，我的心情还是轻松的。

我仔细思索着自己可能犯过的错误。如果我那首《献给犹太战士》的诗里有错误，那么它只有和犹委会牵扯到一起才可能成为一桩重大的罪行。

难道我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半还赎不了这个过错吗？

诺索夫上校告诉我，他们只给为首的人判罪，我是会被释放的。

留明早在1950年就对我说过，我已经可以构思新书了，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姓名列在犹委会领导人当中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其实，我是“卡在他们喉咙里的一根骨头”。我不想说起诉书了。因为把我的姓名写到那里去——完完全全是一个误会。

我想请求审判庭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对苏联人民的热爱奉献给人民，一如我在30年的创作活动中曾经奉献过的那样。

这回我想以一种新的感悟，用列宁—斯大林的语言去写作。

审判员公民们，我想说无论什么样的诬蔑诽谤都没能把我摧毁。我认为党、政府和苏联人民自己会发觉我写的东西是有益的，会给我机会继续为我们的苏维埃祖国服务的。

被告尤泽福维奇：我请求审判庭在决定我的命运时要考虑到在

法庭上已经调查清楚，我没有参与同精于投机的美国人进行的任何勾结。

我请求要考虑到我没有向任何人转交任何谍报材料。我执行洛佐夫斯基的指示，转交过第 205 研究所的那份材料，但却疏忽大意，没有事先要一个批条。对此我应负党纪责任。

我认为，我应该为参与给“黑皮书”挑选材料同样承担党纪方面的责任。

在法庭上还查明了我没有参与起草关于克里木问题的呈文。

我认为法庭已经调查清楚我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情绪，而且我一贯对此持反对的态度。

我请求要考虑到，所有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拒绝承认他们在预审时对我关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言论所做的供述。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犹委会里会进行敌对活动，因为它的工作是受到联共（布）中央的监督的。正因如此，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军事审判庭和党，我没有犯指控我的那些罪行。

我请求审判庭要考虑到我 30 年来忠实真诚地为党和政府服务，与犹太人组织并无瓜葛。

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欺骗过党，也没耍过两面派的手法。我没参加过任何反党的帮派，而一贯是捍卫党的路线的。我可能犯有某种错误，可能表现出目光短浅，但是却不可能背叛党和祖国。这是骇人听闻的指控。

我面对党和祖国是问心无愧的。

如果军事审判庭对我的诚实和无辜有哪怕是一分钟的怀疑，那么就请判我最严厉的刑罚。

被告洛佐夫斯基：审判庭已经从我的供述中了解到除我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中那 9/10 的活动以外的全部情况了。

我认为已经证明了对我提出的控告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我确信军事审判庭是能正确评价 15 个被告和 35 位侦查员书写的 42 册案卷，并按照党性原则揭露诬蔑诽谤。

所有揭发我的供词都已被预审时在这些供词上签了字的那些人自己当庭推翻了。

作为控告的主要武器的惟一一份文件，就是那封关于犹太人迁居克里木的致维·米·莫洛托夫和约·维·斯大林的信件。那封信含有民族主义的调子，但是由于信不是写来供发表的，我也就没有认为有必要去仔细校订。

关于间谍活动的鉴定结论则写得很怪。在为此目的而选定的材料上没有足以确证这些材料已寄往国外这种事实，并指明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人员的资料。

这些材料是由波诺马廖夫和亚历山德罗夫挑选的，目的就是中伤我，而鉴定人员对评价这些材料采取了肤浅的态度。我想依据这个结论提一个问题：“洛佐夫斯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动机不外乎两条——物质上的好处和同美国的资产阶级群体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

在侦查的过程中第一条立即就消失了，而第二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

我觉得为了我这样一个奸细美国人是肯出高价的，但是他们是等不来这一天的，现在对我进行诽谤的人也是如此。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想指出，外国的工会根据我的文章来学习列宁的战术和行动纲领。我是能够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我在这方面的活动的。比如说，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脱离正确路线“误入歧途”，提出了“美国帝国主义具有进步性”的理论。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苏联的朋友，我按照约·维·斯大林的嘱托

同这个人谈了8个晚上。

后来波诺马廖夫企图利用这件事，他说洛佐夫斯基和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谈话。

全部情况我都已讲了，我不请求做任何减免。我要的是完全恢复名誉或是死亡。我把自己的毕生都贡献给了党的事业，我不愿做一个寄生虫。

如果审判庭认定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向政府提出请求，把刑罚给我换成枪决。然而如果什么时候调查清楚我是无罪的，那么我请求死后追行恢复我的党籍并在报纸上报道为我恢复名誉的消息。

13时5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

14时45分审判庭继续开庭。

被告克维特科：审判长公民，审判员公民们！

几十年来我一直是面向佩戴着少先队红领巾的无比欢乐的听众讲话，歌颂做一个苏联人的幸福。然而我却要以面对苏联人民的最高法院的发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被控告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这项捏造的罪名凭空落到了我的头上，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为什么我在这个法庭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泪水？

因为背叛祖国这个可怕的罪名是我——一个苏联人——所承受不起的。

假若能把如诉方所说我在国外充当间谍时转交的那些具体材料和足以证实我进行过反党斗争的文件向我出示，那么也就用不着在这个审判庭上反反复复地讲那么多的话了。

预审时曾经告诉过我，对我进行间谍活动的控告未能成立，可是后来我在起诉书中又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一些被控犯有同样严重罪行的人列在了一起。

从来也没有哪个人听到过我说任何对党和政府的坏话。你们完

全可以相信，如果有过什么这一类的事情，那它一定会在这个审判庭上暴露出来的。但是都知道我是一个苏维埃人，这儿在座的被告没有一个敢于和我谈他们的那些犯罪的计谋。

在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这段时期，我曾长久地试图找出自己所犯的罪行，但是没能做到。请问，我为什么要放弃握在自己手中的幸福——背叛给予了我一切的祖国——而投入帝国主义者们的怀抱呢。

我和他们可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党集团，我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联系，我所有的讲话、诗歌和文章都是拥护党的。

苏维埃国家给予了我一切。我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从不追逐稿酬。我和家人生活得很简朴，也没有更多的需要。

有哪些原因能促使我去背叛祖国呢？没有任何要这样做的原因，就如同背叛本身不存在一样。

我希望侦查机关如果控告我什么罪的话，能提出物证。如果他们企图断言我想把自己的苏联作家兼诗人这一光荣称号换成美国间谍这种称号的话，就让他们拿出这一方面的证据来。

现在我的头脑还没有完全昏庸，我认为要有某种背叛的行动才能被指控背叛祖国的。

我请求具体指明我往国外送交了什么机密文件。案卷里边没有这样的材料，因为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样的事情。

也许我是一个不好的工作人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坏人，必须与社会隔离，因而才控告我犯了重罪？

我对审判庭声明，我什么罪——无论是间谍活动或是民族主义的罪行——都没犯。我有过个别的错误，但是并没有罪恶的蓄谋，我感觉得到我使祖国感到不快，但我没有做犯罪的事。对我的全部控告都是凶狠的诬告人制造的可怕的谎言。

为用列宁主义精神教育苏联儿童出一份力那该是一种多么巨大

的快乐呀。我深知如果创作不具有我们现代的思想，那么它就会很快地凋萎，所以我虽然身在牢狱之中，可是心却感到自己是在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大家庭里，我没有停止在思想上同儿童交往，就这样还在监狱里就已经诞生了我的新的诗集《太阳》。

党是我的家和我的信念，任何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这股共产党员的强大力量。

我请求审判庭要考虑到起诉书中并没有据说是我仿佛进行与联共（布）和苏联政府为敌的活动的确凿证据，也没有我同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有犯法的联系的证据。我请求还要考虑到没有证据说明我要指示犹委会的记者们去收集谍报材料及我本要为此目的去克里木。

也没有证据说明我向戈尔德贝格转交了关于苏联的机密情报。

我认为所有这些指控在开庭审判的过程中都完全没能成立。我觉得我同侦查员们互换了角色，因为他们应该用事实来控告，而我这个诗人应该写创造性的作品。可是结果却相反。

我得声明，我同这儿在场的被告们不大认识，想不起曾和他们哪一个人有过什么样的交谈。我不是他们的帮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自己对犹委会所干的那些岂有此理的事情负有部分的责任，如果审判庭对鉴定的结论予以确认，那么我请求要考虑到我虽然并不推卸自己对犹委会的活动所负的责任，但并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刑事罪。我没有背叛祖国，对我列出的5条指控中我一条都不承认。我痛心地认识到自己未能具有敏锐的眼光，请求党加以原谅并给予我用自己的劳动赎罪的机会。

对我来说，在苏联的国土上坐牢也比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过“自由生活”更痛快。

我是苏联公民，我的祖国是党和人类的天才——列宁和斯大林的祖国，我认为我不可能没有证据就被定成重罪。

我希望我的论据能得到审判庭应有的考虑。

我请求审判庭能让我重新参加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诚实劳动。

被告贝格尔森：我不是诗人，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没有干过与党和苏联政府为敌的活动。

这一点我在法庭已经讲过了，现在我再重说一遍。

我不是犹委会的骨干，因为就不存在这种骨干，我也不知道有任何敌对性的勾结。

我知道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动员一切人同法西斯做斗争。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我本人收集过或是向国外送交过什么谍报性的材料，或者是向什么人交代过收集这一类材料的任务，然而我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想对苏联最高法院讲一讲自己的罪过。

我对让我进入犹委员会主席团这件事的看法太轻率了。我知道犹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名单是爱泼斯坦拟定的。他开列上去的都是在外国“有一定名气”的人，好让那边不至于说犹委会是一个政治组织。

党中央批准了对我的举荐是把对从犹委会寄往国外的材料负责的重担和信任加在了我的肩上。

我本该关注犹委会的活动，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委员会却干了别的事情。因此说我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应当做的事情，辜负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尽管我本人极少亲自参与犹委会的活动。

犹委会里有一些老党员，他们也和我一样“马虎大意了”。我感到自己在这一点上是有罪的。

我请求审判长公民和审判员公民们要注意到我的整个一生，并且，尽管我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的水平，考虑到我是从“中世纪”过来做到这个地步的。

我的文学活动在苏联和外国都受到很高的评价。

有人把我比作高尔基和福楼拜。有人把我和一些我向之学习并且热爱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相提并论。我把自己的作家才干全部献给了劳动人民，而不是我出身的那个阶层——富人。

我请求审判庭注意到我这个年纪的犹太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投身于苏联文学。例如肖洛姆·阿什，比亚利克，努姆贝格，还有其他的人。整个这一代作家中惟有我接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并用最近的 30 个年头写苏维埃题材。我向着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的水准努力前进，但是可能只差了一点点还未能达到，这是我的过错。

我错在没能达到一个苏维埃人所具备的那种警惕性的高度。

我请求最高法庭给予我这个年纪最大的犹太作家一个机会，倾全力为人民谋福祉，达到苏维埃人的水准。

被告霍夫斯坦：我的请求我已经在对法庭侦讯的补充发言中向审判庭表达过了。

被告伊利亚·瓦坚贝格：审判员公民们！所有同本案材料相关的情况都已经讲过了。我只想提请审判庭注意这样一个情况：本案的所有材料都直接证明了我是无罪的，控告的依据仅仅是我本人在预审时所做的供述，而这些口供我已经全部拒绝承认。我是在预审时各种错误情况的压力下才那样供述的。我不想把这些原因彻底揭破，如果审判庭认为可以相信我，那么我请求宣告我无罪。

而如果审判庭认定我有罪，那么我请求要考虑我从 1921 年起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循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路线前进的。

从 1929 年起我就在对外贸易方面真心实意地为苏联谋求利益，挽回了数十万苏联卢布的损失，而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尽心尽力地工作了 39 年。

我请求还要考虑到我成年之后选择了苏联作自己的祖国，我没有理由背叛这个祖国。

如果法庭认为我有罪，我请求在判决时考虑我的功绩及羁押

期。尽管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对我进行惩处，但如果审判庭认为我所受的惩罚还不够，那么我请求给我判处一种让我有可能在家里边运用自己的知识的刑罚。我还有一个请求：如果我妻子也要判罪的话，请让我们在一起服刑。

我还想说，1949年5月26日审问我的记录并不是速记稿。

后来我才弄明白这份记录是干什么用的。审讯之前告诉我塔尔米已经被捕，并且承认了自己犯有所指控的全部各项罪状，可是后来我看到他是根据我的那些供词才被捕的，我向审判庭声明，我的那些对塔尔米的供述不是真的。

我还对审判庭声明，我既没有犯间谍活动罪，也没有犯民族主义罪。

被告希梅利奥维奇：法庭审讯期间我已经有机会把全部情况向审判庭讲过了。现在我只想谈几个情况。整个预审期间我一次也没有想到我必须向审判庭讲些什么的问题。我只是讲了我所知道的事情。

在这个法庭上审理了关于议论撤换18名医学杂志编辑一事的问题。我要说，早在当时我就认为这些人是应该撤换的，不过这件事要做得很谨慎。

开庭审理期间我给审判长呈交了9份我致政府的声明的复制件，这些声明是我在侦讯期间写的，现在我相信它们会被送给党中央的。

讲两句克里木的事情。在这儿已经调查清楚，我和递送关于克里木的呈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爱泼斯坦对我说过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这样做的。案卷里边有一份据说仿佛是我在1944年2月份写的关于克里木的呈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上述日期与内容不符就表明了这一点。

除开已经说过的一切之外，我请求审判庭向相应级别的机关提

出请求，禁止在监狱实施肉刑。还要让安全部的个别工作人员改掉侦查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思想，叫他们明白我们最神圣的是党。

我请求改掉监狱的管理机关隶属侦查处的这种关系。

我想请求禁止个别的侦查员在审讯期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

根据我在法庭上讲的情况，我想请求严厉追究安全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责任。

预审时我从未承认过自己有罪。我在思想上对党，甚至对整个的安全部一次都没有疑惑过。但是安全部工作人员中有某些人，其中包括阿巴库莫夫的人品，却令人生疑，我请求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我的良心是无愧的，一直是有党性原则的，安全部的这些人并没能使我低头。

我想再一次强调，在庭审的过程中，起诉书没有任何东西站得住脚。预审时“搞到”的全部东西都是侦查员们，其中也包括留明，自己强加于人的。

我生命中最后这 30 年是很美好的，因为我从未依赖过个别的人，而只依靠党，是党在一直推动着我前进。

说到我同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有着某种联系，只要说明这样一个情况就足以驳倒这个说法了，那就是我在医院里工作的这 18 年间，有许许多多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外国人去医院，安全部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批评。

我非常爱我的医院，未必能有别的什么人会这样爱它。

另外，我对安全部交付的任务完成得比别的人要好。

根据所述的这一切，我请求审判庭依据控告不真实及缺少证据而中止我的这个案件，并解除对我的监禁。使我可以重新回到苏联

党的大家庭中并重新在包特金医院工作。

被告祖斯金：军事审判庭的审判员公民们！我想在最后的陈述中稍稍讲一讲我的生活经历。

伟大的十月革命成功时我是18岁。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负荷。革命使我成了一名享有充分权利的苏联公民，直至今日我也没有玷污这一崇高的称号。

我进入国家犹太剧院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后来成了我整个生活的一个悲剧。

我还没有对审判庭讲起过，当侦查员波格列布诺伊告诉我犹太剧院被关时，我对他说的是这件事做得对，我早就看出来必须这么办，我认为我的未来在俄罗斯剧院的舞台上和电影里。

最后我想对法庭说，我认为在党和苏联人民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没有做任何怀有敌意和居心不良的事情。如果军事审判庭能够相信我并还我以自由，我保证用诚实的劳动来证明我对党、苏联政府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

被告塔尔米：我在庭审一开始就声明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我认为这已经被证明了。在我分析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其中会有苦涩。有的只是为儿子的命运感到痛苦，我没有把他保护好，有的只是替妻子感到痛苦，她落下了罪犯的母亲、被抓起来的男人的妻子的恶名。

我不认为我在监狱里度过的这一段时间失去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加觉悟、更有经验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写成了几部作品，我已把它们交给了审判庭。这些作品不无某些文学上的和政治上的长处，它们反映了我的感情和思想。对于一个苏维埃人来说，衡量他是否合格的尺度，就是他对社会是否有益。在我被捕之前的30年的劳动生涯中我未曾感到过羞愧。

我还应当说，虽然我不是敌人，没有在祖国、党和苏联政府面

前犯下罪行，但我是有个别的错误的，为此我应该受到惩处。

我请求把开庭审判前这段时间的先行羁押就算作是对此的惩处吧。我希望判决能容许我投入到苏联人民的紧张的工作中去，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被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希望审判庭相信我和诺维克之间没有任何间谍联系。我向他转交情报那件事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但不是间谍活动。我请求要考虑到预审时我关于同戴维斯交谈的供述是假的，是我处在狂乱的状态那段时间里供述的。

我跟犹委会完全没有关系，我想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民族主义情绪，我离开美国来到苏联是因为我在那里生活感到很苦恼，当然是在精神上，所以我不可能对那种生活感到惋惜。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是我的愿望。从1934年起我就在苏联老老实实地干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或许我个别地表现出某些庸俗的情绪，但不是反苏性质的情绪。

如果审判庭还是认定我有罪，我请求能够让我和丈夫一块服刑。

我还想告诉法庭，所有那些预审时“我的供词”都是侦查员的创作成果，与事实不符。

被告什泰恩：我想就我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对法庭做一些解释。我想说，在对待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的态度上我不是奴颜婢膝的，但是对于那些我曾把他们当作老师的科学家们，我为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一切而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激和敬意。这并不能降低我对苏联的政府和党的领袖们所怀有的尊敬。

我将永远感激他们给予了我的那一切。

如果说在旧时代俄罗斯人得向西方去寻求知识的话，那么现今科学的中心移到了东方，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拒绝接受那边做出来的那些科学发现。

苏联的科学超过了西方的科学，是最现代化的科学，但是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成就加以利用并不是什么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以我的观点看，被作为世界主义而加罪于我的东西正是国际主义。我们的科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律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这是它与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差别。

我想请求审判庭能够让我得以运用我50年的工作经验去解决我所研究的那些问题。

逮捕我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要比给犹委会的整个活动带来的损害要大得多，因为这有可能使我所进行的工作名声扫地，毁掉已经取得的成果。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医学上的一个新的篇章，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把我所掌握的一切带到坟墓里去。我觉得我的工作对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进行的治疗心脏病方面的第二项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第三项工作是研制确实可用的治疗药剂。

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再一次请求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继续工作。

如果审判庭认定我有罪，那么我请求让我和研究所党组织的书记见面，我和他已经共事29年，我要向他交代今后的工作方向。

我只请求审判庭不要认为我犯了背叛祖国和叛变了党和苏联政府的罪。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进行工作，而为了很好地进行工作，必须照旧予我以信任，并完全恢复名誉，这样我才能继续为人民、为我们的祖国服务。我认为自己的祖国不仅仅是苏联的国土，而且也是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国土。

17时50分审判庭人员离开法庭去会议室做判决。

№11731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洛佐夫斯基等人的判决书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7月18日12时00分审判长宣布开庭，宣读军事审判对本案的判决，并对判刑人员讲解他们有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请求赦免的权利。

13时05分审判庭闭庭。

审判长 亚·切普佐夫 (签名)

书记员 阿法纳西耶夫 (签名)

判 决 书

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授权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由

军法中将切普佐夫任审判长

军法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及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任审判员

阿法纳西耶夫上尉作为书记员出席

于1952年7月11~18日

在莫斯科市对以下人员提出控告：

1. 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年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区丹尼洛夫卡村人，犹太族，苏联公民，

已婚，高等学校毕业，1949年被开除联共（布）党籍，原任苏联情报局局长；

2. 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1900年生，基辅州什波拉镇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学校毕业，1919年加入联共（布），犹太诗人，原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秘书；

3. 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1890年生，华沙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教育程度，1917年加入联共（布），原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4. 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1892年生，里加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教育程度，1920年加入联共（布），原任包特金中央临床医院主任医师；

5. 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1890年生，敖德萨州戈洛斯科沃村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受家庭教育，1941年加入联共（布），诗人，苏联苏维埃作家协会会员；

6. 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1895年生，原沃伦省现日托米尔州波隆诺耶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受教育程度自学，1939年加入联共（布），诗人；

7. 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法伊洛维奇，1882年生，基辅省，即今文尼察州萨尔内地区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受家庭教育，非党员，诗人；

8. 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1889年生，基辅州科罗斯特舍夫地区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教育程度，1940年加入联共（布），诗人；

9. 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1899年生，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帕涅韦日斯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学校毕业，非党员，演员，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

10. 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夫娜，1878年生，拉脱维亚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耶帕亚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未婚，1938年加入联共（布），原任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

11. 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1893年生，巴拉诺维奇斯克州利亚霍维奇地区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非党员（原美国共产党党员），高等学校毕业，捕前任苏联情报局的新闻记者兼译员；

12. 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1887年生，斯坦尼斯拉夫市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非党员，受高等法学教育，捕前任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审；

13. 泰乌明，埃米莉娅·伊萨科夫娜，1905年生，伯尔尼市（瑞士）人，犹太族，苏联公民，未婚，高等教程度，1927年加入联共（布），捕前担任“外交辞典”副主编，曾任苏联情报局国际部编辑；

14. 瓦坚贝格-奥斯特格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夫娜，1901年生，基辅州兹韦尼哥罗德村人，犹太族，苏联公民，已婚，高等学校毕业，非党员，捕前担任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译员，曾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译员。

——对以上人员犯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第58-2条各条款所规定之罪行一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经预审及法庭审理查明，为了动员国外的犹太人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及在国外的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成就，1942年4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委会），归苏联情报局领导。

洛佐夫斯基系联共（布）党内一个暗藏的敌人，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反对过党的路线并因此被两度开除出党，他作为苏联情报局的

副局长，利用了犹委会这个组织，联合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斗争。

洛佐夫斯基作为犹委会直接领导人，为此目的约来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已亡故）分别担任犹委会的主席和责任秘书的工作，而此二人为了保证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得以开展，在洛佐夫斯基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又找来一些有名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任主席团委员，担任犹委会的领导工作：犹太诗人费费尔——前崩得分子，以前在自己的作品中非止一次地表达了民族主义者的立场；犹太诗人克维特科和马尔基什及犹太作家贝格尔森——此三人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抱敌对态度，在1920～1921年间逃往国外，并在国外发表作品诽谤苏联的现实和联共（布）与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返回苏联之后又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民族主义的观点；什泰恩——出身于阶级异己阶层，1925年自国外来苏联；希梅利奥维奇——前崩得分子；尤译福维奇——过去在1917～1919年间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的首领之一；及祖斯金。

此外，在洛佐夫斯基知情并经他同意的情况下，被吸收为犹委会成员的还有：犹太诗人霍夫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1925～1927年居留国外，并在巴勒斯坦的反动犹太报刊上发表过民族主义的作品；塔尔米——1917～1920年间曾在乌克兰积极参与一些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的工作，1921年逃往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并在那里继续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瓦坚贝格——1905年至1924年曾先后在奥地利和美国充任犹太人民族主义政党“波阿列伊—锡安”的首领之一。

这样的人员组成不仅保证了洛佐夫斯基及其同伙得以打着犹委会的旗号在苏联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敌对的民族主义活动，而且为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民族主义集团建立罪恶的联系创造了条

件，因为犹委会领导人员中多数在国外都以犹太民族主义者著称。

犹委会成立不久，其领导人员就以履行交给该委员会的任务为掩护，开始开展民族主义的活动，并同美国的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给这些组织寄送关于苏联经济的情报以及关于苏联犹太人的状况的诽谤性情报，期望用这种办法获得犹太资产阶级群体的物质援助并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

1943年5月，洛佐夫斯基借口加强对苏联的成就和对反法西斯斗争两个方面的宣传，设法使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获准去美国访问，要他们同美国的犹太人民族主义群体建立个人的接触，以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斗争。

去美国之前，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根据洛佐夫斯基的指示收集了一系列关于苏联工业的材料，去后交给了美国人。

在美国逗留期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百万富翁罗森贝格，布季什，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魏茨曼及其他人建立起联系，向他们通报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犹太人的状况的诽谤性情报。

在同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晤谈中，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商定了在苏联加强民族主义活动的措施，而且作为提供物质援助的交换条件，罗森贝格要求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必须设法获得苏联政府的准许，让犹太人迁居克里木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共和国，如罗森贝格所说的，此事与美国的犹太人利害相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还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除此之外，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还同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商定要经常寄运广泛的关于苏联经济的情报。

1943年底返回苏联后，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把同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相勾结的犯罪行为向洛佐夫斯基和其他的同谋者做了汇报。

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爱泼斯坦和希梅利奥维奇按照罗森贝格交付的任务，在其同谋们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给苏联政府写信，提出向克里木迁居犹太人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而且此信在送给政府之前经过洛佐夫斯基的校阅。

洛佐夫斯基及其同谋者在信中诬蔑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说在苏联似乎是盛行反犹太人主义，苏联的犹太人“没有得到安置”，“犹太人问题”没有解决，还说“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民群众都将对犹太共和国的建设给予物质援助。

与此同时，犹太会的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及其同谋者在洛佐夫斯基知情的情况下，扩展了收集及向美国寄送关于苏联经济的情报的活动。为此目的费费尔和其他人吸收了居住在莫斯科及苏联其他城市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充当记者。这些记者执行犹太会领导人的指示，到各种工业企业、新的建筑工程和科研机构去参观，借口考察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形收集有关这些企业工作状况的间谍情报。

此外，犹太会居领导地位的人员——霍夫斯坦、贝格尔森、克维特科和其他一些人——还到苏联的各个地区去收集同样的情报。

本案所做鉴定的报告书确认犹太会领导人寄往美国的材料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保密的，构成了国家的机密。

1943~1946年美国新闻工作者、犹太民族主义者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在苏联逗留期间，洛佐夫斯基和费费尔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报。

一批有关苏联的经济和拉脱维亚、立陶宛及爱沙尼亚三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的机密材料以及洛佐夫斯基从第205科学研究所弄来的关于该国对外政策的机密材料，在洛佐夫斯基的组织下交付给了间谍戈尔德贝格。

另外，洛佐夫斯基让费费尔陪同戈尔德贝格去波罗的海沿岸和

乌克兰，在这两个地方戈尔德贝格由费费尔协助和当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也获得了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侦察资料。

为达到他们为反对党和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而斗争的罪恶目的，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尤泽福维奇、希梅利奥维奇、克维特科、马尔基什、贝格尔森、霍夫斯坦、什泰恩、祖斯金、塔尔米和伊·瓦坚贝格按照美国的犹太人民族主义集团交代的任务，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广泛地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此目的，他们利用了 在犹太委员会管辖下办起来的犹太文报纸《埃尼凯特》报、“德尔埃梅斯”出版社、犹太文学作品选集、犹太剧院和乌克兰科学院所属的犹太文化研究室。

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当众演说、发表在《埃尼凯特》报上的文章及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宣扬犹太人的民族局限性和特异性，宣扬关于犹太民族具有特殊性的欺骗性论题，说这个民族据他们讲仿佛是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表现了特殊的英勇精神，在劳动和科学研究上据他们讲仿佛是有着特殊的功绩。

他们把远古的历史加以理想化，以民族主义精神歌颂圣经人物，鼓吹全世界的犹太人不分阶级仅按“同一血统”的特征“亲如兄弟地”团结起来的思想，从而同美国、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

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同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鲜明例证，就是 1946 年出版了所谓的“黑皮书”，这件事是犹太委员会经洛佐夫斯基同意与美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共同进行的。

在这本书里犹太人特别单独列为一个与其他民族相对照的类别，夸大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把注意力仅只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所遭受的牺牲上，贩卖法西斯主义据说仅仅是对犹

太人，而不是对所有各个民族及世界文明具有威胁性的思想。

由于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他们的同谋者进行反苏活动，犹太人当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开始去找犹委会，请求派他们到巴勒斯坦去，要求组织志愿部队参加到以色列国方面去，大量的控诉信件纷至沓来，诬蔑说在地方上仿佛有压制犹太人的事情。犹委会的领导人——费费尔和其他的人——根据这些控诉信件给各种政府组织发函，要求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

犹委会的领导人擅自扩大该会的职权，办起了安置送往比罗比詹的犹太移民、安置从疏散地点返回的犹太人、安排乌克兰和克里木的前被占领区犹太人的劳动就业等事项。

犹委会领导人所做的这一切反苏的犯罪的事情，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和民族主义的活动的中心。

法庭调查确定，这种犯罪的反苏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洛佐夫斯基和费费尔，而被告人尤泽福维奇、希梅利奥维奇、克维特科、贝格尔森、马尔基什、霍夫基坦、祖斯金、塔尔米、什泰恩和伊·瓦坚贝格不仅了解犹委会进行的犯罪活动，而且还亲身积极参与了这种活动。

比如，被告人希梅利奥维奇非止一次地在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言主张在苏联国内外扩大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还诽谤说在苏联对犹太人有歧视。致信政府要求在克里木组织犹太共和国是按照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布置办的，希梅利奥维奇是该信的起草者之一。

被告人贝格尔森出身于大商人家庭，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从1918年开始就进行民族主义活动，是犹太民族主义组织“文化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怀着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逃往国外，在国外为犹太人反动报刊撰稿多年，发表过多篇反苏的民族主义内容的文章。1934年返回苏联后继续从事民族主

义活动。除积极参与犹委会主席团的反苏工作外，还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宣扬犹太民族的民族局限性、特异性和特殊性，宣传全世界的犹太人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的思想，并歌颂圣经人物。

在会见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时向他通报了一系列关于比罗比詹的情报。

被告人克维特科逃往国外后，于1925年返回苏联，在哈尔科夫市参加了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犹太人民族主义文学集团“战斗”。

犹委会成立初期担任委员会的副任秘书，同民族主义者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罪恶地勾结到一起，协助他们收集关于苏联经济的材料寄往美国。

1944年执行犹委会领导的罪恶指示，到克里木去收集关于该州的经济情况和犹太人状况的情报，是倡议向政府机关提出关于据说是在克里木仿佛存在着犹太人受歧视问题的人之一。

在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要求扩大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活动。

1946年同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建立了个人间的联系，向他通报了苏联作家协会的情况，并对他表示同意出版苏美文学年鉴。

被告人马尔基什在国外期间曾同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有联系，并为犹太人民族主义报刊撰稿，1926年自国外返回苏联后在国内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7年居留哈尔科夫市期间同犹太人民族主义文学集团“战斗”有联系，1940年同在明斯克市活动的一批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犯罪的联系。

担任犹委会主席团的委员，在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中宣传全世界犹太人不分阶级地团结起来的思想，并歌颂圣经人物。

1945年同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会面数次，向他转交了关于苏联犹太人作家的情绪的情报。

被告人霍夫斯坦作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国内战争时期曾在基辅市积极参与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的反苏活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诽谤苏维埃政权。

1925年从苏联逃往德国，后又逃至巴勒斯坦，在那里曾为反动的犹太报刊撰稿。

1927年从巴勒斯坦返回基辅市，继续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活动。

作为犹委会积极成员之一及该委员会驻乌克兰的代表，曾同基辅和利沃夫两市的一些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及犹太人宗教团体联合进行反苏活动。1946年同来基辅市的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建立起犯罪的联系，协助他收集令他感兴趣的情报，并把一些关于乌克兰犹太人的生活的诽谤性谰言通告给他。

被告人尤泽福维奇在1944年曾把关于苏联工会工作的机密材料交给美国间谍伊甘，1945年按照洛佐夫斯基布置的任务同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建立起联系，并向他转交了关于苏联的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的机密材料。

也是按照洛佐夫斯基交代的任务，把第205研究所的关于英国的对外政策的机密材料交给了戈尔德贝格。

被告人什泰恩系犹委会主席团的委员，不止一次地在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表反苏的民族主义内容的讲话。1945年和1946年同一批居住在莫斯科市的外国人建立了联系，并向美国人马德和莱斯利通报了苏联科学家正着力解决的科学问题，还把一些关于苏联科学院她领导的那个研究所的科学研究项目情况的情报告知了英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特里普。

被告人祖斯金系犹委会主席团委员，同时也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主力演员，本案审理过程中查明，该剧院系犹委会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分支机构之一，祖斯金和米霍埃尔斯一起在此剧院上演歌颂

犹太人的古代历史、乡镇的传统和生活以及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的戏剧，以此煽动犹太观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往美国寄过数篇关于苏联艺术现状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

被告人塔尔米长期进行民族主义活动。比如，从1913年至1917年居留美国期间是反动的犹太社会—疆土党的成员，做过该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后来又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书记。1917年来到苏联，在基辅市积极参加了一些犹太民族主义组织的工作。1921年从苏联逃往美国，在那儿加入了美国国籍，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9年以旅游者的身份与其他一些美国人一起来到苏联，和犹太民族主义者取得了联系，由他们帮助收集了一些有关比罗比詹的情报。

1932年来苏联定居，遵照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指示同莫斯科市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建立起联系。

作为犹委会的成员，参与了民族主义的活动。

1946年会见美国新闻工作者诺维克时，向他通报了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情报及关于苏联犹太人生活的诽谤性情报。

被告人瓦坚贝格居留国外期间，从1905年至1924年进行了民族主义活动，先在奥地利后在美国担任犹太人政党“波阿列伊—锡安”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参与了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进行的派别之事。在1926~1929年曾以旅游者身份来苏联，在这里同犹太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收集了一系列有关地罗比詹的情报。

1933年来苏联定居，重又同在苏联进行反苏活动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建立起联系。

作为犹委会的成员，参与了犹委会进行的民族主义活动。1946年会见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诺维克时，向他通报了苏联的经济状况，并给他报告了一些关于苏联犹太人的生活情况的诽谤性情报。

被告人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怀有民族主义情绪，在犹委会担任译员工作，她了解犹委会首领们的民族主义活动，并按照他们的布置把一些要寄给美国的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从犹太文译成英文。1945~1946年在莫斯科市会见美国人诺维克和戴维斯时，向他们通报了有关居住在地罗比詹和几个中亚苏维埃共和国内的犹太人情况的资料。

被告人泰乌明在苏联情报局担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部的编辑，经常同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见面，赞同他们的反苏民族主义观点，1945年按照洛佐夫斯基的布置收集了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的机密材料，并避过书刊检查机关，亲自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

根据上述事实，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认定洛佐夫斯基、费费尔、贝格尔森、尤泽福维奇、希梅利奥维奇、马尔基什、祖斯金、克维特科、什泰恩、霍夫斯坦、泰乌明、伊·瓦坚贝格、列·塔尔米和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已经触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和第58-2条所规定之罪行。依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之规定，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如下：

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
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
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法伊洛维奇，
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
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
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
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
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
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

泰乌明，埃米莉娅·伊萨科夫娜，
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
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
和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夫娜

所犯罪行数罪并罚，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58-1 条 a 款之
规定判处极刑——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夫娜所犯罪行数罪并罚，按照俄罗斯
联邦刑法典第 58-1 条 a 款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51 条之规定，
判处劳动改造营监禁 3 年又 6 个月，剥夺权利 3 年，不没收财产，
监禁期满后，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35 条之规定，将罪犯什泰
恩逐往边远地区 5 年。

罪犯什泰恩预先羁押的时间折抵监禁期限，从 1949 年 1 月 28
日起计算。

剥夺奖章：

洛佐夫斯基——“保卫莫斯科”奖章 1 枚，“莫斯科建城 800
周年”奖章 1 枚；

费费尔——“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 2
枚；

贝格尔森——“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
章 1 枚；

尤泽福维奇——“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
奖章和“莫斯科建城 800 周年”奖章各 1 枚；

希梅利奥维奇——“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
奖章、“保卫莫斯科”奖章、“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
劳动”奖章和“莫斯科建城 800 周年”奖章各 1 枚；

马尔基什——“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

和“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各1枚；

祖斯金——“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

克维特科——“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

霍夫斯坦——“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

泰乌明——“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和“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

伊·瓦坚贝格——“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1枚；

塔尔米——“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

瓦坚贝格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枚

及什泰恩——“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和“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奖章各1枚。

报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勋章：

洛佐夫斯基——列宁勋章和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各1枚；

费费尔——“荣誉”勋章1枚；

希梅利奥维奇——劳动红旗勋章和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各1枚；

马尔基什——列宁勋章1枚；

祖斯金——劳动红旗勋章1枚；

克维特科——劳动红旗勋章1枚；

霍夫斯坦——“荣誉”勋章1枚；

泰乌明——“荣誉”勋章1枚；

什泰恩——劳动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各1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原本经相应人员签名。

与原本核对无误。

军事审判厅法庭书记员、上尉 阿法纳西耶夫（签名）

№11732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执行判决证明书

(不早于1952年8月12日)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关于1952年7月18日判决执行完毕的证明书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52年7月18日对罪犯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年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丹尼洛夫卡村人处以极刑——枪决的判决已于1952年8月12日执行完毕。

苏联安全部 A 司第一处第三科科长、

上校 沃罗比约夫

对伊·所·费费尔、列·莫·克维特科、佩·达·马尔基什、韦·利·祖斯金、列·雅·塔尔米、鲍·阿·希梅利奥维奇、达·拉·贝格尔森、达·瑙·霍夫斯坦、伊·谢·瓦坚贝格、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埃·伊·泰乌明、约·西·尤泽福维奇也有同样的关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的判决已于1952年8月12日执行完毕的证明书。

№ 11733

关于布雷格曼的死亡证明书

(1953年1月23日)

在押犯人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1895年生，1952年6月16日因患代偿失调性二尖瓣膜症伴有心病性哮喘现象、高血压症、动脉硬化症、肺硬化症、继发性肾萎缩症而住入布特尔监狱卫生处医院，于1953年1月23日12时05分死亡。

在押犯人布雷格曼因出现心力衰竭现象而死亡。

医生 斯米尔诺娃

1953年1月23日

№11734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终结布雷格曼的
刑事案件的判决书

(1953年6月3日)

裁 决 书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由

军法中将切普佐夫任审判长

军法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及

军法少将扎里亚诺夫任审判员

书记员上尉阿法纳西耶夫出席

无国家公诉和辩护机关的代表参加，不公开开庭

于1953年6月3日在莫斯科市对以下人员提出控告：

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1895生，兹伦卡市人，商人家庭出身，犹太族，中等教育程度，1912年入党的联共（布）原党员，原任俄罗斯联邦国家监督部副部长——犯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及第58-2条各条款所规定之罪行一案进行了审理。

现查明：

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因所犯之罪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法庭审判。在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所·列·布

雷格曼患病，被送进卫生处治疗，而对他这一案件的审理经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1952 年 7 月 9 日裁定暂停。

据布特尔监狱卫生处陆续发给军事审判厅的报告说，被告人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布雷格曼的健康状况在他在卫生处治疗的整个期间都不允许他出庭接受对控告他的实质问题进行审理。

从法庭得到的苏联内务部布特尔监狱卫生处的报告获悉，被告人所·列·布雷格曼已于 1953 年 1 月 23 日死亡，此事并由 1953 年 1 月 26 日进行的尸体剖验报告书所证实。

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319 条和 320 条之规定，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

裁决

对控告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的刑事案，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4 条第 1 款之规定，不再继续进行刑事上的审理。

审判长 切普佐夫（签名）

审判员 德米特里耶夫（签名）

扎里亚诺夫（签名）

№11735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关于撤销对洛佐夫斯基
等人的判决并终结该案的裁决书**

(1955年11月22日)

苏联最高法院裁决书

0065 / 52

由

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A. A. 沃林任审判长

军法上校 Г. E. 科瓦连科及

军法上校 H. A. 达申任审判员

于1955年11月22日组庭审查了苏联总检察长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52年7月11~18日的判决所做出的鉴定，该判决对：

1. 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1878年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丹尼洛夫卡村人；

2. 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1900年生，基辅州什波拉镇人；

3. 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1890年生，华沙市人；

4. 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1892年生，里加市

人；

5. 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1890年生，敖德萨州戈洛斯科沃村人；

6. 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1895年生，日托米尔州波隆诺耶市人；

7. 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法伊洛维奇，1882年生，文尼察州萨尔内地区人；

8. 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1889年生，基辅州科罗斯特舍夫地区人；

9. 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1899年生，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帕涅韦日斯市人；

10. 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1893年生，巴拉诺维奇斯克州利亚霍维奇地区人；

11. 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1887年生，斯坦尼斯拉夫市人；

12. 泰乌明，埃米莉娅·伊萨科夫娜，1905年生，（瑞士）伯尔尼市人；

13. 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夫娜，1901年生，基辅州兹韦尼哥罗多克村人

——以上13人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8-10条第2节、第58-2条并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之规定均判处极刑——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

14. 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夫娜，1878年生，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利耶帕亚市人——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第50-10条第2节和第58-2条，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条a款之规定，兼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第51条之规定，判处劳动改造营监禁3年又6个月，剥夺权利3年，不没收财

产，监禁期满后依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5条之规定，将之逐往苏联边远地区5年。剥夺罪犯们受到的政府奖励。

听取了Г.Е.科瓦连科同志的报告及苏联副总检察长、一级检察官П.В.巴拉诺夫同志关于洛佐夫斯基等人一案因缺少构成反革命罪的要件应撤销原判并结案的鉴定结论，——

判决书接着讲述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52年7月18日的判决书中所陈述的各项指控的主要之点。

……苏联总检察长在鉴定结论中请求，根据新发现的情况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52年7月11~18日对洛佐夫斯基，所·阿、费费尔，伊·所、尤泽福维奇，约·西、希梅利奥维奇，鲍·阿、克维特科，列·莫、马尔基什，佩·达、贝格尔森，达·拉、霍夫斯坦，达·瑙、祖斯金，韦·利、什泰恩，莉·所、塔尔米，列·雅、瓦坚贝格，伊·谢、泰乌明，埃·伊、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谢所做的判决以及军事审判厅1953年6月3日对布雷格曼，所·列所做的裁决，终结他们这一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理由如下：

苏联检察院遵照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73~378条规定之程序再次进行侦查查明，逮捕费费尔、希梅利奥维奇并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原领导人立案侦查的依据，乃是此前被逮捕的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两个人的口词。在此之前，1947年12月19日未经检察长批准，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逮捕了戈尔德施泰因。戈尔德施泰因被捕之后，尽管国家安全机关并不掌握这方面的任何材料，侦查员索罗金和苏联国家安全部要案侦查处的两个前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却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逼迫他供认据他们说仿佛进行了间谍和民族主义的活动。

由于戈尔德施泰因很长时间都不承认自己犯了罪，索罗金和科

马罗夫按照依旧是那个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对戈尔德施泰因进行毒打，这样就迫使他们在他们经阿巴库莫夫秘书处工作人员布罗韦尔曼的参与而炮制出来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

1947年12月28日，根据这些伪造的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逮捕了格林贝格，在利哈乔夫进行审讯时他很长时间都没承认自己有罪，后来还是在利哈乔夫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这份记录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所供的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他一些人据说仿佛在进行积极的反苏活动，以及他们同美国的侦察机关有犯罪的联系。

苏联国家全部要案侦查处前副处长科马罗夫在他1953年6月15~22日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1948年侦查处办苏联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原研究员戈尔德施泰因的案件，我参加了对他的审讯……对戈尔德施泰因审过几次之后，阿巴库莫夫……说……戈尔德施泰因打听苏联政府首脑及其家属的私人生活情形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本意，他的背后有外国的侦察机关。我们并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材料，然而还是开始朝这个方向审问戈尔德施泰因。开始他不承认指控的这种罪状，但是在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打了他一顿之后，戈尔德施泰因招供了……对戈尔德施泰因的口供阿巴库莫夫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只是说，他不能把戈尔德施泰因的口供压下，他有责任把它报告给上级机关……”

于是，靠殴打而取得的戈尔德施泰因未经核实的口供使得格林贝格遭到逮捕，而格林贝格的口供又成了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复查材料卷1，案卷页36）。

从侦讯期间格林贝格写给利哈乔夫的几份声明中可以看出，他

不承认自己有罪，而那些关于他的犯罪活动和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的活动的口供是利哈乔夫使用欺骗和允诺释放格林贝格的方法取得的。

在1949年4月19日的声明中格林贝格给利哈乔夫写道：

“4个月前你曾正式对我宣布说，我的案子已经了结，我不久就可获释，可遗憾的是，结果并非如此。我已被关押16个月，体力越来越虚弱了……”（复查材料卷3，案卷页41）。

讲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和其他一些人犯罪活动的那份格林贝格的审讯记录日期注明为1948年12月17日，也就是格林贝格写上面这份声明之前整整4个月。1949年12月22日格林贝格死亡（复查材料卷1，案卷页50，70，73）。

可见，重新侦查获得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他人就是根据阿巴库莫夫及其同谋们伪造的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口供被逮捕的。

预审时，除希梅利奥维奇之外所有的被告人都承认了自己有罪，并且详细地供述了据说仿佛是犹委会的领导人进行的反苏犯罪活动，但是到了军事审判庭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开庭审理的时候，仅有费费尔一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并对其他的人做了揭发，然而在法庭审理临近终了时，费费尔请求秘密开庭，秘密开庭时，在其他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推翻了自己的口供，声明他是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工，化名“佐林”，按照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布置行动（法庭记录卷8，案卷页1~3，68~69）。

此外，就在这次秘密开庭时费费尔声明：

“……早在我被逮捕的那天夜里阿巴库莫夫就告诉我，如果我不招认，我就要挨打。所以我害怕了，这就是我在预审时做了不实的供述的原因。”

经复查查明，费费尔确实曾和安全部的机关进行合作。还查

明，费费尔曾受到阿巴库莫夫的传唤，在他那儿受审 35 分钟，不过那次传唤费费尔去见阿巴库莫夫没有做记录（复查材料卷 1，案卷页 74，卷 2，案卷页 125）。

费费尔还对审判庭声明，在履行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206 条之后，侦查员库兹明把他传去，要求他，费费尔，在法庭上必须确认他在预审时所做的全部供述。

在侦查过程中查明，苏联安全部的原工作人员确实执行了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

苏联安全部要案侦查处的原工作人员留明、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库兹明及其他人证实，对本案的被捕人员采用了非法的侦讯方法。

从费费尔在法庭上所做的解释以及进行补充侦查时获得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出，侦查人员知道费费尔会见美国犹太人群体的领导人是得到了苏联驻美国代表的批准的，这些代表们对费费尔在美国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尤泽福维奇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指控在 1943~1946 年同美国间谍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建立了犯罪的联系，并且给了他们关于苏联的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其中包括一份第 205 研究所的关于英国的对外政策的机密材料。

当庭受到审讯的第 205 研究所前所长普赫洛夫供称，该研究所确曾应洛佐夫斯基之请求准备了一份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材料，并交给了洛佐夫斯基。据普赫洛夫的供述，这份材料是根据英国报刊登载的资料编写而成，并不含有任何机密性的消息。

侦查机关也知道，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美国的进步人士，他们因积极从事有利于苏联的活动而遭到美国侦察机关的调查。

从 1955 年补充侦查所获得的材料中得知，诺维克是一位工人运动老资格活动家，1921 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目前担任美国共产

党的报刊《自由晨报》的主编。从这些材料中还了解到，戈尔德贝格访苏回去之后，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客观地写苏联犹太人的生活的文章（复查材料卷1，案卷页79~80）。

对洛佐夫斯基等人一案进行过两项鉴定：一项是为了判定犹太委员会工作人员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另一项是要判明他们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

经复查认定，这两项鉴定做得不客观，且严重地违犯了法律。在补充复查时接受审讯的鉴定人员供称，他们是在侦查员们的直接监督之下进行鉴定的，侦查员们对鉴定人员的影响力极大，使得他们在一些时候做出了他们所查阅的文件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来的结论（复查材料卷1，案卷页270~273；280~287）。

在1955年进行的再次侦查过程中查明，鉴定人员1951年所做的结论中指列的那些材料并不是保密的，不构成含有国家机密的情报（补充侦查材料卷2，案卷页58~62）。

因其他案件被捕的海金、海菲茨、托卡里、别列尼基、舍伊宁、索罗金及其他一些人的审讯记录的复制件被当作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他人的犯罪证据附在了本案的案卷中。复查查明，这些人都推翻了自己的口供，目前他们的案件业已终结。推翻自己口供的还有斯特龙金、加尔金、卡甘、德鲁克尔、巴赫穆茨基及其他几个人，这些人的审讯记录复制件也放进了洛佐夫斯基等人的案卷中。

案卷材料还指出——这一点在苏联总检察长的鉴定结论中也提到了——因此案被判罪的人中有一些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期间盗用他们并不具有的职权：以委员会的名义干预解决犹太族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提请释放关押在劳动改造营中的犹太人等等，还有：在他们的个别文学作品、信件及谈话中有时候出现民族主义性质的言论。

阿巴库莫夫及其同谋者们利用了这一点，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这些行为提高到反革命国事罪的高度，然而在这件事

情上并没有材料能够为控告洛佐夫斯基和其他的人犯了诸如背叛祖国、进行间谍活动及其他的反革命罪行等重罪提供根据。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查了本案及补充侦查的材料，同意苏联总检察长鉴定结论所列举的论据，认定洛佐夫斯基等人的案件系苏联国家安全部前工作人员、人民的敌人阿巴库莫夫、留明、科马罗夫、利哈乔夫（以上4人已由军事审判厅定罪，判处枪决）及其他一些人制造的一起假案，因此由于其行为缺少构成反革命罪的要件，对洛佐夫斯基等人的判决应予撤销，对他们的案件应予终结，现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73条第3款及第378条之规定——

裁 决：

因缺少犯罪的构成要件，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52年7月11~18日对洛佐夫斯基，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费费尔，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尤泽福维奇，约瑟夫·西吉兹蒙多维奇、希梅利奥维奇，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克维特科，列伊巴·莫伊谢耶维奇、马尔基什，佩列茨·达维多维奇、贝格尔森，达维德·拉法伊洛维奇、霍夫斯坦，达维德·瑙莫维奇、祖斯金，韦尼阿明·利沃维奇、什泰恩，莉娜·所罗门诺夫娜、塔尔米，列昂·雅科夫列维奇、瓦坚贝格，伊利亚·谢苗诺维奇、泰乌明，埃莉娅·伊萨科夫娜和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柴卡·谢苗诺夫娜的判决及军事审判厅1953年7月3日对布雷格曼，所罗门·列昂季耶维奇的裁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条第5款之规定，终结他们这一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

原本经相应人员签名。

与原本核对无误。

军事审判厅法庭书记员、
大尉 阿法纳西耶夫（签名）